ローマ人の物語

罗马人的故事

Ⅶ

臭名昭著的皇帝

[日] 盐野七生◎著 涂华忠◎译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从美丽的卡布里岛到火烧罗马城
短短54年间，罗马皇帝几经更迭
四位皇帝是否果真臭名昭著？

是英雄创造的时代已远
还是暴君当道的世纪来临？
他们究竟是帝国覆亡的推手
还是帝国变局中的一页？



王石 王巍 | 作序 |

版权信息

书名:罗马人的故事7：臭名昭著的皇帝

作者:[日]盐野七生

译者:涂华忠

ISBN:9787508634630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金币故事





本书中涉及的事件是公元1世纪之后50年内发生的事情。此外，我撰写的《罗马人的故事14·基督的胜利》是预示罗马帝国覆灭的公元4世纪。从这个时代往前追溯300年，回到公元1世纪，正是罗马人对罗马历代帝王谩骂指责的年代，但同时也是罗马人自身觉得幸福的时代。

原本“臭名昭著的皇帝”这个题目源于与这些皇帝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古罗马知识分子，比如塔西佗，以及追随这些大师脚步的西欧史学家们对皇帝的评价。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此处借用这个题目意思却与之相反。当我们武断地认为这些皇帝都不是明君时，事实果真如此吗？想必大家确实有此疑问。然而，在这些恶名昭彰的帝王们的统治时期，当时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无论从铸造技术还是金银纯度，都让公元4世纪的货币望尘莫及。

盐野七生

2005年夏于罗马

银币故事





写作本书时，我的立场只是旁听，而并非他们的辩护人。就好比辩护人出示大量史实，证明他们是明主而非暴君时，我只能坐在旁听席上，认真聆听监察官与辩护人的说辞，认真思考真相到底如何。

经过连日审判，我得出一个结论，公职人员与私人果然不一样。想想看，如果是单纯的个人，我们可以理解他，做别人的朋友，我们会觉得心情愉悦，做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我们会觉得非同寻常，责任重大。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抛开私人感情，站在公职人员的立场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在这过程中就会涉及平衡问题，即暴君与明主的界限问题，或许这正是如何在公职人员与私人两种身份之间保持平衡的共同之处。

顺带提一下，此处介绍的银币正面的头像是卡利古拉，他没有把握好平衡。而银币背面则是奥古斯都，说到巧妙地把握平衡，他是罗马人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也是帝国政权时期的首任皇帝。奥古斯都是卡利

古拉的曾祖父，然而卡利古拉似乎没有继承奥古斯都对行事尺度的清醒认识。

盐野七生

2005年夏于罗马

金币故事





与其他职业相比，政治家容易受指责的一个原因在于，大家都相信谁都可以当好政治家。打个比方，钢琴赛的评委往往是由有名的钢琴家担任，一个人再怎么喜欢音乐，如果仅仅只是爱好的话，公众是绝不容许由他来给钢琴选手们投票的。不过如果换成政治的话，规定每一个人都有选举权，不这样的话，就会被指责为反民主。然而，也不能因此就说人民大众是作为源泉的政治体制，就是由一群完全不懂政治的人来评价专业政治人士的体系。

这样看来，对政治家而言，关乎他们生死的问题就是获得政治门外汉们的支持。从虽有真才实学却没有从事过政治事务这一点而言，不论是学者、评论家还是媒体都应归于不懂政治这一范畴。政治家应该去挑战的是，在保持政治专业人士应有的气概与能力的同时，还要保证政治门外汉们对自己的支持等等之类的高超技能。遗憾的是，克劳狄乌斯皇

帝没有成功挑战这样的技能。我是基于怎样的理由下此结论，读完本书，读者们自会知晓。

盐野七生

2005年夏于罗马

银币故事





有很多人，明明在诸多领域都有着非凡的才华，却不能灵活使用这些才能以获得全方位的成就。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多面手”的人，换言之，也即不会成长的人。因为人必须通过认认真真完成每一件事才能获得成长，而非蜻蜓点水，无所专长。

因此，这些“多面手”的内心深处一直藏着不安，担心自己一直一事无成。这种不安，表现为做某件事时会常常不小心行事过度。我认为皇帝尼禄也属于“多面手”，是个不幸的男人。

但是生活在罗马的人们却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他们生活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建立过程之中。如若尼禄行事避免太过专横跋扈，也不会在30岁时就被逼得自杀身亡。

盐野七生

2005年夏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

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

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

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

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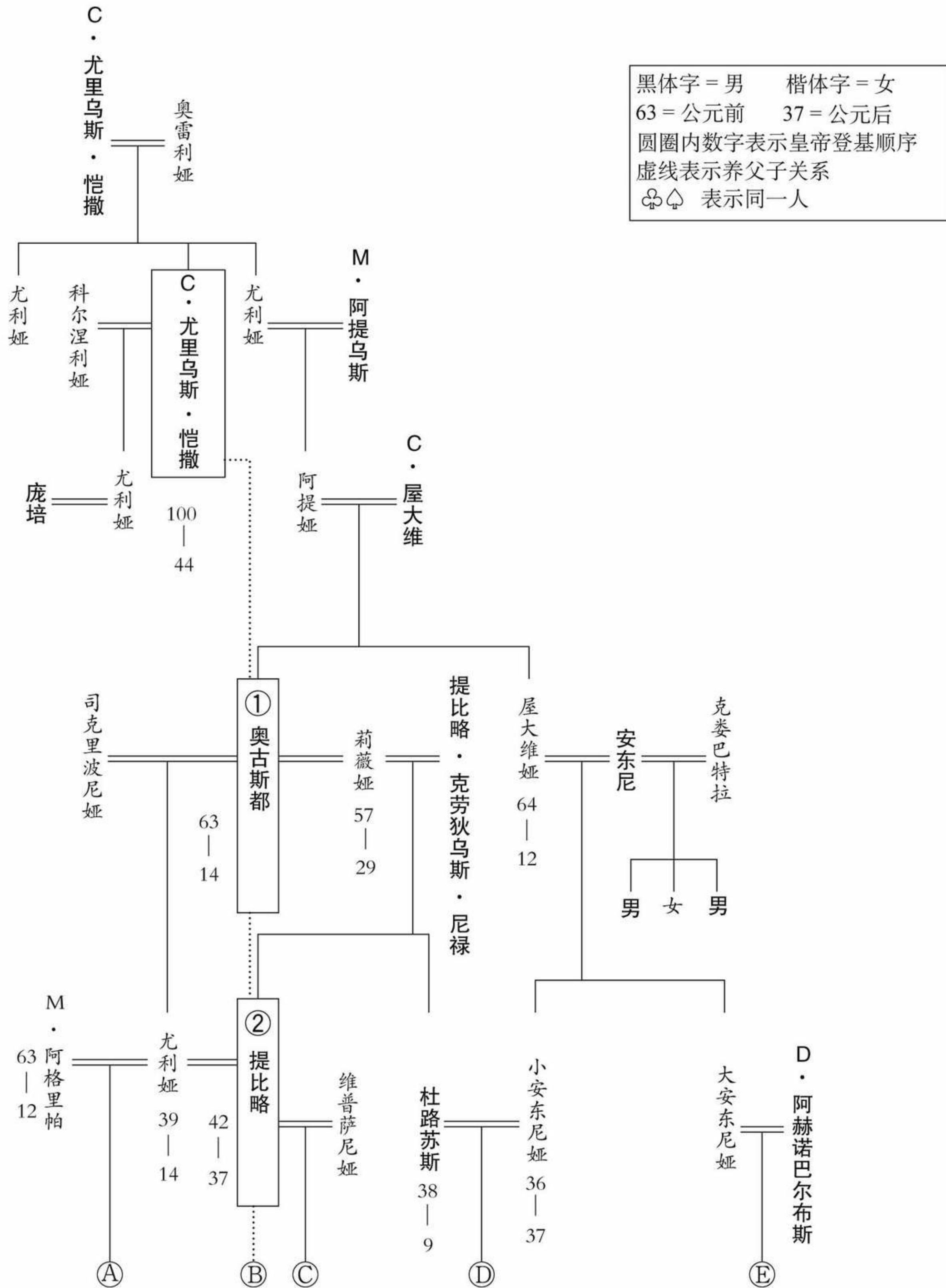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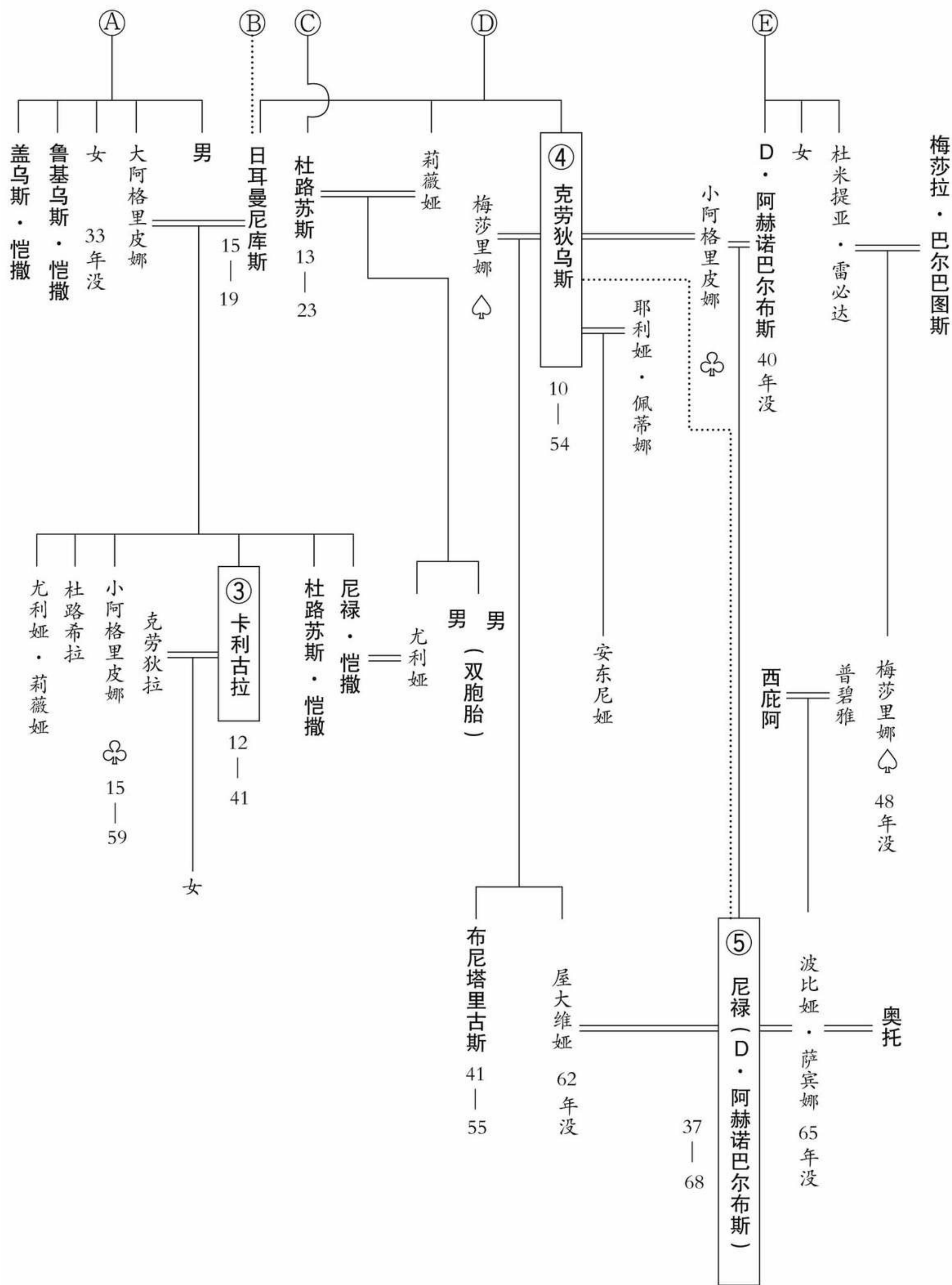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尤里乌斯——克劳狄斯王朝图谱（略去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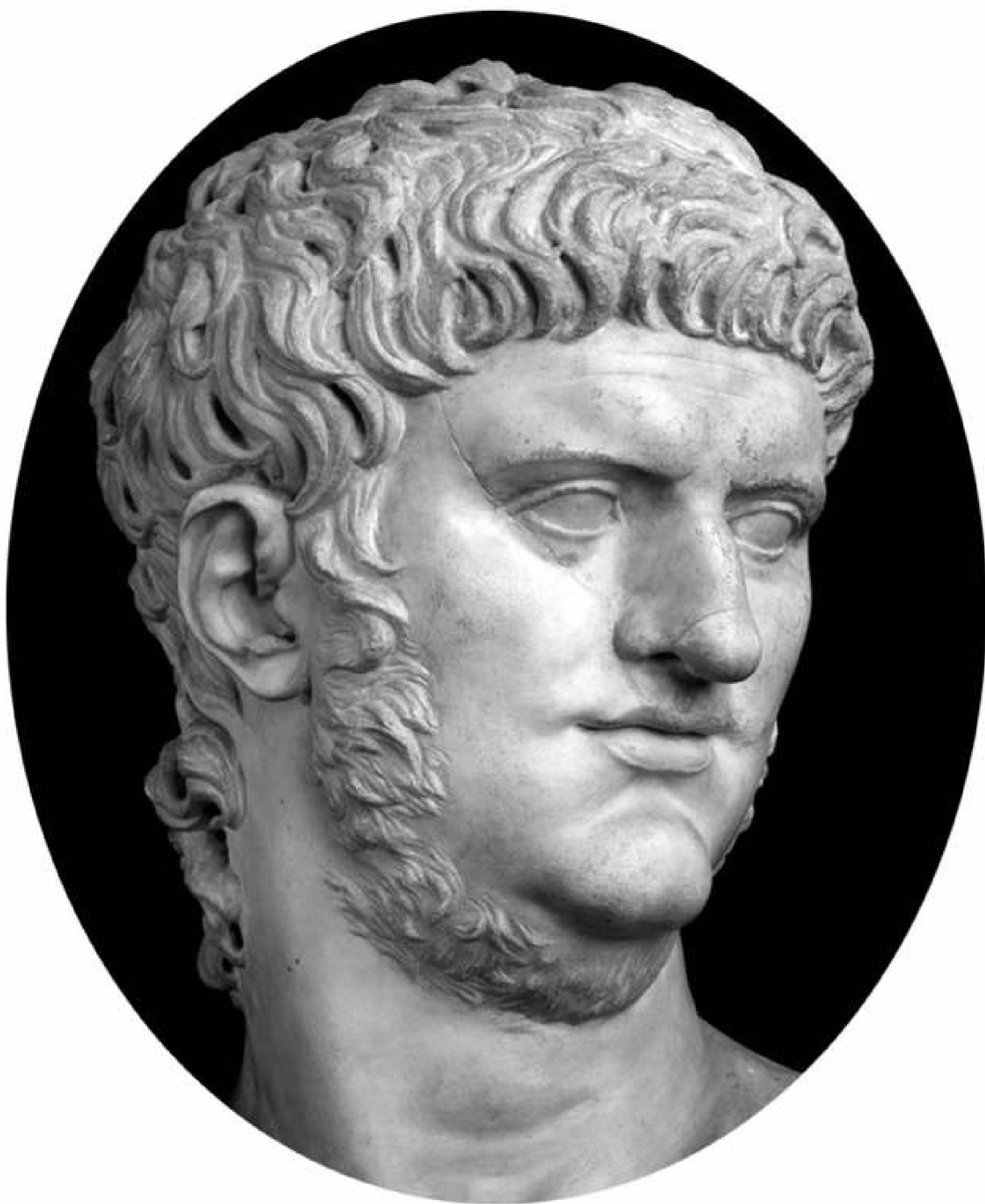


Ⓐ
Ⓑ
Ⓒ
Ⓓ
Ⓔ
盖乌斯・恺撒
鲁基乌斯・恺撒
女
33年没
大阿格里皮娜
男
日耳曼尼库斯
15—19
杜路苏斯
13—23
莉薇娅
梅莎里娜
♤
④
克劳狄乌斯
10—54
耶利娅・佩蒂娜
小阿格里皮娜
♧
D・阿赫诺巴尔布斯
40年没
女
杜米提亚・雷必达
梅莎拉・巴尔巴图斯
尤利娅・莉薇娅
杜路希拉
小阿格里皮娜
♧
15—59
克劳狄拉
③
卡利古拉
12—41
杜路苏斯・恺撒
尼禄・恺撒
尤利娅
男
男
（双胞胎）
安东尼娅
西庇阿
普碧雅
梅莎里娜
♤
48年没
女
布尼塔里古斯
41—55
屋大维娅
62年没
⑤
尼禄（D・阿赫诺巴尔布斯）
37—68
波比娅・萨宾娜
65年没
奥托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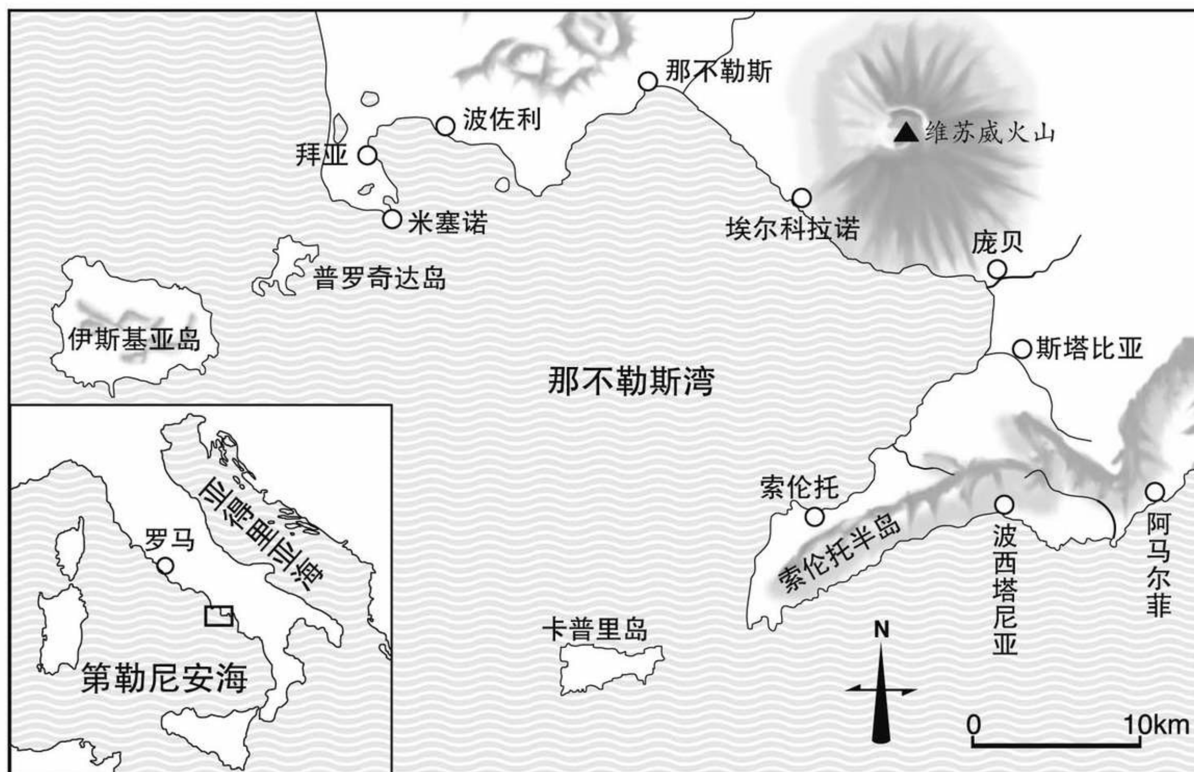
皇帝提比略

（14年9月17日—37年3月16日在位）

卡普里岛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湾以南30公里的海面上，有一座名叫卡普里的小岛，今天搭乘水翼船只要30分钟就可以到达这座岛上。如若有闲暇，加之想要走上甲板呼吸海上清新的空气，又或想观赏周围的美景的话，可以选择搭乘联络船前往，即使这样，一个半小时到达小岛仍然绰绰有余。

然而，那时候不论如何热衷于提升船只性能的古罗马人，在动力方面也不得不依靠人力和海风。据说普通的三层帆船时速可以达到两三海里（1海里约合1.852千米），如果顺风的话可以达到时速5海里。但那不勒斯湾是一个只适合进行划船或独木舟练习的平静海湾，卡普里岛气候与罗马大同小异，是意大利气候最为舒适之处。因此，卡普里岛又被称为“皇帝的御用船”。可是，提比略需要的并不是游玩用的游乐船，而是把卡普里岛当成了一艘能够办公用的政务船。无论是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商港波佐利还是军港米塞诺出发，都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到达卡普里岛。



卡普里岛及其周边环境

时光荏苒，卡普里岛如今已成为地中海沿岸为数不多的疗养胜地，游人们谁都可以涉足此地。然而，历史回溯到2000年前，整座卡普里岛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这是由于奥古斯都大帝用伊斯基亚岛与卡普里岛的前主人交换了这座岛屿，最后才把整座岛屿纳入自己的名下。作为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奥古斯都，居然愿意拿比卡普里岛面积大4倍、又有温泉的伊斯基亚岛去交换卡普里岛，不难想象卡普里岛的迷人之处。其实，从罗马时代起，卡普里岛就有“那不勒斯湾珍珠”的美称。遗憾的是，奥古斯都虽然钟情于卡普里岛，生前却未能好好在卡普里岛畅游享受一番。大概是奥古斯都大帝在那不勒斯周游之际，才顺道在岛上作了短暂停留，随后就与世长辞了。对于终生日理万机的奥古斯都而言，卡普里岛虽是一个适合放松的胜地，虽然他想去度假，却因政务繁忙而始终未能成行，前往卡普里岛或许是奥古斯都一个未竟的梦想。

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围绕的卡普里岛是一座没有沙滩的岛屿，往来的

船只只有岛屿北边的一处码头可以停靠。据说岛上有一座奥古斯都修建的别墅，坐落在离岛岸不远的一处高台之上。虽说是高台，但离海面也不过10米左右，以至于渔夫们能清晰地辨认出站在列柱回廊上的皇帝。每当这时渔夫们就会停下手中捕鱼的活计，纷纷向皇帝行问候礼，皇帝就会站在高台的回廊上向他们轻轻地挥手示意。每逢岛上居民的祭典，奥古斯都大帝大都会愉悦地参加。

风景优美的卡普里岛，充斥着欧洲各大名牌商店，现在早已成为一个观光度假的旅游胜地。从停靠船只的码头搭乘缆车，一转眼的工夫就可以到达海拔146米高的卡普里岛中央广场。来此旅游的游客们希望充分地享受卡普里岛的阳光，而非卡普里岛周遭的景色，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岛上的饭店全都集中在卡普里岛的南面，一处最适宜日光浴的地方。

我背对着为了争乘缆车而喧嚣不已的人群，独自一人踏上了从中央广场分出来的一条小道，打算顺道造访位于小岛东边的提比略皇帝的别墅。要到这处遗址就得舍弃便捷的缆车或汽车，虽然这是一条从海拔146米延伸到海拔336米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不那么危险，沿着平缓的上坡路，越往前行民居越少，左边的那不勒斯湾渐渐地映入了我的眼帘。

我也记不得在过去的这30个寒暑往返了多少次，也记不清要花多长时间才可以到达这座别墅，更记不清这段路程有多远的距离，因为每一次踏上这条道路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在思考同一个情形。

在我脑海里，在那个没有缆车的年代，提比略皇帝要到达这座按照自己要求建在卡普里岛最东边断崖上的别墅，这也意味着他得爬到海拔350米左右的高度。即使按现在的标准折算，当时的海拔也有336米，因为那时的海平面比今天大概要低6米以上。按照古罗马人的性格，肯定会立刻就把上山的道路铺好，但提比略当时是否会安然地坐在轿子里，由一群倔强不屈的奴隶抬着一路摇晃而来呢？其实，即使提比略到了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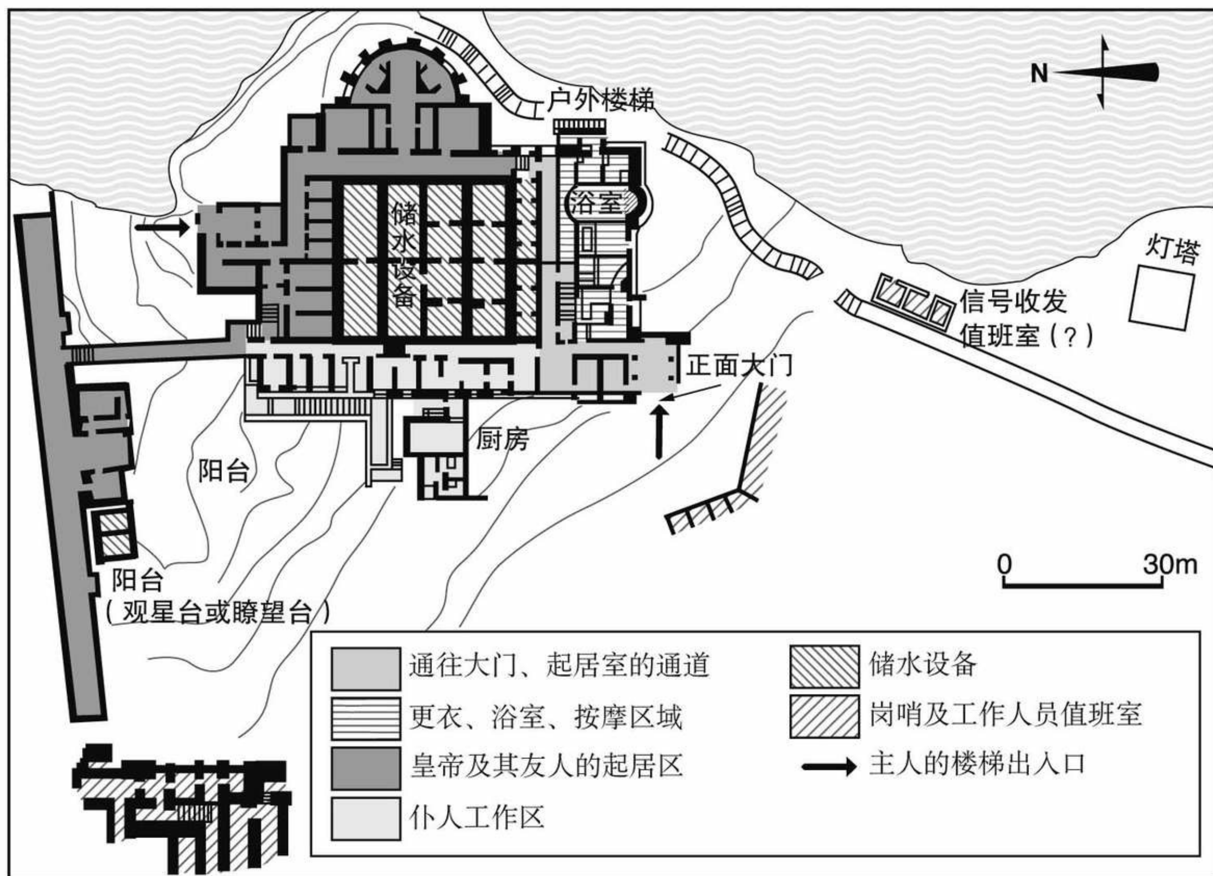
年，他的身体依然非常硬朗，也许是因为在船上的时间较长，很少有运动的机会，到别墅的这段路才总是由他自己走上来的吧。

虽然身体没有提比略那么硬朗，但我也坚持走完了这一段路程。走完最后200米的路程之后，我已经深刻感受到了提比略是一个性格多么孤僻的人。此外，如若想观察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与其继任者提比略之间的性格差异，只需要比较一下卡普里岛上的两座别墅就能洞悉到这一点，途中，我一直这么自言自语着。

被称为“乔伊斯别墅”（宙斯别墅）的提比略别墅坐落在断崖最高处，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然而，从规模庞大的储水槽来看，应该能够充分满足当时罗马人对生活孜孜以求的舒适需求。话虽如此，这栋豪华舒适的别墅，并不是提比略皇帝的退隐之所。他并没有在退位之后隐居于此，不再过问政事。事实上，提比略从公元27年直到逝世的那10年时间里，虽然一直身处卡普里岛却统治着整个罗马帝国。尽管他的性格孤僻，但并没有放弃统治罗马人民的责任与义务。进而言之，由恺撒描绘蓝图、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帝国，在提比略统治之下更加稳如磐石。

我一直有个习惯，在游览古代遗迹之后，就会立刻在脑海中重新描绘出这些建筑物的复原图。我觉得建筑物如若复原的话，那么曾经生活在其中的人也会随之“复活”。在我设想的世界里，他们至今仍然活着、呼吸着。

在撰写《罗马人的故事·恺撒时代》的时候，我一直关注着他。然而，在我眼中的恺撒并非独来独往，他身边经常围绕着一群年轻而富有朝气的部下。我有时甚至能听见他们传来的欢声笑语。即使在跨越意大利北部卢比孔河这攸关一生的时刻，恺撒大帝发出“越过此河，将是人生的悲剧；如若不越此河，我们将会灭亡”的慷慨悲歌之后，仍然有着大批的追随者不顾性命而追随着他，我无法想象恺撒这样极具魅力的皇帝会感到孤独。



乔伊斯别墅平面图（这座别墅跟一般的罗马别墅相比，有着非常明显的特色，即主人的居住区与用人的工作区一目了然。）

我也很难将奥古斯都与孤独联系在一起，恺撒是一位凡事都必须经过自己决断的皇帝，而奥古斯都则是大部分情况之下都自己作决策。然而我所见到的奥古斯都，身边总有阿格里帕和梅塞纳斯跟随，是其在作决策时重要的商量对象，这样的奥古斯都，显然是与孤独无缘的。

然而，唯有提比略，我才能想象他被孤独深深困扰的情形。他那高大健壮的体格，即使面对其背影，也不会觉得单薄。而他修长的身形，严厉得似乎在拒绝别人的援助。

倘若面对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又或是面临着人类难以生存的沙漠，一个孤独的男人将无从选择，他仍然可以活在自己构建出来的虚幻世界

之中。从乔伊斯别墅眺望出去的景致，是美丽的地中海地区令人流连忘返的景色，也是一处能让人深刻体会到生活的美好愿景的地方。从东北部延伸至东部的索伦托半岛那柔软静谧的景致使人变得十分安详，目之所及，宽广的那不勒斯海湾碧波荡漾，而稍远处西北部的米塞诺海角，入夜后灯火闪烁，不难想象在这熙熙攘攘的尘世间，一个不善交际的男人，身处这样的绝世美景之中是多么的另类。

提比略刚继位时，并没有那么讨厌与人交往。从心底而言，他应该是努力地尝试过，不，或者应该说过犹不及吧。

皇帝继位

虽然记录具体日期的史料早已不复存在，然而我们都很清楚奥古斯都大帝逝世的时间是公元14年8月19日，而提比略继皇位的时间是9月17日。此外，与23年后提比略去世的地方相同，奥古斯都下葬的地方同样也位于那不勒斯近郊，把他的遗体运回罗马花了12天。从这两件史实可以推测，奥古斯都的遗体运回罗马首都应该是公元14年9月之后的事情。据说，由于当时意大利时值盛夏，所以移灵都在夜间进行，或许因此时间就拖到了9月10号以后吧。毕竟要把皇帝的遗体运回首都，不能仅仅依靠马车。当士兵抬着奥古斯都的遗体回罗马首都之际，徒步紧随其后的正是提比略，奥古斯都逝世的时候他也在场。

这不仅因为提比略是奥古斯都的亲戚，奥古斯都生前早已将各种权力交付给他，将其视为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所以，在运送遗体的军队沿阿皮亚大道北上的过程中，他肯定早先离队骑快马赶回了首都。因为他有责任召集元老院，由元老院决定奥古斯都的葬礼怎么进行，此外，还得宣布奥古斯都的遗嘱。皇帝的遗嘱并非私事，属于公事之列。依照惯例，奥古斯都在年初写好遗嘱后要交给维斯太贞女（Vestalis，女祭司）保管。此时会场中坐满了500多位元老院议员，人人洗耳恭听。出

于公正、公平，遗嘱由一位与死者没有亲戚关系的法务官宣读。遗嘱开头第一句话，在宽阔的元老院会场回荡：

> 特此声明，既然无情的命运夺走了我的盖乌斯和鲁基乌斯，我把赠与他们遗产的二分之一与六分之一留给提比略。

奥古斯都大帝的独生女儿尤利娅生了两个儿子，即盖乌斯与鲁基乌斯，不久后奥古斯都收留他们，亲自抚养。可是这俩兄弟，分别于公元4年与公元2年去世，23岁和18岁的年纪就去世确实令人感到十分痛心，不过这些都是10年前的陈年旧事了。事实上，元老院的议员们早就明白这两位年轻的继承人能力不足，只有他们的祖父奥古斯都会为外孙的早逝而发出感叹。而时年55岁的提比略无论能力还是功劳，都是一位无可挑剔的继承人。

事实上，奥古斯都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从下面的一些例子就可以发现这一端倪。公元4年，奥古斯都收当时45岁的提比略为养子，同时请求元老院赋予他为期10年（这一时限其实可以随意更改）的“护民官特权”，元老院最终同意了。此外，公元13年，奥古斯都还把全部领地的统治权与整个罗马军队的最高指挥权都交给了提比略，让他成为与奥古斯都一样的实际共同统治者。为提比略铺好了自己逝世后的统治道路后，奥古斯都才与世长辞。或许在他看来，只有这样做才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实际上，从法律角度而言他确实做得相当完备了。在奥古斯都的遗嘱中，他仍然延续按罗马人司空见惯的方式，将遗产的三分之二赠与第一顺位继承人，这等于指明了提比略是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毕竟管理一个庞大帝国容易出现的最大问题，应当是指挥中枢的突然断裂。

奥古斯都让提比略继承了大部分的遗产，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把遗产留给丝毫没有血缘关系的提比略，却是缄口不言。显而易见，恭听遗嘱的议员们大都认为，原本作为皇位继承人的两名外孙早已不在人世，奥古斯都别无选择，不得不任命已有妻室的提比略作为其继承人。然而不

论是古罗马还是在其他地方，靠着女人扶摇直上的人，终究逃不出一辈子遭受蔑视的命运。

因此，说得通俗点，奥古斯都的遗嘱还是有不够“干脆利落”的毛病。与恺撒的遗嘱相比，很容易发现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当时，恺撒在任命不满18岁的奥古斯都做继承人时，并没有“如果这个年轻人能量力而行”等等之类的附带条件。如果真要加上这么一条的话，那么奥古斯都在与军事实力悬殊的死对头安东尼的较量中肯定会暴露出这个问题。当时罗马正处在恺撒遇刺后的动乱之中，在战场上与敌人实力的差距，会给恺撒继承人打下不适合继承皇位的烙印。正因为恺撒“干脆利落”的遗嘱，才对奥古斯都大有裨益。

然而，奥古斯都应当会说自己并没有给提比略附加条件。不跟不知山有多高、海有多深的18岁毛头小伙提条件，却向经验与功勋都十分丰富而卓著的50岁男人提附加条件，这两者并不相同。一想到向后者提附加条件这件事，就总让人感到好笑。可是，即使在字面上没有明确写出来，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奥古斯都还是巧妙而隐晦地提出了他的附加条件。

在他逝世前的10年时间里，奥古斯都将提比略收为养子，这也是把提比略作为继承人重点培养的一段时间，他让已经有儿子的提比略收日耳曼尼库斯为养子。日耳曼尼库斯是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的儿子，与奥古斯都有血缘关系。虽然在他死后迫不得已必须由提比略继位，但这一举动等于表明提比略的继承人是日耳曼尼库斯。

奥古斯都在遗嘱中提到：“既然无情的命运夺走了我的两个外孙盖乌斯与鲁基乌斯”，后面一句话就立刻提到要将皇位传给提比略，对此却未作任何解释，只是提到10年前的陈年旧事，让人感觉到他还是没有忘却往事，对确立继承人一事稍嫌犹豫。其实，从字面意思理解的话，我们只领会到了奥古斯都意思的一半。奥古斯都在遗嘱中刻意提到10年前早逝的两个外孙，言外之意，就等于挑明了今后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

身上，必须流淌着他这位“奠基者”的血。遗嘱中只字未提传位给提比略的理由，那是因为在他看来，提比略只是日耳曼尼库斯继位前的过渡继承人而已。提比略刚好在这一年满了55岁，而担任莱茵河防御军团总司令的日耳曼尼库斯却只有28岁。单从年龄角度来看，这条曲线继位道路铺设得十分巧妙。

然而，尚未正式继承皇位之前，遗嘱就把这一顺位继承关系挑明，那么提比略的内心世界又有什么样的斗争呢？端坐在元老院会场中的议员，大家的目光应该都聚焦在默默聆听遗嘱的提比略身上，这其中肯定会有人怀揣着十分恶意的好奇心，观察着提比略聆听遗嘱的表情。罗马帝国第二位皇帝提比略的统治，应该始于这种屈辱的环境中吧。

可是，假设曾一度被遴选为过渡继承人的战友阿格里帕仍然健在，在公元14年的元老院议会场中听到了上面的遗嘱，他的心里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呢？阿格里帕与奥古斯都也毫无血缘关系，他仅仅是从一个普通的士兵一步步得到提升，最终才成为奥古斯都的心腹的。再假设如若当初恺撒没有提拔阿格里帕，在共和国时代非出身名门不可为军官的罗马军团中，阿格里帕最高只能升到百人队队长。又假设他没有进入罗马帝国的军队，阿格里帕说不定会一生碌碌无为。所以，如果他成为日耳曼尼库斯的过渡继承人，应该不会感到是屈辱，而是无上光荣的喜讯。

提比略却是克劳狄乌斯家族的直系血亲。在罗马改国体为共和制之际，克劳狄乌斯家族就带着5000名“被保护人”（clientes）迁往罗马。换言之，克劳狄乌斯家族的历史就是罗马的历史。与之相比，奥古斯都的祖父靠什么起家根本就无从考证，这根本不能与克劳狄乌斯家族相提并论。虽然收养奥古斯都为养子的尤里乌斯家族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为罗马共和国崛起而供应的人才方面，却根本不能与克劳狄乌斯家族相提并论。克劳狄乌斯家族是一个曾经拥有过28名执政官、5名独裁官、7名财务官、6名凯旋将军与20名次席凯旋将军的显赫家族。提比略的母

亲出身于利维斯家族，这个家族也隶属于克劳狄乌斯家族的旁支。在提比略祖先中声名显赫者非常之多，在此举以下几位：

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公元前312年担任财务官，他不仅利用职权修建了罗马第一条大道（也可谓是当时罗马帝国高速公路的阿皮亚大道），还因为负责架设罗马第一条自来水管道而名垂青史。（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在第一次腓尼基战役中，与迦太基的第一战取胜。（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

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第二次腓尼基战役中，为了阻止占据意大利的汉尼拔同从西班牙赶来支援的胞弟哈斯德鲁鲍尔会合而参与战斗，并取得梅陶罗河会战的胜利。这次战斗导致汉尼拔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

当然，克劳狄乌斯家族为罗马帝国提供的并不都是优秀人才，愚蠢的人也为数不少。臭名远扬者如下：

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公元前450年，罗马贵族与公民阶层发生了正面冲突，他就是罗马贵族阶层堡垒“十人委员会”的核心人物。（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克劳狄乌斯·普鲁克斯——第一次腓尼基战役中罗马军队的一个败军之将。通常罗马是不会处罚败军之将的，然而只有他被撤职。在今天看来，撤职的原因有点好笑。罗马人在战斗前习惯先用鸟类来占卜吉凶，占卜过程中他选中的鸡不肯啄食诱饵，他气得大叫道：“难不成你想喝水！”然后就把它扔进了海里。他的这种行为被认为非常主观，不适合担任军队的指挥官。（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

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按照传统，贵族不能担任罗马的护民

官，他却选择成为平民的养子来担任这一职位，并且投靠到恺撒的阵营之中。这在成员皆为名门贵族的元老院眼中，他只是一个替恺撒派扶马鞍的丑角。（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4 ·恺撒时代（上）》）

公元4年，提比略在正式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后，传闻不再用“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这一签名来签署公文，而是取而代之用“提比略·尤里乌斯·恺撒”这一签名，签名的变化表示他是尤里乌斯家族的成员。但是他身上依旧流着克劳狄乌斯家族的血液。不过这种问题不难解决，只要提比略利用登上皇位的契机，让克劳狄乌斯家族重现元老院体制时期的辉煌就行了。

然而，提比略的不幸在于他赞同奥古斯都的政治理念，这与他本身所背负的家族传统截然相反。换言之，提比略本应该继承代表旧的共和体制的家族传统，但他认为元首制这种新体制才能将罗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精神上支撑提比略这种想法的，是克劳狄乌斯家族源源不断为国家提供人才的这种自傲。克劳狄乌斯家族的男性对国家利益优先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强烈自负，即使国体变更成元首制，这种精神依旧沉积于提比略的血液之中。

在遗嘱中，奥古斯都将遗产的三分之二赠与提比略之后，宣布又将剩下的三分之一留给妻子莉薇娅。之后，莉薇娅被尤里乌斯家族收为养女，同时也将她的名字改为尤利娅·奥古斯塔。

不得不重提的是，像恺撒和奥古斯都这种阶层的遗产继承，与将财产赠与公民和士兵不同，这种继承也可以称之为权力的转让。所以，奥古斯都把遗产的三分之一赠与了莉薇娅，表明莉薇娅也因此获得了三分之一的皇帝的权力。奥古斯都并不是把爱情置于首位的人，从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一个多么老谋深算的人。

如前所述，日耳曼尼库斯与奥古斯都有着血缘关系。此外，他更是皇后莉薇娅英年早逝的次子杜路苏斯的长子，也有传闻称杜路苏斯是奥

古斯都的私生子。给予莉薇娅三分之一的权力，事实上是早就预定由莉薇娅的孙子——日耳曼尼库斯来继承的。至于留给莉薇娅的长子提比略的部分，只要三分之二就能解决。同时，让莉薇娅做尤里乌斯家族的养女，是为了防止赠与莉薇娅的权力流出尤里乌斯家族。

大概有很多人会认为奥古斯都太过眷念于将权力留在尤里乌斯家族之内，对此我并不完全赞同。奥古斯都这样行事的目的，其实最终还是想维持罗马帝国政局的稳定。因为罗马政局一旦失控，内战就会爆发。至于被视为过渡继承人的提比略心里打的什么算盘，那可不是奥古斯都顾得的事情了。

遗嘱的后半部分在《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提到过。然而在详细记载赠与居住在首都附近的公民和官兵的遗产金额之后，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给帝国今后的继承人留下了遗言。

“超越现有帝国疆域的任何扩张，全部不可行。”

这是继任者们必须严格遵守的信条，对作为奥古斯都继承人的提比略而言，这是一个比其他任何皇帝都不得不直接面对的重大课题。幼发拉底河和多瑙河早已在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无须再作纠缠；然而遗嘱的问题在于奥古斯都语焉不详的是，他没有直言所谓的“现有帝国疆域”到底是指莱茵河，还是易北河。此外，奥古斯都还在留给罗马帝国全体居民的《功业录》（亦称《奥古斯都功德碑》）中这样写道：“我国舰队通过‘俄刻阿诺斯’（今北海），从莱茵河口东征辛布里人。以前不管是海路还是陆路，从未有罗马人经过这里，而此地的日耳曼民族派出使节，希望与我及罗马帝国国民建立友好关系。”

这里没有一句话提到要称霸，但是在9年前，提比略曾经率领军队攻至易北河岸边，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辛布里人世代居住在易北河以东，进攻到此地的提比略，如今已是罗马军队的最高司令官，这样想来，易北河应在帝国的版图之内。那么，聆听奥古斯都“遗言”的所有议

员，恐怕都认为帝国的北边就以易北河为界了。

在弥留前的几天，奥古斯都火速召回提比略，在没有第三人的情况下，他们商谈了很久。至于他俩到底谈论了什么，这也是信守承诺的提比略至死都未曾透露分毫的一个千古之谜。或许奥古斯都说应该把军队撤回莱茵河吧。对于从战场撤退这件遗留在罗马史上名声扫地的事件，奥古斯都直到临终前仍然保持缄默，这也成为困扰提比略的一大难题。

在宣读完遗嘱之后，就要决定奥古斯都的葬礼如何举行了。决定很快就出来了，用国葬之礼来安葬奥古斯都。翌日清晨葬礼就开始了。由于国葬是尚未等元老院通过就决定的，所以一应物事早早就准备好了。更何况在夏末之际，遗体也必须立即冰镇妥善保存。罗马人的葬礼并非将遗体安置在棺木中，而是放在床榻上，以便大家跟亡者告别，感念亡者的功劳。之后人们把遗体运往火葬场。身为奥古斯都养子兼继承人的提比略，在罗马广场中央的恺撒神殿前宣读悼词。在奥古斯都陵的火葬结束后，骨灰安置在庙宇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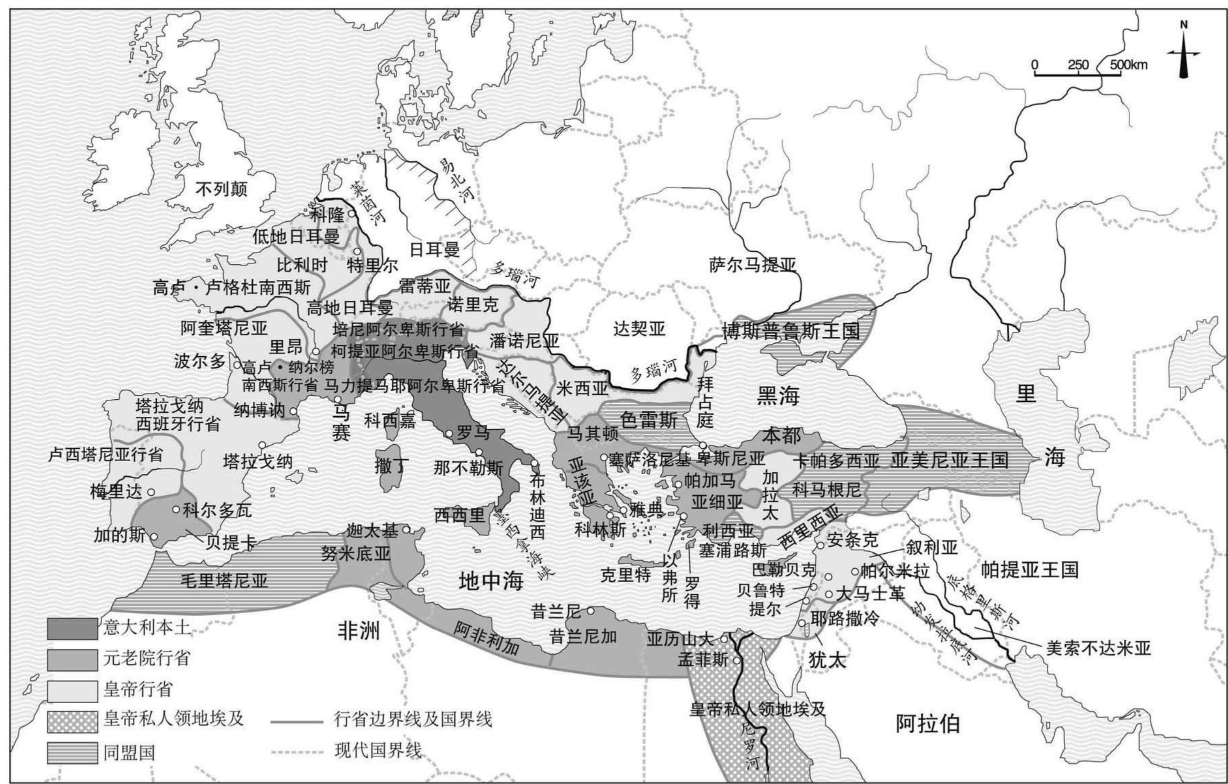
元老院商议后，决定将驾鹤西归的奥古斯都封为神，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神君奥古斯都”。

权力的转移似乎进行得一帆风顺，提比略本人却要求元老院议员们慎重考虑继位一事。

其实，这种做法提比略心中自然有他的算计。他深知自己将接任的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是依照罗马的法律和传统来进行的，然而也有内容非常模糊的地方。因此，对于这个奥古斯都的“遗产”中比较棘手的问题，提比略希望在元老院有了明确的决断之后，再开始他的统治。

可是，要正式继承罗马帝国的皇位，只有先皇的指定还不够，还必须经过元老院的同意，以及全体罗马公民的认可。元老院用投票来决定，而公民则用欢呼声的大小来决定。虽说这两种表达方式有许多差

异，但如果缺少了他们的认可，新任皇帝是不可登基的。这种方式有别于中国等其他帝国的皇帝继位制度，也是掌控罗马帝国统治权的一大特色。



罗马帝国全图（公元14年）

罗马帝国的掌权者，终究还是属于“SPQR”（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意思为“元老院与罗马公民”）这一类范畴。因为元老院与罗马公民的“认可”，就表示“委托”这个人代为治理。当时罗马人的思维方式是否与我们今天举行的“选举”类似呢？如若是选举的话，就应该在这种制度中明确任期的期限，然而在没有明确任期的前提下，就将统治权委托给某人——罗马帝国实际上仍是共和制外衣包裹下的君主制。这也是奥古斯都处心积虑布置出的局面，因此不得不保留一些模棱两可的地方。他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彻底击败安东尼，在罗马世界中唯我独尊，然而他竟然出人意料地宣布要恢复共和制。在他亲笔所写的《功业录》

中正式表明了这一态度："从那时起，我的威信虽在万人之上，但我的权力从未超越过任何一位同僚。"如果对这番宣言深信不疑，那罗马帝国就不再是元首制，而是共和制。与为了元首制还是共和制而争论不已的罗马不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共和国和元首制的定义一致，并且元首的权威与权力，恰好如奥古斯都宣称的那样。

威尼斯共和国国会选出的元首，实行终身制，也不存在世袭，但元首对内对外都代表着"威尼斯的颜面"。威尼斯元首拥有的权力却非常有限，只相当于当今国会中200票中的1票，或者等同于当今内阁中的"十人委员会"的17票中的1票。此外，国会和元老院的议员实行的都是世袭制，而元首却是一任。若不遵循这个规则，威尼斯就不能被称之为元首制了。因为威尼斯领土面积狭小，加之人口十分稀少，才使得这种体制能够延续下来。

另一方面，古罗马对于元首的权威与权力的关系又该作何解释呢？

与威尼斯类似，罗马元首也是"罗马的颜面"，通常会在钱币上铸上元首的头像与名字。此外，罗马元首还是罗马宗教界的尊长——大祭司，这也从某种意义上确认了他的权威。只是在权力方面，罗马与坚持共和制的威尼斯则完全不同。

第一，拥有罗马帝国军队最高司令官的身份。

第二，拱卫全国和首都罗马的近卫军，是其直属军团。

第三，在被分成"元老院行省"和"皇帝行省"的领土中，拥有"皇帝行省"并对其完全负责。

第四，通过其任命的"皇帝财务官"掌控全国征税权，包括由元老院派遣的直辖行省总督治理下的"元老院行省"。

第五，拥有"护民官特权"，并有权召开公民大会。根据保障公民权

利的《霍滕修斯法》（Quintus Hortensius），法案即使被元老院否决，但只要还能在公民大会上通过，一样可以定案，成为可施行的政策。用今天的观点来解释，即使是国会反对，国民依然拥有公投表决的权利。

此外，“护民官特权”还附带着否决权。关于否决权的用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有无否决权的异同，就应当明白这项权力的厉害之处。2000年后的今天，原为拉丁文的“VETO”的这种权力依旧被世人使用。

第六，罗马帝国的元首有权发布临时措施令，也有人将之译为敕令。要统治一个疆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庞大帝国，很多事情必须立即采取对策。但是要将这种临时性措施法令化，也就是让它变成可长久实施的政策、法律必须通过元老院的决议。这也是罗马帝国与其他帝国的不同之处。

第七，元首拥有几乎所有行政官的任命权，对于部分高级行政官，虽然没有任命权，但还掌握着推荐权。

第八，奥古斯都把原本属于罗马公民的控诉权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换言之，他本人还兼任了最高法院院长一职。

独揽各项大权的元首都是世袭。

这些条款都是对罗马帝国元首的真实写照。历史学家塔西佗曾断言：“奥古斯都开创的既不是王政，也不是独裁，而是以元首为名的国家体制。”我不明白他是不了解实情才这么说，还是明知内情却刻意挖苦呢？

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奥古斯都强调的“第一公民”含义的话，它只是“罗马公民的第一人”而已，还算不上正式的称谓。而且，从目前发掘出来的全部碑文中可以看到，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证明这是对罗马皇帝

的别称。“第一公民”这种称谓，不过是独揽大权并开创了“一人统治政体”的奥古斯都的一个障眼法罢了。然而，这个把戏背后会滋生许多隐患，毕竟人类往往只考虑眼前的情况。

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提到罗马人的明快、逻辑严谨和法治精神，还数恺撒采用的终身独裁官制度是较为快捷高效的政体。独裁官在罗马帝国内的位置等同于危机处理系统，独裁官下面的元老院及所有下设机构的任务，就是执行敕令。这样一个组织分工合理，结构明确。恺撒虽然采用终身制，但没有采用世袭制，而是由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指定继承人，之后此人再指定下一任继承人，如此延续。当然，这种做法与五贤帝时代的皇帝继承制度相同。不过，即使是五贤帝时代，在大约150年前也曾经遭受过激烈的反对。此外，终身独裁官这一称谓还是显得太过直白。正因为毫不掩饰心中的意图，恺撒才遭人暗杀身亡。

在今天奥古斯都的研究者中，批评他的大有人在，说罗马帝国后来的灾祸，就是起因于他留下的模棱两可的继承体制。我同意他的继承体制不分明，但不至于去批评他。因为在我看来，幸亏奥古斯都留下了这个模糊不清的继承体制，罗马最终才会形成完整的元首制体制。难道不正是因为他明白“第一公民”的权力基础并不明晰，至少得靠血缘来维系这种传承，才对继承者的血缘关系有所要求吗？然而，这模棱两可的继承体制带来的弊端，使得提比略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尤其是提比略与奥古斯都毫无血缘关系，遭受的损失更严重。距奥古斯都逝世都快要过去一个月了，但提比略对继承皇位一事仍旧小心谨慎，我觉得他此时的心情绝不会是塔西佗说的“渴望至极却故作犹疑”的心态。

在奥古斯都葬礼之后数日内召开了会议，公元14年9月17日召开的元老院会议标志着提比略开始正式统治罗马。会议刚开始，当年担任执政官的两名议员就以共同提议的方式提出如下提案：

一、按照惯例，在奥古斯都逝世后，应授予提比略“元老院第一人”的称号。

二、前一年提比略已获得“全罗马军队最高指挥权”，今后应当继续享有这项权力。

三、10年前授予提比略的“护民官特权”仍旧有效，并且是无限期的终身权力。

四、与在世时的奥古斯都一样，将保卫罗马所需的一切权力尽归于提比略。

虽然史料没有把议案通过的细节详实地记录下来，但最后这项提案估计还是被通过了。因为在这之后，全国上下纷纷掀起了向提比略宣誓效忠的浪潮。首先是两位执政官向提比略宣誓效忠，随后是元老院的议员们宣誓效忠，再后就是被召见的仅次于元老院的第二阶层——骑士阶级的宣誓效忠，之后是公民阶层宣誓效忠。

然而，我们注意到在两位执政官的提案中，并非是询问众人是否赞同提比略成为新皇，而是要求议员认可如上列举的第一项权威，以及后面的三项权力。罗马元首制的特点就此表露无遗。罗马皇帝的权力从来就不是君权神授，而是在大家认可之后，才能成为治理国家的皇帝。

在获得具有委托意味的“承认”之后，提比略应众人的要求起立演讲，但是演讲内容十分出人意料。

首先，提比略讲到罗马帝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要妥善处理这些因素导致的问题，单凭他一个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但唯有奥古斯都，才能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完成如此重责大任。所以，一旦决策失误就会使罗马帝国陷入危机，提比略在奥古斯都晚年实际上参与治理后对此深有感触。随后，他转向元老院的议员们继续演讲道：

“然而，罗马不乏可担重任之贤士。既然如此，我以为，大权尽归一人并非上策，广纳能人贤士，帝国的长治久安还会困难吗？”

历史学家塔西佗素来不喜欢提比略，他认为，提比略不希望别人觉得他志满意得，这番演说不过是遮掩之词，绝非肺腑之言。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提比略的生父支持共和制，他曾为恺撒效力，参加过高卢战役。这样的交情，纵使他没有对恺撒刀剑相向，却仍被认为是“3月15日”暗杀的同伙。所以，在屋大维时代，奥古斯都就将此人列入惩罚的名单内，使得他不得不带着当时年幼的提比略到处流亡。在以肩负罗马共和的使命而引以为豪的名门贵族之中，克劳狄乌斯家族与科尔涅利乌斯家族齐名。流淌着克劳狄乌斯家族血液的提比略，此时便向原本与自己同一阶层的男性求助。毕竟在历史上，就连以武力取胜的恺撒，也曾为了建设新罗马，请求战败的元老院议员西塞罗出手相助。但是，大多数元老院议员听了提比略的话之后，都极力想躲开这件麻烦事，他们恳请提比略赶快接受“第一公民”的称号。而剩下的少数人，脸上浮着与塔西佗相同的冷笑。

提比略终于开口道：

“我深知，一己之力难当此重任，如诸位执意相托某事，我从之。”

阿吉尼斯·葛斯立即接话道：

“恺撒（提比略后来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他也就变成恺撒家族的成员），说相托则从之，什么意思？”

这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阿吉尼斯·葛斯是提比略唯一爱过的女人维普萨尼娅（Vipsania）的现任丈夫。由于提比略被迫与奥古斯都的女儿尤利娅结婚，导致了他与维普萨尼娅夫妻两人劳燕分飞。然而，与尤利娅的不幸婚姻破裂之后，提比略也不曾想过再与其他女子结合。提比略虽然具有转移窘境的机智，但在回答的时候，他还是犹豫了一下：

“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放弃公务。然而，事与愿违。勉强取舍，实在与吾道相左。”

葛斯再度发言，此时他的脸上恐怕还浮现着刚才的冷笑。

“非求取舍之道。我想听到的，乃国唯一，一人可治一言也。”

接着，葛斯又假惺惺地歌颂奥古斯都的功勋，称赞提比略长久以来在战场上和政治舞台上卓越的表现。

可是，提比略还是没有答应接受这个称号。终于，一位叫庞蒂斯的议员站起来说道：

“恺撒，想让国家群龙无首的状态拖到什么时候呢？”

元老院的焦急心态在所难免。毕竟距奥古斯都驾崩都快过去一个月了，驻扎在莱茵河畔的帝国军团也传来边境有变的信息。

提比略终于点头应承了下来。即使他与奥古斯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在年龄、经验、功劳和能力上都是可以接任皇位的第二任“第一公民”，也意味着新皇帝终于确立了。此时，提比略还差2个月满55岁。

元老院会场中的这番针锋相对，我认为并非如塔西佗推测的那样虚伪与反虚伪之间的斗争，而是一个小插曲，它如实呈现了元首制下皇帝与元老院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

提比略请求元老院赞同，这正是奥古斯都巧妙创造出来的由皇帝统治、元老院协助的管理模式。葛斯当然有理由反对。如果单从字面理解奥古斯都对众人直言的部分，罗马仍旧是共和体制，元首只不过是全体公民中的“第一公民”。然而事实上，指定“第一公民”的却是上任“第一公民”，而元老院只有同意的份儿。其实，在葛斯看来，也许是提比略的举动让人觉得可笑吧。因为对于这显而易见的事实，提比略视而不见，反而摆出一副“第一公民”姿态与元老院平等地对话，还请求元老院协助。

其实葛斯是在借题发挥，毕竟他与提比略都了解奥古斯都架构的“第一公民”政治体制内所隐藏的矛盾。

虽然这样说，当时奥古斯都为什么能够设计这种违背常理的制度——掩盖在共和制下的君主专政，并且成功维持其运作40年之久呢？

研究者认为，奥古斯都拥有相当敏锐的政治直觉。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帝王与元老院的对立关系中保持平衡，并实现双赢。我完全赞同这种观点。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在权力斗争中，奥古斯都从来都是依靠武力才大获全胜的。不管他本人多么温和谦逊，作为实实在在的失败者，元老院在他面前也不得不采取慎言的做法。提比略获得的权力是前人靠实力获得之后“拱手相让”，也不符合奥古斯都明确表示的血缘继承模式。换言之，他这个继承人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也正因如此，我认为提比略情愿从字面上理解罗马公民中的“第一公民”，从而需要接受元老院的帮助。

有人提议授予提比略的母亲莉薇娅“国母”称号，提比略说：“授予女子头衔应谨慎行事，对我也一样。”从而拒绝了这项提议。实际上，他也拒绝了元老院打算授予他的“国父”封号。

此外，他还下令禁止在公共场所设置他的塑像，禁止称呼他为“主人”的人再次使用这种称谓。下面是公告的内容：

> “提比略”乃家仆之“主人”、士兵之“将军”、公民之“第一公民”而已。

无论如何称呼提比略，他都早已是事实上的皇帝，跟随在侧的人从未断绝。一次元老院会议上，有议员提议仿照“7月”命名为“尤里乌斯”、“8月”命名为“奥古斯都”，“9月”也改为“提比略”。但提比略仅仅说了一句话，就轻描淡写地驳回了这项提议。他说道：

"'第一公民'超过10人时，那又该怎么办呢？"

下属嘴里说出这样的话，会让听到的人心里面极为不快，因为听这话的人感到其他人会认为自己是个浅薄的人，几句无聊的奉承话就说得自己心花怒放。不过，世上的确也不乏溜须拍马之人，能让上位者逗趣取乐，很多人乐此不疲。顺带一提，在提比略之后，这种阿谀奉承不曾间断，也有皇帝欣然接受，虽然更改了月份名称，但是历经2000多年之后，流传至今仍被使用的称呼不过只有7月和8月的代称而已。

奥古斯都被神化了，他的养子提比略自然就升格成了"神之子"。在罗马帝国"颜面"最为重要的宣传媒介——硬币上，提比略的侧脸旁边就刻着"神之子"的文字。然而，在公文中，提比略将"提比略的神圣职责"改为"提比略的辛苦任务"，又把"遵从提比略的命令"改为"接受提比略的建议"。继位后的提比略，正式的名字自然是"提比略·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可是这个名字只有在给东方各同盟国的正式公文中才使用。如果面对罗马公民，则使用提比略·尤里乌斯·恺撒。因为"奥古斯都"这个名字，给人一种"神圣"的距离感。创造了共和外衣下的君主专制体制的奥古斯都，肯定是明白"奥古斯都"这个词的含义，才以此为名的吧。

提比略在元老院会议中说道：

"元老院诸君，以前我已经一再申明，今后也将肯认。身负无限大权之'第一公民'的治理，是否做到了不昧己、不草率，应以是否忠于元老院及公民来衡量。此心昭于天下，我就无悔了。为什么呢？对于'第一公民'之重任，诸君中必有人愿体谅之，此乃吾之主（意译则是所有者），我深以为然。"

即将登基的提比略所提到的"第一公民"，并非只有权威、而权力却与领导阶层相等的威尼斯共和国元首。奥古斯都创设的"第一公民"身兼权威与权力，提比略也把这些统统继承了过来。但是为了巩固统治，他

不得不极力保持“权力”，同时尽量削减自己的“权威”。他理解的“第一公民”不能翻译成“元首”，更不能说成是“皇帝”。虽然我们还不太习惯这种称呼，但也只能说他是“第一公民”，至少在他统治的前10年，他一直努力想成为他设想的皇帝。

罗马帝国拥有公民权的成年男子，即具有投票权的公民，已达500万人；仅靠召集住在首都的几万人来进行选举，公民大会早已名存实亡；更何况，元老院议员们又得为因此耗费的巨额经费大做文章。所以，就任“第一公民”后，提比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执政官以下国家要职的选举，由公民大会转移到元老院。他的真实意图是，希望通过减轻议员们的这项负担，重振元老院这一国家领导阶层，让他们襄助帝国治理。

提比略做的第二件事，是要求元老院赋予日耳曼尼库斯“全罗马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元老院同意了。奥古斯都在驾崩前一年将这项权力分与提比略，提比略却在继位那一年就做了这件事，这表明他身为“第一公民”，也没有独揽各项权力。

但是，没有一种动物像人类一样，能够在各种矛盾中稳若泰山。刚说不需要强势的领导人，可一旦危机降临，又马上改口大声说“第一公民”应当身先士卒前往第一线，指挥大家摆脱困境。提比略继位时发生的“危机”，是指驻扎在潘诺尼亚负责多瑙河防线的3个军团以及负责莱茵河防御的8个军团的叛乱。虽然称之为叛乱，但那其实不过是士兵要求改善待遇而发生的罢战。然而参加罢战的人都拿着武器，如果稍有失误，便会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不过，对于要求“第一公民”身先士卒的呼声，提比略却置之不理。一年前，日耳曼尼库斯就成为莱茵河沿岸8个驻守军团的总司令。提比略甚至把“全罗马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和日耳曼尼库斯分享，奥古斯都的遗嘱还预定了他就是继提比略之后的皇帝。提比略把对这次危机的处理，全权交给这位跟他共享权威与权力的28岁的年轻人。

要回应潘诺尼亚3个驻守军团的要求，还得从首都罗马派人前往。由于军中缺乏能够真正掌握3个军团且兼备权威与权力的总司令，提比略原本预定前往并完善多瑙河防线，结果因为奥古斯都驾崩而搁置。这次，提比略派自己26岁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前往此地。近卫军团军团长之一的塞亚努斯也率领两个大队、共2000名近卫军团的士兵随行。等待杜路苏斯一行的是潘诺尼亚3个军团1.8万名士兵。提比略决定坐镇罗马，静观这两个年轻人如何应对这个局面。

军团哗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潘诺尼亚军团发生了反对提比略的军团哗变，竟是因为军团长普拉耶斯对下辖士兵的体恤。在这位军团长得知奥古斯都驾崩，以及提比略将继承皇位这一信息之后，就以凭吊先皇、恭贺新皇为由，给所属军团的士兵们休假。而士兵们也暂时摆脱了繁重的土木工事工程以及严酷的军事训练，共有3个军团的士兵们聚集在夏季营地中晃来晃去，三五成群地扎堆聊天，享受这难得的休闲时光。

人一旦有了空闲，就会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这些士兵也不例外。他们逐渐开始担心奥古斯都死后自己的命运，毕竟奥古斯都统治了罗马帝国40年之久。现在这一切戛然而止，自己效忠的对象换成了新的主人。罗马军团的士兵大都是志愿入伍的职业军人，他们的心中充满着对今后可能会失业的不安与恐惧。

然而，在这份不安与恐惧没有消退之际，他们又想起了平时繁重的土木工事工程与严酷的军事训练的辛苦。现在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才激起这些念头。巧合的是，最会煽风点火的士兵，也正好就在这座军营。这个名叫贝肯尼斯的家伙，曾是罗马剧场中调动气氛的能手，现在却是军团的一名士兵。这名口若悬河的士兵对大家煽风点火道：

为什么我们要像奴隶似的，必须听命于人数不多的百人队队长，甚至比百人队队长还少的大队长呢？若不趁此时新皇根基未稳，或恳求或威胁上面的官员，去改善我们的待遇，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大家想想，我们忍耐长达三四十年的兵役，忍受衰老，忍受留在身上的累累伤痕，为了什么？不就盼着有朝一日可以拿到工资退役回家！可是退役也不过是个幌子，到后来还不是假借援助国家之名，仍旧要我们做相同的工作？就算苟活下来熬到退役，那些人又巧立名目，说是殖民开发，二话不说就把我们送到沼泽或不毛之地，最后我们还不是一无所得？这就是我们的下场啊！

兵役本身就是付出多、收益少的累活，我们的身体和心灵等于是以每天10阿斯的价格为他们卖命，可是我们得到了什么？这些钱要花在衣服、武器、帐篷上，拜百人队队长所赐，连装病不去干活都得花钱！最后手里剩下的钱还有多少？这还不算完，不守军规还要被鞭打，跟敌人战斗有死有伤，冬天严寒，夏天酷热，战场残酷，营地贫困，这些何时到头啊？要我们忍受这一切，不是不行，得有条件。

条件就是：每天1第纳尔，服役16年。此外，绝不在同一军旗下、同一营地上工作。还有，退役金必须以现金支付。

近卫军一天领2第纳尔，16年之后就能回归故里。我并不是对他们有意见，虽然他们在城市工作确实钱多事少待遇好，但是现在给我们的待遇，只够我们在荒野之地待在帐篷看着敌人罢了。

这种煽动性的言论往往有夸大其词的成分，这番说辞自然不能全信。罗马军队的军服、武器、帐篷和粮食等由国家提供，说这些要自掏腰包当然不足为信。然而，个人的衣物肯定得自己掏腰包，对百人队队长的孝敬当然也没有包括在上述薪水之中。

每天10阿斯的薪水，那么年薪就是225第纳尔，这些都是事实。只

不过，罗马帝国的近卫军一天却领不了2第纳尔，只有1.875第纳尔。此外，服役三四十年还不能退役实在夸张。不过，退役金因为财源不足，逾期不发倒是很有可能。

这段蛊惑言论中最真实的部分，就是与其他防线相比，多瑙河和莱茵河沿岸的环境更艰苦、更劳累，付出的辛劳更多。和南方的西班牙、北非，或是生活水平较高的叙利亚和埃及相比，可以说这里工作条件极其恶劣。莱茵河和多瑙河两条防线处于蛮荒之地，面对的敌人也最凶悍勇猛。如果皇帝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士兵们将获得如下表所示的薪酬：

	近卫军团兵	军团兵（现状）	军团兵（要求）
日薪	1.875第纳尔（30阿斯）	0.625第纳尔（10阿斯）	1第纳尔（16阿斯）
年薪	675第纳尔	225第纳尔	360第纳尔
退役金	5000第纳尔	3000第纳尔	3000第纳尔须现金支付
服役年数	16	20	16
服役地点	本土	行省	行省

说明：第纳尔——银币，阿斯——铜币。

虽然贝肯尼斯只是区区普通一兵，但他满腹牢骚的演讲完全俘获了士兵们的心。士兵们要求改善待遇的呼声，充斥在整个潘诺尼亚军团驻扎的营区。不知是否是为了平息士兵的激动情绪，军团长普拉耶斯决定派身为大队长之一的亲生儿子回罗马，向皇帝转述士兵们的请求。这样，士兵们总算平静下来了，虽然这种平静只是暂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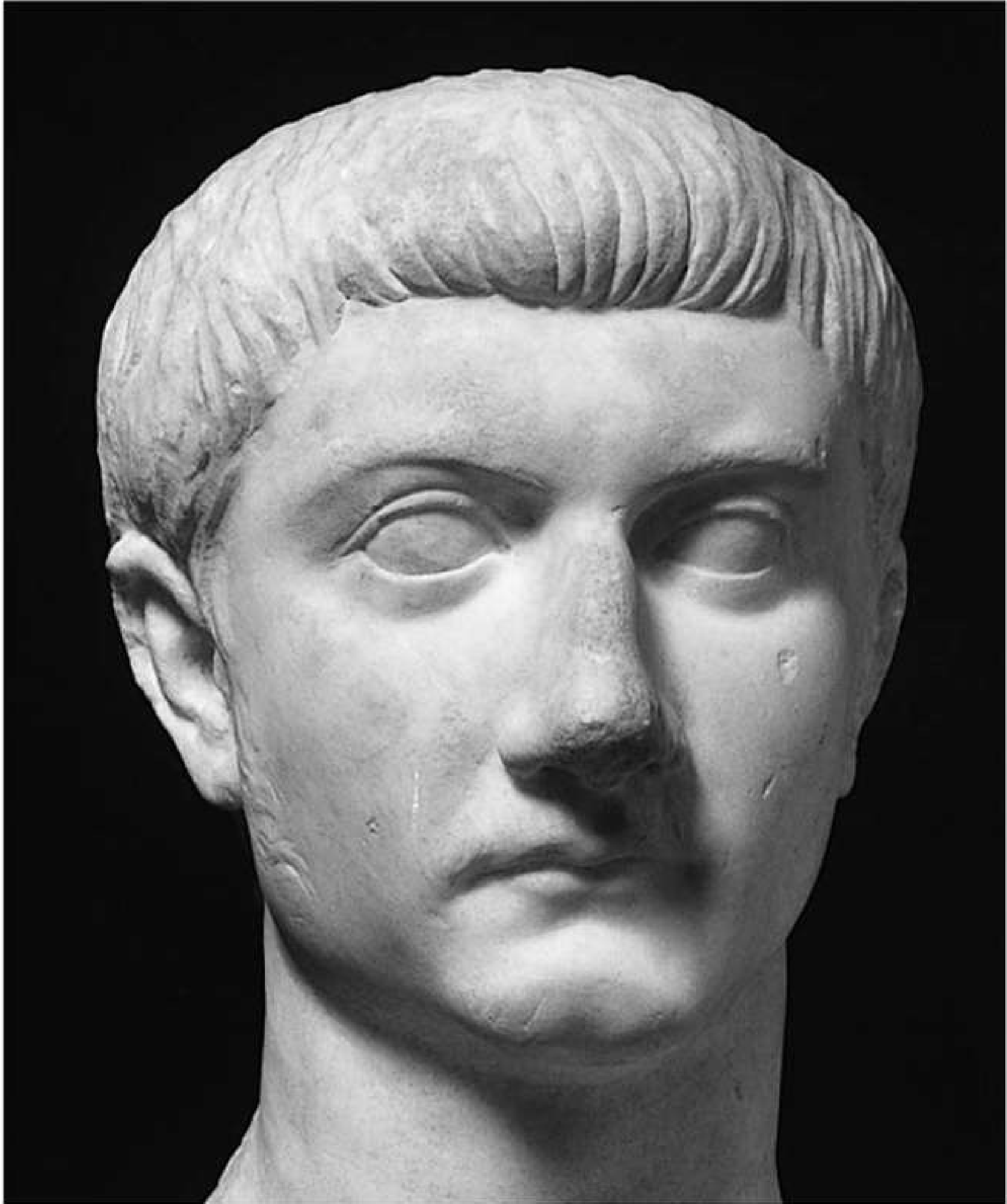
但是，被派到营地附近的纳乌波尔图斯参与桥梁和街道建设的小分队士兵们，得知本队营区发生骚乱的信息之后，竟然开始在当地掳掠起来。纳乌波尔图斯被罗马赋予“地方自治体”的地位，并认可其自治。这种地方，怎能允许如此暴行？百人队队长们前往劝阻，士兵们就将矛头对准百人队队长和工程的监军。

古罗马军团的百人队队长分为两种，分别是有权参加作战会议的上级百人队队长以及没有这项权力的下级百人队队长。下级百人队队长管理80名士兵，对比现代军队体制，相当于美国海军的中士，是中队长级别的指挥官。在军团中，士兵们一旦暴动，往往是下层的百人队队长最先遭殃。

在痛打百人队队长之后，士兵们哗变的气氛更加高涨。他们返回自己军队驻扎的营地，使一度恢复平静的营区再度骚乱起来。这一次遭殃的还是百人队队长。哗变者们首先向眼前的长官发泄怒气，触犯军规的士兵想到肯定会遭到严惩，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骚动更是变本加厉。整个大营陷入混乱之中，牢房被毁，关押的犯人趁乱逃了出去。这些犯人也加入骚乱之中，暴动愈发严重，甚至有百人队队长惨遭杀害。提比略闻讯后立即决定派儿子杜路苏斯前往处置骚乱。

杜路苏斯在2000名近卫军和皇帝护卫队——日耳曼骑兵中队的保护下抵达潘诺尼亚军营。等候他们一行的情况十分糟糕，与其说是来到罗马军团的营地，倒不如说身陷敌营。似乎是为了表示对新皇儿子的尊敬，哗变士兵们纷纷出营，跑到路上来迎接。然而，与往常迎接长官的礼仪不同，这支哗变部队没按军团、大队、中队的顺序列队，也没有挂上军团旗或队旗，士兵衣冠不整，态度骄横，丝毫没有向长官问候的意思。与其说他们是罗马军团的士兵，还不如称他们是一群无法无天的暴徒。这位26岁的皇子依然面不改色地从哗变士兵中间穿过，直接走到营区中央。这些士兵好像早已就事先串通好了，就在杜路苏斯踏入营地的瞬间，哗变士兵们迅速堵上了营区的各个出入口，让杜路苏斯一行进退

两难。其余的士兵则全数包围营区中央讲台，冲着台上的杜路苏斯大声叫嚣，满口威胁恐吓。



杜路苏斯

杜路苏斯抬手示意士兵安静，随即宣读提比略的旨意：

屯于潘诺尼亚之3个军团，是我一手打造，随我征战多年（公元前12—前9年，公元6—9年，共计6年）。我在此与各位约定，在先皇逝世的悲哀稍微消减、政务如常的时候，我一定把各位的请求转告元老院。

我现在派自己的儿子前来，军团长分内之事，可由其裁定。逾权之请，须呈元老院。诸位之请求是否被采纳，取决于元老院商议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境下，望各位慎重从事。

历史学家塔西佗描述完提比略的这番敕令之后，断言这只是提比略争取时间的惯用手腕。从塔西佗的观点不难看出，他认为提比略作为罗马军队的最高统帅，自己居然无法定夺是否接受士兵们的请求，还得跟元老院商议，根本就是很荒谬的事情。莫非每次面对强敌开战与否也要同元老院协商不成？

提比略的确也是在争取时间。姑且不论士兵们所提要求的对错，而提比略早已敏锐地察觉到，是否接受这个要求不仅涉及驻扎在潘诺尼亚的这1.8万名士兵，更影响到罗马全军15万士兵。届时，这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会演变成影响帝国稳定的政治问题。我相信提比略的真实答案应该是“拒绝”。

即使服役期满却不能退役这件事确实有必要改善，但其他要求不能来者不拒，否则就将打破奥古斯都打造的体制。奥古斯都这么做，也是在综合考虑了罗马帝国的人口以及经济条件之后，协调各方面利益才得到的结果。提比略在55岁之前，几乎都在奥古斯都身边，他对此知之甚深。此外，奥古斯都还把士兵年薪从恺撒定的140第纳尔提高到225第纳尔。如果每次皇权交替就增加士兵薪酬，国家财政肯定会入不敷出。进而言之，提比略统治的基本方针之一，就是在不增加税收的基础上健全国家财政体制。

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安抚这手执武器、剑拔弩张的1.8万名士兵。毕

竟像恺撒那样，面对此情此景只凭一番话就能稳定军心的人物，在古罗马是十分罕见的。提比略除了尽量争取时间，实在是别无他法。

即使这样，提比略还是把自己的儿子派到这里。听完敕令后，士兵们态度依然强硬，叫嚣着要改善待遇，并包围了杜路苏斯，随行人员中甚至有人被石头砸伤。此时，杜路苏斯就连提比略所说的“军团长分内之事，可由其裁定”都没做到。所以士兵们的要求不变，对于“日薪1第纳尔、16年后退役”的条件毫不松口。杜路苏斯无疑是受制于人。营地里四处弥漫着骚动，总让人有种太阳西下后会出事的不祥预感，虽然众人各自回帐，却没人放心安眠。

这夜，万籁俱寂，夜空干净得没有丝毫杂质，月华满地，让人深深迷醉。如此良辰美景愈发凸显了人们心中的恐惧和不安。然而，这一晚正好月食，只见原本点亮秋夜的满月，渐渐出现了缺口。士兵们对天象一无所知，认为这是凶兆，纷纷从帐篷中冲出来对着缺月祈祷，希望高挂夜空的月亮恢复如初。

杜路苏斯从帐篷中出来，也看到了月食。只不过，他和大多数随从都明白个中原因。接着，杜路苏斯马上想到这是个机会，利用得当这次叛乱就可以兵不血刃地落幕。于是，他命令随从秘密召集在士兵中有声望的百人队队长。

不管士兵如何祈祷，月食仍然在继续着。看到月亮缺口越来越大，士兵们心中的恐惧与不安也随之蔓延；当月亮完全消失、夜空一片漆黑的时候，他们的恐惧达到顶点。燃烧在营地各处的火把，跳跃的火光照耀在伏地悲鸣、瑟瑟发抖的士兵身上。

接到命令的百人队队长悄悄靠近这些士兵。他们分别来到自己中队的士兵身旁，对陷入绝望而恐惧发抖的士兵们说：

“你们究竟打算把皇子软禁到何时？你们考虑过后果吗？跟随叛乱

的主谋是不错，但你们觉得那些家伙会如愿以偿给你们加薪吗？退役后谁能给你们土地，那些家伙有能力治理国家吗？这些问题你们想过没有？我们中队最后才加入叛乱，趁早脱身不就没事了吗？”

哗变的士兵们听到这番话开始动摇了。先是老兵与新兵分开，接着各中队开始列队，之后是大队，最后一个军团集合起来。这样一来，士兵们恢复成重视秩序的罗马人，轻视不守秩序、不知礼仪的野蛮人，自尊心又回到了他们身上。也有士兵主动捡回被弃置一旁的军团旗与大队旗，把它插在营帐前面。就在这时候，月亮开始慢慢变圆。这次，面对光芒渐盛的月亮，士兵们祈求月亮宽恕自己所犯的罪行。

翌日清晨，杜路苏斯召集士兵。杜路苏斯只有26岁，他的演讲仍然缺乏足够的感召力，然而，由于良好出身带来的优雅气质以及得体的语言，加之他在台上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屈从于恐吓和胁迫的态度。接着他又用言辞诱惑道：“只要你们发誓重新恢复成遵守秩序的罗马军团，并且愿意将此事委托与我，我会写信上呈父皇，恳请父皇施以宽容之心，重新考虑大家的请求。”这些士兵中虽然仍然存在抵触的声音，但不久就被绝大多数赞同的声音所压制。杜路苏斯选了3个人作为信使，他们分别是：潘诺尼亚军团的军团长普拉耶斯的儿子、一名自己的随从和一名首席百人队队长。百人队队长若能成为首席，就是可参与司令部作战会议的“上级百人队队长”。这个人选表面上是哗变士兵的代表，然而个中意味值得深究。此时心中满是悔意的士兵们根本没人留意到这一细节。

信使离开之后，营区重归平静，似乎这些士兵都在对提比略的答复翘首以盼。只有杜路苏斯不以为然，也许当他离开罗马的时候，早就得知提比略不会答应这种无理要求。

杜路苏斯下令，传唤造反主谋贝肯尼斯及其另一个同伙。两人一进帐篷就被立即处死，为了避免其他士兵们看到，尸体被埋在距离营区很远的森林中的一处偏僻地方。

除掉两名主谋之后，偏激分子很快也被杜路苏斯逐一清洗。这个清洗名单好像早就拟定好了，交由近卫军和潘诺尼亚军团的百人队队长们负责执行，清洗运动执行得十分彻底。

对此，士兵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而且，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又要继续住在这个只是为了夏季扎营而搭建的帐篷营区中，士兵们的心情更加抑郁。阴雨霏霏，而且还时常会变成倾盆大雨，这时帐篷里就是一片泽国。士兵们不由得心生恐惧，认为这是天神对他们反叛行为的惩罚。对于当时不惜揭竿而起要求改善待遇的要求，早就置之脑后了。

住在帐篷中的不便，杜路苏斯也感同身受，不过他一直在等着，看士兵们何时沉不住气，再采取后续行动。

处在前线的夏季营地只是临时基地，要求并不高，只要能满足基本的饮水、能防御敌人就行了，所以夏季营地大多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与此相比，要从秋末住到来年初春的冬营地，则多设在生活便利的村镇附近，士兵们也不用帐篷扎营，而是住在常备的营房里。此外，冬营地有士兵们亲密的女友等候，这是服役期间的单身罗马士兵无法抗拒的诱惑。

首先，第八军团的士兵最先提出返回冬营地，接着第十五军团的士兵表示赞同。只有第九军团的士兵说要在夏季营地等候回复，但又担心只有自己留守且离敌人很近，万一情况有变，无法应对。这样一折腾，3个军团都想立即回到温暖舒适的冬营地去。

杜路苏斯看着士兵们出发的背影，思考着如若在冬营地，那么仅靠军团长普拉耶斯就能管理好这些士兵了，于是他当即决定返回罗马。然而，士兵们一直盼望新皇帝提比略的“答复”，好像根本就没有离开过罗马。

与此同时，驻扎在潘诺尼亚之北更遥远的莱茵河防线的士兵也发生了哗变。不过这个“日耳曼军团”的哗变从爆发到结束，都与潘诺尼亚军团大相径庭。首先，潘诺尼亚有3个驻守军团，莱茵河沿岸则有8个。单从人数而言，潘诺尼亚仅有1.8万名士兵，莱茵河沿岸达到了4.8万名之多。

日耳曼尼库斯

被称为“日耳曼军团”的军队负责莱茵河防线，沿莱茵河上游、下游分为两个部分：上游因为地势较高，又被称为“高地日耳曼军”，下游因地势较低，又被称为“低地日耳曼军”，两军分别配置了4个军团。各军团的军团长直接指挥6000名士兵，高地日耳曼军的4个军团之上还有负责统筹的军团长，低地日耳曼军也有另外一名军团长。公元12年之前，提比略是整个日耳曼军团的总司令，公元13年起则由日耳曼尼库斯接任。总司令全由奥古斯都的亲信担任，是因为他要用这支劲旅拿下延伸至易北河的日耳曼全境。正因如此，日耳曼军团的士兵比其他地区多，实力也最为强劲，堪称罗马帝国军队的精锐。

精锐之师也并非一朝一夕打造的，军队需要能征善战，不断积累对敌经验，磨炼意志，做到令行禁止，才能成为精锐之师。公元14年初秋的哗变，就是刚入伍立即被派到日耳曼的新兵引发的。

罗马军团的士兵，首先必须是拥有公民权的罗马公民。当时，罗马公民大多来自意大利半岛。而那群从南意大利被送到北方的莱茵河下游地区，对边境防御一无所知的新兵们，除了要迅速调整以适应当地的恶劣气候和地形之外，枯燥乏味的边疆防御生活很快就让他们感到厌烦。因此他们迫切要求改善待遇。与驻守潘诺尼亚军团的士兵们一样，他们也认为趁皇权更替之际，向新皇帝提比略提出要求改善待遇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

日耳曼军团哗变与潘诺尼亚军团哗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首先表明了立场，愿意全力支持日耳曼尼库斯继承皇位，然后才提出要求改变待遇的精明要求。

其实，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们并不是讨厌提比略，只是他们认为由先皇的血亲日耳曼尼库斯继承皇位才顺理成章。历史学家塔西佗指出，士兵们早有主见，他们认为如果日耳曼尼库斯知道整个军团鼎力相助，必定会暗自窃喜，到时自己成了皇帝继位的有功之臣，那么他们改善待遇的要求，日耳曼尼库斯一定不会拒绝。

日耳曼尼库斯却出人意料地断然拒绝了，他甚至率先对新皇提比略宣誓效忠，随后要求士兵也宣誓效忠。这样一来，士兵们的待遇要求肯定就泡汤了。另一方面，来往于各地的商人是当时信息传递的有效途径之一，潘诺尼亚军团哗变的消息也通过这些商人，传到了莱茵河下游的营地中。

与潘诺尼亚军团的哗变不同，低地日耳曼4个军团的骚乱并非有人蓄意煽动，而是在士兵中间自然发生的。所以，士兵不是一开始就要求改善待遇，而是哗变发生之后才提出来的。百人队队长最先承受士兵的怒气，这是两次哗变的相同之处。对于这次以星火燎原之势瞬间蔓延整个夏季营地的哗变，军团长凯奇纳束手无策。此时，日耳曼尼库斯因征税滞留高卢，闻讯后，他立即放下手边工作，迅速北上。

按照惯例，全体士兵应出营迎接总司令，4个军团士兵自然没有失礼。放眼望去，这群士兵似乎悔不当初，尾随日耳曼尼库斯进入营地之后，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队伍立刻解散，士兵满口怨言，骚乱顿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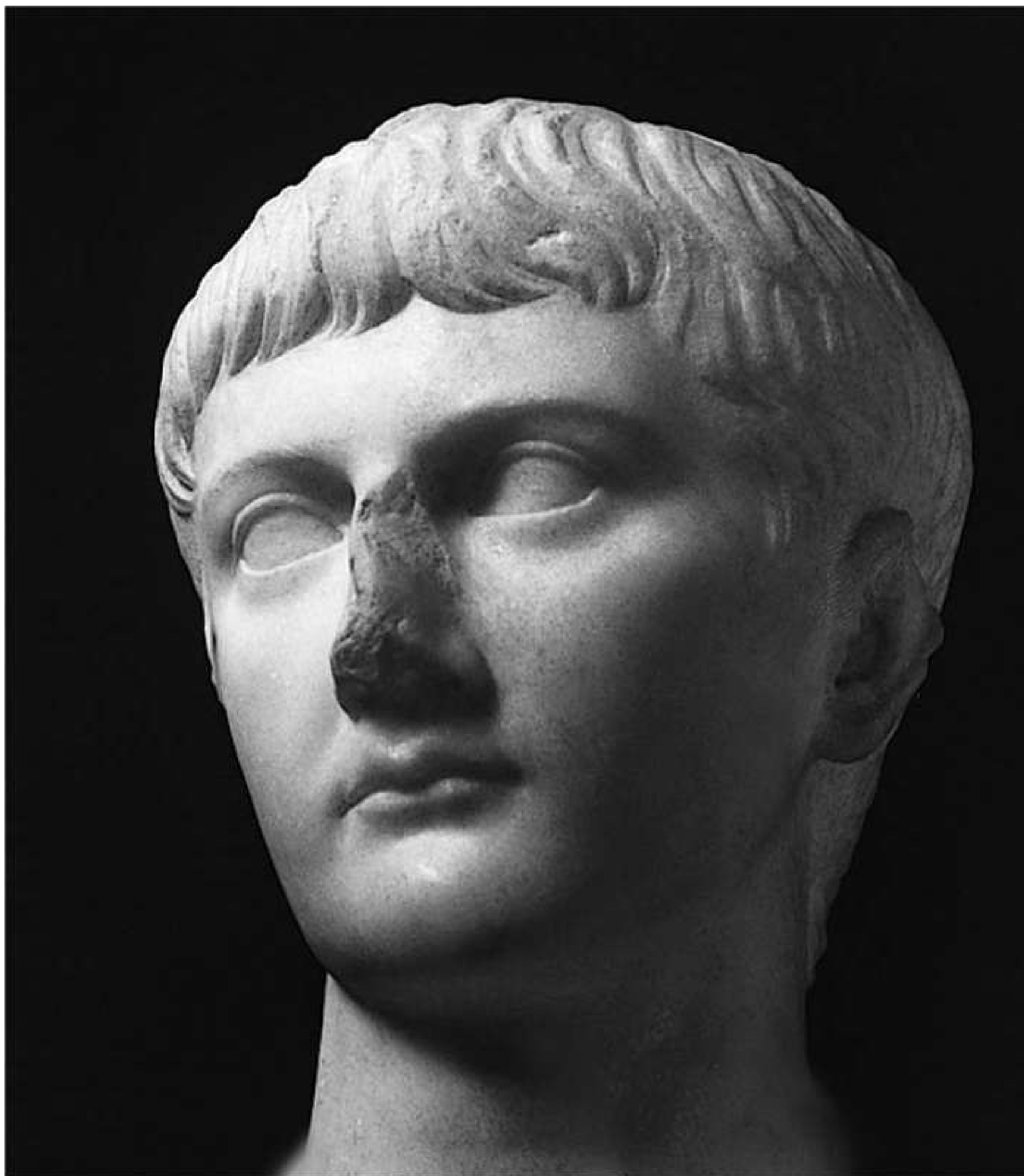
站在营区中央的讲台上的日耳曼尼库斯，首先命令士兵们依照中队、大队与军团的序列各自归队站好。士兵们不得不服从命令，然而，他们拖拖拉拉，费了很长时间，感觉非常不情愿。日耳曼尼库斯很有耐

心地等他们归队后，才开始发表演讲。

首先，日耳曼尼库斯对先皇奥古斯都在天之灵深表敬意，接着历数提比略过往的种种战功，并将其归功于在场士兵的出生入死。然后又说道，不但意大利全国支持提比略继承皇位，高卢行省也没有表示异议，帝国内至今没有一个地方因为新皇继位而发生骚乱。大多数士兵都沉默不语。这时，日耳曼尼库斯终于提到了这次哗变。这位时年28岁的总司令提高了嗓门大声说道：

“士兵服从的铁律精神消失了吗？罗马人尊重秩序的传统精神消失了吗？谁赶走了大队长和百人队队长？”

在日耳曼尼库斯的斥问之下，士兵们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一边脱去上衣，身上露出的全是战争和鞭打留下的累累伤痕，一边开始抗议。为了免除土木工程工事的劳役，他们只好去巴结百人队队长，原本就微薄的薪水更加捉襟见肘。可见架桥铺路是多么辛苦的活儿啊。如果挖战壕、钉栅栏、运军粮、砍伐工程所需的木材、准备柴火等等是不得不做的任务也就罢了，可是谁想到，这些都是指挥官们为了不让士兵们闲着没事干，胡乱生事，就做完一件差使又想新招来折磨人。士兵们的不满终于发泄出来。老兵们纷纷控诉兵役期限过长，新兵纷纷质问先皇的遗产赠金何时兑现。士兵们不分新老，都纷纷表态将全力支持日耳曼尼库斯继承皇位。



日耳曼尼库斯

日耳曼尼库斯听到这话，仿佛听见恶魔的声音一般，迅速从台上跳将下来，背对士兵，快步走向自己的营帐。这时，几个距离较近的士兵拔出刀剑将日耳曼尼库斯团团围住，威胁他回到台上。他高声断喝：

“如果背信弃义，就不如以死相谢！”

这不只是说说而已，话音刚落，他抽出腰际的剑往胸口刺去。幸好身边的人眼疾手快，及时阻止，否则日耳曼尼库斯也许就英年早逝了。可是，高高举起寒光闪闪的剑反而激起了士兵们的反抗心理，甚至连远处的士兵们也大喊：“要刺就刺进去呀！”更有甚者，他身旁的一个士兵竟然把自己的短剑递给他，还说：“试试，这把更锋利！”然而，第一个倒下的，就是这个对出身高贵的年轻总司令无礼冒犯的士兵。眼看士兵脸上稍微露出怯意，幕僚们将日耳曼尼库斯拉进了帐篷中。

日耳曼尼库斯一行在军团长的大帐中商议对策。他们得到消息，低地日耳曼军团的士兵派人邀高地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一起行动。可以想象，如果高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也参加叛乱，首先掳掠的，就是富裕的乌比人的根据地（今德国科隆），然后向西进犯，将会波及高卢。另外，完全可以预测，一旦乱军兵锋转到西方，防线空虚的消息泄露，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必然会乘虚而入。当局面还在可控范围之内时，无论如何都必须在军团内部解决这起哗变。担当此次重任的日耳曼尼库斯与前往潘诺尼亚军营的杜路苏斯不同，提比略没有向他传达任何旨意。

对自己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和侄子兼养子的日耳曼尼库斯，提比略当然是一视同仁，他甚至赋予日耳曼尼库斯仅次于自己的军队大权。提比略重法制，恶逾矩，在他看来，将旨意传给日耳曼尼库斯，会让这个年轻人缩手缩脚，他不会这么做。不过，不要忘了，提比略是“第一公民”。四面楚歌的28岁的总司令，决定以这个名义写一道敕令。这份伪造的敕令中有如下三项表明是皇帝提比略承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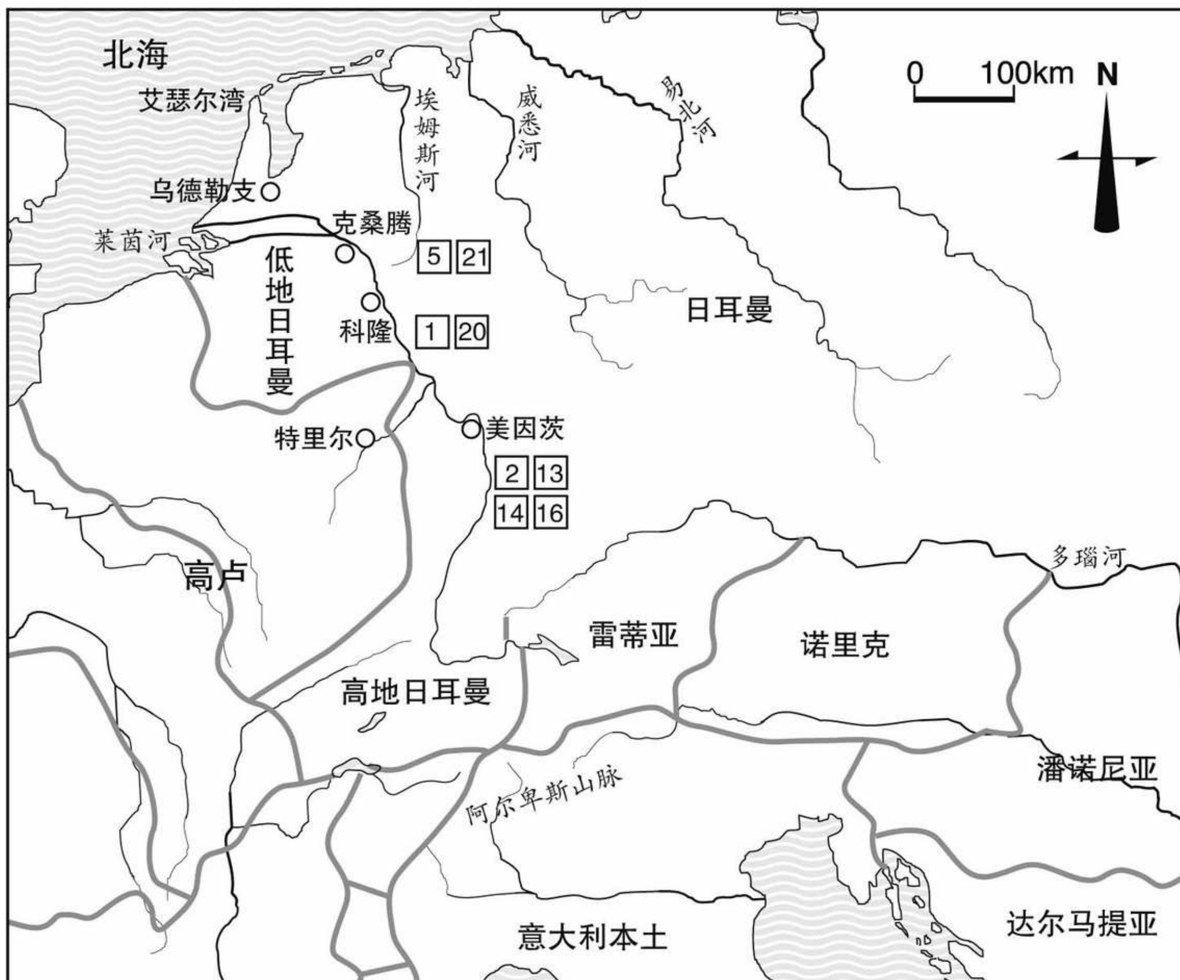
一、服满20年兵役者，可退役。

二、服兵役满16年者转预备役，除非遇敌袭迎战，其余情况可免兵役。

三、先皇之遗赠，加倍赏赐。

然而，这些哗变士兵们以为日耳曼尼库斯有意拖延，转而要求他立即兑现。于是大队长们马上着手办理退役手续，只是关于先皇的遗产赠金，日耳曼尼库斯承诺，返回冬营地佩特拉（今德国克桑腾附近）后兑现。可是，第五、第二十一军团不肯妥协。迫不得已，日耳曼尼库斯和幕僚们只好拿出全部财物，凑齐金额支付给这两个军团的士兵们。费尽周折，这两个军团终于肯出发前往冬营地。第一、第二十军团也愿意在冬营地接受支付，于是由军团长凯奇纳率领，向科隆进发。只不过这支队伍由满载着从日耳曼尼库斯那里抢来的货车打先锋，而且队伍散乱不堪，军旗倒拽着前行。

日耳曼尼库斯终于松了一口气，在他看来低地日耳曼军团的哗变终于解决了，随即火速奔赴高地日耳曼军团的驻地。对于低地日耳曼军团士兵的动向，高地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一直在静观其变，日耳曼尼库斯认为这个军团必须要妥善处理。莱茵河上游的4个高地日耳曼军团，此时已经在军团长席里斯的指挥下，前往摩功提亚库姆（Mogontiacum，今德国美因茨，Mainz）的冬营地驻扎下来了。



莱茵军团的配置（城市名称旁方框内的数字表示驻扎在冬营地的军团番号）

日耳曼尼库斯刚抵达摩功提亚库姆的冬营地，就召集士兵，要求他们向新皇提比略宣誓效忠。与进驻冬营地后心情舒畅不无关系，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军团等3个军团的士兵们毫不犹豫地照做了，只有第十四军团的士兵略显迟疑。日耳曼尼库斯察觉到了，他担心这种情绪会波及其他军团，所以即使没有人提出任何要求，他还是主动承诺高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享有与低地日耳曼相同的特殊待遇。于是第十四军团也对新皇提比略宣誓效忠。见士兵们都服从命令，日耳曼尼库斯认为高地日耳曼军团已无后顾之忧，当即策马沿莱茵河北上，前往科隆的冬营地，迎接元老院使节团的到来。

元老院派遣使节团前来，只不过是将赋予日耳曼尼库斯大权一事传令各处军营而已。然而，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们不解其中内情，对使节的来意产生了误会。他们猜测使节团前来，就是要把日耳曼尼库斯许诺的特殊待遇取消掉。在科隆的冬营地里，除了第一、第二十军团之外，全是等着办理退役手续返乡的老兵。如果日耳曼尼库斯的许诺成为泡影，他们比谁都担忧这样的事情，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哗变再一次爆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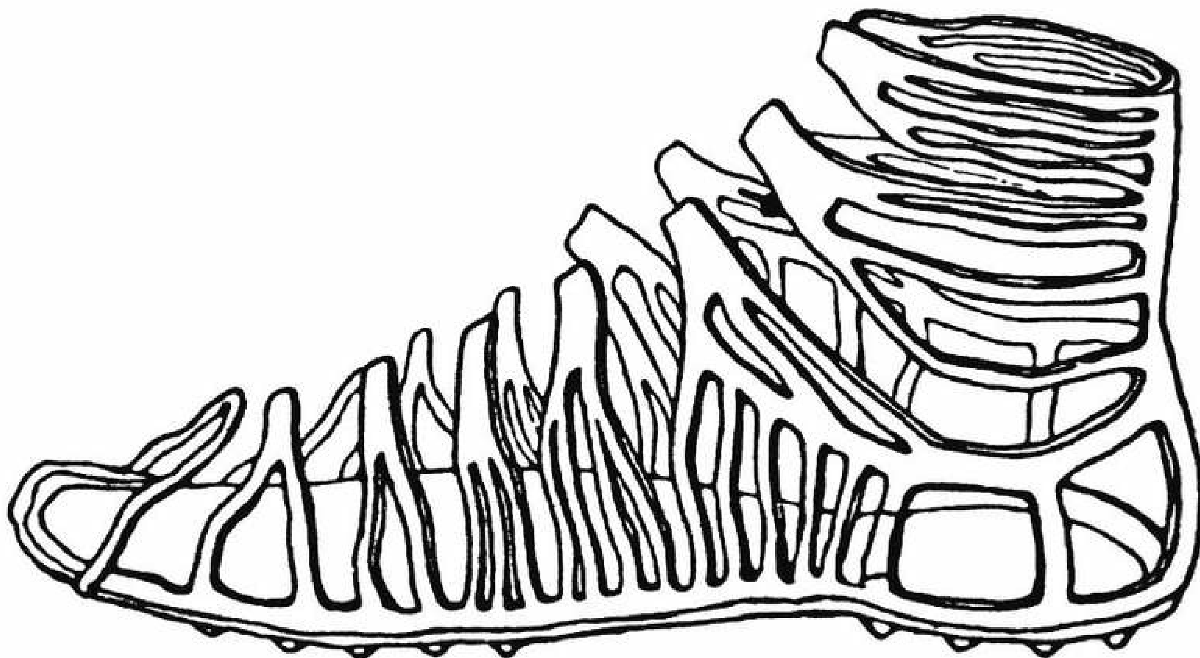
万籁俱寂，夜黑风高，这些哗变士兵悄无声息地潜伏到总司令的营房周围。因为是冬季扎营的基地，官兵都不住帐篷。总司令住在独栋的营房，罗马人称之为“维拉”。他们潜入到最里面的日耳曼尼库斯房间，这已经不是士兵所为，而是演变成为杀人越货的强盗了。这群哗变士兵当晚就被击退，然而哗变已经波及整个军营。

第二天清晨，日耳曼尼库斯召集所有士兵，再把引发士兵骚乱的使节团团长普兰克斯请上台来，向士兵们说明来意，士兵们暂时平静了下来。

然而，没有人因此而认为情况可以得到控制。有幕僚建议，驻扎美因茨的4个军团已经宣誓对皇帝效忠，高地日耳曼军团的冬营地相对安全，可以考虑转移过去。日耳曼尼库斯责任感比常人强烈，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不过考虑到至少可以让家人避开危险，几经犹豫之后还是决定转移。他犹豫是因为妻子阿格里皮娜。阿格里皮娜认为自己是奥古斯都的血亲，有奥古斯都庇护，不惧任何危险，因此她坚决不走。最后，日耳曼尼库斯以她怀有身孕和两岁的儿子为由终于使她点头松口，同意离开。就像敌军来袭仓皇出逃一般，他们开始准备避难。

其他军团长的家人也决定同总司令的妻儿一起转移。不过，目的地不是美因茨的高地日耳曼军团驻地，而是高卢行省。因为他们认为，比起已经敌我不分的罗马军团士兵，高卢行省的人民要安全得多。

在准备货车和避难用的行李时，女仆们不禁低声哭泣，哭声惊醒了酣睡的士兵。他们纷纷跑出营房，发现怀抱幼儿的阿格里皮娜坐在车上，部分高官们的妻子和少数护卫跟在后面。另外，当这些士兵得知阿格里皮娜一行将要前往高卢行省，而非寻求自己同胞的庇护时，他们如遭重击一般。历史学家塔西佗对此直言不讳，罗马士兵们“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卡力加[罗马军队百人队队长（与现代军队中下士相似）以下士兵穿的皮制凉鞋式军靴]

阿格里皮娜怀里的幼儿是日耳曼尼库斯的第3个儿子，名叫盖乌斯，也是士兵们的吉祥物。士兵们很疼爱这个娃娃，他们给他穿上特制的幼儿军装，还为他做了名为“卡力加”（caliga）的凉鞋式罗马军靴。士兵们给幼儿盖乌斯起了个可爱的名字“卡利古拉”，后来就变成士兵们对总司令幼子的昵称。如今这个孩子竟然因为自己而无处容身，甚至要让被他们一贯看不起的高卢人来负责她们的安全，这无疑是对自己怀有戒心，要让自己的军人之名蒙羞。士兵们围住正要出发的车驾，恳求阿格里皮娜不要走。另外一群士兵则来到日耳曼尼库斯跟前，恳请他不要草率行事，以免使罗马军团蒙羞。日耳曼尼库斯见时机到来，就登台训

话。这些言辞虽然有些冗长，但我认为如实反映了日耳曼尼库斯这个人的性格，于是把它全文翻译整理了下来：

> 对我而言，妻儿重要，可重不过父皇与这锦绣河山。父皇以权威管理国家，治理军队，我已无后顾之忧。不瞒大家，上任第一天起，我就准备为了各位的荣耀牺牲妻儿。但是眼下，我不得不让她们离开，因为你们已非昔日令行禁止的良兵。我不愿你们错上加错，对奥古斯都的孙女、提比略的儿媳妇下手。如果你们将继续行暴，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吧。
>
> 今天，我眼看着你们不顾法纪，为所欲为。除了“乱军”，我还能怎么称呼各位？对身拜总司令的皇子群起而攻之，还称得上是士兵吗？对元老院使节团的议员们无礼犯上，还是罗马公民吗？罗马人历来敬重使节，尊重人权，这种精神让敌人心悦诚服，而今你们却肆意践踏。
>
> 有士兵不听指挥、无视命令，神君恺撒只要说声“各位乡亲们”，这些人就能改邪归正。在士兵面前，神君奥古斯都仅凭英姿气势就能威慑全军。我没有两位先贤的气度和威望，眼下又令各位做出被西班牙和叙利亚的战友所不齿之事，今后我恐怕要名声扫地。
>
> 第一、第二十军团的士兵们！两年前，父皇率领你们转战日耳曼原野，踏平蛮族，获得无数荣誉和嘉奖。莫非，你们今天要我带着让人痛心的噩耗回首都复命？杀害百人队队长，驱逐大队长，囚禁元老院议员，营地血流成河，士兵敌意森寒，难道你们要我这苟活的总司令向他报告如此惨状吗？
>
> 第一天阻止我自裁的朋友，现在想来，是我错看了；相反，递短剑给我的士兵，才是我的盟友。悔不当初，如若我当时故去，就不用因目睹你们的种种暴行而痛心疾首。你们选出来的总司令，如今至少已为瓦鲁斯（在条顿堡森林中被日耳曼人杀害）和3个军团报仇雪恨了吧。我明白，罗马人所蒙受的屈辱，必须亲手雪耻。即使高卢行省的人民有意代劳，神明也不允许我们将如此光荣的事情借

他人之手达成。

驾鹤西归的神君奥古斯都啊！在日耳曼英年早逝的父亲杜路苏斯啊！我，日耳曼尼库斯诚心祈求，请你们洗净这群士兵心中的罪恶与污秽吧！也请你们助我一臂之力，让罗马人将同室操戈的怒气，转向敌军日耳曼人吧！

现在，你们清醒了，我愿意重新接纳你们。如果你们愿意释放使节团，宣誓效忠皇帝，并将妻儿归还给我，那么，请停止一切暴行并交出主谋，这是最好的表示。唯有如此，我才能相信你们真心悔改，相信你们依旧忠诚。

士兵们悔不当初，觉得日耳曼尼库斯的斥责，句句在理。话音刚落，就有很多士兵开始叫道：

“让阿格里皮娜回来！”

“卡利古拉是我们看护着长大的，不要把他交给高卢人！”

“我们有罪，请让我们杀敌赎罪！”

日耳曼尼库斯以身怀六甲、冬日严寒为由，拒绝送回阿格里皮娜。至于卡利古拉，他承诺士兵们有重归之日。回营前，日耳曼尼库斯留下一句话：“其他事情，自便。”

哗变士兵们忙着获得宽恕，把带头哗变的主谋们一个个用铁链绑住，带到第一军团长的跟前。对这些主谋的审判是这样进行的：士兵们拔出刀剑，围绕讲台站着。这些主谋被一一押上讲台，由大队长向台下的士兵们询问这人有没有罪，如若有罪呼声很高，这个人会被即刻推下台就地正法。每处决一个人，士兵中就会响起欢呼声，仿佛杀了这些前一刻还是朋友的主谋，他们的罪行就荡然无存了似的。

然而，日耳曼尼库斯对这种处决方式置之不理。站在他的角度考虑

的话，虽然罗马人早就没有拿活人做祭品的习惯，但这种行径无疑是野蛮而残酷的。因为这不是他的命令，而是借士兵们的刀除掉哗变者，所以他应该有充分的理由置之不理。

日耳曼尼库斯没有使用武力，就成功地将士兵们最为痛恨的百人队队长重新洗牌。由于他使用的是较为“民主”的方式，才使得他声名鹊起。

这些百人队队长被挨个儿传唤到总司令跟前，在如实汇报了自己的姓名、所属百人队、出生地、服役年限、有无战功等之后，如果作为上司的大队长或所辖军团的士兵们认同这名百人队队长的勤勉与正直，他就接着当他的百人队队长；如果被认定为贪婪残暴者，则就地免职。

就这样，科隆的冬营地恢复了原有的秩序。屯扎在克桑腾营地的第五、第二十一军团的士兵们在得知科隆的“审判”之后，义愤填膺。这些士兵在所在营地掀起了暴动，并且比其他军团都更加强硬和彻底。如若要处罚，我想这些士兵是最应该受到惩罚的。日耳曼尼库斯决定在事情没闹大之前想办法解决，如果有必要，即使同为罗马军人，也会刀剑相向。科隆和克桑腾都是莱茵河沿岸的基地，于是日耳曼尼库斯下令备好渡河的船只。就在出发之前，他先派快马信差带着密函，送往克桑腾营地的凯奇纳军团长处。密函中写道，他将亲自率领军团顺莱茵河而下，要凯奇纳在自己抵达前妥善处置，否则将会把整个克桑腾冬营地夷为平地。

凯奇纳将没有参与暴动的士兵召集在一起，把密函上面的内容转述给了他们。这些士兵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只有赶快行动。

夜幕降临之后，自相残杀的行动拉开了帷幕，战况非常惨烈。毕竟不是与敌人作战，而是每天寝食相处的手足士兵。而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使得他们无法看清楚刀砍下去的对象，致使很多无辜的士兵都莫名其

妙地被杀死。

在抵达触目惊心的罗马军营之后，日耳曼尼库斯见到的是血流成河、尸横遍地的惨象。但日耳曼尼库斯别无他法，只有叹息道，这根本就不是处置而是虐杀，但此刻他也只能下令，把死者的遗体火化掉。

闻着空气中弥漫的血腥气味，让幸存的士兵内心也开始变得十分凶残。日耳曼尼库斯认为，要让这群血脉贲张的士兵们恢复正常，只有让他们再淋一次来历不同的鲜血。不是内乱却上演了手足自残的惨剧，要想洗雪这个罗马军团中前所未闻的污名，唯有把刀枪对准莱茵河对岸的敌人。虽然10月底是一个根本不适合作战的季节，但日耳曼尼库斯依旧匆忙下令在莱茵河上飞速架桥。

此时对舒适地住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而言，祸从天降。在他们看来，10月底并不是罗马人发起进攻的月份，出人意料的是，杀红了眼的罗马军队竟突然攻了过来。由于毫无防备，结果当然是罗马军队一举大获全胜，将日耳曼人杀得丢盔弃甲。用日耳曼人的血来祭奠亡灵的罗马士兵，觉得这似乎已经洗刷了自己的污名，于是温顺地跟着百人队队长回到科隆和克桑腾的营地。日耳曼尼库斯终于能向远在罗马的提比略报告了——日耳曼军团的哗变已经被平息了下去。

于是，提比略召集元老院议员开会，向他们报告了杜路苏斯和日耳曼尼库斯已经解决了潘诺尼亚军团以及日耳曼军团的哗变事件。然后，他又说服元老院同意日耳曼尼库斯对士兵们承诺的3项特殊待遇，不仅是驻扎在日耳曼的8个军团受惠，屯扎在潘诺尼亚的3个军团也依照此例办理。在他看来，毕竟总不能一边让步，另一边又不认账。如果总是用同一种手法，说不定哪天潘诺尼亚军团又会闹腾起来。元老院的议员们也感同身受，这项提案终于得到了通过。

在元老院会议上，提比略没有提到日耳曼尼库斯以下犯上用他的名义伪造敕令、向士兵们让步的事件。一想到提比略那种要强的性格，不

难想象出他在会议当天是何种心情。不久，在真正的执行过程中，提比略就提议取消了3项中服役期限缩短为16年以及奥古斯都的遗产赠与金加倍这两项特殊待遇，元老院附和着，使得这项议案差点完全沦为白条。不过，提比略倒是努力执行了20年服役期满退役这一条。因为提比略在军队的经验丰富异常，十分了解士兵们渴望期满退役回家的心情。为了确保财源足以支付士兵的退役金，他也把各方要求废除营业税的声音置之脑后。

虽然提比略把平乱的重任交给日耳曼尼库斯与杜路苏斯，但继位不久的提比略并没有老老实实地待在首都罗马，去等待着潘诺尼亚军团和日耳曼军团平乱的消息。不难想象，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加上罗马帝国铁蹄下的种族、民族、宗教、文化差异太大，最终导致提比略要去解决的问题将会层出不穷。

公共安全

提比略直到55岁才成为“第一公民”，也就是当上有实权的皇帝，但我想刚刚继位的提比略早就会预料到他自始至终都应该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皇帝。因为提比略从继位之初就好像不管不顾似的，一点也不在乎笼络人心的政策是否重要。

何谓罗马帝国呢？这正是一个由尤里乌斯·恺撒绘制蓝图，奥古斯都以此为蓝本建成的一个庞大建筑物。如若把这项工程交给一个完全不了解恺撒意图的人，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危险，这个人极有可能会增加一些蓝图上根本就没有的东西，最后变成一栋风格迥异的建筑。为避免这种结局的出现，这项工作必须由能够完全了解设计者意图和建筑者想法的人来主持建造，此外，修建后的建筑物必须非常牢固，今后不管后面的人怎么去改变它，都不会改变它原来固有的基础。而奥古斯都交给提比略的工作，正是这份枯燥乏味但异常艰辛的工作，我想对于提比略

而言，除了早已驾鹤西去的奥古斯都之外，没有人能够了解到这份工作的特殊性质。

何谓“和平”呢？当然不是仅仅做到御敌于国门之外就能实现的梦想，而是只有让罗马人民能够实现真正的安居乐业才可谓是真正的“和平”。“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所隐含的正是这两个方面的“范式”。

提比略在继位后不久大力推行的一项政策，就是不断完善罗马帝国的公共安全。假如公民们才迈出家门一步，就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国家的保障的话，可以想见，生活中所必需的各种社会活动也肯定会销声匿迹，这种状况肯定会使得人心惶惶。于是提比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诸如偷盗、抢劫、伤害、杀人，还有角斗场中的流氓无赖行为，全部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加以明文禁止。此外，由奥古斯都亲手创建的9000人近卫军团士兵，全部被提比略从罗马城中心迁出，屯驻到建于罗马东北部的常驻基地。从近卫军团执勤的地点来看，他们就好似今天国家中的警察一样。罗马帝国并未在意大利半岛部署任何军团，因此，作为被部署于意大利仅有的军事力量，近卫军团的主要任务是维持罗马帝国的日常秩序。

说到底，只有“公正”才是最高的“安全保障”，可是，公正必须依靠正常的司法系统才能得以维系。罗马的审判过程是，告发者陈述理由要两天，辩护方的辩论也要三天；此外，提比略一定会全程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一直到法官完成判决。提比略非常喜欢旁听关于下属行省总督违法乱纪的审判。提比略身材十分高大，身体强健，加上那一套宽大的白色托加，双目炯炯有神，目光犀利，不苟言笑，言辞锋利地审问被告。在这样的场景下，提比略更像监察官而非政治家。他正是一位在那种场合会让人备感威严和压力的最高权力统治者。

紧缩财政

不得不提的是，公正不应仅仅局限于司法范畴，也应纳入作为德政基础的税收制度。提比略对税收制度的理念较为坚持——绝不增加税款。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要遵循先皇奥古斯都定下的规矩，而且，提比略本人也非常肯定不加税的合理性。（有关奥古斯都的税收制度，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国家财政收入有着这样的特色，即便还没有出台新一轮的开支，总额也会不停地攀升。罗马帝国的疆域虽然还是维持原有版图，然而，从奥古斯都进行税收制度改革以来，差不多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了。这时候，就有这样的议论出现了：到底是只用维持现在的税收制度就行了，还是应该上调行省公民税收比率？提比略是这样回答的：

“你们应该把他们当做是剪取羊毛的羊，而不是宰杀来食肉的羊。”

把收税的对象称之为“羊”其实是一种太过直接的说法，那么这些人心中会怎么嘀咕呢？他们真的会觉得一年被剪一次毛比被宰了吃掉好吗？如果真的晓得会被屠宰掉，他们即使在实力不济的情形下，也会舍命相搏。要是一年只用缴10%的行省税就能避免被宰杀的话，他们就会乖乖地顺从。此外，也应感谢当时处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年代，他们也不需要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与邻近部族的战斗中。如若遇到外族入侵、土匪强盗袭击之类防御“狼来了”的危机，现在都由霸主罗马帝国的军队来挑起重任。假如罗马霸权之下的行省人民如果都能这样考虑，对于罗马统治者而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们不用增强军事实力，但仍能够建立巩固的“安全保障”。这也正是奥古斯都所思考、提比略所赞同的“合理性”。

然而，就算是不管不顾，每年的财政支出仍会只增不减，必须想办法解决国家财政面临的困境。为了贯彻收支运行的合理性，其中包括兑现20年服役期的承诺，提比略面临的首要课题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财税体系。

其实，奥古斯都实行的并非宽松的财税政策。作为帝国的奠基者，奥古斯都不得不考虑赢取民心的政策。话虽这样说，奥古斯都面临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民心的向背问题。奥古斯都设立的罗马帝国皇位，必须同时取得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认可才能继位。此外，一旦二者收回认可，就将直接影响到坐在皇位上的人。

考虑到“认可”或是“选举”，并不是由“有投票权的人”依据人气的高低来决定支持与否的，还是有不少人是通过对才华、力量、功劳等进行评估之后，才决定是否继续支持，拉丁语称之为“virtus”。即便有例外的情形，但博取民心的政策与公共利益还是必须找到契合点。

埃及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物，是安葬法老的陵寝金字塔；希腊的代表性建筑物，是供奉着庇护生灵的众神的神殿；然而，提到罗马的代表性建筑物，答案却是让罗马公民生活舒适的街道、下水道、桥梁、议事堂、港口和浴场等基础设施。为什么罗马会如此重视公共事业？他们的公共事业如此兴盛，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传统精神中找出答案——从事这种公共事业工程，是上层精英不可推卸的责任。博取民心的政策与公共利益，这两点在罗马帝国是共生共荣的。

奥古斯都在位的40年内，完成了原本用来对付对手安东尼的公共事业，这些建设的数量相当可观。在安东尼战败之后，这些公共事业随即转化为巩固奥古斯都帝王统治的重要基石。虽然当时的奥古斯都靠战友阿格里帕与梅塞纳斯两人协助完成了这些事业，然而，他还是有资格自夸：“留给我的是一个满是砖瓦的罗马，我身后的却是一个大理石的罗马。”奥古斯都在《功业录》中大量地列举了他的政绩，从中不难看出，他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收买民心的。

那么，继承奥古斯都衣钵的提比略又该怎么做呢？从结果来看的话，不到紧要关头，提比略是纹丝不动的人，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财税制度的重建。最终，提比略还是认为大规模的建设不宜过多，原因在于奥古斯都完成的工程可谓不胜枚举，仅仅维护这些建筑没有庞大的

资金根本就不可能。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提比略才推动了两项公共建设，当然，最有影响力的当数首都罗马。第一个工程是奥古斯都神殿。提比略认为有必要盖座神殿来供奉成为神君的先皇奥古斯都。第二个工程是全面修缮庞培剧场。庞培剧场是罗马仅有的两座用石头建筑的永久剧场之一，由于经常被使用，加之年久失修，对其进行修缮十分必要。

虽然提比略在首都及意大利本土对公共工程并不热衷，但他在行省大兴土木，特别是在位于多瑙河帝国防线前沿的潘诺尼亚，兴建的工事颇多，甚至在北非还发现不少关于提比略事迹的碑文。显而易见，提比略重视实用性的个性忠实地被这些建筑反映了出来，对于光鲜亮丽的新剧场他毫无兴趣，他的兴趣在于如何修建街道、桥梁等基础设施。

此外，罗马人还有这样一种心理，他们认为领导阶层还有为公民提供玩乐的义务。在2000年后的今天说到古罗马，一定会让人联想到“面包与马戏”。拉丁文一词中“马戏”是“色克斯”（circus）。提到“面包”的话，那个时候的小麦都是不要钱免费配给的。当时的罗马帝国是一个还没认识到累进课税制度的帝国，最终使得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这也使得富人会想到把财富分给那些不幸的人们，希望通过这种做法保障社会的稳定。盛行于古希腊的是各种戏剧，而充斥于古罗马玩乐场所的却是击剑等各种竞技角斗。

奥古斯都与其养父恺撒相似，在玩乐方面抱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仅在《功业录》中记载的项目就有：

> 角斗比赛8次，罗马帝国全国各地竞技者的体育比赛3次，战车比赛7次，献给战神马尔斯的竞技角斗每年1次，非洲野兽狩猎表演26次，模拟海战1次。

只不过这些比赛的总数，都是40年间的总和。

继承奥古斯都衣钵的提比略，除了将献给战神马尔斯的竞技赛这种与宗教祭典合并的表演之外，对于此外其他的所有活动，都不再扮演资助者的角色。当然，这不意味他会立法禁止这些活动，而是意味着皇帝不再用钱来资助这些活动了。特别是在举行角斗比赛之际，他的态度相当冷淡，也可以理解为提比略不爱好这种比赛罢了。然而，恺撒与奥古斯都不能被理解为爱好角斗比赛。对于当时罗马帝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他们非常讨厌这种血腥的死亡游戏，一般老百姓对此却十分狂热。所以恺撒与奥古斯都才会去迎合这些拥有投票权的罗马公民。

事实上，角斗场内的确有不少人是靠它生存下来的。由于失去了皇帝的赞助，也引发了角斗士们此起彼伏的抗议场面。这种每天都与死亡打着交道的工作，使得这些角斗士们赚得到很多的金钱，此外还有来自妇女们的欢呼声，甚至还发生了元老院议员的女儿跟角斗士私奔的故事。当然，角斗对于罗马人而言，只是比拳击赛稍微残酷一点的运动罢了。

执政官以下各种重要职位的选举办法都被提比略进行了改动，结果是从公民大会改到元老院中举行。对此，元老院的议员们十分高兴，然而，这也等同于宣告普通公民丧失了免费去看热闹的门票。

假如重要职位仅仅依靠议员们互相推荐才能选出的话，那么参选的元老院议员们就没必要进行选举。在普通罗马公民都拥有投票权的时代，候选人在选举活动中赞助竞技团，免费请拥有“投票权”的公民去观看角斗比赛，这就成为他们动员家中助选员们从事拉票工作的主要手段，甚至发生了贿选买选票的事件。他们之所以千方百计想要当上这种除了固定经费之外没有任何额外收入的职务，是因为这种职务表明了自己属于被称为“光荣的职务”的罗马帝国领导层。

当选举被提升至元老院，元老院的候选人为此可以少花很多钱去参

选，这些候选人当然笑得合不拢嘴。对于拥有投票权的罗马公民而言，除了丧失免费看戏的机会之外，最令人期待的一年一度选举时的额外收入也化为乌有。此外，随着提比略时代的到来，普通公民原来享受的另外一笔赏金也竹篮打水一场空。

罗马皇帝的这一职位，是由元老院议员加上拥有投票权的罗马公民决定的，奥古斯都深谙这一点，毕竟他才是打造这一系统的创始人。所以，奥古斯都不会对在经济上给这两者优惠政策置之脑后不顾。

元老院议员一职只是名分，即使担任行省总督也没有任何固定的公职。要想担任元老院议员这一职务，奥古斯都规定要有100万塞斯特斯才有资格任职。不过，万一哪位议员的财产不足100万的话，那么作为皇帝，将会从财政上予以救济。只不过这项帮扶政策也是由皇帝提出来，最后由元老院通过才算数。不难看出，这项政策是通过雄厚的国家财政实施的以元老院议员为对象的扶贫政策。

此外，在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普通老百姓中，属于中上阶层的骑士阶级，皇帝会起用他们来担任负责征收税款的皇帝财务官等行政职务，才能够较好地利用这些人的经济实力，当然这些官员的薪酬颇丰。

提及位处中下阶层的罗马公民，皇帝经常向这些阶层发放名为赏金的红包，这部分钱不需要经过元老院议员们的同意，因为这钱来自皇帝自己的荷包。对此，《功业录》中是这样记载的：

> 公元前29年——首都罗马公民每人可以领取400塞斯特斯，共有25万人受惠。
>
> 同年——居住在罗马帝国领土其他殖民城市的罗马公民，每人可以领取1000塞斯特斯，共有12万人受惠。
>
> 公元前24年——首都罗马公民每人可以领取400塞斯特斯。
>
> 公元前23年——皇帝自己出钱购买了大批小麦，分12次免费发

放给贫困的居民。

公元前12年——每人400塞斯特斯，共有25万人受惠。

公元前5年——首都罗马的公民每人可以领取240塞斯特斯，共有32万人受惠。

公元前2年——皇帝自己出钱购买了大批小麦，发给有资格免费领取小麦的贫困公民，每人可以领取240塞斯特斯，共有20余万人受惠。

那么，提比略会有什么样的对策呢？

他并未拒绝资助财产不足百万塞斯特斯的元老院议员，但要求需要资助的议员在元老院会场中承认自己出现了财政赤字。但没有议员愿意这样丢人现眼，所以使得提出申请的议员人数直线下降。大概在提比略的思维中，根本就没有必要帮扶那些因为自己铺张浪费而导致财务窘迫的议员。

提到如何对待骑士阶级，提比略的做法与奥古斯都毫无二致。提比略不仅仅把对他们的帮助局限在经济领域，他甚至大胆任命一些骑士阶级担任军团长。可以说，提比略是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善用身处罗马社会第二等级的这些人。

提到公民政策议题，提比略全面废除了以皇帝赏赐为名的补助政策。由格拉古兄弟中胞弟——盖乌斯·格拉古所创立的《小麦法》却延续了下来，这部法律从立法以来已经延续了150年之久，能够保障贫民无偿领取小麦。当初恺撒发放的人数达到了15万人，在奥古斯都时代增加到20余万人，而到了提比略统治时期，人数甚至日益攀升。因为这项《小麦法》是对罗马人称之为“无产者”的贫困阶层的一项社会福利政策，为历代皇帝所赞扬。

如若一直维持奥古斯都时代的开支规模，那么随着拥有公民权者的

人数不断增加，国家财政总有一天会破产，因而增加税收的政策趋势将不可避免。当时，假如提高征收行省税的话，被统治的当地人就会起来反抗，而要镇压这些反抗就得出动军团。此前，罗马军团用来对付外部敌人的军队还行，如若还要用来对付内乱的话，这就意味着必须增加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然而，增强军事实力又会加重帝国的经济负担，最终又循环到了加税的恶果。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中，建立完善的财政制度迫在眉睫。在奥古斯都去世后随即发生的军团哗变，可以理解为财政将要破产的先兆。如若找不到可以用来支付退役金的新财源，那么服役期届满的士兵也会无法退役，原本承诺20年的服役期限将会延长至30甚至40年。假如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仅会打击士兵的士气，罗马帝国的防御体制也会陷入危机之中。

当然，重建完备的财政制度是提比略面临的重要课题，如果要在不增税的前提下也能实现这个目标的话，那么只有紧缩财政开支。但是，提比略自己也清楚，这项政令必然会招致各方的不满。

提比略完善财政制度的重要性很容易理解，即使是对于经济概念一无所知的我，也不难想象其中的艰难。如果强力推行的话，罗马帝国是否会跌入经济萧条的危机之中呢？截至奥古斯都统治时代，这一时期的公共事业或竞技活动应该促进了经济活动，皇帝的赏金也应该刺激了消费。提比略对于奥古斯都制定的这些政策，要么全面废除，要么铁腕压制。

然而，一冷静思考，发现这一切根本就是杞人忧天。

首先，新的工程建设虽然日益减少，但是罗马帝国需要不断维修的建筑、下水管道以及街区的数量仍然十分惊人。身处罗马的工程师有这样一句名言：“石头是朋友，水是敌人。”哪怕是小小的坑坑洼洼，只要风吹过就会留下沙土与种子，被雨水浇灌之后，就会生根发芽、杂草丛生。而这些在风中摇曳飞舞的杂草将会成为建筑物极大的威胁，使得它们很有可能倒塌。所以无论是街道还是建筑物，表面必须保持光滑，绝

不能让沙土以及水分残留下来。而只有不断对这些建筑物进行监管和维修，才能保护它们。所以，就算新的建设工程日益减少，仍然会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入到公共事业中去，而人力与技术基础仍然十分坚实。

作为最大的赞助者，皇帝已经停止继续资助竞技活动，对于从事这些竞技的人，比如抗议的角斗士们，或许在经济上会有所影响。这种不满源于被剥夺了免费看热闹而产生的抱怨情绪。当然，在古时候，这些就业方式是会很少得到任何保障的。

奥古斯都统治的40多年中，用赏赐命名的奖励也仅仅发放了7次。这种平均每6年发放1次的补助，对于促进消费的作用实际上并不大。

因此，公元1世纪上半叶，提比略统治下的辽阔罗马帝国，在奥古斯都建成的经济圈已经发挥了相当程度的作用，促使罗马帝国国库的积蓄也在不断增加。但“皇帝行省”，除了原本文明程度很高的叙利亚之外，其他地区的经济仍然十分落后。行省的税率为当年收益的10%，当然也不能期望这些行省缴纳更多的税收。除掉南法行省与南西班牙行省之外，整个高卢地区与希斯帕尼亚两个区域的经济实力都日益增强，究其原因不难发现，一方面是安全形势得到了极大的保障，另一方面是因为道路网等基础建设已经日益完善。

只要有了安全感，人就会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如果考虑“迁徙”与“定居”两者的能量消耗和财富累积的差距，定居的好处是不容忽视的。在提比略继位前的50年，恺撒通过战争已经使得高卢人进入安全的范围之内，避免了日耳曼民族的铁蹄践踏。有史料显示，正因为这样，才使得他们从狩猎民族过渡为农耕民族。此外，基础建设的普及也促进了农畜产品的互市贸易。

在这样经济持续发展的时代，紧缩财政也并不需要在所有领域削减开支。只需把单纯的浪费，以及并非必要的开支略作调整就行了，这肯定不会导致经济萧条。人类素来习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表象来判断一

件事情。实体经济并非陷入了困境，但是让人感觉到出现了经济萧条，所以大多数人认为提比略比奥古斯都更加“吝啬”。

撤离日耳曼

提比略继承皇位之后的工作：第一，确立皇帝的统治地位，并巩固帝国政权；第二，不断完善国家的财政制度；第三，一系列帝国战略上的问题，即帝国北方的防线是继续维持在莱茵河呢，还是应继续推进到易北河？

在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我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答案，从提比略时代到百年后塔西佗时代的罗马人，也清楚地知道罗马帝国的北部防线就是莱茵河。然而，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就曾经尝试过征服易北河的日耳曼地区。但在何时，谁拿主意放弃的，没有人能够回答得上来，因为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对此都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派往日耳曼的军队就暗示了他们的意图，但最终又退回了意大利本土。这是发生在罗马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他们两位当事人都对此缄默不语，不知道是否是奥古斯都至死都不能放弃征服日耳曼民族，这个撤退的烂摊子才交给提比略去处置的呢？

被现代学者认为“野心太大”的奥古斯都征服日耳曼之旅，于公元前12年正式拉开序幕。当时他让妻子莉薇娅的养子之一——杜路苏斯率军前往。杜路苏斯大胆运用战略，于公元前11年、前10年在日耳曼原野上不停地征战，并于公元前9年抵达了易北河。不幸的是，这位年轻的统帅在回国途中，从马上摔下来丧失了性命。公元前8—前7年的日耳曼战线总指挥则由他的亲哥哥提比略担任。然而，由于奥古斯都失去了战机，导致罗马军队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而提比略也于公元前6年隐居罗得岛。直到公元4年，提比略才重返战场，使得日耳曼战线恢复了生机。公元5年，提比略率领的罗马军团再度挥师至易北河。奥古斯都在

遥远的罗马，应该是一直在梦想着完全征服日耳曼人指日可待吧。

在公元7年，与莱茵河并称为罗马帝国两大防线的多瑙河南线，居住在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原住民发生了反抗罗马帝国的大规模暴动，当时有能力平叛的将领仅有提比略一人。在提比略离开日耳曼战线之后，就把罗马军团在日耳曼的军权授予了瓦鲁斯，一位奥古斯都远房亲戚的女婿。然而，公元9年秋天，瓦鲁斯和3个军团在条顿堡森林全军覆没。（参阅《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这对于希望称霸日耳曼的奥古斯都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奥古斯都最终挺了过来。提比略第三次就任了日耳曼战争的总司令，由提比略率领的罗马军队不停地在日耳曼平原征战，时间从公元10年到12年，战火延续了3年的时间。

公元13年，提比略被奥古斯都召回首都罗马，这或许是奥古斯都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所以想把统治罗马帝国的皇权交付给提比略。但在我看来，对罗马帝国即将完成的日耳曼霸业，奥古斯都想在日耳曼尼库斯手上实现。同年，日耳曼尼库斯取代提比略成为日耳曼军团前线的总指挥，日耳曼尼库斯就是20年前在日耳曼逝世的杜路苏斯的大儿子。“日耳曼尼库斯”从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称霸日耳曼的英雄”的别称，原本这个称谓是留给杜路苏斯的。然而在罗马，父亲的称号成为儿子的名字一事并不鲜见。此外，由于日耳曼尼库斯与奥古斯都有着血缘关系，所以自然得到了奥古斯都的疼爱，这也成为奥古斯都把征服日耳曼的事业交由日耳曼尼库斯完成的原因吧。

公元前12年伊始，罗马帝国在日耳曼的军事行动虽然停滞了不少时间，但前后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还是白白地浪费掉了，难道奥古斯都没有考虑过与其一事无成，还不如把军队撤回到莱茵河吗？

为什么这样呢？原因在于如果前面是一条将要撤退的战线，而日耳曼尼库斯又是将会接任提比略皇位的重要人物，奥古斯都怎么会把他摆在那里呢？如若因为这件名声扫地的事件而使得罗马历史上第三任皇帝

的仕途遭受挫折，那么岂不是极不明智的吗？

在此，不得不重申的是，罗马皇帝是由元老院议员以及罗马公民的选举认可才能继位的，作为继任皇帝的重要条件之一，没有罗马人所认同的、领导者必须具备最高尚的“品德”和公民们公认的“力量”，是万万不行的。

所以，奥古斯都将日耳曼军团的军队指挥权托付给日耳曼尼库斯，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奥古斯都希望日耳曼尼库斯能完成征服日耳曼的事业，最终使得罗马帝国称霸日耳曼地区。我们知道最终提比略还是下令把日耳曼军团撤回到莱茵河。即使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支持，但上文的假设也依然会成立，这不是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撤军的决定还是由提比略作出的吗？

对于罗马史上第一次名声扫地的事件，提比略应该是小心翼翼地算准了时机才撤军的，虽然这违背了先皇奥古斯都的意愿。只不过提比略并没有等来撤军的机会，低地日耳曼军团士兵的哗变让撤军时机稍纵即逝。

罗马军团下属的不服管教，总司令负有非常大的责任。为了平息哗变而出台的伪造敕令，却仍然没有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没有人比日耳曼尼库斯更感痛苦的了。随着秋意渐浓，日耳曼尼库斯知道自己的责任来了，他命令罗马士兵们从冬营地出击，去进攻正在准备平安过冬的日耳曼人部落，然后好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凯旋回营。而且，早在日耳曼尼库斯两年前出任日耳曼战线的总司令以来，就没有打过一场真正的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称霸日耳曼的英雄”的美称名不符实。虽然刚迎来29岁，但这位年轻气盛的总司令决定，明年初春，军队必须要完成称霸日耳曼的使命。罗马有着前线总指挥官负责一切战略部署的传统，假设最高司令官提比略不干涉的话，那么身居罗马帝国军权第二位的日耳曼尼库斯，其行动就更加无所羁绊。

公元15年初春，日耳曼尼库斯率领大军越过莱茵河。其中，美因茨营地的4个军团2.4万名士兵，加上行省平民补充的1万名士兵。下游的克桑腾冬营地则是由凯奇纳率领4个军团2万名士兵与新兵5000人，也一同跨过了莱茵河。他们从南边和西边夹击的作战策略，成功地分裂了由阿尔米纽斯领导的因歼灭瓦鲁斯3个军团而意气风发的日耳曼民族统一战线。罗马军队胜利的消息传到阿尔米纽斯岳父的耳里，使得他不得不选择归顺。日耳曼尼库斯在承诺归顺后的礼遇之后，答应将他迁往莱茵河西岸。而阿尔米纽斯的妻子也跟随她的父亲归顺了日耳曼尼库斯。由于她身怀六甲，最后就在罗马军营中生下了一个男孩。罗马人以保障他们的安逸生活为借口，将这个男孩送到了意大利生活。作为日耳曼民族自由与独立旗手的阿尔米纽斯，他的胞弟、身为部族长老的岳父、妻子和儿子悉数被罗马军队一齐掠去。

当年发生的日耳曼战役，罗马军队大概是因为与凯奇纳的军队会合才形成将近6万大军，使得己方始终保持了较大的优势。此外，被阿尔米纽斯歼灭罗马3个军团时夺走的其中一面军团旗——第十九军团的银鹫旗，也被罗马军队成功夺了回来。在罗马军队进攻途中，他们经过了埋葬着6年前死难者遗体的条顿堡森林。历史学家塔西佗描绘了当时的情形，内容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在此不再赘言。

罗马军队在发动进攻的时候，声势浩大。然而，随着寒冬的逼近，在他们准备返回莱茵河畔冬营地时，日耳曼人的游击战突然间打乱了罗马军队的计划。凯奇纳军团兵分两路后导致兵力分散，加上腹背受敌，好不容易才狼狈地撤回到克桑腾的营地。而日耳曼尼库斯的军队，在归营的途中也是历经千难万险，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在回营过程中损失的士兵人数比战争折损的还要多得多。

元老院批准了日耳曼尼库斯及其下属3位军团长在首都举办的凯旋仪式。我想这大概是元老院接受提比略的建议而举行的。除了为4位将

军举行凯旋仪式，元老院还提议因日耳曼战场上取得了胜利，授予提比略“国父”的称号，但是对于这个称号提比略断然拒绝。如果提比略真接受了“国父”称号的话，就不能从日耳曼撤军了。然而，仅仅用凯旋仪式来为这些将领们庆祝，那么“胜利后撤”的说法也能够被人接受了。

不知是否是元老院的决议使日耳曼尼库斯的力量得到了加强，翌年，即公元16年，他攻入了日耳曼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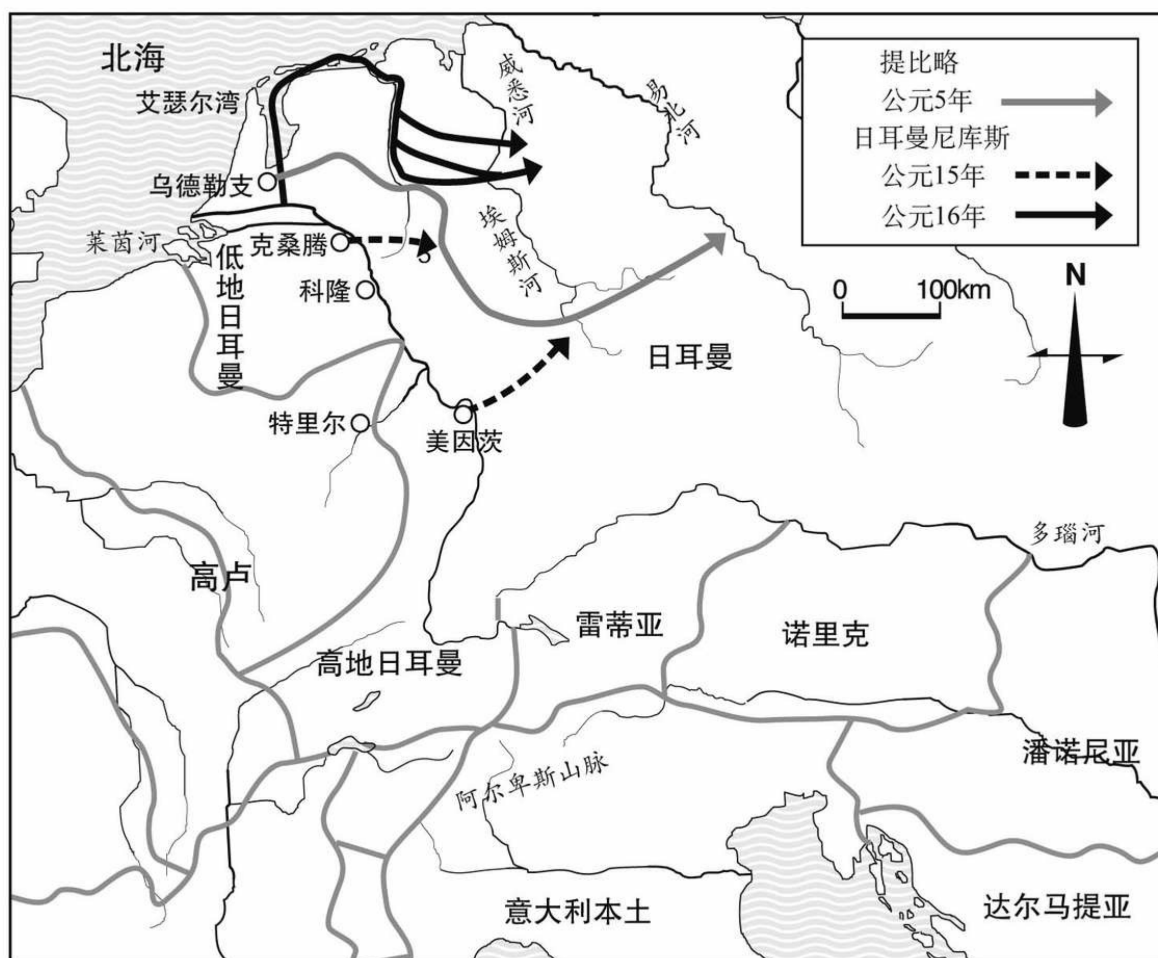
日耳曼尼库斯率领刚刚补充完新兵的8个军团共8万大军，沿着莱茵河顺利直下，穿过北海，并逆着埃姆斯河北上，直捣日耳曼的心腹。阿尔米纽斯也首次以会战的方式迎战罗马军队，然而，在战术方面还是罗马人比日耳曼人更胜一筹，罗马军队在前面两次战争中都是以全胜收场。日耳曼尼库斯用掳获的敌军武器，在战役发生的地点铸造了胜利纪念碑，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荡平莱茵河与易北河间的日耳曼人的我皇提比略之大军军威浩荡，在此将胜利献于最崇高之神祇朱庇特、战神马尔斯以及神君奥古斯都。”同年，他又从敌人手中成功夺回了瓦鲁斯将军遇害时被夺走的三面军团旗中的第二面军旗。

这一年的回师南下也不太平。虽然没有受到日耳曼人游击战的阻击，加之战斗中的损耗也没有多少，波涛汹涌的北海却让罗马军队尝尽了苦头。此外，日耳曼的地形和气候也给罗马军队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日耳曼尼库斯经过艰苦跋涉才率军撤回到莱茵河畔的冬营地，但是，他又在考虑明年春天的战事该如何安排了。就在这个时候，由提比略邀请日耳曼尼库斯回首都举行凯旋仪式的信被送到了前线。日耳曼尼库斯立即提笔回信，恳请提比略能够再给他一年的时间，他就能够完成称霸易北河的大业。但是，提比略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翌年，公元17年5月26日，首都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罗马人庆祝征服日耳曼民族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凯奇纳及其他3位将军身穿凯旋礼服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方，其中还有拉着象征被征服的日耳曼民

族、即载有阿尔米纽斯妻儿的车驾。接下来，凯旋仪式的高潮到来了，驾着4匹白马拉的战车，31岁的年轻总司令日耳曼尼库斯登场了。在这辆战车上还坐着他的3个儿子与2个女儿。他的妻子阿格里皮娜也在凯旋仪式之列。在公开场合，日耳曼尼库斯与2000年后的欧美领导人相似，经常有妻子陪伴在他的左右。而罗马人也与2000年后的现代人一样，不惜对这位年少有为、家室和睦的总司令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在凯旋仪式结束后不久，提比略就公布了日耳曼尼库斯的下一处任职地，当然不是日耳曼前线，而是距离日耳曼路途遥远的东方。理由十分简单，皇帝的继任者必须出马亲自去东方完成重要的任务。



提比略与日耳曼尼库斯的进军路线

历史学家塔西佗这样写道：“禁止日耳曼尼库斯从战争中脱身。”我

想真正的原因，在于塔西佗认为日耳曼尼库斯的战功受到了提比略的妒忌。

我们暂且像塔西佗所认为的那样，承认是提比略出于妒忌更改了日耳曼尼库斯的任职地点。其实，提比略如果有意继续日耳曼战争，他还得重新任命总司令。适合接任日耳曼尼库斯，而且又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选其实也不乏其人。这个人就是提比略的亲生儿子，亦即日耳曼尼库斯的义弟——29岁的杜路苏斯，他的战功在于平息了潘诺尼亚士兵的哗变。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提比略并没有指派任何人（包括杜路苏斯）接任日耳曼尼库斯的位置。更进一步，提比略竟然废除了低地日耳曼军团、高地日耳曼军团共计8个军团的总司令职务。这些措施也说明了提比略不想再继续日耳曼战争了。

然而，阿尔米纽斯仍然毫发无损，此外，令罗马人颜面尽失的三面军团旗也只夺回两面。但罗马人好歹在战场上再次证明了罗马军队的实力超群。虽然阿尔米纽斯苟延残喘了下来，他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去纠合整个日耳曼统一战线了，而分崩离析的日耳曼民族也没有实力再去对抗罗马军队。从整体局势来看，长达28年的日耳曼战争似乎是胜利的，提比略也认为这是结束战争的大好机会。与百年之后历史学家塔西佗误解他如出一辙，其他人对他作出的命令仍然抱有很大的成见。

莱茵河防御体制

把罗马帝国的疆域延伸至易北河，将野蛮而彪悍的日耳曼民族纳入帝国版图，以此来保障北部的安全，奥古斯都在28年之后才完成这一梦想。然而，坚决贯彻这一战略的提比略，并不是只简单地将士兵从日耳曼地区撤回。虽然从公元17年开始莱茵河再次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北方防线，这却分散了军团营地。

截至战略调整前，罗马军队一直把建立在莱茵河西岸的冬营地作为一个基地。通常，每年一到春季气候转暖，罗马军队就越过莱茵河向东发起进攻，入秋后又撤回西岸，回到莱茵河沿岸的冬营地过冬，就这样延续了28年。然而，战略调整后莱茵河自身就成为一条天然防线，冬营地也就再也不是过冬后春天出击的基地了，这里也变成一个除了防备敌军来袭外，他们常年居住的定所。现在的这一状况也使得他们不能把4个军团或2个军团的士兵汇集一处。如果兵力太过集中，反而会使得营区之外的防卫出现空隙。此外，如果将大量的士兵汇集在同一个地方，就会有出现3年前那样哗变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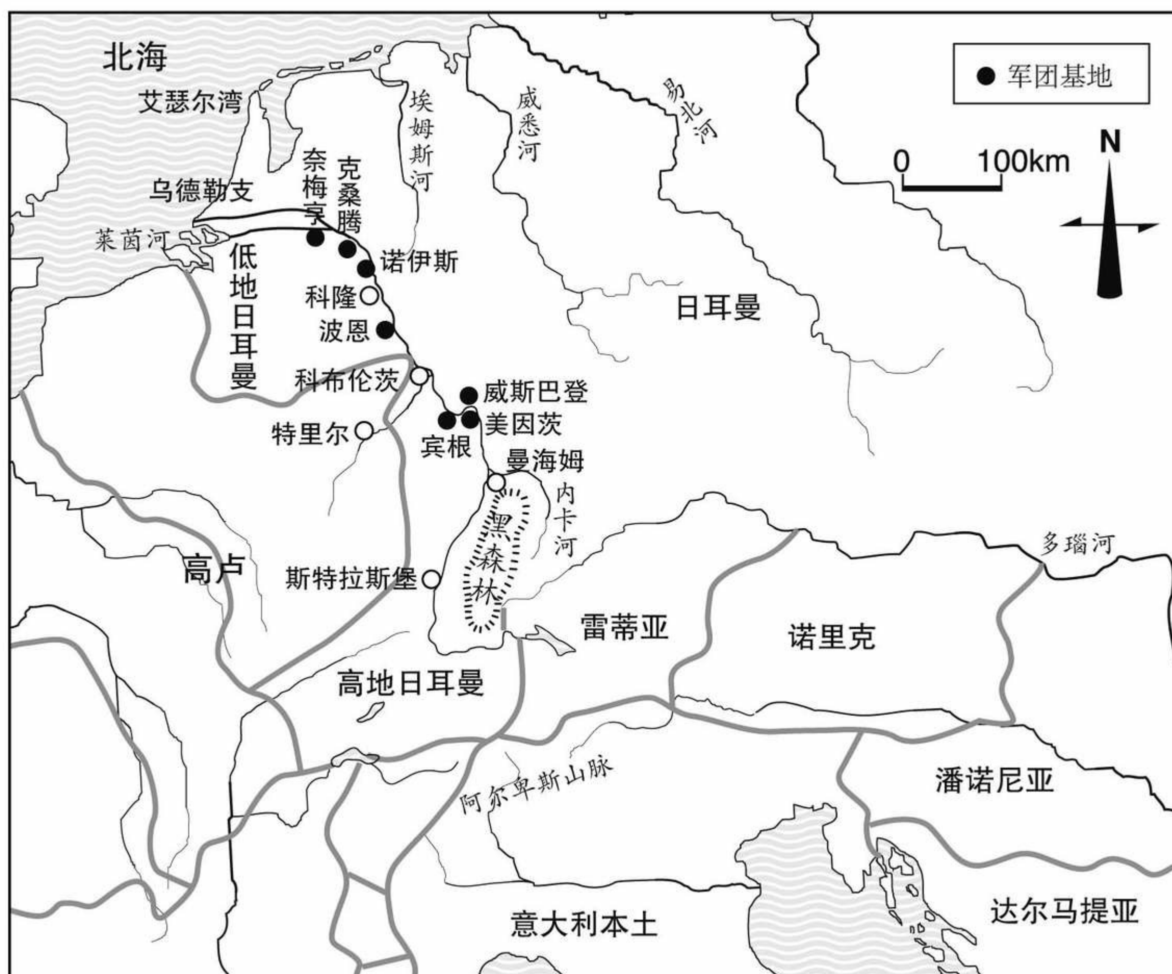
虽然在新的调整方案中，仍然把莱茵河分为上游与下游，分别称为“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各设置了4个军团，但将两个地域的分界线改为现德国的波恩与科布伦茨的中部。

其中，虽然位于莱茵河的西岸却被称为日耳曼的地区，是因为居住在西岸的居民是日耳曼民族。虽然恺撒把这些人民纳入了罗马帝国，使他们成为定居的民族，但从人种上而言，他们与定居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并无差异。即使在日耳曼就是德国这一现代观念中，莱茵河西岸还是称为“莱茵兰－普法尔茨”，属于联邦德国。而位于莱茵河最下游的地区属于今天的荷兰。

话题再回到古罗马，在波恩北方的“低地日耳曼”，以前将4个军团分别安排在佩特拉（今克桑腾附近）和科隆尼亚（今科隆附近）的两个基地中，然而在战略部署调整后由北往南这4个军团被分散部署到诺维欧马格斯（今奈梅亨）、佩特拉、诺法耶吉姆（今诺伊斯）和波恩纳（今波恩）4个基地。至于驻守在康弗恩特斯（今科布伦茨）及以南的“高地日耳曼”的4个日耳曼军团的大部分，都还是维持原来的驻防态势，仍然驻扎在摩功提亚库姆（今美因茨），这大概是3年前这里并没有发生哗变的缘故。但是，从美因茨开始往西的比恩昆（今宾根）、往北的亚奎·马提亚凯（今威斯巴登），军队分散驻扎在这些地方。威斯

巴登在那时一直冒着温泉，对于非常喜欢温泉的罗马人而言，自然是个适宜居住的地方。此外，美因茨又有道路通往奥古斯塔·特雷维洛伦（今多利亚），从莱茵河上游的阿尔根特拉屯（今斯特拉斯堡）也有宽阔的道路沿着莱茵河到达美因茨。当然，这些道路也自然被罗马人所利用。在国境上也再没有部署兵力的必要了，也就是说随着莱茵河防线确立之后，美因茨与同样闻名的后方城市斯特拉斯堡，都一举成为罗马军队的常驻基地。

虽然莱茵河西岸的兵力布置就此得以解决，但是莱茵河东岸的问题依旧存在。日耳曼尼库斯的父亲即提比略的弟弟杜路苏斯在此国境上修筑了几个小城，并且在其中部署了中队规模的守军。



罗马帝国莱茵河军团的重新调整图

可是，提比略却把这些士兵全部撤走了。与此同时，原本居住在莱茵河东岸的几个部族，与罗马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却被提比略迫搬到西岸，把狭长的莱茵河东岸一带变成无人区。至于这个区域的面积长宽几何，都缺乏精确的数据。但因其是部族搬出而形成的无人地带，所以应该不会只是几百米的规模。那会是有多少公里呢？从当地的地势来判断，应该能够达到几十公里。这一无人区只能用来白天放牧牛羊，进行耕作是被禁止的。

之所以要沿着莱茵河设置带状的无人区，大概是为了在敌人来袭的时候更早地发现吧。可是，事实上这一无人地带从未发挥过它的效用。在对提比略的脑袋里为什么会冒出这么个主意而感到困惑的时候，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恺撒在《高卢战记》中曾经说过一段话：

> 最值得日耳曼民族骄傲的，应该就是在自己领土的四周扩张广袤的荒地。这些荒地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它表明了排斥周边的其他部族，没有意愿和他们交流这一决心；其二，则是基于安全保卫上的考虑，能够免遭敌人的突然偷袭。

不仅仅局限于日本人，入乡随俗一直都是人类的共识。所以我想大概提比略的治国方略也贯彻了这一思想。换言之，就是用日耳曼人的办法来对付日耳曼人。

然而，把全长1300多公里的莱茵河沿岸，以及比莱茵河更长的多瑙河沿岸，全部变成无人区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在莱茵河沿岸的无人区只适用于莱茵河下游平原较多的地区。没有平原的其他地区要怎么防御呢？提比略也借鉴了恺撒的经验。

也就是只与居住在莱茵河东岸地区、多瑙河北岸地区的几个日耳曼部族，结成了友好关系。用罗马人较为熟悉的说法，就是与他们缔结了“被保护人”（clients）关系。“clientes”翻译成现代英语是“客

人”（client），但并非是脑海中浮现的“客人”这一意思，把它理解为部下对于上级的关系会比较接近罗马人的想法。这些部族并不是被纳入罗马统治下的行省公民，因此没有缴纳行省税的义务。虽然他们没有必要缴纳税收，但是他们被要求必须提供兵力，由此看来他们形成的是一种同盟国关系。在东方，罗马就和各君主国家建立了这种关系，但是对于那些尚未确立君主制的日耳曼民族，罗马帝国只能与部族缔结同盟关系。

可是“被保护人”关系一到罗马人手中，就连上下这单一的关系都失去了。部族等级的人物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包括世袭权的罗马人的权利，就算是在军中担任辅助兵的部族人，也只要服役满25年，就能够赋予罗马人的公民权。

就像是翻滚向岸边而来的海浪一样，在经过与海中四处露出的岩石撞击后，力量也会减弱。恺撒虽然仅仅到过莱茵河的东岸两次，且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但恺撒已为之后的提比略打好了基础，提比略把它运用得更广，将其建成一个长期培养的固定体系。

罗马人以“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这一基本统治路线闻名。提比略把这种传统观念确立在了帝国的防御体系中。

目前并不存在公元1世纪前半叶帝国北方防御体制完全是提比略一人独立完成的史料。但是，后来继承提比略的卡利古拉毫无建树确实非常清楚；再往后的克劳狄乌斯虽然抱有对帝国运营的热忱，但在防御体制上并未作出什么改动。这之后的尼禄也正如前两位皇帝一样，完全没有显示对此表现出丝毫热心。所以，在重整北方防卫线的韦斯帕芗皇帝继位前的半个世纪里，莱茵河和多瑙河的防卫系统一样，一直延续着提比略所构思和实施的状态。从半世纪后韦斯帕芗得过且过的态度来看，或许连将与莱茵河平行、在曼海姆附近汇入莱茵河的内卡河河谷地区纳入帝国版图也是当初提比略策划实现的。在战略上，这确实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举措。因黑而被称为黑森林的地方，作为日耳曼人逃走躲避的地

方再好不过。而如今，黑森林已归入了帝国的领土。如果仅限于安全保障这一领域，我个人更愿意相信提比略继承了尤里乌斯·恺撒，而并非是奥古斯都的继承者。

考虑到这些情况，提比略并未将这重编的防卫体系运用于当地，而是将其实行于首都罗马。提比略拥有的是以建立多瑙河防卫为目标的6年和日耳曼实地战斗5年的经验。他熟知日耳曼民族，了解当地地势气候，更理解身处战地的士兵心理。只要指令传达系统发挥正常效能，手下的部将组织有序，即使不到当地，政策同样能够得以执行。然而，首都的公民对坚守罗马一动不动的提比略给出了年迈慵懒的恶评。提比略在这段时期也已步入了他的花甲之年。

东方问题

虽说掌握人事权就像手握大权一样，但要付诸实践并没那么简单了。就算是更改他人的工作地点这种事情，也必须得到当事人的同意，以及周围人的认同。因此，将日耳曼尼库斯的工作地点从莱茵河畔调往幼发拉底河畔，首先要得到日耳曼尼库斯本人点头同意才行；其次还要有让元老院和公民也赞许的条件。大概提比略真正的意图，是希望通过更改日耳曼尼库斯的工作地点，达到从日耳曼地区撤军的目的。但是，要巧妙地达成他的目标，就必须让把日耳曼尼库斯调派东方的理由能为众人所信服。显而易见，当时大多数的罗马公民对历时28年之久的日耳曼战役终将获胜这点深信不疑。

一件名为“法国浮雕”的绝世珍品就收藏在法国巴黎的国立图书馆中。它是一个长宽分别为31厘米、25.5厘米的大浮雕，制作于公元17年。这个大型浮雕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刻有恺撒、奥古斯都与提比略的弟弟，也就是日耳曼尼库斯的父亲杜路苏斯，他们都是发展罗马与日耳曼民族关系的先驱者；中段刻的则是提比略、日耳曼尼库斯等

征服日耳曼民族的主人公以及他们的家人；最下面则取景为被征服的日耳曼人群像。就算现今看到这幅作品的人也一定会这样想到，公元17年春为迎接日耳曼尼库斯而举行的凯旋仪式，就意味着罗马完成了征服日耳曼民族的伟业。也就在那一年，罗马军队也完成了从日耳曼的撤离，不了解事情原委的人是绝对想都不会去想的吧。另一幅收藏在维也纳历史博物馆的古罗马时代的著名浮雕“奥古斯都浮雕”与“法国浮雕”不同，这幅作品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因为绝大多数日耳曼民族仍然居住在罗马帝国国界以外的地区内。要从攻占的地区撤退，并且是块经历了28个年头才征服的领地，最后却要撤退，在罗马史上要作出这样史无前例决断的帝王，势必要蒙骗众人，其中不仅是本土的国民，还有敌方的日耳曼人，于是就想到利用华丽的凯旋仪式或者是精美的浮雕来迷惑众人的眼光。而且，对被视为胜将的日耳曼尼库斯的任地变更一事，也就必须拿出能够让众人信服的理由。



法国的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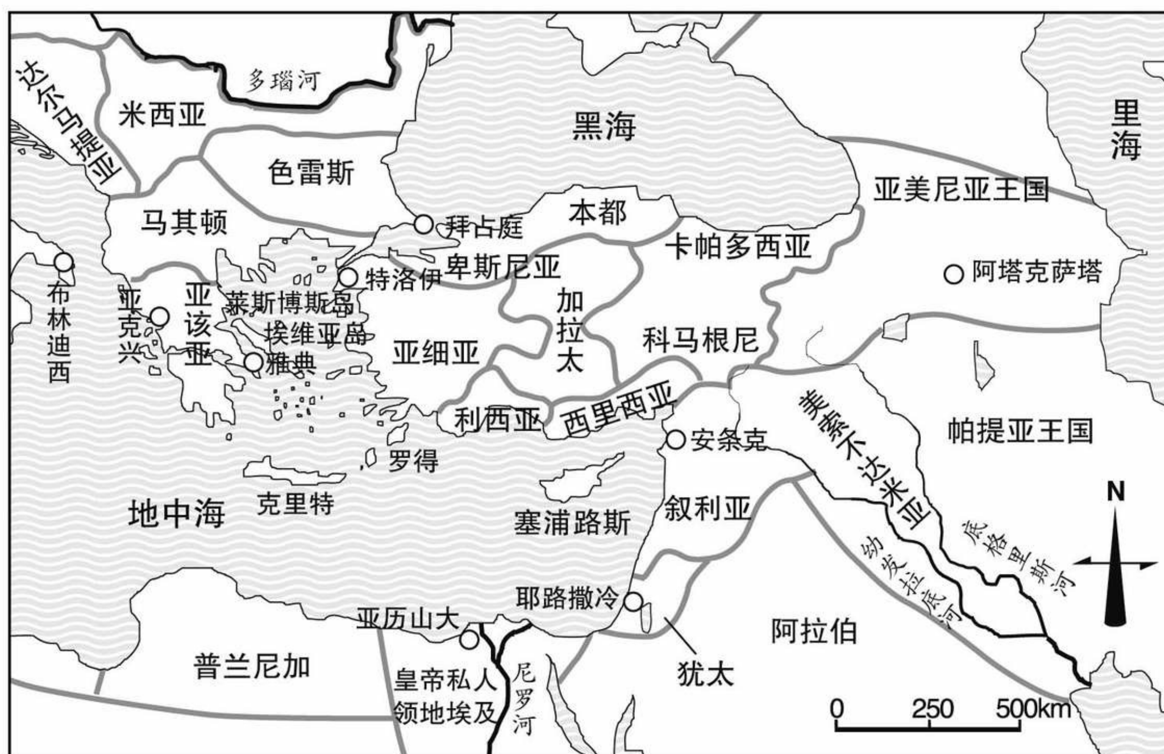


奥古斯都浮雕

帕提亚王国问题正是罗马帝国当时所谓的东方问题。然而，帕提亚王国没有能够对付罗马帝国的国力。如果罗马帝国与帕提亚王国发生正面冲突，即使出现像与迦太基作战时互有输赢的情况，罗马的最后胜利仍是毫无悬念的。即使帕提亚王国的军事力量无法战胜罗马，却足以威慑邻近诸国。而且，帕提亚王国邻近各王国都是属于罗马帝国打造的“被保护人”体系。正是与这些同盟国的合作，才形成了罗马的东方防御体制。

为了解决帕提亚王国问题，从罗马霸权遍及整个地中海区域的公元前1世纪起，罗马就开始全神贯注地思考此事。卢拉加斯、庞培和罗马帝国其他非常优秀的将领，无时无刻不把帕提亚王国当做目标，进行称霸东方的事业。即使没有直接和帕提亚王国交手，却通过在周边展开军事活动，成功实现了对帕提亚王国的军事封锁。而要彻底解决帕提亚王国问题、即将准备出发远征的恺撒却遭到谋杀，此事不得不搁置下来。

恺撒被谋杀后，奥古斯都在内乱中继承罗马帝国皇位，也开始着手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然而，奥古斯都是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纠纷的。当一提到以外交途径解决纠纷，我们现代人，特别是日本人，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是在一个平和的气氛中，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问题。奥古斯都的外交途径却是先以军事力量震慑，再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历史的无数次证明，这种方式才是最有效的外交方法。显而易见，理性不会使得人类自发地清醒过来，而只有在武力的强迫下才会认清事实的本质。奥古斯都采用这一手法也正是因为他掌握了这个要点。



罗马帝国的东方

公元前21年，罗马帝国与帕提亚王国在从幼发拉底河中的一个小岛上举行了和平条约的签约仪式。罗马帝国的代表是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提比略。在出席签约仪式前，带领军队对帕提亚王国实行“武力威慑”的也是这位时年21岁的提比略。在这一年签订的条约中，两国再次确认以幼发拉底河为国界，在承认贸易自由的前提下，双方发誓不互动干戈，这次谈判才得以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这次缔约之后，两国除了偶尔进行的细微调整之外，友好关系维持了35年。现在，重新调整的时期又一次来临。在两国关系处于略微调整的公元2年，奥古斯都派往东方的是时任“皇太子”的盖乌斯。如同上次一样，出席者也必须是皇位继承人。作为完全的君主专制国的波斯民族帕提亚王国，如对方出席的不是社会地位高的人的话，其出席资格是不被认可的。这和现代的民主国家喜欢有能力的人来负责谈判具有同样的道理。

所以，把日耳曼尼库斯从日耳曼调回来之后派往东方，这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足以让日耳曼尼库斯本人与罗马公民接受。对提比略而言，把因完成称霸为受众人信任的日耳曼尼库斯派到东方解决帕提亚王国问题，即使撤退也能在不致使不满情绪爆发的情况下得以实现。

提比略的东方政策完美地继承了奥古斯都的行事作风。换言之，他也是左手以武力威慑、右手摇着橄榄枝倡导和平。但是外交手段的成功与否受制于先行的宣传战。

提比略随即致函元老院，要求元老院立即授予即将前往东方的日耳曼尼库斯“最高司令权”。元老院也经过了简单的决议，认为日耳曼尼库斯是派往东方最适合的人选。帕提亚王国获知这个决定后，一定感受到罗马帝国对这一问题的认真态度。在作好准备之后，日耳曼尼库斯在公元17年的秋天离开罗马，前往东方。如同他总带家人同行的一贯作风，这次虽然把长子、次子和两个女儿留在罗马，但他还是将怀有身孕的妻子阿格里皮娜以及5岁的小儿子卡利古拉带在了身边。这一行程日耳曼

尼库斯兼顾希腊等地的观光，不愧为一段十分惬意的旅程。

早在把日耳曼尼库斯派往东方之前，提比略就把他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派往了多瑙河前线。由于莱茵河上建立防线以后，同样与日耳曼民族相对的多瑙河沿岸的防御体系的确立，就比以往更加迫切了。奥古斯都式的统治方式也被提比略沿袭了下来，把养子与亲生儿子两人派往前线之后，提比略自己坐镇首都指挥。显而易见，皇帝身在首都是负责罗马帝国运转的“大脑”，而派往前线的军团长正好是“四肢”。

日耳曼尼库斯的东方之行

日耳曼尼库斯虽然只有31岁，但他是一个很受欢迎与爱戴的人。这不仅是由于他有着非常帅气的外表，而他的母亲是奥古斯都的外甥女，还有着非常显赫的出身背景。除此之外，妻子又是奥古斯都的孙女。又身为三男三女的父亲，子女众多也使他赢得了庶民的拥戴。而且，还有日耳曼尼库斯为倾听手下士兵的心声，夜晚装扮成兵卒走访士兵帐篷的逸事。2000年之后，一位现代历史学家还在称赞他是一位“充满热心的将军”，而在士兵眼中，他是位非常注意民主的上司。当然，日耳曼尼库斯性格开朗，温文尔雅，对谁都彬彬有礼。虽然他会一见到士兵们暴动，就失望得想要举剑自残；或是看到许多船只因受到北海狂风的侵袭而沉没时就感到绝望，感觉都是自己的失误，而想要跳海自尽。但是这些举动在普通的罗马人眼中，恰恰是他心怀仁慈，是一位十分体贴下属的领导人的表现。另外，他对于以元老院主导为特色的共和制有着无法掩饰的亲近，正因为如此，在保守的元老院议员中日耳曼尼库斯也大受赞赏。日耳曼尼库斯率军从罗马南下，沿着阿皮亚大道前往布林迪西进军之际，沿途挤满了祈求他平安归来的罗马人。

日耳曼尼库斯率领部下从布林迪西港登船出发，虽然遭受了3天冬季强烈季风的影响，但还是安然无事地踏上了希腊的国土。公元18年1

月，日耳曼尼库斯率领部下造访了位于希腊最西端的亚克兴角。大海正对在亚克兴角前，正是在半个世纪前的公元前31年屋大维时代，奥古斯都率军与安东尼和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联军，在此进行了著名的“亚克兴角海战”[参阅《罗马人的故事5 ·恺撒时代（下）》]。最终，这场战役的胜利使奥古斯都成了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上建造了神殿以感谢神灵赐予的胜利，在此可以看到前面的大海。日耳曼尼库斯首先来到这座神殿祭奠先皇奥古斯都，而后他也参观了一下神殿附近的安东尼军队的营区遗迹。现如今，日耳曼尼库斯成了提比略的养子，也就是奥古斯都的孙子；他的生母安东尼娅，正是奥古斯都姐姐屋大维娅与安东尼的女儿。换言之，在亚克兴角海战中失败的马克·安东尼正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外祖父。

当然，日耳曼尼库斯造访半世纪前亲生外祖父决战时的战场，并非是出于好奇才来的。

日耳曼尼库斯到这里的原因，其实是为了缅怀受命运捉弄而败北的外祖父，以及在他指挥下不得已与自己的国家刀剑相向的罗马士兵们。发人深省的是，罗马人当时竟然没有对日耳曼尼库斯这一行为予以弹劾。不过仔细想想的话，如今登上皇位的提比略的亲生父亲，就是长年与奥古斯都为敌之人。罗马人不是就这样简单地原谅了失败者，就像希腊人普鲁塔克所评论的一样，“甚至于要同化败军之将”。罗马人的这种败者观，在古代也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在2000年后的今天来看也是很奇特的一件事，丝毫没有丧失其吸引力。因为，在往后无论哪一个帝国，败者都是落到被斩首的下场。

在《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出生的28年前，也就是日耳曼尼库斯造访希腊那年，当时的希腊人也拥有像普鲁塔克一样的罗马观吗？实际上，日耳曼尼库斯及其部属不仅在各地大受欢迎，就连在这样没有驻扎任何罗马军团的希腊，他们也享受了一段不需特别保卫的惬意之旅。

日耳曼尼库斯横穿希腊之旅，仅在雅典稍作休息，之后取道埃维亚

岛经海路抵达了莱斯博斯岛。阿格里皮娜就在这个岛上生下了她的小女儿——尤利娅·莉薇娅。在他们离开莱斯博斯岛踏上近在咫尺的小亚细亚海岸后，日耳曼尼库斯仍不急于赶快结束这段旅程。接着他们前往北边的特洛伊，寻访了荷马叙事诗《伊利亚特》中的古战场遗迹。对在莱茵河以及多瑙河流域的战场度过了青春时代的日耳曼尼库斯而言，从意大利开始的东行是他有生以来的首次体验。此外，他也没有需要赶路的理由，倒是提比略任命的几名“事务员”得加紧行程，他们必须赶在日耳曼尼库斯抵达之前，做好各项工作准备以备随时执行。

日耳曼尼库斯家谱图系（到三个女儿出生为止）

司克里波尼娅
①奥古斯都
莉薇娅
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
屋大维娅
安东尼
克娄巴特拉
男 女 男

M·阿格里帕
尤利娅
②提比略
维普萨尼娅
杜路苏斯
小安东尼娅
大安东尼娅
D·阿赫诺巴尔布斯

盖乌斯·恺撒
鲁基乌斯·恺撒
女
大阿格里皮娜
男
日耳曼尼库斯
杜路苏斯
莉薇娅
④克劳狄乌斯
D·阿赫诺巴尔布斯

尼禄·恺撒
杜路苏斯·恺撒
③卡利古拉
小阿格里皮娜
杜路希拉
尤利娅·莉薇娅
女
男
男
（双胞胎）

黑体字＝男
楷体字＝女
圆圈内数字表示皇帝继位顺序
虚线表示养父子关系

一直在持续的亚美尼亚皇位继承权争夺战，导致了罗马帝国与帕提

亚王国之间关系的变化。亚美尼亚人民厌倦了出身罗马并由奥古斯都支持而登上皇位的沃诺内斯的统治，想把沃诺内斯赶下皇位后让本都王的儿子——被人民认为具有东方君主风范的泽诺尼斯当亚美尼亚王。从奥古斯都选出的王子这点看来，沃诺内斯肯定具有统治的能力。不仅如此，这位王子也应该有罗马统治者才有的能力与干练。然而，罗马人认定的君主就是国家的统治者，而在波斯人观念中，君主是妻妾成群、准备战争、准备狩猎以及举办宴会的领导人。在价值观上，东方和西方确实存在着差异。从亚美尼亚被驱逐的沃诺内斯逃到了叙利亚，受到了叙利亚行省总督的保护。亚美尼亚敢做出这种与反罗马无异的举动，正是因为它认为有邻国帕提亚作为靠山，才使它拥有了付诸行动的勇气。而帕提亚国王一直打算把亚美尼亚纳入自己的版图，也认为这是一次把罗马的影响力从亚美尼亚抹去的良机。不管怎么说，按照罗马一贯的东方政策，即以西边的叙利亚行省与北方的亚美尼亚王国为基地，对帕提亚王国形成封锁。

不过，对于使罗马和帕提亚王国之间可能随时爆发战争的这种挑衅行为，提比略作出了冷静而透彻的对策。亚美尼亚对于罗马帝国仍旧是非常重要的屏障这点是不会变的，当然，这并非单纯的出于占领欲想据为己有，把它置于罗马的控制之下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从文化与历史角度出发，亚美尼亚人和帕提亚人同样都属波斯文明圈。在提比略看来，亚美尼亚皇位的人选只要能让下属的亚美尼亚人民满意，使国内安定、政局稳定、确保亚美尼亚今后继续保持和罗马的友好关系，这就够让罗马帝国欣慰了。或许提比略早已完成对此事的调查，知道觊觎皇位的泽诺尼斯是亲罗马的本都王的儿子，而他本人也并未站在反罗马派的一边。提比略让泽诺尼斯当上亚美尼亚王，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泽诺尼斯的名字必须改为阿尔塔什斯，即从希腊名改为亚美尼亚名。

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势，日耳曼尼库斯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到达阿塔克萨塔，即亚美尼亚两个首都之一，在阿塔克萨塔完成亚美尼亚新国王的继位仪式。就这样，亚美尼亚新国王的继承仪式在亚美尼亚人的欢呼

声中落下帷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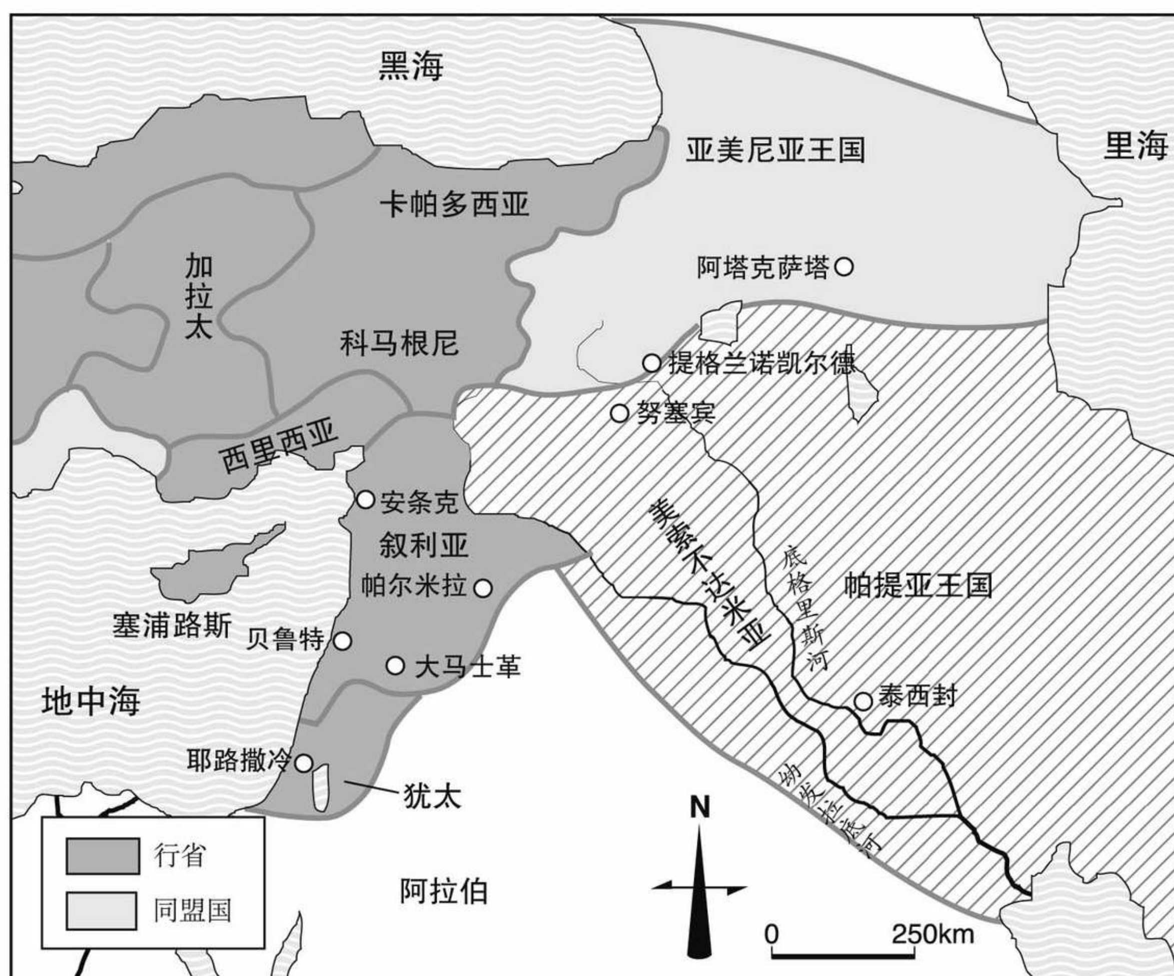
在日耳曼尼库斯的精心操作下，帕提亚王国的计划至此全部落空。看清现实的帕提亚国王阿尔达班连忙派遣使节到日耳曼尼库斯处，提出愿意与罗马重新缔结友好条约，并提出具体的建议，即在幼发拉底河中的小岛上进行缔结协约仪式。如若任由叙利亚行省保护的前任国王沃诺内斯一直待下去，有可能变成新国王统治的威胁。于是其中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希望日耳曼尼库斯能将保护沃诺内斯的地方迁移到离亚美尼亚更远的地方。对此，日耳曼尼库斯同意了，打算把沃诺内斯转移到小亚细亚的罗马行省。就在护送途中，沃诺内斯不知出于何故想要逃跑，最终被追随而来的百人队队长杀死。当然事情是否如此，真相不得而知，然而，不再有威胁亚美尼亚王国局势的人了。

这一年，罗马帝国在以外交手段成功地处理亚美尼亚问题的同时，也顾及了帕提亚王国。直到公元34年，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到阿尔塔什斯国王去世为止的16年中，可以说罗马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关系到罗马帝国东方安定关键的亚美尼亚王国收归手下，在这件事情上大获成功。

其实，除了助亚美尼亚王登基、重新与帕提亚王国缔结友好条约之外，日耳曼尼库斯被派往东方之行，还有另外一个虽没有前两个声势大，但也很重要的任务。也就是完成对于东方君主国家中算是小国的已与罗马结成同盟（事实上的属国）的卡帕多西亚与科马根尼的处置。虽说没有大国帕提亚与中等国家亚美尼亚那么棘手，但是这也是日耳曼尼库斯的第3个重要任务。虽说从现代的地理位置上来看，这两个小国位于土耳其的最东部，但与罗马帝国的直辖行省叙利亚一样，同样都是封锁第一假想敌帕提亚王国这一举措上的重要棋子。在公元18年，卡帕多西亚的老国王阿尔科拉欧斯因有反罗马的行动而被召回并扣留在罗马帝国本土，卡帕多西亚皇位的继承问题浮出水面。与此同时，在科马根尼王国还未遴选出继承人的情况下，国王也驾鹤西去。

当然，提比略的决定很快就出来了，把这两个王国都变成罗马的直

辖行省，只是做法不同而已。提比略把具有执政官历练的维拉尼斯，派为卡帕多西亚的第一任总督，把卡帕多西亚纳入罗马帝国的意图十分明显。此外，他派没有执政官历练的法务官瑟维鲁斯担任科马根尼的第一任总督，可以猜测提比略可能想把这个小国当做其邻地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直到培养出皇位继承人。提比略对这两个王国的处置手法不同，源于前者国王是犯有过错，而后者的国王是自然死亡，所以存在着差异。再没有哪个民族像罗马人这样能看菜下饭（Case by Case）、操纵自如的了。20年之后，科马根尼再次成为独立的王国证实了提比略的先见之明。



帕提亚王国及其周边地图（公元18年之后）

在卡帕多西亚和科马根尼两国成为罗马的行省之后，自然两国的国

民就有了缴纳罗马税制中规定的行省税等种种税款的义务。虽提比略明知这不是长久之计，但还是大幅度地降低了税率。因为东方的民众早已习惯了专制君主的统治，所以只要这样特殊的民族情感没有爆发，统治者不论是东方人还是罗马人对他们而言就不会有区别。只要税率比以前低，受到拥护，人民就不会对新的统治阶层产生反感。说起来，一直处心积虑健全财政的提比略，并非是不分青红皂白毫无节制榨取行省人民财产的皇帝。

与此同时，提比略也在罗马本土实行减税政策，他把从前饱受恶评的1%的营业税（即消费税）降低为0.5%。但对于全面停止征税的要求，提比略出于保证罗马防御经费财源的考虑断然拒绝。由于有两个行省新增加的税收，所以有了减少税率的条件，但是这一减税政策也只持续了一段时期。实际上，过了不到两年税率又恢复到减税前的样子。

总督皮索

看上去波澜不惊的日耳曼尼库斯的东方之行，其实意外就隐藏在背后。日耳曼尼库斯与叙利亚行省总督皮索的关系恶化，导致了矛盾的产生。

由于日耳曼尼库斯被提比略赋予整个东方区域的“最高司令权”，也就是说在处于整个东方区域行政官中地位最高的叙利亚总督也应听命于他。虽然这只是一些研究者的推测，但他们认为在日耳曼尼库斯出发时，握有提比略密令的皮索也踏上了赴任叙利亚之路。此外，几位现代学者还推测，提比略选择把相当于日耳曼尼库斯叔辈的皮索派往东方出任叙利亚总督，也有出于对日耳曼尼库斯进行监督的考量。然而，事实证明这次的人事安排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皮索没有履行好从旁监督这一职责，只起到一个横加干预的作用。皮索是一个喜欢越权行事的人，而且还是典型中的典型。

除此之外，如若女人加入男人之间争端的话，那只能使男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最终导致场面无法控制。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阿格里皮娜最引以为傲的，是身为神君奥古斯都的直系血亲这一点，所以她总在各场合抛头露面，连军团的阅兵典礼也要参加。阿格里皮娜的这种做派使皮索的妻子普兰希娜萌生了对抗心。这位总督夫人也开始经常出入军团消磨时间。两个女人之间的抗衡发展到了各个方面，这样的抗衡在对权威和权力只能次于日耳曼尼库斯的皮索态度上也日益暴露。皮索甚至对日耳曼尼库斯要求调派1个军团的命令充耳不闻，毫无反应。

当然，并非上述一件争端就使得日耳曼尼库斯对皮索产生了不满。从公元18年至次年的这个冬季，日耳曼尼库斯偕同家人前往埃及，打算在埃及避寒。然而，埃及是皇帝的私有领地，在罗马身兼重职的人不论是谁，不经皇帝的许可是不能入境的，这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就有规定。在日耳曼尼库斯看来，既然身为东方区域的最高司令官，那么进入在其管辖范围之内的埃及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在没有得到罗马的提比略许可的情况下便进入了埃及。对于日耳曼尼库斯而言，埃及特别是首都亚历山大，由于这块土地与他的外祖父安东尼渊源颇深，所以他的心里洋溢着亲切感。

日耳曼尼库斯一家的埃及之旅，按照他时年32岁“热情洋溢的领导人”的性格观察的话，应当完全是按照他个人的意愿进行的。此行，他们前往合葬在亚历山大的墓地的外祖父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的灵庙。此外，在身边缺少护卫的情况下，他们还以一副希腊式的短衣打扮游走在亚历山大的街道。不得不提的是，当时的埃及特别是亚历山大是希腊人的城市。他们像普通游客一样周游人人向往的尼罗河，兴致勃勃地观赏沿岸的金字塔与寺庙。当他听说亚历山大的居民缺少食物之后，就把原本要运往罗马囤积的小麦开仓济贫，将粮食分发给了亚历山大人民，这种举措自然使得他也受到了当地人的拥戴。在当地人眼中，他们更愿意把这位年轻的罗马“皇太子”，看做是当年率领埃及军队顽强对抗罗马惨遭失败的马克·安东尼的外孙子。

提比略在得知日耳曼尼库斯在埃及的举动时，回想起他当初在日耳曼军团哗变时伪造诏书放他一马的事情，越发恼怒，在元老院中公开对日耳曼尼库斯进行了斥责。当然，提比略的斥责也有一定的道理，理由有三：其一，日耳曼尼库斯身居罗马要职，却轻率地以希腊式的打扮出现在埃及街头巷尾。其二，视神君奥古斯都制定的法律为一纸空文，在没有获得皇帝许可的情况下私自进入埃及。其三，无视埃及直属长官的权力，违背长官之意，私自开放粮仓。提比略对日耳曼尼库斯的斥责，元老院也深表认同。于是日耳曼尼库斯收到了一封要他谨慎行事的正式信函。

然而，还未等这封信送到日耳曼尼库斯手中，日耳曼尼库斯与家人早就离开了埃及。因为他是就算受到责备也不会放在心上这一性格。更何况，日耳曼尼库斯一直期望的埃及之旅也得到了实现。

多瑙河防御体制

就在罗马帝国东方安全防御体制在日耳曼尼库斯的精心努力下得到巩固之际，罗马帝国西方的安全防御体制，也如同提比略的规划，在其子杜路苏斯的执行下，多瑙河防御体制最终确立下来。

罗马帝国在多瑙河流域的对手，正是日耳曼民族中实力最为强大的马柯曼尼人。而马柯曼尼人的族长马洛勃杜努斯自幼在罗马长大，非常熟悉罗马有着强大的国力，所以从不采取正面对抗的方式与罗马帝国发生冲突。如果一直由马洛勃杜努斯统治多瑙河北岸的话，提比略自然会十分省心。这位一直拒绝与阿尔米纽斯并肩作战反抗罗马帝国的马洛勃杜努斯，由于部下的叛乱而身陷囹圄。在危急情况之下，马洛勃杜努斯向提比略请求援助。然而此时的提比略完全没有越过莱茵河或多瑙河进攻日耳曼的打算，他甚至拒绝派遣罗马军团前往驰援。不过同时，提比略的确也下令，承诺在意大利北部的拉文纳提供一个让马洛勃杜努斯及

其家人栖身之所。最后，为了保全性命，这位日耳曼人领袖也只能委曲求全。

当向元老院报告了这件事情之后，提比略列举了下面几条理由来强调对此事件处理的合适之处。

对于罗马人而言，再也找不出像马洛勃杜努斯这样危险的日耳曼人，他非常有能力，而且在日耳曼民族中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如果罗马帝国能够好好地利用他，收降他，用贵宾的身份使其归顺而不是把他俘虏过来，不仅可以削弱居住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的日耳曼民族的力量，在危急时刻还可以向马洛勃杜努斯辅之以罗马军团，让他对付日耳曼人。也就是说，把这位日耳曼政治逃亡者当做对付日耳曼的王牌。事实上提比略的这一招也发挥了作用，自马洛勃杜努斯到了拉文纳开始悠然的生活后，提比略只要看到多瑙河北岸的部族有南下进攻的迹象，就会拿出这张王牌对他们进行恐吓。

对政治逃亡者与人质，罗马人并不会冷遇他们，也不会把他们关在牢房里，总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王牌加以利用。当然也是为了在紧要关头，可以利用他们翻盘。

不久之后，因击溃马洛勃杜努斯而将族长一职收入囊中的卡杜阿尔达斯也遭到叛变的境遇，他同样也转向提比略请求援救。提比略也为卡杜阿尔达斯准备了栖身之所，把他安排在了法国南部的海港法姆·尤里（今弗雷瑞斯）。自此有两张王牌已紧握在提比略手中了。

此后，统率了马柯曼尼人的瓦尼斯，又被提比略认可了，上升为罗马帝国的“朋友”身份，就这样跟这个多瑙河北岸的独立王国缔结了同盟关系。就是这样的做法或许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现实政治吧。实际上，罗马正是凭借这种冷静透彻的外交策略，使帝国在莱茵河东岸和多瑙河北岸都争取到了盟友，实现了对日耳曼英雄阿尔米纽斯的孤立目标。然而，这位抱有联合全族人民击垮罗马梦想的日耳曼风云人物，在两年后

的一次小战役中身亡。恰好在此时，居住在多瑙河下游的色雷斯人也发生了内讧，提比略乘机一举成功地将这个地区纳入了罗马帝国版图。这确实也证明了提比略在元老院上的演讲并不是谎言：“罗马帝国的安全，并不是靠军事而是靠政治来保障的。”塔西佗非常讨厌提比略，但他的著作《编年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述：

“维护罗马帝国的安全，正是提比略心中最为挂牵的。”

日耳曼尼库斯之死

日耳曼尼库斯于公元19年春离开埃及，返回叙利亚。前路危险重重，在那里等待日耳曼尼库斯的，是对他反感心理与日俱增的总督皮索。甚至有这样的传闻，在叙利亚行省首都安条克的总督府内，经常可以看到两人争执的情形。随后，皮索去了帝国辖区西岸的小亚细亚，而日耳曼尼库斯则动身返回帕尔米拉。就在此时，又到了在幼发拉底河上的与帕提亚王国重新缔结新友好条约的时候了，日耳曼尼库斯需要经帕尔米拉往东去参加缔约仪式。日耳曼尼库斯只好结束了这个夏天的沙漠旅程回到了安条克。然而，没过多久，日耳曼尼库斯却因高烧病倒在床。

这突如其来的高烧，却在第二天早上神奇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到了夜里又再度袭来，谁也没有料到，隔天清晨又退了下去。在日耳曼尼库斯没有发高烧的时候，他还如平常人一样起居生活，然而每晚高烧必然来袭。连续几天下来，即使白天稍微退烧，也没能恢复到正常体温。在高烧的来回折腾下，这位年轻将军的生命日益衰竭。

日耳曼尼库斯卧床不起，病榻边围坐的众人都认为这突如其来的病是总督皮索下毒引发的。在这样的声浪中，日耳曼尼库斯也对此深信不疑。然而，日耳曼尼库斯发烧还不到10天，就在对围在病床边的妻子与

战友托付报仇的遗言后撒手人寰。公元19年10月10日，日耳曼尼库斯病逝，年仅33岁。

日耳曼尼库斯是一位非常优秀、对敌人极为宽恕的将军。他的离去不仅使得叙利亚，也让整个东方地区都为这位青年将领的死感到惋惜。东方地区的居民，除了罗马人，就连希腊人、犹太人和闪米特人也前来安条克中央广场参加他的火葬仪式。虽然此时已经进入了不宜航海的季节，然而，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阿格里皮娜还是捧着丈夫的骨灰，带着7岁的卡利古拉和刚满1岁的女儿，踏上了返回罗马的道路。由于天气十分恶劣，船只经常停靠岸边，走走停停历时两个月才返回罗马。

如果是下毒致日耳曼尼库斯死亡，然而毒性的发作太漫长。历史学家塔西佗更倾向于日耳曼尼库斯是死于皮索毒害，而皮索又是受了提比略的密令这一说法，他这样描写道：

> 不论是从躯体之美、英年早逝的年龄，还是从离世的缘由以及亡于东方这一远离故土之处等这些情节来分析，日耳曼尼库斯与亚历山大大帝的命运确实如出一辙。两人都拥有极为强健的身躯，都出身显贵，却都在刚刚踏入而立之年的30岁出头就客死他乡，成了家族暗斗的牺牲品。
>
> 不过，与亚历山大大帝有所不同，日耳曼尼库斯待人宽厚，不只会贪图享乐。虽然只有一段婚姻，他也享受到了子女绕膝之乐。
>
> 对作为将军的日耳曼尼库斯而言，如果日耳曼战役没有遭到故意为难，他肯定能留下足以与亚历山大大帝媲美的战绩。如果他生而为王，拥有行动的自由和制定决策的权力，那他所造就的业绩绝对能轻松地超越亚历山大大帝在战功上的成就。因为，无论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为人处世方面，还是其他众多的才华方面，日耳曼尼库斯都略胜一筹。

历史学家塔西佗虽然是以罗马帝国最有权威的身份写下了这段话，

但这一段话的某些见解却让现代的研究者不禁觉得好笑。甚至有研究者这样认为："日耳曼尼库斯之死，根本谈不上是罗马帝国的损失。"更何况，现在已形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和日耳曼尼库斯都亡于疟疾的定论，只不过亚历山大大帝被毒害的说法更有说服力。当然，不论谁英年早逝都不免会让人有惋惜之情，更何况是这样一位生前受人爱戴尊敬的人物。就连知道他所存在缺点的人，在他意想不到的死亡之后，也会将这些小毛病都抛诸脑后。驻守在莱茵河防线的士兵们为这位曾经的将领之死感到痛心。这大概就是"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的起源吧。

罗马人在得知阿格里皮娜一行人将会经海路抵达科孚岛后，都自发地聚集到了这个距科孚岛尚有两日行程的登陆港——布林迪西港上。提比略从罗马派遣来的3个近卫军团大队，也抵达了此地。在群众带着叹息之声的迎接中，手捧骨灰坛的阿格里皮娜与遗属登上布林迪西港。

古罗马时代，鲜花是用来祝福活着的人或是插在坟前用的，所以对于这样刚刚过世的人而言，则是依据各自的财力燃烧相应的物品给这位故人以示悼念。然而到了基督教时代，演变为点燃蜡烛悼念，这种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日耳曼尼库斯的骨灰经过由3000名近卫军防护的阿皮亚大道时，前来悼念日耳曼尼库斯的罗马人络绎不绝，富裕一点的人则焚烧昂贵的香料，贫穷的人则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焚烧来祭奠他。在罗马帝国的本土意大利，人们也都自发地穿起了丧服。而年轻的寡妇阿格里皮娜和遗属的样子，更是让人热泪盈眶。

这些人群中还有从多瑙河前线赶回来的杜路苏斯，此外，日耳曼尼库斯的胞弟克劳狄乌斯、没有随同日耳曼尼库斯前往东方的两个儿子，还有以当年还在职的两位执政官为首的众多元老院议员也都来到离首都100公里左右的特拉提纳迎接日耳曼尼库斯的骨灰。从特拉提纳开始的阿皮亚大道几乎是一条线直通罗马。亡故的日耳曼尼库斯就在家人和政府高官的护送之下，沿着这条路被送往了罗马。

随着距罗马渐近，道路两边迎接的人愈来愈多。群众的惋惜声掩盖了周边所有的声音，在一片悼念中焚烧物品的烟雾似乎形成一片巨大的乌云遮住了蓝天。这种现象简直就是群众集体失控。

在阿皮亚大道的尽头，民众一直望眼欲穿的人物却并未现身。日耳曼尼库斯的养父提比略，以及提比略的母亲莉薇娅，连日耳曼尼库斯的生母安东尼娅都未出现。送葬队伍进入罗马广场的时候，提比略都还是没有现身。而在第二天的国丧典礼上，致悼词也都是由他的义弟杜路苏斯完成的，提比略、莉薇娅、安东尼娅都未现身。被视为竞争对手的日耳曼尼库斯和杜路苏斯实际上是感情很好的两兄弟，比日耳曼尼库斯小两岁的杜路苏斯的悼词，句句深入人心。然而，在进入灵庙下葬时，提比略也仍旧没有现身。

对于缺席葬礼，提比略给出了如下的解释：日耳曼尼库斯的亲生母亲安东尼娅因伤心过度而卧病在床，也致使他与莉薇娅不得不出于对安东尼娅的考虑而未能出席。

对于非常讨厌出风头的提比略而言，这或许听上去有几分道理。而身为崇尚“冷静专家”的提比略，对“热情洋溢的领导人”想来没有好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在这并不是只需根据个人的好恶作出反应的场合，而是关乎礼仪正确与否的葬礼。更何况日耳曼尼库斯是整个东方地区的最高司令官，是个需要为自己撑场面的了不起的公众人物。提比略对日耳曼尼库斯葬礼的态度，失礼得连为自己辩护的余地都没有。

实际上，人们习惯于拿从前的事与现在进行比较。当人们想到在日耳曼尼库斯的亲生父亲尼禄·克劳狄乌斯·杜路苏斯在日耳曼地区因意外堕马去世的公元前9年，奥古斯都特意到罗马以北500多公里外的意大利帕维亚迎接，之后又全程陪同护送遗体回到罗马这段往事，就会为现在这样一位与先帝完全不同、拥有冷血性格的帝王感到痛心。

然而，此时的罗马人还没有像百年后的塔西佗那样，想到日耳曼尼

库斯正是被提比略派人毒害的。虽然也曾怀疑他是被毒害，但他们坚信这只是总督皮索的个人行为。不过，对于没有出门迎灵、没有参加葬礼的提比略，在这一点上，他也失去了罗马人对他的信服。罗马人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哀悼日耳曼尼库斯，为他服丧。一起停工，这就是今天时髦的说法。

罗马停止了它的运转：审判无限延期，贸易场关门，商铺停止营业，工场鸦雀无声，学校也休课，唯一见到人群的地方就是神殿附近。提比略在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后，向首都的所有罗马人发出了如下公告：

> 有无数为国捐躯的伟人，但是像这样受到国民深切哀悼的，也只有日耳曼尼库斯一人。你们对日耳曼尼库斯之死的悲叹，对于身为父亲的我以及他的所有亲人，我们感到无比的光荣。但是现在的我们更应该节哀顺变。
>
> 作为称霸世界的国家的领袖与公民，我们不应该存在那种只有身处小国的人民才拥有个人的悲叹。苦楚的忍受，悲戚的泪水，虽说这些作为对逝者的悼念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现在已到了需要我们振作精神、重整旗鼓的时候。应做到与神君恺撒和奥古斯都一样，在面对独生女死亡的时候极力掩饰个人伤悲，面临孙儿相继早逝时仍旧坚持继续履行好他的责任。
>
> 在此，我不去举最近的例子，然而，罗马人曾多少次忍受自己军队的失败？经历过多少将军离世的悲伤？忍受过多少历史上显赫家族的衰败？
>
> 每位领袖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然而只有国家才是永恒的。所以，你们应回到各自的岗位。你们所期待的大地母神的庆典也即将来临。而所谓的日常经营也是由工作和每日的期盼所组成的。

至此，全民疯狂的心理终于得以平复了。罗马人开始逐渐回归到各

自的岗位，学校重新开课，母亲们也同以往一般专心家务。可是，在把总督皮索提到法庭上进行制裁这一问题上，罗马人并没有让步。这时候，我们只需要看舆论的动向，不等判决就知道皮索一定有罪了。

审判皮索

总督皮索在日耳曼尼库斯病倒时，并不在安条克。在日耳曼尼库斯病倒之后，他也没有赶回安条克。时隔不久，他便收到了日耳曼尼库斯与世长辞的消息。有传闻讲道，皮索的妻子普兰希娜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喜不自胜，如果真是如此，她还真是个愚蠢到极点的女人。面对这种情势，皮索与同行的儿子、朋友和幕僚慌忙商量对策。讨论的焦点在于，他是否要返回任职地叙利亚的首都安条克，以填补因日耳曼尼库斯之死而造成的东方防御体系总司令一职的空缺？或是立即赶回罗马，向皇帝以及元老院为自己与日耳曼尼库斯发生的争执进行说明？然而，意见出现了分歧，皮索的幕僚主张回安条克去补缺；而他的儿子与朋友却劝告他赶快回罗马澄清事实。作为元老院的重量级人物，皮索也十分纠结于应该如何二者择一的时候，不知出于何种想法，他突然开始对驻扎在叙利亚的前日耳曼尼库斯部属的4个军团士兵实施怀柔政策。然而，这个政策执行效果并不理想，皮索最终决定返回罗马。

由于耽误了太多时间，皮索的首都之行远远落在阿格里皮娜之后。更何况他选取的是一条绕远的路线，他选择从中部的安科纳登陆，而不是从南部的布林迪西港口返回罗马本土，之后顺弗拉米尼亚大道而下，在返回途中甚至还放弃陆路，而下到台伯河采取了水路的方式。他到达罗马时，已是提比略发布了公告、全民为失去日耳曼尼库斯而心理创伤得以平复之时。就这样，他连在元老院议员们面前辩解的机会都没有的情况下，立即就被拉上了审判席。

围观的人高声呼喊判处皮索死刑，元老院会场中的审判正是在这种

声浪中开始的。提比略若是一个在乎舆论的皇帝，那么审判的结果按照罗马公民所期望的走向比较有利。如此这般，提比略没有迎灵、没有出席葬礼的旧账就可以不再提起，而且，后世的罗马人也一定不会给他安上教唆毒害日耳曼尼库斯的罪名。提比略却在审判伊始这样说道：

皮索总督乃家父（奥古斯都）之友，也曾担任军团长。承蒙各位认可，我才派他远赴叙利亚，辅助日耳曼尼库斯治理东方。因此，冷静乃审判之必须。其与日耳曼尼库斯之间的矛盾，是否因皮索自恃功高、争强好胜所致？又或因日耳曼尼库斯轻佻所致恶果，抑或这就是他人犯罪所成？仰仗各位冷静慎重决断。

皮索乃接受包括军团指挥权等行省公务任命后被派遣的公职人员，若其明目张胆越权乱纪，此乃罪责难逃。又，如若抗日耳曼尼库斯之命，此亦是罪责难逃。若其对于日耳曼尼库斯之死，以及他的死带给我的悲伤表现出欣喜之意，我一定会憎恨他，禁入我家之门。然而，我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挟“第一公民”之威报私人之怨。

反之，若其罪证确凿，定当严惩，不论是谁处之，必将以严酷之刑告慰日耳曼尼库斯之子及家族。

至此，是否真有煽风点火之徒存在？是否真有道听途说之徒造谣？议员诸君，望各位切切明辨是非。若真有其事，我必将其人碎尸万段。若日耳曼尼库斯死于毒害，其遗体仍置于广场，外族人亦可见，必将凶手擒拿以祭其在天之灵。

至于对手下那些图谋不轨的军团，皮索是否对其进行了煽动，抑或只是道听途说的控诉人极度夸张的伪证，对此各位有必要进行明辨。如果是后者，即使控诉人是我们的朋友，也必定要作好受到我责难的心理准备。如果真像众人所言，日耳曼尼库斯是死于毒害，他的遗体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丝不挂地暴露在中央广场。而他的死因至今不明，这也是此时此刻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也为儿子之死而痛哭流泪，恐今后伤痛难息。然而，被告亦

有家室，愿诸君留辩解之机，使其言明日耳曼尼库斯之不妥之处，查明真伪。希望各位弃传闻于不顾，慎重决断。只此或能告慰我之伤心。

我以皇威誓言，无论是谁，皆有辩护之权，皆有检举之权。仍望诸君竭尽全力，以护被告之权。

法之所及，不分贵贱，然而对日耳曼尼库斯之死，我放弃一般之裁判，而送至议员诸君之殿前。望诸君，度天时，晓地利，循罗马之旧规，沿罗马之程序，依序而行。

议员诸君，我最大之心愿，乃弃杜路苏斯之泪与吾之伤痛以及周遭的一切声音于不顾，冷静决裁，以告慰养子在天之灵。

这场审判必定会比一般的审判时间长，不仅要算上陈述诉讼理由的2天，辩护方的3天辩护时间，而在这中间还得再经过6天商议之后才宣布判决结果。告发者有在日耳曼战役中担任日耳曼尼库斯手下军团长的凯奇纳、维拉尼斯、维特里乌斯3人，也有在日耳曼尼库斯被派往东方时自愿跟随的将军。他们对皮索的罪状作出了如下的陈述：

首先，皮索对驻扎在叙利亚的4个军团士兵们放任自流。

其次，皮索对各同盟国的国王专横跋扈。

上述两项皮索的罪状，引发整个东方地区公民们对谋害最高负责人日耳曼尼库斯之人皮索的怨恨。此外，军团内部根本就没有秩序可言，而军团内亲近总督皮索的不良分子，甚至把皮索尊称为“军团之父”，但这种做法，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军团内有良知士兵们的鄙视，这样的皮索注定会遭到弹劾。

而第三点谈到的是皮索使用魔法与毒药，把日耳曼尼库斯谋害而死。告发者强调，皮索之妻普兰希娜苦心钻研东方魔法，甚至把施展魔

法作为个人爱好。作为最后的陈述，告发者还提及皮索甚至企图教唆军团士兵把矛头对准祖国。

然而，对皮索实施辩护的一方论调十分弱势。对皮索在军团内实行怀柔政策、放任军团纪律这些指控，辩护方无法拿出证据进行否认。皮索与各同盟国国王之间的不合、国王们对他产生不满情绪，都是不争的事实。提比略一直强调的是皮索是否服从命令这点，即使他们能够反证皮索并没有完全抗拒日耳曼尼库斯的命令，但也不能说忠实地履行了职责。于是，皮索的辩护方只能把辩护的重点放在是否毒害问题上。

他们辩护道，毒害的证据根本不存在，告发者一方认为，皮索在安条克总督官邸内举办的宴席上，亲自在日耳曼尼库斯的杯中下毒，这些都是没有真凭实据的。两人不合是公开的事实，如若两人确实同时出现在了宴席上，那自然会招来包括奴隶在内的所有人的眼光。

元老院内的情势急转直下，让场外关注着审判过程的群众也不由得定住了一般。即使元老院判皮索无罪，也休想从周围群众的手中逃脱，皮索注定不可能安然离开议事厅。他只能在一队近卫军团的护卫下，躲在四周用布幕围住的轿子里逃回家中。虽然如此，在他的孩子们的激励下，皮索还是坚持每天前往元老院，直到最后一天的辩护结束。

然而，元老院议员们的眼中满是轻蔑与敌意。提比略接连几天连续出席审判，但是一直保持着平静的表情，没有显露出怨恨，也没有表示出同情，他从头到尾都是一副旁人无法猜透的高深莫测的神情。与丈夫一样同处于众矢之的的普兰希娜也开始与他保持距离，转而向以往就很亲密的皇太后莉薇娅寻求庇护。

辩护方告知皮索，就算毒害的罪证不足不被判处死刑，他也逃不掉不服从命令的罪责。唯有自杀谢罪，才是拯救儿子们的唯一出路。在这种情况之下，皮索只能选择自尽。

在判决之日的早晨，人们发现了已经自刎而亡的皮索的尸体。不过，元老院根本就不在乎被告的生死，还是作出了如下判决：

一、从所有官方的记录中清除皮索之名。

二、皮索之财产半数充公，剩下的部分留给身处罗马与此事件毫无关系的长子葛尼斯，但葛尼斯必须放弃皮索一姓。

三、与父亲皮索同往叙利亚的次子马库斯，其元老院议员资格被剥夺，只获得其父遗产500万塞斯特斯，并在10年之内不得踏入首都罗马。

四、皮索之妻普兰希娜受皇太后莉薇娅庇护，不予问责。

皇帝提比略拥有接到控诉后给予最后裁决的权力。由于被告皮索已死，无法进行指控，但是提比略还是行使了这项权力，也就是使用了“最高裁判权”。

首先，提比略拒绝在官方记录中清除皮索的名字。因为即使是向罗马宣战的马克·安东尼，他的名字也仍然保留在了官方的记录之中。此外，他也否决对皮索次子马库斯撤销元老院议员资格、处罚放逐10年的审判结果，并允许他与兄长葛尼斯一样继承父亲所留财产一半的权利。对于这样的撤回决定，提比略给出了“身为儿女者不能违背父亲的命令”这样的理由。至于对皮索之妻普兰希娜的处置，则维持元老院的决议。

对于提比略“最高裁判权”中的决定，元老院没有异议。然而，有两名议员站出来提议，为亡故的日耳曼尼库斯铸造黄金像，供奉在复仇之神马尔斯的神殿内。对于这项提议，提比略却拿出了“此类神化的做法，只适宜在战胜其他国家时使用，自家人的悲剧应将与悲伤一同埋葬”的理由予以了拒绝。

就这样，引发罗马人万众瞩目的皮索审判，也到此画上了句号。民间舆论对这样的裁决也感到满意。判决的内容却让后世的罗马人对提比略是否参与毒害引发了质疑，与此同时，日耳曼尼库斯遗孀阿格里皮娜对提比略也产生了憎恶之情。阿格里皮娜身上流着奥古斯都家族的血液，她也一直以此为傲。她一直痛恨与奥古斯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巧取豪夺了皇位的提比略，如今日耳曼尼库斯之死使得这种痛恨比往日更甚。在她心目中，提比略是为了清除日耳曼尼库斯，避免出现皇位的争夺者，才指使皮索对日耳曼尼库斯进行了毒害。

当然，提比略没有顾及日耳曼尼库斯之妻的胸中恨意，更何况他的个性又是满不在乎的类型。不过，是否仍任由“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继续扩大，这是一个攸关帝国稳定的重大政治课题。这次审判堪称审判之典范，可以说是罗马人对法律创始人精神原貌的再现，也因此产生了事后要对这个“神话”加以干预的必要。

皮索审判之后不几日，元老院提议，让在审判中慷慨陈词的告发者凯奇纳、维拉尼斯和维特里乌斯出任祭司，提比略予以同意。原本属于骑士阶级的这3名日耳曼尼库斯的部属，被任命为原本只有元老院阶级出任的祭司一职，这意味着他们社会地位的上升。这也是元老院怀柔日耳曼尼库斯旧部的一项措施。此后，这3人得到了提比略的重任，特别是维特里乌斯，当罗马又面临必须在东方地区进行重整的时候，提比略赋予他与日耳曼尼库斯公元17年出使东方时一样的权力。如果这只是出于对日耳曼尼库斯派的人员进行怀柔，那将他们提拔成祭司也就可以了。然而，提比略后来对他们的重用，证明他知人善任的一面，也再一次证明提比略绝非率性而为的人。

阿格里皮娜

奥古斯都驾鹤西去之后，他的养子提比略自然就成了尤里乌斯一门

的恺撒家族的族长。在把日耳曼尼库斯纳为养子一事上，提比略也同样遵从了奥古斯都的遗愿。依照罗马法规定，家长权力大到可以掌握家族人员的生死，但与此同时也肩负了保护家族的重任。而当他养子日耳曼尼库斯离世后，作为罗马法律上的祖父，提比略也把保护日耳曼尼库斯子孙的重担接了过来。

陪伴着已故日耳曼尼库斯的长子尼禄，提比略来到了元老院，在经过一番说明之后，提比略希望元老院议员给予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特殊关照。虽然尼禄·恺撒已完成了他的成年礼，然而年纪仅为14岁，离担任公职时间还很长。在罗马，必须到25岁才有资格担任账务监察官员一类的重要公职。此外，具有一些基层公职的经验，也是成为账务监察官候选人的条件。对此，提比略向元老院提出了特殊关照：其一，免除尼禄基层公职的经验；其二，承认尼禄在达到资格年龄的5年前，即20岁时可竞选账务监察官。

想必在场的元老院议员们，很快就领会了提比略提出这些请求的盘算。提比略向来喜欢大家称呼他为“第一公民”而非皇帝，即使这种叫法有些伪善。提比略继位后一直致力于与元老院协调步伐，并且忠实继承了奥古斯都仍旧想把帝国最高统治权留在尤里乌斯家族的遗愿。所以，元老院议员们都感受到了提比略的用意，于是同意了这项请求。表面上是共和体制的罗马，但葫芦里卖的还是君主专制的药，这是既成事实。

哪怕是尤里乌斯家族中的一员，但只要跟公职沾上了边就必须得到元老院的同意，这就是奥古斯都所创立的罗马式元首制的基本模式。针对里面的内涵，即使是奥古斯都也未对罗马历来的家长制进行修改。正因为如此，提比略行使了这一家长权，决定了尼禄的婚事。女方是杜路苏斯的女儿尤利娅。因为提比略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之妻也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妹妹，所以尼禄·恺撒等于是跟姑妈之女订婚。对于这种安排，罗马民众相当满意，因为在他们看来，值得尊崇的日耳曼尼库斯的遗孤，也因为这项婚约得到了继承皇位的资格。即使如此，也无法抹灭阿

格里皮娜对提比略的仇恨。因为，公元21年，执政官换届，虽然提比略无意连任，但仍然与杜路苏斯一起被推举为候选人，并双双获胜当上了新一届的执政官。显而易见，提比略的精心算计，都是为了提高杜路苏斯的权威而采用的手法，父子两人都如愿以偿当上执政官。公元19年，是提比略前次担任执政官的时间，而另一名执政官正是日耳曼尼库斯。在阿格里皮娜看来，亲生儿子尼禄继承皇位的可能性正不断下降。



阿格里皮娜

然而，此时的提比略已经62岁了，即使现在他发生什么意外也并不会影响罗马政局。此时尼禄15岁，而杜路苏斯33岁。如若希望皇位顺利交接以确保政局稳定的话，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按照提比略——杜路苏斯

——尼禄这种顺序。可是阿格里皮娜对看重血缘关系这点持有不同的看法。两年前杜路苏斯得到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然而其中一个早夭，可另外一个已2岁。对于提比略来说，这是他的长孙。阿格里皮娜非常担心原本应该由自己儿子继承的皇位，就此被提比略家族抢走。在阿格里皮娜看来，血缘名分是最为重要的，然而如今的继承人与奥古斯都生前的希望背道而驰。这个2岁的孩子相当于阿格里皮娜小姑子的儿子，可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杜路苏斯，却从未出现在奥古斯都在世时皇位继承人名单中。

阿格里皮娜想到这件事，满脑子就被偏执的念头所占据。此前的仇恨加上如今的担忧，阿格里皮娜对提比略的敌意无以复加，发展到最后演变成了可称为“阿格里皮娜派”的党派。然而，在公元21年，这个党派还未与“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相结合。因为，当时这只不过是一群围在阿格里皮娜身边对提比略满腹牢骚的女人罢了。

要集结这么多对提比略发牢骚的女人，事实上并不困难。因为在当时的罗马上流社会，提比略向来不讨女人喜欢。在提比略36岁那年与其妻尤利娅离婚后，在这将近30年里，提比略对女人更是不闻不问。如果提比略真的有情人，喜好八卦的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就绝对不会不去刨根问底，所以可以断言提比略并没有拈花惹草这种习性。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不适合当丈夫的人也没有什么大碍，可他的行为确实也让女人们捉摸不透。从提比略的生活方式来看，他不参加聚会、不喜欢游乐，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禁欲主义者”，大概这些都是提比略不讨女人喜欢的缘由。

当然，提比略也并非同性恋，并非不会对女性产生情愫之人。也许提比略心目中的唯一爱人，就是其子杜路苏斯的母亲维普萨尼娅，但奥古斯都为让他与自己的女儿尤利娅结成连理，却命令他与维普萨尼娅离婚。直到公元20年维普萨尼娅离世，提比略与维普萨尼娅只是偶然才会遇到，她更是小心翼翼避开提比略。不难想象，萦绕在提比略脑海中

的，应该是30年前两人年轻时候的样子。

公元21年，提比略登基后初次离开首都罗马。并非外地有等着他前去处理的事务，而是他想向世间宣告，同任执政官的儿子杜路苏斯将会是皇位第一继承人，并想借此机会让杜路苏斯积累最高领袖的历练。从提比略一直待在经阿皮亚大道就可以到达首都的那不勒斯近郊，可看出他此次离开的意图。

当然，33岁的杜路苏斯也的确非常有能力。在元老院年轻一辈与年长者之间的分化愈演愈烈时，身为年轻一辈带头人物的他成功地化解了双方的对立。此外，他还在公共事业中肃清承包商不法行为。除了军团士兵负责的一般道路之外，在大多数都承包给私营“企业”的罗马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系统中，招标的国家公职人员和中标的民间企业容易相互勾结。杜路苏斯身为执政官，对此疾恶如仇，对双方都提出了控告，取缔了这样的不法行为，重新将竞争规则导入企业之间的运营。这样一来，因不法行为而膨胀的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开销也得到了大幅缩减。

然而，事关帝国的运营，单靠在罗马帝国高级职位的执政官并不能尽善处理。特别是在维持帝国和平问题上，罗马帝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官提比略必须亲自处理。负责处理北非和高卢暴乱的不是执政官，而是提比略本人。

面对日益复杂的局势，此时的提比略必须作出选择，是应该回到首都亲自进行指挥，还是继续留在那不勒斯附近，在远处对此事进行指挥。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后者。

提比略选择继续留在那不勒斯，不得不立即展开对情报的收集，并建立一个上下通畅的指挥系统。提比略在这方面的才华可以说十分完美。他将从全国收集来的情报作为参考，作出恰当的指示或建议写在书信中。手持书信的信差，一直快马加鞭地往返于阿皮亚大道。

沙漠游牧民族

北非骚乱，指的是曾效力于罗马军团的辅助部队，并拥有相当丰富的军队历练的塔克法里纳斯，率领沙漠游牧民族侵略罗马行省的骚乱。在这些沙漠游牧民族看来，罗马扩大耕地的计划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原来喜欢四处游牧的民族，总是会对农耕民族产生仇恨。而游牧民族最主要的生存模式，就是掠夺农耕民族。

罗马帝国为了提防游牧民族的侵袭在此派驻了一个军团。这一地区，即包括现今的突尼斯与利比亚的阿非利加行省属于元老院管辖，也即元老院行省，行省的总督也是由元老院议员互相举荐而担任。当然，这也是奥古斯都深谋远虑的一个实例，由元老院议员选派的新总督前往行省进行治理时，其实他并没有获得军团的指挥权。就算政治由他负责，但在军事上则无权过问。即使当地有常年驻守的军团，其指挥权也在皇帝任命的军团长手里。换言之，奥古斯都实际上也凭借将元老院管辖的元老院行省文武官员，实行权力分管、相互制约的方法，以达到强化皇权这一目的。

当然，奥古斯都打造的上述体制，唯有在没有内忧外患的前提下才能发挥效用。先前，可能成为内忧的迦太基居民，通过重建首都海港城市迦太基，以及修建水道、街道等其他基础建设，已经完成了城市的罗马化，因此对罗马造成不了威胁。而谈到外患，只要东边的埃及与西边的毛里塔尼亚处在罗马的控制之下，就不会产生多大的问题。现在罗马帝国只剩下南边的敌人令人十分担忧。所谓南边的敌人，指的就是沙漠游牧民族。不过，只要他们没有能干的领袖，在罗马人眼中他们只能算是一群强盗。只要完成与其说是军队不如说是警察的任务，只需要1个军团加上后援部队不足1万人的兵力，就足够抵御这些人的袭击了。

熟知罗马军队作战方式的塔克法里纳斯掌控这些沙漠游牧民族之后，原本各自为政的强盗群体，现今也实行了军事化管理，恐怕以警察

这种程度的防御就难以加以控制了。提比略掌握到这一情况之后，早在两年前就从驻扎在多瑙河的军队中抽调了1个军团驻守在北非。这样也许就能把塔克法里纳斯赶进沙漠，然而，在支援的军团离开非洲后，沙漠游牧民族又卷土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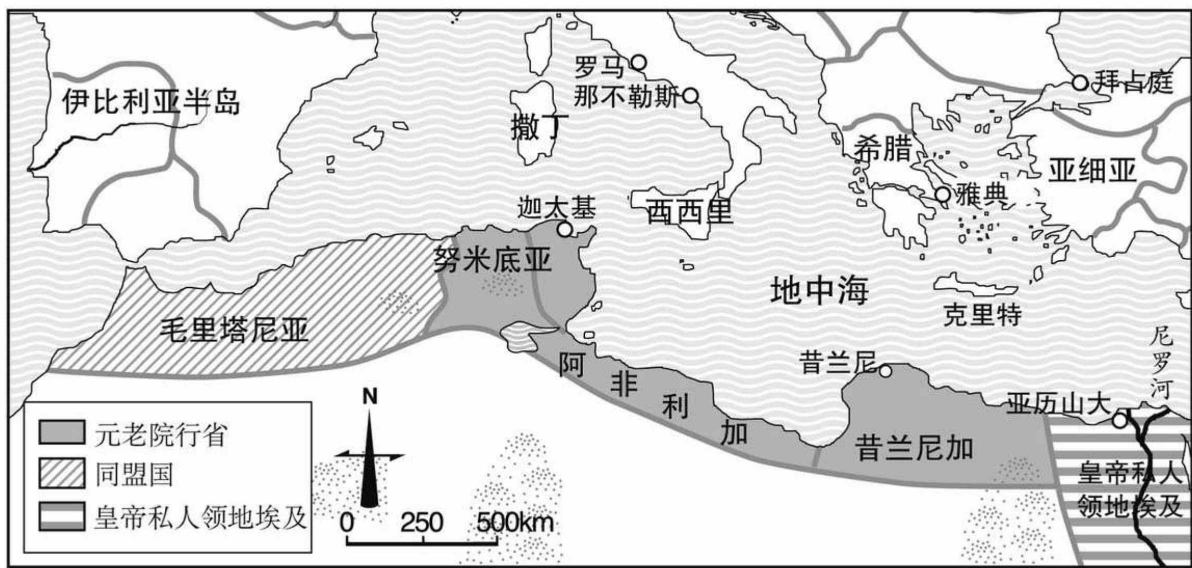
直到公元21年，提比略才下定了要彻底解决沙漠游牧民族问题的决心。然而，提比略希望不增加军费，也不准备扩充负责整个帝国防御的25个军团，也没打算抽调其中的一个军团派驻北非。因此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北非行省问题，提比略仅在此地、此时（直至此问题得到完美解决）妥协地修改原本文武分管的制度。他将有军团指挥权的总督派遣前往当地，把原为军团长的任务——制定抵抗侵略者政策，移交给了总督。

如此这般，北非行省内的指挥系统得到了统一，以政治和军事互相结合的形式来全面抵御沙漠游牧民族。当然，这种体制与莱茵河前线、多瑙河前线、面对帕提亚王国的叙利亚等皇帝行省的体制相同，这些防线经常与敌人对峙。不过有差异的是，北非行省属于元老院行省，而非提比略握有决定权的皇帝行省。于是，提比略向元老院请求，希望从中选出一位能当此大任的总督人选，以行使当地罗马军队的指挥权。

元老院围绕提比略的要求反复商讨，虽然过程十分热烈，却始终没能锁定一位合适的人选。其实元老院议员们心中的算盘跟以前一样，都希望住在海港城市迦太基这样一个舒适的总督官邸里，至于那沙漠里的帐篷，则能不去就不去。最后结果，竟是提比略获得了完全委托给皇帝处理这样的答复。

但是，提比略当然不会独自处理这个问题，随后又列举了两位元老院议员，也正是提比略心目中的军事才华横溢的议员，要求元老院从中作出选择。被提名的两人——雷必达和普拉耶苏斯，当然，他们也拥有在元老院会场中发表意见的权力。雷必达，这位出身于从共和制时代起就声名显赫家族的议员，他以身体抱恙、女儿还待字闺中为由拒绝了这

项差事。当然，他不忘赞美普拉耶苏斯，认为他更能胜任此职。至于新任的元老院议员普拉耶苏斯，似乎觉得临阵脱逃会让人觉得他胆小畏缩，既然被提名，也就点头应诺了。不出所料，心中落下块大石头的议员们，立刻愉快地把票都投给了普拉耶苏斯。这样一来，解决北非沙漠游牧民族引发的难题，也算是迈出了第一步。只要方针政策正确，依罗马的军事实力，要解决这些游牧民族，剩下的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果不其然，两年后，遁地无门的塔克法里纳斯战败而亡，沙漠游牧民族引发的骚乱也就冰消瓦解了。



北非

德鲁伊特教

与此同时，高卢行省也发生了叛乱。高卢行省发生的叛乱并不是因为外敌的入侵所致，招致民众不满的高额贷款利率是罪魁祸首。在罗马帝国本土利率上线被设定在12%，行省却没有对此设限。姑且不论70年前恺撒时代贪图48%高利率的布鲁图，在经济学理论上，投资被视为“高风险”的皇帝行省金融市场，得到“高收益”也是值得期待的。在罗马化程度稳步推行、属于元老院行省比较安全的法国南部地区，却并没

有发生叛乱。显而易见，南法行省与罗马帝国本土相同，在金融方面都是“低风险低收益”地区。

70年前高卢行省也出现过叛乱，但被恺撒镇压了。公元21年，叛乱再度爆发，虽说此次叛乱是由被罗马人称为“长发高卢”的民族引起的，但实际上他们到处借贷的痛苦，刨根究底是由罗马征收的行省税所致，所以把矛头指向罗马中央政府也是情有可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所有叛乱主谋都有一名尤里乌斯，他们都拥有罗马公民权。

当时称霸高卢的尤里乌斯·恺撒，以长远的眼光确立了高卢将来的统治模式，其中一条重要的政策，就是给予被征服的部族首领以尤里乌斯·恺撒的家族姓名与罗马公民权。按照罗马式的思维来理解，赠与自己的家族姓名，就意味着把他们收为自己的“被保护人”。时髦的说法，也即“开分店”、“召集喽啰”。受此恩惠，“长发高卢”的领导阶层，都冠以尤里乌斯的姓氏，摇身一变成为具有罗马公民权的普通公民。无论罗马公民权还是“被保护人”的关系，都是可以世袭的权利和义务。公元21年，发动叛乱的3个主谋都是名叫“尤里乌斯”的高卢人，这也并不意味着恺撒的高卢政策有问题，因为只有东部的“尤里乌斯”发动叛乱，西部和南部的高卢人并未起来反抗。

可是，反抗罗马帝国的叛乱为何由东高卢而起？如若贷款的利率过高、矛盾重重，那么暂不考虑罗马化进程较快的南法地区，为何与东高卢罗马化程度相近的西高卢却并未发生叛乱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凭借当时记载的片段来推测。然而，我认为，在由学生引发叛乱的背后，其实高卢宗教界的祭司阶层也参与其中。

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对高卢进行重新划分时，把“长发高卢”中最大的部族埃杜伊族的首都比布拉克特（今欧坦），发展成为一个学问之都。当然，如若把它称为大学城的话，则稍有不妥。感觉上这里的性质

更接近于中学以及大专。为何这样说呢？原因在于此地的教育机构，目的在于为高卢的优秀学子提供较高等的教育，而想要继续深造的，罗马、雅典、罗得岛或埃及的亚历山大都有大批著名学者，可以远赴这些地方求学。

其实，奥古斯都不是特别喜欢钻研学问，也并非对于教育抱有热忱，他只是想从一手掌握高卢的宗教、司法、教育的民族宗教祭司德鲁伊特手中夺回教育的权力。学习希腊、罗马式的思想正是当时高等教育的目标。提及司法，则是由被罗马派遣的行省总督负责，当然，这也意味着这项权力也从德鲁伊特手里争取了过来。与罗马不同，高卢有被称为德鲁伊特的独立祭司阶层，而这些祭司拥有这么强大的号召力，是因为他们完全垄断了宗教、司法与教育权。

但是，对德鲁伊特的干预，奥古斯都没有就此罢休，虽然并没有对德鲁伊特教施行镇压，但严禁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皈依这个宗教。罗马人对于容许实施活人祭奠的宗教，无论是伊特鲁里亚人还是迦太基人的宗教，都非常讨厌，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野蛮的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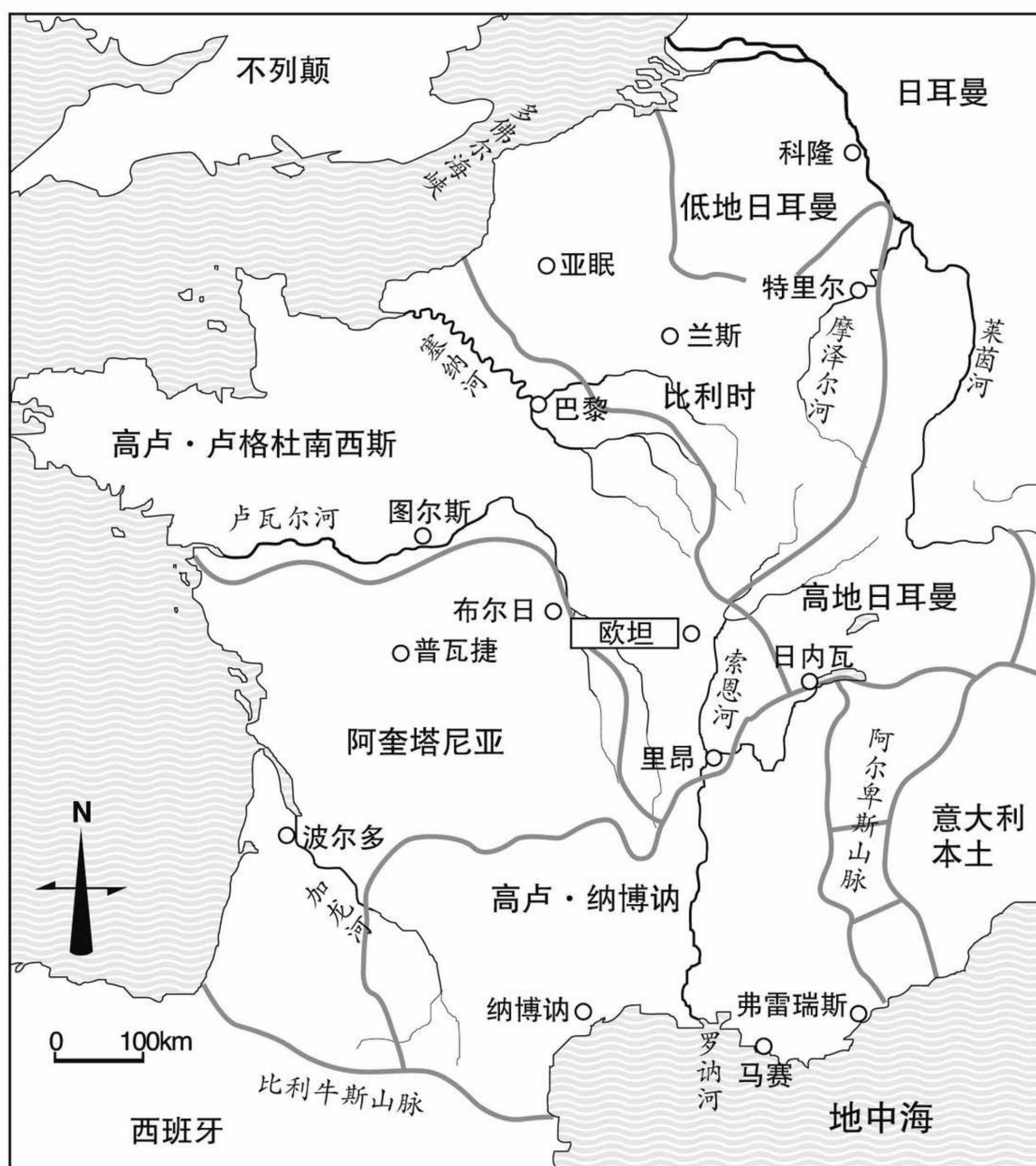
由于高卢几乎所有领导阶层都拥有罗马公民权，而奥古斯都出台这项禁令，使得高卢的德鲁伊特教的祭司们在高卢领导阶层中的影响力顿失。在攸关生死存亡之际，祭司们想到了把宗教和高卢的民族主义相结合。而祭司们把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牵连到这一场冲突中来，非常容易。如此这般，对高利贷的愤怒与高卢民族主义相结合，演化成为高卢东部地区欧坦城发生叛乱的导火索。然而，造反者的盘算也出现了失误。

祭司们第一个失误在于，他们预测罗马帝国的莱茵军团放弃了征服日耳曼，日耳曼尼库斯也被改派到东方之后，就变成一个不再设有皇族总司令的莱茵河防御军团，肯定会导致乱无军纪、士兵们厌战。这种毫无根据的推测被证明错得十分离谱。由于提比略在此地精心布局，军团长并非依出身定职，都是能力超群的将才。基地牢固之后，无论是设备还是功效，都会相比日耳曼战役时有很大的提升。并且，军团自身的任

务，不只是驻扎在莱茵河沿岸，而担任军务的士兵们不仅要防御日耳曼人的侵略，还要在后方稳定高卢的政局。所以，遇到任何骚乱，还未等提比略的命令下达，他们早就起身镇压去了。

祭司们第二个失误在于，他们误认为，和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军团一同从事军务的辅助部队中，那些高卢出生的士兵如若知道高卢人起事，一定会抛弃罗马的军队投身这边来。实际上，罗马军团中被送至镇压起义前线的高卢士兵根本就不为所动，他们毫不犹豫地挥刀砍向造反的高卢人。

祭司们的第三个失误在于，他们在不寄希望于南法地区的情况下，竟然连高卢西部与高卢北部都没有一起起兵就立即起事。可想而知，公元21年的叛乱就只局限在高卢东部。其中叛乱方作出的最不妥当的安排就是，他们叛乱的地点，居然离罗马帝国莱茵河驻军近在咫尺。



高卢全境

祭司们第四个失误在于，他们过于相信拥有罗马军队最高司令权的提比略年事已高，又身在罗马之外。他们深信，待在气候温暖的南意大利的这个垂老的皇帝，想必早已荒废了他的政务。当然，发生这种失误也在所难免，因为就连首都的罗马人都这样认为，并对他横加指责。

但是，高卢的叛乱分子与罗马人不知就里的是，提比略是一个十分重视承担责任的人，喜欢安排部下各司其职。提比略的确不在首都，他的情报却是源源不断，却没有下达任何指示。镇压这起叛乱的主导权，提比略全权交付给了莱茵河防线的两名军团长。

在镇压东高卢的叛乱上，这两位军团长实际只动用了8个军团中的2个军团加上辅助兵共2.5万人。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击败了超过4万名的叛军。身为主谋者的3个“尤里乌斯”都自尽身亡，许多被他们蛊惑的学生也大多死于非命。

提比略在平定叛乱后给元老院写了一封信，详细报告了战斗的始末，就连反提比略派的塔西佗也评价是一份“毫不隐瞒、毫无夸大”兼具客观性的报告。在书信中，提比略把能迅速成功平定叛乱的原因，归结为军团长们的责任感与杰出的能力。对他明知发生叛乱却不肯回罗马坐镇，甚至连杜路苏斯也待在罗马不曾前往前线一步的指责，提比略这样辩解道：

“若因一两个民众的叛乱就手忙脚乱，实在有辱最高领导者的德行。此外，离开统治世界的罗马城赶赴前线，简直是遭人耻笑的事。”

罗马军队镇压高卢叛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于是，元老院对为全罗马军队最高司令官的提比略举行凯旋仪式一事给予了应许。这种拉丁语称为“欢迎”（ovatio）的仪式，胜利者是骑马接受庆祝的，这比坐在4匹马拉战车出席的“凯旋”（triumphus）仪式规格要低一些。

时年63岁的提比略当即上书元老院，表示感谢。信中他这样写道：

在面对比高卢更加善战的日耳曼民族时，罗马军队从未尝败绩。我年轻时也获得过不计其数的“凯旋”荣誉。即使如今我已年迈，还是欢喜地接受这种能在罗马城中骑马凯旋的欢迎方式。但对此并不是出于我对荣誉的渴望。

提比略的性格就是喜欢在适当的时候挖苦对方几句。

叛乱中成为学生根据地的欧坦城的学校，后来并未被封锁。虽然史书未记载叛乱平息后的贷款利率是否降低，然而，史书上再也没有“长发高卢”人发泄不满情绪的记录，大概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吧。

史书记载欧坦城中高等教育机构虽然继续保留了下来，还有一件史实，就是提比略把“德鲁伊特”全部赶出高卢一事。高卢（希腊语读做凯尔特）的祭司们只好逃亡到了不列颠（今英国）。下面可能是一些玩笑话，以圆桌骑士而闻名的亚瑟王孩提时代的教师——魔法师梅林，据说就是一位德鲁伊特祭司。

宗教观念

从现代版图来看，包括今天的法国、比利时、瑞士、卢森堡、荷兰东部和德国西部都是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高卢地区。在我看来，在叙述了祭司德鲁伊特被从这一大片区域驱逐出高卢后，也有必要来了解皇帝提比略的宗教观念。虽然，这与提比略没有直接关系，但在他统治时期的巴勒斯坦地区，当时被称为基督的耶稣已经开始传教，在提比略的统治接近尾声时，耶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先说结论，那么，我认为提比略若是知道耶稣基督说了“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样一句名言，那么他一定会是第一个对此表示赞同的人。不论是尤里乌斯·恺撒，还是奥古斯都，他们看来政教分离不过是个常理，没必要刨根问底。若是他们俩在生前就知道死后会被当做神明，也不会觉得别扭吧。多神教的神明与一神教的神明，不同之处在于，后者连信众的生活方式都规定得清清楚楚，他们就只是庇护世人这单一的角色。开辟通往元首制道路的恺撒，与随后将这条路高速公路化的奥古斯都，两者想必都很适合保护走在这条路上的罗马人。维

修这条高速公路却是交给提比略的工作，不论谁来继承他的职责，就是保证高速公路不能沦为乡间小道。显而易见，其辛苦程度完全不逊于前者，但任务的性质迥异，当然，提比略对此比谁都更加清楚。

正是这个提比略，对任何神化他的举动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可谓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对于元老院仿照把7月命名为尤里乌斯、8月命名为奥古斯都的先例，把9月改为提比略的提议，他断然拒绝，也拒绝了“国父”称号。至于在神殿中设立他的塑像的提议，他也以觉得没有一定的政治必要为理由，予以否决。当然，提比略只接受了神化皇帝习俗历史悠久的东方行省的做法，其余一概没有同意。他也不准亲生母亲莉薇娅的地位和待遇，超出先太后的规格。直到离世，他始终保持总归一死的凡人心态。何况一生都贯彻这种生活方式的人，竟是大祭司——罗马宗教界的第一人。此外，在罗马的宗教史上，自始至终都不曾有过独立的祭司阶层。我认为没有比这两件事更能体现罗马人对于宗教的态度的例子了。所以在罗马，政教分离一直被认为是不辩自明的道理，也是理所当然的。

众神的责任在于保护个人，对个人集结成的共同体（Les public）的“保护”，则变成了政治任务。因此，只要不成为引发社会不安的因素，承认宗教自由也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这成为罗马领导人一贯的宗教观念。

3个世纪前，在不曾有人幻想过元首制的共和制年代，从希腊传来的一种叫狄俄尼索斯（酒神）信仰的宗教俘获了罗马女性的心灵。这是一种提倡畅饮葡萄酒、酒醉后狂欢却算不上犯罪的宗教。元老院却以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为由，强制进行打压，并将其彻底肃清。罗马帝国在不断征服其他民族的过程中，让相继纳入其霸权之下的各民族的神明也进入了自己的体系。即使罗马人自己并未皈依，但也允许信徒们建造礼拜堂与神殿。越来越多的不同信仰的人搬到首都罗马，自然也带来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就在公元前后的100年内，大概是恺撒与奥古斯都的时

代，这一时期罗马人的宗教观念最为开放。在首都罗马，埃及教、犹太教都有着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当然，这也是宗教很守本分，并没有打算染指皇帝的权责范围内的缘故。

提比略面对这样的宗教观念，也和先前的恺撒与奥古斯都一样，都属于合理主义者。当台伯河河水泛滥，公共建筑物林立的城中心被淹之际，惊慌失措的元老院提议打开西比拉的神书，向神明求救。提比略却认为解决洪水问题是人的责任，并未赞同此举，同时要求元老院成立对策委员会应对洪水灾害。就算是对于罗马人信仰的宗教，合理主义仍然是提比略行事的准则。所以，提比略绝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的情况发生。

有一年台伯河西岸的犹太人举行了一个活动，在提比略看来这已经算染指政治领域了。对此，提比略发布了临时命令，把4000名罗马的年轻犹太人送往撒丁岛，让他们去承担防御强盗的差事，并把其他犹太人赶出了罗马。元老院同意之后临时命令才能上升为法律，提比略却没有向元老院提出要求，或许提比略只是想通过这一时的手段暂时压制这场活动吧。实际上，时隔数年后，犹太人再度回到罗马聚居，建成了犹太社区。罗马的犹太人被驱逐之时，提比略仍旧沿用奥古斯都的政策对待其他地区的犹太人。比如，提比略并没有废除犹太教徒将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耶路撒冷神殿的做法。此外，犹太教徒也不用在罗马军队服兵役，因为犹太教徒一旦去当兵，就必须对作为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宣誓效忠，这必将打破他们唯一忠于犹太神的誓言。而提比略对于那些舍弃了犹太教信仰的犹太人，也允许他们服兵役，并且可以在军中担任公职。实际上，甚至有犹太人在提比略统治期间晋升到埃及长官一职。

实际上，以可能造成社会不稳为由而被赶出意大利的，不仅仅是犹太教徒。在这一时期，埃及的伊希斯教徒也被驱逐出境。而他们被驱逐的原因，是他们以捐款的名义要求信徒掏钱的行径被认为超过了界限。的确，当地曾经发生过很多因捐献的香油钱过多，而对伊希斯教提出控

诉的家庭。同样受到责难的还有占星师，当他们发誓以后绝对不再收取报酬后，才被免予处罚。

从上述的种种可以看出，提比略虽然承认人民拥有宗教信仰自由，然而，他极其讨厌将不信教的人也卷入宗教的做法。也正是这位提比略，却接受了犹太人聚居区，特别是东方犹太人社区提出的要求，允许他们保持犹太式的审判方式，甚至承认了仅限于他们内部的司法权。多元宗教繁生的罗马帝国，如若所有的民族都能遵守“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一信念，那么，最为高兴的当属罗马皇帝们，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例外。

灾害对策

公元22年，提比略请求元老院授予其子杜路苏斯“护民官特权”。在给元老院的书信中，他罗列了如下几条：首先，他给出客观评价，称赞了杜路苏斯的能力，中肯的语气简直让人怀疑这是否出自亲生父亲之口。其次，提到杜路苏斯幸福的婚姻生活，而且杜路苏斯现已有3个孩子，这与当年提比略从奥古斯都手中接掌大权时相仿。再次，提比略陈述了杜路苏斯历时8年的边境防卫军团长历练，也曾获得过凯旋仪式的荣誉，并两次担任执政官。提比略还提到，从上面举的例子可看出推举杜路苏斯是非常正确的，并非临时起意。最后，提比略认为如若元老院同意请求，并授予杜路苏斯“护民官特权”，杜路苏斯必将勇敢挑起治理帝国的重任。

对于提比略的请求，元老院毫无异议。时年63岁的提比略为了实现帝国政权的平稳交接，正式完成了接班人的指定工作。杜路苏斯时年34岁。

看似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了，然而后面的工作还有许多。不仅皇

位继承需要经过元老院的承认，而且，遴选皇位继承人也得经过元老院认可，否则皇帝的政令也不过是临时性办法。如果要成为长久实施的政策，就必须经过元老院这一关，否则还是无法实现它的法律化。这也正是奥古斯都所创立的罗马元首制。对于中国的皇帝而言，要当上罗马皇帝真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此外，罗马皇帝与波斯等东方的君主制相比，只有用上“罗马式”这个形容词，才更能表达这种制度的真正内涵。

那么，皇帝应该怎样去处理与元老院之间的关系，让它更好地发挥作用就变成了最重要的课题。奥古斯都在与元老院打交道一事上花费了一番功夫，当然，提比略对此也是颇费周折。

元老院设定的议员总人数是以600人为上限，由于多数的议员因公务游走在罗马帝国四面八方，但最后的决议，也仍然需由400到500位议员经过反复讨论后才能作出决定。然而，耗时冗长的讨论也时有发生，而且结论也是迟迟才能推出。元老院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就好似报废了的机器一样，功效顿失。正因为如此，提比略才会想到采用人数较少的委员会这种模式解决难题。由他设置5至10人的议员组成对策委员会，在及时地讨论了提案之后，马上作出应对之策。此外，委员会的这些议员们不仅承担决策义务，还得亲自前往事发地，把解决方案负责执行。当罗马帝国遇到地震或火灾等灾害问题时，委员会在其处理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公元17年，罗马帝国的小亚细亚南部地区遭遇了大地震。而强地震之后的火灾使得灾情愈发严重，位于震区的萨迪斯、马格尼西亚与菲拉德菲亚等城市几乎陷入了灭顶之灾。就连名城以弗所也没能逃脱余震的破坏。这些属于元老院直接管辖的“亚细亚行省”地区，通常都要经过元老院的商讨才能拟定对策交付办理，然而在如今的灾情威胁之下，拿出对策刻不容缓。

提比略在获得灾情报告后，马上要求成立应急委员会，并要求委员会对他提出的对策进行及时的决断。

一、为实施紧急援助及重建基础设施，从国库拿出1亿塞斯特斯进行救援。

二、对灾区受灾的人民，免征行省税5年。

1亿塞斯特斯有多少钱呢？这个数字相当于保卫罗马帝国的全部军队一年工资的一半。第二条的行省税，现在的说法就是现在的国税与地方税。

帝国负责紧急援助及社会资本的重建，就是提比略的灾害对策的核心思想。然而，由于帝国免除了受灾人民5年的行省税，所以个人家庭的重建只能依靠自身。

由提比略创设的灾害对策不止一次发挥了效用，即使是在后世的罗马皇帝当政期间，如果遇到天灾，还是沿用了同样的办法。然而，受灾情况的大小，决定了紧急援助的金额与免征行省税的时间长短。可是，免税时间都不会少于3年。而提比略的救灾对策之所以能成为典范，受后人顶礼膜拜，是因为公元17年小亚细亚南部的重建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传闻，灾区萨迪斯城在3年之内就完成复兴，而当地人民3年内就恢复了缴税能力。

儿子之死

然而，就在小亚细亚灾区重建工作稳步推行，战胜北非沙漠游牧民族后的工作日益走上正轨，国内外一片安详的公元23年，突然发生了一件出乎提比略预料的不幸事件——刚被罗马人公认为继承人的杜路苏斯突然去世。不难想象，对于一位64岁的父亲而言，35岁的儿子离世是多么沉重的打击。贵为皇帝，提比略失去的是帝国的继承人，然而，这又不是一个仅仅依靠出席葬礼就能解决的问题。提比略不曾生病，有着非常健壮的身体，可是他已经64岁了，按罗马60岁老年的标准他已超过了

4岁。

站在元老院议员们面前的提比略完全不像一位刚痛失爱子的父亲，他以一贯冷峻严肃的态度将日耳曼尼库斯的两名遗孤托付给了元老院。他请求所有元老院议员能把17岁的尼禄·恺撒与16岁的杜路苏斯·恺撒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进行照顾。

对于那些希望罗马帝国由流着奥古斯都之血的人来继承的人而言，提比略的这一举措无异于“大政奉还”。有很多人对此欢喜异常，第一个有这种念头的正是阿格里皮娜，她的身份是奥古斯都的外孙女，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尼禄·恺撒与杜路苏斯·恺撒的母亲。

若阿格里皮娜是个聪明有头脑的女人，这种时候她就应比杜路苏斯在世时更谨言慎行。随着提比略年事已高，只需要耐心等待，阿格里皮娜的儿子很快就会继位。然而，阿格里皮娜却在此时蠢蠢欲动。

阿格里皮娜煽动此前反对提比略的妇女们，共同形成了反提比略派，并把这股势力引往罗马男人的世界中。只要敬仰日耳曼尼库斯的男人都加入其中，这将无异于与“日耳曼尼库斯神话”合流。当见到提比略之子杜路苏斯以皇位继承人身份游街时，阿格里皮娜被仇恨吞噬；看到杜路苏斯之死，她心中又多增加了一分欣喜与傲慢。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阿格里皮娜认为提比略已经无牌可出。

然而，此时半路却杀出了个程咬金，阻碍了阿格里皮娜的计划。此人就是与阿格里皮娜同住在帕拉蒂尼山孤独生活的莉薇娅。拥有“国母”称号的莉薇娅是神君奥古斯都之妻。虽然她年事已高，但在皇族内依然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对于阿格里皮娜而言，莉薇娅既是已故丈夫的亲生祖母，又是让他深恶痛绝的提比略的亲生母亲。众多现代学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阿格里皮娜派，与其说是为了推翻提比略以使儿子继位，不如说是阿格里皮娜为巩固儿子地位，把继承皇位的这种想法公之于众。

那么，提比略是如何看待阿格里皮娜的这种种举动呢？或许，他认为阿格里皮娜只是在等待他的离世。就在提比略之子离世的这一年年末，这位64岁的皇帝又失去了4岁双胞胎孙子中仅存的一个。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提比略对于皇帝的责任仍然没有丝毫懈怠。为什么是这样呢？显然分担提比略部分工作的人都驾鹤西去，提比略埋头案间，应该可以暂时忘却个人的不幸与伤悲吧。在其子死后，对于帝国最有权力的提比略而言，应当是比以前更加繁忙和充实了吧。

安全防卫

第一个建设街道的民族并非罗马人，但不仅仅建一条街道，而是将其阡陌纵横、连成网络，提高运输效率，并且付诸实践的却是罗马人。第一个制定法律的民族也并非罗马人，然而，最先想到把法律分为各种部门，形成法律体系，建成法治国家，发挥效用且付诸实现的也是罗马人。这两个事例共同体现了这样一个道理：顺应实际要求、及时作出“维护”，以避免功能退化这样的人类社会的现实规则。根据实际情况与时俱进地对法律进行修订，就是法律上“维护”的真正含义。对于法律体系的创始人是罗马人的说法无人质疑，然而，罗马人从未认为法律被制定后就要一成不变地捍卫到底。“法律”也应当像街道一样，适时作出必要的“维修”。这种理论适用于各种体制。换言之，不论是什么样的体制，都应该符合实际地作出“维修”，如果疏于“维修”，体制本身也会出现疲劳，直至最后崩溃。长远来看，这是非常不经济的。对功能的不懈追求，就是只有通过对既有的力量高效且灵活、巧妙地加以运用，才可能达成目标。正是这种被称为罗马人“哲学”的理论，也正是这种“从自身做起”的精神，才使得罗马人战胜了与自己势均力敌的迦太基和希腊。在罗马人看来，就算是神君奥古斯都创设的体制，也绝非一成不变。对于从奥古斯都时代传承下来的体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这种做法，本身与继承奥古斯都的传统并不矛盾。因为，只有在必要的时候

进行修改，才能永远维持创设者本人的意图。这样一个只要作出适时“修改”就能维持其效用的体制，对于体制的创设者本人而言也是非常高兴的事情。显而易见，这说明了他已经完美地将雏形制造了出来。在这方面奥古斯都的才能，确实是值得单独提出加以赞赏的。

然而，“维修”一事并非是交给谁都可以完成的。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需要有这样的能力，懂得在什么地方修改，懂得如何保持系统的运作，懂得如何维持功能，以及在实行过程中具有决断力与执行力。从这方面来看，提比略的确是自恺撒以来最适合担任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的人选，对此，现代的研究者也没有任何异议。这种“修改”的最好例证，就是以维护“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为目的对防御系统进行的调整。

提比略对奥古斯都在公元9年后定下的帝国防卫基本形态没有进行更改。也就是说，也许是出于对公元1世纪当时的人力与经济实力的考虑，奥古斯都建立了一个由25个军团、15万罗马公民组成的主要兵力，加上不足15万行省人民所组成的辅助部队，总计近30万军人来保障国家安全的帝国防卫基本形态，而提比略对这种形态也没有加以改变。就连《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记述的军团分布的情况，在14年后的公元23年，也没有重新布防。提比略只是重新调整了莱茵河与多瑙河前线的几处驻守兵团的任务。

在罗马帝国莱茵河前线，驻扎在上游的高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与驻扎在下游的低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总计8个军团的任务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的目标不再是奥古斯都时代那样，以征服日耳曼、将霸权推进至易北河为目的，防守莱茵河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对于8个军团的数目，提比略并没有进行增减。而继续对他们冠以“日耳曼军团”的名称，对高卢也能产生心理上的安抚。罗马仅仅在里昂驻扎了1000名士兵，以维护广阔的高卢地区的安全。提比略完全放弃易北河、撤回莱茵河这个决定，单从推进高卢罗马化这一角度来看，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因为如若高卢发生骚乱，而8个军团从易北河撤回的话，从时间上讲根

本就来不及。

提比略对多瑙河南岸一线的7个军团的布防也未进行调整。这里的局势比起莱茵河前线更加复杂多变。

在莱茵河前线方面，决定把此地设为帝国防线的恺撒，已经完全征服了直至莱茵河的全部地域，所以提比略只要防御好不失守就算完成了任务。在多瑙河前线，恺撒也曾设想把这里作为帝国防线，但在着手实施前就遇害身亡，所以后续工作实际上是由奥古斯都来完成的。由于奥古斯都并非那种在前线冲锋陷阵的领袖，所以战斗任务就交给了阿格里帕，而阿格里帕死后则由提比略接任。虽然两人都是出类拔萃的将军，却并非如恺撒一般有天赋。多瑙河防线的最终确立，是依靠一城一池的速度缓慢推进的，如果从刚开始的年代算起的话，前后花费了100年左右的时间。

对于多瑙河防线，德国历史学家蒙森这样写道："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眼中，多瑙河是'政治上的国界'而非'军事上的国界'。"言外之意，虽然多瑙河被确定为防卫线，罗马帝国事实上却没有完成到多瑙河为止的疆域的霸权事业。蒙森还提到，当时的多瑙河就相当于奥古斯都时代的易北河，也不过是地图上的国界罢了。多瑙河沿岸的维也纳与布达佩斯被纳入罗马帝国也是提比略时代之后的事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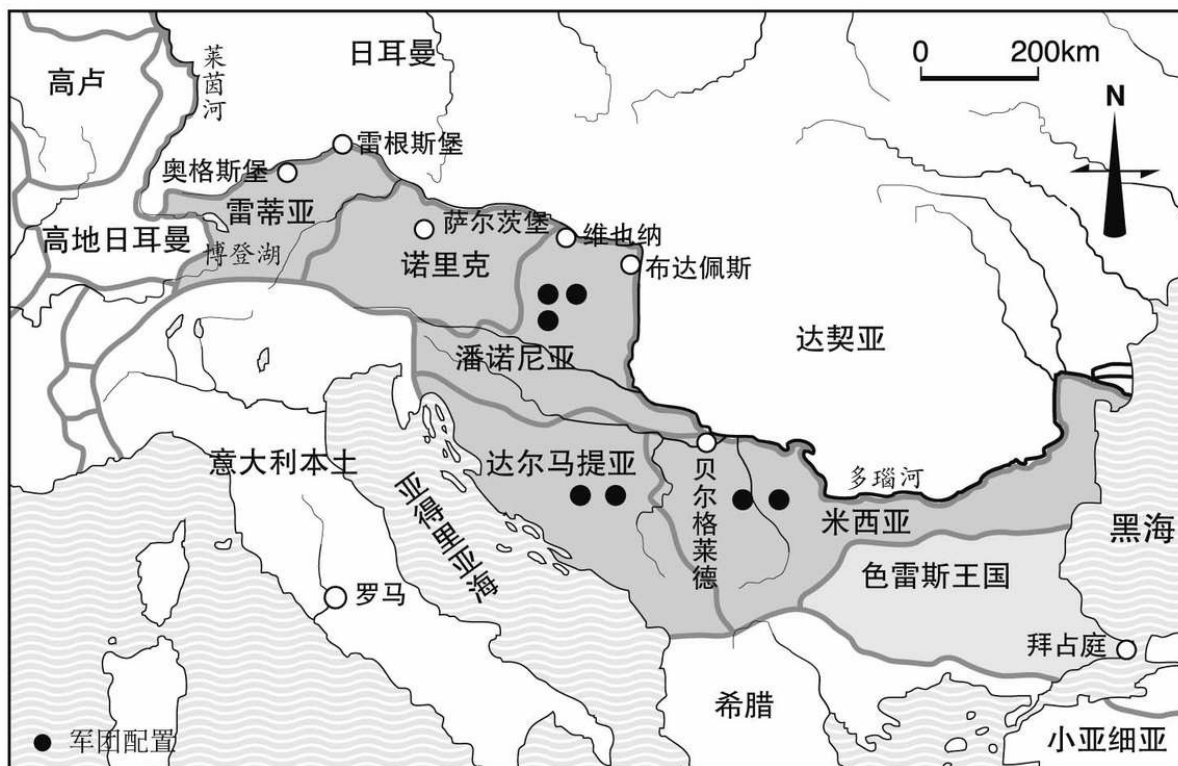
虽然罗马史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并且蒙森根本没有单独拿出来叙述的必要，但是在罗马人看来，多瑙河与易北河有一个本质差异——罗马人放弃了易北河，却对多瑙河死抓不放。虽然这一过程十分缓慢，然而，罗马确实在确立多瑙河防线的事情上一直努力，这可以从提比略对防御体制的调整中看出缘由。

罗马人把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注入黑海的多瑙河南岸作出了如下的划分，从上到下分别划分为：雷蒂亚、诺里克、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米西亚与色雷斯。提比略必须完成的任务，与其说是完成全区的防

御，不如说是确立罗马在此地的霸权。因此，在多瑙河流域如何布置安排7个军团，就成了与战役推进紧密相连的大问题。

第一，提比略布防的目标是地处多瑙河最上游的雷蒂亚行省。因为早前提比略的军事行动，山岳地带和从这里到多瑙河的平原地区，包括博登湖和奥格斯堡都已纳入了罗马统治之下。虽然当时多瑙河沿岸的雷根斯堡还没有成为罗马军队的营地，然而，罗马的霸权已经从此地延伸至多瑙河。提比略在此未布置任何军团，因为此地离西北莱茵河上游的高地日耳曼军团不远，随时可以派军队过来处理突发事件。

第二，提比略在以流入多瑙河的因河为界的东部诺里克行省，也没有部署任何军团。此地，即萨尔茨堡早已纳入罗马帝国版图，即使是困难重重的阿尔卑斯山区也被罗马帝国占领，而罗马帝国的霸权延伸至多瑙河流域也指日可待。我认为，提比略大概是想把称霸雷蒂亚和诺里克的任务，交给固守莱茵河一线的“高地日耳曼军团”。



多瑙河流域图

第三，提比略在位于多瑙河上游的潘诺尼亚行省布防了3个军团，只要这个地方的称霸任务顺利完成，那么也能实现对维也纳、布达佩斯的称霸。由于此地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所以罗马暂时也没能完全实现对这个地区的称霸。而在此地的罗马军队的任务，攻大于防。实际上，驻扎在潘诺尼亚行省的这3个军团是7个军团中实力最强的。

第四，至于位于潘诺尼亚以南、又不与多瑙河相连接的达尔马提亚行省，提比略也在此安排了2个军团。因为维护好了这里的和平，对保证与此仅有亚得里亚海之隔的罗马帝国本土的和平来说意义深远。当然，这2个军团在必要时刻也能北上驰援潘诺尼亚军团。

第五，提比略在多瑙河中游的米西亚行省布防了2个军团。这个地方的霸权确立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罗马军团在此地最主要的目的，不在于攻击多瑙河对岸，而是保护多瑙河南边的希腊免受袭扰。罗马帝国要永远保持“霸主”的地位，面临着许多困难。因为只有保护好霸权下的被保护人，才有继续当“霸主”的权力。

第六，地处多瑙河最下游的还有一个色雷斯王国，提比略采取了和处理东方地区亚美尼亚问题时相同的策略。提比略之所以这么安排，其实是凭借这个事实上是罗马属国、形式上是独立的王国的区域来防御多瑙河下游。

前面已多次讲到过，提比略与多瑙河北岸的几个部族确立了友好关系。在这一政策的确保之下，加上多瑙河北边盟友的奥援，很容易保证罗马帝国实现未竟的多瑙河南岸霸业。所谓的“分而治之”，是敌我都很适用的策略。

但是，提比略对罗马帝国军事力量的“重整”，却并不局限于军队调整。

在《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已有叙述，罗马的一个

军团，从军团长到士兵，从工程师、医生到财会，总人数约为6000名，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在新开发殖民地时，尤里乌斯·恺撒通常是将整个军团的退伍军人都移过去，原因在于罗马军团中有维持开发的几乎所有人才。此外，恺撒也没有补充因年老、战死或重伤而短缺的士兵，因为他的目的是进攻。恺撒创立的以进攻为主要任务的军队，后继者的做法性质相同最好。防御却是提比略首要的任务。谈到防御的话，质量与数量都同等重要。因为除了帕提亚王国之外，已经演化成为元首制的罗马，他们共同面临的最大敌人都是战役中以量求胜的蛮族军队。

补充罗马帝国军队中的缺员士兵是提比略要做的第一件事。而补充士兵，能够让罗马帝国现役的25个军团，每一个都能成为充分发挥防御作用的独立单元。然而，仅仅把人数补足是远远不够的，维持军团质量这一课题也不容忽视。如若让社会边缘人混进军队，极有可能会出现扰乱军纪、军心不稳的局面。

而且，随着服役时限的届满，所有的士兵都梦想着早日归乡。对于这种想法，提比略允许服兵役届满20年的士兵可以退役，也保障了退役金的发放。在赞助角斗比赛上备受指责的提比略，对于发放士兵退役金倒是十分大方。

此外，扩充罗马军队中的辅助兵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这是因为，对主要战斗力和非主要战斗力的合理使用，直接影响到军事成果的大小。在军团长看来，统率罗马公民组成的正规军团，要比行省人构成的辅助兵军团更容易。在莱茵河防线的各军团的辅助士兵，虽然他们在莱茵河西岸居住了很长时间，但他们还是不得不与河对岸的日耳曼人为敌，然而这些士兵也是日耳曼人。此外，辅助部队没有人员限制，使得各军团都有故意压缩人数的倾向，以方便扩大实力。

提比略对辅助兵的名额进行了限制，他规定辅助兵的名额可以与正规军的名额相同，然而，绝对不能超过军团正规士兵的名额。当然，提比略也延续了奥古斯都时代的做法，规定服役期满的辅助兵可以获得罗

马的公民权。此外，提比略也知道“军团士兵”与“辅助士兵”有着抱怨之处，他们除了服役期满还不能退役之外，还得参加土木建设。虽然提比略知道这些情况，然而，士兵们在被征服的土地上进行桥梁、街道建设，是罗马的传统。提比略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要让这些士兵承担过重的劳役。虽然没有任何史书对此予以记载，我想提比略一定采取了一定的折中方案。因为，现代德国南部、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四通八达的罗马街道网络，几乎都是在提比略统治时期建成的，而士兵们未以此为借口，再次爆发“罢工”。

此时，提比略所进行的“调整”，就是由军团长承担一切事务的执行。在他看来，唯有实行责任分担，才能保持庞大的罗马帝国的运行。

那么，要采用分担责任的方式，选择合适的人选自然成了很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就连厌恶提比略的历史学家塔西佗也不得不说：

“从未有一任皇帝能像提比略这样知人善任。”

提比略在选贤任能方面，始终贯彻知人善任与实力至上的理念。军团长必须具备军事才能，行政官必须具备行政才能。而与别国处理外交事务的行省总督则起用名门贵族，这种渊源源自共和制时代，出身名门的人担任总督更有利于外交谈判。虽然选拔人才的标准各不相同，但是在知人善任和实力至上两个条件方面从未改变过。哪怕是出生于行省的罗马公民，也不会因为出身而影响仕途。曾被认为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而一度被逐出罗马帝国本土的犹太人，在提比略看来，只要他有足够的能力，也可以担任埃及的长官。而遴选总督和军团长级别的官员，提比略对实力至上为基础的判断更加明显。且不论提比略其后的四任皇帝能力怎么样，仅他们统治时期负责军事和治理行省的人物，每一位都出类拔萃这一点，就足以使人大吃一惊了。提比略不是提拔这些人，就是提拔这些人的后代。此外，提比略向整个帝国的人灌输并让他们深信，只要有实力就一定会有用武之地这一想法，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不论一个组织有多么完美，只有人才会让它发挥作用。

“提比略在其子杜路苏斯离世之前，就完成了所有的改革。”塔西佗这样记载道。提比略在其子死后无心政务，将一切都委托给了身边的亲信塞亚努斯。

然而，对于塔西佗的这些记载，笔者存疑。首先，提比略在其子死之前已经完成了所有工作，缺乏史书证实。其次，提比略所做的工作，与其称之为“改革”，还不如称之为“修改”更为贴切。当然，仅仅是在工作中制定路线还远远不够，还要监督是否得到落实，再根据执行时的实际情况适时加以“修改”，这样，才能期待得到成果。要达成这样的目标，一年时间根本不行。更何况，提比略返回罗马与经历儿子之死，仅仅只有一年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塔西佗对自负的人完全不了解。

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才可以称之为自负的人。对于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绝不会因为儿子的离世，而允许自己败在悲伤的脚下。普通人遇到这样的悲剧，肯定会以泪洗面、无所事事。然而，自诩为不是普通人的人，即使是死也不会自暴自弃。恐怕只有当最大的伤痛袭来之际，他才会奋起埋头于艰苦的工作之中吧。只有这样，自负的人才能够活下去。当普通人摆脱悲伤拾起工作时，自负的人才与此同时感到身心疲惫吧。公元25年，在提比略之子杜路苏斯去世两年之后，有议员称颂提比略的政绩，并提议为他兴建神殿。塔西佗引用了提比略在元老院婉拒的演讲，记载如下：

> 我无非是难逃一死的平凡人而已，我操劳之工作，议员诸君都能够做到。为了不让各位赋予鄙人的崇高地位蒙羞，我克勤克俭，不敢放松，对鄙人而言，已经是辛苦之至了。
>
> 后世会怎样评价鄙人？我所做之事是否不坠先祖之名？是否有助于维护各位议员诸君的立场？是否有益于国家的和平？此外，为了国之利益，即使批评如潮，我仍旧不为所动，努力完成心之所想，后世是否会给鄙人些许正面颂扬呢？
>
> 若有，对鄙人而言，那才是真正的神殿，也才是最美且永远被

铭记的雕像。另外，就算是用坚固的大理石所造之神像，若后世的唾骂不断，那它只是个比坟茔还要低贱的事物。我之渴求，乃是希望在我有生之年，众神在赐予我精神上的宁静之际，赐给我洞悉人类法则的能力。

从上面的文字不难看出，这难道会是两年前因丧子而情绪低落、抛开所有政务的人说的话吗？这又何尝不是看淡生死之人的一种宣示呢？一位当代研究者用如下的拉丁语格言来形容皇帝提比略，非常合适：

“FATA REGUNT ORBEM！CERTA STANT OMNIA LEGE.”

（不明之事乃命运之域，确定之事乃法之所辖。）

对于我们这些两千年之后活在当世的人而言，想必很难对提比略的想法产生共鸣。议事厅内用心聆听的议员们，对提比略并不认同。部分议员认为提比略所谓的生命短暂是出于他的谦逊，而另外一群议员则认为这是提比略没有自信的表现，余下的议员们都认为这正好是提比略精神上的卑劣之处。然而议员们较为一致的观点在于，身居高位的人本应追求更高之境界，在这方面，先皇奥古斯都的确比提比略更加出色。塔西佗这样评论道：

虽然只要成为最高权力者就能享受到许多特权，但他们有一件必须至死追求的事——给世人留下关于自己的美好回忆，因为不重视名声的人，就是轻视道德的人。

与其说这句话阐明了古代与现代领袖的差异，倒不如说它更加让人思考，让我们体会到了不论古今内外，作为一位领导人的艰难。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终归会死的凡人的提比略，他竭尽所有来完成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使他的帝国统治顺利进行，对于这一点，连一直对他持批评态度的塔西佗都给予了赞许。

罗马帝国的边境，随着提比略对军团的重新布防而更加巩固。罗马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拥有不必担心敌人袭击的安全感。所谓的“和平”，当然不仅仅局限于边境安全。对于无须担心外敌入侵的罗马人而言，他们最关心的身边的事，就是走出家门也不用担心会遇上强盗或窃贼。在这方面，提比略贯彻了公共安全第一的政策，并且这样的政策遍及地方政府。提比略对犯罪分子的惩罚执行得很彻底。

对于一国而言，仁政的最佳评估标准就是税收。对此，提比略未增加任何新税种，也没有上调税率，甚至对未能坚持公正征税的人进行了严惩。只要税收被控制在一定的水平，绝大多数人都会认真缴纳。而对于将征税事务交由私人代办的罗马帝国，为了保证征税工作的公正，只要警戒过度征税而非逃税就行了。

不论提比略在治理国家事务上多么能干，当他一回到家中，仍然还得面对命运之神对他的制约。

与家族的关系

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段故事发生于公元26年，这些故事全部是由塔西佗描述的。

第一个故事，是由一个名叫杜米提亚斯·阿福洛的人，以通奸罪控告与提比略同属克劳狄乌斯家族的克劳狄乌斯·布鲁克鲁斯为开端。根据奥古斯都所制定的法律，在帝国政治体制下的罗马，犯通奸罪的人将会被判处流放外地的刑罚。就此看来，这也只不过是一项普通的判决。然而，因为克劳狄乌斯·布鲁克鲁斯身为阿格里皮娜派系中的得力干将，也是阿格里皮娜的表姐妹之一，这项判决让阿格里皮娜怒火中烧。在阿格里皮娜眼中，这是提比略背地里跟她耍花招，故意要让她难堪。阿格里皮娜打算跑到提比略面前，将她忍受已久的不满和愤怒全部发泄

出来。

这时提比略正在供奉有神君奥古斯都的祭坛前面跪拜，可阿格里皮娜还是无法等到仪式完毕就开口嚷道：

“提比略！难道你就是这样为神君奥古斯都鞠躬尽瘁的同时，对其亲人赶尽杀绝的吗？在你的心中，哪还有先皇奥古斯都神君的位置？！如今还遗留有神君奥古斯都神圣精神的，绝不在那尊神像，而是活生生的我，这个流着神君尊贵血液的我！我之所以穿着丧服，是因为如今我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告发克劳狄乌斯·布鲁克鲁斯，只不过是对我进行攻击的预演罢了。就因为她对我的忠心，你把她定罪？”

这时候，从祭坛前面站了起来的提比略，紧紧拉住为了发泄平日积攒的怨恨而怒骂不止的阿格里皮娜的手臂，用仆人们听不懂的希腊语低声说道：

“你发怒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你没能得到罗马的统治权。”

在克劳狄乌斯·布鲁克鲁斯和其奸夫普鲁尼斯都有罪的判决作出后，阿格里皮娜的愤怒情绪愈演愈烈。

第二个小故事，是在上一个故事发生不久之后发生的。当提比略前来探望卧病在床的阿格里皮娜时，阿格里皮娜对这位同属恺撒家族现又身为族长的人哭诉道：

“请你可怜可怜我孤独一人的现状，赐我一个丈夫吧。现如今的我还处于盛年。对于我这个贞洁的女子，正式结婚才是唯一的慰藉。在地域辽阔的罗马帝国，一定会有接纳日耳曼尼库斯遗孀与孩子的高尚的男人。”

对此，提比略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就离开了阿格里皮娜的房间。就连塔西佗也作了这样的评论：“阿格里皮娜的再婚不只是一个女人的再婚

问题，而是一个与帝国统治的后继者紧密相关的问题。”

第三个故事是在提比略与阿格里皮娜家人共进晚餐时发生的。

这天夜里，虽然阿格里皮娜坐上了餐桌，但她一直沉默不语，也没有动手吃饭的意思。察觉到这种异状的提比略，从盘子中取了一个水果，递给她说道：“很新鲜，尝尝吧。”虽然阿格里皮娜接住了水果，但尝也没尝就马上递给了仆人。提比略对阿格里皮娜没有说什么，转身对母亲莉薇娅说道：

“她怕我毒死她。所以，我对她那么冷淡应该也不奇怪吧。”

塔西佗描述的这些都是提比略家族中发生的小故事，也都是从与阿格里皮娜同名的一个女儿所写的回忆录中筛选出来的。这个小阿格里皮娜后来成了卡利古拉皇帝的妹妹，也即克劳狄乌斯皇帝的妻子，尼禄皇帝的母亲。如此说来，这就是10岁少女眼中的皇帝家族的氛围。此外，对于年近70的提比略而言，家庭以外的元老院（从他的出身阶层来看，也属于自家人）也不是可以让他感到满足的地方。

与元老院的关系

就被赋予强大的权力这一点而言，要想了解罗马帝国元首制时代皇帝与元老院的关系，那我们可以参考今天美国总统与议会——其中的过半数是由与总统所属的党派相对的党派人员组成——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权力的授予来讨论这个话题。与前者比较而言，后者是由拥有投票权的公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从古罗马至今接近2000年，人类之所以被称之为人类，也是因为建立在这些进步之上的。美国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总统所属政党与参、众两院都过半数席位的党派不一致时，就会出现许多问题。当时的古罗马也存在这种情形。

不得不注意的是，哪怕是元老院反对，其实皇帝还是可以一意孤行做自己想做的事，然而，这些仅仅局限于皇帝的通告、敕令以及临时性措施范围里面。假设要想使之上升为罗马人的“法律”，不论名称是否为“元老院最终劝告”，都得经过元老院议决通过。

如果元老院只是附议通过皇帝提出法案（政策）的机构，那么即使“元老院最终劝告”具备立法权，但他们仍然没有发挥立法机关的功能。若是这样的话，皇帝乃至“第一公民”，与元老院之间的这种平衡关系就不存在了。罗马的元老院并不是通过选举产生，正因如此才拥有吸纳了罗马各界重量级人物的优点，但是如果这种平衡出现倾斜，就会带来危害更大的结果，这将会演变成帝国的两大势力正面对决。需要强调的是，看似与元老院共同分享国家主权的普通罗马公民，实质上还是应该把他们归为“保皇派”。免费配给小麦等社会福利政策，以及资助角斗比赛等等活动其实质也是选举造势活动。说白了，这些手段其实都是皇帝收买“保皇派”的主要方法。当然，把这些手段单纯划分为收买人心的政策也是不对的，虽然提比略为了完善财政体系而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不再资助角斗比赛，但没有停止发放免费小麦，提比略甚至没有减少免费领取小麦的人数。从实质上而言，这还是一项社会福利。

罗马帝国被称为“元老院体制”也没错，然而，一个由元老院主导国家体系运转的体制也会出现血缘循环问题。在尤里乌斯·恺撒降世的30年前，也即格拉古兄弟时代，就有人已经知道这种体制有着巨大的缺陷。在与迦太基生死存亡的战争时代，“元老院体制”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体制终究无法摆脱僵化的局面。不过，不管首先攻击这个体制的格拉古兄弟，还是最终击溃它的恺撒，都不曾幻想过要废除元老院。因为元老院既是罗马人的历史，也是罗马人的传统。简单地想，共和制时代的罗马就是元老院主导体制，哪怕罗马帝国后来成为元首制，体制还是由皇帝主导的，元老院并没有消失。

那么，尤里乌斯·恺撒是如何处理皇帝与元老院之间的这种罗马式

微妙关系的呢？

他以武力战胜了最大的对手，即元老院一派拥护的庞培，而他也没有分享权力的性格。在恺撒成为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之后，就开始不断向元老院（议会）提出议案，并要求全部认可，失败的元老院也只能通过恺撒的法案。也许是恺撒意识到皇权主导的形式过头了，于是他就用元老院中亲皇派的名义提出建议，换言之，就是把他的议案用议员立法的形式获得元老院通过。然而，毫不知情成为法案提案者之一的西塞罗，后来知道这件事时也大吃一惊。

谋杀恺撒的主谋，其实是以布鲁图为首的元老院议员们。在他们心目中，其实并不是反对恺撒实行的政策，而只是想把“皇帝主导体制”拉回到“元老院主导体制”的模式。暗杀恺撒的行动中并没有普通罗马市民的参与，这也暗示了恺撒的暗杀事件并不是政策对错的问题，而是元老院对政治体制不认同的反抗举动。

对元老院而言，奥古斯都继承恺撒的遗愿，收拾了布鲁图，击败了安东尼；这样看来，奥古斯都是当然的胜利者。不想重蹈覆辙的奥古斯都没有对元老院掉以轻心，但他也没有改变以皇帝主导的这种体制。对于年纪轻轻就成为最高当权者的奥古斯都而言，时间就是他最好的武器。他非常懂得审时度势，让情势的发展对自己有利，甚至会趁元老院已经遗忘之际顺水推舟地提出法案，于是可以立即获得通过。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可谓是皇帝与元老院关系最为顺畅的一段时期，当然，与其说是元老院的大力配合，还不如说是奥古斯都更善于算计。

提比略没有两位先皇以武力取胜的优势，在血缘上他与先皇没有任何联系。除此之外，提比略与出身于显赫家族的恺撒，以及出身骑士阶级的恺撒养子奥古斯都不同。当然，提比略并不属于罗马社会的圈外人士，他出身于自元老院主导下一直是罗马社会主流的克劳狄乌斯家族。正因为如此，提比略理所当然地认为“第一公民”应当与元老院合作统治罗马帝国。提比略正是基于这个想法充满诚意地去实践。只不过，我觉

得他做得太过头了。

两大势力并立只存在于理想之中，而不容于现实。对于元老院的统治能力，恺撒与奥古斯都没有心存幻想，所以他们也不会在得知真实情况后希望破灭。提比略也不能算做是幻想，然而，他对元老院的期望值超过了真实水平。

提比略经常不带护卫，也不带随从，独自一人出席元老院的会议。与其他议员一样，他最喜欢坐的也是最前排。当然，提比略也会和其他议员一起起立迎接执政官走入议事厅。他对于议员非常有礼貌，并一直努力与元老院竭诚合作、共商国是。提比略统治伊始，就连他这位最高司令官权责范围内的事，如军团士兵服役期满退役问题，他还是要在元老院同意之后才执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提比略尊重元老院表现之一斑。

提比略多次公开阐明自己的态度，希望元老院议事之际更加自由活跃。然而，如若有人附和他人发言，提比略会面露不快，并要求这位议员阐明自己发言的真正目的，因为表达同意意见的只有执政官与皇帝。当然，我也曾经多次提到，提比略禁止议员们称他为“皇帝”，而是要求议员们称他为“第一公民”。

提比略不论是请求元老院，还是提出反对意见，他的口气一直都很严厉。即使从他口中听到的是赞同的意见，但冷漠的语气总让聆听的议员感觉像是被泼了冷水一样全身发凉。显而易见，不懂幽默是提比略的最大缺点。恺撒有能力让反对派喜笑颜开地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然而，对此不能奢望提比略。当议员们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忘记元老院是国策决策机构，而想把一切责任抛给皇帝的时候，提比略的语气就变得辛辣无比。这时候的提比略，仿佛就是用言语的利剑戳得他们体无完肤，要他们认同元老院的权威与责任，言语上毫不留情。然而，若是恺撒或者奥古斯都碰到这种情况，应该在心里暗自高兴。

当然，元老院600位议员并非完全丧失了治理罗马帝国的能力。若25岁担任账务监察官，到了30岁就可以自动取得进入元老院的资格，所以罗马元老院还有汇集人才的作用。然而，帝国经常需要不计其数的人才才能保证它的运行。至于提比略选拔人才与知人善用的能力，连塔西佗都肯定其“目光锐利”的一面。如若认为一个人非常有能力承担这项工作，提比略就不会在短期内调动这个人的任职地方。而罗马帝国短期任职的，只有法务官、执政官等中央政府高官，以及出任元老院行省总督的这些官员才会只有一年的任期。

因此，经常在元老院会场中见到的面孔，其中的大部分属于能力不怎么样的人了。无论如何，共和制年代遗留下来的元老院，当然是罗马帝国显赫贵族聚集的地方，就算是能力拙劣，只要有众人耳熟能详的家世背景，都能在元老院里有一个议席。提比略喜欢的是通过实力进入元老院的议员，有很多这样的议员被派往边疆戍国，委以重任。也只有从原任职地前往新任职地的短暂时间，他们才能够待在罗马。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元老院的大多数议员都喜欢坐等现成，又喜欢到安全而又富庶的行省担任总督累积历练，回来好邀功请赏。虽是如此，提比略仍然想调动元老院议员们积极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对此，提比略毫不懈怠，简直就是努力过了头。为了避免人数众多、效率低下的议事方式，提比略打算使用委员会的方式作为替代，以提高议事效率。当然，委员会中的成员仍然是议员。

由奥古斯都创立的“第一公民”主导的罗马政体，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眼中，这种制度并非纯粹的皇帝制度，而是“元首制”。因此，罗马帝国并非由皇帝统治，而是由“第一公民”负责。“第一公民”与元老院就像国家的双足，相互协调着推动国家政体的前行。若是严格的“元首制”，那么就必须与刚才讨论过的内容吻合。然而，对于此种意见，我并不完全赞同，在描述奥古斯都的《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已经强调过了。“第一公民体制”只是奥古斯都用在外面的酒瓶，而真正在瓶

内装的还是元首制。我想，提比略继位之后，大概也认为罗马的政治体系是元首制。与奥古斯都说一套做一套不同，提比略十分相信元首制的存在理由，也努力捍卫它的存在。

然而，元老院的现实与他的期望南辕北辙。不难想象元老院议员们热烈讨论的背后，是提比略的失落与疲惫感。在此，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的这种心情，元老院讨论如有人出任某地职位时，是应该孤身赴任，还是可以偕妻同往？

这位议员提出，派出的总督不论是到兼理军务的皇帝行省，还是到只负责治理的元老院行省，都应禁止偕妻同往。这条法案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提案者引用自身的例子，讲述了他40年的外地任职中，妻子一直留在罗马养育6个孩子，但夫妻感情仍然十分牢固。在强调提出这个提案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好处，引发议员们的哄堂大笑之后，他开始阐述法案的中心思想。

此前的法律禁止偕妻赴任并非毫无根据。这是因为，非战时期偕妻前往极有可能惹是生非，从而影响丈夫履行职务。此外，战争时期她们也会出于害怕从而影响丈夫履行职务。而女人与生俱来不喜欢纪律约束的特点，也会使得丈夫部下变成毫无秩序的一群人。另外，不喜欢吃苦也是女人的本性，如此这般，会让戍边的罗马士兵，反感自己的辛劳任务，从而丧失战斗力。

此外，如若给女人掌权机会，她们就会变得异常冷酷、争强好胜。也发生过下面这些广为人知的例子，有的军团长夫人以上级的身份动辄使唤百人队队长，染指军事演练，甚至对军事行动指手画脚等。

虽然元老院行省不负责军事任务，但也不乏偕妻子同行而酿成灾祸的案例。元老院下辖行省的总督经常在回到本土后，因违法乱纪、滥用职权而遭到起诉，其中大多数是由于总督夫人惹出的事，而致祸起萧墙。此外，在罗马行省中也有不少人以提供商机为名，借机接近总督夫

人，为自己谋取私利。而这种链条一下子就清晰了，从而出现了行省官员服从总督、总督服从总督夫人这种现象。总督夫人也由此渐渐变得妄自尊大，越发不可控制。

公元前215年，罗马制定的《奥庇乌斯法》等法律中规定严格限制偕妻子赴任，所以上述问题并未出现。然而，时隔250年后，不仅仅是戍边，就连赴行省的任职也变成了太平的任务。大概正因如此，上至总督，下至下属的其他高官也偕妻赴任的现象一时风靡。结果，无论是在行省军队营地，还是在总督兼任大法官的审判场所，这些官太太们都摆出一副得意洋洋的主人的面孔出现在众人面前。

面对此项提案，元老院一扫往日的隐晦，议员们都积极地参与到讨论之中。对此，许多议员持反对的立场，其中一位议员这样反驳道：

由于时局所致，才导致了250年前的严格禁止偕妻赴任条文的出现。也是当时周边环境险象丛生，罗马才如此规定罢了。往昔征战频繁，我官员至外族纳降土地赴任，当地居民的敌意确实不小。然而，如今帝国治下一片和平，还有何担忧呢？

当然，从家庭内部来讲，为了满足太太们的需求而赋予她们必要的权限，也不至于影响到家庭和睦。此外，从家庭外部环境来讲，这种做法也不至于影响到罗马统治下的基础（指行省人民、同盟国的国王）的关系。

在此，还有这样一个道理，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太平时代，人的一生中有很多事情必须由夫妻共同承担。

当然，对危及行省统治的言行举止理应予以管制。然而，丈夫在辛辛苦苦结束任务回到家中，还得要由法律来规定是否安排他的妻子在家中等候吗？

不可否认，野心勃勃、耽于享受的女人大有人在。然而，男人就与上述的种种丑恶完全无缘吗？即使这样，在面对处处充满诱惑的花花世界行省，男人还是依旧被赋予担当重任的义务。此外，如若男人们卸任返回罗马，遇有违法乱纪指控，不论是谁都会一口咬定其妻教唆而致？照这样说，单身男人全部都是清廉洁白、奉公守法的典范？而此前总督们的落网也都是偕妻赴任的诱因？

大概是这样的男人喜欢把玩忽职守的责任全部推到女人身上吧？即使官太太们想要利用夫君的地位和权力谋取私利，然而，归根结底责任还是在男人身上。

时局所致的《奥庇乌斯法》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我们罗马法，忘记与时俱进，已经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加以修改，使它更加完善、更加合理，以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达成法律的目标。我们也不必因为一两位丈夫对夫人管教不力，就用法律来限制所有的官员。

女人原本就是善变的，容易被虚荣心驱使，或者憧憬其他女人所掌握的权势或财富。此类女人，即使经与她们结为连理，我敢保证这类婚姻也很难持续下去。如若还横加长年分居的壁垒，夫妻情感就会变淡，简直与离婚无异。这么一来，孤身赴任的丈夫，老是挂牵罗马的妻子，大概也不会专心政事了。

担任主席的执政官也持这种观点。他曾说过：“不论他地位多么崇高，只要担任帝国使命者，都无法避免前往异地任职。神君奥古斯都也曾多次前往西方或东方履职，而皇后莉薇娅经常陪伴左右。我自己也曾因军务长年驻扎在伊利里库姆不能回乡。然军规不允许，只得孤身前往，其间妻子常常引我思量，导致精神涣散、业不专精。”

由此，提议禁止偕妻赴任的法案，遭到投票否决。

对于元老院此时的审议结果，提比略委婉地提出忠告：此案事关各

位利益，热烈讨论无可厚非，然而我还是恳请大家对国事认真商议，而非把精力枉置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不难发现，元老院在讨论是否偕妻外出赴任时气氛相当活跃，然而，提及讨伐野蛮民族入侵行省的军团长人选时，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议员们经过漫长讨论，个个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居然还是把责任推给了提比略。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提出严禁偕妻赴任议案的此位议员，也即前低地日耳曼军团军团长凯奇纳，随后因驻地变更，追随日耳曼尼库斯前往东方，目睹了日耳曼尼库斯妻子阿格里皮娜与皮索之妻的矛盾。从日耳曼尼库斯之妻阿格里皮娜爱出风头的个性来看，这位议员提出这项法案也是有据可循。而站在提比略角度出发，日耳曼尼库斯之妻阿格里皮娜不论在家里还是公共场合，都是造成提比略精神压力的最大原因。

公元27年，在时年68岁的提比略心中埋藏多年的想法终于变成了现实，他离开了首都罗马，那不勒斯湾的卡普里岛成为了他最后的归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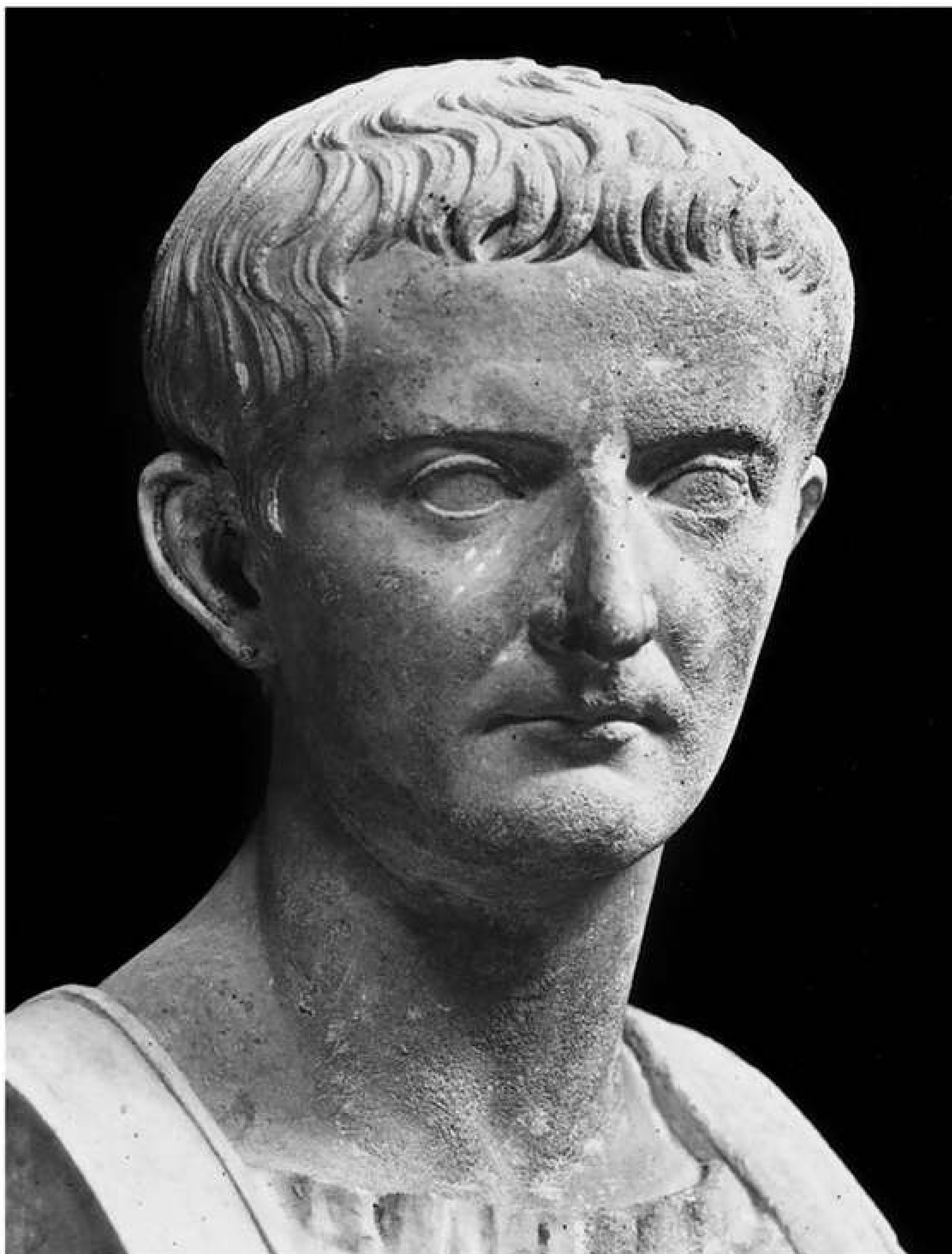
隐居卡普里岛

想必那在350米高处的悬崖上依山而建的巨大储水槽，当时应该是做好精心的准备才动工的，因此才得以完好地保存到今天。大理石之类的所有材料，都从那不勒斯运出，途经30公里的海路。

提比略虽然远离世俗隐居卡普里岛，当然这并非是隐退（退居二线、甘于淡泊），也不是退位（放弃当下的权力地位）。在小岛上，提比略依然统治着帝国。我哭笑不得想说，这应该是“离家出走”吧。

如果把提比略的这一行为也叫做“离家出走”，那么他是有“前科”的。从提比略36岁起的7年之内，他一度抛下地位和家庭，隐居到罗得岛。然而，那时奥古斯都当政，提比略是真的隐退，也可以称之为退休。今非昔比，事隔33年后的第二次“离家”，他根本就不能对帝国的事

业撒手不管。即便是日耳曼尼库斯的两名遗孤有了治理罗马帝国的能力，毕竟他们不过才20岁、19岁，都还稚嫩。另外，他本人似乎也没打算退位。6年前，提比略离开罗马，住到那不勒斯近郊，那段时间他一直遥控指挥。其间，他确立了收集各地情报和畅通无阻的传递系统，与元老院以书信往来商议国政，虽然这种方法前后延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对帝国的统治小有成效。提比略或许因此而信心十足，认为这种模式可以持续更久。我不禁想，或许正因为有了这份自信，即使只是短暂的停留，他仍然在岛上兴建了设施齐全的宅邸，以便他舍弃氛围诡异的家庭，抛开无心政事的元老院，在卡普里岛逍遥自在。



提比略

历史学家塔西佗批评提比略的第一条，就说他道貌岸然，是个伪君子。我的观点却不尽相同，塔西佗所指的伪善，只是在字典上的解释——看起来慈眉善目，背地里做尽坏事；然而，我总觉得提比略是个不会掩饰、直言不讳的人。提比略这种始终表里如一的个性有时候不见得是好事，反而会让事情变成僵局。

不管恺撒如何独断专行，但他一直都是住在位于喧闹的罗马广场的大祭司宅邸。奥古斯都的居住之所略微安静，然而距离罗马广场的元老院并不远，从山上的皇宫出发，不用5分钟就可到达。

罗马上流社会的女性，以及元老院议员的素质，并没有从两位先皇时代的让人叹服突然变成提比略时代的良莠不齐。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会反省自身、改正不足之处。对于这一点，恺撒和奥古斯都非常了解，所以没有奢望太多。

下定决心隐居卡普里岛的提比略也许有这样的想法，只要能切实促进帝国的统治，维持帝国正常运转，在何地、如何进行，并没有区别。可是，这不是政治家的思维，而是官僚的思考方式。

“伪善”的英文“Hypocrisy”与意大利语的词语“Ipocrisia”，其实它们的词源都是希腊语。只是，在此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得更清楚，把希腊语写成拉丁文的话，就是“Hypokrisia”一词。

换言之，这个词是古希腊人创造的，他们造词时想到的，不只是日语字典所说的虚有其表的善行。古希腊人把伪善分为上等与下等，日语字典解释的伪善，只是下等。

古希腊人观念中的上等伪善，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假仁假义”。希腊的哲学家们甚至认为，这种伪善对政治家而言，是必要的手段。它不是必要的恶，只是具有积极意义层面的“恶”罢了。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古希腊的政治家中，仅仅只有伯里克利贯彻了这种说法——表面上佯装民主政治，实际上独裁30年。如果在这方面他堪称希腊的表率的话，那么在共和制的外衣下把控政局40年的奥古斯都可以算是罗马的代表了。更有意思的是，从2500年前至今的古代政治家中，他们获得的评价远远高于其他人。人们只要觉得自己握有主权就心满意足，不太在意实际操作，只有情况不妙时才会想起行使主权。

无上下之别，行事无法违心，这就是提比略的缺点。希腊语中，“伪善”来自舞台上演员的演技。换言之，伪善就是一种表演。讲得更通俗一点，就是装模作样。无论公事还是私事，没有人比提比略的演技更加拙劣。他这种个性最戏剧化的表现，就是隐居卡普里岛。也正因如此，在西欧，由于长期受到塔西佗对提比略苛刻指责的影响，直到1600年以后，才有另一位历史学家沃特站出来为提比略辩护，后来又有蒙森等多位研究罗马史的权威挺身为他翻案。然而，他们也一致认为，隐居卡普里岛是提比略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失误。所谓政治，就是在官僚式思考中，认为不可能的“技巧”。大家不妨想象美国总统隐居到联邦领海内的某个小岛，幕后统治美国联邦、甚至全世界的情景，首先站出来抗议的肯定是媒体。即使塔西佗等历史学家不是大众传媒，但他们相当于当时的媒体。

塔西佗特别讨厌提比略这一点，因为他隐居卡普里岛时，既没有告诉家人，也没有通知元老院，只说他要出席设在先皇奥古斯都驾崩之地诺拉的神殿祭典，然后就离开了首都罗马。谁也没有想到，提比略这一去，居然10年都没有回到罗马。

要是不把提比略的举动看成“退休”，只当做“离家出走”，就不难理解提比略的这种做法，打算离家出走，有谁会弄得天下皆知呢？

不明就里的元老院议员和罗马公民们都认为，提比略在神殿祭典结束后没有回到罗马，是打算在气候宜人的卡普里岛稍作休养。他们丝毫不认为提比略放弃了治理的责任，并且时局也不允许他这么做。而且，

对不坐镇首都罗马就无法治理罗马帝国，他们也深信不疑。

至少议员们清楚，要统治帝国，必须收集情报，最佳的情报集散地，就是号称“世界之都”的罗马。然而，他们并不了解，情报收集的重要性不是绝对的速度，而是抢得先机截获情报，早一步进行分析作出判断，然后更早一步下达命令。收集情报应该考虑获得情报的速度，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即使利用奥古斯都时代设置的政府邮政系统——在高速公路化的罗马街道上快马加鞭相继传递，从边境传来的消息要到达首都至少需要10天。海路虽然容易受到风向影响，如若顺风顺水的话，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到那不勒斯湾的军港米塞诺，也要9天时间。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随时可以收集情报，然而处理对策滞后的情况亦不在少数。究其原因，在于掌握情报的人没有真正领会其价值，进而迅速采取措施，使之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所以，理论上，只要确立通畅的收集情报和传递命令的系统，并使之有效运转，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处理情报，物尽其用。

实际上，提比略在隐居卡普里岛之后就发生了两件大事，他迅速而又精准的反应不得不让人交口称赞。

从罗马沿萨拉里亚大道北上10公里左右，有个叫做佩特洛的小镇，这里曾经发生了一起导致5000人死伤的惨剧。起因是小镇上举行角斗比赛，木结构的观众席轰然坍塌，这次比赛的原先设想在于赢利，并不是为选举活动造势。比赛场地只可以容纳1万人，结果硬生生地挤进去了2万多人。提比略不喜角斗比赛因而不再赞助，此类比赛少了许多；政府高官的选举也从公民大会变成元老院议员相互选举，不以选举为目的的比赛又有减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0年时间。暌违10年，佩特洛小镇举行角斗比赛自然吸引了无数百姓，对比赛素来怀有极大热情的百姓们自然把场地围得水泄不通。塔西佗说死伤者达5万人之多，然而中世纪手抄本数字误写的极多，减掉一个零更接近事实。更何况，从佩特洛小镇的规模来看，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地方建一个可以容纳5万人以上的庞

大的圆形角斗场。最佳容纳人数应在1万人左右。除了容纳人数超出场地极限之外，主办方吝啬建设经费也是观众席坍塌的原因。

提比略得知后立即下令，动员首都和邻近村镇的所有医师前往佩特洛治疗伤员。同时，要求佩特洛以及邻近所有村镇的普通家庭收留伤员，决定由国库承担死者的丧葬费用。提比略致信元老院，要求通过如下决议，换言之，要元老院立法施行。

一、拥有40万塞斯特斯以上财产者，方可举行角斗比赛。

二、观众席可木制，然而地基必须彻底修整，否则，不可搭建观众席。

佩特洛角斗比赛的主办人被判处流放并立即执行，才使得这件事画上句号。

在这次事故还没有被淡忘时，位于罗马“七丘山”之一的西里欧山却被付之一炬。由于当时山上几乎没有公共建筑，所以遭此大难的都是民居。提比略知道后立刻发放救济金，首都的居民们也纷纷效仿皇帝伸出援手，使灾民得以早日重建家园。这次重建活动并没有对灾民实施免税，因为灾民是拥有公民权的罗马市民，他们原本就不用缴纳直接税。幸好提比略反应迅速，指责他不在首都的声浪也趋于平静。元老院甚至决定，要感谢提比略对灾区采取迅速准确的措施。

然而，不论救灾活动处理得多么及时准确，罗马的公民们也不会因此就觉得满意提比略的表现了。罗马的居民们开始认为，自己被长期在外的提比略舍弃了。至于元老院，议员们除了不满之外，更加认为这是提比略的侮辱。因为提比略送来书信只是要求他们同意，这只能说明元老院权威不再。提比略这么做，是因为他已经厌倦以“第一公民”的身份来统治帝国，他决定要做个名副其实的皇帝。不仅要像奥古斯都一样成为实质性的皇帝，凌驾于公民和元老院之上，还要坐实皇帝的“名分”。

并且，即使远离首都仍然可以治理国家，治理得越得心应手，越能证明元老院可有可无。体会到自己无用武之地，真是世上最憋屈的事儿。于是，百姓和元老院的议员们都有了自己的理由，对提比略的评价越来越差。无论是谁，都会认为耳提面命好过被遥控操纵。然而，年逾古稀的提比略似乎毫不在乎人心向背，更何况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轻易受舆论摆布的人。

为了使得卡普里岛的生活与罗马一样，岛上除了必要的仆从之外，和提比略一起隐居的只有不到10位朋友。其中并没有任何女子或以情人或者朋友之妻的身份随行。元老院议员也只有一名。这群身份不一的随行人员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通晓提比略所喜好的天文学和希腊学，然而没有人可以和他商议政治或军事，没人可以给他提供建设性意见。他们就像是远离公事，在周末的乡村里围坐桌前，惬意享受。在这些人当中，有人在提比略隐退罗得岛时就随侍在侧，他们可以算是提比略为数不多的朋友了。

卡普里岛以东的悬崖上有座别墅，如果您曾经从南方的海面上举目远眺，脑海中也许会浮现罗得岛中部林都斯悬崖上的神殿吧。一望无际的蔚蓝海面上，纯白的大理石神殿点缀其间，可以说这座神殿集中体现了希腊人的审美意识。然而，无论罗得岛上的神殿，还是卡普里岛上的皇帝行宫，今天都只留下了残存的遗迹，我们只能在脑海中描摹原状，想象它们曾经的壮丽。在我脑海里提比略在罗得岛生活了7年，或许他也想在卡普里岛上找到当时的感觉吧。罗得岛的神殿供奉神祇，卡普里岛的行宫则是皇帝的起居之所。提比略虽然极力排斥可能被神化的事情，几近走火入魔，然而选择舒适的居住环境，则另当别论。游林都斯的希腊神殿时，我觉得能住在这里挺不错。每次造访卡普里岛上的皇帝行宫时，也会浮现同样的想法。提比略此人，即使离家出走，选择目的地也是眼光独到。遍览地中海众多岛屿，提到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景致令人心旷神怡，罗得岛和卡普里岛都是名列前茅的绝佳选择。此外，提比略并不需要忍受乡村生活的不便。因为卡普里岛上的房间布置得尽

善尽美，他完全可以享受媲美罗马皇宫的舒适生活。



卡普里岛的乔伊斯别墅

当我把上面的内容告诉一个意大利人时，他问我，提比略是否想做神呢？我明确地回答他，不是。神殿是祈求神佑的场所，并非沐浴或按摩之类放松身体的地方，也非畅饮美酒、大啖美食的享乐之所。对信奉多神教的古人而言，个中差别显而易见。然而，有意思的是，希腊人喜欢在风景迷人的地方建神殿，罗马人则偏好在风光明媚之处修别墅，让难逃一死的凡人尽情享受俗世的快乐。提比略尽管痴迷希腊学，但他骨子里仍是罗马做派。

在游览林都斯卫城遗址之时，我骑在驴背上，走过撒满碎石的蜿蜒曲折的乡间小路，摇摇晃晃，尝尽颠簸。我不禁好奇，提比略是靠什么往返于卡普里岛的？农民才会骑毛驴，上流社会的罗马人不好此道。难道是坐在轿子里，让强壮的奴隶抬轿往返？提比略隐居后并非一味困守

卡普里岛，他还是会时常出岛游览周围景致，然而始终没有返回首都。卡普里岛虽然气候温暖，当寒冬到来的时候，依然会让人感到寒风刺骨。

在我思考这些细节之际，恰好看到一本相关著作，是特奥多尔·蒙森写的《罗马行省，从恺撒到戴克里先》（Die Provinzen von Caesar bis Diocletian）。书中记载，在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第一个获得优胜的罗马人，正是提比略。按公元纪年的话，当时是公元1年，时值第19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会四年一次）。每一届运动会都会记录各项比赛的优胜者，书中记录的名字是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这是提比略成为奥古斯都养子之前使用的原名。并且，提比略于同年隐居罗得岛。罗马方面没有任何史书，那么他一定是以隐居的私人身份参赛。他参加的项目是四匹马拉的战车比赛，跟电影《宾虚》中唯一震撼的场景相同。这件事发生在提比略41岁时的夏天。

假如情况属实，那么对他身形高大、胸膛宽厚、体格健壮匀称、目光犀利、视力超群、鲜少生病的评价，很可能是确有其事。罗马人一般用冷水或热水兑饮葡萄酒，据说提比略是直接饮用，并且每次要喝很多。这可能得益于他体力过人、身体强健吧，更何况罗马人素来喜好饮酒。有条小路可以从码头通往海拔300米悬崖上的行宫，不过这条乡间小道碎石遍地，雨天就无法通行。提比略不会放任不管，即使蜿蜒曲折，他一定会把整条路铺好。当然，年逾古稀的提比略，仅仅凭借双腿上山下山也不无可能。要是我也穿上跑鞋的话，这对于我也同样不是个问题。

虽然提比略保证可以住得舒适，又能享受知性的谈话，作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他毕竟跟普通人不同，是一个公众式的人物。要彻底解决公务，需要很多“左右手”。然而，这些“左右手”都有一个缺点，这些人在有着出类拔萃才华的同时，也有超出常人的野心和欲望。此外，随着要他们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要，他们能够行使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大。在提

比略隐居卡普里岛后，近卫军长官塞亚努斯就成为他最为倚重的肱股之臣。

塞亚努斯

出身于罗马帝国第二阶层骑士阶级，鲁基乌斯·尤里斯·塞亚努斯其人并非罗马社会的第一阶层“元老院阶级”。定居首都的骑士阶级大多在“经济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罗马帝国中的有钱人；然而，塞亚努斯不在此列，他属于成员多来自意大利各地的骑士阶级，只能算是中等阶层。因为恺撒和奥古斯都持续推行起用骑士阶级的政策，所以塞亚努斯的父亲后来官拜近卫军军团长，而且任职于唯一设在意大利境内的“近卫军团”。公元14年，奥古斯都驾崩，提比略继位，随即提拔塞亚努斯，让他同样成为近卫军军团长官。次年，其父因升任埃及长官前往亚历山大任职，于是提比略命塞亚努斯接任，成为意大利近卫军长官。以34岁之龄担任这一要职，这在罗马可谓是第一例。一个聪明有能力的“左右手”，必须要分析冷静、三缄其口、观察细致。而在这方面，塞亚努斯似乎确实有其常人所不能及之处。

此时，皇室的女主人莉薇娅已是80多岁了，而提比略又没有妻子，所以在他离开罗马后，家族权力自然落到40岁出头的阿格里皮娜手里。然而阿格里皮娜不仅以流着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之血的嫡孙女自居，还认定没有血缘关系的提比略谋权篡位，并且深信提比略指使皮索毒害日耳曼尼库斯。更不幸的是，这个女人并不明白伺机而动的道理。

历史学家塔西佗持这样的观点，出于对媳妇的憎恶，提比略隐居后命令塞亚努斯全力肃清阿格里皮娜一派。不过，大多数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阿格里皮娜和仍旧信奉“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的莱茵河日耳曼军团取得联系，准备发动反对提比略的政变。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在巩固罗马帝国的大目标之下，从提比略重视各司其职的人生哲学来考虑，再

没有比时常就拿奥古斯都的血缘关系来大肆炒作、只知道出风头的女人更令人厌烦的。提比略被奥古斯都强迫，与他的独生女尤利娅结婚，而尤利娅就是阿格里皮娜的母亲。正是因为提比略无法忍受这类女人，才使得两人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

维护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和首都罗马的秩序，是9000名近卫军的任务。从恺撒时代起，来自莱茵河以西日耳曼的日耳曼士兵负责保护皇帝，如今已成定例，所以近卫军团不需要负责皇帝的安全。近卫军团以维护社会公正与秩序为责任，这同今天日本附带机动组的“治安厅”很相似。这个机构的最高负责人，正是塞亚努斯。提比略隐居卡普里岛时，他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坐了12年。或许塞亚努斯在等待转任埃及行省总督——这是骑士阶级出身的官员政治生涯的顶峰，他的父亲已经站在上面。然而，提比略的用人标准，除了实力至上，还有知人善用。他并没有调整塞亚努斯近卫军团的长官职务，而是任命居住在埃及的犹太人担任埃及行省总督。

罗马人毕竟是法治体系的创始人，塞亚努斯可以利用的武器，除了类似机动组的9000名近卫军之外，还有法律。尤其是处罚严厉的叛国罪法与通奸罪法。

叛国罪法从共和制时代就已经制定，此法规定国家是公民的共同体，其立法目的在于对破坏国家安全与秩序的人，严惩不贷。关于这部法律的著名案例，是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审判，当时哲学家西塞罗担任监察官，恺撒负责辩护。进入帝国政权时代，奥古斯都加以修改，并冠上修订者姓名，称为《尤里乌斯叛国罪法》。修订后的法律扩大了适用范围，在原有的“公民共同体的国家”的基础上，增加了意图谋害“公民共同体的国家之长”，即被称为“第一公民”的皇帝者，同样适用。毋庸置疑，公元前44年恺撒遇害一事是修改法律的真正原因。《尤里乌斯叛国罪法》制定以后，意图暗杀皇帝等同于企图破坏国家。这条法律与同样出自奥古斯都之手的通奸罪法成了皇帝一派对付政敌的强大“武器”。

我们不能忘记，罗马是法治国家，要消灭政治上的敌人，主要是利用法律来动手脚。假使一个人被判决有罪，判处叛国罪会被处以死刑，判处通奸罪则是流放到荒芜之地。

既然是奥古斯都制定的法律，在他统治时期自然有案例适用这两条法律。皇帝的独生女和外孙女因通奸罪被判处流放之刑，而当时的执政官穆雷纳意图行刺奥古斯都，被判决为叛国罪而处以死刑。

司法体系中没有设置监察官一职，这是古罗马的司法特点。虽然有辩护人，然而监察官由告发的当事人担任。哲学家西塞罗，在共和制时代以律师身份闻名，他虽然为人辩护，真正让他在法庭万众注目的，是他揭发别人时的兴奋活跃。而且，苏拉担任独裁官之后承认告密者的权利，他规定，只要告密者胜诉就可以获得被判有罪的被告财产的四分之一，这好比是原告给的报酬一样。

对于这一点，我十分赞同塔西佗和他之后的史学家的态度，他们批评这种制度是为了报酬，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告密的重要诱因。然而，只有恺撒完全没有使用这个体制，奥古斯都没有将之废除。提比略曾公开声明，奥古斯都的言行举止都是他的法律，所以他当然也继承了这个体制。他所作的“修改”是，为了防范没有确凿证据而胡乱告密带来的弊端，可以揭发告发者的不法行为。然而，这种做法很容易变成收拾残局，以前著名的西庇阿审判（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就证明了司法容易被当做排除政敌的武器。

显而易见，塞亚努斯有十分适合担任警察性质的工作能力，这也没有辜负提比略对他的赏识。他深知提比略厌恶没有真凭实据就随意告发他人，所以他竭尽全力搜集证据。他最擅长的手段，就是故意设套去寻求证据。他用处处为人着想的态度让对方放松警惕，当他人敞开心扉、吐露心事时，就叫仆从隔墙偷听，然后让这个仆从出庭作证。他还经常让元老院议员们参与检举揭发工作，使得大家对原告的说辞深信不疑。

如此一来，阿格里皮娜周围的人，纷纷因叛国罪或通奸罪而被排挤。罗马上流社会一时间人人自危，甚至对自己的仆从都怀有戒心，惶惶不可终日。

随后，塞亚努斯以提比略驾崩后的皇位继承权为诱饵，成功离间了阿格里皮娜的长子尼禄·恺撒和次子杜路苏斯·恺撒的关系。两个年轻人才20岁出头，思虑不周，只知沉溺于五光十色、浮华奢侈的社交圈，十分容易产生竞争心理从而为人各个击破。

与此同时，提比略在卡普里岛上依旧为了维护帝国安全，殚精竭虑。

在莱茵河下游以东（罗马霸权还未触及）定居的一支日耳曼民族，突然起兵反抗罗马帝国。这些不在罗马控制之下的日耳曼人为何要做出不可以思议的造反行为呢？其实这是提比略针对日耳曼民族的策略之一，同他们形成交易罗马军用皮革的贸易关系。事情发端于商业原因，然而日耳曼人原本就对提比略不得居住在莱茵河东岸带状无人区的规定有诸多不满。低地日耳曼军团出兵镇压，双方展开激战，罗马军队在损失了900名士兵之后才获得了胜利。

然而，提比略根本就没打算改变坚守莱茵河防线的战略，他继续下令，禁止以替这些战死的士兵报仇为名的任何复仇计划，特别是向莱茵河东岸用兵。

驻守莱茵河的士兵中有很多人认为，如果当初提比略让日耳曼尼库斯一直担任莱茵河8个军团的总司令，而不是把他调往东方，那么罗马早就在日耳曼地区彻底称霸了。不过，也有许多研究者观点不同。这个时期，阿格里皮娜与他的大儿子尼禄·恺撒开始拉拢这些官兵。不过，这是身为历史研究者所必备的推理而作出的假设，目前没有史书可以证实这个推测。然而，我们不难想象，被排除在外的阿格里皮娜怒气高涨，憎恶滔天。我们也能理解当时参与战斗的士兵们的愤愤不平，而连

百年之后的塔西佗都指责提比略禁止为900名士兵报仇雪恨的命令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自古以来，相较进攻，防守更容易让人非议，甚至招来指责谩骂。

公元29年，莉薇娅逝世，享年85岁。这件事情仅仅过去一年，而提比略在卡普里岛却已生活快有两年的时间了。

莉薇娅不仅是提比略的生母，而且还是先皇兼其养父奥古斯都的妻子。这一次，罗马公民都认为提比略会返回罗马参加祭奠仪式。因为从公私两个角度而言，提比略作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和莉薇娅的儿子，都理应亲自回罗马负责处理丧事。

然而，提比略让罗马公民失望了，他仍然没有回到罗马，只从卡普里岛致函元老院。信中要求元老院勿违背其母亲的心愿，葬礼从简，尽量减少谥号，不愿莉薇娅被神化。此外，信上还提到应由17岁的盖乌斯在葬礼上宣读悼词。以卡利古拉这个昵称而闻名的盖乌斯是阿格里皮娜的小儿子，是莉薇娅英年早逝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之孙，也就是她的曾孙。

提比略在信函最后写道，由于国事堆积如山，片刻不能释手，故无法出席母亲的葬礼，万望谅解。

确实如此，恺撒与奥古斯都不但没有出席自己母亲的丧礼，甚至母亲临终之时都不在身旁。不过当时事出有因，恺撒正在进行高卢战役，奥古斯都身陷屋大维时代的内乱之中，他们都无法抽身。当时，事关国政的所有重责大任都由提比略负责，然而如今在卡普里岛上安然度日的提比略是不能和恺撒与奥古斯都相提并论的。更何况，从卡普里岛快马加鞭的话只要一天就能到罗马。

然而认真思考的话，不难想象举行葬礼不仅是为了安葬死者，更重要的是安慰生者。所以对沉浸于悲伤中的人而言，出席仪式实在更加让

人痛苦。出于礼貌，仅仅回应别人节哀顺变的宽慰已经让人难受，有时不禁想要大声呐喊，不要管，让自己一个人安静片刻，痛苦得只能熬到仪式结束才会觉得松口气。大概提比略还是会在卡普里岛上，一个人眺望眼前辽阔的蔚蓝大海，独自悼念母亲吧。当然谁都清楚提比略借口国事繁忙这个理由太过牵强，太过苍白。

社会的评价大多是就事论事，通常不会掺入个人的感情。所以，上至元老院议员，下至贩夫走卒，所有人一致认为提比略冷血薄情，连对自己的母亲都不例外。展现自己对母亲的关怀，可以掩盖几乎所有缺点，这是古今内外永远不变的人之常情。提比略不期望别人理解他，他也不想去了解别人。有些研究者认为，要维持帝国的稳定，就必须肃清阿格里皮娜一派，我同意这种说法。然而，如果是我，我可能会把行动延后。虽然提比略在军事方面能力出众，在制定策略方面还是赶不上恺撒和奥古斯都这两位皇帝。

肃清阿格里皮娜派系

依照罗马帝国的习惯，在莉薇娅葬礼之后不久，将会在元老院会场中宣读提比略写给元老院议员们的信函。对于阿格里皮娜与长子尼禄·恺撒企图发动政变一事，提比略只字未提，只说阿格里皮娜对他的敌意难以消除，已经23岁的尼禄·恺撒仍旧放浪形骸，尤其对他喜好男色的癖好嗟叹不已。提比略并非要求元老院审议，这只不过是一封牢骚满腹的信函罢了。

然而，议员们相信无论是谁都明白这封信的真正意图，但大家都一声不吭地聆听着。显而易见，这封信正表明了提比略打算铲除日耳曼尼库斯一家的意图，皇位之争的大戏终于拉开了帷幕。

念完信后，全场一时静默。终于有几位议员打破了沉默，提议以这

封信为议题进行讨论，不过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其中一位持反对意见的议员说，我们都清楚地听到提比略的严厉指责，但他没有要求我们如何行事，不如就此作罢。支持提比略的一位议员提议，今后皇帝会回心转意，此事不如日后再议。对于这种意见，元老院大多数人纷纷赞成，决定改日再议。

罗马的普通民众在得知此事之后，纷纷涌向元老院会场。他们围着议事厅异口同声地说道，批评日耳曼尼库斯的家人并非皇帝提比略的本意，由于近卫军团长官塞亚努斯挑拨离间，才使得身在卡普里岛的皇帝有如此看法。此时罗马平民的愤怒主要是针对塞亚努斯，而不是针对提比略。参加抗议的普通民众，大多数人都抬着阿格里皮娜和尼禄·恺撒的雕像，高喊不许任何人动他俩一根汗毛。这群人聚集在议事厅前寸步不离。

提比略接获报告之后，立即致信元老院。他在信中说道，他将颁布皇帝敕令禁止任何游行示威，并绝不轻饶向元老院施压的暴徒行径。接着又再次批评阿格里皮娜母子，严厉指责元老院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逃避职责，导致皇帝威名受到损害。

在提比略不肯让步的强硬态度面前，民众的示威气势顿时消了下去，元老院也只好开始重新审议。国家重大案件的审判也是元老院的工作之一，所以元老院此时又变成了法院。提比略那位能力超群又忠心耿耿的“左膀右臂”——塞亚努斯，也许在担任陪审团的元老院议员们面前，出示了许多他收集到的证据吧。

在此说“也许”，是因为关于皇帝提比略的史书中最详细的一本——塔西佗所著的《编年史》，其中公元29年中期到31年年末的记载，在中世纪遗失；而塔西佗以外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详细记载这次审判。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想象，由元老院议员组成的监察官陈述指控理由也好，辩护方的反驳也罢，场面一定非常激烈。因为，除了皇帝提比略的殷切盼望之外，查阅其他叛国罪的审判案例，场场都是原被告双方依循法律、

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地热烈辩论。审判皮索花费了很长时间，这次审判阿格里皮娜母子肯定会考虑其他因素。这两个案例有天壤之别，后者在皇帝颁发敕令禁止示威后，元老院再也没有外部压力。而且，提比略一开始就站在原告一边。

公元29年年底，阿格里皮娜母子被判处有罪，母亲阿格里皮娜流放潘达特里亚岛（今文托特内岛），其子尼禄·恺撒流放逢替阿岛（今蓬扎岛）。他们犯的是扰乱国家安全罪，所以都被视为“国家公敌”。阿格里皮娜母子没有被判处死刑，我想是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同日耳曼军团勾结发动政变，阴谋篡国本身就是罪行。在古罗马的审判中，经常围绕图谋及是否采取行动展开激烈争论。曾经，无论是否有叛国行动，都可依叛国罪法判处死刑。在罗马史上著名的喀提林审判过程中，时年37岁的尤里乌斯·恺撒曾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至于西塞罗，他主张意图谋逆也应判处死刑，并且执政官可用手中权力加以制裁。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不可避免地因为这种立场而遭人诟病。我认为，阿格里皮娜母子没有采取具体行动，然而暗中图谋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所以流放是比较恰当的刑罚。因为，正如恺撒在喀提林审判中所主张的，把危险分子一个个与社会隔离，就能把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

普通民众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极度反感。他们虽然没有示威抗议，却对法庭辩论过程并不关心，他们认为提比略讨厌这两个人，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法庭判决。罗马人深信，家庭稳定是保持社会健全的重要构成要素，在他们看来，像公公弹劾媳妇和爷爷弹劾孙子的事情，这实在是让人难以认同的一个案子。

在我看来，提比略本人应该是对这个结果颇为满意的。因为提比略早已命人在母子两人流放的岛屿上布置了相当规模的储水设备，当然，设备肯定比不上卡普里岛上的别墅。文托特内岛，也即阿格里皮娜的祖父奥古斯都曾流放过提比略母亲尤利娅的地方，岛上的储水设备是当时修建的，提比略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加修整、扩建。虽然现在遗址早已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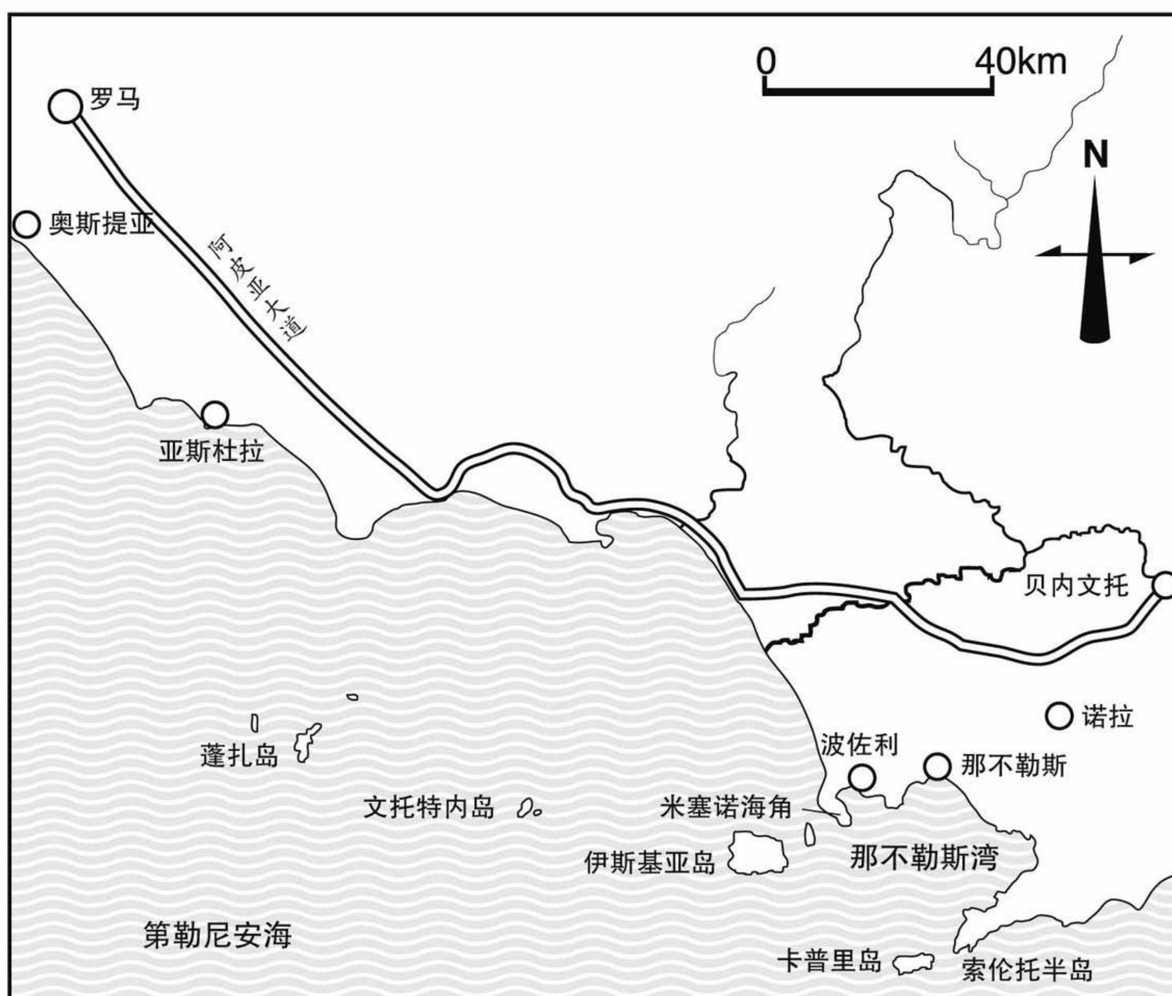
海水淹没，然而设备之完善是唯有罗马人才有的大手笔，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提比略大概心里面这样想，连我都避岛而居了，其他人还有什么好埋怨的？因为，文托特内岛和蓬扎岛都算不上孤零零的岛屿，从南往西北方向，依次是卡普里岛、伊斯基亚岛、文托特内岛和蓬扎岛四座连成一串的岛屿，各岛之间距离30公里左右。即使不用担心生活用水，但四座岛屿的舒适程度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今天，文托特内岛和蓬扎岛紧随卡普里岛和伊斯基亚岛的步伐，致力于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打造观光景点。然而，受正面强劲北风的影响，岛上的饭店没有与时俱进，至今还是青年旅馆，岛上的景观也比较单调，只能吸引单纯喜欢原始意趣的观光客。景观变成绝美胜景，是由于目之所及并非一目了然，让人没有一探究竟的欲望；视线中有了遮掩，层叠掩映自然产生不同的趣味，能使人流连忘返。相反，如果四周只有一望无际的苍茫大海，我们只能说是单纯地接触自然罢了。伊斯基亚岛的温泉久负盛名，可要说起岛上的景致，还是卡普里岛要略胜一筹。那不勒斯湾左接米塞诺海角，右连索伦托半岛，有这两个天然屏障，位于那不勒斯湾的卡普里岛，北风柔和，加之百看不厌的美景，这座小岛2000年来一直是地中海首屈一指的疗养胜地。当我踏上文托特内岛时，认为这里适合静心写作，可是如果要我在文托特内岛和卡普里岛中间二选其一，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卡普里岛。显而易见，主动隐居与被迫流放，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公元30年，在确定流放的阿格里皮娜及长子尼禄·恺撒各自前往流放地之后，塞亚努斯的下一个目标选择了阿格里皮娜的次子杜路苏斯·恺撒。不知是因为交恶的兄长失势落魄而兴高采烈，还是因为年仅22岁容易疏忽大意，塞亚努斯居然可以轻易地利用他的妻子搜集到了证据。根据塞亚努斯到手的证据，当年两名执政官之一，以叛国罪告发杜路苏斯·恺撒。就这样，元老院判决杜路苏斯·恺撒有罪，他也被列为国家公

敌。不同的是，这次既不是死刑，也不是流放到某个岛屿，而是软禁在山上皇宫的一处地下室内。对阿格里皮娜势力的清洗依然持续，然而没有任何人被处以极刑。甚至挑明了反对提比略的阿吉尼斯·葛斯在被判有罪后，也只是把他软禁在执政官的官邸。流放蓬扎岛的尼禄·恺撒也在这一年死掉了。有人认为他是不服从警卫而惨遭毒手，也有人认为他是万念俱灰之后自杀身亡的。



那不勒斯湾与周围的四个岛屿

这一年，塞亚努斯在肃清阿格里皮娜派系的运动中冲锋陷阵，似乎已经权势熏天。次年，即公元31年，他与提比略共同担任执政官。提比略登基后，与他同期担任执政官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因为如果提比略

认为有必要提高他选定的接班人的权威，他就会出任执政官。公元17年的养子日耳曼尼库斯，以及公元21年日耳曼尼库斯亡故后晋升为继承人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提比略都和他们一同担任执政官。事隔9年，塞亚努斯获此殊荣，难怪他会得意忘形。

塞亚努斯的倒台

提比略经常受到历史学家塔西佗的批判，说他的所作所为无可厚非，只是行事过于阴险奸诈。他指的如是提比略收拾塞亚努斯这一事件并没有错，确实手段十分阴险奸诈。

话虽如此，但不用阴险之计，怎么能除掉塞亚努斯呢？对手年届50，正当盛年，并且担任近卫军团长官15年之久，手握精兵，肯定培养了一大批心腹。提比略是包括近卫军团在内的全罗马军队的最高司令官，然而士兵服从的直属上司不是他。同这个掌握9000名精兵15年的人物相比，皇帝虽然是他的上司，身边却只有极少数负责护卫的日耳曼士兵，如果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如果塞亚努斯察觉提比略的动作，那么连防御城池都没有的卡普里岛将毫无招架之力。所以，提比略必须谨慎谋划，准备周全。在我看来，提比略从与塞亚努斯一同出任执政官时起，就意味着已经出招了。

那么，提比略对塞亚努斯委以重任，又如此提拔塞亚努斯，如今却拔刀相向，这是为什么呢？

有研究者给出如下解释：他们认为，提比略竭力撇清他在肃清阿格里皮娜派一事中的关系，他要向罗马社会表明，这次行动完全是塞亚努斯的擅自行为，而自己一直隐居在卡普里岛并被蒙在鼓里。

对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正是由于提比略指责阿格里皮娜母子，元老院才开始审判他们，并且提比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他毫不掩饰自

己对这对母子的不满。在提比略看来，塞亚努斯不过是搜集证据时必要的“左右手”而已。如果提比略一开始就打算在事后装做不知情，何必要出面不断从正面抨击呢？这样做简直愚不可及。

还有一部分研究者持以下论调：提比略频频出手让塞亚努斯惶恐不安，他花钱收买提比略手下的近卫军，甚至消防队的队员，极尽拉拢之能事。

似乎确有其事，然而塞亚努斯是在东窗事发前才收买士兵的。正如塔西佗批评提比略行事阴险一样，他原本就小心谨慎，除去他的接班人塞亚努斯，肯定不是仓促决定。一旦对方惊慌失措，做出一些自掘坟墓的傻事，提比略自然就会借这个机会动手。

很多罗马史专家认为，提比略察觉到塞亚努斯的野心会对自己产生威胁，所以才决定出手。

这样的看法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我认为这只不过是提比略对罗马社会的说辞，他心里应该另有打算。我们难道不能认为，塞亚努斯的野心勃勃与提比略的贵族气质相冲突了吗？

小说《恺撒的事业》（Die Geschafte des Herrn Julius Caesar）的作者贝尔托·布莱希特对恺撒有过这样的描述：“尤里乌斯·恺撒是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面对元老院议员们时，他会用议员们乐于接受的语言，而当对象是士兵们时，他就选择士兵们容易理解的说法。也许面对女性，他的措辞也会因人而异吧。”然而，无论何时，恺撒永远是恺撒。这种评价并非出自历史学家，而是作家特有的观点。只有“永远是自己”，才能真正表现出贵族气质来。提比略同样具备了这种贵族气质，只可惜他天生没有“见人说人话”的“技能”，因为他实在不会演戏。不过，正因为他确信自己无可比拟的优势，出身、成长以至他原有的性格，都让他的这种贵族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具备贵族气质与重视他人实力并知人善用，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一定与“见人说人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起用人才是要让他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帮自己办事，而不是换位思考。换言之，提拔人才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如若那个人因而得到不错的利益，不过是凑巧获得报酬的结果而已。

抱有这种观念的人，是绝对不允许他提拔起来作为“左右手”的人翻身成为“大脑”，进而把自己取而代之的。即使自己可以放低身段平等相处，他也是绝对不会允许以下犯上的事情发生的。

提比略为何会把塞亚努斯放在身边15年呢？大概是因为他确实是个能力不凡又忠心耿耿的“左右手”，然而，提比略肯定不曾想过把塞亚努斯作为接班人来培养，而塞亚努斯肯定也不了解提比略的真正盘算。

在5年前，塞亚努斯就露出了不满足于“左右手”的第一个征兆。当时，塞亚努斯请求仍在罗马的提比略，恳请同意他与两年前逝世的杜路苏斯的遗孀莉薇娅结婚。莉薇娅是日耳曼尼库斯之妹，相当于提比略的侄女，同时她又是提比略亲生儿子之妻，所以是亲上加亲的皇族女子。如果提比略同意塞亚努斯娶莉薇娅为妻，就意味着塞亚努斯正式加入了皇室。

对于塞亚努斯的这个请求，提比略不置可否，这种含糊的态度让塞亚努斯满怀希望。我想公元25年，提比略可能已经在考虑隐居卡普里岛。要在卡普里岛的皇帝行宫的大岩石上开凿一个庞大的储水槽，短时间内不可能完成，所以如果要在卡普里岛隐居一两年，在岛上统治帝国的话，首都的治安必须委托给可靠之人。更何况，当时肃清阿格里皮娜派系的计策已经基本成型，而塞亚努斯正是提比略用人之际的不二人选。

提比略于公元27年隐居卡普里岛，并利用塞亚努斯，于公元29年、30年成功肃清阿格里皮娜势力。至此，塞亚努斯已经没多大用处了。而

一个人的利用价值降低，他的野心就显得十分有威胁了。

塞亚努斯的不幸正是自以为能够体会提比略的心意，并成功肃清了阿格里皮娜一派的势力，为此拼尽全力的自己一定更受提比略赏识，以为自己会接着受到重用。更何况，提比略还亲自担任执政官，为自己首次担任执政官保驾护航。因此塞亚努斯深信，在提比略之后，他肯定会成为不可取代的罗马帝国皇帝接班人。

然而，提比略让塞亚努斯产生了错觉，使其认为与莉薇娅的婚事已经就在眼前了。正是这种皇室成员的幻想，使得55岁的塞亚努斯一失足成千古恨。

公元31年1月1日伊始，塞亚努斯正式开始了他的执政官工作，此时他干劲十足。不过，同样身为执政官的提比略仍旧闭岛不出，所以塞亚努斯是首都罗马最高掌权者。此外，他手握9000名精兵，身兼近卫军团长官一职。就连从共和制时代开始只有出身名门才能在元老院有一席之地的议员们，对塞亚努斯这个“新摄政”也是无计可施，这些议员们都冷眼看着他干劲十足地去摄政。然而塞亚努斯却不守本分，他越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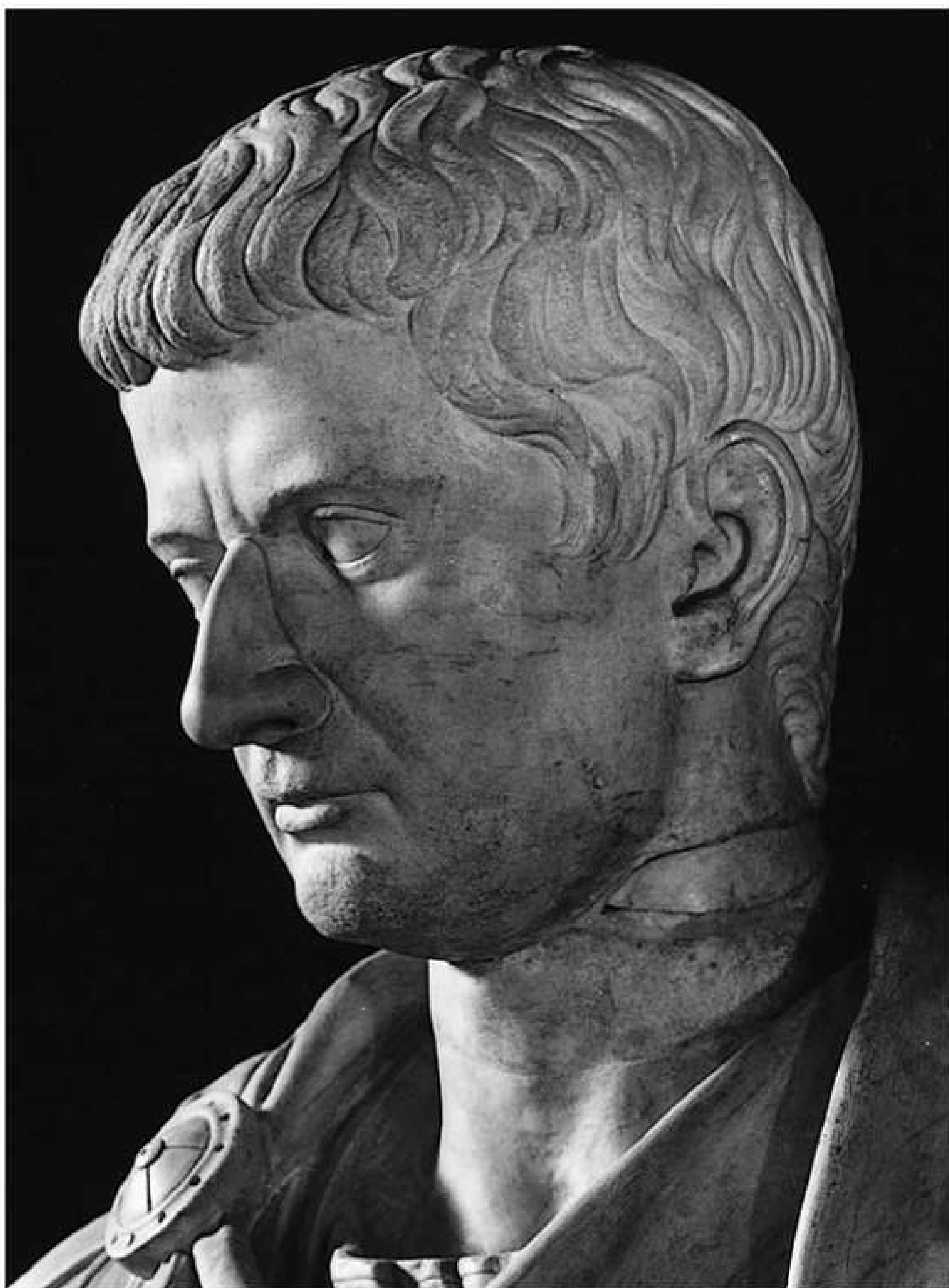
塞亚努斯身为执政官，居然亲自检举西班牙行省的总督路奇乌斯·亚伦提乌斯。理由在于路奇乌斯滥用总督职权，从事不法行为。他之所以这么做，大概是因为他意识到提比略从不轻饶在行省执政官员的不法行为。然而，提比略亲自反驳了塞亚努斯的这项指控。

在按惯例从卡普里岛送到元老院的信函中，提比略陈述了如下理由：尊重行省人民委托他人指控总督的权利，然而检举任期中的官员可能妨碍治理行省。所以，应在总督卸任回到罗马之后才会追究责任。也许提比略考虑到不检举任期内的官员应上升到治理帝国的政策，所以他额外要求元老院将这个建议通过，并加以立法。

对塞亚努斯的行径心怀不满的议员为数不少，加之提比略的建议又

言之有理，以压倒性的票数迅速通过了不检举任期中的官员的法律。这使得塞亚努斯的不安第一次涌上心头。

即便如此，塞亚努斯作为现任执政官的地位并没有立刻动摇。进入帝国政权时期，皇帝是整个帝国的最高负责人，而执政官是首都罗马与意大利的最高负责人，并与同作为行省最高负责人的总督地位差不多。按照惯例，元老院管辖的元老院行省总督，应由有执政官经验的人担任。所以，刚完成的禁止检举任期中的总督法对此同样适用。换言之，塞亚努斯大可不必担心自己在执政官任期内遇到此类的“反击”。然而，如若借用英国某位研究者的形容词“terrible”（可怕），即拉丁文的“terribilis”，72岁高龄的提比略真是名副其实这个词语的注脚。提比略在为期一年的执政官任期刚刚过去一半的时候，于1月1日辞去了执政官一职。



永远“可怕”的提比略

古罗马的惯例是两名执政官共同进退。

随着提比略宣布辞职，塞亚努斯不得不紧步其后尘。公元31年下半年，继任的两位执政官是“候补执政官”。

这样一来，塞亚努斯开始惊慌失措了。似乎从此刻开始，塞亚努斯同任职于行省的自己人互通消息，也开始用钱收买近卫军团的士兵和消防军们。这种类似垂死挣扎的动作，都被事无巨细地报告给远在卡普里岛的提比略。不过，塞亚努斯那时还是近卫军团长官。他毕竟掌握着战力不俗的9000人的精锐部队，万一大事不妙，他随时可能会一声令下包围卡普里岛。

另一方面，提比略在卡普里岛上密令卡利古拉到岛上见驾，如有必要，会释放那位被囚禁在皇宫地下室的杜路苏斯·恺撒。提比略出此下策自然不是因为担心阿格里皮娜两个儿子的安危，他只是为了防范塞亚努斯借着日耳曼尼库斯遗孤的名号，掀起政变，毕竟日耳曼尼库斯至今在罗马社会依然拥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另外，他还秘密解除塞亚努斯近卫军团长官的职务，重新任命马克罗前往首都罗马主持大局。

10月17日夜，马克罗秘密返回首都罗马，在来到位于罗马东北部的近卫军团营区之后，他立即将9个大队长全部召集起来，然后拿出提比略的委任状，宣布即刻起由他接管近卫军团总司令一职。接下来，马克罗拜访了一位名叫雷古拉斯的执政官，亲手递交了封存完好的提比略信函，并传达提比略的口谕——在明天早上的元老院会议上宣读信函。随后，马克罗去见塞亚努斯。他先告诉塞亚努斯，自己已经被任命为新的近卫军团长官，仿佛是为了避免塞亚努斯产生任何疑心，马克罗接着又告诉他另一个消息。他说，明天，在执政官宣读的信件中，提比略将请求元老院授予塞亚努斯护民官特权。塞亚努斯喜不自胜，他忘了深究自己被免除近卫军团长官一职意味着什么。

依据元老院的规定无故缺席会被处以罚款。第二天，即10月18日，

为了免受财产损失议员们纷纷出席，议员们一边腹议，这次肯定又是例行公事地宣读提比略的书信，然后投票表决，应当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一边陆续进场。议事厅中没有安排固定座位，通常是先到者先坐。然而，大家每次都会心照不宣地留出最前排的座位。前排的座位是长者或能力超群的议员们的专座，即使这些议员姗姗来迟，也没人敢去坐。这天塞亚努斯却认为自己也理所当然地应坐在最前排。

会议在两名执政官进场之后随即开始。在不疾不徐地拆开昨夜收到的提比略信件之后，雷古拉斯执政官开始当众宣读起来。

虽然塔西佗的《编年史》从中世纪流传至今，但是让人惋惜的是他的书中关于这一时期的内容不幸失传。也因此使得我们无从得知提比略书信的内容。塔西佗素以厌恶提比略闻名，然而对自己作为历史学家、作家的专业水准相当自负。用自己独树一帜的文字表达好恶，是业余爱好者的习惯，不合专业人士的作风。历史学家记述史实，通常会在其后附加注释或评语，向读者传递自己的看法。至于专业作家，历来避免发表个人评论，只是陈述历史事件，就能让读者体会到书中人物是否伟大或渺小。塔西佗对这两种方法运用自如，所以他被人们公认为帝国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对同一个史实，我经常会产生和塔西佗截然相反的看法，然而这不妨碍我阅读他所作的批注或记载的史实。因为，他比任何人都要尊重历史，忠实于历史，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传达史实。换言之，我相信他的专业功底，才是我信任他著作的原因。他的著作中有尤里乌斯·恺撒的亲笔文章，或者把他从碑文上摘取的史实重点和其他史学家进行比较，其中的差异一目了然。塔西佗写的是彻头彻尾的“摘要”，然而其他史学家，尤其是狄奥·卡西乌斯，完全变成了发表自己观点的著作。所以他笔下的罗马历史人物，说话口气都是一个模式，给后世的研究者在区分人物、了解人物性格时带来不小困难。甚至尤里乌斯·恺撒的语言也有失简洁明快，就好像是一个50岁老头在喋喋不休，实在大煞风景。

塔西佗不是这样，在研读他的著作时，要时刻牢记他非常善用上述两种方法，否则就会轻易地被他的文字叙述牵引着，从而忘了自己的初衷。我也一直认为，自从伏尔泰开始，近现代屡次出现为提比略翻案的事件，并不是找到了比塔西佗的记载更可信的历史记录，而是大家把他的作品读通、读熟、读透了才产生的想法。

在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虽然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也只好将就现有的材料。所以，关于公元31年10月18日在元老院会场宣读的提比略书信，我只能借用其他史学家的观点。通过这些解释，我们很清楚，当天提比略的长篇大论，根本目的就是让塞亚努斯垮台，堪称“传世之作”。

提比略在这封书信中首先提及七零八碎的国政琐事，接着强调维护帝国安全的重要性，突然话题一转，罗马帝国处在危机之中，信函在这里陡然变换了语气。提比略在信中说道，如果此时回到罗马，仅靠现有的护卫并不安全，希望元老院派一位执政官来随侍保护。因为执政官有权指挥近卫军团，所以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朝堂危急，需要动用近卫军团以防不测。议员们原本以为信函内容是老生常谈，一听到这话，立刻竖起了耳朵仔细聆听。当提比略严词质问支持塞亚努斯派的两位议员时，议员们才开始集体转变态度。紧接着提比略不留情面地指责塞亚努斯罪不可赦，犀利的言辞朝所有议员铺天盖地而来。塞亚努斯不仅阴谋颠覆国家，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他的罪名是叛国罪。这件事情由皇帝亲自揭发，一一列举的证据就是指控理由。信函的最后，提比略要求元老院立即将塞亚努斯就地正法。

塞亚努斯对事态的急转直下大惊失色，这种结局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好一会儿都没有回过神来。元老院的绝大多数议员十分厌恶塞亚努斯，趁塞亚努斯还在怔愣的空隙里，迅速通过了对他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决议。执政官叫到被定罪的塞亚努斯时，他茫然若失，没有任何回应，念了三次名字才反应过来。

当天，塞亚努斯被押解到罗马广场的牢房内，随即就被执行死刑。罗马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欢呼雀跃。塞亚努斯曾经因修复庞培剧场有功而在剧场一角为其立像，民众把这座塑像抬出来，敲得粉碎。民众对塞亚努斯的类似密探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罗马人朝着塞亚努斯的尸体发泄怒气，并将其碎尸后扔进台伯河中喂鱼。近卫军们没有人敢为前任长官出头求情，全都在这段时间内闭营不出。在一周之内，包括其长子在内的塞亚努斯派势力，就以同党的罪名受到牵连并处以极刑。

对于提比略而言，一切都进展得相当顺利，在整个过程中也没有发生无谓的流血事件。然而，祸福难测，让他痛不欲生的折磨也由此开始。

在塞亚努斯提出要与莉薇娅结婚之后，就与其结发妻子亚比卡塔离异了。然而，亚比卡塔在得知儿子也受到牵连后，绝望地选择了自杀。本来事情到此结束，她却给提比略写了一封信，并送到了卡普里岛。正是这封信，引发了后面一连串变故。

亚比卡塔在信中提到，早在提比略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尚未离世之时，她的前夫塞亚努斯和杜路苏斯的妻子莉薇娅已经暗通款曲。8年前正是这对奸夫淫妇密谋毒杀，才导致了杜路苏斯的英年早逝。在信中她甚至详细描述了下毒手法。此外，这两个人会起意杀人，不只是为了除去两人天长地久的障碍，还有一点，虽然杜路苏斯并没有察觉妻子出轨，但对塞亚努斯怀有莫名的敌意，这使得塞亚努斯十分惶恐。对于这封信中所述的内容，提比略倒也能够略有记忆，因为杜路苏斯经常当面抗议他重用塞亚努斯一事。

72岁的提比略没有像往常一样在这一年冬季离开卡普里岛，回到温暖的意大利本土南方度过寒冬。他在岛上一待就是9个月，甚至不许执政官前来探望。他一整个冬天没有踏出卡普里岛一步。

对于提比略的统治才能，现代的研究者赞誉极高，他们这样写道：

提比略在成功消灭塞亚努斯之后，有着非常好的时机重返罗马，再次统率帝国开创盛世。甚至塔西佗也认为提比略统治的前10年是毋庸置疑的好时期，此后的7年好坏参半，最后6年就是暴政。从公元31年处死塞亚努斯到公元37年驾崩正是这最后6年时间。后面我们再讨论这6年的统治是否如塔西佗所说的那么不堪。然而在普通民众看来，让庞大的罗马帝国精巧地运作都是一些表面功夫，并不会让他们感到骄傲，而真正的领袖在于唯有一直带领他们不断向前。如果提比略在乎舆论和后世的评价，那么公元31年年底的确是他返回罗马的良机。如果他顺应民意回到罗马，他就不用背负统治后期施政不仁的骂名了。

然而，提比略并没有回到罗马。公元31年年底，我们都认为是重返罗马的绝佳时机，提比略沉寂了两个月后，和元老院以信函往来又恢复了原来的方式。虽然方式相同，但有些东西已经变了。提比略不再压抑自己的愤怒，甚至可以说是“不管不顾”了。不过，他的“不管不顾”并不是对帝国不理不睬，而是只针对元老院阶级。显而易见，人如果能预见结局，就不会轻易破罐子破摔。

提比略在审判皮索时，曾经极力避免让父亲的罪责波及后代，甚至数年后还让皮索的一个儿子担任执政官。可是，现在这样的提比略早就不复存在了。塞亚努斯有三个孩子，长子已经被处决，剩下的两个孩子中有个年幼懵懂的小女孩，也被皇帝下令杀害了。被怀疑和塞亚努斯有奸情，并与之共谋毒杀亲夫的莉薇娅也被迫自杀。然而，铲除塞亚努斯全家并不能平息提比略的怒气。被认为属于塞亚努斯派系的议员们在劫难逃，据说就连他们家中的奴隶们也被下狱。塔西佗写道：逐一记录这次事件中一连串受害者的姓名时，虽然难受得几欲呕吐，但又不能不把这些事实记载下来。这些事件使得指导整个罗马社会的元老院都陷入了恐惧之中。

被塔西佗等史学家们定义为“暴君恐怖时代”中的历次审判，假如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觉一个特别的情景。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提比略

的怒气冲天并不是恐怖时代形成的唯一原因，惶惶不可终日的议员们也使得这种恐惧心理不断地蔓延开来。毕竟，叛国罪的审判要在元老院进行，涉案的被告和原告都是元老院的议员。发展到最后，执政官都彼此反目成仇，仿佛是先下手为强，要在被指控之前先把别人拉下马。我们可以把古罗马时代的这项叛国罪法比做日本的《破坏活动防治法》（即《破防法》），人们凭借这个法律来指控而演变成先发制人的手段，这时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司法问题，而就好像雪球越滚越大。提比略对此的态度简直判若两人，在以前，他会积极介入，要求执法必须做到勿枉勿纵；现在，刑罚是否忠实执行他毫不关心。结果，有犯人一入监牢就杳无音信。提比略采取不管不顾态度的一年后，流放到文托特内岛的阿格里皮娜和囚禁在帕拉蒂尼山皇宫的次子杜路苏斯·恺撒相继去世。这难道不是警卫士兵被提比略的漠不关心影响所致的例子吗？

在记录提比略造成的死难者名单时，虽然塔西佗说他光是写名字就觉得心里十分难受，然而还是有其他研究者心平气和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根据一位名叫奇亚切里（Ciaceri）的意大利研究者的研究资料记载，提比略统治时期有63人因叛国罪而受到审判，这些人还包括塞亚努斯掌权时代的审判人数，不仅仅是发生在“六年暴政”时期的人数。更何况塔西佗连正常死亡的人都算进去，也没有区分死因到底是处死还是自杀。在这些人中，选择自杀的人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被告后身陷绝望，为了保护财产和家人只好自寻短见；而另一种则是体力衰弱，自知时日无多，选择了自杀。人在体力、智力、精神等方面都衰竭之后通常会苦苦挣扎以求长寿，但罗马领导阶层对年老体衰后的苟延残喘厌恶至极，历史上他们选择绝食等死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西塞罗的挚友阿提库斯，以及随提比略隐居卡普里岛的元老院议员涅尔瓦，都选择绝食而死。

关于63人这个数目是多是少，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恺撒从未使用过叛国罪法，奥古斯都统治40年也不过两三个案例。如此说来，提比略时期达到63例的确坐实了恐怖时代之名。然而，恺撒与元老院矛盾

激化时，暂且算做战争，杀人无数；奥古斯都正值恺撒遇刺后的内乱纷争，他把以西塞罗为首的300名元老院议员以及2000名骑士阶级成员划入布鲁图派彻底清洗，换言之，奥古斯都在内乱中屠杀了罗马社会第一、第二阶级的2300人，而在这些人中未经审判即被就地处决的有130人，免于一死的人也难逃家产全部充公的命运。总而言之，恺撒是迫不得已才这样痛下杀手，而奥古斯都则是吸取恺撒的教训自我防范过度，在肃清反对派之后，他们对罗马人的“慈悲”精神才最终让他们声名鹊起。

然而，考虑到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不同之后，问题就不再是数量的多寡了。话虽如此，公元32年以后，提比略不再执著于指控的证据是否真实可靠。议员们以为他送来的书信中会犀利地指出模糊不清的控诉理由，没想到就连那些根本不构成指控理由的“理由”，他都不再关心，完全放任自流。

不难想象，提比略造成“恐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想利用这次机会清除元老院的害群之马。阅读辩护的文章之后，63名被处死的人中，只有寥寥几个让人觉得杀了可惜。剩下的绝大多数人，不得不让人赞同提比略的感叹，元老院议员的素质低得让人叹息。元老院议员一共600名，即使在通过选举选贤任能的今天，真正担得起贤能之名者有多少？在人才选拔方面，难以兼顾数量和质量，这是古今内外不变的现实情况。不过，不能仅凭这一点就为提比略开脱罪责，因为奥古斯都实现对罗马帝国的统治，正是通过对这600名议员的怀柔政策才得以实现的。

不管是不是他“不管不顾”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是他刻意肃清元老院中的害群之马，但实际上牺牲的是元老院阶级的成员。罗马普通民众对提比略同样是满腹怒气。

虽然罗马普通民众既没有被处以极刑，也没有被没收家产，然而，在提比略20年紧缩财政的政策之下，大多数人感到经济十分不景气，而且这种日子仍在继续。罗马帝国根本没有增加新的建设，只对公共建筑

进行了一般的修缮整理。奥古斯都时代数次发放的皇帝赏金，现在已经好久没听说过了。此外，皇帝不仅不再赞助民众最喜欢的角斗比赛等各种活动，还禁止别人主办，百姓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享受过此类娱乐。此外，如果提比略仍然在罗马指挥着罗马帝国的话，那当然是不能对他进行任何指责的，提比略却远在风景秀丽、温暖舒适的卡普里岛，独自享受舒适悠闲的生活。此外，提比略居然以叛国罪的名义，冥顽不灵地妄图粉碎建国以来象征罗马传统与权威的元老院。当时的罗马人对提比略的看法十分糟糕。

如果此时蛮族入侵罗马帝国边境，或者与势力强大的东方国家帕提亚突然爆发战争，抑或众多行省中有那么几个揭竿而起反抗罗马帝国，那么罗马人的注意力肯定会转移到这些“新闻”上，哪还有空对老皇帝的日常言行说三道四呢？提比略从登基以来就通过稳固的政策和从不间断的监督，使罗马人在往后的20年内，都不用担心会发生这种“大事”，这得归功于提比略把帝国治理得太好了。然而，人们总是追求“新闻”。如果没有“大事”，那么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聊胜于无。毕竟，天下太平，就连作为主食的小麦也没出现过不足的情况。提比略统治的23年间，只有一次因粮食不足引发骚乱。因小麦价格暴涨使得罗马公民民怨爆发，最后演变为对政府的抗议示威。在闻讯后，提比略从卡普里岛发来指示，小麦毫无理由涨价，因为他清楚地记载了小麦的库存量。在提比略的打压下，抗议小麦价格高涨的活动也烟消云散。说明白点，提比略统治后期怨声载道，是因为他之前一直殚精竭虑施行德政，还有比这更有讽刺意义的事吗？

流言蜚语

被白色高墙围绕的行宫耸立在卡普里岛的断崖上，里面住着一位上了年纪的最高当权者，这怎么会不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去猜测他的日常生活呢？提比略在隐居卡普里岛的10年间，从未在罗马的任何公共场合出

现。与奥古斯都不同，提比略也不会去参加岛上居民的祭典。卡普里岛水源稀少，所以提比略不但在行宫安装了储存雨水的蓄水槽，农民也可以使用这个便利。可是，即使农民们一直在使用这个蓄水槽，但与替他们修建蓄水槽的皇帝却从未谋面。他们知道皇帝是否还在岛上的唯一途径，就是看码头是否停有御用的快艇。

提比略即使离开卡普里岛返回本土，他的御辇四周仍是挂着布幔，也不允许别人靠近问候。能够见到提比略的人大多是前往异地上任的总督或皇帝的财务官，此外能觐见皇帝的人寥寥无几。提比略坚持贯彻知人善任的原则，所以因职务而觐见皇帝的人的任期自然就延长，所以因职务而觐见皇帝的人也自然就更少了。至于每年交替的元老院行省总督，因为元老院掌握人事权，他们不需要面见皇帝领受任务。换言之，了解提比略生活起居的人越来越少。越是在神秘的面纱后遮遮掩掩，越会令人无端猜测，让人的想象愈加漫无边际。

理智的塔西佗只记载了“提比略强行将少年们带回岛上，猥亵之”，可是另一位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对此类“传闻”兴致勃勃，事无巨细全部记录在案。根据这些记载，提比略在卡普里岛犯了以下恶事：

第一，嗜酒。希腊人和罗马人通常都会用水或温水兑饮葡萄酒，在他们看来，喝纯酒可以算得上酒量好。当然，提比略喝下的酒自然不少。

第二，发明下流猥亵的性游戏。提比略把从各地搜罗到的少男少女按男女搭配，每一组有一位此道高人从旁调教，然后三个人在提比略面前表演。提比略要求分组表演，是因为各组要求以不同的体位性交。苏维托尼乌斯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刺激提比略已经衰退的性欲。

第三，提比略发明了新花样——在7000平方米的官邸用地内，让打扮成牧神或精灵的少男少女们藏在各个森林或洞穴里，提比略只要到了他们面前，他们就要给提比略表演性交。虽然总面积7000平方米是确有

其事，可是其中尽是林木，根本不见森林和洞穴。

第四，提比略特意挑选出幼小的少年男女，称他们“小鱼儿”，他惬意地躺在宽敞的罗马式浴缸内，让“小鱼儿”们在他大腿间穿行，享受“小鱼儿”们的舌头和牙齿触碰他性器官的快感。记载中还说提比略老而弥坚，性欲旺盛。甚至在一次给众神献祭的祭典中，他看中一个帮忙的美貌奴隶，等不及仪式结束就带她到别的房间颠鸾倒凤。

时至今日，那不勒斯当地居民依然深信所谓的“提比略传闻”。他们说，当年这些惨遭提比略蹂躏的受害者，任务完成后都会被无情地从300米高的悬崖上投进大海，没留一个活口。

现代的历史研究者对于这些“恶行”大多是付之一笑。论及提比略的古代历史学家一共10位，其中有2位希腊人和2位犹太人。我们暂且不说支持提比略的罗马人帕特库鲁斯和犹太人斐洛，老普林尼和塞内加虽然也记载了提比略性格孤僻，然而都没有说他品行不端。希腊人普鲁塔克也曾提到他在卡普里岛的孤独生活，但他同样没有说提比略道德败坏。犹太人弗拉维奥·约瑟夫亦然。罗马的讽刺作家尤维纳利斯虽然嘲笑老皇帝在岛上和占星师们浑噩度日，但也没有提到他在性生活方面的丑恶趣味。在提比略驾崩30多年后出生的苏维托尼乌斯，是唯一一位在提比略百年之后对他这些事详细记载的史学家。对于这些流言，塔西佗寥寥数语带过，此后的狄奥·卡西乌斯的记录略微详细，但与苏维托尼乌斯相比却望尘莫及。更何况，苏维托尼乌斯所著的《罗马皇帝传》也和今天的色情杂志大同小异。

据说，喜欢和“小鱼儿”们共浴的还有年迈的奥古斯都，这不由得使人产生一种想法：这种性行为是古罗马男人梦寐以求的美事。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在别人身上可以完成，这是人之常情。提比略的被现代人视为“禁欲”的生活方式，难道不是适得其反，更加刺激了民众的幻想吗？

金融危机

74岁高龄的提比略在最高当权者必不可少的冷静方面仍然出类拔萃。他对公元33年罗马金融危机的出色处理，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年，在已经转变成同室操戈的元老院中，有人指控某议员放高利贷牟取暴利，这是金融危机的前兆。指控的理由不是该议员违反了法定年利率最高上限12%的规定，而是因为他违背了《尤里乌斯·恺撒法》。所有金融业者都必须将资金的一定比例用于意大利本土融资，这就是《尤里乌斯·恺撒法》。我们不清楚所谓的“一定比例”到底是多少，然而恺撒是首位开疆拓土、选拔人才的开创者，当时可能是出于若就此放任自流会导致国内金融空洞化的考量，所以他制定了这部法律。毕竟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尽管本土的利率上限为12%，行省却无限制，有议员就效仿布鲁图，收取48%的利息。面对12%与48%的利率差距，别说布鲁图，其他人肯定也会转移资金。恺撒制定这部法律，就是希望在这种情况可以控制时加以引导使之规范。

并非是因为罗马的金融业者遵纪守法，才使得《尤里乌斯·恺撒法》能够通行至今。金钱遵循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即使向行省融资的收益高也肯定伴随着较高的风险。相反，本土内的融资收益低也使得这种风险随之降低。

罗马帝国维持了60年的“和平”，对行省融资的风险自然有所降低。“风险”降低，“收益”却没有缩水。最后，导致《尤里乌斯·恺撒法》形同虚设，也没有人遵守将资金按“一定比例”用于意大利本土融资的规定。所以属于富裕阶层的元老院议员中，暗地里操控金融业的有很多。

然而，形同虚设，并不意味着废止了这部法律，所以违反《尤里乌斯·恺撒法》，同样可以作为检举的理由。元老院闹翻了，因为一旦开庭审议，绝大多数议员都会被问罪。

接到元老院请求后，提比略当机立断，以一年半为限，要求众人自行调整资产以符合“一定比例”的规定。

罗马帝国的金融业者开始四处奔走催讨债务，他们同时也中断新的融资申请，以适应“一定比例”的规定。如此一来，出现货币供给不足的现象，大概因为行省有很多大规模农庄，才使得意大利本土的债务人受到的冲击比行省大得多。而本土由于恺撒制定了《农地法》，中小规模的农庄居多。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的往往是中小企业，而非大企业，这也使原本日渐下跌的本土土地价格更是一落千丈。为了偿还债务，地主纷纷售地变现，随着地价滑落，破产者不断出现。至此，金融市场已经面临全面危机，只有依仗国家出面力挽狂澜。

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按今天的说法，必须得“投入公共资金”。为此，提比略决定从罗马帝国的国库中，划拨出1亿塞斯特斯投入金融市场。不过，“公共资金”不是通过金融业者直接投入。提比略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不经过金融业者，而是直接由“公”的委员会借给“私”的债务人。这种由“公”至“私”的融资为期3年，无息。然而，债务人须以价值2倍于债务的不动产作为担保，抵押给债权人——国家。

公元33年的金融危机在提比略的政策实施之下，暂时得到了缓解。不知是否已经能够满足“一定比例”的规定，抑或是担心失去低风险的融资对象，金融业者们不停地再度融资。

提比略这样的政策其实治标不治本。塔西佗把原因归结于法律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起初严格遵守执行，后来渐渐地丢在一边。但是我认为，金融业的影响源于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部分学者的说法是，本土内的利率通常在5%左右，然后根据风险变化适当调整；行省的利率控制在10%到15%之间。这样一算，罗马本土与行省之间的确存在2到3倍的利率差。至于对行省融资，由于罗马人自己实现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行省的融资风险充其量算中等水平，虽不及本土低，但也不算高风险。低风险低收益和中等风险高收益孰优孰劣，这一点谁都

明白。罗马的金融业者遵循的也是“金钱”规律，只要达到“一定比例”的要求，就会把多余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向欧洲或非洲。正因为他们这样的做法，才使得行省得到了发展，从根本上维护了罗马帝国的“和平”。其实，公元33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并不是本土经济“空洞化”的前兆，应该说是本土与行省的“平等化”。进一步而言，就是本土与行省利率差距缩小的前兆。我有理由认为，罗马帝国主义与后来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最大的不同之处，正是罗马帝国本土公民与行省人民，尤其是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平等化”。

时隔17年，东方问题在金融危机刚结束时随即爆发，当然这也需要提比略亲自出马处理。公元18年，在罗马帝国的大力援助之下，阿尔塔什斯在继任亚美尼亚皇位之后，励精图治，使得亚美尼亚王国国泰民安。然而，随着亚美尼亚国王的驾崩，帕提亚再度插手亚美尼亚事务，造成问题日益复杂化。帕提亚希望从王族中选择亚美尼亚新王，摆脱罗马帝国对亚美尼亚的掌控。

帕提亚人认为在卡普里岛深居简出的提比略已经垂垂老矣，应该没有精力再介入东方事务。然而，他们错了，即使76岁，提比略依旧雄风不减当年。

知悉帕提亚的举动，提比略即刻派遣维特里乌斯前往东方。亚美尼亚是罗马帝国的东方屏障，提比略根本不想把亚美尼亚王国拱手让给帕提亚。提比略推选原本被送来作为人质、后来在罗马长大的梯里达底作为亚美尼亚新王的人选。维特里乌斯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新王登基时不能够与帕提亚开战。维特里乌斯奉命出任叙利亚行省总督，此外跟17年前的日耳曼尼库斯一样，他也被授予整个东方地区的最高指挥权。

此时的维特里乌斯也是提比略善用人才的一个典型。驻守叙利亚的4个军团原地不动，提比略只是冷眼旁观帕提亚等东方各君主专制国家彼此短兵相接，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成功地让梯里达底登上皇位。

和亚美尼亚建立友好关系是提比略最大的希望，因为亚美尼亚是东方君主国家中唯一可以牵制势力强大的帕提亚的国家。亚美尼亚不用向罗马帝国纳税，也不需提供兵源。罗马帝国对亚美尼亚的政策就是新王必须站在罗马帝国一边。

维特里乌斯在完成使命后，立即启程前往叙利亚行省总督官邸所在地安条克。此时，他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免除担任犹太长官10年的本丢·彼拉多的职务，并将其送回意大利。彼拉多并非是因为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被遣送回国受审，而是因为身为犹太地区长官却玩忽职守，就罗马行政官的立场而言，理应被检举。也许犹太人社会中与耶稣基督有关的动乱，都是彼拉多恶政导致的。提比略包容其他民族的任何信仰，然而不能容忍因此造成社会不安。总而言之，本丢·彼拉多不是因为一个名叫基督的年轻木匠之死而被指控，而是以玩忽职守的行政官身份受审。

公元36年，罗马帝国“七丘山”之一的阿文庭山发生火灾，大角斗场观众席下的一家店铺是起火点，这一年也是在彼拉多被召回国的同一年。这座可容纳15万人的角斗场有三层观众席，当时只有一楼是石材结构，上面两层是木结构，是由尤里乌斯·恺撒重建的。石材结构的下方各种店铺挤满了前来大角斗场观看演出的观众。

火势从一家店铺蔓延，不仅把并排的店铺烧个精光，大角斗场的木造部分都被波及，大火在当时北风的吹动下，肆虐到了阿文庭山。古罗马人一般会购置两套住房，闹市的居所无法满足宁静的要求，阿文庭山自然是首选，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阿文庭山属于幽静的高级住宅区。所以，比其他山丘离市区更远的阿文庭山，除了共和制时代遗留的几座神殿以外，都是住宅区。因此，除了大角斗场和神殿等公共建筑之外，受此次火灾波及的还有民居。

提比略对这次火灾的处理同样迅速彻底。他立即拨出100万塞斯特斯作为救助金，并成立由5名元老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灾情调查

与灾后重建的协商和执行。除了1名是执政官任命的之外，提比略任命了5名议员中的4名。提比略任命的4个人，分别是3年前被流放至文托特内岛后过世的阿格里皮娜的3名女婿，以及杜路苏斯的女婿，即提比略的孙女婿。换言之，委员会成员中有4位皇族。这个安排，对于首都公民和元老院而言，是难得出于政治考虑而作出的人事安排，使得他们暂时忘记了“提比略抛弃了我们”的观点。这对历来自信满满无视舆论的提比略而言，此时此刻也应该是心力交瘁了吧。

最后的日子

我们在史书中寻找提比略身心俱疲的征兆，其实可以从他冷静彻底地肃清塞亚努斯后不久的公元32年看出。

公元32年，元老院以叛国罪互相倾轧，彼此争斗得不亦乐乎。恰逢此时，身为提比略友人之一的议员科塔被告发，罪名是他在用餐时以提比略及其家人作为谈资。其实科塔很冤枉，他只是说了几句实话，根本算不上批评就被认为此举有损提比略的威名，真是让他百口莫辩。为此，提比略从卡普里岛寄来书信，内容如下：

> 议员诸君，如果我早知欲针对何事如何下笔，抑或明了今日落笔之内容，那么，即使诸神降下我连日来已品尝之痛不欲生之苦痛，我也甘之如饴。

接着，提比略介绍了他与科塔的多年友谊，盛赞科塔对罗马帝国所作的贡献，然后，以下面这句话结尾：“进食之闲谈成检举之证词，让人不胜唏嘘。”

然而，这封书信的开头部分被塔西佗解读成：“提比略本人是自作自受”，“他的罪行以及犯罪事实带来的深重罪恶感，让他不得不自我坦

白”。

对此，我有不同的理解。我不认为提比略受困于深重的罪恶感，而是元老院的素质低得出乎意料，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这就是罗马帝国的领导阶层，他对此深表绝望。餐桌上无意义的话题居然被当做叛国罪的证据，面对这样的元老院，即使不是提比略，任何人都不知道“针对何事如何下笔，抑或今日落笔之内容”。总之，对手越愚蠢，要传达什么、如何传达，都会变得难上加难。

独自背负所有责任的人的自我怜悯，甚至会偶尔流露出“连日来已品尝之痛不欲生之苦痛”这样的感叹，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怨自怜呢？感叹为什么一切都得由自己一人承担，这是凡事都得靠自己单打独斗的人偶尔会陷入的情绪低谷。只要能摆脱这种暂时的低迷心理，这个人又会以差不多忘记自怨自怜的能量，重新振作，“单打独斗”。实际上，即使提比略在众人面前坦露心迹，一吐为快，当次年遭遇金融危机、再下一年起历时两年解决东方问题，以及之后的灾害处理，他依然继续单打独斗。

提比略曾经以辛辣无比的言辞戳得人体无完肤，他至死也不会流露出丝毫绝望或脆弱之情。然而，提比略已经身心俱疲，此时的他真的老了。

公元36年到37年的冬季，在凛冽刺骨的西北风中，77岁高龄的提比略离开了卡普里岛，来到那不勒斯湾以西的米塞诺海角上的别墅过冬。在此地过冬，不但可以免受寒冷的北风和西北风的袭扰，还能从正面远眺到维苏威火山，那真是一个美不胜收的地方。这座别墅由共和制末年的一位杰出将军鲁库卢斯建成，当然，他以奢侈生活、吃遍天下美食闻名于罗马，然而，最后此地却成了提比略的私有财产。虽然今天摆在我们眼前的只有遗迹，不难想象这座别墅反映出鲁库卢斯的贵族品位，一定是座美丽漂亮的海边别墅。提比略似乎对这座别墅情有独钟，经常到此过冬。

公元36年到37年这一年的冬季并不寻常，77岁的皇帝已经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提比略有生之年不曾生病，也没有遵循医嘱，随心所欲活到古稀之年，如今，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已经筋疲力尽，无力继续支撑。提比略凭借强烈的责任感来治理庞大的罗马帝国，他肯定明白权力顺利交接的重要性。有三个人具备接替提比略成为第三任皇帝的资格，按长幼依次是：45岁的克劳狄乌斯、24岁的卡利古拉，以及提比略的年仅16岁的嫡孙葛梅鲁斯。

提比略首先排除年纪适合的克劳狄乌斯，这事出有因。克劳狄乌斯虽然是提比略的亲侄子，然而提比略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时，克劳狄乌斯的哥哥日耳曼尼库斯以提比略养子的身份成为尤里乌斯家族的一员，所以克劳狄乌斯成了提比略本家克劳狄乌斯家族的现任家长。如果让他成为皇位继承人，就违背了先皇奥古斯都的遗志——唯尤里乌斯家族的男性可继任为皇帝。正因为自己出自克劳狄乌斯家族，所以要在家族内挑选继承者，这不是提比略的风格。

归根结底，提比略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他的接班人，不是奥古斯都预定接替他的日耳曼尼库斯仅剩的遗孤卡利古拉，就是以他的嫡孙的身份加入尤里乌斯家族的葛梅鲁斯。

提比略于公元37年3月16日驾崩。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学家塔西佗说提比略的死法很符合“可怕的提比略”的死亡方式——他因枕头窒息而死；然而，提比略驾崩时才10多岁的博物学家普林尼，在提比略百年之后却认为提比略死于衰老，我也认为他是自然死亡。提比略终年77岁零4个月。

罗马帝国是由恺撒绘制蓝图、奥古斯都打下框架、提比略奠定基石，不论塔西佗等共和制拥护者如何批判提比略，都不能改变上述事实。

此外，还有研究者批评提比略没有施行任何新政。在我看来，提比

略没有施行新政非常重要。因为，奥古斯都一手架构的完美帝王政治体系，如果继承者的做法稍有差池，肯定会因一时的改革而前功尽弃。但是，提比略继承了奥古斯都的遗志，为巩固奥古斯都所架构的体制专心致志，殚精竭虑，所以之后无论由谁执掌天下，罗马帝国的基石已经坚如磐石了。

虽然有默默无闻的努力，但是提比略还是很难获得民众的称颂。此外，也没人能够为他性格上的缺陷进行辩护。而且，罗马人经常会以政治上的不当言行，彰显出提比略这些性格上的缺点。在得知提比略驾崩后，罗马人举国欢庆，他们纷纷涌上街头，高喊："把提比略扔进台伯河！"

幸好，有人在提比略驾崩不久便对他的政绩给予了正确评价。可惜的是，提比略在罗马公民或元老院的议员之中缺少这种"朋友"。这个人是埃及行省首都亚历山大的居民、一个没有罗马公民权的犹太人——斐洛。他才思敏捷、学识渊博，被称为"犹太的柏拉图"，此外，他还是亚历山大城中犹太人社会的代表。欲知这位犹太领袖如何评价提比略，我们只能借助他的著作了解一二：

> 皇帝提比略驾鹤西归后，盖乌斯（通称卡利古拉）继承了一个疆域宽广的庞大帝国，幅员之辽阔几乎囊括全世界所有的陆地与海洋。整个帝国公正立法，严正执法，如今，无论大小的"争斗"已是过眼云烟。帝国各处，无论东西南北，陆地海洋，都和谐地统一于罗马帝国的名义下。帝国之内，蒙昧之民和开化民族和睦相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平等共事，为了维持彼此祈求的和平，人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
> 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让人赞不绝口。在人们累积的财富之中，黄金和白银是货币也是工艺品，随处可见。遍及整个帝国的通商网络，让财富与物产的交流更加频繁。帝国军力强盛，编制了完备的步兵、骑兵和海军。帝国之境，皆可安居。因此，整个帝国是

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帝国疆域从幼发拉底河绵延至莱茵河，日出日落之地似乎也在其中。

这一切殊荣，并非只有住在罗马的公民有权享受，欧洲之民、亚洲之民亦可，换言之，帝国全体居民都可享受。当然，第一个继承这样繁盛帝国的幸运帝王，是盖乌斯。不管是个人或是帝国规模，也不论财富、权力或繁荣的基础，一应俱全，无须再造。幸福就在门外，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开门迎接。

提比略曾以犹太人可能造成社会不安为由，将他们暂时从意大利本土驱逐了出去。如若他在天之灵知道自己死后竟然有一位犹太人给予他如此美誉，不知他将作何感想？

近现代历史研究者不断对提比略进行重新评价，当然，这应该归功于考古学的发展，而不是因为历经1800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转变。过去我们只能根据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还原历史，现在可以参考罗马帝国各地发掘出来的众多碑文和其他历史数据，使得我们的著作更加接近真实。其中，以德国人特有的严谨贯彻始终的，就是以历史著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蒙森。他评价提比略是“罗马最优秀的帝王之一”。

谨以此文——“皇帝提比略”，献给1996年逝世的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先生。高坂先生在世时曾说，罗马皇帝之中，他尤其对提比略心有戚戚焉。在我询问理由之前，高坂先生就已与世长辞，然而，在如今我写完提比略后，似乎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第二章

皇帝卡利古拉

(37年3月18日—41年1月24日在位)

年轻的新皇帝

罗马帝国上上下下，特别是意大利本土和首都罗马的居民们，都欢欣鼓舞地迎接提比略的驾崩和卡利古拉的登基，仿佛是漫长严冬后春天造访一般。一位24岁零7个月的英俊潇洒的年轻人继承了77岁老皇帝的皇位。仅此一项，就足以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然而，民众的喜悦不只如此。

首先，对于应由神君奥古斯都的血亲继承皇位深信不疑的人而言，目睹父母都与奥古斯都有着血缘关系的卡利古拉登基，总算等到了“大政归还”的一天，夙愿得尝。

其次，素来与皇帝对立的元老院，也非常赞成卡利古拉继承皇位。在议员们的印象中，卡利古拉的父亲日耳曼尼库斯一贯亲近元老院，他们也认为卡利古拉应该不会效仿提比略，恣意妄为地寄封信来要求元老院同意，根本无视元老院权威的存在。况且，卡利古拉乳臭未干，根基尚浅，有利于元老院把持朝政。

普通民众自然双手赞成，他们心里根深蒂固的“日耳曼尼库斯神话”似乎成为现实，获得圆满结局，自然喜之不尽。更何况，提比略禁止角斗比赛之类的财政紧缩政策让他们压抑太久，迫切想要品尝快乐的滋味。

至于罗马帝国的士兵，尤其是驻守莱茵河防线的8个军团，他们把卡利古拉继位看做自己人生的喜事，欢喜之情溢于言表。毕竟新皇的童

年是在军营和他们一同度过，带给他们无数欢笑。他们看着小小的孩子蹒跚学步，给他做小巧的“卡力加”（罗马军靴），陪他嬉戏玩耍，所以，士兵们都不叫他的本名盖乌斯，而是亲昵地称他“卡利古拉”（小军靴）。当时，总司令日耳曼尼库斯育有三子，年纪最小的卡利古拉被士兵们视为吉祥物。如今，卡利古拉成为他们的新皇，众望所归。所以，卡利古拉登基时，并没有发生类似提比略登基之初士兵要求改善待遇的抗议事件。这种暴动通常发生在有弱点的对手身上。提比略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与奥古斯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然而，在这方面卡利古拉大可高枕无忧。

公元37年，从来没有任何一位皇帝像卡利古拉一样，在万民的拥戴之下登上了罗马帝国的皇位。换言之，没有人能在毫无敌意、举国欢庆的情况下手握天下大权。并且，民众们对新皇帝的祝福，是发自心底的最诚挚的祝福。

通常在两种情况下人们会思变求新：一种是希望摆脱危机，另一种只是单纯地想要一些新鲜的改变，没有什么特别的迫切需要。在前者，发出期盼的人既不幸福也不富足，而后者幸福而富裕。民众对卡利古拉的态度就是后者。正如犹太人斐洛所写：“幸福就在门外，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开门迎接。”

在提比略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卡利古拉被奉为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的继位也象征着罗马帝国将继续享受盛世繁华，几乎所有人都对此信心满满，其中也有历史学家斐洛。

公元37年3月16日，提比略于那不勒斯以西的米塞诺与世长辞。

3月17日，皇帝驾崩的消息传遍罗马。

3月18日，元老院迅速通过决议，将所有权力尽数授予卡利古拉。此时，议员们甚至连护送提比略遗体回到罗马的卡利古拉的影子都还没

见到。

3月28日，提比略的遗体抵达罗马。在阿皮亚大道恭候多时的两名执政官的陪同下，护送遗体的卡利古拉前往元老院。议事厅中，除了仍在行省工作未归的议员之外，其余所有议员都在等候这位差5个月满25岁的年轻人。他们告诉卡利古拉，元老院已于10日前决定授予他统治帝国的一切权力。我们知道，要成为罗马皇帝，必须同时获得元老院和公民的认可。这一天，元老院对他正式“承认”。卡利古拉进入首都时，民众们热情的欢呼声和抛来的鲜花，就是他们“认可”的最佳证明。

卡利古拉从元老院获得了以下的统治权力：

“第一公民”——这一称号并不是罗马公民“第一人”的正式称号，但它是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能支配行省人民的罗马公民权所有者中的“第一人”。虽然这一称号并不太过张扬，但这也只不过是奥古斯都根据以公民平等理念为基础的共和制时代的传统、充分发挥他处心积虑的一个缩影。与这种罗马特殊政情没有关系的行省人民不会使用“第一公民”的称号，经常是用演变成“皇帝”别称的“恺撒”来称谓最高统治者。

“皇帝”——罗马士兵们钦佩指挥官能力的一种称呼，后来，在恺撒时代结束后就专指罗马最高司令官。意即，卡利古拉获得罗马最高军事指挥权。

“护民官特权”——这意味着皇帝管理军权，而护民官就管理行政权。这项权力能够进行政策立案，即使遭到元老院的否决，护民官也可以行使否决权否定元老院的决议。

概括而言，只因为卡利古拉身上流着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的血，元老院就把罗马帝国象征性的尊称、最高军事指挥权以及最高行政权都授予这位未满25岁的年轻人，即，全权委托他治理庞大的帝国。

在5个月后卡利古拉25岁生日之时，元老院甚至决议再送他一个礼物——“国父”的尊贵称号。

尤里乌斯·恺撒在55岁遇害前数月才获此殊荣。

奥古斯都在他统治帝国30载后、61岁时才获封“国父”。

提比略统治时期曾3次获赠此尊称，然而都被他婉拒了。

卡利古拉在25岁生日当天获得这个称号，他竟然坦然受之。其实，“国父”这个称号不是元老院随便授予的，必须由民众请愿，元老院受理后通过决议才能赠与某人。这又一次证明了举国上下对卡利古拉的一致拥戴。

在极短的时间内，卡利古拉就获得元老院与民众的全力支持，手握大权，荣誉等身。即使他对统治帝国不甚了解，仅从他在提比略统治后期的所见所闻也应该完全明白什么样的统治会激起民众的不满情绪。

在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的前提下，卡利古拉却被无数的大权与荣耀包围着。卡利古拉在元老院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宣布他将采取与提比略截然相反的治理方式。议员和市民们对此十分赞成。卡利古拉辩才无碍，口若悬河，演说内容让聆听之人对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满怀憧憬。这位年轻的皇帝许下了如下承诺：

一、所有因政治理由被放逐国外者，允许回国。

二、全面废除了通称为“告密”的情报制度，对今后有此行为者定严惩不贷。

然而，大家都沉浸在喜悦中，没有人注意到罗马帝国各地向皇帝送呈报告的情报收集系统随之全面瘫痪这个弊端。接下来是卡利古拉“施政方针演说”的其他条文：

三、提比略把每年作为罗马中央政府要职的执政官、法务官、财务监察官、按察官的选举放到元老院，但今后仍然移交给公民大会决定。

仅在意大利，有投票权者就逾500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直接选举，早就名存实亡。因此，卡利古拉的这个承诺，名义上是尊重拥有投票权者，实际上没有任何政治考量。如果议员互选自然不需要选举活动，如果在公民大会中选举，选举活动就无可避免。所谓的选举活动，比如款待拥有投票权者，或者免费提供角斗比赛争取选票等等。参选者一想到这些竞选经费，立刻愁眉苦脸，然而无心参选的普通民众对此类活动自是欢迎之至，兴致勃勃。

四、废除了备受批评的税收制度。

无论是什么税收都会有人不满，卡利古拉以妨碍经济活动为由，宣布废止1%的营业税。这项税收是奥古斯都为了筹措防御经费而设置的，即使后来面对巨大的减税废税声浪，提比略也没有让步。卡利古拉的废止宣言中，对替代财源只字未提，大概他根本没想到这一方面。

五、在提比略时期以散播反社会言论被放逐国外的作家，允许他们回国并出版发行他们的作品。

然而，缺乏历史书籍考证当时涉及的作家与他们的作品。

六、被提比略流放的演员，允许他们回国。

提比略素来不喜“观众”之间因冲突而引发的混乱，所以他以此为由，把有名的演员赶出本土。

七、卡利古拉作为“第一公民”常住罗马，并出席元老院所有会议。

上至元老院讲议员，下到黎民百姓，大家都对此宣言好评如潮。先皇提比略令人想之生厌，现在已经被民众彻底遗忘。他的遗体回到罗马

5天后，就被火化安葬在奥古斯都陵，当时没有人像刚得知提比略驾崩时一般，破口大骂：“把提比略扔进台伯河喂鱼！”和提比略孤独的人生终点相呼应，国葬如晴朗阴冷的冬日一般悄无声息、毫无延误地结束了。这表明民众对他已经漠不关心。

除了分配给民众及士兵们的遗赠金部分外，提比略其余的遗嘱都被置若罔闻。不是卡利古拉，而是元老院对此视而不见。提比略留下遗嘱，皇位由卡利古拉与提比略嫡孙葛梅鲁斯平等继承，然而元老院改成卡利古拉一人；反而是卡利古拉把没有获得皇位继承权的葛梅鲁斯收为养子。收为养子，言下之意就是继承皇位的第一人选。元老院想尽办法来遗忘提比略，一面倒地支持卡利古拉也是对他们极度厌恶的提比略的反抗，当然，卡利古拉对这一点也是一清二楚的。

皇帝也好，国王也罢，按照我们的思维模式都应经过加冕才能登上皇位。然而，罗马皇帝没有加冕这一仪式。奥古斯都开创了有罗马特色的帝国政权，在这种体制之下，皇帝表面上只是“第一公民”，没有与普通民众严格区别的“皇冠”。把罗马皇帝当做是“无冕之王”就好理解了。出现在货币上的皇帝侧面头像，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无冕之王”的姿态。

话说回来，罗马皇帝与其他国家经过加冕仪式正式登基的国王或君主相比，他们手中的权威和权力更大。然而，把皇帝头上空无一物地刻成雕像或铸在货币上也不太美观。罗马的货币不仅在罗马帝国境内流通无阻，还是信用度极高的国际货币，就连帝国周边的野蛮民族也奉为重宝。所以，罗马皇帝经常是头戴用月桂树枝或橡树枝编制的月桂冠或市民冠出现在货币上。无论皇帝的“冠”是用真的树枝编的，还是黄金做的，它的样子说是“皇冠”，不如说是树叶装饰的缎带更贴切。因为在男人脖子的位置，这种头冠会在脖颈处用缎带打个结，但这样的装饰也与皇帝威严的形象不符，因此，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后世罗马帝国皇帝对皇冠的外形也进行了改进。然而，不论怎么改变，皇冠在罗马帝国政权

的初期与中期都主要采用缎带式。但是这些“皇冠”不知为何，与他们总是相得益彰。虽然新皇帝没有加冕典礼，但他获得元老院和民众认可之后就开起新的统治，这也符合罗马人一贯讲究合理性的性格。

所以，虽然没有加冕仪式，没有登基大典，甚至卡利古拉连人都不在首都的情况下就成为罗马帝国的新皇帝。从3月18日起，在元老院授权下罗马帝国进入了卡利古拉时代。当卡利古拉结束在元老院的“施政方针演说”与提比略的葬礼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引起一贯重视家族的罗马人的响应。

对于暴风雨将至的消息，这位年轻的新皇帝置之不理，他义无反顾地登上了早已准备在罗马外港奥斯提亚的船只。他在天气骤变的情况下依然下令开船。他此行是要去文托特内岛和蓬扎岛，取回因流放而不幸丧命于此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和兄长尼禄·恺撒的骨灰是他真正的目的。

罗马人以眼泪和狂热欢呼卡利古拉怀抱骨灰坛返回罗马。罗马人的眼泪，是为日耳曼尼库斯客死他乡的妻子与孩子而流；罗马人的狂热，是民众对年轻的统治者不忘亲人产生的共鸣。卡利古拉把两位亲人的骨灰都安葬于奥古斯都陵，接着，他又发行了记述此事的货币。这个举动充分说明了卡利古拉非常清楚他此番作为的政治意义。

卡利古拉能够借此解脱。然而，从提比略这条锁链中获得解脱的，不仅仅是卡利古拉，对于元老院与罗马的公民而言，他们都有同感。当然，这也是解读卡利古拉统治的关键所在。

成长背景

从提比略手中继承罗马帝国的统治之后，卡利古拉不用担心外患，而内忧也早已被消灭在萌芽之中了。此外，虽然在没有提高税率、增设新税的前提之下，罗马帝国的财政体系已整顿得十分完善了，哪怕是除

去必要的开支，在国库中还盈余了2.7亿塞斯特斯。拉丁文中有意为“从锁链中获得解脱”的单词，被称为拉丁语长子的意大利语中也有这个词。然而，一个词通常有几种意思，这个词也有引申义为“恣意妄为”，或“行为肆意”。

从享受自锁链中解脱的自由之后想要为所欲为，从卡利古拉过去的生活经历来看，这一点也在情理之中。虽然卡利古拉只有25岁，然而在他的半生中可谓是遇到许多波折。

公元12年8月31日，即奥古斯都驾崩前两年，罗马以南50公里以外的安提姆（今安齐奥）出生了一个小男孩，他就是卡利古拉。如今的安齐奥不过是个小渔村，然而在古罗马时期，上流社会在此建造豪宅，是个优雅的海滨城市。卡利古拉之后，罗马帝国的第四任皇帝尼禄也出生在安齐奥。当时的这个海滨城市交通便利，风景宜人，如果从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乘船，转瞬即至；若沿阿皮亚大道南下，中途取道正南方的道路，也不过近在咫尺。

据说孩提时代的卡利古拉和幼年的奥古斯都很像，都非常惹人喜爱，奥古斯都甚至在自己的卧室里放了一个卡利古拉的雕像，每次回到卧室都要亲吻一下。卡利古拉是奥古斯都的外孙女阿格里皮娜的儿子，也即奥古斯都的亲外曾孙。

然而，卡利古拉不能长住安齐奥或罗马，因为他被经常随父亲一同上任的母亲搂在怀里，前往远在北国的莱茵河军团基地。卡利古拉未满2岁就离开了罗马，随后不到一个月，曾祖父奥古斯都去世，提比略继承了罗马帝国的皇位。

在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叙述过，提比略即位时莱茵河驻防军团发生了哗变，也提到当时2岁的卡利古拉帮助陷入镇压困境的父亲日耳曼尼库斯解决暴乱。2岁到4岁的卡利古拉在边境防御军团士兵们的看护下成长，可谓是士兵们的吉祥物。从此时开始，大家不叫他的本名盖乌斯，

而是昵称他为“卡利古拉”。

由于父亲日耳曼尼库斯要在首都举行凯旋仪式，卡利古拉在快满5岁的时候，随父母返回罗马。5月26日，日耳曼尼库斯亲自驾驭4匹白马拉的战车，载着卡利古拉、10岁的尼禄·恺撒与9岁的杜路苏斯·恺撒出现在凯旋仪式上，整个罗马为之沸腾。由于家庭的幸福美满，这似乎也是30岁的日耳曼尼库斯受民众拥戴的原因之一。

5岁的卡利古拉同年年底随调任的父亲日耳曼尼库斯前往东方，一路上，他和父母穿越希腊，绕道小亚细亚，前往叙利亚的安条克，体验这漫长的旅途。卡利古拉的母亲阿格里皮娜每次都跟着日耳曼尼库斯赴任，她只带了卡利古拉，将两个大点的儿子留在罗马接受教育。日耳曼尼库斯地位崇高，好奇心十分强烈，所以在年幼的卡利古拉眼中，这趟闲适安然的旅行应该充满了乐趣。途中，他们在爱琴海的小岛上略作停留，身怀六甲的阿格里皮娜在此地生下女儿。

时年6岁的卡利古拉还未在安条克的总督官邸住满一年，次年就随父母前往埃及。从埃及回到叙利亚还不到半年，时年33岁的日耳曼尼库斯就于公元19年10月10日与世长辞。所以，卡利古拉7岁失去了父亲。虽然，现代学者普遍认为日耳曼尼库斯死于疟疾，然而，日耳曼尼库斯从病倒到离世的10天中寸步不离的阿格里皮娜，包括去世的日耳曼尼库斯本人，都认为是叙利亚总督皮索下毒谋杀了他。随后，年幼的卡利古拉在母亲的携带下乘船返回了罗马。

实际上罗马帝国领导阶层的后代中，幼年丧父的例子并不少见。由于自幼丧父或者父亲一直在海外的情况比比皆是，所以通常由母亲负责教育孩子、守护家庭。然而，卡利古拉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异于常人，她对提比略充满憎恨，而卡利古拉正是在母亲手捧父亲日耳曼尼库斯骨灰之后的7年间，即他7岁到14岁这段性格形成时期，在母亲的教育之下长大成人。少年卡利古拉正是在养祖父提比略与亲生母亲阿格里皮娜的关系日益恶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提比略正是在卡利古拉15岁那年隐居到了卡普里岛。两年之后，卡利古拉的曾祖母莉薇娅，即先皇奥古斯都的遗孀过世。对于阿格里皮娜和她的孩子们而言，莉薇娅的去世，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唯一可以压制提比略的人。

同年，因被判决犯有叛国罪，卡利古拉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和大哥尼禄·恺撒分别被流放到文托特内岛和蓬扎岛。次年，卡利古拉的二哥杜路苏斯·恺撒也因为同样的罪名被囚禁在皇宫的一处地下室里。

卡利古拉的母亲被流放之后，他被寄养在了祖母安东尼娅的家中。正如其祖母的名字所示，其祖母的父亲是被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迷惑后，向罗马帝国倒戈相向的马克·安东尼，而其母则是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后来安东尼娅与提比略的弟弟杜路苏斯成婚，她继承了母亲踏实稳重的性格，不像她的父亲那样浮夸。虽然她早年丧夫却没有再婚，也没有传出任何闲言碎语。而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正是看中她这一点，安排她的居所作为属国（罗马帝国的同盟国）王子们被扣押在罗马当人质的接待家庭。寄养在祖母家中的卡利古拉结识了各国王子，并成为他们的同学与小伙伴，这其中包括了色雷斯王子、犹太王子等。对卡利古拉而言，17岁到19岁的两年时光，也许是其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从这些异国王子身上，他受到极大的影响。然而，就在此时，卡利古拉的大哥尼禄·恺撒在流放地蓬扎岛去世了。

公元31年，在提比略动手收拾近卫军团长官塞亚努斯前不久，卡利古拉被提比略召唤至卡普里岛，提比略就在岛上为他举行了成年礼。成年礼通常是在16岁，迟一点也就是在17岁举行，19岁才举行成年礼确实比普通人晚了很多。然而，如果相信当时提比略检举的理由，此时卡利古拉的母亲阿格里皮娜正为了联合反对提比略的势力而四处奔走。阿格里皮娜大概是因为这样，才忘记了小儿子的成年礼。

卡利古拉的成年礼后的两年，21岁的他被选为财务监察官，这意味着他开始履行身为罗马领导阶层的责任，踏出了他公职生涯的第一步。

他也在这一年娶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然而，这一年噩耗接踵而至。年初，被软禁在帕拉蒂尼山皇宫地下室的二哥杜路苏斯·恺撒逝世。同年秋，流放于文托特内岛的母亲阿格里皮娜也与世长辞。

公元36年，即罗马“七丘山”之一的阿文庭山火灾的同年，卡利古拉年轻的妻子因难产而死，孩子也不幸夭折。卡利古拉的第一段婚姻只维持了3年。

公元37年3月16日，也即卡利古拉丧偶后不久，提比略逝世。这位还未迎来25岁生日的年轻人，这位仍然保持着独身没有小孩的轻松生活的年轻人，却集所有的权力与所有人的尊崇于一身。因此，与前任相比，这位年轻的最高当权者，不能像提比略那样不受欢迎，也要考虑整个罗马帝国的国家利益。不对，这种说法似乎显得卡利古拉没有责任感，事实并非如此。他必须满足罗马公民的要求，并将其实现。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财政是否支持他的统治。卡利古拉非常幸运，他拥有提比略留下的2.7亿塞斯特斯。

统治之初

卡利古拉获得元老院和公民赋予的全部权力之后，继承了罗马帝国的皇位。随即，他宣布要废除1%的营业税（相当于今天的消费税）。他并没有立即下令全面停止征收营业税，而是在公元37年降低为0.5%，直到公元38年才开始全面废除。民众因为废除税金，自然会拍手称快。

随即到了6月1日，卡利古拉遵照提比略的遗嘱，向下层公民和士兵们分发遗赠金，按人头发放300塞斯特斯。由于提比略没有忠实执行莉薇娅的遗嘱，卡利古拉于7月19日第2次发放莉薇娅的遗赠金，金额同样是300塞斯特斯。士兵们通过这两次发放遗赠金，获得了相当于年薪一半以上的报酬。

当然，这些开支不是用国库中的钱财来发放，而是用莉薇娅和提比略的私人财产来支出。因为卡利古拉继承了他们的遗产，所以卡利古拉执行了提比略与莉薇娅遗嘱。这样一来，在罗马人眼中的卡利古拉既是一位不会积蓄个人财产又是一位热心公共利益的皇帝。

8月31日是卡利古拉的生日，当然这也是一个令罗马人举国欢庆的节日。卡利古拉并未把这一天看做普通的生日，就在同一天，他举行神君奥古斯都神殿的祭祀仪式。神殿早已竣工，只差兼任大祭司的皇帝举行祭祀大典，当时提比略不愿返回罗马，所以才推迟到现在举行。提比略的时代在元老院和公民的眼中好像根本不存在，罗马帝国的皇位仿佛是奥古斯都直接传给了正在举行仪式的卡利古拉。卡利古拉在这种氛围之下，提议把自己登基的3月18日定为国庆节，元老院与罗马民众当然同意了这个提议。9月27日，元老院接受了罗马民众的请求，顺水推舟地通过决议将“国父”尊称正式授予卡利古拉，而卡利古拉毫不推辞就接受了下来。这位25岁的年轻人获得了恺撒与奥古斯都两位“神君”所拥有的荣誉。

因此，3月28日到9月27日的7个月内，卡利古拉从回到罗马再到获得“国父”称号的这些日子里，首都罗马每天都像是在过节一样，各地都举办了连续好几日的角斗比赛、4匹马拉的战车竞赛、体育竞赛和戏剧表演。罗马民众们脱下普通的朴素短衣，穿上有节日气息的白色或其他带有鲜艳色彩的短衣，参加神殿祭典，祈求罗马帝国在卡利古拉的统治之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街上经常能够见到头戴花冠的妇女和孩子们载歌载舞。公民痴迷于角斗比赛，他们给自己喜欢的选手呐喊助威，直到声嘶力竭之后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罗马人不论是谁都洋溢着幸福的神情，就好像是漫长的寒冬之后春天终于来临，然而，这个“春天”的到来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开支。

大病

当年10月，以往总是出现在公众眼里、沐浴在罗马民众欢呼声中的卡利古拉，突然消失了踪影。

卡利古拉仍然年纪尚轻，虽然体型瘦削，但他的身体十分健康，从未病过。这一次他却因高烧卧床不起，着实让人大吃一惊。在我的想象中，这可能与卡利古拉刚当上皇帝高兴过度，再加上连续7个月夜以继日的庆祝有关。当罗马人听说卡利古拉发高烧，立即想起他的父亲日耳曼尼库斯临终前的情形，非常惶恐焦急。首都罗马、意大利本土，包括遥远的行省，甚至连身为一神教徒而不能宣誓效忠皇帝、也不需服役的犹太人都在举行祭祀，祈求卡利古拉早日恢复健康。

卡利古拉即位至今才过去7个月，他除了发放赏金、举办祭典、赞助观赏活动之外没有其他作为，为何民众对他如此拥戴？对此，埃及首都亚历山大城犹太人社会中的领袖——斐洛，这位被誉为学富五车的“犹太人的柏拉图”，我觉得他的叙述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 罗马人在得知卡利古拉重病的消息后，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他们不但立即抛开了先前令人生满足的各种娱乐，而且戒除了赌博这类不良嗜好。全国气氛为之一变，充斥在家家户户、大街小巷中的，到处都是不安、担忧、惊慌与失意，仿佛整个罗马都和他一起倒下了。然而，席卷帝国的这场“大病”甚至比卡利古拉的病情更为糟糕。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后者仅仅是对肉体的折磨，而前者波及的范围更广。罗马人一直追求的力量、和平、希望、幸福，以及能够享受这一切的坚定信仰，所有的一切在明天是否都会化为乌有呢？这种深深的不安和担忧让罗马人都患上了心病。他们担心从明天开始，无政府状态将会取代过去的和平与幸福，而饥饿、战争、破坏、抛弃耕地、没收财产、杀人越货、绑架诱拐将会层出不穷，不是奴隶却被强制为奴，最后悲叹命运多舛，含恨而终。
>
> 帝国所有民众都清楚，只有卡利古拉康复才能拯救大家脱离苦

海，除此之外都无济于事。

无论哪个城市，无论大街小巷，只要罗马的旅人经过，人们都争先询问卡利古拉的病情；当得知卡利古拉正在康复，人们就在街上欢欣起舞。因为卡利古拉痊愈，消除了民众对未来的忧虑和彷徨。

再没有任何史料，能比这位犹太学者的记载更能显示罗马的帝王政治给人民带来的福祉。罗马帝国历经尤里乌斯·恺撒描绘蓝图、奥古斯都构筑框架、提比略奠定基础，直到卡利古拉继承帝位，才有今天稍具规模的罗马帝国。由于人们担忧卡利古拉之死将会宣告罗马帝国的终结，甚至连被统治阶层都为卡利古拉的康复祈福。卡利古拉在登基后的7个月内，在政治上毫无建树，由此可见举国上下祈求他早日康复，并不是出于民众对卡利古拉政绩的认同。卡利古拉彰显了罗马帝国政治的优越性。实际上从“政治方面毫无建树”的结果来看，反而会更有效果。

在宣布要采取与提比略截然不同的统治方式之后，卡利古拉登上了罗马帝国的皇位。然而卡利古拉所谓的截然不同的统治，仅限于废除税收、举办庆典、赞助活动之类收效显著的收买人心的较为花哨的活动中。卡利古拉沿用提比略的方式，在普通民众不太关注的行省治理、边界防御等问题上没有作任何调整。此外，提比略发掘的人才依旧在行省和帝国防线兢兢业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并没有受到首都罗马长达7个月庆典的影响，也没有作任何调动。借用历史学家蒙森的话，这些人才可谓都是“提比略的门生”。我能够想象得到，卡利古拉在与晚年的提比略共同生活的6年内肯定明白了人才的重要性。不论是总督还是军团长，没有任何权力比人事权更能让人真切地体会到手中权力的作用。如若手握人事权的官员一旦变动，那么他手下的人员也会一起调动。幸运的是，在卡利古拉短暂的4年统治期间，他几乎没有更改提比略当初定下的人事安排。联系卡利古拉喜欢夸耀权力的个性，这样的例子对于罗马帝国而言真是一件幸运的事。

公元37年秋的大病让卡利古拉性情大变，许多历史学家持这种观点。我却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大病之前，卡利古拉有所顾虑，很多事情想做却不能做。痊愈后就不再顾忌，随心所欲，如此而已。

卡利古拉目睹了不受民众欢迎而深受孤寂之苦困扰的提比略晚年惨淡的景象。也许卡利古拉当时就在心里告诫自己，绝不品尝那种滋味，绝不要孤独终老。卡利古拉不满25岁就继承了提比略的帝位，他其实是个心思细腻、易受影响又容易伤感的人，还常被失眠所困。可是如今他掌握了权威和权力，拥有一切，甚至受到被统治的其他民族的人民的敬爱。

拥有一切的人最为担心的是失去现有的一切。所以，卡利古拉与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提比略不同，他集中全力来维持如今拥有的一切。或许是举国上下为了祈求他早日康复而焚烧牲礼形成的烟雾和气味，给了卡利古拉莫大的勇气来抛开曾经的重重顾虑。因为，他生病前有所顾虑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的作为能否收拢人心，只不过是对社会舆论有所顾忌才缩手缩脚。然而，现在所有人都很明显地支持卡利古拉。

作为罗马帝国最高当权者，卡利古拉康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除去养子葛梅鲁斯。在先皇提比略的遗嘱中葛梅鲁斯同样拥有皇位继承权。然而，在提比略驾崩还不到8个月之时，18岁的下一任皇位继承人葛梅鲁斯就被25岁的皇帝卡利古拉下令处死了。与此同时，欢天喜地庆祝皇帝卡利古拉康复的民众，只能默认这件事情的发生。

神化

从公元37年冬到公元38年初夏的7个月里，年轻的统治者正陶醉在权力的美妙之中。25岁的卡利古拉观念里的“权力”，跟恺撒、奥古斯都、提比略认为的“权力”—— 罗马式的权力不同，而是少年时期的同学

兼好友的东方王子们教给他的东方式权力。

作为东方专制君主的后代，当他们有朝一日回归祖国登上皇位，头上自然有璀璨的王冠，被称为王，官员子民都得对他行礼跪拜。然而，对于他们能否回归祖国继承皇位，卡利古拉有绝对的话语权，但他是“无冕之王”。只有士兵称他“皇帝”，普通民众只以“第一公民”称呼他，谁都没想过要对他行礼跪拜。东方历来实行君主专制，西方的历史和传统都与东方不同，奥古斯都正是基于这个考虑才创造了“无冕之王”这个“罗马特色的皇帝”。因为“无冕”，卡利古拉反而不明白它凌驾于“有冠”的国王之上，所以他对“王冠”的有无始终耿耿于怀。

卡利古拉认为这种差异是不合理的，他想到了一个消除差异的办法，就是成为比帝王更高的神祇，并且不是罗马多神教中的众神之一。在希腊和罗马的多神教中，众神之间划分等级，最高神祇是朱庇特（希腊称宙斯），其次是海神涅普顿（希腊称波塞冬），接着是天后朱诺（希腊称赫拉）、智慧女神密涅瓦（希腊称雅典娜）、美神维纳斯（希腊称阿弗洛狄忒）三女神，然后是战神马尔斯（希腊称阿瑞斯）和阿波罗两名男神，这些是一级神祇。死后被神化的恺撒、奥古斯都，顶多晋升到下位神祇。由于自己身上流着神君奥古斯都的血，所以卡利古拉也认为自己是神，不过他不甘心屈居下位神。当然，他也不打算成为一神教的神明。卡利古拉是希腊、罗马文明的产儿，所以他希望自己能跟最高神祇朱庇特合二为一。

我们通常见到的希腊、罗马神像，都是裸露上身并且赤足的姿态。如果想要表现凡人神化后的英姿，或者是过世后的塑像，不是赤脚、赤裸上身，就是像著名的“普里马·波尔塔的奥古斯都像”一样，身穿甲胄，双足赤裸。然而，卡利古拉是自己尚在人世就让自己神化，并且还以这种形象出现在罗马人面前。

卡利古拉似乎模仿宙斯，把头发和胡须染成金色。当他须发金黄、赤裸上身、光脚走进元老院时，议员们被吓得大惊失色。有时候，卡利

古拉会以另一种装扮出现在公众面前，身穿短衣，外面披着缀满东方风情宝石的披风。他有时会手执象征宙斯的黄金闪电盾牌，也会模仿海神波塞冬手握三叉戟。今天，对此我们经常会看到当红歌手或者模仿他们的那些身穿奇装异服、打扮怪异的年轻人，我们早已司空见惯，并不会大惊小怪。当时不可能如此前卫，罗马领导者的形象，历来要求稳健刚毅、老成持重。所以，卡利古拉这种打扮让议员们哑然失色，也让普通民众大吃一惊。议员们不禁心想，莫非是那场大病烧坏了卡利古拉的脑子。

刚开始并没有人批评他，甚至有些年轻人和民众觉得这样“很有趣”，为他鼓掌喝彩。在兴趣方面，卡利古拉和年轻人以及普通民众大同小异。

快乐

角斗比赛和战车比赛在卡利古拉解禁的娱乐活动中最具代表性，而且这两项运动都能让罗马民众为之疯狂。

由奴隶出身的职业角斗士进行的比赛采用一对一的形式。据说这项比赛曾经是伊特鲁里亚人的体育项目，罗马征服伊特鲁里亚之后，自然引入了这项活动。对于这种经常出现不死不休局面的比赛，罗马人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类：（一）因残酷而厌恶；（二）虽然残酷，但可以欣赏到角斗士的技艺；（三）因残酷而喜欢。当然，这无关个人好恶，只是单纯将娱乐作为掌控人心的手段，换言之，除了像恺撒和奥古斯都这种以此为收买人心的政策之外，提比略属于第一种态度，西塞罗、塞内加、小普林尼等知识分子属于第二种态度，罗马公民和卡利古拉则是最后一种态度。

卡利古拉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即把原本一对一的职业角斗士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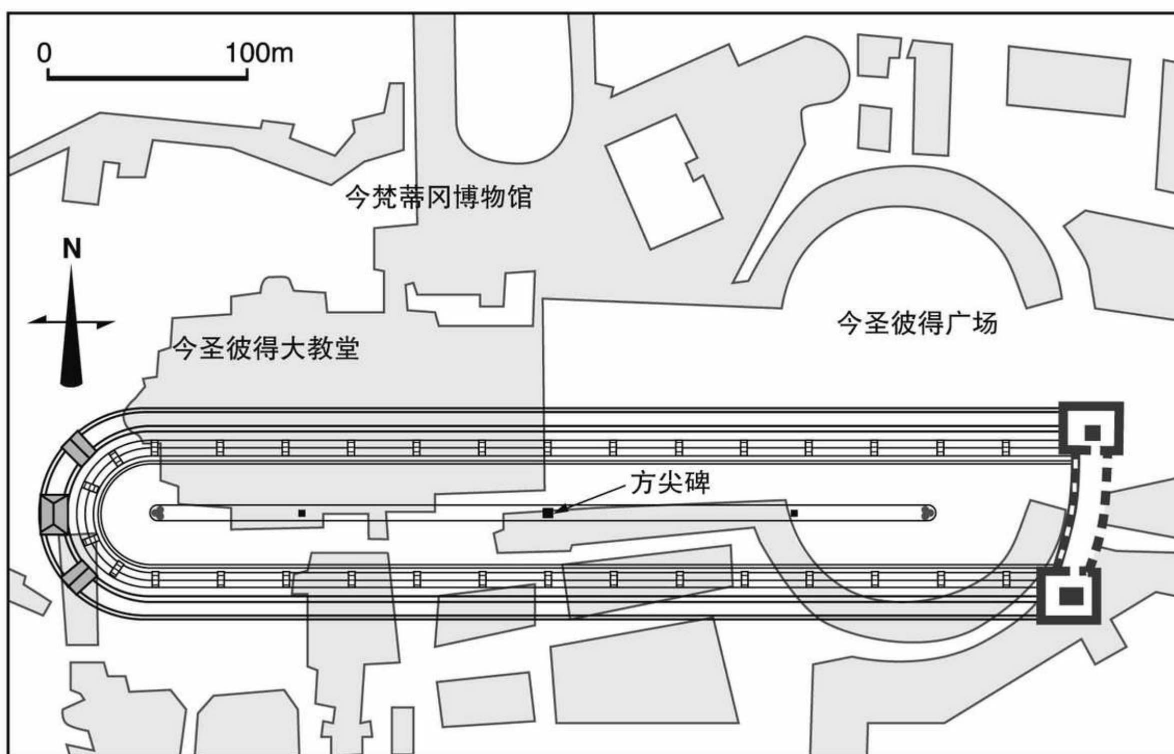
赛，改为职业角斗士与重刑犯的业余对抗。没有受过任何剑术技能训练的普通人加入这项比赛，场面自然更加残酷。卡利古拉赞助了这项比赛，民众们非常欢迎，我们不难理解这种狂热。

提到战车比赛，这个项目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而是由选手驱使4匹马拉动的华丽战车。参加这项比赛需要相当的经济实力，此外选手还应具备可以同时驾驭4匹马的高超技术。这么说来，古罗马的战车比赛和现代的F1方程式赛车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参加战车比赛的，不是富裕阶层、善于御马的人，就是职业队。

一支职业队，通常由提供资金的所有者、管理战车和马匹的负责人以及驾车出赛的选手组成，一般分成绿、蓝、白、红四队。卡利古拉是绿队的狂热支持者，他经常出席比赛结束后在马厩里举行的庆功宴。要是绿队获胜的话，他有时会提供200万塞斯特斯作为嘉奖。卡利古拉身为皇帝却是狂热的战车比赛迷，这也是能引起罗马民众的共鸣之处。

如果自己拥有战车，我们难免会想亲自上阵，体验一下比赛的刺激。可是，卡利古拉毕竟不是提比略，没有提比略年轻时候参加四年一度的希腊奥林匹亚角斗赛的自信。因此，卡利古拉在后来兴建了基督教大本营——圣彼得大教堂——的地方（今梵蒂冈），建了一座可以驾着4匹马的战车自由驰骋的私人比赛场所。因为这里必须从市中心越过台伯河才能到达，所以兴建私人比赛场所时没有任何问题。

战车比赛的“角斗场”和体育比赛的“比赛场”很像，都是较长的椭圆形。只是，希腊式的体育场（185米）以及边长固定的“露天体育场”，都没有“圆形角斗场”长，即场地较小。不能同可以容纳15万人的“大角斗场”相提并论，仅卡利古拉的私人角斗场就有500米长，与圣彼得大教堂后方到圣彼得广场的距离相当。场地中央是否有带状区域，这是“圆形角斗场”和“露天体育场”的第二个区别。战车要围着带状区域绕好几圈，所以“圆形角斗场”要保留中间地带。



卡利古拉的角斗场

公元前30年，奥古斯都大败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征服埃及，他曾从埃及运回方尖碑，摆在“大角斗场”的正中间。卡利古拉也建了一座私人使用的“圆形角斗场”，然而，他认为中央带状区域也必须摆放方尖碑，所以，他命人制造大型船只，以便原封不动地把方尖碑从埃及运回罗马。卡利古拉的所有行为都要花掉一大笔钱。今天，这座高达25米的方尖碑现在的位置已经移动了百米左右，耸立在圣彼得大教堂前面广场的正中央。

同提比略统治时的罗马完全不一样，卡利古拉时代各种娱乐活动、运动项目盛行，可是后来被批评为“面包与马戏”。

所谓“面包”，我认为是一种社会福利政策，它是根据共和制时代的《小麦法》制定的一个主食小麦的免费发放系统，目的在于救济贫民。受惠于这个政策，已经数百年没有人因饥饿而死。古罗马时代，尤其是

在罗马帝国统治时代，绝对不是通过舍弃弱势群体进行统治。

因此，拉丁语“circus”（场地）也被英语引用，读做“色克斯”。如果，今天我们要在意大利全面废除足球比赛，不论政府多么为民众着想，也不管政绩如何优异，我们都可以断言这会遭到强烈反对。究根探底在于皇帝是否应该赞助此类活动，然而在标榜平民主义的帝国政权下，举办这些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求。最好的例证就是提比略，他从不理会民众的需求，如果他参加总统选举，十有八九会落选。所以，不论“面包”还是“马戏”，问题在于国家财政是否能够支撑得起这些活动。



战车比赛（电影《宾虚》场景）

卡利古拉统治早期还有提比略留下的资金盈余可以应付，所以这个问题没有愈演愈烈，实在是万幸。正因如此，罗马人只需尽情享受卡利古拉为他们提供的娱乐就可以了。对卡利古拉的所作所为，心满意足的人们自然全部认同。

“奥古斯塔”这个殊荣只有奥古斯都的遗孀莉薇娅有幸获得，卡利古拉决定授予刚过世的祖母安东尼娅这个尊称，元老院同意了。卡利古拉年少时母亲被流放，是祖母把他抚养长大，他这么做可能是为了报答祖母的养育之恩。安东尼娅是马克·安东尼的女儿，他曾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联合向罗马宣战。后来，奥古斯都打败安东尼成为最高统治者，他没有把安东尼娅看做仇敌之女，而是把她当做亲外甥女，视同家人一样对待。女性的“奥古斯塔”相当于男性的“奥古斯都”。给予家人一样的待遇跟授予“奥古斯塔”的尊称，完全是两码事。如果是奥古斯都，他不会做到如此地步；提比略也绝对不会这么做。因为，这种事并不是私人感情，想给就给，不必顾虑，这个问题兹事体大。如果我们把“奥古斯都”译为皇帝，那么“奥古斯塔”就是皇后的意思。

不管何事都应该有分寸，但卡利古拉才不管什么分寸不分寸。

虽然叛国罪的控诉状可以烧毁，但是，卡利古拉没有替死于流放之地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平反，因为元老院作出的有罪判决无法改变，他不得不把死于非命的母亲和两个兄长的骨灰葬在奥古斯都陵之内。

除兄长之外，25岁的卡利古拉还有3个妹妹，分别是22岁的小阿格里皮娜、20岁的杜路希拉与19岁的尤利娅·莉薇娅，提比略在晚年安排卡利古拉的3个妹妹和名门之后结成连理。卡利古拉继位时的誓言里，把3个妹妹的名字加在自己后面。依照罗马传统，妇女没有公开的社会地位，就连长年陪伴奥古斯都的莉薇娅，都是在他的遗言中获得“奥古斯塔”的尊称。卡利古拉打破了这个传统。以往，不论她们的家属身份以往跟最高权力者多么亲密，能发挥多大的权力，毕竟女人只能活跃于家族之内。而今，卡利古拉让女人们也能享受公开的社会地位。通常，性格乖僻的人，大多胆小。这类人往往选择笼络明显支持自己的人，形成自己的圈子，而不是在陌生人中寻找盟友。这一类人还有个特征，他们的盟友往往都是血亲。放在卡利古拉身上，他厚待妹妹们，对自己的妻妾反而非常冷淡。

从21岁到27岁的6年中，卡利古拉有过4次婚姻。其中有一位妻子去世，两位离婚，他28岁驾崩时陪葬的是第四任妻子卡耶索妮雅。卡利古拉一生中随处可见母亲和妹妹的影子，妻子的踪迹却难以找到。

通常情况下，货币上雕刻的都是皇帝的头像，然而卡利古拉赐予3个妹妹这项殊荣，她们可说是罗马的“第一夫人”，地位高于卡利古拉的妻子。这3位女性的性格各不相同，从下面可见一斑：

小阿格里皮娜争强好胜，美貌聪慧，野心勃勃；杜路希拉古典气息浓郁，性格温柔，多愁善感；尤利娅·莉薇娅敦厚朴实，却不起眼。三姐妹中，杜路希拉深受年长5岁的哥哥宠爱。

哥哥深爱妹妹，这有违伦常，并不被世人接受。然而卡利古拉认为自己就是神，在神明的世界里这种事无伤大雅。因为，在被视为神祇的埃及皇室，像克娄巴特拉嫁给自己的弟弟那样，姐弟、兄妹通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公元38年初夏，杜路希拉离世，芳龄21岁。无论是谁，在如此风华正茂之年去世实在令人惋惜。对卡利古拉而言，这更是个沉重的打击。在得知这个噩耗之后，卡利古拉抛开一切策马离开首都，身边只有少数护卫，他甚至没有出席葬礼。我们并不清楚他当时为什么会去西西里，或许他精神恍惚，索性信马由缰，不知不觉中一路南行，清醒过来已经到了西西里。卡利古拉第一次见到墨西拿海峡，以及漂浮在海面上的西西里岛，这似乎有助于他恢复冷静。然而，卡利古拉只是恢复冷静而已，杜路希拉之死并没有让他改变分毫。他返回罗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杜路希拉神化。在罗马历史上，死后封神的只有恺撒和奥古斯都两人，而今，卡利古拉这位21岁的年轻的妹妹也被封神。

现在很难找到关于罗马民众对卡利古拉评价的历史资料，因为就连塔西佗的《编年史》一书，唯独关于卡利古拉一卷的内容在中世纪完全散失。如果我们从其他历史学家的记录中选取比较可靠的部分来看，普

通民众的态度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卡利古拉非常担心失去民心，所以他不改初衷，依然赞助角斗士比赛和战车比赛等娱乐项目，还强迫其他有权有势的人士举办这些活动。

另外，卡利古拉非常清楚，公共事业建设，即今天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提供娱乐活动一样，可以获得民众的支持。

卡利古拉曾说道，现在罗马已有7条引水渠供水，今后将在此基础上建设新的引水渠。随着居住人口的不断增加，罗马成为世界之都已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供应丰沛的水源，也是为了防止疾病发生的有效政策之一。然而，这个引水渠建设与现有的引水渠相比，实在是一项工程量浩大的土木工程。因为，水源的源头距离罗马70公里，其中10公里以上的长度要架设高架引水渠。公元38年，工程开工，直到公元52年才完工，正值克劳狄乌斯统治时期，这条渠道被命名为“克劳狄乌斯引水渠”。此外，另外一条引水渠“亚尼斯·诺福斯”，也是由卡利古拉破土开工建设的。这样一来，加上原有的7条引水渠，罗马共建成引水渠9条，相当于每天可以为每一个罗马居民提供900升水。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后的今天，罗马居民的供水量只有当时的一半，甚至缩减到三分之一。

当然，卡利古拉心里也非常明白，确保粮食安全则是获得民众支持的重要因素，但罗马帝国本土已经很久没有实施粮食自给自足的方针。于是，提比略任命的“水利局局长”堪当大任，此外他任命的“粮食局局长”也十分有能力，所以从来没有人抱怨小麦不足或售价提高。然而，卡利古拉想要有所作为，所以把他前往西西里时的想法付诸实践。小麦从产地埃及运回罗马时必须经过墨西拿海峡，卡利古拉打算沿海峡修建海港。墨西拿海峡横亘在意大利半岛与西西里岛之间，波涛汹涌，海浪湍急，是公认的难关。所以建设这项工程的目的，就是即使遭遇狂风暴雨，满载小麦的船只也能够轻松避难。

对于这种以完善基础建设为目的的公共事业，普通民众好评如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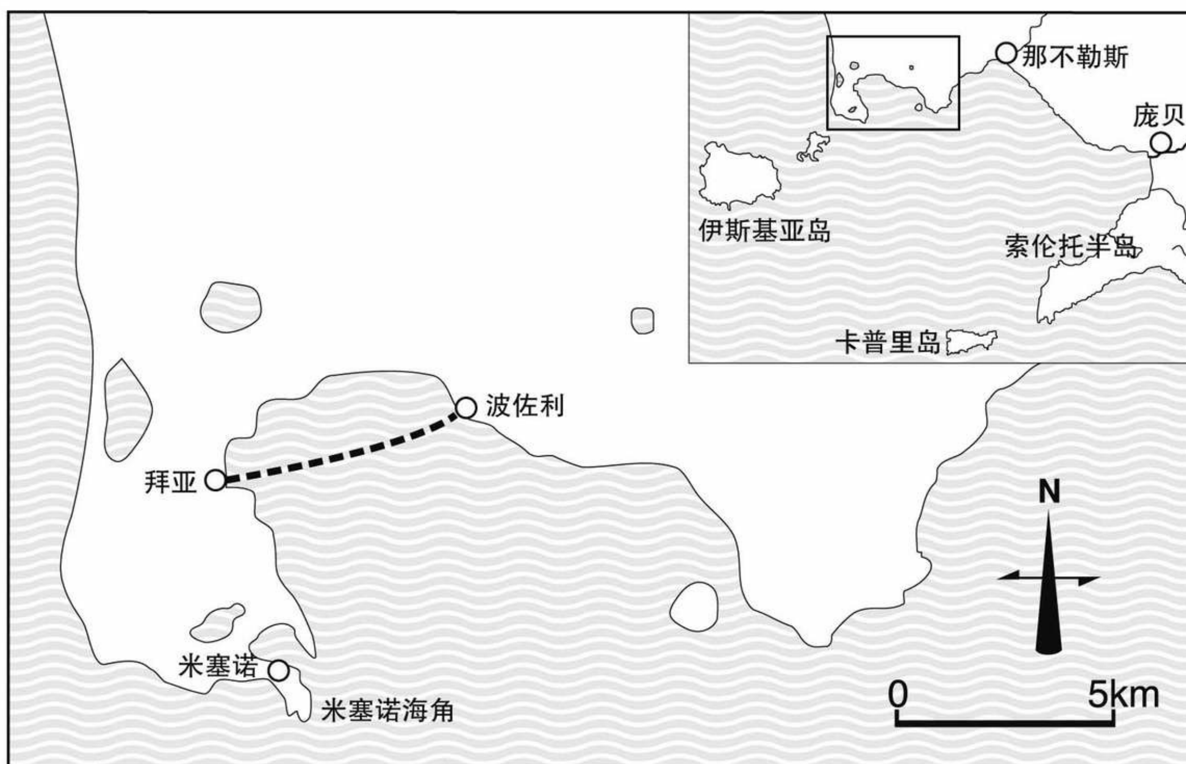
欢迎之至。因为，罗马人了解基础建设的重要性，它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发展。然而，基础建设通常工期都比较长，皇帝只在破土动工和竣工之际出席视察，平时建造者都是默默无闻地埋头施工。换言之，这种工程缺乏话题性，没有轰动效应。卡利古拉对此颇有微词。

当时是公元38年10月，首都发生火灾，史书中没有明确说明火灾发生的具体位置。古罗马建筑的墙壁和柱子都使用石材，所以不太容易引发火灾。然而为了减轻天花板和屋顶的重量，这两处一般都用木料，这也是罗马建筑的最大弱点。

得知火灾的消息后，卡利古拉自然当仁不让地指挥灭火，毕竟他才26岁，年轻力壮，体力充沛。

另外，卡利古拉以这次火灾为契机，下令火灾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国家负担。此举当然令民众欢欣鼓舞，不过这也是日后导致国家财政崩溃的原因之一。总而言之，卡利古拉收买民心的政策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点，即希望做些开创性的创举，让罗马民众有新的感受。

以那不勒斯为起点，向东可达庞贝，往西则是绵延的海岸线，其中波佐利到军港米塞诺随处可见罗马上流社会的度假别墅。此地气候温暖宜人，温泉喷涌，风景秀丽迷人，在这样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拥有自己的别墅，人们认为这是上流社会身份的象征。波佐利是一个商业港口，附近生机勃勃。与之隔海相望的是拜亚，那里满是优雅时尚的高级别墅。卡利古拉放出豪言，他要策马走过连接波佐利和拜亚的海上通道。



卡利古拉的“海上通道”

两地按照今天的算法相隔4.5公里。卡利古拉命人把征调的大量船只放在海面上并排成线，以桅杆为中心在左右铺上木板，然后在木板上铺上厚土，成为一条平坦的大道。

在看到皇帝的布告后，波佐利和拜亚盛况空前，民众围得水泄不通，载满乘客的小船覆盖了周围的海面。

卡利古拉就在这条由船只连接而成的通途上来回往返。踏海而过时，卡利古拉一副罗马士兵装扮，他头戴以鲜绿色橡树枝编制的“公民冠”，身披黄金刺绣的披风，左手持骑兵圆形小盾，右手御马。其中，“公民冠”以受实现罗马和平的奥古斯都喜爱而广为人知，同时也是军人挽救战友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卡利古拉返回时的演出更是叫人叹为观止。他身穿从埃及取来的亚

历山大大帝的黄金铠甲，舍骑马而坐两匹战马拉动的战车。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征服波斯，当时在罗马为人质的帕提亚王子是波斯的达雷欧斯的后代，所以卡利古拉让帕提亚王子乘坐另一辆战车走在前面，他自己假扮成亚历山大大帝紧随其后。当然，无论去程还是归程，火红披风迎风飘扬，马上英姿飒爽的卡利古拉的年轻玩伴，以及一支近卫骑兵一直跟随卡利古拉，踏浪前进。面对此情此景，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欢呼声。然而，表演结束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如泡沫一般转瞬即逝，除了这个茶余饭后的谈资。无论是亲眼所见，还是道听途说，人们都赞誉有加，似乎感叹象征皇帝的年轻力壮和帝国的繁荣昌盛的绚丽烟花一般，这个话题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正是卡利古拉的目的，即使花费不赀，也要完全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卡利古拉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想要彰显自己没有王冠却凌驾于头戴王冠的诸王之上，希望自己永远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卡利古拉所做的史无前例的事情，远不止于上面的例子。

罗马时代的史学家们有这样的记载，船只一般有三层桨，卡利古拉却要求建造十层桨的大船。用精美绚烂的绢做帆，绢上有花纹，颜色会随阳光而产生变化。船上备有浴室、客厅和卧室，甲板上建了回廊。树木葱翠欲滴，果实缀满枝头，人们置身其间，尽情享受丰盛的佳肴。

距卡利古拉时代1400年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被称为旷世奇才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前辈阿尔贝蒂·利昂纳·巴蒂斯塔想要探究中世纪传说的真相，他就到从罗马出发，沿阿皮亚大道南下30公里左右的内米湖，即罗马沉船的地方寻找蛛丝马迹。然而，当时受潜水条件限制，没有成功。18世纪，也有人尝试过，但是最终也以失败收场。直到20世纪，对古罗马时期如痴如狂的墨索里尼再三催促，再次进行大规模的探测。此时已经是考古学的全盛时期，虽然经过了1900年，最终从干涸的湖底发掘出两艘古船。船底都极为平坦，充分表明这船是为了漂浮在水面上，而非用于航行。两艘船一艘长67米、宽20米，另一艘比较大，长

71米、宽21米。当时的人们在船上发现了很多用来铺设地板的颜色各异的大理石、马赛克与雕塑，此外还有大量青铜制的航行设备与烹饪工具。

为此，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兴建了一座博物馆用来收藏这些古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这些船体非常不幸地被毁坏了，遗留至今的只有幸免于难的大理石、马赛克与青铜制品。

目前，没有史书可以证明是卡利古拉下令打造了这两艘船。但不论在卡利古拉前后，罗马历史上不乏锐意进取的帝王，他们敢于打破陈规，做出史无前例的创举，不过绝大部分建设都是为了满足公共用途。然而，卡利古拉最擅长的，就是公器私用，他一时心血来潮修建的私人建筑只会让人觉得浪费。



卡利古拉

2000年后的今天，郁郁葱葱的树木倒映在内米湖上，一派恬淡宁静。类似别墅的豪华游艇在这小而安静的湖面上漂浮，荡漾，在这样的游艇上举办宴会，应该是一种极致的享受。卡利古拉是如何产生如此绝妙想法的呢？台伯河流经罗马市区，当时河中的岛屿就已经建造成船只的模样，可能就是这些岛屿带给他灵感。或许，幼年时候随父亲日耳曼尼库斯游览埃及时体验过的尼罗河上华丽的巡游船——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的遗产之一，也是他灵感的源泉吧。

根据船只被焚毁以前的研究，我们知道，这两艘在内米湖中发掘的罗马船，既不是被烧毁，也不是船坏了才沉没的，而是故意沉到湖底的。卡利古拉遇刺后不久，所有与他有关的一切都被遗弃，而豪华游艇可能就是那时被沉到湖底的。当然，也没有任何史书表明，卡利古拉之后的皇帝把这些船作享乐之用。

筹款

还不到三年的时间，卡利古拉就把皇帝的个人财产，以及国库中的库存挥霍殆尽。由于卡利古拉赞助各种娱乐活动，提比略当初留下来的2.7亿塞斯特斯早就被挥霍一空。随后，他虽然绞尽脑汁筹措资金填补财政漏洞，然而在他的统治即将迈入第三年时，已经黔驴技穷。但卡利古拉依然旧习难改。

首先，浪费这点，不论哪种形式的浪费都只会愈演愈烈。其次，普通民众已经对卡利古拉一掷千金的做法习以为常，卡利古拉本人也担心“财尽缘断”。所以，筹款是26岁的卡利古拉最关心的事情。他非常清楚，对普通民众一掷千金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自己最稳固的支持者是普通民众，而非元老院。

不能减少支出，但又要尽快摆脱财政危机，那么只有增加财源收入

这个办法了。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罗马帝国的经济实力，那就是“繁荣”。这是因为太平盛世长达70年之久，基础设施在此期间覆盖帝国全境，以及实行从共和时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各民族、各城市高度自治的统治方式。如果有统计数据或图表，经济实力一定是呈现向右上方上升的增长趋势。

如果仅仅依靠自然增收来促进税收，那么税收也会逐渐增加。营业税最能直接反映经济增长情况，当时的税率很低，虽然只有1%，但是卡利古拉也废除了这项税收。

不论卡利古拉再怎么爱花钱，他也不敢把行省税提高10%。毕竟，统治者可以对被统治的行省人民征税，然而一旦提高税率，他们必定立即起来反抗。无论封建专制的君主国，还是承认自治的“自治城市”，直接税率只有10%。虽然在古代没有明文规定，但这是常识。此外，万一发生暴动，就必须出兵镇压，最终只会增加财政负担。

一边维持松散的财政，一边又要迅速健全财政制度，当人们面临这种难题时，绞尽脑汁后一般都会采取权宜之计，暂时纵容。于是，只有卡利古拉一贫如洗，其他人依然富裕，即使不富有也不至于贫困交加。即使这样，卡利古拉也没有苛待真正的贫苦公民，他继续实行免费发放小麦给穷人的救济政策。

我们看看卡利古拉的筹款措施，没有穷途末路的感觉，反而让人苦笑连连。在这方面，卡利古拉可谓创意无限。

从没有生命的家具、珠宝饰品，到活生生的当做仆从的奴隶，卡利古拉把皇帝家中的这些东西都拿来拍卖。可是，他没有在首都罗马拍卖，而把地点安排在相当于高卢行省的都城里昂。如果有人问在里昂拍卖的原因，我想理由大致有三：

第一，如果在罗马拍卖，实在有失皇室体统。

第二，卡利古拉希望尽可能地把卖价提高。如果按实际价格卖，家具、珠宝饰品、奴隶根本赚不了钱。奥古斯都、提比略，甚至卡利古拉，或者皇族女性，他们都是罗马上流社会，这毋庸置疑，然而他们拥有的奢侈品并不比那些靠贩卖奴隶发家的暴发户多。所以，如果想卖高价，只能拍卖奥古斯都用过的床，或者莉薇娅喜欢用的珠宝饰品，甚至从出生开始就为皇室服务的奴隶。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充分利用附加值。

我们可以预测，首都的民众对皇帝一家已经非常熟悉，遥远的行省人民则不然，他们因此而对皇族更加心怀敬意，更加憧憬。卡利古拉会如何选择，答案显而易见。

第三，不管行省人民对皇族如何尊敬，如何憧憬，没钱的人想买也没有钱。所以卡利古拉的出售对象是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富人。毕竟专程从罗马穿越阿尔卑斯山运到里昂，运费就要花不少钱，这样一来售价自然昂贵。听说，得知这个消息，高卢各地都有很多人前来参加拍卖，这说明能够以高价买下有附加值物品的，大有人在。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把行省算在内，帝国的经济实力的确在增长。

当富裕的行省人民躺在奥古斯都用过的床上时，他们在想些什么呢？无论如何，要解决迫在眉睫的资金不足问题，卡利古拉靠这种方式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行省人民原来的税率是收益的10%，卡利古拉虽然不打算提高这项税率，但他也彻底放弃了减轻行省人民税收的可能性。换言之，实际上卡利古拉不允许行省人民获得罗马公民权。因为行省人民一旦成为罗马的公民，他们就没必要缴纳行省税。

此外，卡利古拉还规定，拥有罗马公民权的行省人民只能将公民权

传给他的儿子。在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行省人民只要获得罗马公民权之后，对其亲戚家族同样适用，并且承认这是一项可让子孙后代沿用的世袭权利。因为公民权只能传给直系男孩，行省出生的罗马公民愤愤不平，他们出示恺撒或者奥古斯都赋予的“Diplōma”（特权书）以示抗议。然而，卡利古拉以证书过期无效为由，拒不承认。

卡利古拉明白，确保罗马军队的兵源远比增加行省的税收重要，所以他允许直系男孩继承罗马公民权。行省人民以“辅助兵”的身份服役满25年就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那么他的儿子自然也具有公民权，具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就有资格志愿参加“志愿兵”。罗马坚持实行志愿兵制，以此确保兵源，卡利古拉也不能视而不见。

卡利古拉的窘迫境况依然没有改善，这自然归咎于他没有减少支出。于是，卡利古拉想到了增加新的税种。可是，税制的基本体系由神君奥古斯都设置，不能随意更改，他只能略作改动。

在罗马的民事诉讼规定中，审判开始必须向国库缴纳诉讼金额的2.5%。另外，如果在审判过程中撤销起诉，就免除缴纳的义务。然而，卡利古拉对这个规定略作调整，无论审判情形如何，都要缴费。

此外，卡利古拉还规定，对罗马市内销售的燃料也要收税，但史书没有明确说明税率多少。

甚至色情行业和妓女，他也规定要纳税，税率方面同样不可考。至于搬运工，据说税率是每天收益的八分之一。

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把卡利古拉筹款的种种窘相生动有趣地加以列举，只是绝大部分是当时不太可靠的夸大言辞，直到百年之后，苏维托尼乌斯才把这些片段加以整理编纂。虽然大部分不太可信，然而据说卡利古拉连遗书都涉及了这些方面。如果考虑罗马的实际情况，这其实是个出乎意料又非常有效的办法。

罗马人在指定遗产继承人时，通常指定由平日敬重有加之人继承。于是，先皇奥古斯都对六等亲以内的亲属免征遗产税。然而，卡利古拉认为这是一项可以征收的税金，居然强制罗马人在遗产继承人中加上他的名字。除了现金之外，卡利古拉可继承的遗产，从房屋等不动产到奴隶、角斗士等“活资产”都包括在内。卡利古拉一旦继承遗产之后，他可没有忘记要把这些东西变成现金，自然是立刻拿去拍卖换钱。根据奥古斯都的法令，六等亲以外的人继承遗产必须缴纳5%的遗产税，当然也无从考证卡利古拉缴没缴这笔税。

然而，这里面有别的问题。只有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才是奥古斯都遗产税的征税对象。卡利古拉动手调整后的结果，等于把手伸向罗马公民的钱包。

征收燃料税，向搬运工收税，甚至对色情行业和妓女征税，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公民权，人们认为这是对被统治阶层收税，身为统治阶层的罗马公民权所有人自然不会表示异议。然而，插手遗产继承税，就对身为统治阶层的罗马人造成了直接的冲击。

作为一个法治民族，罗马人非常尊重私有财产，不论贫贱，即使是一张床，他们也会清楚地列在遗产中。所以，人们认为卡利古拉侵犯了他们的私有财产权。此外，卡利古拉还忘记了更重要的事。

只要不触犯自己的利益，不管国家还是私人提供的马戏团或者娱乐活动，人们都欣然接受，也不吝啬表示他们对活动赞助者的支持。如果他们认为侵犯了自己的利益，会立刻翻脸，曾经的支持顷刻间作鸟兽散。然而，卡利古拉没有考虑到这种现实。刚继位时民众们对卡利古拉的狂热追捧日益降温，卡利古拉对此无法忍受。

前往高卢

公元39年秋，卡利古拉登基2年半之后，时年27岁的他突然前往高卢，从此时到公元40年夏返回首都的7个月内，当时的史学家大致记录了卡利古拉的所作所为。可是，对于卡利古拉这么做的原因，也许他们不太关心，并没有记录在册，而后世的研究者只能依靠推测。研究者们认为，卡利古拉已经拥有了一切，而他唯一缺乏的只有军事上的荣誉，也许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在我看来，应该是这样的。通常，人们想要有所作为都是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卡利古拉不喜欢被称做罗马公民的“第一公民”，他想要的“凯旋将军”称号则是士兵们对胜利的军团长的尊称。恺撒自不用说，奥古斯都与提比略都曾被称为“凯旋将军”，只有卡利古拉不是。如果卡利古拉想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那么在甫登基之初，去博取战功的几率应该非常之高，因为那时人们对卡利古拉非常狂热。遗憾的是，卡利古拉那段时期是在不分昼夜的庆典中度过的。在我看来，登基2年半的卡利古拉，除了想要军事上的荣誉之外，他最缺的仍然是“钱”。

当时，罗马军力强盛，拥有15万人的主力军团，以及与主力部队人数差不多的辅助兵。即使是位于东方国力强胜的帕提亚，如与这样的罗马军队为敌，纵然小规模的、零星的战斗能够取胜，大规模的战争必败无疑。卡利古拉身为军队最高统帅，他有权决定如何使用这支力量。

然而，在奥古斯都的策略中，总计30万人的军队力量是维护“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必不可少的防御力量，他为此留下禁止扩大帝国疆域的遗嘱，所以罗马人都相信卡利古拉不可能违背这条遗嘱。

所谓的防线，仅靠击退犯边之敌无法维持边境稳定，必须将来袭的敌人击退，然后乘胜追击，深入敌人腹地，直捣黄龙，再凯旋回营，重新构筑防御体系。否则，就不能算是做好了“防御”工作。

在奥古斯都时代，延伸至莱茵河西岸的罗马军团基地只是单纯的冬营地，提比略将之改为帝国防御体系基础的常驻基地。这么做并不是要让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民族认为罗马军不会越河侵犯。相反，这是提比

略对日耳曼民族的宣言，如若轻举妄动妄图侵犯莱茵河以西，即使穿越莱茵河，罗马军团也会不辞辛苦地还以颜色。因为，在提比略决定从日耳曼撤退之后的20多年里，即使军事行动有所收敛，罗马军队仍然经常越过莱茵河，攻击日耳曼人。

此外，关于以莱茵河为帝国防线一事，卡利古拉时代其实也没有达成一致战略。奥古斯都直至临终前都在幻想称霸延伸至易北河的日耳曼，虽然他在遗嘱中禁止扩大帝国版图，然而没有说清楚帝国疆界是易北河，还是莱茵河。所以，就连出生于卡利古拉时代10年后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都深信，如果把征服延伸至易北河的日耳曼地区的霸业交给日耳曼尼库斯，奥古斯都的梦想早该实现了。然而由于提比略嫉妒日耳曼尼库斯军功显赫，最终使得这件事情前功尽弃。日耳曼尼库斯此名，是代表“征服日耳曼之人”的称号，而卡利古拉就是他的儿子。公元39年，当时的卡利古拉打算征服日耳曼并非匪夷所思。如果能够子承父业，完成父亲遗志，没有任何军功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再者，把日耳曼变成行省后要征收行省税，收缴战利品，这些肯定可以一次性解决卡利古拉国库入不敷出的问题。

卡利古拉到达高卢之后，在里昂略作停留，就急忙赶往莱茵河前线。然而，不清楚是发生了什么事，还是他虚心听取了提比略任命后一直没有调动的军团长的忠告，他最终没有对日耳曼发动进攻就返回首都了，尽管他有权调动8个军团和辅助部队共计近10万人的兵力，首都百姓也肯定会鼎力支持。不过，他还是会进行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今天，我们经常在敌人面前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早在公元39年10月，卡利古拉就进行了类似的军事活动。军队最高统帅卡利古拉在漫山遍野的士兵面前发表演说，最后他说：“希望各位养精蓄锐，把力量和士气留待与敌军交手之时。”

卡利古拉不得不放弃进攻日耳曼，接着他把视线转向不列颠。自从尤里乌斯·恺撒进攻不列颠之后，此后过了百年再也无人问津。因为即

使搁置不管也不会对罗马产生威胁，所以罗马没有理会。奥古斯都和提比略认为，只要多佛尔海峡附近，即高卢附近（今肯特地区）的各个部族能与罗马保持友好关系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实际上，卡利古拉想要进政不列颠是有原因的。有几名不列颠人在部族领导权的斗争中失败后逃往高卢，请求罗马派兵干预。然而，这并不符合罗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传统作战理念。说明白点，卡利古拉进攻不列颠，只是他毫无根据的心血来潮而已。

即使是卡利古拉头脑发热，要付诸实践依然有诸多障碍。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进攻的兵力从何而来？距离高卢最近的只有驻守里昂的1000名士兵。前线必须有人防守，如果从莱茵河抽调军队，8个军团最多只能调动2个。伊比利亚半岛有3个军团，但最多只能抽调1个。卡利古拉不得不决定征集相当于2个军团人数的志愿者加入军队。当然，这笔军费又让卡利古拉更加头疼。

按照罗马军队备战习惯，首先得将确定的因素先准备下来，也即备齐兵力、武器、军粮等，至于精神、士气等不确定因素，那是后话。罗马军历来号称是以后勤补给获胜，确保补给线自然是军团长的首要任务。换言之，开战需要庞大的军费支撑，军团长首先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对获胜后的战利品和行省化后的行省税垂涎不已，卡利古拉才意图染指不列颠，可是一想到军费问题，他不得不放弃。导致国库空虚的主因，一直实行松散财政政策的卡利古拉难辞其咎。

也许卡利古拉不甘心就此罢休，他决定在多佛尔海峡进行军事演习，向不列颠展示实力。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卡利古拉命令士兵们捡拾散落在沙滩上的贝壳。然而我认为，这不是卡利古拉的命令，肯定是为了阅兵式而被带到高卢北部边远地区的士兵们备感无聊，才只好捡贝壳。实际上，卡利古拉只是检阅了沙滩上的军队，以及命人在海角前端设置灯塔罢了。

公元40年5月末，卡利古拉历时2个月之后，又回到了罗马，可是他没有回到被称为“顺城圣区”的市中心。罗马自古的风俗是凯旋将军在凯旋仪式之前不可进入市中心，卡利古拉遵循古制，在8月31日将为他举行凯旋仪式前暂住郊外。然而，这次仪式并不是驾驭4匹白马拉动的战车，而是称为“简化凯旋仪式”的骑马凯旋礼。对卡利古拉的要求元老院向来是照单全收，只是他仅仅做了军事演习和阅兵典礼，允许他用正式的凯旋仪式实在站不住脚。然而，卡利古拉似乎心满意足，仪式虽然很简单，但他故意把典礼安排在他28岁生日当天。因为这样一来，即使是简化的凯旋仪式，他仍然可以听到前来参加仪式的士兵称呼他“皇帝陛下”。由于长达7个月的行省巡视让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国库更是雪上加霜，所以这一切都结束之后，卡利古拉就集中精力，使出浑身解数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

先对有钱人动手就是卡利古拉所谓的尽快筹款办法。而元老院阶级正是卡利古拉指的有钱人，要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交钱，“叛国罪”刚好派上用场。元老院原本满心以为，“恐怖时代”应该随着提比略的驾崩而宣告结束，没想到这种恐怖卷土重来。以阴谋刺杀卡利古拉为借口，他的2个妹妹被流放，离世的妹妹杜路希拉的前夫雷必达和高地日耳曼军团团长格图里克斯被迫自裁。卡利古拉与元老院的关系，从登基后的狂热欢迎逐渐冷却，原本还维持表面的协调，经此一事，已经彻底翻脸。卡利古拉对有钱人阶层“痛下杀手”，原本与此毫无关系的罗马人应该会觉得大快人心，然而，如今甚至连他们都开始同情元老院阶级了。因为人们获得太多，就会感到厌烦。对于卡利古拉，罗马人已经开始生厌了。

筹款迟迟没有进展，另外，卡利古拉也许察觉到民众正在从对他的狂热中清醒过来，于是他打算去帝国东方视察，借此避开这种尴尬的局面。东方地区以富饶闻名，相较西方而言，东方的子民更欢迎日耳曼尼库斯之子继位。或许卡利古拉还认为东方地区更容易筹款吧。

然而，让卡利古拉如临大敌的问题终于浮现在他的面前。说实话，

他这也是自食其果。

罗马人与犹太人

近现代的研究者大多从犹太人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古罗马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用一句话概括而言，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部崇尚自由的犹太人顽强反抗罗马人的历史。然而，如若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是否犹太人以外的其他民族就没有反抗罗马的统治呢？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希腊人、高卢人、西班牙人、不列颠人，以及东方地区各民族，他们也进行了抗争，只是没有顽抗到底。那么，犹太人为何抗争不止呢？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必须得找到答案。

难道是前者追求自由意识的淡薄，后者追求自由的意识强烈？抑或是，罗马人与前几个民族对“自由”的定义与犹太人对“自由”的定义不同？

诚如出生于罗马元首制时代的希腊人普鲁塔克所言：罗马人有着“将失败者同化”的统治精神。犹太人是失败者，但他们拒绝与罗马人同化，不只是罗马人，他们也拒绝与其他民族同化，原因何在？

原因在于这个民族的宗教——犹太教，禁止他们如此行事。摩西“十诫”等同犹太人的宪法，不可违背，“十诫”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之外，尔等不得尊他物为神。”既然是一神教，这位神祇肯定心胸狭隘，因为他不承认犹太教之神以外的神明。为了在多神教支配的时代坚定立场，虽处弱势也对自己的宗教深信不疑，那么相信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相信自己是神选中的子民，这种选民思想成为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当犹太人被困巴比伦、埃及，不得不委身为奴、凄惨度日之时，这种选民思想，以及期待救世主出现的想法就是他们的精神食粮。重返巴勒斯坦后，这个信念依然没有改变。在这一点

上，古犹太人仅次于希腊人，有着非常明显的孤立倾向。一般而言，稍具规模的城市一定有犹太人聚居区，即使身处同一个城市，他们也不会和其他居民融合。并不是犹太人不与其他民族交流，毕竟住在城市的犹太人大多从事金融业和商业，这方面的交流比较频繁，他们本身也有长才。除此之外，即融合或同化，他们毫无兴趣。因为其他民族有不同的神祇，承认了异民族的神就变成多神教信徒，这与犹太人信仰的一神教完全不能共存。然而，亚历山大大帝以后的东方统治者希腊人，以及之后的罗马人都是多神教民族，其特点就是承认其他民族的神明。

犹太人在多神教盛行的古代只能算是一个异类，如果他们只是偏居一隅，不与外界往来的话，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牧羊度日，当然不会对社会产生太大影响。然而，由于财富都集中在城市里，使得他们极度渴望住在城里。

此外，关于法律，罗马人和犹太人的定义也有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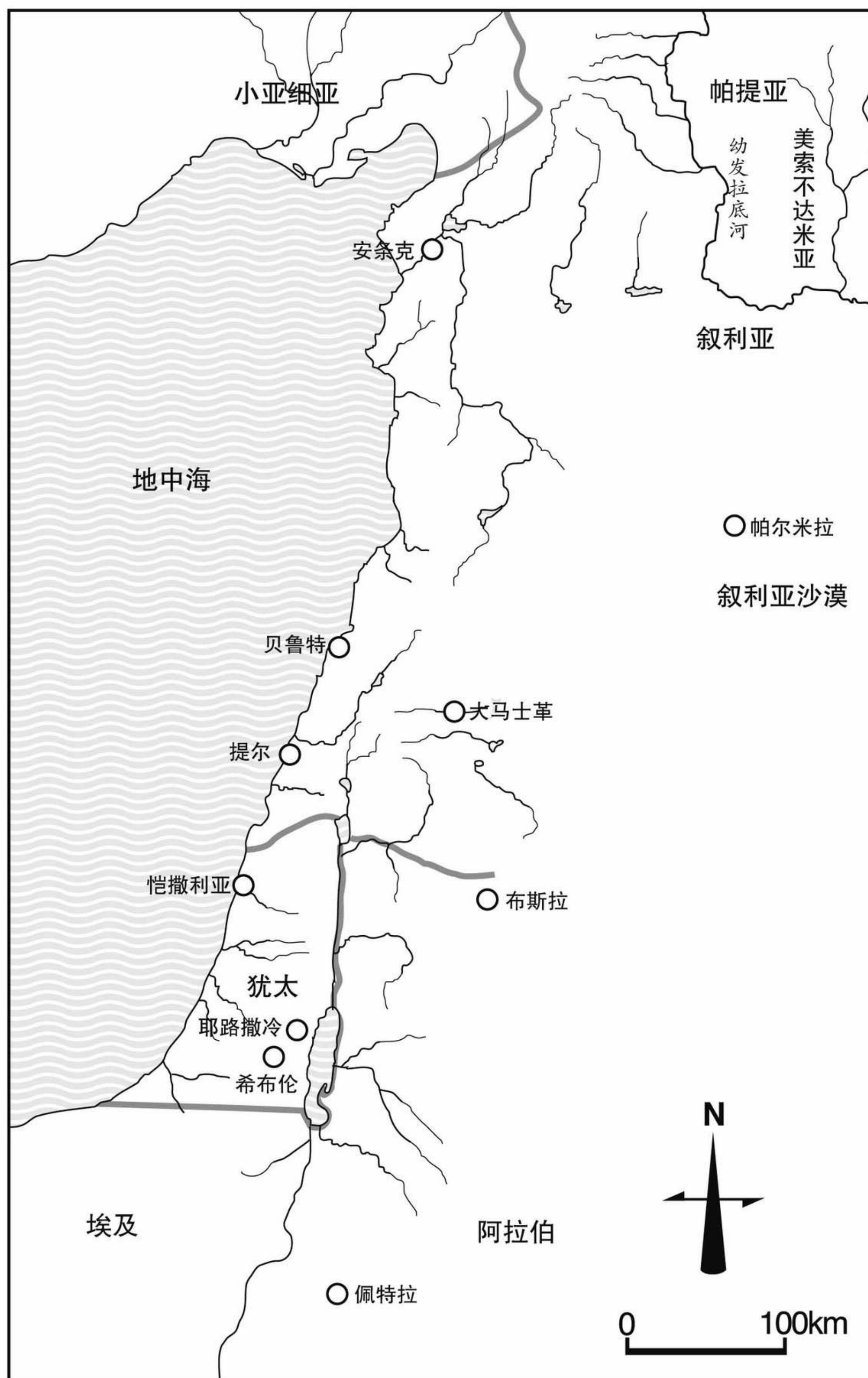
“法律”对于犹太人而言正如摩西“十诫”，是神明赐予人类并要求人类遵守的东西。实际上，很可能是摩西把这些条款在隐蔽处刻在石片上，当他向众人展示时，如果不说这是神谕必须遵守的话，人们都不相信，也无法接受。可是，既然说了是神明的旨意，那么人就不得随意更改，必须严格遵守。

相反，在罗马人看来，“法律”是人类自己思考，在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上由罗马公民们决定是否立法，然后使之成为律法。所以，不符合现状，无法更好地为当下服务的条款肯定要修正过来。

当然，罗马也有类似摩西“十诫”的法律，不过这并非出自神明的旨意，而是由人自己制定出来的。这就是公元前449年公布的《十二表法》，与名称一样，《十二表法》包含12个条款。然而，罗马人耗费了近200年的时间才使得《十二表法》有名无实。罗马人在不断修正使法律符合实际的过程中，法律往往变得面目全非，难辨初文。

换言之，罗马人是让法律符合世人，而犹太人则是要求世人符合法律。但犹太人的“法律”只适用于本民族，而罗马人的“法律”却是整个帝国都可通行，所以罗马人的这种法律精神甚至流传至今。为什么这样讲呢？罗马人观念里的“法律”不是宗教，归根到底仍是法律而已。正因如此，罗马人创造出了符合各民族的基本构想，后世将此称之为“罗马法律的精神”。

在同化定居国内的异民族时，罗马人采用的具体做法是赋予这些民族罗马公民权。按照当时的政策，拥有这项权利可以免缴行省税，所以很多民族趋之若鹜。然而，也有人不愿接受这项权利——古代的“特殊典型”犹太人。根据恺撒制定的法律，医生和教师不分民族都享有罗马公民权，这一政策也随着帝国政权的发展而逐渐遍及全国。犹太人非常优秀，医生、教师数不胜数，可是真正利用这项权利的犹太人屈指可数。因为他们如果成为罗马人，就不得不遵守罗马的法律。



小亚细亚
帕提亚
幼发拉底河
美索不达米亚
安条克
叙利亚
地中海
帕尔米拉
叙利亚沙漠
贝鲁特
大马士革
提尔
恺撒利亚
布斯拉
犹太
耶路撒冷
希布伦
N
埃及
阿拉伯
佩特拉
0
100km

同理，志愿加入罗马帝国军队的犹太人也是少之又少。如果成为罗马士兵，就必须对军队的最高统帅——皇帝宣誓效忠。然而，他们深信，犹太人只能忠于自己的神明，如若违背，必遭报应。

罗马政府很开明，体谅犹太人情况特殊，免除他们服兵役的义务。然而，这反而不利于犹太人融入罗马帝国。

以辅助兵的身份服役满25年就可获得罗马公民权，这是最迅速的大批量产生罗马公民的方法。粗略计算一下，每25年就会产生15万罗马公民。然而在这个体系中，犹太人非常不合群。

犹太人游离于体系之外，选择成为罗马世界中的异乡人。这不是罗马人逼迫所致，而是犹太人出于自愿决定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地中海世界推行希腊化，所以同作为统治者的希腊人相比，犹太人一直是二等公民。罗马人继承希腊人统治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变化。作为一等公民，不仅要保护自己，同时也有义务保护别人。如果不接受这个义务，那么即使优秀如犹太人，也只能心甘情愿地做二等公民。

当然，例外总会存在，这个例外大多是住在城市的犹太人，其中又以知识分子居多。然而，就连今天的以色列人依然认为他们是叛徒。

“普遍”与“特殊”，换言之，罗马人与犹太人开始接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3年，那一年庞培占领了耶路撒冷。

公元前63年，庞培战胜了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并用和平条约牵制帕提亚王国，又兵不血刃地推翻了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于是，希腊文明拉开了序幕。此时，庞培提出，如果犹太人想在罗马霸权下继续保持独立，必须修正犹太教祭司阶层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犹太人拒绝接受，于是庞培出兵耶路撒冷。他没有亲自指挥，只派出部分兵力，所以

没有立刻攻下耶路撒冷。然而耶路撒冷在三个月之后还是破城了。大获全胜的庞培独自进入神殿，他并非为了夸耀自己的胜利，而是出于对犹太教神殿的好奇。庞培注定失望，禁止崇拜偶像的犹太教神殿里空空如也。庞培走出神殿的感想纯真直白，他说："里面一无所有。"

犹太人在知道庞培进入犹太教神殿之后群情激奋。因为按照教规，非犹太教徒不得进入耶路撒冷大神殿，更何况内殿这神圣之地，一年也只允许大祭司进去一次。罗马和希腊的神殿都可以自由进入，所以庞培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自己不带士兵不带武器就是遵守礼仪。可是在犹太人看来，他成了渎神者。

"普遍"并不是要求别人和自己一致，接受"特殊"并认可其存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当然，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这方面，罗马人的本事让人望尘莫及。

公元前48年，尤里乌斯·恺撒为追击法萨卢斯战役中战败的庞培，进军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在滞留亚历山大城期间，他着手协调统治者罗马人与被统治者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使之朝良好的方向发展，对象涉及居住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次年，即公元前47年，尤里乌斯·恺撒离开亚历山大时以"我来，我见，我征服"作为寄语，赠给了在与法尔纳凯斯的战斗前，经过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犹太人。这句话尤里乌斯·恺撒首次明确了统治阶层罗马人与被统治阶层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尤里乌斯·恺撒采取了两种做法，每一种做法都听取了犹太人的请求。第一种，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犹太人后的300多年里，希腊人在东方世界中成为了统治阶层，而犹太人一直处于劣势地位，恺撒赋予犹太人与希腊人在经济上一样的权利。第二种，可谓是给予犹太人"不用履行公务"的特别优待，恺撒允许犹太人不担任包括军务在内的所有罗马帝国公职。恺撒驾崩时，除了罗马人，由于失去了第一个认同他们的统治者与保护者，犹太人的眼泪与悲伤远远多于其他任何民族。然而，请求恺撒认可自己特殊性的同时，犹太人也错过了融入罗马社会的大好时

机。时隔不久，陆续有高卢人、西班牙人出任罗马帝国元老院的议员职务以及行省总督，而希腊人、埃及人出任罗马帝国元老院的议员职务的情形也不断出现，甚至有人成为皇帝，然而犹太人始终没有产生这种人物。犹太人在要求别人承认自己“特殊性”的同时，也意味着亲手切断了通往“普遍性”的道路。

奥古斯都继承皇位之后，依然沿用恺撒的犹太人政策，只要对帝国统治有利，他不惜背负骂名，奥古斯都不愧是务实的罗马人。除了务实的性格，奥古斯都的犹太人政策肯定听取了阿格里帕的建议，因为阿格里帕曾前往当地详细调查，且通晓常识。犹太王族多次使用阿格里帕这个名字也是从此时开始，这可以算是犹太人向这位奥古斯都的“左膀右臂”表示感谢和敬意。此外，罗马帝国的务实方针能够沿用30年之久，显而易见，犹太人中务实正直的杰出人士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希律王虽然不是纯正的犹太人，但在激烈的权力角逐中取胜，最终掌握了犹太大权，他不愧是一个相当有能力的人物。这个人在庞培势力强大时依附于庞培，而在恺撒大败庞培重建犹太王国时，他立刻跑到恺撒跟前，请求恺撒赐予他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称，摇身一变又成为了恺撒的附庸。在恺撒遇害之后，他又以东方势力强大为由，投奔了暗杀恺撒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然而，支持恺撒的安东尼和奥古斯都与这两个反恺撒的人物在腓立比战场上一决高下时，他又用非常冷静的态度保持着中立。之后，在安东尼与奥古斯都的权力斗争中，他再次以东方实力强盛为由，转而支持安东尼。安东尼觉得简直如虎添翼，所以无论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如何央求，安东尼都没有把犹太王国作为礼物送给她。

希律王在安东尼战败之后，立刻改变效忠的对象，转而投向更名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对于迅速来访的希律王，奥古斯都承认他的犹太皇位，也把他当做罗马帝国的盟友。小国当权者的忠诚度因情况而变化，这种自保策略，希律做到了极致。然而，罗马帝国也并不是因为他实行了一些亲罗马政策就欣然承认了他的皇位，比如兴建恺撒利亚（意

为“恺撒之都”），送两个儿子到罗马留学。奥古斯都在冷静地分析了他的利用价值后才作出决定。

第一，希律王是个彻底的专制统治者。犹太的专制统治者，意味着他不允许犹太教的祭司参与朝政。因为对宗教不插手政治怀有疑虑，所以罗马人没有设置独立的祭司阶层。

第二，对于希律王而言至关重要的是皇位能否长久，所以驻守东方地区的罗马军团是他最大的靠山。而对于奥古斯都而言，确保罗马帝国东方地区的稳定与秩序是最为重要的，那么，位于罗马直辖领土叙利亚和埃及连线上的犹太王国，最好能够站在罗马一边。如此，才能形成冷静且正常运转的互助关系。

第三，按今天的说法，奥古斯都作为跨国公司的总裁，有理由相信由当地人担任国情特殊的犹太王国的分公司负责人更合适。而且希律王非常希腊化，即他是西化的东方人，能够充分领会奥古斯都的政策。

第四，要统治在帝国东方地区形成聚居区网络的犹太人，他们的精神家园——耶路撒冷的动向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奥古斯都对此非常了解。无论身在何处，犹太教徒有义务捐出部分收入给耶路撒冷的神殿。集中财富意味着手握财源的祭司阶层权力增强。奥古斯都需要帮手以强权压制容易变成民族主义温床的犹太祭司阶层。整个东方地区的稳定建立在耶路撒冷的稳定基础之上，事关整个犹太人社会的稳定。

30载光阴在这种情况下转瞬即逝。罗马人在这个时期内没有同犹太人发生任何直接关系，便成功地把这个特殊的民族纳入帝国体制之下。然而，公元4年，希律王离世，异变突生。

犹太王国被希律王一分为三，分别传给他的3个儿子。菲利普分得犹太王国的北部，希律·安提帕分得犹太王国的南部，亚基老则分得以首都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中间部分。前两个儿子的统治权得以顺利继承，

然而亚基老继承的耶路撒冷出了问题。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发动暴动，要求恢复祭司阶层神权统治，他们首先免除了希律王任命的大祭司，接着开始驱逐“污秽”的其他居民离开他们的“圣城”。于是，犹太教的圣地血流成河，稚气未脱的亚基老只好请求叙利亚的总督出兵相助。此时叙利亚的总督是瓦鲁斯，这位总督在5年后与3个军团一同殒命日耳曼条顿堡森林。瓦鲁斯没有出动军团强行镇压，他建议发动起义的激进派犹太人代表前往罗马，当面向皇帝禀明他们希望废除王权、恢复祭司摄政的请求。为了向皇帝陈情，共有50名犹太人代表被选出前往罗马。

从巴勒斯坦到罗马得走海路，往返的时间加上在罗马停留的日子，至少得要半年时间。激进派们在这段时间之内并没有像小孩一样乖乖等着。不知是为了要造成既成事实，还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狂徒般命运的驱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终于，瓦鲁斯不得不出动叙利亚的守军加以镇压。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希律王的老办法，通过武力才让耶路撒冷重新恢复了稳定。

站在帕拉蒂尼山上的阿波罗神殿前，已经66岁高龄的奥古斯都接见了这些代表们。皇帝站在通往神殿的石阶上，聆听并排站在台阶下的50名代表陈情。奥古斯都允许这些代表们的背后站了8000名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来自定居于台伯河对岸的第14区。耶路撒冷的命运紧紧牵动着海外犹太人的心弦，这一点相信奥古斯都再一次深刻体会到了。

然而，对于这些犹太人的要求，奥古斯都严词拒绝了。尊重希律王的遗言是奥古斯都拒绝的重要理由，是奥古斯都身为希律王指名的遗嘱执行人的义务。不用说，奥古斯都真正的用意是不承认神权统治。希律王时代，犹太人的税赋非常之高。奥古斯都拒绝废除王权，但希望用减轻税赋来回答这些犹太人。

留在国内的同胞不满意代表们带回来的这个答复，暴动再度爆发。

无奈之下，奥古斯都只好放弃没有能力平息暴乱的年轻国王亚基老。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用两年不到的时间废除了王权，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可是，奥古斯都根本不打算让犹太教的祭司管理国家。几经考虑，针对希律王留给亚基老的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中部地区，罗马政府决定将其纳入直接管辖范围，由耶路撒冷权力阶层组成的长老会保留行政权。换言之，罗马把内政的自治权留给犹太人。

公元6年，耶路撒冷和犹太中部地区在经过多次波折之后，都变成了罗马帝国的行省，然而，它们只能归为B级行省。因为，到这里任职的长官都出身罗马的第二阶层——骑士阶级，其直属上司是负责叙利亚行省的总督，而不是皇帝，相当于把耶路撒冷划归叙利亚行省之下。

奥古斯都并不是不重视，才将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中央部分编为B级。如果那个地区暂时没有合适的继承人，奥古斯都以及其后的提比略通常将之划入行省范围，直到下一位合适的继承人长大成人。就像现代企业先从总公司派人前往暂理事务，等到当地有合适的人选再与之交接。其实，奥古斯都并没有放弃犹太人治理犹太人的盘算。

商业发达的恺撒利亚有很多希腊居民，住在这里的犹太人也以稳健派居多，犹太长官的宅邸就建在此地，而非耶路撒冷。罗马留在此地驻扎的军队不是罗马公民组成的正规军，而是在叙利亚征集的希腊志愿辅助兵，只有3000人左右。这样一来，这些士兵在与大多使用希腊语的犹太人没有语言方面的问题。当然，所有这些安排都是为了安抚犹太人。

罗马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摩擦因为观念迥异也时有发生。罗马人为了准确把握实际情况，在这个地区归入行省后立即进行了人口与资产调查。犹太人从来没有这种习惯，他们认为罗马人这样做是要把他们变成奴隶。在他们看来，行省税缴给身边的国王就可以了，要上缴给远在罗马的皇帝实在难以接受。犹太人无法理解花钱保护自己和其他民族安全有什么用。耶稣基督曾说“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从他的回答引申出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犹太人必须向罗马人缴税？”言外之

意，我们除了捐钱给犹太教的神殿之外，为何还要交钱给罗马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没有几个犹太人明白宗教无法取代安全防卫。

犹太人在向行省过渡的这段困难时期，居然没有发生任何暴动，有两个因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犹太人并非完全一致，他们分为两种类型，居住在没有岩石的海港城市、思想较为开明的犹太人，与由农民或耶路撒冷下层人为核心的激进派犹太人。第一种类型欢迎罗马的直接统治所带来的稳定秩序，因为他们大多从事工业、金融业与商业，能够理解罗马人为什么要进行调查和征收行省税。

其次，奥古斯都起用了叙利亚总督瓦鲁斯，来完成犹太行省化这一艰苦的工作，这是个很有才干的人物。

总督瓦鲁斯首先确保了稳健派犹太人居多的海港城市的自治权，如此一来，在犹太中部地区，不仅仅是耶路撒冷，从恺撒利亚开始，形成了许多在内政上拥有自治权的城市。这项政令的第一个目的是实施罗马统治的原则“分而治之”，第二个目的则是尽量削弱耶路撒冷的影响力。言外之意，就是使得稳健派与激进派分化开来。

对于耶路撒冷的特殊性这一点，总督瓦鲁斯也没有忘记。宗教人士介入司法是神权统治的明显特征，当然，这对于遵循神明赐予的律法进行裁决的犹太教而言是丝毫不容置疑的。所以，罗马帝国把耶路撒冷纳入直接统治后，祭司阶层负责司法的做法仍然保留了下来。

当然，严格遵守罗马法律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的义务，罗马法律当然也会制裁犯罪的人。

相比较而言，犹太教徒没有罗马公民权，所以他们犯罪时一般用犹太法律作为裁决基础。摩西“十诫”的后半部分就规定禁止杀人、奸淫、

窃盗、作伪证、侵犯民宅。当然，这也是罗马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所以交由犹太教处置也是合理的。只是判处死刑时必须经过作为“皇帝代理”的犹太“长官”同意，否则没有效力。

谈到耶稣基督的案子，也是由耶路撒冷的祭司们组成的法院判决之后，经过当时的犹太长官本丢·彼拉多同意后执行死刑的。然而，当时本丢·彼拉多屈从于祭司们的压力，以洗手的象征性动作表明，这是你们（犹太方面）决定的事情，不是我们（罗马方面）决定的事情，从而导致了耶稣被判处死刑。依照犹太教的律法，随意口称神祇之名的人都会被处死，然而在多神教的罗马这只是小事一桩。如果当初本丢·彼拉多坚持自己的意志，按照自己代表的罗马法律行事，那么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对可能影响社会安定的罪名，并且虽有隐患却没有造成真正的危机，依照罗马法律规定最多也只是被判处流放。可是，如果耶稣被判处流放至黑海地区，而不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日后的基督教也就不会发展壮大了吧。而本丢·彼拉多的玩忽职守给罗马帝国埋下了祸根。

总督瓦鲁斯的犹太政策是在充分考虑犹太人特殊性的同时遵守罗马的普遍性要求，然而，彼拉多担任犹太长官时，瓦鲁斯已经离世。

皇帝掌管帝国的金银币铸造权，然而使用频率最高的铜币的铸造权，除了帝国之外，拥有自治权的城市，比如雅典、斯巴达一类“自治城市”，也可以铸造。只是，首都罗马的铸造权则由元老院负责。受罗马直接统治的行省没有这项权力，因为行省以罗马钱币为流通货币，当然，皇帝的头像无一例外地都被铸在了货币上。

罗马帝国把犹太王国纳为行省，希律王时代铸造的钱币就不能继续使用，代之以罗马货币。然而，摩西“十诫”里就明文规定禁止雕刻塑像，所以导致了犹太教没有偶像崇拜。

针对这种情况，总督瓦鲁斯在犹太行省发行的是没有皇帝头像的铜

币，因为铜币的流通频率较高，但并没有改变金币与银币的设计，因为普通民众很少接触到金币和银币。

此外，总督瓦鲁斯十分尊重犹太教的习俗，发布了禁止非犹太教徒进人耶路撒冷神殿参拜的戒律，违者处死。此外，奥古斯都与妻子莉薇娅历来排斥包括犹太教在内的东方宗教的罗马上层人士，却例外地向耶路撒冷神殿捐赠了大量钱物。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成为行省人民后，罗马人没有把能够彰显军事实力的军队驻扎在耶路撒冷，而是改在100公里之外的恺撒利亚驻扎，以避免刺激他们。除此之外，罗马帝国还规定恺撒利亚的驻军若事出有因不得不前往耶路撒冷时，必须将皇权的象征——军旗留在恺撒利亚才能拔营。

继任者提比略沿用了这个由叙利亚总督瓦鲁斯身先士卒执行的奥古斯都犹太政策，我们应该说他贯彻得更彻底。提比略继位之后，瓦鲁斯似乎还是叙利亚总督。

耶路撒冷神殿原本供奉着罗马人捐赠的没有皇帝象征的供品，然而考虑到犹太人会觉得非犹太教徒的供品弄脏了神殿，于是提比略下令，将这些供品都移到恺撒利亚供奉先皇神君奥古斯都的神殿内。此外，犹太教大祭司在祭典上的法衣原本也由罗马方面保管，放在耶路撒冷神殿内，提比略也命令将之归还，让犹太人自行保管。曾经，法衣由异教徒的罗马人保管，每当祭典之际犹太祭司前来借用时，都必须花7天时间以消除衣服上的污秽之气。

公元21年，顺利实现犹太行省化的普布利乌斯·苏尔比基乌斯·瓦鲁斯与世长辞。提比略以他对国家鞠躬尽瘁为由，下令以国葬之礼厚葬了这位总督。纵观瓦鲁斯一生，出生低微，却在军团中受到赏识，接着被选为执政官。随后又在日耳曼、非洲、叙利亚被委以要职，临终又得享国葬。在重视出身背景的由元老院把持朝政的共和制时代，这无疑是天

方夜谭。对于出身寒门的有识之士，由恺撒开创、奥古斯都确立、提比略加以巩固的帝政时代，实在是施展才干的伟大时期。

提比略在瓦鲁斯去世之后并没有掉以轻心，所以犹太人的治理比较顺遂。当然，历届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直接接触的犹太官员中，由于对此民族的特殊性一无所知而治理不当的官员大有人在。身为犹太长官必须有所准备，时刻保持清醒，因为一旦犯错被提比略得知，立即免职，并且被召回本土接受审判。从公元26年起，担任犹太长官10年的本丢·彼拉多就是个典型。他让扛着军旗的军队进人耶路撒冷，并受到犹太人多次发生骚乱的牵连，最终导致他被撤职。

其实，罗马的当权者未必是犹太人反抗的主要原因。犹太人作为一贯处于弱势的民族要从被害意识中获得解放，走向自由，并不容易。因为这些人满脑子都是受害者意识，面对强者时经常反应过度。所以，在其他行省无足轻重的小事，到犹太人身上就会变成大问题。

奥古斯都的犹太人政策不仅被提比略完完整整地继承了过来，而且在他手上执行得更为彻底。奥古斯都时期的政策针对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中部的犹太人，提比略把帝国全境的犹太人囊括在内。此外，他还不只是扩大政策适用范围，还考虑到东西方的差异，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种“因地制宜”与“分而治之”的政策相辅相成，都是罗马帝国基本的治理方针。

之所以提比略会贯彻奥古斯都的犹太人政策，这并非是奥古斯都执行不到位，而是因为有些问题在奥古斯都时代不甚明显，到了提比略时代就迫在眉睫了。犹太人除了只遵从神明的法律外，还有另一个特点。

希腊人与犹太人

希腊语“代阿斯珀拉”（Diaspora，大流散）意为离开故国定居海

外，现代普遍认为这是犹太人特有的一种现象。姑且不提犹太人被强制迁徙到巴比伦和埃及的例子，但单论定居海外，希腊人早有先例。罗马人在各地兴建名为“科洛尼亚”的殖民城市只是政策移民，而非人们自发迁移形成的人文现象。就自主性移居而言，希腊人堪称先驱，而犹太人则是紧随其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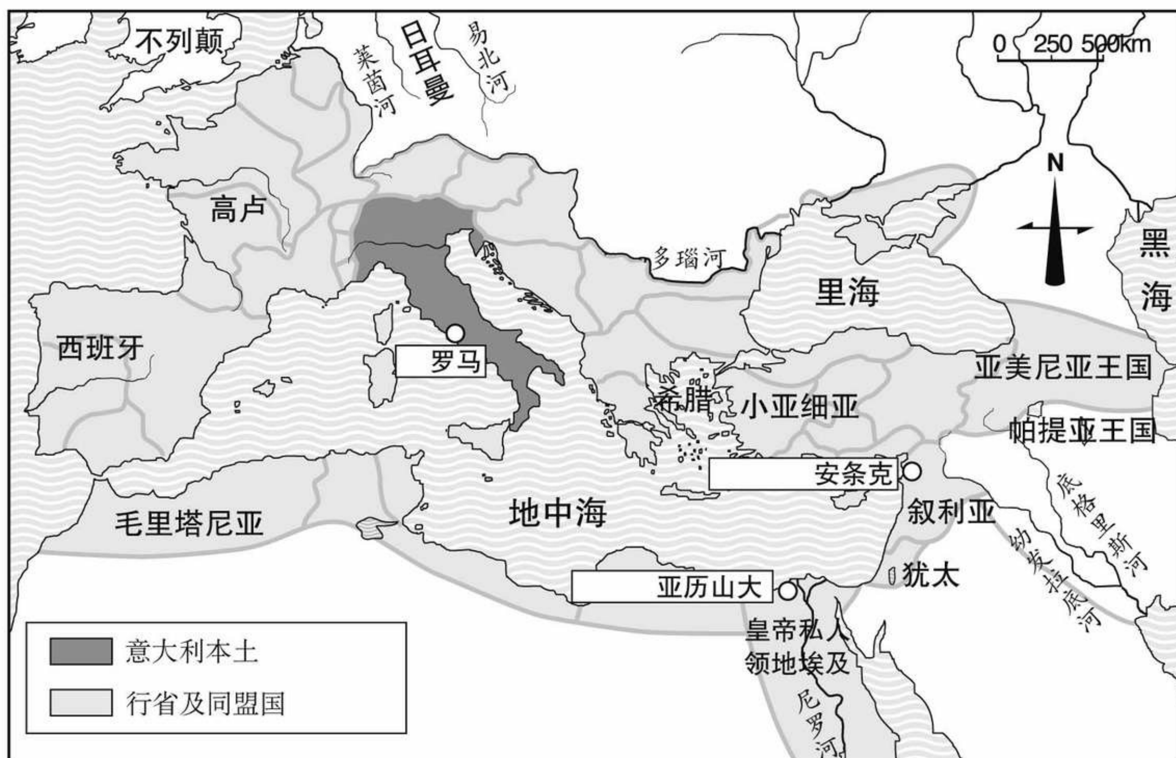
然而，两个民族的迁徙，在本质上则是天差地别。

首先，希腊人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建设新的城市，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手工业、商业，慢慢地积累财富；与此相反，犹太人则是迁移到现有的发达城市，在那里从事手工业、商业与金融业，以此积累财富。公元前1000年，希腊人就开始向地中海周边移民，不论东南西北，在各地都兴建自己的城市，然而我们找不到任何一座犹太人自己兴建的城市。很显然，犹太人不会移居到贫瘠之地。

公元前后过渡时期，地中海周边的东方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犹太人聚居区，然而在罗马帝国等西方的各个城市中并没有同等规模的犹太人聚居区。因为罗马虽然是霸权国家的首都，但西方的富庶之地并不多。

然而，实现“Pax Romana”（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以及普及基础建设，使西方的经济迅速提升，以往差距颇大的东西方经济开始趋于平衡。也许有人认为财富都集中到罗马了，事实却不是这样。罗马、亚历山大与安条克是罗马帝国的三大都市，然而只有罗马属于西方地区，亚历山大和安条克都在东方。身为统治阶层的罗马人很重视整个帝国的财富流通，他们并不认为必须把财富都集中到罗马。行省税并不是被统治者向统治者进贡，而是保障他们在帝国境内安全的保护费。

不管怎么说，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提升的西方经济实力逐渐引起了犹太人的兴趣，此时的西方地区也真正具备了犹太人移民的条件。恰逢此时，提比略登基为皇。



罗马帝国的三大都市

提比略与犹太人

从一直重用叙利亚总督瓦鲁斯，以及采取各种缓和措施避免刺激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等事，我们可以看出提比略非常了解犹太人的种种特殊性。正因为这份了解，他也深知，对推行普遍标准的罗马帝国而言，固执地保留其特殊性的犹太人会带来什么危害。怎样才能让以神明的律法为圭臬的民族和遵循人类法律的人民和平共处？若对他们不闻不问，随时会出事。在东方地区，比如节庆期间希腊居民和犹太居民经常发生冲突，就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希腊人是多神教民族，与罗马人在法律是人类创造的观念上最为接近，同时他们毫不抗拒地接受了与罗马人同化。

摆在提比略面前的是如下事实：

亚历山大城总人口过百万，居民分5个区居住，其中3个区是希腊人，剩下的2个区都是犹太人。然而今天缺乏罗马人口调查数据，我们只能推测当时的人口数量，肯定有超过40万犹太人住在这个城市。位于东方的另一个百万人口城市安条克的犹太人口也大致差不多。

罗马一共划分14个行政区，其中只有1个区允许犹太人居住，况且移民到罗马的犹太人十分稀少。因为罗马开始富裕不过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才发生的。研究者估计，犹太人定居罗马的应该在2万人左右。在100万人中的40万人与100万人中的2万人，这一数据中大概隐藏着允许“特殊”又贯彻“普遍”的对策。

提比略承认东方各个城市犹太人聚居区沿用奥古斯都时开始的办法，即同意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本民族内行使司法权，除了执行死刑必须经过罗马总督或长官的许可之外，所有的规章制度都沿用耶路撒冷的做法。换言之，提比略承认东方地区的犹太人有权依照神明的法律进行审判。

此外，认可犹太人渴望已久的周六安息日，可以说也是提比略一个高明的决策。休假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是向众神献祭的节日，人们通常会放下手头的事情去参加祭祀仪式，观赏祭神的角斗比赛或戏剧等等。所以，犹太人除了向神明祈祷之外什么都不做的休假方式，实在令希腊人与罗马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对犹太人而言，摩西“十诫”的第4条既然规定了“安息日即是圣日”，若不遵守必遭天谴。身为统治阶层的罗马人，居然能够忍受犹太人“什么都不干”的习惯，而自己在每周六努力干活。对此，提比略也别无他法，这是因为在百万人口中犹太人达到40万人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在百万人口中犹太居民只占2万人的西方地区，提比略实行的政策是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这项政策没有限制或禁止犹太人迁移，然而他们必须甘心接受西方不同于东方的不利条件。摩西“十诫”中规定了犹太人每周六“什么都不干”，所以提比略爽快地同意了，然而提比略不允许犹

太人聚居区享有自行审判的司法权。犹太教徒要移居西方地区，不论是谁都必须严格遵守罗马法律。由于犹太人只有2万人，处于弱势，所以这项政令可以顺利进行。

然而，就是这位提比略，强制要求包括耶路撒冷在内不分东西方，各个城市的犹太人都要遵守这一条规定：承认犹太人包括宗教信仰自由、迁移自由在内的所有犹太人的特有习俗，但坚决反对任何以反罗马为目的的行为以及影响社会稳定的活动。这些居住在罗马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必须时刻牢记这一条。公元19年，时任犹太总督的瓦鲁斯对犹太教徒推行怀柔政策。与此同时，提比略以造成社会不安为由，强制从罗马本土驱逐所有住在罗马的犹太人，虽然这只是暂时的。承认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但绝不允许他们演变成社会动乱的根源，这就是由提比略确定的罗马人对异教徒的政策。

在犹太人聚居较集中的帝国东方，提比略继承了恺撒和奥古斯都的方针政策。希腊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对立，因历史等种种因素使得两者的关系日益恶化，提比略的策略是站在调停者的立场，不偏不倚，公正裁决。毕竟帝国的东方是建立在这两个民族之上的。

和愿意接受与罗马人同化的希腊人不同，犹太人不愿被同化，所以管理犹太地区时让犹太人自己来做负责人是上上之策。我想，提比略对此心知肚明。然而，提比略一直没有合适人选，虽然他对候选人之一希律王之孙希律·阿格里帕评价不错，但又指责希律·阿格里帕缺乏责任感。因此，提比略不得不维持由叙利亚总督指挥下的“长官”直接统治这一办法。

提比略驾崩之前罗马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住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斐洛对罗马的帝政赞誉有加（参见前文），足以证明当时帝国境内的犹太人非常满意罗马人从恺撒、奥古斯都到提比略持续一个世纪以来的统治。当然，卡利古拉也承袭了这些政策。身上流着奥古斯都之血的卡利古拉一定会将这项政策执行得更好，以斐洛为首的犹太人

对此深信不疑。

卡利古拉与犹太人

我们人类，不论是谁，在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着种族偏见这一意识。但有两个必要前提才会意识到这一点：首先，过着每天都能见面的共同生活；其次，两者之间有着利益冲突，也即利益不一致。在地中海东岸长期生活并存在利益冲突的，就是希腊人与犹太人，而无关罗马人。当然希腊人与犹太人都非常能干，正因如此，他们在各方面都会形成利害冲突。且不提经济方面的较量，两者在学术领域也有着很强的竞争关系。由于希腊人的航海才华呈压倒性优势，所以，大概海运是他们唯一没有利益冲突的领域。

亚历山大大帝开创的希腊文明时代，历时3个世纪之久。在这个时期两个民族的身份变成了统治者的希腊人和被统治的犹太人。表面上的确如此，这也有助于保持他们之间的平衡。然而，希腊人统治的最后据点在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战败之后，也被纳入罗马帝国版图。罗马人从公元前30年开始，成为了这一地区唯一的统治者，作为被统治者的希腊人和犹太人就不得不成为了“同居”关系。

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期，而彼此间的利益冲突不断深化，这样长年累月积累起来的对立关系不可能在转瞬间冰消瓦解。此外，可以说在罗马霸权之下，这两个民族的选择明显两极分化：希腊人选择与罗马人同化，犹太人则拒不接受。

即使这样，拥有可以将失败者同化这种特质的罗马人认可特异分子——犹太人的特殊性，把他们纳入统治体系。对犹太人而言，我想从恺撒、奥古斯都以至提比略的这一个世纪，他们的生活应该比希腊人统治时期要好得多。犹太人如此拥护卡利古拉登基，恰恰证明他们希望罗马

人继续维持帝国政权统治下去。

然而，卡利古拉根本不懂罗马皇帝的“无冕之王”才是凌驾诸王之上的本质，在他心目中只有成为各个民族的“神”，才能超越凡间的各个国王。

于是，卡利古拉的举动让犹太人十分为难。在卡利古拉大病时，犹太人献上供品诚心祈求他早日痊愈，然而犹太人根本不能认同卡利古拉是神。与犹太人不同，希腊人是多神教的民族，所以多一个神明也无关痛痒。如何对待宣布“我即神”的卡利古拉，这再次激起了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对立关系。双方的这种大规模对立冲突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正式爆发，这是因为在帝国的东方地区，亚历山大城的希腊人和犹太人势均力敌，不相伯仲。

公元38年，卡利古拉继位后才一年，亚历山大就爆发了民族冲突。刨根问底，起因是希腊人借卡利古拉之名发泄对犹太人的敌对情绪。换言之，是希腊人先对犹太人寻衅生事。

停泊在港口的所有犹太人的船只都被抢劫焚烧，甚至连犹太人集中居住地的百姓也不能幸免，家里都被抢劫一空。哪怕是从居住的地方出门都不能保障安全。希腊人甚至把卡利古拉的雕像搬到犹太教的教堂内，借此讥讽犹太人胆小怕遭天神报复的心理。

为了平息希腊人与犹太人的纠纷，派驻埃及的皇帝代言人——罗马官员责任重大。时任埃及长官的是弗拉库斯，由提比略提拔上台的他一改以往的仁慈，果断地强硬出招。但是，此次他没有居中调停，而是支持希腊人。在他看来，年轻的皇帝卡利古拉即位才一年，他的统治生涯必定很长。况且国内都知道卡利古拉自封为神，所以强硬镇压尊卡利古拉为神的希腊人肯定困难重重。至此，亚历山大的这场暴动，演变成了以埃及长官弗拉库斯带头的大规模镇压犹太人事件。

弗拉库斯首先废除周六安息日，以犹太人没有权利居住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为由，把以往5个区中可以居住在2个区的犹太人全部赶到1个区。犹太人被赶走的地区，400多间房屋与犹太教教堂都被焚烧得干干净净，在希腊居民的嘲笑声中，36名祭司被带到角斗场接受鞭笞。

而犹太人经营的工场被关闭，商业活动全部停摆。由于担心希腊人打砸，就连贩卖日用品的商店也关了门。被称为东方第一大城市的亚历山大约有半数城区陷入混乱之中。

犹太人除了直接向罗马皇帝投诉之外别无他法。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法律允许直接上诉，犹太人大概已经习惯提比略23年来未曾改变对犹太人的政策了。所以，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决定向罗马皇帝卡利古拉上诉。虽然卡利古拉自诩为神，然而他毕竟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犹太人满怀希望地想见到卡利古拉之后能请皇帝居中调停。

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一致决定，由学富五车、在犹太人社会中威望高、号称“犹太的柏拉图”的斐洛担任前往罗马的使节团首席代表。因为斐洛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同时他又不吝于承认希腊、罗马文明的优点，坚信罗马帝国政权下犹太人生存的可能性，是稳健的都市犹太人，所以尽管他年届古稀，仍然被认为是最佳人选。此外，他资产颇丰，可以负担使节团所有成员的花费。

当然，斐洛的优点不止于此，他有一个会让罗马政府产生好感的家庭背景。斐洛的胞弟名为盖乌斯·尤里乌斯·亚历山德罗斯，他是一位非常有钱的金融业者，正如名字所示，他取得了罗马公民权，同时他还管理着卡利古拉的祖母安东尼娅的财产。由于卡利古拉几乎继承了祖母的全部遗产，盖乌斯管理着皇帝在东方地区的私有财产。此外，斐洛家族中还有一个获得罗马公民权的亲戚，名为马库斯·尤里乌斯·亚历山德罗斯，也是“财经界”的重要人物。他跟犹太王希律·阿格里帕一世的女儿贝蕾妮丝结为连理，马库斯也因为这桩婚姻，和卡利古拉的挚友犹太王希律·阿格里帕成为亲戚。

另外，斐洛的一个儿子拥有罗马公民权，他叫提比略·尤里乌斯·亚历山德罗斯。他选择在军队里工作，在父亲担任使节的同年他业已晋升为罗马军队的大队长了。此后，这位犹太裔的罗马人取得了显赫的位置，他在克劳狄乌斯皇帝时代担任犹太长官，尼禄皇帝时代出任埃及长官，韦斯帕芗皇帝时代晋升为近卫军团长官。尽管被罗马人同化的犹太人十分稀少，然而，还是会有部分人活跃在罗马社会各个领域。

公元38年初冬，经过长途跋涉，以斐洛为首席代表的犹太使节团终于来到了罗马。他们一直以为卡利古拉会立即召见，却迟迟不见有人通知。他们拜托身在罗马的希律·阿格里帕向卡利古拉说情，而卡利古拉的答复是等希腊使节到达罗马后再一起召见。希腊人经常避免冬季出海，加之他们没有向皇帝上诉的紧迫感，所以出发得非常迟缓。希腊人如果秋天没有出港，势必会到第二年的春季才出发。如此看来，希腊使节团抵达罗马应该是在公元39年春意盎然之际。当然，亚历山大的希腊人派遣了一个以学者为首席代表的使节团前往罗马，他就是名为亚比昂的著名哲学家。而提比略毫不客气地说他是一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学者”。当然斐洛并不惧怕口若悬河的亚比昂，然而在这一段长时间的焦躁等待中，斐洛对身为调停者的卡利古拉感到深深的不信任。

终于等到希腊使节团抵达罗马，可以谒见皇帝了。在罗马“七丘山”之一——埃斯奎里山上面积广阔的“梅塞纳斯大宅”的皇帝私宅内，卡利古拉接见了双方代表。梅塞纳斯是奥古斯都的亲信，他去世时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奥古斯都，所以这个能将整个罗马城尽收眼底的景区也变成了皇帝的私有财产。卡利古拉原本打算在这里招待罗马上流社会人士，欣赏戏剧表演。当他前往视察时，顺便把希腊人和犹太人双方的使节团叫到了“梅塞纳斯庭院”。因此，这次接见不是在固定的议事厅中面对面地坐着，而是三方都站着交谈。我把斐洛记载当天会见的全部过程翻译了下来。卡利古拉在此时快要迈入27岁的年龄了。

我们被带到皇帝跟前的时候，充满敬畏地把头低了下来，双手

前伸，口呼“敬爱的皇帝陛下”。随即，卡利古拉用极度挖苦嘲讽的口吻说：“原来就是你们啊，听说你们憎恶其他神明。其他民族都承认我是神，只有你们，信仰禁止你们口呼其他神明的名号，所以不肯承认我是神啊。”卡利古拉说完之后，两手高举，看着天空，对着神明大放厥词，让我们难以忍受。

与对我们的态度完全相反，皇帝对希腊使节团的亲切仿佛是在挖苦我们。希腊人因此得意洋洋，以夸张至极的动作和恶心而低贱的话语去拍皇帝的马屁。一位叫伊西多罗斯的希腊代表甚至说：“尊敬的主人，如果您知道这群家伙在亚历山大干下的蠢事，我敢说，您会更加厌恶他们。您大病之时，亚历山大的居民举行祭祀，献上祭品，诚心祈求您早日康复。可是只有这些家伙，就是这群犹太人，他们说神明不允许，竟然不为您祈祷，实在可恨。”

我们异口同声地反驳：

“伟大的盖乌斯（卡利古拉的名字），请您明鉴！伊西多罗斯对我们的指责不过是毫无根据的恶意中伤，请您明察。您贵体染恙，我们也为您奉上牲礼，而且不像他们只用了几头，我们奉上100多头家畜诚心祈求。并且，我们依礼为您正式祈祷。把祭礼办好，并不是在祭坛前宰杀家畜，把它们的血洒在祭坛四周，然后把肉带回家吃掉。而是宰杀后要等牺牲化为灰烬，这才是真正的祭祀。我们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不仅如此，我们不止一次举行这种祭祀。您登基后的两年内，我们就举行过三次。第一次是您继承皇位之时，第二次是您病倒、整个帝国和您一起生病消沉的时候，第三次是您与日耳曼人作战时，我们举行祭礼祈求您凯旋。”

卡利古拉对于我们诚恳的辩白却如此讽刺道：“那我就算你们确实举行过牲礼。然而牲礼是献给神明的，你们信奉的宗教却口口声声说神明只有一位。难道你们在献给唯一神明的祭祀中会去祈求另一位神幸福安康？”

口不择言的卡利古拉一边说，一边检查布置在庭园各处的表演

场地，根本没有放慢脚步。他逐一检查各处让贵客观赏的表演场地，不停地在楼上楼下来回走动，若有不满意之处，他当即下令改过来。然而，这种做法就意味着需要浪费更多的钱财。

我们在他后面亦步亦趋，不断地在楼上楼下来回走动。这期间，希腊使节们毫不客气地继续指责我们，肆意嘲笑我们。然而，对于卡利古拉偶尔的发问，他们回答不出所以然来，所以皇帝和希腊使节团之间的对话，时断时续，没有顺利进行下去。

突然，卡利古拉向我们发问道："你们为什么不碰猪肉？"

这个刻薄的问题又引起希腊方面的哄堂大笑。然而，我们依然诚恳地回答道："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律法，不同的律法就会有不同的忌讳。希腊人也不例外，山羊数量多，又便宜，然而他们不吃山羊。"

卡利古拉大笑，然后他说："这简单，因为难吃嘛。"

在这种氛围下皇帝接见我们，这让我们困惑不已，心情更加沉重。卡利古拉接着又问："犹太人现在行使的政治权利有哪些？"

我们开始讲解的时候，他侧耳倾听，说明他愿意理解我们的立场，然而风云突变。我们说到重点的时候，正在检查的卡利古拉就踏进了庭院中央宽阔的表演台。因为卡利古拉开始下达命令，我们只好打住。他命令在四周的窗户上缀满如玻璃一般白色的稀有石头打磨成的薄片，这样既可以采光，又可以使里面的观众免受强风或强光的伤害，一举两得。之后，他又面向我们，问道："刚才你在谈什么？"

接着刚才说到一半的话，我们又开始重新讲解，可是卡利古拉依然没有放慢脚步。他刚踏进下一个表演馆就再次下令改装。这次他要求更换用来装饰表演馆墙壁的画。

才吩咐完，我们以为他会认真听我们解释，没想到他突然说道："我觉得你们犹太人也没有希腊人说的那么糟糕，然而你们的确是一个不幸又愚昧的民族，因为你们居然不承认我继承了神明的本质。"

他说完这话扬长而去，我们也只好回去了。

不论是罗马的史学家，还是后世的作家对卡利古拉的描写，都不及与卡利古拉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这位犹太人写得栩栩如生。不论是2000年后的阿尔贝·加缪在戏剧《卡利古拉》中刻画的人物，还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意大利各自拍摄的《卡利古拉》的电影中，化身为性与暴力怪物的卡利古拉，这些题材都来自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皇帝传》。这本传记是苏维托尼乌斯在卡利古拉作古百年之后，收集流传在街头巷尾的传言编写而成。然而，卡利古拉并不是一个幸运或者不幸的怪物，他的头脑也并没有那么愚昧。只是他的不幸，抑或是罗马帝国的不幸，是让一个不懂政治的年轻人，从政治的立场出发去肩负政治上的责任。对于卡利古拉而言，其实他也有批评眼光。卡利古拉曾经开玩笑地讲道，要任命他的一匹爱马英西塔士斯担任元老院议员，这其实是在嘲笑元老院议员们素质的降低。然而，这种玩笑话流传到他身后，就变成了他要把一匹马任命为元老院议员的狂妄举动。

虽是这样说，但是批评与实践有着很大的不同。所谓的政治实践正如人们常说的"没有新闻就是进展顺利"一样，是一件脚踏实地的工作，同时也要求有始有终。随机应变固然不错，但容易见异思迁，对政治实践者而言这无疑是自掘坟墓。

我们只能说，以斐洛为首席代表的犹太使节团的罗马之行有得有失。失败之处在于犹太人的不利环境根本没有获得改善。但还是有成功之处的，即卡利古拉重新任命的长官不允许亚历山大的希腊人继续对犹太人横行霸道。作为罗马帝国东方地区发达的经济中心，埃及的亚历山大与叙利亚的安条克齐名。当然，犹太人积极参与经济活动才使得亚历山大能够发挥经济中心的职能。

卡利古拉在斐洛回到亚历山大不久就再次前往行省，前面已经交代过他在莱茵河沿岸和连接多佛尔海峡的高卢发生的故事，此处不再赘

述。随后，他在返回罗马之后，举办了一场虽然仪式简单但也算做凯旋的庆祝活动。然而，恰逢此时，因巴勒斯坦又生事故，卡利古拉的目光再次转向犹太人。

势力对决

莱茵河前线为迎接卡利古拉举行了军事演习，随后又在罗马举行了凯旋仪式，所以当这么大的消息传到东方的犹太地区时，似乎变成了卡利古拉征服了日耳曼民族的信息。为此欢欣鼓舞的希腊人准备搭建供奉卡利古拉的祭坛，并在此举行牲礼祭祀。

希腊人的行为深深刺激了犹太人。愤怒的犹太人如潮水般涌来，把大理石祭坛砸得粉碎。这件事当然上报给了返回罗马的卡利古拉。

卡利古拉原本就对犹太教徒没有任何好感，接到报告后果然大发雷霆，他武断地决定必须用武力解决。对于卡利古拉的决定要是发生在今天，肯定非常轰动，一定是电视里的头条新闻，以及报纸上的头版头条。卡利古拉给负责治理犹太的叙利亚总督佩特罗尼乌斯去信，命令佩特罗尼乌斯打造一个以卡利古拉为模特儿的最高神祇朱庇特神像，并将这尊雕像安放在耶路撒冷大神殿之中。

作为先皇提比略起用的一位行政官，佩特罗尼乌斯看到卡利古拉的命令时大惊失色。更糟的是，卡利古拉的这个命令不只是给佩特罗尼乌斯的密令，他甚至昭告天下，所以，很快在犹太人中传了开来。

犹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而且不分男女老幼都加入这股洪流之中，他们把行政官的宅邸围得水泄不通，要求佩特罗尼乌斯想方设法避免亵渎神明的行为发生。对于这个消息，亚历山大和安条克等地的海外犹太人也是忧心忡忡，毕竟，耶路撒冷大神殿是犹太人崇高无比、不容亵渎的“圣地”。如果放任不管，一定会引起整个犹太人聚居区

的揭竿而起。

总督佩特罗尼乌斯略施小计，他密令制作神像的泰勒斯工场尽量拖延工期。面对犹太人的要求，他一言不发，只是默默点头作为回答，没有留下任何把柄。于是，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都暂时平息了。

罗马这边，卡利古拉满心期待自己的命令尽快执行。然而他望穿秋水，都没有接到报告说，已经在禁止偶像崇拜的犹太教大神殿竖起了他的神像，甚至连神像制作好的消息也没有影子。于是，卡利古拉再次致信总督佩特罗尼乌斯：

> 看来你罔顾我的命令，接受了犹太人的示好。换言之，你宁愿博取他们的好感，也不愿履行你的职责。你这是不从皇命。那么，不论现在还是将来，身为皇帝的我有必要让你们清楚不从皇命的后果。所以我认为，你自我了断最为妥当。

一言以蔽之，卡利古拉命令佩特罗尼乌斯自裁谢罪。这中间有个操作问题，按当时的条件，从罗马到安条克需要一个月。所以，当卡利古拉的命令还在地中海向东传达时，下令的卡利古拉已经驾鹤西归了。

总督佩特罗尼乌斯侥幸捡回了一条性命，罗马皇帝和犹太人之间的全面对决也因此烟消云散。然而，卡利古拉导致的罗马帝国统治上的“裂痕”，不仅仅是犹太问题。

围绕亚美尼亚王国是亲罗马还是偏向帕提亚，罗马和帕提亚的关系开始面临危机。所以，叙利亚总督佩特罗尼乌斯不得不在与帕提亚交界的幼发拉底河畔驻扎了2个军团。

北非西部的毛里塔尼亚王国，70多年来一直是罗马可信赖的盟国，这个国家也因为卡利古拉的轻率行为与罗马产生嫌隙。

毛里塔尼亚王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大致是今天的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在奥古斯都时代，即使毛里塔尼亚王国没有皇位继承人，罗马帝国也与其保持着同盟关系，并没有将它纳为行省。他安排败给恺撒的努米底亚末代帝王尤巴的儿子，与马克·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女儿结婚，并让他们统治毛里塔尼亚。到卡利古拉时代，毛里塔尼亚的国王是这两个人的后代，他的外祖父是马克·安东尼，也即卡利古拉的曾祖父。卡利古拉继承皇位之后，无法忍受有着血缘关系的特洛梅斯担任友好国家兼盟国的统治者，实际上就是藩属国的国王。卡利古拉把特洛梅斯召到罗马之后立即处死，并宣布要把毛里塔尼亚变成罗马行省。为了反抗这一举动，毛里塔尼亚人掀起了反罗马运动。通常而言，治理帝国难免会发生一些问题，可是就连罗马人历来很放心的毛里塔尼亚也问题丛生。

卡利古拉的执政不仅仅让国库濒临崩溃，而且在外交方面也是困难重重。

反卡利古拉行动

恐怖行为并非因文明程度不高而发生，也不会因为参选落败而不择手段才引发，而是因为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才导致大家都认为只有杀掉他才可以改变当下的政治局面。

公元40年到41年，卡利古拉身处的环境从他登基时的狂热拥捧到现在的迅速退烧，让人怀疑这一切是否像梦境一般虚幻，而且这种变化之快不过才3年半而已。卡利古拉甚至连担任罗马公职资格要求的30岁年龄都还未满。

普通民众一般不太关心外交，他们享受作为社会福利的“面包”和博取民心的“马戏”，照理说卡利古拉的支持率应该很高，他的支持率却出

现下滑，究其原因是卡利古拉征收燃料税。也许在卡利古拉看来，这项税收是代替废除的营业税，然而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燃料，即使能够免费领取小麦的贫民也必须使用燃料。虽然民众可以免费欣赏角斗比赛、杂耍等各种表演，抗议征收燃料税也时有发生。罗马人聚集在角斗场中大声抗议，卡利古拉只好派出近卫军团前去镇压。

对于卡利古拉在外交等所有帝国施政上的失策，完全有能力掌握情报、分析判断的元老院对此也有所了解，他们却像被蛇盯上的青蛙一样，不敢轻举妄动。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第一，卡利古拉攻击的目标锁定为元老院，他利用叛国罪法对准目标大开杀戒，害怕明天大祸临头的恐惧让议员们不敢贸然行动。

第二，在议员们看来，如若身为日耳曼尼库斯之子的卡利古拉有什么意外，至今仍然流传着“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的莱茵河前线守军一定会有所动作。

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本名盖乌斯，对意思为“小军靴”的“卡利古拉”这个名字非常抵触。然而，在军队中实力最强的莱茵河沿岸军营里，士兵们把幼年的盖乌斯视为吉祥物，看着他长大。所以，即使卡利古拉继承皇位，他还是士兵们的“小军靴”，是背负士兵们希望的日耳曼尼库斯之子。

第三，元老院没有采取行动反对卡利古拉活动，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周全，没有计划好推翻卡利古拉后如何治理帝国。元老院中有部分议员是顽固的共和主义派，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恢复共和制。进入帝国政权时代已经过了70年了，几乎所有议员都成长在奥古斯都创设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体制下。废除帝王政治、恢复共和制的想法对于这些议员而言非常不切实际，轻举妄动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卡利古拉在施政上的失败已经让人无法袖手旁观。

第四，扳倒卡利古拉并不容易，他周围戒备森严。奥古斯都吸取恺撒的教训，恢复恺撒曾经解散的日耳曼士兵贴身侍卫制度，这也是他长寿的原因。卡利古拉把这个编制扩大，禁卫军也成了他的护卫队。近卫军被称为罗马军队的精英，成员都是从帝国各地驻防军团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士兵。卡利古拉还从父亲日耳曼尼库斯麾下的日耳曼军团中挑选人才担任近卫军队长。换言之，“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的忠诚信仰者负责护卫卡利古拉。这样一来，即使元老院议员们的勇气可嘉，但也不能贸然行事。

然而，最后杀害卡利古拉的，竟然是他认为对自己最忠心的“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的信仰者，这简直是命运对他的嘲讽。

遇害

公元41年1月24日，献给神君奥古斯都的帕拉蒂尼祭典在皇宫的所在地——帕拉蒂尼山上举行。按照罗马帝国的习惯，祭典在祭祀仪式之后都会有戏剧表演与角斗比赛，而戏剧表演的时间正是帕拉蒂尼祭典的第5天。

卡利古拉心知肚明，先皇提比略恶评如潮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从不出席这类活动，所以不论是戏剧表演还是角斗比赛，卡利古拉一定会出席观看。当天，他一直兴致勃勃地观看上午的表演。

从议事厅通向皇官有一条短程地下通道。卡利古拉在下午1点左右，起身准备享用午餐。然而，就在卡利古拉即将走出地下通道之际，近卫军大队长卡西乌斯·卡瑞亚用剑从背后朝他的脖子砍下去；另一名近卫军大队长科尔涅利乌斯·萨比努斯也拿剑从正面用力刺进站立不稳的卡利古拉的胸部。一眨眼之间，卡西乌斯·卡瑞亚就再次举剑向倒在地上的卡利古拉头部砍去。

皇帝卡利古拉在日耳曼人警卫赶到现场时已经遇刺身亡，而她的第四任妻子卡桑尼娅也是胸部中剑，气息全无。1岁大的女儿杜路希拉，则是被人从乳母怀里夺过来摔到地下通道的墙壁上而夭亡。被称之为卡利古拉的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日耳曼尼库斯，享年28岁零5个月，他的统治只维持了3年10个月零6天。

由于涉及卡利古拉遇害一事的所有当事人没有留下只言片语都死去了，所以后世的研究者只能猜测他遇害的真正原因。研究者认为，杀害卡利古拉意味着近卫军干涉皇位更替开了先例。此外，还有人认为，近卫军团士兵受到了金钱的诱惑最终刺杀了卡利古拉。我对第一种观点比较赞同，近卫军团士兵受金钱诱惑的论调，我不敢苟同。

近卫军团的士兵确实在卡利古拉遇害之后，在帮助克劳狄乌斯继位上功不可没，此外，每个士兵都得到1.5万塞斯特斯的褒奖，然而，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卡利古拉遇害之后。

此外，并非近卫军团的9个大队共9000名士兵全体参与了此次谋杀，涉及此案的只有2个大队，更何况，涉案的2个大队也并非2000人都参与了谋杀。实际上，决定谋杀自己宣誓效忠的皇帝，是统领这2支队伍的2名大队长与20多名士兵。

这2名直接动手的大队长，先不说拿了多少钱，他们以谋杀皇帝的罪名被判处死刑时都相当从容。而他们手下的士兵以及以团结闻名的近卫军团其他士兵，都未有任何反抗举动。所以不能简单地说这些士兵被金钱引诱了。

卡西乌斯·卡瑞亚既是刺杀卡利古拉的主谋之一，也是两个实际动手人之一。查阅史书，我们发现，公元14年，即27年前，卡西乌斯·卡瑞亚正是当时驻守莱茵河的日耳曼军团中的一名百人队队长。

公元14年，正是奥古斯都驾崩、提比略继位的同一年，皇位更迭使

得当时的士兵以为提高待遇的机会来临了，从而掀起了哗变，这是莱茵河军营最为动荡不安的一年。这一点我在提比略的章节里已经叙述过，年仅2岁的卡利古拉可以说是间接帮助父亲镇压了暴动。时任百人队队长的卡西乌斯·卡瑞亚手执利剑保护日耳曼军团总司令日耳曼尼库斯一家，英勇地挡在哗变士兵们面前。

罗马帝国的百人队队长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中队长，他们一般指挥80名士兵，有“罗马军团的脊梁”的称号。然而，在罗马的军队编制中，他们只是下级士官，军官的资历通常从指挥800名士兵的大队长开始计算。贵族子弟或者同当权派沾亲带故之人，他们入伍后经过一段适应期就可以直接晋升大队长一职。犹太人，比如权威人士斐洛的孩子，也可以跳过百人队队长，直接担任大队长。因此，一位军团长或大队长，如果他曾经担任百人队队长，那么就可以确定他在军队之中是从底层爬上来，是有真才实学的。

通常，从17岁志愿入伍开始，没有身家背景的普通人要到30岁左右才能晋升到百人队队长。如果公元14年卡瑞亚30岁上下，那么到公元41年，他应该55岁多了。就摸爬滚打慢慢晋升的普通士兵而言，55岁多担任近卫军大队长，算是职位晋升得比较顺利的了。另外，近卫军团士兵服满16年可以退役，这个规定只适用于普通士兵，大队长一级的将领不在范围之内。所以，50多岁依然是现役军人，在当时一点也不奇怪。只是，60岁以上的一般都退役了，除非担任军团长。

公元14年到41年之间，没有任何关于卡西乌斯·卡瑞亚的线索。然而，从公元14年到16年的两年之内，正是令日耳曼8个军团恢复秩序的总司令日耳曼尼库斯渡过莱茵河，同日耳曼民族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刻。军队从春天到秋季进行远征，冬季就回到莱茵河沿岸的营地。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两年内，于暴乱之际声名鹊起的百人队队长卡西乌斯·卡瑞亚必定是鞍前马后地追随日耳曼尼库斯。由于冬季不利于作战，士兵们一般都在营地休整。卡利古拉这位被士兵们昵称为“小军靴”的总司令的

儿子，就穿着士兵们特制的幼儿军靴在军营里成长着。

卡西乌斯·卡瑞亚也很有可能参加了公元17年在首都为日耳曼尼库斯举行的凯旋仪式。凯旋仪式，不仅仅是为了庆祝凯旋将军的战功，当然也有慰劳协助将军立下战功的士兵的目的。借着隆重的凯旋仪式，将军和士兵们共同分享无上荣耀。日耳曼尼库斯温和敦厚，他肯定不会忘记在危难关头拔剑护卫自己家人的卡西乌斯·卡瑞亚。凯旋将军有权选择一名士兵同他一道回罗马参加仪式，卡西乌斯·卡瑞亚肯定是最佳人选。

同年秋，卡西乌斯·卡瑞亚大概也追随着日耳曼尼库斯启程前往东方。因为，有许多日耳曼尼库斯亲信的军团长或大队长的名字，出现在被提比略派往东方的随行名单中，让人感到他似乎把莱茵河沿岸的总司令部整个搬到了幼发拉底河。

如若卡西乌斯·卡瑞亚也是日耳曼尼库斯的随行，那么他应该会跟随日耳曼尼库斯、其妻阿格里皮娜以及儿子卡利古拉一同前往埃及。此后，他们从埃及回到叙利亚不久，日耳曼尼库斯病逝，阿格里皮娜怀抱亡夫骨灰，领着7岁的卡利古拉回到本土。这一连串事件发生时，卡西乌斯·卡瑞亚应该都在场。

然而，在这之后，关于卡西乌斯·卡瑞亚的线索又断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进行推测，最少也要具备有用的史书。不难推测，卡西乌斯·卡瑞亚也许是回到莱茵河沿岸的军营，因为失去总司令的士兵除了军队别无去处。在提比略的励精图治之下，罗马帝国北方的防线最终以莱茵河和多瑙河为界，而罗马帝国确立防线这种不起眼却非常重要的工作，人才不可或缺，肯定是需要诸如卡西乌斯·卡瑞亚这类出类拔萃而又忠心耿耿的军事专才的。

晋升到近卫军大队长就可以到首都工作，这是每一个士兵都艳羡憧憬的职位。我想，卡西乌斯·卡瑞亚回到首都时应该是“小军靴”卡利古

拉继位之后。而卡西乌斯·卡瑞亚此后的工作就是贴身保护卡利古拉。不论卡利古拉出现在里昂、莱茵河前线基地，还是濒临多佛尔海峡的高卢北部，都应该能发现卡西乌斯·卡瑞亚的身影，这已经成了他的日常生活。卡西乌斯·卡瑞亚过这样的生活眼看就有4年了。

有流言说，卡利古拉经常笑话没有妻室、一直单身的卡西乌斯·卡瑞亚是同性恋，所以苏维托尼乌斯认为这就是原因，卡西乌斯·卡瑞亚因憎恨卡利古拉而痛下杀手。对皇帝宣誓效忠却施以毒手，只是这种程度的憎恨实在没有说服力。想想卡利古拉性格还不成熟，说是嘲笑，撒娇的成分可能要多一点。况且，卡利古拉自幼丧父，和母亲一起的时间也不长，那么，卡利古拉也许会把与日耳曼尼库斯年龄相仿的卡西乌斯·卡瑞亚当做父亲一样来对待。

然而，我想，皇帝卡利古拉的言行都让忠诚的卡瑞亚感到痛心疾首。当卡西乌斯·卡瑞亚想到年届花甲、退役后只能孤独度日，心中仿佛像父亲大义灭亲杀了不肖子一般，举剑刺向“小军靴”卡利古拉，就像是自家的丑事自家料理一样。

卡西乌斯·卡瑞亚杀了卡利古拉之后，命令手下把吓得躲起来的克劳狄乌斯带回近卫军营区，让士兵们称呼他“皇帝”。虽然，卡利古拉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但克劳狄乌斯也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弟弟，其实他们是一家人。在元老院作出反应之前，卡西乌斯·卡瑞亚已经抢得先机，让生米煮成了熟饭。家长具有很大权力这一观念早已深深植根于罗马人的家庭观念之中，所以卡西乌斯·卡瑞亚才能快速地了结此事。

木已成舟，元老院只好接受，他们迅速同意让克劳狄乌斯继任皇帝，以杀害皇帝的罪名判处卡西乌斯·卡瑞亚死刑时，他一言不发地坦然赴死。而萨比努斯追随卡西乌斯·卡瑞亚自尽身亡。这两个人都指挥着2000名士兵，作为大队长要想说服这些士兵并不是难事。此外，他们是扳倒暴君卡利古拉、让克劳狄乌斯登上皇位的有功之臣。然而他们从容就死，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在我看来，他们应该是一开始就以必死的

决心来犯下这滔天之罪的。另外，近卫军团所有士兵每人发放1.5万塞斯特斯赏金，难道不是为了避免士兵们对处死两位大队长的抗议吗？

然而，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史书中明确记载的只有如下事项：

公元41年1月24曰，皇帝盖乌斯遇刺，妻子与女儿也难逃此劫。

近卫军两位大队长卡西乌斯·卡瑞亚和科尔涅利乌斯·萨比努斯，以及少数近卫军士兵是谋杀的主要行动者。没有证据显示元老院议员参与其中。

卡利古拉遇害后没多久，卡利古拉的叔父克劳狄乌斯被人发现，并带回近卫军团营区，接受士兵对这位“皇帝”的欢呼。元老院只好承认这个事实。

卡西乌斯·卡瑞亚和科尔涅利乌斯·萨比努斯束手就死，但参与行刺的士兵没有被问罪。而普通罗马民众对卡利古拉之死反应冷淡，无人叫嚣把卡利古拉丢到台伯河中，也无人为卡利古拉流泪。

卡利古拉的遗体被迅速火化后，骨灰并没有安置在皇族墓地奥古斯都陵，而是被葬在了埃斯奎里山庭园的一角，后世人并不清楚具体的埋葬之处。

卡利古拉在世时，要求制造完成后分送帝国各地的他的塑像，目之所及都被毁坏。正因为卡利古拉遇刺后他的塑像立即被捣毁，留存至今的卡利古拉塑像十分稀少。大概是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梦魇，罗马人彻底抹去了卡利古拉的一切痕迹。随后，出人意料的50岁新皇帝登基，新的时代来临。



第三章

皇帝克劳狄乌斯

(41年1月24日—54年10月13日在位)

意外继位

罗马帝国的第四任皇帝是克劳狄乌斯，他既是提比略的侄子，也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弟弟、卡利古拉的叔父。公元前10年8月1日，克劳狄乌斯出生于今天的法国里昂地区。他的出生地位于法国中北部落后地区，被罗马人称之为“长发高卢”，而非“托加高卢”，即罗马化的（罗马人所谓的文明化）发达的南法高卢地区。其父杜路苏斯时任日耳曼战争的总司令，此外还担任南法地区之外整个高卢省的总督，作为身兼两职的官员的家眷，理所当然地都住在高卢省的首府卢格登（今里昂）。

正如名字所示，克劳狄乌斯的母亲安东尼娅，是马克·安东尼（莎翁的戏剧中则念作马卡斯·安东尼）与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之女。虽然奥古斯都战胜了有意勾结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势力的安东尼，然而奥古斯都却把安东尼的儿女当做是自己的孩子一般，并把他们抚养长大，使得他们都有了栖身之所。奥古斯都将安东尼娅嫁给了他的继子——其妻莉薇娅与前夫所生的一个儿子杜路苏斯。罗马共和体制末期权力斗争的两位主人公，对于皇帝克劳狄乌斯而言都是他的亲人，安东尼是他的外祖父，奥古斯都则是其外祖母的胞弟。

由此可知，克劳狄乌斯的身上也流淌着奥古斯都的血，然而年纪轻轻的卡利古拉之所以能够抢在克劳狄乌斯之前捷足先登，继承皇位，究其原因，并非如古代的历史学家所说的是因为克劳狄乌斯身体有缺陷所致，而是另有玄机。

在《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我早已提到，在奥古斯

都即将逝世的最后几年，所有与他有血缘关系的皇位继承人都早已不在人世。所以奥古斯都在认提比略做养子的同时，他也提出了要提比略收养日耳曼尼库斯为养子的要求。虽然提比略也是莉薇娅的儿子，然而，他在血缘上跟奥古斯都没有一点关系。不过，姐姐屋大维娅的儿子日耳曼尼库斯与其弟克劳狄乌斯，和奥古斯都有着血缘关系。奥古斯都一直坚持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人才能够继承皇位，并希望通过让提比略收日耳曼尼库斯为养子的办法，在提比略死后能够让帝国的皇位再一次回到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后代手上。然而，由于日耳曼尼库斯的英年早逝，提比略的皇位继承人成了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卡利古拉。

这也就意味着，借由养父子关系，皇位从奥古斯都传到提比略再到卡利古拉，都被尤里乌斯家族的男人牢牢把持着。

另一方面，由于克劳狄乌斯的哥哥日耳曼尼库斯被奥古斯都的养子提比略认做养子，即他的兄长成了尤里乌斯家族的一员，所以克劳狄乌斯成了从共和制时代以来就是名门望族的克劳狄乌斯家族中留存下来的唯一的后代。换言之，克劳狄乌斯不属于尤里乌斯家族，他仍旧还是克劳狄乌斯家族的人。当然，克劳狄乌斯不是没有野心觊觎皇位，只是他没有资格而已。

由于克劳狄乌斯不是尤里乌斯家族成员，基于这个原因使得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生前都没有承认过克劳狄乌斯是皇位继承人之一。此前，奥古斯都一直坚持皇位必须保留在尤里乌斯家族的男性手中，而提比略也恪守奥古斯都的遗旨，所以他们甚至从未将克劳狄乌斯纳入皇位继承人考虑范围，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然而，卡利古拉在位才短短4年时间，这一事实将奥古斯都的计划全盘打乱，加之尤里乌斯家族之中已经没有男性来继承皇位。只有让一个人继承皇位才能避免重返共和制，从而继续维持罗马的元首制。近卫军大队长卡瑞亚曾向卡利古拉发过肝脑涂地的尽忠誓言，所以在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较为牢固的观念，那就是皇位继承人必须流淌着神君奥古

斯都的血液。即使克劳狄乌斯不是尤里乌斯家族的一员，然而他的母亲与外祖母始终与奥古斯都是血脉相连的。

继承皇位的克劳狄乌斯，正式的全名为提比略·克劳狄乌斯·恺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

从克劳狄乌斯的全名不难看出，提比略是名，而克劳狄乌斯是家族名，至于恺撒与奥古斯都则是后来所有的皇帝都要继承的头衔，因此可以称其为“皇帝名”，而拥有“日耳曼霸主”意思的日耳曼尼库斯则是他父亲杜路苏斯的昵称，这与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称霸非洲的西庇阿”）中的阿非利加努斯意义相同，这在古代被称为家族名。在罗马，家族名是可以在子孙后代中世代继承的，所以与现在的姓氏具有相同的含义。

在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恺撒、奥古斯都、提比略与卡利古拉都拥有家族名“尤里乌斯”，然而克劳狄乌斯并没有尤里乌斯这一名称，他以“克劳狄乌斯”作为家族名称。基于恺撒描绘的帝国蓝图，由奥古斯都拉开序幕的君主专制的罗马帝国这一段历史中，从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开始，到提比略、卡利古拉、克劳狄乌斯以及第五位皇帝尼禄，这段时期前后长达一个世纪。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为“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时期”，意指在出身于尤里乌斯家族和克劳狄乌斯家族的皇帝们统治下的时期。这是因为奥古斯都、提比略和卡利古拉都属于尤里乌斯家族，而克劳狄乌斯以及被他收做养子的尼禄则是属于克劳狄乌斯家族。这两个大家族并不是没有关联。提比略本来就出身于克劳狄乌斯家族，而不论是克劳狄乌斯还是尼禄则各自的母亲都与奥古斯都血脉相连。“尤里乌斯王朝时期”与“克劳狄乌斯王朝时期”为何没有分开，而是统称为“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时期”的原因就在于此。尤里乌斯家族和克劳狄乌斯家族从罗马建国初期开始就一直是名门望族。

在此，我为何要如此不厌其烦地说明两个家族的联系呢？原因在于罗马的君主专制正是凭借这些错综复杂的联系的正当性，才能保证罗马

帝国政权的延续。

能让被统治者认同被统治的理由，是建立在所谓统治者正当性的基础之上的。总统和首相通过直接选举中的得票数，或者是间接投票方式的国会记名投票来获得统治的正当性。在还没有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的罗马元首制时代，要继位称帝，就要征得元老院和公民的认可。言外之意，即使是在元首制时期，罗马人仍然把统治的正当性放在重要的位置。理由是再简单不过的，不管是在何种政治体制下，如果被统治阶层不给予一致支持的话，就无法执政。从这一方面可以说“一致支持”就是“认可”的意思。

奥古斯都也正是考虑到政局的稳定才拘泥于必须要由血亲来继承皇位的。卡利古拉遭遇刺杀这种震惊朝野的事件刚过去没多久，克劳狄乌斯虽不是尤里乌斯家族的人，然而他和奥古斯都血脉相连，才使得克劳狄乌斯出人意料地继承了罗马帝国的皇位。这也说明了由奥古斯都开辟的元首制体系，在历经70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元老院与罗马公民的一致认可，否则就算近卫军先斩后奏拥立克劳狄乌斯为帝这件事做得再滴水不漏，克劳狄乌斯的执政期也不可能有13年那么长。

历史学家皇帝

即便是在“健全的精神存在于健全的身体之中”的主流观念支配着当时罗马帝国之时，罗马人还是接受了一个身体上有着明显缺陷的人成为他们的新领袖。

克劳狄乌斯大概因为年幼时患过小儿麻痹症，他总是拖着右腿走路。由于身体的不均衡，总不能保持左右平衡。也许是因为无法进行日常锻炼，他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是弱不禁风。克劳狄乌斯走起路来两膝不住地发抖，步履艰难。此外，他还有不停地摇头、一紧张就会口吃的毛

病。克劳狄乌斯的身高也低于平均水平，体态不佳，脑袋不大，倒三角脸，尖下巴，三条深深的皱纹刻在狭窄的额头之上。

若非要评价一下他的外表，只能说虽五官俱全，然而组合出来的是残次品。可能稍微注重一下自己的仪表就会使自己的心情变得高兴一点，然而从不缺钱来打扮自己的克劳狄乌斯对此毫不在意。

如此不修边幅的克劳狄乌斯不被皇室的女性们所仰慕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克劳狄乌斯23岁时去世的奥古斯都一直很看重他的优点，对亲戚间的关系不是很看重的提比略虽然没有给克劳狄乌斯特殊照顾，然而也没有亏待过他。不过，兄长日耳曼尼库斯倒是克劳狄乌斯最大的保护者。

罗马帝国扣留了许多盟国皇室成员作为人质来到罗马，对于这些小孩而言，他们与罗马帝国的皇室成员一起在帕拉蒂尼山上的官邸中长大，在相同的屋檐下玩耍，是友好的玩伴与同学。虽然是作为人质来到罗马的，然而除了不能随便回到祖国外，王子们依旧是王子，这就同英国殖民地贵族阶层的子弟留学英国或是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留学美国的性质一样。只是，这些小孩子出乎意料地喜欢恶作剧，而克劳狄乌斯这样有身体缺陷的小伙伴往往成为他们欺负的对象，但克劳狄乌斯年长5岁的哥哥日耳曼尼库斯一直保护着他，才使他免遭欺凌。日耳曼尼库斯不仅深受奥古斯都疼爱，而罗马帝国的女性们也对他仰慕不已，他还是一个极富责任感的人。在他看来，弟弟在1岁时丧父，此外还身有残疾，作为兄长要好好保护弟弟才行。克劳狄乌斯正是在兄长的庇护之下，才有一个较为安定的童年和青春期。或许正因如此，克劳狄乌斯才能在继位称帝之后，在罗马帝国施政方面诠释了“不健全的身躯也可以孕育出健全的精神”这一理念。

即使是在克劳狄乌斯长大成人之后，奥古斯都以及提比略都从未考虑过对他委以任何军职和官职，反倒默许他从事于他从小就热爱的历史研究与写作。克劳狄乌斯若非卡利古拉遇难之后继承皇位，可能终生都

会与“历史”为伍。

据传克劳狄乌斯的历史学研究与写作的指导老师，正是晚年的提图斯·李维。

我已在《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的参考文献中对提图斯·李维作了详细的介绍：

> 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公元17年），从32岁开始一次10册地撰写出版《罗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在他一生中，一共发行了142卷，这些著作又被罗马人赞誉为罗马历史研究的金字塔。这部《罗马史》记述了罗马开国到公元前9年的史实，只是大部分在中世纪时遗失了，现存的部分不到原书的三分之一，这使罗马史研究者扼腕叹息。

李维与构架起希腊历史金字塔的希腊人修昔底德一样，都出生在动荡的年代，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更关注历史。当然，关怀“人性”正是关注历史的最终目的，并不能理解为怀旧情怀。生在乱世自会要比生在太平盛世的人更关心人们的种种行为背后的人性。尤其是极具观察力和分析能力而又置身官场之外的人，更是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李维10岁——尤里乌斯·恺撒率军渡过卢比孔河，内战随即爆发。

11岁——由庞培率领大军，即主张罗马维持共和制的元老院派，与由恺撒率领的反对共和制的反元老院派在希腊法萨卢斯平原大战。被恺撒打败的庞培在逃亡埃及时被杀害。

12岁——恺撒就任罗马独裁官。

13岁——恺撒开始清除庞培余党，并将战火烧到北非，并在塔普苏斯战役又一次取得胜利。拥护共和制的小加图自杀而亡。

14岁——恺撒取得了西班牙孟达会战的胜利，给拥护共和制一派致命一击。

15岁——恺撒出任终身独裁官，真正意义上的元首制开始了。3月15日，以布鲁图为首的14名元老院成员在元老院会场内将恺撒谋杀。

16岁——由于形势日下，策划暗杀恺撒的主谋布鲁图和卡西乌斯逃亡到希腊，并打算与恺撒派的安东尼和屋大维一决生死。在首都罗马，共和制先驱西塞罗遭到杀害。

17岁——恺撒的反对派和恺撒派在希腊的腓立比荒野上激战，最终恺撒派获胜，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战败自杀。

随后，恺撒派（反元老院体制派）发生内讧，一分为二，分为安东尼和屋大维两个派别，权力争夺战拉开序幕，一直持续到李维28岁时的亚克兴角海战之后才成定局。次年，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双双自杀身亡，一时间恺撒的养子屋大维权倾朝野。

32岁——更名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宣布要恢复共和制。然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奥古斯都要确立元首制耍的第一个花招而已。

奥古斯都公元前63年生，公元14年卒。李维公元前59年生，公元17年卒。虽然皇帝和历史学家所处的立场截然不同，一个是时代的参与者，一个是时代的观察者，然而可谓同属一个时代。从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直至奥古斯都开创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可以说李维都亲眼见证了。

共142卷的《罗马史》记载了从罗马帝国的建立到公元前9年间共744年的历史。作者李维生活的那一段历史，即记载了由共和制转变为元首制时期的历史的那部分只遗留下了零星记载，这让研究罗马史的历史学家们十分惋惜。虽然李维生于奥古斯都时代，他却是一位共和制的

拥护者。如果这些史书能保存下来的话，我们就能从共和主义者的立场来看奥古斯都是如何在向众人宣布恢复共和制之后瞒天过海，然后又将共和制转为元首制的。

据说奥古斯都在这142卷书还保存完整时就通读了这些书，并称李维是“庞培的拥护者”。虽然言语间戏谑了李维，这位建立起元首制的元勋奥古斯都却从未考虑过将这位庞培支持者所写的书打为禁书。提倡发行共和制先驱西塞罗的全集也是在奥古斯都时代。克劳狄乌斯虽然和罗马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掌门人兼皇帝的奥古斯都有血缘关系，然而即使是他在青年时期师从“庞培支持者”，也没有人认为这是丑闻。

在读了克劳狄乌斯被推上皇位之前，即他50岁前撰写的一系列著作之后，不难看出他深受李维的影响，这不由得让我透露出一丝苦笑。

最初，克劳狄乌斯撰有《伊特鲁里亚史》，篇幅长达20多卷。之后又撰有《迦太基史》，共8卷。对于罗马而言，《伊特鲁里亚史》描写了在罗马建国初期伊特鲁里亚人从称霸意大利中部，再一点点遭受罗马帝国的侵略直至完全被罗马侵占同化的历程。《迦太基史》记录了迦太基民族与正如日中天的罗马帝国发生正面冲突，在经过3次布匿战争之后，最终臣服于罗马的史实。虽然这两个民族与罗马的斗争史各不相同，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战败国。虽然克劳狄乌斯生在胜利者一方的罗马帝国，然而在他全身心扑在记录历史的时期，他关心的却是战败国的历史。

克劳狄乌斯写的另一本书是关于失败政治家西塞罗的传记，通篇都能看出他在为西塞罗辩解。也许是受到老师的影响，也可能是作为这部传记的延续，克劳狄乌斯开始着手写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书，也就是记录恺撒遇害、动乱再次发生的时代的历史事件。克劳狄乌斯原本打算要给描述这段历史的书起名为《内战记》，然而受到母亲安东尼娅的忠告，他在写到第2卷的时候就没再写下去了。因为内乱时期的主角不管是安东尼还是奥古斯都，大多数人都是克劳狄乌斯的血亲，他和局外人

李维的立场终究是不一样的。一直都喜欢站在失败者一边的克劳狄乌斯，似乎是出于好意要把布鲁图和安东尼好的地方记录下来。安东尼娅虽是安东尼的女儿，但出于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对儿子造成不利影响的考虑，她极力劝阻儿子克劳狄乌斯不要写这样一本书。

克劳狄乌斯虽然不能再接着写《内战记》来记录那个时代的历史，但无法放弃对当时历史的关心，他写成了全书共41卷的《和平记》。既然这是一本记录和平时代的书，那么就应该是描写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式和平。因为罗马在此之前并不能称之为“和平”。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由罗马皇帝亲手写的历史书可谓是一级史书，非常可惜的是这些史书全部遗失了，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根据流传下来的克劳狄乌斯写的演讲稿与碑文，学者们推测他学识渊博，调查也做得很详细，只是他的文章缺少了文学作品应有的闪光点和深刻的意境。学者们都认为正因为后人把他的作品当做“学者的文章”来对待，才致使他的书没有被保存下来。不过想来也确实是这个道理。

尽管克劳狄乌斯没能写出流芳百世的史书，然而对克劳狄乌斯而言，潜心钻研历史和写作的前半生，对他继承皇位之后帮助良多。在他被推上皇位之前，除了卡利古拉心血来潮地委任他当了几个月的执政官外，他没有任何军队或政务上的经验。克劳狄乌斯从书中学到的知识积累到50岁时，在应对一切都是陌生的事物时还是发挥了不小作用。这也意味着罗马帝国产生了一位历史家皇帝。

执政之初

公元41年1月24日下午1点，罗马帝国的皇帝卡利古拉遇刺身亡，不足4年的卡利古拉政权便戛然谢幕。

行刺卡利古拉的凶手与主谋，近卫军大队长卡西乌斯·卡瑞亚和他

的同谋在刺杀成功后做的第一件事，没有去占领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也没有像刺杀恺撒的布鲁图和他的同谋们一样退守到卡匹托尔山上，更没有盘踞在最高神祇朱庇特神殿证明这是他们的正义行为。卡瑞亚率领一队士兵找到因害怕而躲起来的克劳狄乌斯（表面上是拥立，实际上就是挟持），将他带回位于首都罗马东北方向的近卫军军营。

这是因为，虽然是两名大队长率领的20个左右的手下人犯下行刺皇帝的滔天大罪，但是，他们仍然期待其余7个大队长和麾下的士兵，尚有1万名左右的近卫军士兵能够拥护他们。近卫军所谓的“拥护”，是指皇帝换成了别人，他们支持的依旧是元首制。即卡利古拉的取代者，必须和奥古斯都有血缘关系。换皇帝不改政体才是行刺者卡瑞亚心中的真实意图。

正是为了对抗唯一有可能会反对继续实行元首制的元老院，卡瑞亚才把克劳狄乌斯当做人质，带回近卫军军营。

一般而言，人质有两种用处：一种是恐吓。即如果对方违抗自己的意愿，那就杀死手中的人质。另一种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即利用人质号召世人归顺，用以分离消灭反对势力。

克劳狄乌斯既不是罗马名门望族的族长，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只不过是一位专注于记录历史的50岁老人，就算他被杀了，对于元老院而言也是无关痛痒的。显而易见，卡瑞亚抓了克劳狄乌斯做人质自然是企图挟天子以令天下。在卡利古拉遇刺后，一直支持元老院的首都警卫队听闻近卫军纷纷拥立克劳狄乌斯时，当下见风使舵，转而拥立克劳狄乌斯。如此一来，9个大队近1万人的近卫军与3个大队的首都警卫近3000人的支持方向就确定了，这就意味着首都罗马，意大利本土所有的军事力量都站在了维护元首制的旗帜之下。

拥护共和制派在卡利古拉遭到刺杀之后，立即抓住时机，在元老院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慷慨陈词的他们，原本就是少数派，现在又见大

势已去，除了保持沉默别无他法。不过若是就如此屈服在近卫军之下，元老院就会威严扫地，更何况如若元老院让近卫军的傀儡当上皇帝，罗马的前途也会更让人担心。

元老院立即展开了行动。1月24日晚上，派出两位护民官做代表与身在近卫军军营的克劳狄乌斯会面，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想直接听听克劳狄乌斯对时局的看法。

两位使者带来的元老院信函中有以下两项内容：

（一）若克劳狄乌斯愿意当回平民，那么就将不追究其当天的行为。

（二）若想要成为"第一公民"，克劳狄乌斯就必须得到元老院的认同。

从信函的第二项中就可以看出，其实元老院心中已经认同了继续在罗马帝国实行元首制。

虽然是被强行推上帝位的，然而克劳狄乌斯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他向使者表明，虽然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第一公民"，然而既然有这个机会，他就会迎难而上。

当然，克劳狄乌斯绝不是突发对权力的渴望。对罗马精英分子影响至深的哲学，既非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哲学，也不是苏格拉底哲学，而是希腊哲学的后起之秀——斯多亚学派哲学。斯多亚学派反对封闭式的城市国家，宣扬世界国家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奉献公众是精英们的责任，这恰巧是罗马精英们的抱负。作为出身于精英阶层的人，几乎花费了半辈子的时间来探索人性、钻研历史与写作的克劳狄乌斯，在面对意料之外的皇位时，心中奉献大众的想法油然而生。此时此刻的他已经不再是别人手中的傀儡。

就在当晚，元老院一致通过了将卡利古拉拥有的一切权力赋予克劳狄乌斯的决议："第一公民"称号、罗马军队最高司令官、可无条件动用否决权的护民官特权、罗马宗教中地位最高的大祭司，此外，继承恺撒与奥古斯都这两个名字的权力。也即只有"皇帝"才能享有这些权力，承认了克劳狄乌斯的地位。大概是元老院在被年轻的卡利古拉折腾过之后，50岁的克劳狄乌斯更让人放心吧。

既然要继续实行元首制，就不能让行刺皇帝的人逍遥法外。克劳狄乌斯继位之后，做的头件事就是追究刺杀卡利古拉的人。不过克劳狄乌斯下达的只是处决大队长卡瑞亚的命令，而由于另一位大队长萨比努斯的名声没有卡瑞亚响亮，克劳狄乌斯似乎是想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至于参与谋杀卡利古拉的另外20余名士兵，念在他们没有直接参与行刺，最终宽大处理，不问责作罢。

虽是卡瑞亚亲手杀死了"小军靴"，但他在没有牵连任何一个人的情况下坦然接受了死刑。大概是卡瑞亚在亲眼见到日耳曼尼库斯的弟弟克劳狄乌斯继位后，觉得用自己的死来终结暴君的统治，是死得其所。同谋萨比努斯虽然免于死刑，然而他最终选择了自杀去追随卡瑞亚。这或许是外人难以理解的战友情谊。随着两位主谋都以死告终，行刺卡利古拉一事也算是处理完毕了。

以下内容已重申多次，就连我都有点想跳过去不再多说了，然而这一点又刚好极其重要，无奈之下只好再啰嗦一遍。

即使是罗马采取元首制时代之后，SPQR，即"罗马元老院和公民"，是权力的根源这一点从未改变。皇帝的统治权是由元老院以及罗马公民这些"有权者"赋予的。所以，罗马皇帝可以开始行使统治权的标志，不是举办加冕大典，而是得到元老院和公民的许可。

罗马是一个地跨欧洲、中东、近东以及北非的庞大帝国，受到通讯不发达等落后条件的影响，"有权者"反映他们的意见是有局限性的，即

能反映自己意见的“有权者”实在少之又少。如果举行民意调查以了解皇帝的支持率的话，反映的也不过是元老院、首都罗马市民以及本土意大利居民的“意向”而已。

拥有罗马公民权是成为“有权者”的必备条件，如此一来，行省人民就不能称之为“有权者”，也就没有委任他人统治自己的资格。然而从被统治者角度出发，行省人民与罗马公民有着相同的地位。此外，行省人民的人口10倍于罗马公民，他们自然不会心甘情愿地像小孩一样听任使唤。因此，也曾发生过行省人民反抗暴政的暴动与起义。罗马中央政府赋予行省人民控告行省总督实行暴政的权利，所以行省人民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发言。

如果当时罗马帝国有民意调查这个东西，并且对行省人民进行民意调查的话，在首都和本土支持率极低的提比略在行省的支持率肯定会高得离谱。不过对于历代皇帝而言，意大利本土与首都罗马的支持率，就足以反映出民众对他们的拥戴程度。

除因宗教原因，犹太人不能称呼恺撒和奥古斯都为“神君”外，备受罗马公民和各行省人民拥戴的这两位皇帝都一直被他们视为“神君”。而其后的提比略与卡利古拉两人，前者为了顾全整个帝国的利益，不惜牺牲首都罗马人民的支持，以致得到的评价极其糟糕。而后者则太过重视首都人民的支持，最后引发财政崩溃，直至葬送了自己。

克劳狄乌斯下定决心当皇帝之后，在他的脑袋里面，早已把罗马建国以来的罗马历史，被罗马人引为前车之鉴的城邦国家时代的希腊人历史，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创造的希腊历史，也就是先祖们的历史反复加以借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克劳狄乌斯关心历史就等于不一味地相信包括自己在内的众人的创造力，即他并不认为“个人创造历史”，而是相信“人类创造历史”。所以他并不觉得借鉴先人的例子是一件羞愧的事。先人当中，恺撒和奥古斯都更是被他引为执政的榜样。

然而，克劳狄乌斯在元老院宣誓时，他提到的效仿对象只有奥古斯都一个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恺撒。这是因为他宣誓的对象是元老院。恺撒虽然保留了元老院，却一直都在打压元老院提倡的以寡头治理为特色的共和制。相反，奥古斯都则宣誓要恢复共和制，并始终做出尊重元老院参政权力的姿态，尽管这只是他用来巩固自己政权的幌子。他甚至表示要恢复奥古斯都的施政模式，这样一来就不必担心元老院会造反了。

提比略不仅是一个口碑极差的皇帝，在隐居到卡普里岛之后仍旧不放手帝国的统治权，在政治上更是不把元老院放在眼里。对于这样一位先皇，克劳狄乌斯当然是只字不提。

尽管克劳狄乌斯没有对外表示要把恺撒和提比略当做自己的摄政榜样，但很明显，他的统治模式还是受到了这两人极大的影响。尤其在财政管理和行省的治理上，他很有提比略之遗风。这是因为，若要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的话，唯有遵循提比略的治世之道。

确立了相同的目标，然而左右过程的却是当事人的能力高低。克劳狄乌斯踌躇满志，也有实现壮志的决心，然而他缺少领导人应当具备的某些特质。

50岁的克劳狄乌斯在罗马人眼中正处于成熟的巅峰，但他执政之初的表现十分平庸。到他宣布要恢复奥古斯都的治世方式为止，一切都还顺畅。然而接下来，他提倡恢复罗马自古以来着装的优良传统，落实的第一步，就是提议将其法规化。

“罗马公民应随时穿着托加。”

放到现代社会，也只有流行歌手才会穿着奇装异服，而先帝卡利古拉却时常衣着怪异，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克劳狄乌斯的用意。在《罗马人的故事4 ·恺撒时代（上）》里所介绍的，托加是一种庄重威严的服

装，并不适合日常穿着。平日要保持威严仪态的元老院议员和律师另当别论，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当中，是有无产阶级存在的，穿着托加他们还怎么工作呢？元老院的议员虽然能理解要求人们穿托加的用意，但不觉得有必要为此立法。当身着托加的他们从新皇帝口中听到这个要求时，出于礼貌，虽然没有发出轻蔑的爆笑，但还是不禁面露冷笑。

第一次在元老院发表演说，满堂的爆笑使克劳狄乌斯不再镇定，他开始结巴。一结巴就拼命想把话讲好，结果嘴角堆满了唾沫。向来不注重仪表的克劳狄乌斯似乎没有发现，一直没有把唾沫处理掉，结果唾沫就变成了口水从嘴角流出。到最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克劳狄乌斯的首次演讲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画上了句号。

尽管如此，克劳狄乌斯的执政生涯并没有戛然而止。这主要有两点原因：

其一，克劳狄乌斯奉献大众的意愿坚定，丝毫没有因为第一次公开演讲的失败而受到打击。

其二，克劳狄乌斯很走运。元老院中的少数议员，在目睹了克劳狄乌斯的丑态之后，更激发了他们要为新皇帝鞠躬尽瘁的情怀。这部分议员虽然人数不多，但个个都是举足轻重、富有才华的人。他们深知推行元首制才是罗马帝国的治世之道，所以愿意倾尽全力辅佐新皇帝。这一派议员的代表人物，就是提比略起用的人才之一路奇乌斯·维特里乌斯。即克劳狄乌斯拥有可以沿用提比略提拔的人才这一优势，这一点无疑是克劳狄乌斯在外交和军事上取得成功的助推力。

重树威望

克劳狄乌斯执政的当务之急，是重树因不足4年的卡利古拉统治而对元首制失望的民众的信任。

克劳狄乌斯宣布，不再执行“反叛国家罪”的刑罚。由于这条法律是奥古斯都制定的，所以他没有废除它，而是下令保留这条法律，但不再执行。克劳狄乌斯还批准因这条法律被流放的人回国。

包括被流放到文托特内岛的卡利古拉的两个妹妹在内的许多流放犯人，都借此赦免机会回到意大利本土。这两个人中的小阿格里皮娜丝毫没有流放外岛的憔悴模样，反倒是神采奕奕地回到了本土。追求生活的舒适是罗马人的天性，哪怕是被流放到偏远之地也不例外。早在流放小阿格里皮娜之时，提比略就命人在岛上修建储水池，为了能使她在因暴雨天气不能出海的日子也能吃到鲜鱼，还挖了大鱼塘，用引流进来的海水养鱼。当时正值26岁的小阿格里皮娜是卡利古拉皇帝的妹妹，后来她当上了克劳狄乌斯的皇后，最后成了罗马帝国下一任皇帝尼禄的母后。在历史上，为了便于区分同名的她与她的母亲，称她为“小阿格里皮娜”。小阿格里皮娜在岛上过了一年的流放生活，回到本土的她已经成了一位游泳健将。

“反叛国家罪”这条法律的行使对象大多数是元老院的议员门，新皇帝宣布不再执行它，他们当然是求之不得的。除此之外，克劳狄乌斯又推行了一系列深受元老院欢迎的政策。

克劳狄乌斯效仿提比略时代，将选举执政官等罗马帝国中央政府要职的场所，从公民大会移回到了元老院。议员们为此省去了为竞选经费头疼的烦恼，自然表示欢迎。可是克劳狄乌斯引用提比略的施政方式也就到此为止。他不仅没有禁止选举活动中的各项娱乐，还采用褒奖的形式，鼓励以皇帝为首的富裕阶层对活动进行赞助，民众因将选举地移回到元老院而产生的不满也因此得到了纾解。然而，克劳狄乌斯的政策转换，应该是个人喜好的成分大于政治目的。与向来厌恶各种娱乐的提比略刚好是两个极端，克劳狄乌斯对这些活动乐此不疲。有些看起来一板一眼的学者，却热衷于拳击或职业摔跤，克劳狄乌斯就属于这类人。

此外，克劳狄乌斯比谁都明白他的任务，就是收拾卡利古拉留下的

烂摊子。

首先，克劳狄乌斯必须重整因卡利古拉奢侈淫逸而濒临崩溃的国家财政。当然，他从没想过要用增加赋税的方式恢复财政，可能是为了避免同提比略一样被世人诟病，也没有采用提比略削减财政支出这种办法。身为史学家的克劳狄乌斯深知罗马的惯例，领导者最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重视公共利益，进行基础建设。

克劳狄乌斯用卡利古拉所缺乏的坚定的意志，重新启动卡利古拉开工但未完成的两条大规模水利工程。工程承包商们没有了卡利古拉时代经费不到位的顾虑，一心扑在了工程上。尤里乌斯·恺撒有两大规划：其一，就是将罗马的奥斯提亚海港建设成整个地中海地区一流的港口；其二，抽干意大利中部的富基努斯湖的湖水，把它开垦成良田。只是恺撒的后继皇帝没一个人去实行。而克劳狄乌斯又向这两大公共事业工程发起了挑战。

大家都很怀疑，不靠增加税收、也不靠削减财政支出就能重建财政的可行性。然而克劳狄乌斯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他的根据不是专业的经济知识，而是常识。

一、重新征收被卡利古拉废止的1%的营业税。

规定征收这个税金的是奥古斯都，克劳狄乌斯既然表示要效仿他的执政方式，恢复这个税收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世上是没有让人乐意的税收的，就算是神君制定的税收也不例外。卡利古拉为了得民心，废除了这项税收，现在要重新征收，大家的感受就如同被征收新税一样。为了平息大家的不满，克劳狄乌斯就宣布免征卡利古拉时代征收的燃料税等各项杂税。这么一来，税收体制同卡利古拉时代以前的税收一样，少而精。克劳狄乌斯的税收制度比卡利古拉时代以前更加精简。

二、不削减必要的经费开支，不必要的开支一项不留。

这么一来，没有了以前令人瞠目结舌的大笔支出。大家认为举办戏剧表演、杂技表演、竞技赛、剑术比赛是必要支出，所以照常举行。相反，为了省下维修费用，克劳狄乌斯在卡利古拉时建造的、用来从埃及搬运25米长方尖碑的大船上装满石头，沉到海底给奥斯提亚海港工程的堤坝做基石。

克劳狄乌斯从不注重仪表，当然对住所也毫不挑剔。没有人会愿意住到奥古斯都那简陋的住所去，提比略就在帕拉蒂尼山上盖了新居，只是在他隐退到卡普里岛之后便停止了施工，完成这个建筑的是卡利古拉。克劳狄乌斯就住到了那个房子里。尽管不是新的宫殿，但对于假公济私没有任何想法的他而言已经足够了。

光靠这些举措，不禁让人怀疑重整财政的效果，然而事实是，这些举措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提比略是在公元14年继位的，那时他不得不采取严格的紧缩财政政策。而克劳狄乌斯继位，是公元41年。在这不到30年的太平盛世里，整个罗马帝国的经济实力飞速增长。

罗马的税收制度采取的是百分比征收法，而非固定税。如征1%的营业税、5%的遗产税、5%的关税、10%的行省税、25%东方进口奢侈品税。克劳狄乌斯继位之后，包括整个罗马帝国的大经济圈已经开始运转，财政的恢复只要靠自然的税收增加就能达到。

依靠税收的自然增长来构架财政稳定，税收收入渠道就得畅通。如果放任征税者的违法行为的话，管道就会堵塞。克劳狄乌斯身为罗马帝国皇帝，如果在大众面前过度抛头露面一定会惹来物议，然而为了保证税收渠道的透明公正，克劳狄乌斯不顾这些，他热衷于参加法院的审判。通常而言，他会把杀人和偷盗案件交给别人处理，对于税收，他清楚公正的税收是实施仁政的根基，是值得皇帝用心去监督的。在这一点上，克劳狄乌斯和提比略如出一辙。

卡利古拉留下的第二个烂摊子，就是在他在位的短短4年时间内，萌生了一系列外交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北非的毛里塔尼亚王国的问题；其次是犹太问题；最后才是卡利古拉在多佛尔海峡进行军事演习之后又撤回罗马，从而引发的不列颠问题。

北非

毛里塔尼亚问题是罗马帝国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局限在北非一带，还牵扯到直布罗陀海峡对面的伊比利亚半岛的稳定，解决这个问题迫在眉睫。

卡利古拉杀死了毛里塔尼亚的国王却没有安排代替他的人选，这种草率的行为造成了曾是忠诚同盟国的毛里塔尼亚王国的反叛。面对如此局面，他只好用军队镇压叛乱。克劳狄乌斯根本没有想过要和平解决这个问题，这与其说是不把毛里塔尼亚放在眼里，倒不如说罗马是绝对不会跟反罗马的国家和平谈判的。如对方有任何异议，罗马允许对方派使节团来罗马上表，然而如果对方不上表，企图用武力反抗罗马的话，罗马方面就会诉诸武力。这就是罗马的态度。由卡利古拉留下的毛里塔尼亚叛乱的烂摊子，克劳狄乌斯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摆平了。此后，这个地区也是以“帝国主义”之名被统治，即以非常罗马化的方式进行统治。

借着便于管理叛乱之地的理由，原毛里塔尼亚王国被罗马帝国分为“毛里塔尼亚·汀吉塔纳”（摩洛哥首都塔吉尔的毛里塔尼亚）与“毛里塔尼亚·恺撒恩西斯”（舍尔歇的毛里塔尼亚）这两个地区。当然这两个地区都是罗马的行省。前者的首府是塔吉里（今日的塔吉尔），后者的首府是恺撒利亚（如今的名称是阿拉伯语的舍尔歇）。

克劳狄乌斯指派罗马官员出任这两个地区的长官，并在治理上沿用

尤里乌斯·恺撒在北非的治理方法。围绕建设殖民城市这一核心，克劳狄乌斯将大量的退伍军人和罗马公民志愿者输送到这两个地区，在这些城市之间建造罗马式的道路网来振兴产业，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一地区以东的原努米底亚王国的努米底亚行省、原迦太基的阿非利加行省，还有在克里特岛长官管辖之下的昔兰尼加行省在内的北非西部全境和这两个行省，后来的小麦出口量，达到了首都罗马和意大利本土需求量的三分之一之多。



毛里塔尼亚被分割之后的北非

前文中曾叙述过，埃及供应给罗马的小麦占了罗马进口小麦量的三分之一，不过这个比例是克劳狄乌斯重新开发北非西部全境后得出的数字。在此之前，出口到罗马的埃及产小麦占的份额比现在的更高。对于以小麦为粮食，却主要靠进口小麦的国家而言，单由一个地区供应粮食的话，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北非地区能够提供三分之一的小麦以后，加上出产量几乎等于整个罗马本土小麦产量的西西里岛，罗马等于有了3条生命线。

这里的北非，实际上指的是以向南方延伸的沙漠为界，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地区。不过这一带的罗马化进程不只停留在产业振兴的层面上，

人才的挖掘和提升经济实力有着必然的联系。不仅是发展经济，负得起守护刚起步的经济责任的人才也是紧缺的。换言之，对有军事才华的人而言，这将是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同时还急需能保证经济和军事顺利进行的行政方面的人才。这种人才需求，促进了迦太基裔的居民融入罗马帝国体系之内。

公元前146年，迦太基被罗马所灭。罗马经过3年的攻城战，终于将其首都攻陷，并在城中撒满了海盐，使其成为一块不毛之地。公元前46年，尤里乌斯·恺撒重新兴建这座曾是地中海地区数一数二的繁华城市，并用迦太基这个曾使罗马人难以忘怀的宿敌之名来命名。90年之后，仍旧是罗马行省的迦太基经济再度复苏，但它早已是农业大国和贸易强国。取得这些成就，都应当归功于克劳狄乌斯的这种“帝国统治方式”。甚至在150年后，这里还诞生了另一位罗马帝国的皇帝。

犹太问题

犹太问题是卡利古拉留下的另一个烂摊子。由于犹太问题是多地区问题，他们包括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居民，以及在亚历山大等城市和希腊人混居的犹太人。应对这些依旧抵制罗马化的犹太人，克劳狄乌斯采用了特殊问题特殊解决的方式。对于前者，克劳狄乌斯引用奥古斯都的犹太人管理方式；对于后者，他则用提比略的统治办法。

事隔35年之后，克劳狄乌斯决定，再次任用犹太人做国王来统治居住在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地区聚居的犹太人。这就如同海外分公司的总经理不是由总公司的人担任，而是聘请当地人担任。被委以统治犹太人重任的是希律王家族的一位成员。他的名字在西方被读做尤里乌斯·阿格里帕，犹太人则读做希律·阿格里帕。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尽管这对罗马而言有好有坏。希律·阿格里帕幼年曾在罗马当过人质，他既是卡利古拉的玩伴，与克劳狄乌斯交情也非常深厚。

可惜的是，这位才华横溢的王子，始终没有得到提比略的信任。如果提比略有让尤里乌斯·阿格里帕王子做犹太国王的打算的话，他完全有能力这么做。然而一直没有提拔他，是因为提比略觉得这个人不是值得依靠的盟友。一直待在“象牙塔”活到50岁的克劳狄乌斯就与之不同，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容易相信别人。

在此，顺便提一下，卡利古拉与犹太人有过武力冲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他打算打造与其相仿的朱庇特神像强行竖立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大神殿中。然而，这起冲突在卡利古拉死后烟消云散。叙利亚总督佩特罗尼乌斯拖延不从之后，使得卡利古拉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在任期满后，这位总督回到了罗马。

然而，住在亚历山大地区的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关系日益恶化，犹太人方面甚至出动了以哲学家斐洛为首的使团直接向克劳狄乌斯告状。克劳狄乌斯针对这个问题则贯彻了提比略的策略，也即罗马做中间人出面调停，但对两边都不偏袒。

克劳狄乌斯继承皇位不久之后，就发出了一封题为《致亚历山大公民的一封信》的公文，罗马皇帝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单从题目就能有所了解。

这份公文的诉求对象，既不是住在亚历山大的希腊人也不是住在此地的犹太人，而是“亚历山大公民”，这当然是有深意的。它表示，地中海最大的城市亚历山大的所有希腊人居民和犹太人居民，都应该摈除民族偏见，把自己当做“亚历山大公民”的一分子。这也表明，产业和贸易之都亚历山大的繁荣发展与当地的希腊人和犹太人的齐心协力密不可分，为此，罗马也誓将竭尽全力地调停此事。简明扼要而言，公文的中心思想，就是若哪一方心存不满，在向对方发泄之前，应该先来罗马这边告状。不过克劳狄乌斯也承认，要让两个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都不同的民族同心协力，要看他们是否有包容精神。不管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他都希望他们相互包容。

实际行动就是，取消了应该给在3年前的暴乱放火事件中资产蒙受损失的犹太人的赔偿。因为如果理赔的话，要对犹太人进行赔偿的就是加害者希腊人，如果这样处理，可能会再次引发暴乱。

然而，对遭受损失的犹太人居民，克劳狄乌斯再次确认了提比略对他们做的所有承诺：

（一）犹太人拥有把亚历山大的5个区中的2个区作为居住区的权利。

（二）宗教信仰自由，允许犹太人每年给耶路撒冷大神殿捐款。

（三）赋予犹太人居住区裁决权，然而死刑必须得到埃及行省长官的许可。

（四）周六为安息日。

（五）免除军役等差役。

既然贯彻了提比略的做法，就等于承认恺撒、奥古斯都、提比略等与罗马相同的办法，即犹太人与希腊人在商业上享有平等权利。然而，第5项是罗马考虑到犹太教的特殊性特许的。由于罗马方面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希腊人居民就以一种“不得不如此”的别扭心情包容了这件事。

罗马帝国的沙漠中常有强盗出没，红海地区则苦于海盗猖狂，驱逐这些不法之徒，维护和平是拥有霸权的罗马帝国职责所在。在埃及，驻扎着以两个罗马人为军团长率领的、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士兵组成的军团。

然而罗马军队是由主力军团兵和人数相同的辅助兵组成的，罗马方面积极地征用当地人任辅助兵。事实上，在维护埃及和平的重任中起了

至关重要作用的希腊人与埃及人辅助兵团，其小队长和中队长指挥层大多数是希腊人与埃及人。对于在商业上享有和自己同等权利，却可以以宗教信仰为理由，不用为维护和平出力的犹太人，希腊人心中愤愤不平。用现代的说法可以理解为，犹太人在希腊人眼中是“躲在别人的保护伞下”的懦夫。将地中海地区分而治之，会导致希腊人与犹太人的相互仇视情绪，单靠理解包容来消除这种敌视心理，实在是有点天方夜谭。

虽然矛盾重重，克劳狄乌斯还是以公开的方式表明立场，亚历山大城终于平静如常了。希腊人和犹太人最终承认自己是“亚历山大居民”的事实，这倒不是得益于克劳狄乌斯的劝解，而是他们屈服在克劳狄乌斯在公文最后表露出来的威胁语气。世事，通情达理的人永远都是少数，对于剩下的大多数，威胁往往是最有效的手段。当多数人都屈服于强大军事力量的压力之下时，通情达理的少数派即刻会占据上风，这就是威胁的优点。克劳狄乌斯在公文《致亚历山大公民的信》的最后写道：

> 罗马“第一公民”今后是否还会推行以体谅大家为出发点的政策，就看各位的表现了。

克劳狄乌斯新官上任后立即就烧的犹太问题这把火，到此算是尘埃落定了。然而这期间克劳狄乌斯还是犯了看人不准的错误。正如提比略生前看准的一样，希律·阿格里帕极具野心，他是不会满足于罗马同盟国君主这个位置的。不能疏忽对这位犹太王行动的监视，成了邻国叙利亚行省总督的大事。

希律·阿格里帕管辖的领土基本上就是奥古斯都认可的希律大王时代的领土范围，不过可能是仗着自己和克劳狄乌斯私交甚密，加上克劳狄乌斯生性懦弱，希律·阿格里帕一定是觉得自己在耶路撒冷可以为所欲为了。希律大王去世后，奥古斯都曾下令禁止修建城墙将耶路撒冷的街道围起来，阿格里帕却无视此法规，修起城墙来。叙利亚总督得知此

事后，不得不以坚决的态度在克劳狄乌斯面前告了阿格里帕一状。

希律·阿格里帕要调整政策，他要招集罗马帝国东方各属国的国王来开会。这消息又被叙利亚总督汇报给了克劳狄乌斯。在克劳狄乌斯严厉的警告之下，这个计划最终流产。罗马跟这些东方列国单独地结为盟国，因为这些国家是罗马和其最大的假想敌帕提亚王国之间的缓冲地带，罗马更不可能让这些国家之间形成同盟关系。

虽然中间也经历了一些坎坷，然而“以夷制夷”式的犹太民族统治，还是进行得十分顺畅。希律·阿格里帕在位3年后去世，这对于克劳狄乌斯而言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既是玫瑰又是毒药的有才的希律·阿格里帕，不再是罗马帝国的威胁；忧的是，希律·阿格里帕的儿子年幼，不能继承皇位，所以他将不得不放弃由犹太人统治犹太人的治理方法。

经过公元41年到44年3年的犹太王统治之后，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地区又重新回到以前罗马直接管辖的管理方式之下。即皇帝委任的摄政长官，在直接上司叙利亚总督的监督下治理犹太人。

克劳狄乌斯既然遵从提比略时期对犹太人的管理体制，那么实质性的东西也要按照提比略的做法来办。在犹太地区，不管是人还是物，只要是容易让人联想到统治者罗马帝国，就都尽可能地清除掉。执政官驻地在恺撒利亚，军营也驻扎在那里。雕塑和军旗都一律禁止带入耶路撒冷，以避免皇帝的塑像可能被说成是搞偶像崇拜。

在历任执政官当中，当然也不乏无知鲁莽的长官，也导致了罗马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然而，历来有中东地区“火药桶”之称的巴勒斯坦地区，在此之后还是享有了20年的和平。自从希律大王去世后，犹太便被纳入罗马帝国直接管辖之下。如若从公元6年开始算起的话，尽管是被异教徒的罗马人统治着，犹太人度过了60年的太平日子，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远征不列颠

不列颠问题，是卡利古拉留下的最后一个烂摊子。这倒也不是仅仅因为卡利古拉在多佛尔海峡边搞军事演习，结果还没出海就撤了军，所以不列颠人才不愿意善罢甘休。不列颠问题在50年前奥古斯都时期，还没有那么迫切。到了公元1世纪中叶克劳狄乌斯的统治时期，就演变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了，这才是克劳狄乌斯远征不列颠的理由。

英国当时被罗马人称为不列塔尼亚，这是根据不列颠英语发音而来的。不列颠正如国名的由来一样，这一点与国土的四分之三自始至终都在罗马帝国境外的德意志不同，英国有过被罗马征服的历史。引用英国学者最喜欢的说法，就是正因为不列颠曾经被罗马统治过，所以不列颠人不是日耳曼（德国）人一样的蛮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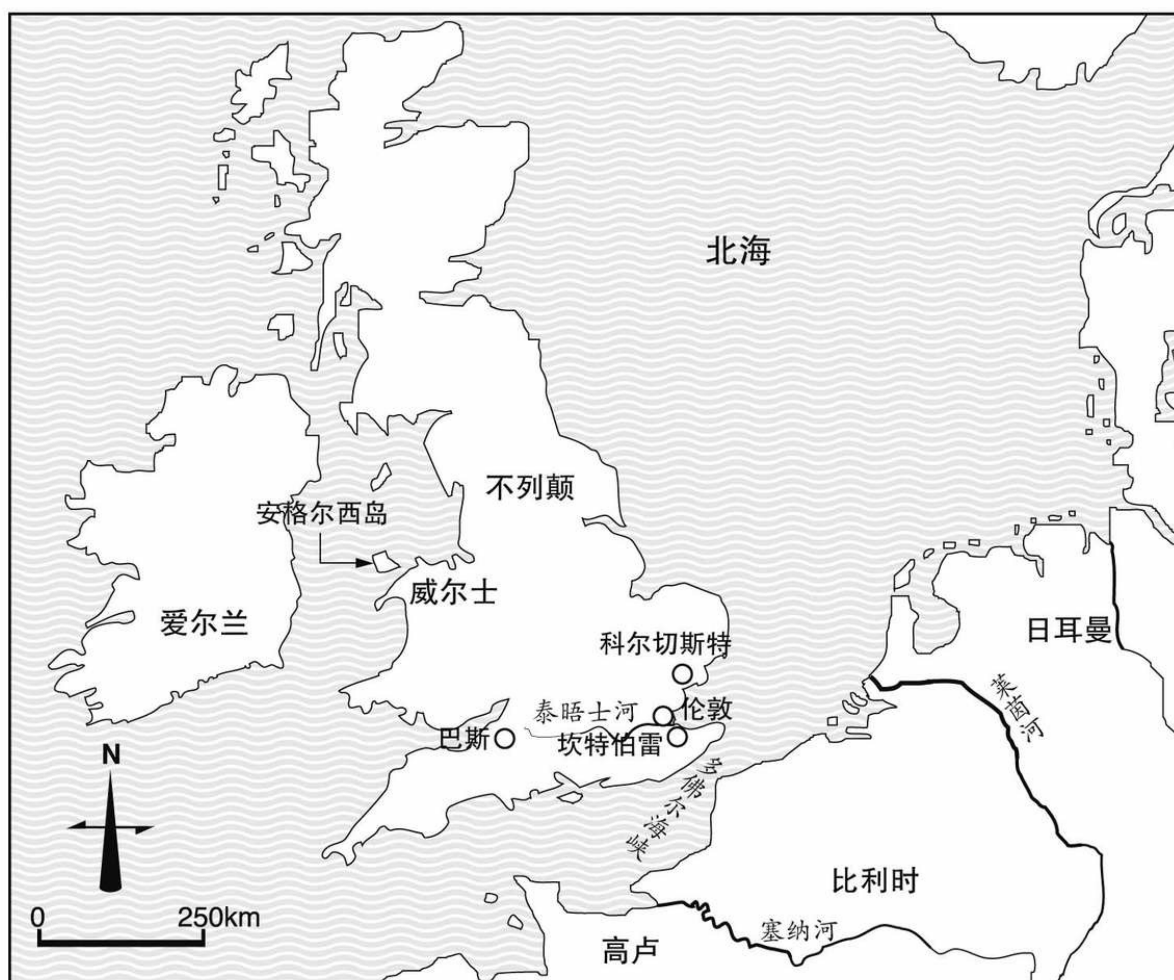
不列颠分别在公元前55年和次年与罗马有过两次交锋，这都是尤里乌斯·恺撒率领罗马军团远征不列颠时期的事了，距克劳狄乌斯时代已有百年历史。

当时恺撒的出发点不是征服不列颠。对于称霸整个高卢地区的恺撒而言，他要做的只是阻止反对罗马的高卢人渡过多佛尔海峡逃往不列颠。此外，属于高卢人的卑尔根（比利时）人也大量迁徙到不列颠。所以恺撒此举的另一个目的，是防止高卢人中的反对派和高卢东北部的高卢人、高卢后裔的不列颠人结成同盟，共同反对罗马帝国。

与此同时，恺撒作出了要横渡莱茵河攻打日耳曼人的决定。恺撒最初攻打不列颠人的出发点就和攻打日耳曼民族一样，是想借此举牵制敌人，而不是想称霸。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恺撒还是想征服不列颠，因为与一直向东延伸的日耳曼不同，不列颠是一个岛国。

当时，恺撒的战略是很有效果的，整个高卢地区（包括现在的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南部、德国西部与瑞士）都臣服于罗马霸权

下。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奥古斯都时代，在他统治的40余年间，罗马对高卢地区的掌控地位更加稳固了，况且不列颠人也始终没有威胁罗马帝国的霸权。多佛尔海峡对岸的不列颠肯特地区的百姓，与高卢地区被罗马征服之前一样，还是和高卢百姓保持着贸易往来。面对这样的局势，奥古斯都当然没有必要出兵去攻打不惹麻烦的不列颠。



不列颠

到了提比略时代，罗马和不列颠之间依旧保持着间接来往。然而虽然当时两国之间的来往，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暗地里却风起云涌。

被罗马人称做高卢人的凯尔特人，在现代有凯尔特人（希腊语）与高卢人（拉丁文）两个称呼。他们在被罗马征服之前叫凯尔特，被罗马

人征服之后则被叫做高卢。而没有被罗马人纳入统治体系之下的爱尔兰人，罗马人也把他们称为凯尔特人。德鲁伊特教是凯尔特人信奉的民族宗教，这种宗教有专门的祭司阶层，该民族的宗教、司法、教育都被他们掌管着，他们也同样极大地影响着高卢民族的各部落领袖。即使凯尔特人信奉多神教，但从宗教与信众的关系方面来看，与一神教的犹太教是相似的。罗马人没有专门的祭司，因为在他们看来，司法、教育和军事本该是人类能够独立思考才产生的，所以，凯尔特人设置祭司的做法自然无法被他们所接受。此外，用活人祭祀是凯尔特人宗教习俗之一，虽然罗马人深受埃特鲁斯坎民族的影响，然而凯尔特人的活人祭祀根本不能为罗马人所容忍。罗马人之所以厌恶迦太基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习惯杀掉小孩来当做祭祀用品。

被征服之后的高卢人的德鲁伊特教并没有受到罗马人的打压，只是以往受祭司影响的范围被罗马人日益挤压。

罗马公民权被尤里乌斯·恺撒授予屈服于自己之下的高卢各部落的酋长。罗马承认公民权的世袭性，因此，不论哪一个民族或部落成为罗马公民，都必须严格按照罗马法律行事。

如此一来，酋长虽然是高卢的上层阶层，然而在法律上，他们的地位和罗马人是平等的。不过，这些部落的支配权就与他们被征服之前类似，仍旧被该部落的酋长们把持着。所以，即使部落酋长统治下的人民并没有罗马公民权，事实上也得严格按照罗马法律行事，这种支配其他民族的方法，实在是现实主义的罗马人绝妙的统治策略。结果，德鲁伊特教祭司手中原本掌握的影响力和司法权也日渐丧失殆尽。

奥古斯都在高卢中部的比布拉克特（靠近现在的欧坦）设置了高等教育机构之后，祭司们原来垄断的教育权也日益弱化了。今后有望成为部落首领的青少年便从全国各地聚集在一起学习希腊与罗马的课程。他们中若有想继续深造的，也有渠道前往罗马或雅典留学。

这样一来，祭司们手中就仅仅剩下了初级教育了。然而，部落酋长们痴迷于争取罗马公民权，年轻人热衷于想参加罗马军队的辅助兵，商人迫切地想与罗马开展贸易，也即这些高卢人掀起了一股拉丁文学习风潮。祭司们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给凯尔特人灌输自古以来传统的教育，其教育的施教内容变成了实用的读写加减运算。不过，读和写的内容还是拉丁文，计算也使用拉丁数字，要是祭司们能够将自己的存在定位于宗教层面的话，他们或许还能存活在高卢下层阶层，然而危机意识逼着他们走向了绝境，最终，他们开始反抗罗马帝国以求得生存。

高卢地区德鲁伊特教祭司们最后的反抗即是发生在提比略统治初期的叛乱，叛乱爆发后不久就被镇压了。由于欧坦的学生们也参与了这起叛乱，这当然引起了皇帝提比略的高度重视。最终，他以此次叛乱破坏了社会稳定为由，将德鲁伊特教的祭司们驱逐出高卢地区。被驱逐的祭司们便逃到了罗马人管辖外的不列颠。虽然不列颠与高卢地区只有一道狭窄的海峡隔着，但他们差不多花了20年的时间，才把这里变成凯尔特人宗教的根据地。如若克劳狄乌斯放任这些祭司们的行为不管，恐会给统治高卢地区带来意想不到的阻力。于是，在与尤里乌斯·恺撒远征不列颠时隔一个世纪后，克劳迪乌斯再次远征不列颠。这就是此次远征不列颠的来龙去脉。

延续奥古斯都的政治是提比略与克劳狄乌斯继位表明的首个态度。提比略甚至还宣示，对他而言，奥古斯都式的执政方式就是法律。当然，这并不代表他要全部照搬照抄奥古斯都的执政方式。毕竟他们都是罗马人，认为法律应该服务于人，而不像犹太人认为的那样，认为人应当适应法律。言外之意，克劳狄乌斯认为“法律”应该是具体情况具体修订。

奥古斯都去世后，掌握统治权的提比略将奥古斯都生前征服日耳曼的毕生梦想束之高阁，而克劳狄乌斯则违背了奥古斯都不得再扩张领土的遗训，一心要称霸不列颠。只是，他们两人肯定不觉得自己没有遵守

奥古斯都的政治策略。因为他们俩一直都是遵循奥古斯都要以保全帝国防线为首位的基本方针。

经常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这样一幕情景：卡利古拉将罗马军队集结到多佛尔海峡边的时候，心里在盘算什么呢？古代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是卡利古拉一时心血来潮，于是就把这个历史事件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可是事实上，卡利古拉并不是疯子，智商也不低。当时导致卡利古拉计划落空的原因，在于他浪费无度致使国库亏空。而克劳狄乌斯之所以能远征不列颠，是因为他做出这个举动是在他继位后的第二年，这也是卡利古拉财政改革后，显露出效果的一段时期。所以我推测卡利古拉最终功亏一篑是受制于财政问题。

另外，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一年前的公元42年，不列颠各个部落中最强大部落的国王克诺贝利努斯在多年的励精图治之后，与世长辞。这位国王的领地首府，是在罗马人统治后叫做伦迪尼姆（现在的伦敦）的东北方约100公里外的卡姆洛杜努姆（现在的科尔切斯特）。克诺贝利努斯的去世，动摇了太平盛世的不列颠。他的弟弟和儿子们为了争夺皇位，兵戎相见。争夺皇位的战火甚至烧到了一个争夺者的领地——当时被称为卑尔根沿岸的高卢东北海岸。

罗马与小领地领主之间是“保护”关系，即罗马是保护者，这些领主则是被保护者，保护者有帮助被保护者的义务，被保护者则要服从保护者。这就是所谓的罗马式相互安全防卫体系。既然牵扯到了高卢地区，就算是其东北部，也是在罗马的管辖之下。这样一来，罗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出兵不列颠了。

克劳狄乌斯没有任何军事经验，他当然明白这种事要交给军事专家负责。被委以不列颠远征军总司令的是和克劳狄乌斯同岁的奥尔斯·布劳迪斯将军。在此之前，他是潘诺尼亚的总督，因出色地逐步完成了确立多瑙河防卫线这项困难的工作而声名远播。

布劳迪斯分派到的兵力共有4个军团的2.4万名士兵加上高卢地区、莱茵河以及出生于西日耳曼和西班牙的辅助兵，总共4万名的精锐士兵。恺撒在97年前第二次出兵不列颠时的兵力，是5个军团3万名士兵加上2000名辅助兵共3.2万人。两相比较，两次出兵数量不相上下，目的却完全不同。恺撒出兵是为了打击敌人，牵制他们。而克劳狄乌斯出兵是为了征服。恺撒当初发动的高卢战役也是以征服为出发点的，然而那时他只有4个军团，所以他下令，要在开战之前重新编制出2个军团。历经8年之久的高卢战役就是靠这10个军团6万名士兵们才得以胜利完成的。

在发动远征时，采用何种征服策略的决定权在最高司令官。枭雄恺撒采取的是集中兵力，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一决雌雄的策略，而文将克劳狄乌斯则是采用保证在不被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投入兵力，慢慢征服的战术。结果，幅员辽阔的高卢虽是不列颠国土面积的3倍以上，然而高卢战役还有战后处理才花了8年时间，不列颠战役却前前后后延续了20年的时间。

克劳狄乌斯采用这样的战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他没有军事经验。当时的罗马与恺撒时代的罗马不能相提并论，当时，克劳狄乌斯不得不把军队都派遣去驻守边防。所谓的“保证在不被动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投入兵力”，他能调遣的兵力也就只有4个军团，即克劳狄乌斯只能靠4个精锐军团征服不列颠，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当然不敢贸然行动。

首先，克劳狄乌斯从前线总司令布劳迪斯以前任职的潘诺尼亚抽调1个军团到前线，这么一来，驻守多瑙河防线的部队就由7个军团削减到6个军团。

随后克劳狄乌斯又下令，要从驻守莱茵河的8个军团里调遣3个军团前往前线。这样一下子调走了3个军团，剩下的5个军团面对日耳曼恐怕难以保护罗马帝国。于是他又下令重新编制2个军团，加入到驻守莱茵河的军团中。克劳狄乌斯作出这样的调遣，是因为出征不列颠的主力必

须是精锐部队。他也是不得已才想出这样的办法。

虽然打得很艰难，然而克劳狄乌斯用只比奥古斯都当时调用的25个军团，外加2个军团的兵力，就把不列颠的国土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征服不列颠后，就得占用3个军团长期驻守当地。这样一来，莱茵河与多瑙河这两条罗马帝国最重要的防线上，就各自少了1个军团。在多瑙河和莱茵河防线上，克劳狄乌斯严守提比略的防御方式，所以即使少了1个军团，防御任务也足以完成。这也说明，能够进行如此调配都要归功于提比略皇帝建立的防御系统。

布劳迪斯率领的4万人的罗马军顺利地横渡多佛尔海峡，并从不列颠东南部顺利登陆。不列颠人的武装和战略与恺撒时代并没有多大改变。总司令布劳迪斯决定先攻打克诺贝利努斯两个儿子驻守的科尔切斯特，因为他认为如果一开始就能攻下不列颠最强大的部落，那之后征服其他部落就势如破竹了。

在泰晤士河南边，双方打响了第一场正面交锋。最后罗马军大获全胜，不过罗马军没有立即渡过泰晤士河乘胜追击。他们在原地等候从罗马赶来的皇帝克劳狄乌斯。

元老院中理解和支持克劳狄乌斯的少数派中，有一位威望很高的议员维特里乌斯。皇帝委任他代理国事后，他就经海路到达马赛，在高卢登陆后，又顺道去了其出生地里昂游览，最后才慢条斯理地抵达在泰晤士河边恭候圣驾的罗马军营。克诺贝利努斯的两个儿子一个在泰晤士河南畔的战役中阵亡，一个落荒而逃到威尔士地区。所以簇拥着皇帝的军队，在渡过泰晤士河直到科尔切斯特，这一路上，就如同走在自己的国土上一样，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军队一路长驱直入，顺利占领科尔切斯特。

克劳狄乌斯在科尔切斯特制定了一系列不列颠行省化的基本政策。其实，目前罗马征服的也不过是不列颠的一小片地区。不过，皇帝只管

拟定基本政策，至于如何执行那就是军队将领们的职责了，更何况不列颠行省化的基本策略和其他行省是大同小异的。让退役的士兵们迁移到当地建设殖民城市，给予原住民地区“区域自治权”。再以殖民城市为中心，用罗马式的道路网将整个区域联结起来，这就是罗马治理各个行省的基本路线。于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退役士兵移民至科尔切斯特，建设殖民城市这一计划就这样定案了。

克劳狄乌斯在定出这些决策之后，就打道回国，将剩下的工作交给了他的将军们。他离开首都长达6个月，然而待在不列颠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6天。

回到罗马的克劳狄乌斯，获悉元老院要为他举行凯旋仪式。既然是正规的凯旋仪式，那身为凯旋将军的克劳狄乌斯就不得不驾驭由4匹白马拉的战车，然而从克劳狄乌斯的身板来看估计是做不到的。所以最后可能是让随从驾战车，他则坐在战车上向群众挥手致意吧。

元老院又赋予克劳狄乌斯唯一的儿子使用寓意“称霸不列颠之英雄”的“不列塔尼库斯”称谓权，尽管不列塔尼库斯当时只是3岁的幼儿。

布劳迪斯在克劳狄乌斯回国之后，立刻率领罗马军队，全面展开了称霸不列颠的战役。强将手下无弱兵，抑或是英雄惜英雄，布劳迪斯的手下个个骁勇善战，他手下的军团长之一韦斯帕芗，后来成为了罗马帝国皇帝。

罗马人称霸不列颠的战略是从科尔切斯特所在的埃塞克斯地区一直向北推进到诺福克。在占领这一带后，罗马军又将战线转移到泰晤士河南畔。罗马军在南畔把坎特伯里、伦敦、巴斯连成一条包围线，开始了称霸不列颠的第二波攻击。罗马人自古喜爱温泉，当罗马士兵在巴斯（罗马时代又称其为亚奎·索利斯）发现温泉时，他们简直高兴得发了疯。虽然历史学家塔西佗没有提及，然而从意大利来的人对不列颠的印象就是“天上地下都是水”。到了现在，由于终年潮湿，即使是现在意大

利生产的鞋子到了英国，不出几天就会坏掉。可以说巴斯的温泉使这些被迫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罗马人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抚慰。

公元47年，即不列颠战役打响后的第四年，总司令布劳迪斯让位于后继者，功成身退回到罗马。克劳狄乌斯和元老院商议决定让这位大功臣以骑马代替战车的简化方式列队游行，庆祝他的凯旋。布劳迪斯离任后，不列颠战役的战线扩展到了威尔士地区。罗马人称为摩纳岛的安格尔西，这一地区大体上与威尔士地区接壤，也正是德鲁伊特教祭司们当年逃亡后的聚居地。然而，直到下一任皇帝尼禄继位，才把反罗马的祭司们完全从英格兰和威尔士驱逐至爱尔兰。

秘书官体系

对历史现象进行大的区分的话，可分为著名历史事件和非著名历史事件。时髦一点的讲法就是看这件事有没有成为新闻。然而，正如企业不能光靠召开记者发布会就能壮大企业一样，维系帝国运行也绝不能像历史纪年表中列好的事情那样去做，不然一定会走向灭亡。由此看来，维持帝国运行的，绝大部分靠的是那些被称为“行政”的不起眼的工作。也许有人就会认为，既然这样，那就把“行政”上的事交给手下的将军、总督或长官去做不就得了？话虽如此，但总得需要有人下达命令指挥他们行事。比如，“殖民城市”建在哪里？哪一座土著居民城市要赋予他们“区域自治权”？罗马式“高速路”要通往哪些行省？等等，这些决策不属于行政范畴，而是政治上的事。因此，被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委以治理帝国重任的“第一公民”，就不得不负起下达决策的重任。

站在现代的角度来看，罗马帝国的疆土囊括了中欧、西欧、中东地区、近东地区以及北非。如此辽阔的疆域，就算是日常事务，工作量也多到难以计数。辛苦不算，由于没什么新闻价值，这些接连不断的工作还没有回报。所以对于负责人而言，相当高的觉悟是不可或缺的，否则

很难持之以恒，有始有终。

恰好，在意外继位之前用了50年岁月研究历史和写作的克劳狄乌斯，很明白这些没有新闻价值工作的重要性。他做过的有新闻价值的事情，除了远征不列颠之外，其他就没有了。在莱茵河防卫线上，他也只是贯彻了驻守的原则，还有对于另一条防卫线多瑙河，他也只是完善了防御系统。然而，与奥古斯都同门的第二代皇帝提比略相比而言，第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缺少他们所具备的贵族特有的骄傲。这位老实本分的皇帝，诚心诚意地想得到元老院的帮助。在征求元老院就审判体系法制化意见的会议上，他这样讲道：

> 我提出的这项改革草案，要成为法律之前，必须得到各位的同意。在此，我希望各位能够独立认真地斟酌后再决定。如果有不赞同这项草案的，请提出代替方案。要是拟定代替方案需要时间，也可以以后再行商量。
>
> 各位议员，为什么要各位提意见呢？假设元老院首席议员给我的草案提意见，各位议员不经思考就表示“同意”，走出议事厅后却说“我已经提过意见了”的话，这实在是元老院不应该有的做法。

克劳狄乌斯刚继位时遭到元老院议员的冷笑现象早已不复存在。因为，克劳狄乌斯早已经习惯在公共场合进行演讲，说话也不再结巴了，加之像维特里乌斯这样愿为皇帝肝脑涂地的议员也越来越多。不过，就算是皇帝钦点要立法的法案成为国家法律，也需元老院一致通过才行。无论是“终身独裁者”的恺撒还是对外一直自称“第一公民”的奥古斯都，抑或是隐退到卡普里岛仍抓着政权不放的提比略，都严守这个规矩。这个规矩可以说是罗马元首制的根基。这么说来，从决定国家政策这一点来看，身为国家政策的最高负责人，皇帝作出的决定等要称做政治的话，那么身为立法机关的元老院所做的工作也同样能称做是政治了。如

果这就是罗马元首制的话，那么要让这体制有效地运作，就需要一个能够正确忠诚地执行皇帝和元老院决策的机关，即在皇帝和元老院之间需要一个新的职能部门。

帝国的运营随着元首制时代的推进日益复杂化。面对这样的局势，如果想要保持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行，就要设立不同职能的职能部门。

提比略隐居的卡普里岛上，不论是在皇帝的别墅附近，还是在离其别墅较远的地方，都修建了多处规模很大的官邸，今天来看这些古迹，可以得知虽然隐退了但还掌握实权的提比略，已经形成了分工明确的部门系统。只不过他向来行事低调，所以至今也无法得知这些官邸各自发挥了什么样的职能。

作为提比略的外甥，克劳狄乌斯却是习惯公开行事的人，所以他将辅助自己治理国家的秘书官体系对外公开。

然而，罗马当时并没有培养官员的机构，就连产生官员的社会阶层都不存在。如果要问在这样的现实当中也能充分发挥职能的是何种组织的话，答案肯定是罗马社会中有钱而又有影响力的家庭。

在罗马严格地遵守各司其职原则的奴隶、称之为“解放奴隶”的原奴隶阶层是怎样支撑着罗马有权有势的家庭的，这是没有奴隶的罗马家庭不能想象的。用人中地位最高的人被称为“玛尤尔朵姆斯”（Major Domestic），是意大利语中“执事”一词的来源。能做到这个职位的一般都是解放奴隶。罗马人会让用人的孩子做自己孩子的伴读，这也是出于维系用人体系的必要而产生的，这也不难看出罗马人物尽其用的理念。

年近50岁的克劳狄乌斯会成为皇帝，这是常人很难想象的，所以他身边自然也就没有党羽和谋士。又由于身体上的残疾，更没有人对他心怀敬意。当上皇帝的克劳狄乌斯不仅结巴还淌口水，要想找到一个对自己忠心耿耿的朝堂助手，就得从家中的用人中培养。皇宫好似首相的官

邸，克劳狄乌斯家中优秀的奴隶和解放奴隶构建成了秘书官系统，打理着官邸上下。当时优秀的原奴隶阶层基本上都是由希腊人构成的。

单就听到“纳鲁奇索斯”、“帕拉斯”这样的名字，就知道他们不是希腊的自由公民，而是少年俊朗奴隶的称呼。这些奴隶要么与主人克劳狄乌斯同龄，要么略小几岁。所以，50岁左右的纳鲁奇索斯是个当官的好手，这对于重用他的克劳狄乌斯来说十分放心。这些原本是奴隶的官员主要有以下职责：

“阿贝厄皮斯托尼斯”（ab　epistulis），从字面上来看是“信件官”的意思，用罗马官方语言拉丁文或是帝国东部地区通用的希腊语写的所有奏折，都要先汇集到这里。他们负责拆信、阅读、研究商讨，然后写上自己的意见，再将奏折呈给皇帝定夺。如果遇到发布公告或是临时法律的情况，就将拟稿的工作交给“学术部”，再将“学术部”写好的文件公布。如果要制定永久性法律，就以皇帝立法的形式提出，请求元老院表决。

字面上来看，“ab　epistulis”虽是“信件官”的意思，然而研究罗马历史的学者一致认为他们实际上相当于内阁秘书长。放到由政治家出任内阁秘书长的日本，信件官相当于最高幕僚的内阁副秘书长。

克劳狄乌斯委任的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家里的解放奴隶阶层的用人之一，纳鲁奇索斯。

纳鲁奇索斯因为工作需要，见克劳狄乌斯的次数比任何人都要多。他还有一项工作，那就是帮克劳狄乌斯安排行程，除了他的家人，如果没有跟纳鲁奇索斯预约，就不能见克劳狄乌斯。

“阿拉特沃尼普斯”（a　rationibus），直译过来就是“财务部”，这个部门的职能就同现代的一样，负责一切财务上的工作，克劳狄乌斯任命解放奴隶阶层出身的帕拉斯为部长，在他下面根据每一项税收分别设科

室。有负责征收元老院行省的行省税收科、皇帝行省的行省税收科，负责收取5%的奴隶解放税科、遗产税科、营业税科，以及负责皇帝私人领土埃及的征税的税收科等等。每个科室的科长都出身于被称为“解放奴隶”的原奴隶阶层，他们的手下也都是奴隶。

“阿里贝里斯”（alibelis），直译的话只能说是“信访部”，实际上就是负责受理全国各地寄给皇帝的请愿书和陈情表的部门，克劳狄乌斯让家中的用人，原奴隶阶层的卡里斯杜斯担任部长。送来的任何请愿书，都要经过卡里斯杜斯的把关才会送达克劳狄乌斯手中，只要卡里斯杜斯认为没有上达给皇帝的必要，克劳狄乌斯就不会得知此信的内容。克劳狄乌斯和卡里斯杜斯会就信件内容一起商讨对策，再将决定下达给相关部门。

“苏贝斯库特沃恩”（Subscription），直译过来就是“记录部”。他们负责把皇帝对请愿和陈情的批复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

“阿可格里恩贝斯”（a　cognitionibus），是“知识部”，其实就是“档案部”。负责整理克劳狄乌斯手边的所有文件，以备用得着的时候可以随时翻阅。司法类文件更是反映出了克劳狄乌斯对司法的重视程度——整齐到可以和法务部的文件室媲美。

“阿斯土迪斯”（astudiis），是学术部，正好反映出克劳狄乌斯喜欢钻研的特性，煞是有趣。但事实上，这个部门的工作不是协助皇帝作研究，而是以皇帝的名义拟写书面布告。演讲的讲稿虽然是自认为颇有学识的皇帝自己写，然而像是要刻在大理石碑、花岗岩或是铜碑上的碑文，就得靠聪明能干的奴隶们出马了。

上述的几个部门就是克劳狄乌斯设置的秘书官系统的基本构成。能够让皇帝的工作富有效率正是设立这个系统的目的。不仅如此，这个系统还能分担帝国最高统治者肩上的重担，这对于健康状况不是很好的克劳狄乌斯而言，无疑是福音。这个秘书官系统也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

虽然克劳狄乌斯出生于法国里昂，然而由于一年之后父亲杜路苏斯在日耳曼这块土地上去世，他也就随母亲安东尼娅回到了首都罗马。从那时起到他50岁，由于身体上的缺陷，他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政治与军事，所以他在这么多年的岁月中都不曾有机会踏出意大利本土一步。可能他的活动圈不过也就是罗马到那不勒斯的这个范围，或许他对意大利北部和那不勒斯以南的意大利一无所知。在当上皇帝之后，他也仅离开本土一次。在罗马的奥斯提亚港口乘船抵达法国的马赛，上岸走旱路横穿高卢地区，然后渡过多佛尔海峡抵达不列颠。历时6个月的外出，可以说是克劳狄乌斯此生仅有的行省之行。不过，虽然克劳狄乌斯没有在多个行省的生活经验，然而作为皇帝的他，行事都是以整个帝国为出发点的。

得益于德国历史学家蒙森发起的收集罗马帝国全国各地的碑文并将其出版发行的举动，我们这些生于后世的人，才有机会了解罗马皇帝们那些没有被记录在册的政绩。借由这类研究，被只关注重大历史事件的古代历史学家们安上罪名的克劳狄乌斯和提比略才得以平反。就只论克劳狄乌斯，在他执政下铺设道路、决定殖民城市、重建同盟国系统、在附属国没有继承皇位的合适人选时将其行省化等等这些举措，都切实地在整个帝国得以推行。自己没有到过的地方，没有亲自视察过的地方，他都能给出切实有效的决策，这都得归功于他50多年积累的书本知识。然而，书本上的知识要经过实践才能上升为认知。在哲学上来讲，所谓的认知，就是依靠理智来探寻事物的本质。说得明白点，发现本质才是最重要的。

多年积累下的知识是克劳狄乌斯拥有的财富，虽然克劳狄乌斯是意外当上皇帝的，然而他一直都不曾放弃个人的意志。在“结合实际”这一点上，克劳狄乌斯就比不过一路实践过来、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缺少作为统治者必须要具备的“结合实际”这一特质的克劳狄

乌斯，只好寄希望于别人的协助。

要说谁最了解克劳狄乌斯，也最能辅佐好他，当然莫过于首席内阁秘书长纳鲁奇索斯。

然而，任何体系都有好的一面与不好的一面，以启用解放奴隶和奴隶为特色的秘书官体系就有不好的一面。

譬如，将军们在经历数年征战沙场的生活后回归朝堂，要是通不过纳鲁奇索斯这里，根本就不可能面见皇上报告。元老院的议员有事想和皇帝商讨，纳鲁奇索斯就会说“第一公民没时间，有事就和在下说吧”等等。至于负责各行省财务的“皇帝财务官”们的报告对象，则是负责财务的秘书官帕拉斯，而不是克劳狄乌斯本人。

罗马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有着很大的流动性，然而从上而下大致可以分为元老院、骑士、平民、解放奴隶与奴隶等阶层。

元老院议员自然应划归于元老院阶级，指挥2个军团以上的军团长大多数出身于骑士阶级，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元老院中拥有席位。行省总督则全部是由元老院阶级担任，而皇帝财务官一般由“经济界”的“骑士”担任。这些罗马社会上层人士，不论他们多么地得到皇帝器重，但如若不向奴隶阶级出身的秘书官们低头，就可谓是和皇帝咫尺天涯。

罗马社会上层人士中开始蔓延着不满与愤怒，这些人自认为自己肩负着罗马的未来，他们开始痛恨秘书官群体，特别是被他们称之为“三人圈”的妄自尊大的纳鲁奇索斯、帕拉斯与卡利斯杜斯这三个解放奴隶。除了引发不满与愤怒之外，使用解放奴隶的秘书官体系还有其他的负面影响。

罗马帝国规定，只要有足够的资产和子女的话，就可以获得罗马公

民权。在这种规定之下，解放奴隶在罗马社会商界中取得成功，活跃于地方自治政府中的例子也不鲜见。然而，这群人毕竟是出身于奴隶，没有任何背景。此外，克劳狄乌斯迟早也会退位。在这种压力之下，他们除了依靠自己之外别无选择。正面的作用是，这样的想法可以变成努力上进的原动力。负面的作用是，在罗马社会产生了金钱万能的风气。这群忠于皇帝、能力突出、热心敛财的秘书官还有另外一项工作，即将公共事业工程承包出去。秘书官们热衷于以此敛财。克劳狄乌斯不注重自己本身财富的积累，他的亲信们却对此兴致盎然。甚至有传闻称秘书官帕拉斯敛财达到了3亿塞斯特斯之多。而在罗马帝国中，要成为元老院议员，拥有的财产也只不过是100万塞斯特斯罢了。

要这些最高当权者的贴身人物们完全杜绝对社会地位高的人傲慢无礼的态度，或是杜绝利用自己的地位敛财的行为，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人是最经不住诱惑的。不过就算消除不了，也是可以克制的。恺撒、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的执政生涯中并不是没有他人的辅佐，不管是以何种方式，总是有人在旁辅佐。不过，这几位皇帝拥有能让手下人心存敬畏的才能，这恰好是对左右手无形的牵制。所谓“敬畏”，字典中的意思是“敬重与畏惧”。不仅仅只是让人“敬重”，还得让人“畏惧”。在克劳狄乌斯的性格中，刚好没有能让人敬畏之处。换言之，就是克劳狄乌斯容易被人轻视。结果，原是奴隶的秘书官们觉得在克劳狄乌斯手下可以恣意妄为。不仅仅是秘书官们小瞧他，就连女人也不把克劳狄乌斯放在眼里。

皇后梅莎里娜

克劳狄乌斯在50岁继位之前曾结婚3次，离婚2次。与第一任妻子乌鲁葛妮拉离婚后，与第二任妻子耶利娅·佩蒂娜结婚，婚后二人虽育有一女，但最终还是离婚了。克劳狄乌斯无论是从身材上还是从精神层次上来看，都不是女性倾心的类型。所以离婚应该也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结果，估计他是被妻子们抛弃的。虽然身材和精神层次不占优势，不过，当他的伯父提比略和兄长日耳曼尼库斯做了尤里乌斯家族的养子后，克劳狄乌斯自然就成了罗马名门望族中的显贵、克劳狄乌斯家族的掌门人。做了望族的一家之主以后，自会有女人愿意委身于他，此时身形和精神层次的劣势不再是问题。克劳狄乌斯的第三任妻子比他小了35岁，是共和制时代的名门梅莎拉家族之女梅莎里娜。

梅莎里娜的外祖母是马克·安东尼和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的女儿，通过她母亲杜米提亚·雷必达这一层关系，梅莎里娜和尤里乌斯家族是有血缘上的联系的。罗马有把父亲的名字女性化给女儿当名字的习惯，如果有两个女儿的话，就让两人共用一个名字。所以，因与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热恋而名声大噪的安东尼和屋大维娅生的两个女儿都叫安东尼娅。历史学家为了便于区分两人，就在她们名字前面冠上“大”、“小”，称姐姐为“大安东尼娅”，妹妹则叫“小安东尼娅”。梅莎里娜的外祖母是大安东尼娅，小安东尼娅嫁给了提比略的弟弟杜路苏斯，生下了日耳曼尼库斯与克劳狄乌斯。和梅莎里娜结婚的克劳狄乌斯从辈分上来讲，与梅莎里娜的母亲是表姐弟。顺便提一句，大安东尼娅的儿子杜米提亚· 阿赫诺巴尔布斯，也就是梅莎里娜的伯父，后来娶了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卡利古拉的妹妹小阿格里皮娜，生下了克劳狄乌斯之后的下一任皇帝——尼禄。

The opening text is first, then 

梅莎里娜

梅莎里娜在嫁给年长自己35岁的表舅时，肯定做梦也没想过自己很快就会成为皇后。公元41年，梅莎里娜的丈夫克劳狄乌斯意外继位，本

人没有像卡利古拉那样兴奋异常，然而16岁的梅莎里娜比自己丈夫更加欢喜不已。她的兴奋不仅是来自丈夫的继位，也出于自己身体内流着神君奥古斯都的血。为此，这兴奋被双倍放大。女人比男人更看重血缘关系，这个有趣的现象，在大阿格里皮娜和她的女儿小阿格里皮娜身上也看得见。或许女人要保证自己地位的正当性，就只能依靠血缘关系。后来，皇后梅莎里娜又为苦于膝下只有一女的克劳狄乌斯产下一子，母以子贵，这以后她更是飞扬跋扈。

由奥古斯都设计的皇位世袭制，势必提升生下皇位继承人的女性的地位。如果是因能力出色而被收为养子继承皇位的，那么生母是谁就不再是问题。然而，世袭制这个制度的立足点是重视血缘胜过能力，所以皇家的女人，特别是生下皇位继承人的母亲的地位会提升，正是这个制度的必然性。

此外，我个人还觉得，克劳狄乌斯本身的性格也助长了他妻子的嚣张气焰。

克劳狄乌斯并不是一个能让周围的人产生敬畏之心的人，这一点可以从秘书官系统的运作上看出一个大概。甚至是连解放奴隶出身的秘书官们都不把他当一回事，那么女人们自然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此外，正如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一样，克劳狄乌斯不太注意自己家中的事务，倒不是他没有家庭观念，而是克劳狄乌斯在继位之前一心扑在历史研究上，继位后又醉心于国家的治理。他心里想着，家中事务家人自己打理就好。他无法忍受一群女人在他耳边唠叨个不停，所以只要不打扰到他，她们想干什么都可以。克劳狄乌斯的这种心态和做法，导致皇后梅莎里娜越来越肆无忌惮。她的虚荣心、物欲和性欲都急速膨胀。不难想象，正是克劳狄乌斯的纵容，才使得她的欲望无限膨胀。

在丈夫克劳狄乌斯的凯旋仪式上，梅莎里娜的虚荣心一下子暴露了出来。公元44年，虽然罗马帝国征服不列颠的战事仍然还在进行当中，然而为了庆祝久违的领土扩张传来的捷报，首都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凯旋

仪式。这让喜欢参加节日的罗马市民狂欢不已。然而，让他们惊讶的是，居然在游行的队伍中看到了梅莎里娜的身影。

凯旋仪式是罗马帝国共同体的成员为迎接以武力为共同体创造利益而举行的仪式，当然也是凯旋将军和手下的将士们为感谢神灵庇佑取得胜利而进行的仪式。换言之，只有真正参加过战斗的人才有资格站在游行队列中，就算是队伍中有女人，她们也只能是战俘，那也是献给神灵和众人观赏的战利品。参加罗马凯旋仪式的真正主人公是军队的将领，如同恺撒时代一样，恺撒就让奥古斯都骑马在队伍中前进。又如，奥古斯都让皇位继承人马尔凯斯与提比略在公众面前亮相，驾着4匹马拉的战车，让马尔凯斯与提比略两个年轻人骑马紧随其后。在梅莎里娜之前，从未有过皇后参加凯旋仪式的先例。百姓把这件令众人哗然的事情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19岁的梅莎里娜充耳不闻。她并不是知道丑闻产生的原因但故意装做不知道，而是她根本就不明白所以才视而不见。克劳狄乌斯明明很清楚凯旋仪式的意义，然而这位年轻的妻子在他耳边吵着说连元老院都承认自己生下的儿子可以使用寓意“称霸不列颠之人”的不列塔尼库斯这个名号了等等，估计是经不住妻子的软磨硬泡，克劳狄乌斯只好答应了她的要求。不过，克劳狄乌斯也因此背上了连自己无知的妻子都管不住的骂名。

梅莎里娜之所以无止境地追求物质，并不是因为她出身贫寒。相反，她的父母双方都出身于共和制时代的显赫家族，她的丈夫更是罗马名门望族的后代。只是这位年轻的皇后自幼就铺张浪费，当上皇后之后更是铺张无度。当她的丈夫还是一个虽出身名门但只醉心于学问的人的时候，她的面前就堆满了各式罕见的奇珍异宝。年轻无知的梅莎里娜却没就此满足，物质欲望反而更加膨胀了。

想要得到一个东西，就会不择手段。梅莎里娜只要利用奥古斯都制定的通奸罪，被定罪的人的家产就会被充公到国库，而她则把原本要充公的财物收入囊中。因此遭殃的哲学家塞内加被流放到了科西嘉岛。她

甚至动用叛国罪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一旦一个人被判了此罪名，那就是死罪一条，抄家也会更彻底。梅莎里娜动用这两条法律，并非是她掌握了确切的证据。为达目的，她如果用通奸罪不能给人定罪，就动用叛国罪置人于死地，简直是无法无天。

在罗马帝国举行的审判中，被告人自己辩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然而，一旦原告是皇帝的话，那么被告人家中的奴隶用人就会人人自危，向他们收集对原告有利的证词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以梅莎里娜的本事，这样的事情她自己一个人是根本做不成的。可是她做到了，这无外乎是那些解放奴隶晋升的秘书官在一旁协助。他们熟知家中克劳狄乌斯与其妻子的强弱关系，自然就会为强势的一方效力。还有，作为一家之主的克劳狄乌斯，他那任由她胡来的做法，更是助长了梅莎里娜的气焰。只要妻子不在耳边烦他怎么都可以的克劳狄乌斯，在妻子递上来的诉状上肯定是看也不看就会签字。梅莎里娜的演员情夫被波比娅（尼禄皇帝的岳母，即下一任皇后波比娅·莎宾娜的母亲）抢走，怒火中烧的她用通奸罪逼得波比娅自杀的事件，就是梅莎里娜滥定他人罪名以满足私欲的最好例子。克劳狄乌斯在逼死波比娅的诉状上签字后几日，在宫中宴请群臣。看到没有偕妻子波比娅同来的西庇阿，克劳狄乌斯甚是纳闷，便向西庇阿询问他妻子的去向。西庇阿只答道：“她已经死了。”便一言不发。克劳狄乌斯这才隐约想起自己几天前好像在写着“波比娅”的诉状上签了自己的名字。类似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可是克劳狄乌斯对家庭的态度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然而，当梅莎里娜的魔掌伸向德高望重的人物时，元老院和一般百姓开始渐渐意识到了这位年轻皇后的险恶用心。克劳狄乌斯在位的第7年，即公元47年发生的阿吉阿提库斯自杀事件就是使大众看清梅莎里娜真面目的事件之一。

事发当年刚好57岁的法雷里乌斯·阿吉阿提库斯，乍一看他的名字

会误以为他是罗马人，实际上他出身于南法显赫的阿洛普洛格斯部落。虽然当时南法早已经成为了罗马的行省，不过罗马允许这些显赫部落继续存在，所以部落的自主权得以保存。罗马授予了这些部落中的上层阶层罗马公民权，恺撒时代甚至授予这个部落元老院议员的席位，所以他们已经逐渐融入了罗马社会。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表彰阿洛普洛格斯部落在东方地区军事上的战绩，所以把阿吉阿提库斯赐予他们，成为了法雷里乌斯的家族名，并沿用了下来。法雷里乌斯分别于公元35年和公元46年两次当选为执政官，换言之，法雷里乌斯爬到了罗马帝国中央政府中最高的位置。

法雷里乌斯虽然是行省公民，但不是第一位当上罗马帝国执政官的人。在法雷里乌斯之前，恺撒提拔的西班牙出身的巴尔布斯，在恺撒遇刺后被选为执政官。不过，法雷里乌斯倒是第一个出身于南法行省的执政官。此外，他也不是罗马退伍军人留在殖民城市的后裔，而是罗马人把南法地区纳入统治之下，罗马人口中蛮夷的后裔。不过，罗马人对法雷里乌斯的崇敬已经超越了种族的鸿沟，是一种单纯的对一位为国家出生入死的人的崇敬。这位蛮夷出身的人其实早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罗马人了。所以当法雷里乌斯买下卢库鲁斯建的别墅，也即前共和时代一位将军的庭院，并装饰一新时，并没有人在这件事上做文章。

但可惜的是，法雷里乌斯买下的这座被称为罗马最美庭院，同时也被时年22岁的梅莎里娜看中了。为了得到这座庭院，她决定用叛国罪诬告法雷里乌斯。告发的理由肯定是她背后的人教给她的。梅莎里娜这样指控道，法雷里乌斯出身于南法，他的很多亲人都在驻守莱茵河防御前线的辅助军团中担任指挥官，法雷里乌斯和他们企图谋反要篡夺克劳狄乌斯的皇位。克劳狄乌斯没有仔细看控告阿吉阿提库斯的诉状就在逮捕令上签字了。法雷里乌斯要求面见克劳狄乌斯澄清事实。法雷里乌斯在见到克劳狄乌斯之后，条理清楚地陈述了自己无罪的事实，而克劳狄乌斯似乎也认同了他无罪的事实，然而，梅莎里娜根本就不是一个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女人。克劳狄乌斯不知道受到了梅莎里娜什么样的摆布，结

果，自认为已经洗脱罪名的法雷里乌斯却接到了皇帝劝他自尽的信函。

时年57岁的法雷里乌斯在招待友人的宴会上，嘲笑自己居然死在女人的阴谋之下后，随即割腕自杀身亡。就这样，那座庭院就成了梅莎里娜的囊中物。

梅莎里娜同样旺盛的性欲也被历史学家们有所提及。

不知道是她这方面的欲望本身就很强，还是因为丈夫夜里忙于政务无暇顾及她才导致她的出轨。历史学家们这样记述道：皇后每晚都会走出皇宫所在的帕拉蒂尼山，到建在山丘附近的大角斗场观众席下面林立的妓院里接客。据说平民聚集的大角斗场下面的妓院里的妓女是全罗马最廉价的，所以客人的素质也是最低的。然而，不管是苏维托尼乌斯、塔西佗还是狄奥·卡西乌斯，写下这些事都是比梅莎里娜晚半世纪以上的历史学家，这种传闻应该只是人们街头巷尾的谈资罢了。

话虽如此，我们也不能断定上述说法与事实不符。克劳狄乌斯每日为政务所困，到吃晚饭的时候都狼吞虎咽，甚至连正式的晚宴上都会昏昏欲睡。所以就算梅莎里娜真的把陌生男人叫到隔壁房间里发生什么，也完全不用担心会被克劳狄乌斯发现。然而，皇宫毕竟不是不透风的墙，不能不避嫌。况且，贵为皇后委身于下贱之人得到的快感应该别有一番滋味吧。梅莎里娜是否有这样的癖好不得而知，也无法求证这些流传到后世的传闻，到底是真的还是只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但梅莎里娜自我控制力极差倒是确有其事。然而强调“自制力强的女人没有女人味”的正是男人。

不管事实如何，“梅莎里娜”在现代意大利语中就是无法节制自己性欲、谁都能够去睡的女人的代名词。所以，要是意大利男人说“你就像是梅莎里娜”时，最好知道他绝对不是在夸你像一位皇后那么漂亮。

拜放纵的年轻皇后所赐，从元老院到平民，他们看克劳狄乌斯的眼

神都与以往不同。只有克劳狄乌斯本人却一点都没觉察到。因为从小开始，比起赞誉与尊敬，他更习惯于受到轻蔑与讨厌的目光。况且身为一国之君的他，此时有堆积如山的工作必须要处理。

人口普查

要统治甚至是治理好一个帝国，克劳狄乌斯心里非常清楚，依靠的是细致的工作，也即依靠不会引人注目的工作一点一滴积累而成的。对于重视推行切实可行的措施的人而言，就必须正确地把握好当下形势。克劳狄乌斯为了更好地了解帝国当下的情况，决定进行人口普查，这次调查距上一次奥古斯都与提比略举行的人口普查已经过去了34年。由于共和制时代进行人口普查的部门是财政部，所以为了进行这项普查，克劳狄乌斯恢复了自从罗马进入元首制后就被废除的财政部。财务部由两名官员组成，任期至少要一年半，由克劳狄乌斯与一直为他鞍前马后效劳的维特里乌斯亲自担任。

据调查显示，可以服兵役的17岁以上的罗马男性公民达到了5984072人之多，而在公元14年人口普查时，这部分人只有4937000人，在短短34年间，就增加了100多万人。行省的人口增长率高于意大利，这可能是因为克劳狄乌斯制定的政策，即罗马统治下的行省出身的人，只要参加罗马军的辅助兵并服役满25年，就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这也表明，成年男性罗马公民组成的“罗马的脊梁”这一群体已经超越了本土的疆界，并逐渐在行省中壮大。

克劳狄乌斯执政期间，除了远征不列颠外，没有进行过其他军事行动，这也是他的伟大之处。其实如果他意图要加强军事能力或是用武力扩张罗马帝国版图的话，以他的能耐完全可以做到，而且从当时莱茵河上的防御部署来看，只要克劳狄乌斯有意出兵，是极有可能达成当年奥古斯都想要称霸埃尔维河以内的整个日耳曼地区的夙愿的。不过不得不

说克劳狄乌斯的过人之处正是在于有能力却不举兵征战。

事件的起因是，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民族中，有几个部落趁低地日耳曼军团司令交接的空隙，侵入莱茵河西岸。起初罗马军一度处于劣势，不过在刚上任不久的科尔布罗的指挥下，成功击退了敌人，并乘胜追击渡过莱茵河深入敌军腹地。

以铁一般的纪律来要求手下士兵的科尔布罗（出生地好像是南法）在军中却很受爱戴，他非凡的军事领导才能也使他在士兵中威望很高。如果让他带领这个军团去征服日耳曼地区的话，多数人都会觉得称霸整个日耳曼地区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科尔布罗带兵渡过莱茵河追击敌军时，皇帝的亲笔信到了。信中说道，要他在给予敌军以沉重打击后，停止东征，带兵撤回莱茵河驻守。在这一片区，克劳狄乌斯自始至终都恪守提比略的方针。

接到通知的科尔布罗只叹了一声“以前的将军们真幸福”，就整顿好部队，退回到了莱茵河畔的驻地。不过，这位一心想要出征的将军，在日后被派到了东部地区负责前线的防御工事，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转变态度，率先履行比起出征更重视防御这一罗马帝国的基本原则。由此看来，在罗马，就连一介武夫也很擅长思维的转变。

克劳狄乌斯虽然没有让科尔布罗继续追击，但为了褒奖这位将军的功劳，他同意为科尔布罗举行代表罗马人最高荣誉的凯旋仪式。

这场凯旋仪式中，还有一位将军也获准参加了，那就是高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库尔蒂乌斯·鲁弗斯，不过这不是表彰他在军事上的功绩。

鲁弗斯明白如果只是坐等敌人攻上前来，就难以保证将士们的士气不被磨灭，于是他不仅动员士兵们去开矿，还动员他们去铺设道路等等。让士兵参加土木工程建设，是罗马历来在和平时期最常见的军队使

用方法。

然而，当时矿山的产矿量很低，开矿劳作还很辛苦。厌烦了的士兵们暗中写了一封信给克劳狄乌斯，希望皇帝能同意让鲁弗斯与科尔布罗一同参加凯旋仪式。因为他们想着鲁弗斯参加完凯旋仪式后，可能就会心无憾事，就此解甲归田。

克劳狄乌斯同意这两位将军同时参加简化的凯旋仪式，不过科尔布罗和鲁弗斯没有沉浸于这一荣誉的喜悦中而就此退休，而是更加干劲十足地回到军营中。回到军营的鲁弗斯想用修建工事来贡献国家，就下令士兵们停止挖矿山，转而去挖连接莱茵河和摩泽尔河的运河。见到这种情景的士兵们脸上是一种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无奈。

杜米提亚·科尔布罗是否是提比略当年提拔的青年将军之一已无从考证，然而库尔蒂乌斯·鲁弗斯确实是那些人才之一。据传鲁弗斯是角斗士出身，被提比略发现提拔后，出任阿非利加行省的财务监察官，之后被召回罗马担任司法官，之后又被派去驻守莱茵河。虽然历史学家塔西佗对他的评价很不好，然而他是一个明确自己的立场、忠诚有实力的人，可以说他是推动罗马帝国前行不可或缺的一个齿轮。

邮政体系

就算一部机器，它的每一个齿轮都品质优良，但也没法保证组合出来的机器效率就会提升，齿轮间良好的磨合度才是高效率的保证。这就好比每天发一班时速500公里的列车，却不如每15分钟发一班时速300公里的列车更能够提升效率。

早在公元前波斯帝国就有了高速公路式的道路，然而把这些道路连成道路网的是罗马人；最初使用邮政的也是波斯皇帝，然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邮政网的还是罗马人。

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设立的国营邮政体系称之为“cursus publicus”，直译的话就是“官用信差”。光从字面上来看，就能知道这是专门为官府传达公文和情报的。要治理庞大的帝国，“官用信差”是不可或缺的。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在共和制时代，书信来往要不就委托私营邮政，要不就差使自家的奴隶去跑一趟。

到了元首制时代，既然罗马帝国创建了官用信差制度，公家的公文和信息就利用官用信差传达，而普通百姓的书信往来就用共和制时代的方法。不过，一开始只是作官府驿道用的罗马式军用道路网，到了后来也准许民间信差使用。

罗马道路每10公里或15公里就会设置一处“mutationes”，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交换所”。交换所之间的间隔因地势而定：山岳地带每10公里设一处，平原地带每15公里设一处。通常交换所里会有备用马匹，有些地方还会有备用信差。平均每隔5个交换所左右，就会设一个名叫“mansions”的“驿站”。在这里，除了像交换所一样换马补给以外，还可以吃饭住宿。另外还有马厩、修马车的人、邮政办事员等等，可谓应有尽有。在现在看来，“mutationes”相当于是现代的高速公路边的加油站，而高级公寓“mansion”的语源“mansiones”，等同于现代配备有汽车旅馆、餐厅与修理厂等的大型服务区，同时还有提供咨询旅途各种必备资料的作用。

一直坚信“民众最关心的是治安，而维持安定就是维持治安”的第二任皇帝提比略，除了扩展驿道网的覆盖面外，还在各个驿站设置警卫处。这样一来，不管是人们出行还是书信的送达都变得更加安全。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推行的改善邮政政策就是对民间开放国营邮政体系，改变其官府专用的状态。

史书中没有记载克劳狄乌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不过，从他一直想要改善被派去参加自己发起的不列颠远征的将士们的生活环境来看，再考虑到不列颠行省当时正在开发，他可能就想至少要改善邮政体

系，使远在水汽腾腾的不列颠而出生地却是在干燥的意大利的士兵们，能方便快捷地和在本土的家人通信。而当时的不列颠比其罗马帝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落后。

不过，受到国营邮政的受众拓宽到平民这一措施的冲击，私营邮局举步维艰，私营邮局再度复苏已经是罗马帝国进入衰退期以后的事了。

克劳狄乌斯是一个着眼于诸如邮政体制改革等能切实改善民众生活环境的举措的皇帝。他另一个惠民举措就是立法限定辩护费不得超过一定的额度。

一个人不管再怎么讨厌罗马人，他也不会否认罗马人是法律体系的创始人。熟知辩护重要性的罗马人，自古就有律师活跃于法庭之上。不过当时普遍认为为当事人辩护是上层社会的责任，所以一直是免费提供的。

不过，光靠个人的责任感是无法维系法律系统的。这种贵族捆绑式的免费服务，会使一些有能力但穷困的律师不再接受人们的委托，这最终还是会损害到罗马共同体的利益。加之即使是再完善的体制也会被钻空子，虽然请律师不用辩护费，然而往往要送礼给律师，或是委任人让律师成为遗产赠与对象之一等等，所以实际上还是有偿的。共和制时代末期，罗马最著名的律师西塞罗是出身于农村的骑士阶级，他正是钻了体制的空子才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罗马共和制时代出了许多非常优秀的律师，这不仅仅是因为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就意味着金钱，还因为成功律师的名声是进军政界的跳板。当时执政官等国家要职是通过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律师辩护的能力直接与拉票能力挂钩。不过由于律师的选票一般是那些请他辩护的人或将来可能委托他的人投的，所以任凭一个律师的辩护能力再高，如果他收的费用高的话，也是得不到选票的。所以自然而然的，那时的辩护费用必须得设置一个限额。

进入元首制时代之后，奥古斯都摄政时执政官以下的国家要职（仅限于文官）是由公民大会选举的，到了提比略时代则把这项选举移回到元老院举行，卡利古拉摄政时又把这项选举交还给公民大会，到了克劳狄乌斯时代，这项选举又转回到元老院，可谓几经波折。

然而，真正的问题不是选举的地点，而是执政官这个职位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吸引力。第一，现如今是元首制，执政官大权旁落；第二，执政官任满后，以前执政官的身份前往行省任总督，然而由于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对利用职务之便敛财的行省总督的处罚十分严厉，只要总督被发现利用职权威胁行省人民，证据确凿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冒死积累的财富也会被悉数充公，所以总督们也不敢在行省敛财了。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也难怪会有人想通过当律师来获取财富了。因为明着说是免费辩护，其实暗地里走后门成风，而且送礼的人送的钱往往是没有上限的。不过这样一来，保障被辩护者的权益就成了痴人说梦。

为了保障公民享有较为平等的辩护权，克劳狄乌斯实施的政策是，认同律师收取辩护费，并设定上限。辩护费的上限是1万塞斯特斯，这相当于一名普通士兵10年的薪水。这个价格绝不便宜，然而要明白的是，辩护费是以这个价格封顶的。而且，正如罗马法律中最重要的一条，保护私有财产所示的一样，罗马人向来尊重个人所有物，包括有形的财物和无形的才华。所以在罗马，较高的收入是优秀的律师应得的。

克劳狄乌斯施行的政策成绩斐然，然而他偶尔还是会暴露出一些继位以前研究历史时的习惯。对历史的爱好使他有点吹毛求疵（拘泥于细节）。公元48年，克劳狄乌斯表示要举办“百年节”（Ludi Saeculares），因为这一年恰逢罗马建国800周年。

大家都很不解距上一次“百年节”不过才64年，还不到100年，怎么又要举办？对此，身兼历史学家的皇帝克劳狄乌斯作了以下解释：

上一次“百年节”，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是在公元前17年共同举办的，但这其实是算错了时间，因为按一个世纪举行一次“百年节”来算的话，今年才是罗穆路斯建立罗马的第800周年，也就是说，公元48年才是举行庆典的正确年份。

罗马是在公元前753年建国的，经他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就只好同意了。不过罗马的第一次“百年节”是在公元前17年举行的，当时奥古斯都还特请诗人贺拉斯撰写了《百年节赞歌》，甚至对举办的地点、流程等细节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从这些来看，我觉得奥古斯都是故意算错举办年份的，对于他而言，罗马到底建国了多少年无关紧要。他结束罗马内战，确立了元首制，到了公元前17年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一派祥和，罗马公民作为唯一的霸权者，站到了肩负罗马和平重任的最前线。看到自己的成就，奥古斯都选择在公元前17年举办庆典的真正目的是想加强罗马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公元前30年，奥古斯都成为罗马唯一的最高权力者，公元前23年，他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把统治大权抓在手里，成了元首的他之后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成立罗马帝国。在公元前17年，罗马帝国成立。所以他选择这一年举行“百年节”，规定“百年节”的细节，并把这些细节刻在大理石碑上，嵌于罗马广场的一角。凡此种种看来，他故意算错建国时间举办庆典的目的就是想要强化罗马人的民族自豪感。

公元48年刚好是罗穆路斯建国800周年。虽然克劳狄乌斯深知奥古斯都的用意，然而学者的学术良知不容许他对这样的学术性错误坐视不理，就算这个“错误”是神君奥古斯都犯的。

身兼大祭司的克劳狄乌斯任命维特里乌斯协助他举办“百年节”，不过公元48年的“百年节”，连细节都照搬奥古斯都的规定。至于“百年节”的实况是怎样的，还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6·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我觉得，通过举办“百年节”让罗马人深刻体会到能称之为罗马帝国领路人的除了克劳狄乌斯别无他人。公元43年，他已经58岁，是在位的第7年。远征不列颠的行动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其他防御也充分体现了帝国防御系统的牢固，不仅如此，他还做到了保障整个帝国和平这一皇帝的首要职责。管理行省，罗马历来的做法是，在行省驻扎罗马军团，让退伍军人建设殖民城市，给予原住民充分的自治权，让他们管理内政，建立地方自治体等等。克劳狄乌斯围绕这一核心措施，在各个城市间铺设罗马式街道，形成城市网。从此罗马对行省的统治从恺撒、奥古斯都的大动脉时代进入无处不在的微血管时代。不过这种实际但不浮夸的政绩，往往是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等热衷于追逐奇谈怪论新闻的知识分子所不关注的部分。

虽然一边是拥有权力、负责统治国家的皇帝，另一边是没有实权然而可以作出自己的评判的普通公民，不过他们同为罗马人。只要是罗马人，自然就会明白加大对基层的建设就是强国之本，克劳狄乌斯的贡献，百姓们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

克劳狄乌斯港

在此，先抛开行省不谈，克劳狄乌斯仅在首都及其附近，就对公共基础设施实施了大规模的建设。

公元38年，即卡利古拉时代开工动土的水利工程，到了克劳狄乌斯时代也还在继续施工。这条水渠全长70公里，其中有10公里必须要修高架水渠，这样浩大的工程，到了克劳狄乌斯手中时离竣工期限只剩4年时间。还有另一条同期开工的水渠如果也竣工的话，给罗马提供生活用水的水渠就会增加到9条，到时候每天可给每位首都居民供应900升的用水。而卫生条件的改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能随时给市民提供新鲜的饮用水。

不管是谁，对自己开创的事业会更加上心，这是人之常情。因此，皇帝克劳狄乌斯对自己下令动工的奥斯提亚港湾工程的重视程度，比对卡利古拉留下来的水渠工程要高。这项外港工程是在克劳狄乌斯继位的第二年上马的。这说明他一继位，就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开始考虑建设这些公益工程。可惜的是，在这项历时12年的工程即将完工之际，他却惨遭杀害，奥斯提亚外港的竣工典礼最后是由继任皇帝尼禄举行的。

不过，当初克劳狄乌斯修建奥斯提亚外港的构想遭到建筑师们的一致反对，就连古代第一位撰写建筑书籍的维杜卢维乌斯也断言，在河口修建港湾实在不是良策，因为港口最终会被河流从上游带来的泥沙淤塞。

然而，克劳狄乌斯是一位钻研历史的人，历史学家的眼睛关注的是人。克劳狄乌斯可能是认为，称得上是世界之都的罗马要修建海港，不是只要地理条件符合就能随便选址的。我想克劳狄乌斯可能就是用这个理由来反驳建筑家们的论调。台伯河是罗马人的灵魂，依着台伯河的流势，罗马人修建了如下文复原图中所示的各种设施。奥斯提亚这座城市刚好坐落在台伯河的入海口，只有在奥斯提亚修建海港，才能使台伯河发挥其河运的作用。所以，克劳狄乌斯认定罗马的外港只能、也必须是台伯河入海口的奥斯提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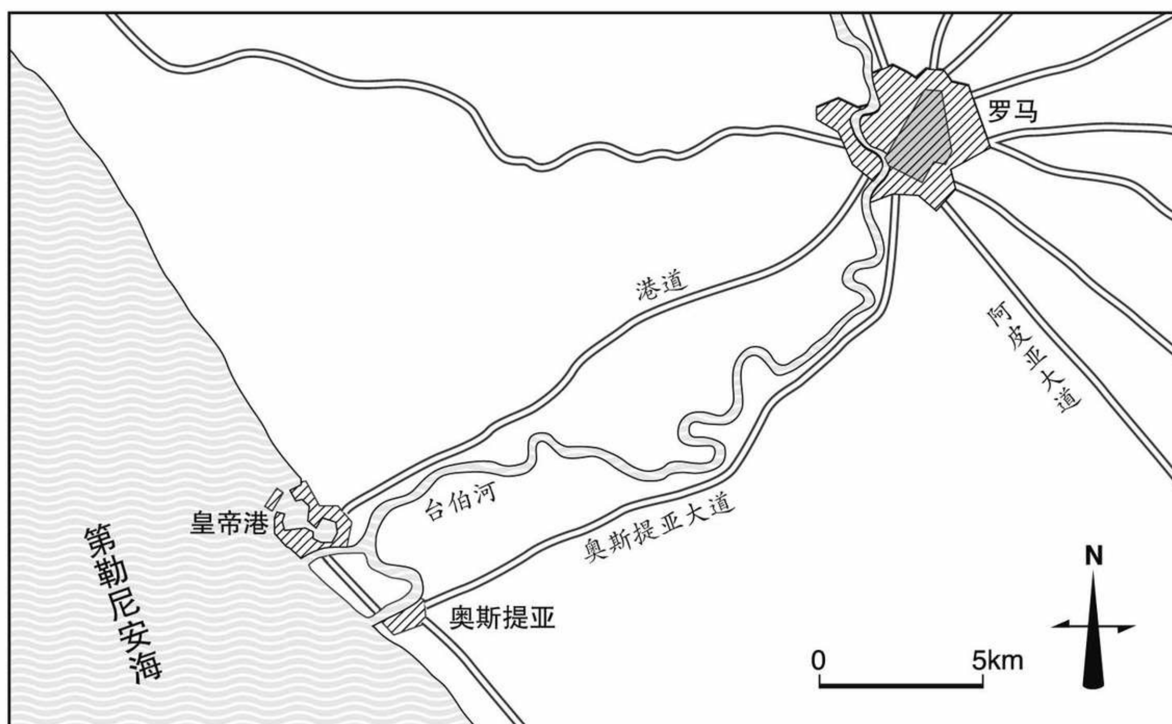
可是，如何避免港口被台伯河河水带来的泥沙淤塞，确实是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不过这也是受克劳狄乌斯之命，把奥斯提亚建设成正规的海港的工程师们该考虑的问题了。

总体而言，工程师们想出来的方案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提案：不在日后必定会被泥沙淤塞的地方选址修建海港。

第二种提案：港口的地址选在奥斯提亚港西北方向30公里处的海岸上，大概是现在的罗马列奥纳多·达·芬奇机场的南边地带。

第三种提案：在港口和台伯河之间修建运河，这样船只就可以不经由奥斯提亚，从运河驶进台伯河，逆流而上抵达罗马。



罗马与奥斯提亚港、新港（皇帝港。图拉真皇帝在进行大规模改建后）的位置略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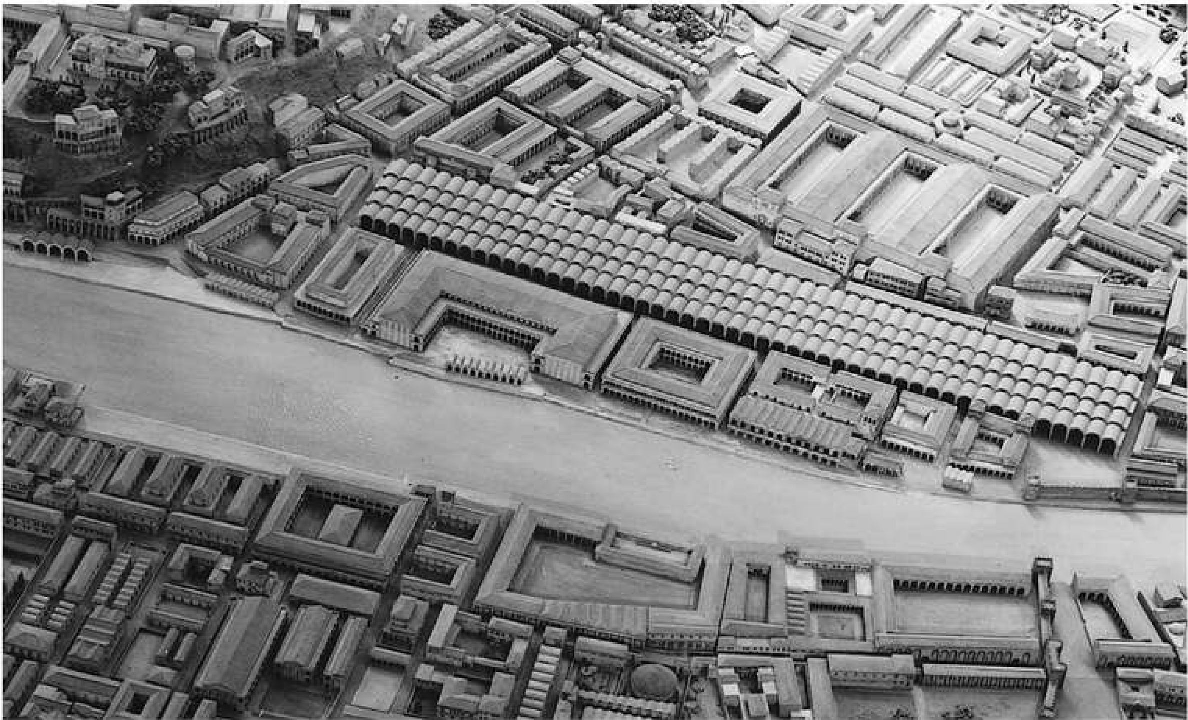
第四种提案：在即将建设的港口和罗马之间铺设道路，这样就可以从港口走陆路直达罗马。即修建“Via Portuensis”（直译为“港道”，现在中文中被称为柏图斯大道。）

第五种提案：在港口除了修建码头、仓库和其他必备设施外，其他诸如交易场所、各个交易公司的办公室，则建在奥斯提亚港内，并在新建港口和奥斯提亚港之间修路，用陆路联通两个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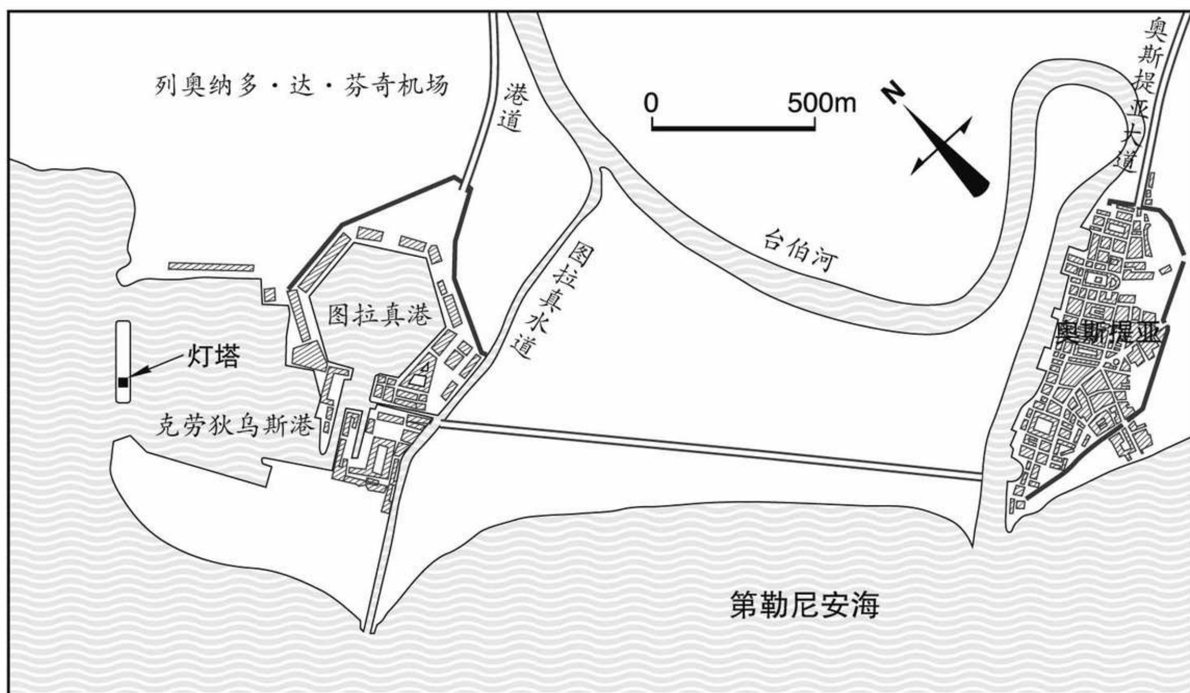
然后从奥斯提亚到罗马，有两种走法。既可以像往常一样走台伯河这条水路，也可以走奥斯提亚大道这条陆路。

虽然我们生活在现代，但我们仍能够从半个世纪后继位的皇帝图拉真作了大改造后的港口景观来观察当时的港口。显而易见，为罗马帝国

各地往来罗马的大量船舶建设一个避风港，应当是克劳狄乌斯当初要建设这个港口的一个目的。而选址在奥斯提亚港则是想保留和罗马一样拥有悠久历史的奥斯提亚港的功能。不过虽然要继续使奥斯提亚发挥海港城的功能，然而由于它坐落在河畔，不适合在此修建避风港，所以克劳狄乌斯才想到要建新港口来补奥斯提亚港的不足。这座以克劳狄乌斯来命名的海港，让我们这些后人不禁感叹罗马人的土木工程是对大自然发出挑战的庞大工程。



台伯河岸港口（复原模型）



奥斯提亚与皇帝港（图拉真皇帝进行大规模改建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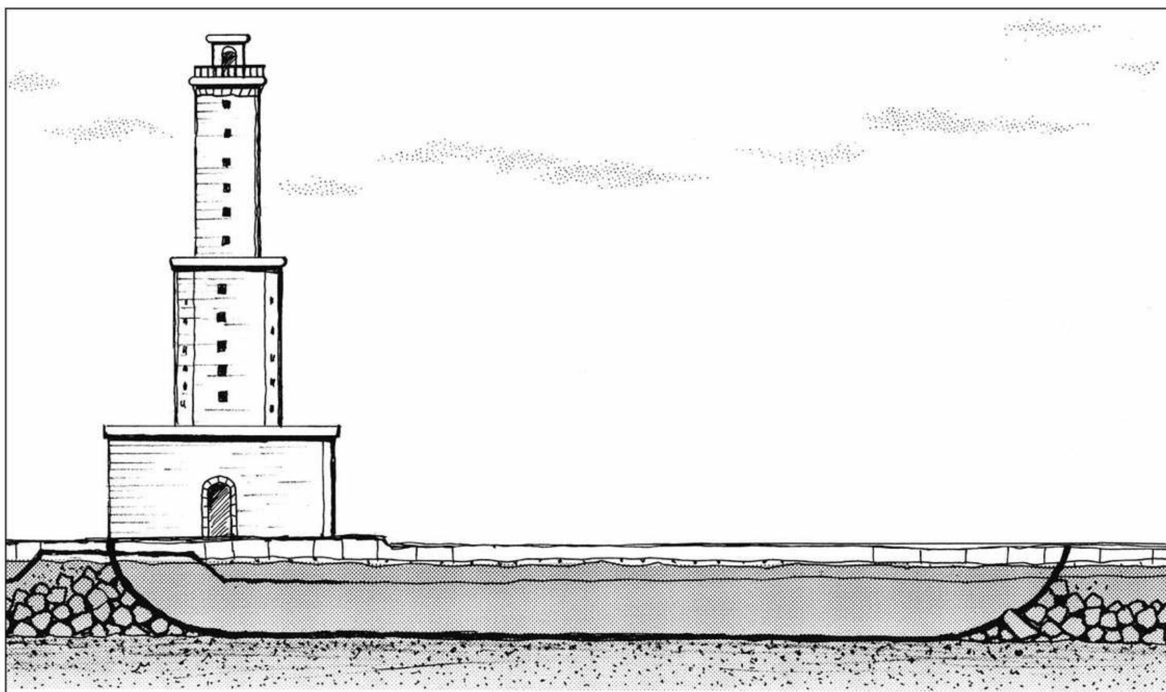
克劳狄乌斯港的动工是从挖地基开始的，虽然在海岸的沼泽沙地上挖地基很容易，然而要让来往于地中海的船舶在此出入或停靠，港口的水深最浅也得5米，这才是问题所在。

从复原图中可以看出，打好地基后，接下来就是建设延伸到海里的堤坝，以及从台伯河右岸开挖最终与新港码头相连的河道。这条河道在50年后被当时的皇帝图拉真改造后，称为“图拉真水道”。这两项工程是同时施工的。

完工后的这个大型船坞总面积达90万平方米，水深在5米以上，码头总长达2500米，伸入海中约1100米。号称可以同时对一字排开的300艘船进行卸货作业。

建防波堤的方法，则是用铁索将不计其数的重达7吨的巨型石灰岩绑起来沉到港口两侧的海中。

除了左右环绕的防波堤外，港口的正对面也修了防波堤，上面矗立着一座灯塔。这样的构造使海港的出入口分别独立，进港口和出港口的宽度都是206米。



摇身一变为防波堤兼灯塔的卡利古拉大船（想象图）

当年，卡利古拉要从埃及运25米长的方尖碑回罗马，然而又不想把这些方尖碑切割后分装上船，为此就特制了一艘大船。据和卡利古拉同一时期的博学家老普林尼的记载，以及现代考古发现，我们基本上可以完全复原这艘船。船身是用冷杉树打造的，光吃水线下面部分的重量就达800吨，中央桅杆要4名船员手牵手才勉强围得过来，船身总长105米，宽20.3米。船一共有6层，满载时的排水量是7400吨，船上需要的水手据说达700到800人之多。正如前文提到，这艘船后来被克劳狄乌斯装上石头沉到海里做地基，而这就是新建海港的中央灯塔防波堤的地基。

这艘船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古罗马人造船技术的集大成之作。只是为了运方尖碑，卡利古拉就不惜破费地命人打造了这艘船，也难怪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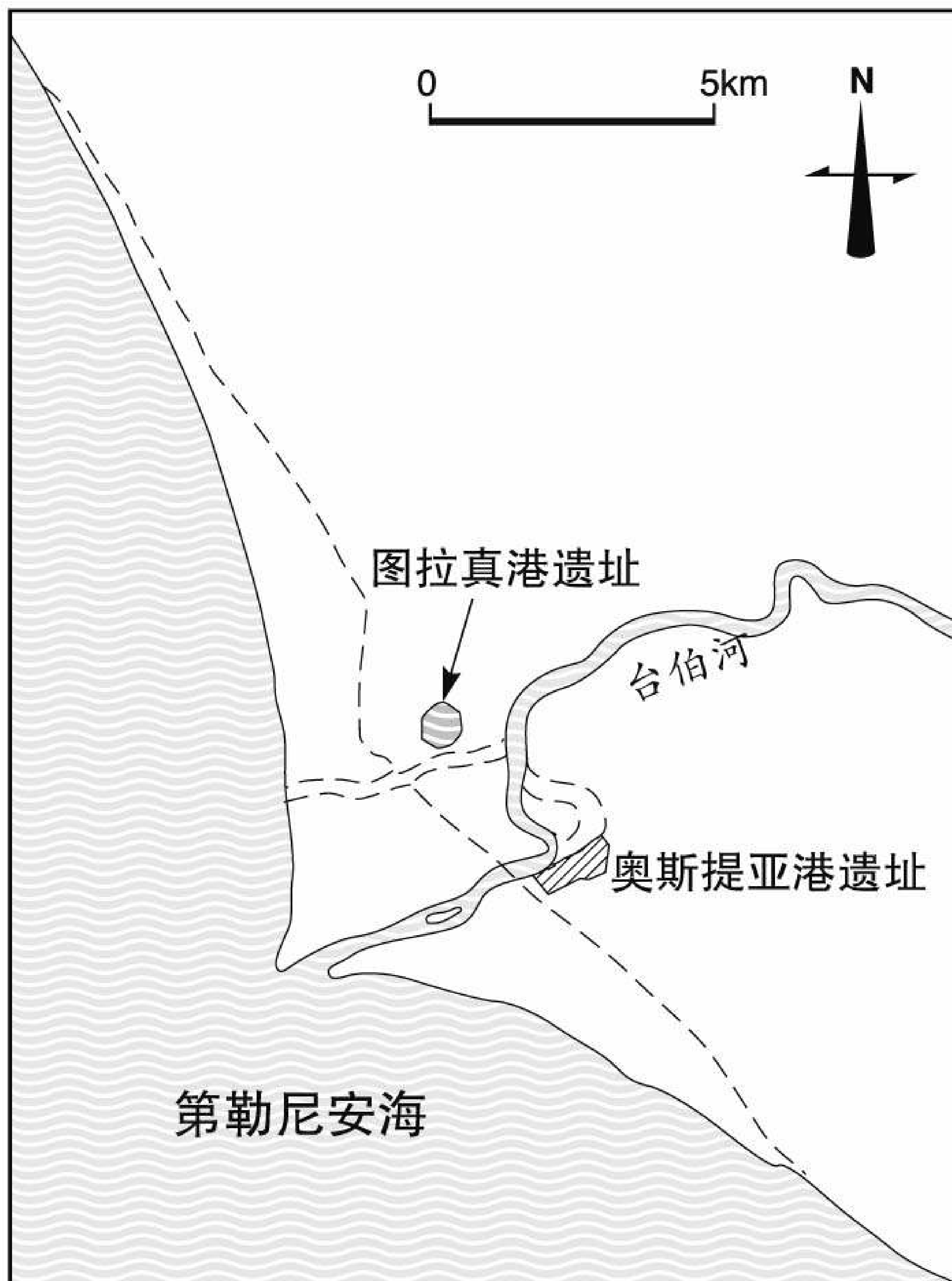
财政会崩溃。继位的克劳狄乌斯觉得这种大型船不实用，就没有使用，不得不说他作了一个明智的决定。这样一来，古代的“泰坦尼克号”就以图中所示姿势，被沉到海底。当然也有船身用的木材耐海水腐蚀的原因。

把桅杆和护板全部拆除后，这艘大船就只是一个可以装东西的“器皿”。在里面装满了石头后，被沉到深达7米的海底，再在其四周沉入巨石，用铁链把船绑在这些石头上固定好。就这样，船只就变成了头顶灯塔的中央防波堤了。

在克劳狄乌斯手里完成的罗马真正的外港，方便了往来的船只。享有税收优惠的小麦运输船，在冬季也能自由地前往罗马。虽然塔西佗等人曾批评罗马粮食依赖进口，然而后来罗马采取的还是粮食依赖进口的原则，并尽力补救由此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罗马坚持粮食依靠进口政策，对于以出口小麦到首都罗马和意大利全国为生的埃及和北非而言，其实就是在对其进行经济上的帮助。

本来是出于某一目的修建的出色工程，势必会带来其他意想不到的好处。由于在台伯河和新港之间修了一条河渠，这就等同于台伯河多了一条支流，这样一来，以前海潮和台伯河上游流下的河水在汇合时经常引起水淹罗马街道的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台伯河入海口距罗马20公里，我曾经一直认为海潮再怎么也不可能逆流20公里，然而看了1966年佛罗伦萨大洪水后，这个观念彻底地转变了。当时，离城市很远的第勒尼安海的海潮逆阿尔诺河而上，在韦奇奥桥附近与因雨暴涨的河水汇合后，水漫到了大街上。可见潮水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克劳狄乌斯之后，罗马极少有发洪水的记录，这估计就是新建的海港发挥的意外作用。

如今的海岸线（虚线代表古代海岸线）



如今的海岸线（虚线代表古代海岸线）

在半世纪以后，皇帝图拉真对海港进行了改造，港埠变成了两个，克劳狄乌斯港和图拉真港，然而人们统称它们为“Portus Augusti”（皇帝港）。不过，流经奥斯提亚的台伯河以及连接皇帝港的支流带来的泥沙，改变了海岸线，现在的海岸线如图所示，皇帝港被泥沙形成的陆地围住，只剩下古时的图拉真港这个呈六角形的海湾还有水。

历经2000多年后，海港成了今天的这种景象。不过我倒不觉得这仅证明了曾经反对在入海口建港口的建筑师维杜卢维乌斯们极具前瞻性，而且还诠释了一个对比，即国家发挥职能的时代与国家没有发挥好职能的时代的差别。

一位曾在军团中负责铺设罗马街道的工程师自夸地说道：“我们铺设的道路100年之内不需改建。”必须搞清楚的是，他的意思是指“百年之内不用改建”，而不是说100年内都用不着保养。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对国家的治理。和平不是说只要当上霸主就可以一直维持，只有平时的用心经营，才能保持。土木工程也一样，竣工之后平时的保养是必不可少的。在罗马帝国还在发挥其国家职能的时代，疏通台伯河河底淤积泥沙的作业从未被忽视过。号称是迦太基港两倍大的、地中海规模最大的皇帝港，在罗马帝国时代发挥了500多年的作用，可是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就变成了陆地中的沼泽。

自取灭亡的梅莎里娜

克劳狄乌斯孜孜不倦地履行皇帝的职责，奈何家门不幸，这使他头疼不已。正在奥斯提亚视察港口建设进度的克劳狄乌斯，收到了一封奉命留在罗马处理政务的秘书官们的来信。

年轻妻子梅莎里娜放荡的作风一如既往，不过如果她偷情的对象是演员或是花花公子，克劳狄乌斯倒也不想追究，这倒不是克劳狄乌斯不

爱他的妻子，而是每天都有堆积如山的政务需要他去处理，分身无术的他根本无暇去管家里的事。妻子梅莎里娜的行径越来越出格。

皇后梅莎里娜这次“外遇”的对象是被称为美男子的西里乌斯，他不仅是元老院的议员，还被选为下一年的执政官。按照罗马的规定，如果不是出身皇族，年龄超过40岁才能当选执政官。这样看来，他绝不是个徒有外表的年轻花花公子，况且他还单身。

时年23岁的梅莎里娜被西里乌斯迷得神魂颠倒。如果这只是单纯的外遇，皇帝最多就把它当做是闲话，听了就过，可是梅莎里娜居然想要和他结婚，而且还付诸了实践。

按照罗马的结婚仪式，得先进行鸟卦再选择结婚日期，结婚当天要在新人面前杀牲祭祀，然后两人签下结婚契约，接下来就是宴请亲友。趁着克劳狄乌斯不在罗马，梅莎里娜举办了一场真正的婚礼，这是不容置疑的重婚。不知道她梅莎里娜脑袋里在盘算什么，难道仅仅是单纯的年轻女孩没头脑吗？然而男方也不是小孩啊。他们两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是不是真如历史学家所说，他们想杀了克劳狄乌斯谋权篡位，如若事实如此，难道他们没有搞错顺序？难道不是应该先杀了克劳狄乌斯再结婚才说得通吗？再说梅莎里娜也有皇位继承权，她也算与奥古斯都有着血缘关系的。

皇帝克劳狄乌斯的秘书官们纳鲁奇索斯、帕拉斯与卡利斯杜斯在得知皇后重婚的事情后，一致认为这次再也不能放任不管了，于是决定先向克劳狄乌斯报告。这封信反复恳请克劳狄乌斯尽早返回罗马处理此事。

虽然奥斯提亚距离罗马仅仅20公里，然而得到消息的克劳狄乌斯没有即刻启程回罗马。要说他是在想对策，还不如说他此刻什么也没有考虑。他还像往常一样每天出现在工地上视察。

皇后梅莎里娜在这期间也得知克劳狄乌斯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始末。到了这时候，她好像才开始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如果她只是通奸的话最多被指控判处流放之刑，然而，对于违反婚约重婚罪的妻子，假使丈夫要行使家长权的话，她只能是死罪一条。

梅莎里娜决定亲自去奥斯提亚，跟克劳狄乌斯坦白。她到这时候，仍然坚信自己见到克劳狄乌斯之后能将他说服。在她心目中，克劳狄乌斯一直以来都是对她言听计从的。然而，当她吩咐奴婢为她准备去奥斯提亚的马车时，却无人听从她的命令，连家中的下人们都不敢理会梅莎里娜。看到这种情形的梅莎里娜便叫来女儿屋大维娅和7岁的儿子不列塔尼库斯，要他们在克劳狄乌斯回家时，替梅莎里娜求情。此外，她还拜托罗马唯一的职业女祭司长替她向克劳狄乌斯求情，饶她一命。梅莎里娜在安排完这些事情之后，就独自躲进了从法雷里乌斯手中夺来的别墅，即连名字都未改的“路克鲁斯庭院”之中。

在秘书官们的催促下，克劳狄乌斯终于起身回到罗马，审问关押在案的西里乌斯。不知审问时克劳狄乌斯是何感受，在此过程中他始终不发一言，全部由秘书官们代为发问。西里乌斯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解。他被判自裁，即刻执行。

克劳狄乌斯很犹豫怎么处置梅莎里娜，不知道用公罪来判决还是当做家务事来解决。加上一双年幼的儿女照母亲梅莎里娜教的话语，乞求父亲能饶母亲一命，女祭司长也劝说克劳狄乌斯，至少要给梅莎里娜一次解释的机会。

克劳狄乌斯终于向身边的纳鲁奇索斯发话道，命那个不幸的女人明天早上过来解释，说罢就起身离开了。

纳鲁奇索斯没有替克劳狄乌斯召见梅莎里娜。这个解放奴隶太了解克劳狄乌斯的心思了，他担心克劳狄乌斯见了梅莎里娜以后，就会把愤怒、受辱的心情抛到九霄云外，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和梅莎里娜重归

于好。回到原来的样子，就表示梅莎里娜又可以为所欲为。

身为内阁秘书长的纳鲁奇索斯，利用职务之便，暗中传唤近卫军的百人队队长，假传克劳狄乌斯的旨意，下令诛杀梅莎里娜。得令的百人队队长便率领着一队卫兵，向“路克鲁斯庭院”直奔过去。

梅莎里娜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当百人队队长把短剑递给她并说这是皇帝的意思时，梅莎里娜握着短剑却始终没有勇气自杀。她痛哭流涕，双手发抖得无法将短剑刺进自己的胸口。见皇后迟迟不动手，没有耐心的百人队队长便夺过剑，结果了她的性命。年仅23岁的梅莎里娜就这样被刺死了。

克劳狄乌斯在得知妻子梅莎里娜的死讯后似乎麻木了，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他都没有表现出悲痛与愤怒的情感。对丧母的一双年幼儿女也没有特别的关爱。被妻子戴了绿帽子的这个60岁的老男人只是埋头于自己的政务，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表示。

秘书官们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拆毁了梅莎里娜的雕像。梅莎里娜的尸体也是在家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被火化的，她的骨灰没有被放进奥古斯都陵里，甚至连被埋何处从那时起就是一个未知的谜。

罗马人在经过这起事件之后，心目中对克劳狄乌斯的评价就是“一个连妻子都不当他是一回事的皇帝”。这对克劳狄乌斯而言，他的公众形象可谓是跌到了谷底。不过，克劳狄乌斯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时间久了自然就会忘了那些不痛快的事。我倒不觉得这是他健忘的缘故，而是在当上皇帝之前，他过了50多年不被人重视的日子，这样的经历没有教给他被人敬重的意义。可是，脑海中完全没有受人敬重这个概念的他，却为百姓做了许多值得敬重的实事。不过，没有这个概念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受得了别人的冷眼。不在乎众人投来的异样眼光的克劳狄乌斯，发表了一次演讲，并按照演讲内容落实各项政策。这篇演讲稿被后世的历史学家们高度评价为“罗马文明留给人类的宝贵教训之一”。

开放国门

这件事的始末源于众人讨论如何补充元老院的议员空缺。奥古斯都对元老院进行改革后，议员席位就固定为600席。然而许多议员由于公职不在罗马，有事要议员全员出席这个想法就变得不可能，况且有了空缺，也不是说需要补充人员就能立马找到人选的。到了公元48年，元老院席位空缺似乎到了一个不得不重视的程度。当时，是否让一个人进入元老院补缺，最后的决定权在皇帝手里。如果克劳狄乌斯有意操纵元老院，安排支持他的人进元老院，巩固元老院中站在他这一边的实力，这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然而，与党羽幕僚绝缘的克劳狄乌斯在50岁时，正是在党羽的背景下继位摄政的，加之自己是历史学家，钻研历史的皇帝关心的不是如何在元老院中培养自己的势力，而是在罗马帝国中，元老院应该扮演怎样一个角色。不过给元老院定位不是他自己想到的，而是有件事提醒了他。

高卢各个酋长们在得知元老院要大量补充议员这一消息之后，马上给元老院递交了请愿书，希望自己也能得到元老院议员的席位。按照罗马帝国的规定，要担任罗马帝国的要职，候选人必须要有元老院的议员席位，所以，他们提出这种要求就表明他们想要参与罗马中央政府事务。

自古以来被称为“纳博讷行省”的南法就是罗马帝国的行省，这里不仅出过元老院议员，也出过执政官，所以这一地区的酋长没有在请愿书上签名。将联名请愿书递交到罗马的是被恺撒征服的高卢中部和北部地区的酋长们，他们就是短发的罗马人口中的蛮夷之地“长发高卢”的权力阶层。

首先，我想大家不会忘记，这些人正是百年前被恺撒打败的人们的

子孙。保留部族，并把罗马公民权赐予部族的统治阶层，这是恺撒对臣服的高卢的处理。再一点，就是高卢人甘愿屈服于罗马人之下，并希望能参与罗马帝国的中央政治，而不是发誓夺回独立权并伺机而动。这就和殖民时代的印度不是向英国政府要求独立，而是希望得到大英帝国的国会席位，进而参与大英帝国的中央政治相似。

面对被统治者的这般要求，身为统治者的罗马元老院又会作何反应呢？

针对这件事元老院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皇帝克劳狄乌斯也列席参加。可以预想，反对的声音十分激烈。

确切地说，在93年前，恺撒行使终身独裁官的权力，给“长发高卢”的部落酋长们元老院的席位时，也遭到了出身于意大利的元老院议员们的强烈反对。甚至连普通百姓也肆无忌惮地讽刺这些酋长，例如嘲笑他们是“拉丁语都说不好的议员”、“连去元老院的路都找不着的议员”，要不就笑他们托加下面居然还穿裤子（高卢人特有的服饰）。当年参与暗杀恺撒计划的人数量众多，可是暗杀计划并没有被泄露出去，这是因为即使元老院的议员没有打算加入布鲁图等人组成的刺杀小组，然而知道谋杀皇帝这一消息的议员也对此三缄其口，选择不对外声张。这估计就是议员对恺撒同意行省的酋长参与元老院这件事的报复。

恺撒的前车之鉴，让把不被行刺这件事当做头等大事的奥古斯都，取消了允许“长发高卢”的酋长们参加元老院的政策。后来的提比略和卡利古拉也沿用了这种做法。到了克劳狄乌斯时代，元老院的议员们“排外”的立场也丝毫没有动摇。这次就这个问题在元老院会场里开展的讨论中，持反对意见的人的理由如下：

“首都罗马和意大利本土还没缺人才到找不到元老院议员的合适人选。”

“以前的元老院议员的席位虽说只有300席，然而光靠罗马居民组成一个元老院都绰绰有余了，而且当时的元老院还管理着意大利本土的其他部落。现在的罗马更是不缺有能力有荣誉感的统治人才。”

“虽然神君奥古斯都赋予居住在北意大利的高卢人进入元老院的权力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难道还不够吗？现在居然让原则上只是俘虏的行省人民也能出入元老院，这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情。”

“一旦让行省人民进入元老院，现在已为数不多的昔日名门势必会遭到排挤，这让这些名门的脸面往哪里搁？”

“现在要求赐予元老院席位的人的祖先，曾消灭了我们罗马的一个军团，还在阿莱夏包围了神君恺撒。这些还都是不久前的事情，如果再往前推的话，曾经攻打罗马、将我们的祖先逼上卡匹托尔山的高卢人，和这些人正是一个民族的，难道我们要忘记这段历史吗？”

“高卢被我们征服后，我们已经把罗马公民权给予了高卢地区的原统治阶层，实在没有必要再给他们元老院的席位和治理国家的职位了。”

在一片反对声中，克劳狄乌斯开始了发言，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当时所作的演说内容，可以从1480年后的1528年，在法国里昂挖掘出来的石碑上的碑文得知。在此我为大家翻译历史学家塔西佗的《编年史》中的一些记载，虽然塔西佗说过自己写这本书时很多东西参考了《元老院纪事》（Acta Senatus）。因为当时塔西佗是写给罗马人看的，所以生在2000多年以后、非罗马人的我们在阅读时需要求助于注释。不过我写的不是研究性论著，所以在此就直接把注释放在了正文中，还请大家谅解。

在此，我不禁想起我的先祖，我最早的祖宗出身于萨宾人克劳苏斯。公元前500年，他移居到罗马，罗马人不仅把出身外族的他与

他的家人当做是同样的罗马公民，还让他当上了元老院的议员，使他成为了贵族。祖先们的做法，就算到了这个时代，也可以成为我们统治国家的方针。一个人，不管他出生何地，不管他的族人是否曾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只要他优秀，我们都应该把他吸收到中央来，施展他的才能。

大家都知道，第三任国王图鲁斯·霍斯提利乌斯（公元前673—前641年在位）征服了阿尔巴隆加地区之后，尤里乌斯家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移居过来的。而克伦卡尼斯家族则是从败给第一任国王罗穆路斯的卡梅里欧地区移居过来的；还有出了大小加图的波尔吉斯家族的祖籍则是图斯库洛城，那里是伊特鲁里亚的发祥地，直到公元前380年，那里的人民才拥有了罗马公民权。

在此，我就不再一一说明了，因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地区到意大利南部的卢坎尼亚地区，不对，确切地说应该是罗马全国的人，不管他们曾经是否是罗马的手下败将，只要是他足够能干，就把他们召集到罗马来，加入元老院，这就是我们引以为豪的过去。后来我们的神君奥古斯都给这种趋势指明了更明确的方向。公元前49年，他把原本只是到卢比孔河的国境线推进到阿尔卑斯山脉，又将只是行省的意大利北部纳入本土的版图。原本罗马公民权只是针对个人的，然而如此这般，包括居民、土地，整个北意大利都是罗马的了。

此后，随着帝国国内的和平日益稳定，对外领土的扩张，这种趋势越发强劲。行省出身的优秀人才竞相加入协助罗马主力军团作战的辅助军团，正是这些新鲜血液的加入，使得已显疲态的罗马帝国再次恢复了她的生命力。

我们罗马人父辈，是否在为恺撒提拔了西班牙出身的巴尔布斯而后悔？是否在为给予臣服于恺撒之下的南法行省居民中的贤能以和罗马人同样的待遇而后悔不已过呢？他们的后裔也与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他们对罗马的爱，丝毫不比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罗马人差。

在战场上斯巴达人与雅典人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国家的兴盛却

只是昙花一现，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没有想要接纳以前的敌人，使他们融入本土百姓的生活中，老是把他们当做外来人。

然而，我们罗马帝国的奠基者罗穆路斯，明智地选择了和希腊人不同的对策，在战败宿敌后，并没有排斥他们，把他们融入罗马人的队伍之中。我国的历史上，也出过其他国家出身的领导者。七位国王中，第二任努马王出身于萨宾人，第五、六、七任国王则是出身于伊特鲁里亚人。早在公元前310年，财务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就任用解放奴隶的孩子承担我家的重任。这些例子说明，给解放奴隶的下一代开放出仕之门，并非我们所想的那样是最近才有的事，而是在很久之前就有过了。

当然，诸君的反对也不无道理。作为高卢民族的一个分支，歇诺内斯人在公元前390年攻陷罗马，曾有一段时间占领了我国大部分领土。然而像乌尔斯奇人和耶奎人这些历来就被视为是罗马人的民族，谁又能断言他们以前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祖先被高卢人俘虏过，也有过不得不送人质到伊特鲁里亚人地盘去的屈辱。公元前321年，萨莫奈人打败了罗马的两个军团，他们命令已经解除武装的罗马士兵在长枪中间穿过。这就是现在的连孩童都耳熟能详的“考地乌姆之耻”。正是这样一个让我们饱受屈辱的民族，早在很久以前就与我们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成了跟我们一样的罗马公民。

对比罗马与其他民族发生过的战争，每次与高卢民族之间的战争都能短期内一决高下，并且战争之后，高卢人与罗马人都是本着诚信的原则和平共处的。然而，到了现在，“长发高卢”的人民由于教育、和罗马人通婚的原因，在生活习惯方面已逐渐被融合。所以，我觉得，把他们拥有的资源带到罗马和意大利来才是明智之举，而不是和他们划清界限。

议员诸君，现在我们深信不疑的惯例，其实在当时也是突破性的尝试。曾经，国家的重要职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被贵族把持着，后来罗马市民也可以在政府里担任职位，接着担任官职的人选扩展到了住在罗马之外的拉丁人，再后来是住在意大利半岛的百姓，就这样官职的大门越来越对人开放。

> 议员诸君，现在我们对要求我们表明态度的高卢人开放门户，在将来这势必也会成为罗马的传统之一。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引用了许多先人们的例子，而在将来，这件事也将会成为供后人引用的先例。

这是一次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的精彩讲话，是高尚宽容精神的展现，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盛赞它为“罗马文明留给人类的宝贵教训之一”，这个盛名克劳狄乌斯当之无愧。当然，罗马人让人钦佩的地方就是，不会让闪光的理想销声匿迹。

在皇帝克劳狄乌斯发表了这篇演讲后，这次讨论以赞成票占多数通过了高卢人出任元老院议员的请求。然而，这并不是承认所有的“长发高卢”的酋长都有资格担任。议员中的反对者同意让步，但他们的附加条件是要稍微修改一下这个提案，即行省的各民族要分阶段地获得进入元老院的资格。最先获得这个资格的只有埃杜伊民族，它是高卢东北部地区最强大的民族，自古就和罗马交好。然而在阿莱夏防卫战的时候，它投奔了韦桑热托里克斯，一同与恺撒为敌。可是取得胜利的恺撒不仅原谅了他们的背信弃义，还让他们继续保持高卢地区的强势地位。现在，就连这样的埃杜伊人都获准进入元老院了，其他的高卢人，获得加入资格肯定也是迟早的事。既然高卢人获准了参与中央政治资格，那么西班牙人、希腊人、北非人、埃及人甚至是东方人享受这种“福利待遇”也指日可待，虽然可能会花上一段时间。

恺撒的治国理念被克劳狄乌斯继承和发扬，并身体力行地把这个理念从意大利半岛推广到整个罗马帝国。

话说回来，我们日本人在批判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排外主义之前，是否应该先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给予了朝鲜人帝国会议的席位了吗？我们同意让他们参与到我们的政府中了吗？

然而，向高卢人大开进入罗马帝国的中央政权之门，其实顶多就是让那些一心死守既得利益、满口闭关锁国言论的本土出身的元老院议员反思，让行省出身的开放论者感动而已。罗马人的精明之处在于，在一面实行开放国门政策的同时，一面制定停止政策实施的法案，以备不时之需。

奥古斯都一直秉持恺撒的开放国门的理念，并身体力行地遵循恺撒的大部分政策。不过他始终没有忘记为这些政策的实施安上一个“刹车”来制衡。所谓的“刹车”就是分别在公元前2年和公元4年制定法规限制奴隶解放，这部法律即使到了克劳狄乌斯时代仍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奴隶解放限制法

如果我们站在现代的角度，抱着奴隶制度违反人权应该废止的观点去讨论古罗马的奴隶制度的话，那么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其实在罗马帝国崩塌、进入基督教世界之后，奴隶制度也没有被完全废止。因为教会认为，没有领悟到基督教才是真正的信仰的人，和基督教徒是不能处于相同地位的。所以在教会的默许下，还存在着非基督教徒的奴隶。奴隶制度得到全面废止，是倡导尊重人权、以人为本的启蒙主义之后的事，所以在18世纪末各个国家都集中发表了废除奴隶制度的声明。在古代，连哲人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都从未质疑过奴隶社会。古代人对奴隶的看法，倒不是觉得他们和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同，不应该和自己享有相同的权利。他们是因为“不幸运”才沦为奴隶的。他们要么因为战败、被海盗俘虏或是无力偿还欠下的债务被剥夺自由，而沦为奴隶；要么就是一出生就是奴隶的后代，或是被父母卖了当奴隶。所以，不管是主人恩典还是偿还了债务，大家都广泛认同奴隶翻身做人。那些被海盗劫持或是在战场上被俘虏的人，他们的境遇都是一样的，只要交了赎金，就都能恢复自由之身。普通人与奴隶的区别，不在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而

在于有没有碰上这等“不幸运”的遭遇罢了。

比起用界限把蛮夷和希腊人严格划分开来的希腊人，选择跳出城市国家的桎梏、转变为领土国家的罗马人更有远见。在雅典和斯巴达，没有解放奴隶这个阶层的存在，然而在罗马这个阶层确实产生了，并生存了下来。罗马人甚至还把罗马公民权赋予了这个阶层中杰出的人才。

罗马人家庭对奴隶的依赖到了没有奴隶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地步。在此，以国家领导阶层的元老院议员的家庭举例：每日清晨为主人刮胡子的，是奴隶；做饭服侍的，是奴隶；负责教育儿女的家庭教师，大多数是奴隶；管家的，是奴隶而不是女主人；就算是在战场上，准备武器装备的，也还是奴隶；被元老院议员假借名义去做不能曝光的生意，甚至还要代主人打理生意的，是奴隶；还有，把主人口述的话写成书信的，是奴隶；在普通百姓还不能使用国营邮政的时候，远赴东方为主人送信，再把回信带回来的，是奴隶；远赴海外替主人管理资产的，也还是奴隶，等等。

虽然奴隶们支撑起了整个社会，然而他们很少起来反叛。这是因为，比起出身决定身份地位的自由阶层来，他们是生活在凭本事说话、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如果一个奴隶有良好的教养，或是有语言天赋、表演才能、经商头脑，再或者有某方面的特殊才能，他就会被竞相争要。而这种奴隶也是离解放奴隶最近的一个群体。哪怕一个奴隶没有什么出众的才能，但与之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就会产生感情。所以在古罗马时代，解放奴隶的事情很常见。其实在奥古斯都制定解放奴隶的法规之前，官府也一直没有干涉奴隶主的这种做法。在这种形势下，与其冒险去采取会引起动乱的举动，还不如顺应形势实行奴隶解放。

针对奥古斯都制定的奴隶解放限制法，许多现代学者把这部法律归咎于奥古斯都的保守，然而，我倒认为这恰是证明奥古斯都善于从现实出发的一个例子。

把不是罗马公民的人罗马化，即异族同化，这是罗马人的做法，正如恺撒在《高卢战记》中记载的一样，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提拔他们当中的优秀人才；其二对因服役等方式对保护罗马帝国安全作出了贡献的人进行褒奖。然而如果一直放任奴隶解放形势不管的话，就等于对解放奴隶大开取得罗马公民权的方便之门，这势必会导致素质较低的奴隶也能成为罗马公民，从而产生不良的后果。到时候，不仅罗马公民的整体素质水平会被拉低，还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

现代国家对非法移民大量增加的现象极为敏感，奥古斯都也一样，他必须要处理好这个问题。研究者在记载这段历史时用的标题是“奴隶与罗马公民”，这是因为在罗马，将奴隶解放就意味着让他们加入罗马公民的行列。

公元前2年，奥古斯都立法通过了《夫里斯——卡米勒斯法》。这部法律是用两位提案者的名字命名的，他们是当时的执政官。然而事实上，这部法律的真正拟定者是奥古斯都，这么做是因为如果所有的法案都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恐有独裁之嫌。就连恺撒也采用此法来避嫌。而一直用“第一公民”代替“皇帝”来称呼自己的奥古斯都与提比略都深谙其道。

概括而言，《夫里斯——卡米勒斯法》是一部限制遗嘱解放奴隶的法律，5年后通过的、同样是用两位时任执政官的名字命名的《艾里——森第亚法》，主要针对主人在世时，限制他们随意解放奴隶。

《夫里斯——卡米勒斯法》不限制家中的奴隶在3人以内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是主人愿意，可以全数解放他们。《夫里斯——卡米勒斯法》主要针对奴隶较多的家庭。家中奴隶在4人到100人之间，只有遗嘱中特意提到了，才可以解放最多半数的奴隶。家中奴隶超过100人但不超过500人，可以解放五分之一的奴隶。总而言之，任何个人遗嘱里要解放的奴隶数不得超过100人。

《艾里——森第亚法》对《夫里斯——卡米勒斯法》中主人在世时的情况进行了移植，并对一些限制作了详细的补充。

在这部法律中规定，不允许曾被国家或主人问罪，也就是有前科的奴隶拥有与其他解放奴隶同等的权力，就算是他们获得了自由也不例外。此外，他们财产也要被充公，居住地必须得搬到离罗马100罗马里（约合150公里）之外。然而如果他们放弃罗马公民权，那么居住地限制就可以解除，也可以享有财产私有权。当然，出台这样的法律就是要阻止有前科的奴隶成为罗马公民。

这部法律还规定了，20岁之下的主人判断力不充分，所以不承认其解放奴隶的效力。20岁之上的主人，打算解放奴隶的年龄超过30岁，与原来的做法相同，只要在律政人员面前宣读释放宣言，才能确认其效力。然而解放的奴隶人数必须要控制在这两部法律规定的人数之内。若主人20岁之上，而解放奴隶的年龄没到30岁的话，就得由专门的审议委员会对此进行认真审议才能决定是否有效。该审议委员会由10位委员组成。首都罗马的审议委员会，其成员为5名元老院的议员与5名“骑士阶级”的骑士组成。在地方审议委员会，必须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才能出任委员。不过即使是审议委员会同意这名奴隶解放，若这名解放奴隶未满30岁，虽然认可他本人的财产私有权，然而不认可其子女继承解放奴隶财产之权利。此外，拥有3万塞斯特斯的私有财产，是解放奴隶获得罗马公民权的重要条件。阻拦解放奴隶的后代成为罗马公民，正是以上重重限制设定的真正目的。

只有血缘相通的同类，才会被希腊人认可为拥有公民权。而罗马人定义的公民权，则代表的是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因此，解放奴隶对罗马人而言，是在遵守“志同道合”这一罗马传统的前提下，只要能够达到防止品质恶劣的人混入造成罗马精神被拉低的目的，那就够了。所以，在管制奴隶解放时，不是“禁止”而是“限制”。不过，不得不加以限制原因，是解放奴隶的数量已经很庞大了。然而在限制奴隶解放之后，仍旧

有50人、100人规模的奴隶获得自由。为此，解放奴隶这一社会群体也就自然地产生并存在着。

提比略完全秉承了奥古斯都的这种对待解放奴隶的态度，不过，提比略也有不同于奥古斯都的地方，他拥有将军的特质。得益于丰富的前线指挥经验，他很擅长辨别一个将军是否有才能。他在法国南部，甚至是在“长发高卢”提拔了许多指挥官级别的人才。在奥古斯都时代，这些被提拔的行省人，最多能当到辅助军团的队长。可是提比略提拔的人才可以官至罗马主力军团的指挥官。罗马帝国的国门开放方针就是国门一直为优秀的异族分子打开着。

元老院门户开放政策，可谓是罗马帝国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国门开放路线的延伸。正如克劳狄乌斯所言，其并未在理想主义的驱使下进行改革，而仅仅是在遵循罗马人的传统。生在罗马霸权时代的希腊人、《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曾这样写道：“罗马人之所以强大，在于他们会把自己的手下败将同化这一统治模式。”普鲁塔克的故国是希腊，就算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仍然活着的时期，又或是大政治家伯里克利最为活跃的时期，虽然希腊存在奴隶阶层，然而根本没有解放奴隶这一概念。

被称为元首制时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塔西佗，他执笔时期刚好正值“五贤帝”当政前期。不过克劳狄乌斯和在其之前在位的三位皇帝都在塔西佗讨厌对象之列，原因会在后面提到，在这里就不费笔墨了。不过既然是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他自然会尽可能客观地记录事实。只是因为塔西佗讨厌这些执政者，所以他在记录他们的政绩时，好政绩和坏政绩的介绍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政绩是“好”，塔西佗在记录完摄政者的演讲或政策后，不会在结尾批注自己的评论。他这是在说，虽然自己不喜欢这个人，然而他的政绩是值得肯定的。相反，如果政绩是“不好”，在记录之前，他就会对这个人和他做的事毫不留情地口诛笔伐。

克劳狄乌斯再次确定了行省人民可以加入元老院的演讲，就被塔西佗划入第一类。

然而，接下来要讲到的事情，在塔西佗的记录方式中就只能被划入后一类了，也就是说，是被塔西佗定位为“不好”的事情。因为这位历史家在文章的一开头就说到“克劳狄乌斯是一个根本不能自己生活、习惯被老婆管教的男人”。的确，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小阿格里皮娜的野心

克劳狄乌斯在梅莎里娜死后又恢复孤单一人的状态，这时的他也已经进入花甲之年了。克劳狄乌斯有过3次婚姻，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大女儿安东尼娅已经出嫁了，下面还有小女儿屋大维娅与小儿子不列塔尼库斯。如若一个人不能生活，那么找个情人应该就足够了，而克劳狄乌斯曝光的情人就有两个。原因在于，克劳狄乌斯根本不会像提比略那样，担心自己再婚会导致皇位继承问题复杂化而保持单身。他平日里总是嫌人啰嗦，希望别人不要来打扰他，可是当没有了名正言顺的妻子，他的心里就老觉得少了些什么。与其说他是习惯了被妻子管着而选择再婚的，倒不如说他不习惯孤独。在我看来，克劳狄乌斯还是那种最后会被再婚妻子左右的人。

如果克劳狄乌斯真要再婚的话，他还得亲自去寻找。虽然，克劳狄乌斯并非女人喜欢的类型，他却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做着皇后梦，向皇帝自荐或是由人推荐的女人也为数不少。此外，以嫁给克劳狄乌斯的梅莎里娜为例，只要不犯下重婚这种原则性的错误，就可以为所欲为，对于任何女人而言都是再美妙不过的了。克劳狄乌斯却做不到自己去选择自己的皇后。他是一个从未被女人的目光追逐的男人，一旦有了可以自己选择的权力时，不可名状的恐惧反而占据了心头。所以，秘书官们成为克劳狄乌斯选择皇后的任务执行人。

解放奴隶三人帮组成的秘书官，在反反复复算计了自己的利益得失之后，最终决定，每人各推荐一名人选。把共计三人的皇后候选人送到

了皇帝面前。

纳鲁奇索斯选出的皇后候选人是克劳狄乌斯的第二任妻子耶利娅·佩蒂娜，只是在生下他们的女儿安东尼娅之后，最终两人劳燕分飞。

卡里斯杜斯选出的皇后候选人是罗利娅·包丽娜，她是皇帝卡利古拉的第三位妻子，与卡利古拉结合不久就离婚了，他们也没有子嗣。

帕拉斯选出的皇后候选人是尤利娅·阿格里皮娜。为了区分与她同名的母亲，历史学家通常把他的母亲称为大阿格里皮娜，把她称为小阿格里皮娜。她是日耳曼尼库斯之女、卡利古拉之妹。然而她是一个寡妇，她的前夫诺巴布早已去世。

这三位皇后候选人都在30岁左右，都出身于上流社会，无论是家庭背景还是外貌都不相上下。可是就算只是从三位候选人中选一个人出来当妻子，克劳狄乌斯也感到十分为难。于是克劳狄乌斯命令三名秘书官说说为什么会推荐各自的人选。

纳鲁奇索斯推荐佩蒂娜的原因如下：佩蒂娜是克劳狄乌斯的前妻，重新做回妻子的话也不会给家庭带来巨大影响，再者她与克劳狄乌斯之间有一个女儿，所以她会好好照顾梅莎里娜留下来的两个孩子，做一个称职的母亲。

卡里斯杜斯推荐包丽娜的理由是：包丽娜本身没有子嗣，所以她会全心全意地养育两个孩子。当初她和卡利古拉离婚，是因为丈夫移情别恋，然而她是品行端正的人。此外，包丽娜被称之为罗马第一美女。如若克劳狄乌斯与前妻佩蒂娜重归于好的话，恐怕得意忘形的她会搅得家里鸡犬不宁。

帕拉斯推荐小阿格里皮娜的理由听似十分充分：

首先，小阿格里皮娜是日耳曼尼库斯之女，而日耳曼尼库斯至今仍

然保持较高的名望，娶她为妻，就能让尤里乌斯与克劳狄乌斯两大家族的关系更加密切。其次，包丽娜膝下无子，估计是因为她不能生育，如果娶了她，恐怕皇帝也不能再得子嗣，可是已生有一子的小阿格里皮娜就没有这种缺陷。帕拉斯如此这般地一点破，恰如其分地点中了克劳狄乌斯这个男人心中的真实想法。

好笑的是，到了这份上，克劳狄乌斯还是无法下决断。发展到这种局面，皇后候选人自身的积极性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皇家出身的小阿格里皮娜有一个优势，即她可以自由出入皇宫，可是她想要嫁的人和她是叔侄关系，这层关系对她而言可不是什么好事。

历史车轮前进到这时，罗马帝国终于出现了一位不满足于仅仅做权力者妻子、想要自己掌管天下的女人。时年34岁的小阿格里皮娜与她的母亲大阿格里皮娜一样，都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个体内流着与奥古斯都相同血液的人。她一直坚信自己统治罗马帝国也是名正言顺的。只要能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她根本不在乎采取怎样的手段，而且她还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位自己写回忆录的女人，她比她的母亲大阿格里皮娜头脑更加聪明。

小阿格里皮娜曾是皇帝卡利古拉之妹，然而她不满足于此。她的盘算是先当上皇后，等克劳狄乌斯驾崩之后再成为皇太后，进而统治整个罗马帝国。当然，她也没想过为克劳狄乌斯生儿育女，在小阿格里皮娜心目中，皇位继承人早就有人选了，小阿格里皮娜12岁的儿子正是她以后摄政的傀儡皇帝人选。为了实现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就算是嫁给叔叔，她也根本不在乎。

小阿格里皮娜不断出招终于征服了克劳狄乌斯。可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叔侄结为连理的设想，这总得要给大家一个说法才行。这时，一直在旁辅佐克劳狄乌斯的维特里乌斯自告奋勇，说要为两位新人分忧。于是一场喜剧就在元老院议员和市民面前上演了。

维特里乌斯与克劳狄乌斯一同担任执政官，也是克劳狄乌斯在财务部门的下属，此前与克劳狄乌斯一起负责了人口普查，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在元老院议员面前这样讲道：

> 议员诸君，吾皇克劳狄乌斯肩负着统治整个帝国的重任，日常生活之苦累，为常人之难以设想。如此劳累之重任，唯有人替吾皇分忧家中大小琐事，才能使得吾皇从家中琐事里抽身出来，全神贯注于国家的治理事务之中。而能替他分担家庭事务的，除了一位任劳任怨的皇后，还能有谁呢？能够理解埋头于国家大事的皇帝，除了一位同甘共苦的皇后，还能有谁呢？吾皇自幼就遵纪守法，继位后又心无旁骛地专心政事，如此伟大的皇帝，难道不应当需要一位耐心听他诉说辛苦的皇后吗？难道就不需要一位养育年幼儿女的皇后吗？

听了这番慷慨陈词之后，元老院的议员一致点头应允。维特里乌斯的声音逐渐提高：

> 议员诸君，小阿格里皮娜身上流着的血有多么之尊贵，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确实，和胞兄之女结为连理，这并无先例。可是，以前我国法律禁止表亲结婚，然而现在表亲结婚不是已经变得很常见了吗？

话虽如此，不过议员们还是觉得不妥，这可是叔叔与侄女之间的婚姻，加之两个当事人的身份门第，这件事的性质可就不是两情相悦的人结个婚这么简单了。不过，应对这个情况的场景剧早就已经被编排好了。这时，一位议员突然走到会场外，一群被打点过了的普通百姓就已经在外面等候着了。这些百姓们异口同声地要求制定法律准许克劳狄乌斯与小阿格里皮娜叔侄两人结婚，随即这位议员开口高声呼吁要求元老院赶快出台法律同意。会议场外百姓的呼吁，即刻消除了场上议员们对

这件事的顾虑。

然后轮到维特里乌斯进行最后的表演，他转头面向克劳狄乌斯，这样问道：

“若是元老院和公民要求您与小阿格里皮娜结为连理，您会接受吗？”

克劳狄乌斯答道：

“我只是一位罗马公民，作为罗马帝国的主人元老院与罗马全体公民，他们提出的任何要求，我都不能拒绝。”

至此这场喜剧圆满结束。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喜剧与悲剧总是会在古雅典与古罗马同一天不断上演。或许对于当时的人而言，人生并非由单一的喜剧或悲剧主导，悲剧与喜剧交错进行才是我们人生的真谛，而皇帝克劳狄乌斯的人生就正好诠释了古人的这一想法。

在摇身一变成为皇后之后，小阿格里皮娜可谓是百分之一百二地在利用克劳狄乌斯的弱点，克劳狄乌斯为了避免皇后在身边烦他，所以看也不看就会在皇后递来的文件上签字。

首先，小阿格里皮娜将自己升到“奥古斯塔”（Augusta）的地位。而“奥古斯都”（Augustus）是先皇的称谓，正如“恺撒”（Caesar）也是皇帝的称谓一样。它被先皇奥古斯都冠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奥古斯塔”在拉丁语中是“奥古斯都”的女性称谓形式。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在他的遗嘱中把“奥古斯塔”这个称号赐给了皇后莉薇娅。可是小阿格里皮娜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这个称号。

接下来，小阿格里皮娜用自己的名字给城市命名，这不仅是罗马史上，甚至在世界古代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疯狂做法。

由于古代文明的核心是城市文明，所以建设作为国家执政的“核心”城市就是摄政者们的首要任务。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指亚历山大大帝之都，而以亚历山大大帝等皇帝名字命名的城市，还不仅仅只有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一处。此外，还兴建有恺撒利亚，是为了纪念尤里乌斯·恺撒，或是为了献给他的养子奥古斯都。提比略也有提比略城，克劳狄乌斯也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罗马帝国统治的“核心”，就是靠退伍军人移民到行省兴建殖民城市，借以形成国家统治中心，这也是罗马自古以来的行省治理政策。在以罗马皇帝名字命名的城市，几乎全是由皇帝派遣退伍军人建设的殖民城市，这也就是为何鲜见以女性之名命名城市的缘由。

公元15年，日耳曼尼库斯时任8个军团的总司令，正在进行日耳曼战役，所以小阿格里皮娜出生在了今天的德国科隆市。由于这一地区是日耳曼民族实力强劲的乌比人的大本营，这一部族曾经在高卢战役中拥护恺撒。由于是友好部族的地盘，所以日耳曼尼库斯才放心把家眷安顿在此地。奥古斯都的左右手，小阿格里皮娜的外祖父阿格里帕，是将科隆作为罗马军队冬营地的第一位将军。

尽管这个地方与外祖父和父亲有极深的渊源，然而小阿格里皮娜却不能简单地以上述理由，外加出生地为借口，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这座城市。罗马帝国在退伍军人移居到当地，并建设好殖民城市之后，才能冠上下令者的名字，这也一直是罗马帝国城市命名的传统。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小阿格里皮娜下令让退役的军人移居到科隆，并把这里升级成殖民城市，所以科隆在古代的名字是“科隆尼亚·阿格里皮娜”（Colonia Agrippinensis），意思即为小阿格里皮娜的科隆。其实，“科隆”（Colonia）不过是拉丁文中意为“殖民城市”的德语的发音罢了。拥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这在罗马帝国实行元首制以后是只有皇帝才能享有的荣耀，然而，小阿格里皮娜也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到了这份荣耀。

这种令人恶心的手段本应该引起社会哗然的，然而，元老院和公民居然出乎意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大家作出如此反应的原因之一是，“小阿格里皮娜”这个词本身就有与阿格里帕相同的含义，大家都觉得这不是“小阿格里皮娜的殖民城市”，而是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阿格里帕的殖民城市”。原因之二是，莱茵河是罗马帝国军事策略中的防线，而莱茵河沿岸最具战略价值的是科隆，把这个城市升为以拥有罗马公民权居民为核心的“殖民城市”，作为前线基地，与罗马帝国的利益并不相悖。此外，对于科隆的殖民城市化，当地的乌比人也举双手赞成。虽然乌比人是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然而由于长期和罗马保持友好关系，许多人与罗马士兵通婚，其实大家也都承认科隆实际上已经被罗马化了。如果科隆成为罗马的殖民城市，就代表着乌比人和罗马人的关系在将来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小阿格里皮娜的手段可谓巧妙，她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野心，还让自己的要求与国家利益融为了一体。然而，她也有女人特有的任性妄为的性格，她容不得任何女人胜过她，不管是在哪一方面。她容不下和自己竞争皇后宝座的两个女人，特别是被称之为罗马第一美人的罗利娅·包丽娜。

提比略曾经下令禁止意大利国内的占卜师靠替人算命赚钱。所以小阿格里皮娜就捏造了一个罪名，说包丽娜曾请占卜师替她卜了一卦，看看自己有多大胜算能跟皇帝克劳狄乌斯结婚。诉状交到克劳狄乌斯面前时，他照例毫无主见地就在上面签了字。然后小阿格里皮娜就把皇帝签了字的诉状交到了元老院。

诉状背后显然是皇后的阴谋，元老院的议员们自然十分清楚，然而因为克劳狄乌斯已经亲手签字了，所以也只好执行。元老院命令可怜的包丽娜只带500万塞斯特斯财产离开罗马。然而小阿格里皮娜这还不满足，不知道使出了什么阴招，最后逼得包丽娜自杀身亡，这才解了她的气。

小阿格里皮娜不是梅莎里娜。虽然在专横这一点上，梅莎里娜与小阿格里皮娜十分相似，然而小阿格里皮娜不像梅莎里娜那样任性与淫荡，小阿格里皮娜专横是因为她在冷静地按照计划前进，实现自己的野心。小阿格里皮娜既没有情夫，更是持家有道。此外，她也很关心孩子们的成长，尤其是对她那12岁的亲生儿子杜米提亚的教育，她更是周到细心。

哲学家塞内加

在罗马帝国首都，想要找到一位精通阅读、写作与数学以及东方通用语希腊语与西方通用语拉丁语的老师并非难事。然而，如何培养爱子杜米提亚具有帝王才能，小阿格里皮娜最为急切。想到亚历山大大帝师从亚里士多德，她觉得有必要替儿子请一位哲学家来教他。仍然在科西嘉岛流放的哲学家塞内加，成为了小阿格里皮娜的最佳人选。

公元前4年，出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的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后世研究者对他的评价极高，他们一致认为共和制时期罗马哲学界的代表人物当属西塞罗，而元首制时期罗马哲学界的代表人物则非塞内加莫属。虽然塞内加并没有出生于罗马本土，但他在罗马长大，幼年时期他跟随身为议员的父亲居住在罗马。虽然他的父亲是议员，然而因为出生于西班牙，所以只能算是罗马新贵。这些新贵对儿女的教育是不遗余力的，所以塞内加家中的三个孩子都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他们家的三个兄弟中，尤以次子路奇乌斯最有才华。

奥古斯都时代的末期，塞内加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不过长大后他也担任过帝国的公职。公元31年，这时已经是提比略摄政时期了，塞内加出任财务监察官，那时他大约35岁，这算是他为官生涯的第一步。

在罗马，只要担任过财务监察官，只要皇帝不表态反对，就可以获

得元老院的席位。进入元老院的塞内加，他的才华大放异彩，不过这却遭到了同样在辩论方面才华横溢的皇帝卡利古拉的厌恶。卡利古拉本想找个借口将他除掉而后快，幸而卡利古拉身边的人替他求情，说反正他也是将死之人，犯不着出手杀他，塞内加这才逃过一劫。当时才华横溢的塞内加是宴会上的常客，可能是每天都过着狂欢放纵的生活的关系，他似乎得了在现代被称为结核病的大病。由于大病，他反而平安地度过了卡利古拉时期，然而在克劳狄乌斯时代，他又得罪了皇后梅莎里娜。不过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才华横溢才招致皇后的嫉妒，而是他是以克劳狄乌斯之妹为中心的反梅莎里娜派举办的聚会的常客，当然仅是这个理由是构不成流放之罪的。后来他因与皇家成员通奸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被判流放。那是公元41年发生的事情，那一年他应该在45岁左右。

塞内加是一位喜欢喧嚣生活的哲学家，早已习惯了罗马的风情，因而科西嘉岛的流放生活肯定使他无聊到了极点。不过这8年的流放生涯，给他送来了两份大礼：第一份礼物是，虽然他极不情愿放弃奢华的生活，然而在大自然里，素淡的饮食，每天规律的生活使他的病魔全消。第二份大礼是，在岛上没有其他的娱乐项目，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之中。随着小阿格里皮娜使用了点小伎俩，让皇帝赦免了塞内加的流放之刑，他才得以重返罗马。当塞内加回到罗马时，他的健康体魄甚至让老朋友们大吃一惊。

小阿格里皮娜的过人之处，在于不仅挑选塞内加给继位前的皇子施行帝王教育，而且还让他出任皇子继位后的辅佐官。也就是说，不得不文武兼备的罗马皇帝的“文”的培养就全权由塞内加担此重任。这么看来，小阿格里皮娜还得给皇子找一位教授“武”的老师。在其继位前指导武艺，在其继位之后负责安全。

小阿格里皮娜选择了塞克斯图斯·阿夫拉尼斯·布鲁斯负责皇子“武”方面的重任。塞内加是西班牙出身的罗马公民，而布鲁斯则是出身于南法的罗马公民。布鲁斯与在元老院中崭露头角的塞内加不同，他

是在军营中脱颖而出的一位佼佼者。布鲁斯从一名普通的士兵一步一步升到了手下有800名士兵的大队长。历史学家蒙森把提比略提拔的行省出身的人才称为“提比略门徒”，布鲁斯就是提比略门徒之一。他虽然天赋不高，然而踏实稳重，非常有责任心，正是提比略欣赏的类型。布鲁斯在战争中失去了左臂，年纪可能比塞内加小五六岁。

可能小阿格里皮娜是打算在等皇子继位之后，再对塞内加另作安排，让他做皇帝的辅佐官，所以目前她给塞内加的正式职位只是元老院的议员。然而小阿格里皮娜清楚，如果布鲁斯没有名正言顺的职位，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于是她决定让布鲁斯担任近卫军团的长官。近卫军是由1万名精锐士兵组成的军队，他们的营地离罗马城中心不远，不仅如此，近卫军更是意大利本土唯一一支具有强劲战斗力的部队。

就这样，小阿格里皮娜给12岁的儿子安排了两位老师，才华堪称罗马第一的哲学家与比罗马人更英勇的将军来教育他。关于孩子要从小就开始培养这一点，小阿格里皮娜倾注的心血比谁都多，她就是想到了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才作出了这样的安排。

虽然如此安排，小阿格里皮娜选择的这两位皇子的老师，今后还得辅佐他的继位，却都并非罗马本土出生。他们有一个出生于西班牙，另一个出生于南法，可是竟然没有人觉得不妥。显而易见，罗马帝国不是单纯地支配行省，而是将行省当做是与自己生死与共的帝国的一个有机体。

能左右皇帝克劳狄乌斯作决定的，当然不仅仅有小阿格里皮娜，还有被称之为“解放奴隶三人帮”——希腊奴隶出身的秘书官集团。如果他们站出来唱反调，小阿格里皮娜的计划肯定会胎死腹中。然而，小阿格里皮娜早就了解到这层利害关系，并没有忘记怎么出招。

首先，小阿格里皮娜拉拢帕拉斯，因为当时他推荐了自己。帕拉斯是“解放奴隶三人帮”中的一员，他有一个叫菲利克斯的弟弟。小阿格里

皮娜向帕拉斯保证会助他一臂之力，帮他实现他对弟弟的期望，并且付诸行动了——小阿格里皮娜动用才智，软磨硬泡终于让克劳狄乌斯同意派菲利克斯赴犹太地区担任行政长官。

这位解放奴隶出身的长官不负小阿格里皮娜的重望，非常出色地管理好了民情复杂的犹太地区。由此可见，小阿格里皮娜并非是一个鼠目寸光的人。

这样，小阿格里皮娜实现野心的第一步告一段落，接下来的第二步就是提高亲生儿子杜米提亚的地位。这一次阿格里皮娜和帕拉斯又配合得相当默契。而且小阿格里皮娜另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她深谙趁热打铁的道理。

尼禄出场

小阿格里皮娜在荣升皇后未满一年，即公元50年，她就成功说服皇帝克劳狄乌斯收自己的儿子杜米提亚为养子。当然，克劳狄乌斯早已有一位叫不列塔尼库斯的儿子，根本没有必要收小阿格里皮娜带来的孩子作为养子。然而小阿格里皮娜用下面这些话说服了克劳狄乌斯：

> 自从以那样的方式失去了生母之后，不列塔尼库斯就变得胆小怕事。然而，他现在才不过9岁，离长大成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现在的他最需要有个人能把他当做亲弟弟一样来保护，而能保护不列塔尼库斯的，年长他4岁的杜米提亚是不二人选。现在把13岁的杜米提亚收为养子，将来让他和不列塔尼库斯的姐姐屋大维娅结婚的话，那么不管是在法律上还是血缘上，他们都是兄弟关系。这对将来要继承克劳狄乌斯的皇位的不列塔尼库斯而言，也等于是获得了一个得力干将。

不知道是被小阿格里皮娜说服的，还是禁不住她的逼迫，克劳狄乌斯只好签字同意了。反正皇帝克劳狄乌斯公开表示，要收妻子带来的这个比自己亲生儿子大4岁的孩子做养子，以后还要让养子与自己的亲生女儿屋大维娅结婚。

此后，小阿格里皮娜把儿子杜米提亚·诺巴布更名为尼禄·克劳狄乌斯。“尼禄”在克劳狄乌斯家族出身的萨宾人的语言中意为“勇敢之男”，是克劳狄乌斯家族中男性最常用的名字。

就在其精心策划之下，小阿格里皮娜的野心正逐渐成为现实。次年，即公元51年，小阿格里皮娜在尼禄满14岁的时候为他举办了成人礼。罗马成人礼，是预示着这个人已经过了与奴隶和平民一样穿着齐膝短衣的年龄，可以享有穿着长及脚踝的托加的权利。获准穿戴托加就表示这个人可以在公众面前露脸了。一般而言成人礼是在孩子17岁的时候举行的，最早也没有小于16岁的。

除了被认可成年，年仅14岁的尼禄还获得了预备执政官的资格，言外之意，他只要满21岁就能拥有执政官的被选举的权力。与此同时，元老院还封给他“Princeps Uventus”的尊称，意为“皇帝接班人”。对于尼禄获得的封赏，在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时代曾经出现过，那时奥古斯都把这个封号赐给预定为皇位继承人的孙子们。

此外，小阿格里皮娜也不忘替儿子笼络人心，加强尼禄在百姓心中的印象。她以庆祝尼禄成年的名义，以尼禄之名，将数额不菲的钱分配给军团的士兵，同时还举办了角斗比赛，邀请百姓前来欣赏。与此同时，小阿格里皮娜依照计划让布鲁斯荣升近卫军军团长。小阿格里皮娜的种种手段，使皇帝的亲生儿子不列塔尼库斯日益边缘化。

公元53年，在小阿格里皮娜的督促之下，尼禄与屋大维娅正式完婚。这时，他们又以尼禄已成年且婚姻大事尘埃落定为借口，时年16岁的尼禄终于跨入了元老院的大门。然而，此时的尼禄尚无正式的元老院

席位，所以他们又安排他请求元老院表决，通过以政策立案选调议员的方式立足元老院。

当然，在小阿格里皮娜与塞内加的通力合作之下，这个主意与演讲的内容已经形成，我们当然也不能轻视尼禄，时年16岁的尼禄也是一位年少有为、能力超群的少年。他的此次演讲共有四个方面：

第一部分演讲的主题，是关于以特洛伊古战场而闻名的小亚细亚伊利欧斯人提出恳请罗马帝国能免除当地居民的行省税的议题。尼禄持赞成的态度发表了这个演讲，请求元老院们通过减免行省税的决议。他富有激情地讲道，特洛伊沦陷之时，罗马人从伊尼亚德逃亡到意大利的，回顾历史，伊利欧斯人是与我们血脉相连的，既然同宗同源，免除伊利欧斯人的行省税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由于伊利欧斯是属于希腊语言圈，而罗马人又是双语民族，议员们不用人翻译也可以听得懂希腊语，所以尼禄就用希腊语向议员们演讲以示亲近。

第二部分演讲的主题，是关于向最近遭受火灾的博洛尼亚人发放救济金的议题。博洛尼亚是罗马帝国境内的一座城市，所以这部分演讲尼禄就用拉丁文。尼禄说这次火灾波及范围广，光靠地方自治政府根本无力承担，国家有必要伸出援手。尼禄建议向博洛尼亚人援助的救济金额应为1000万塞斯特斯。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关于是否应再次给予爱琴海的罗得岛自治城市议题。这次尼禄又换用希腊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由于其祖先留下的丰功伟绩，罗马帝国赋予了雅典与斯巴达获得自治城市的地位，他们不仅内政自理同时也有免税权。然而，罗得岛人民也有过与这两个城市媲美的辉煌过去。由于雅典与斯巴达人民享有永久免税权，所以即使不认同罗得岛人民永久免税权，至少也应免除他们的行省税义务。

第四部分的主题，是关于最近小亚细亚南部发生的地震议题。小亚细亚属于希腊语言圈，所以尼禄用希腊语发表了演讲。尼禄讲道，虽然

这个行省富庶，不需要国家的援助，然而为了帮助当地人民完成重建工作，他提议也应该对他们实施5年的免税政策。

虽然议员们不需要翻译，然而不同的议题用不同的语言来陈述，这难免有太爱出风头嫌疑。尼禄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让聆听演讲的议员们留下他年轻而又有教养、聪明而又富有领导才能的良好印象。大概议员们对尼禄的表现十分满意，他的4个提案都以赞成票占多数的情况被元老院通过了。尼禄的首次亮相圆满收场。

从尼禄首次出场我们可以看出，从提比略时代开始的罗马中央政府应对行省遭受灾害的措施，已经全面深入地融入了整个帝国的体系之中。中央政府会根据受灾情况的不同，实施不同的援助方式。中央政府在遇到灾情特别严重的地震时，会先行拨付临时援助款给受灾地区，用这笔资金进行紧急救援与重建当地的基础设施。虽然中央政府并未把救灾款项直接发到灾民手里，然而依受灾程度的不同当地人民也会享受3至5年的免税政策。也就是说在此期间，中央政府除了负责基础设施的重建工作之外，当地人不用缴税，自己家庭的重建还得依靠自己。上述情况只针对行省人民，如若是受灾地主要以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居民为主，或是由移居到当地的罗马人建设的殖民城市的话，除了原本他们不用缴税之外，援助款也会水涨船高。看来，将因地制宜这一理论运用到极致的，非罗马人莫属。

晚年的克劳狄乌斯

公元53年，克劳狄乌斯已经年满62岁了，然而他是绝不会无度地放任皇后小阿格里皮娜的野心不断膨胀的。克劳狄乌斯还有着统治罗马帝国的热忱，而首席秘书官纳鲁奇索斯早就看不惯小阿格里皮娜的专横跋扈，也想在克劳狄乌斯身旁帮助他继续摄政。

罗马帝国发起的不列颠战争已经前前后后持续了10年时间，已经基本上控制了英格兰的局势，而至于威尔士的战况在军队进入山区之后，一度遭受了很大的挫折。罗马帝国每隔几年就按批次地把一些能干但称不上天才的总司令派往前线，这种做法可谓是下下策。此外，根据罗马目前的实际情况，它能调到威尔士前线的兵力也只不过3至4个军团，导致了战争屡次三番不能胜利收兵。先不提克劳狄乌斯的军队后勤工作怎么样，他甚至连治军的经验都从未有过，这样一来，可以说他对军事指挥一窍不通。然而，罗马军队进行的征服不列颠战役并没有迈不过去的坎，战争总体而言还是非常顺利的，这是由于有很多的优秀人才，如后世的皇帝韦斯帕芗，就是从军队中成长起来的。

而罗马帝国西方的另外一条防卫线，莱茵河与多瑙河防御可以用“坚持”这个词来形容。作为罗马帝国的同盟国，色雷斯王国一直以来都替罗马帝国肩负着多瑙河下游地区的防御任务。这个王国发展到提比略时代王室已经后继无人，之后就被罗马帝国纳为行省。在那种情势下形成的提比略边防体系，在已经延续使用了30年之后还发挥着良好的作用。连在黑海一带出没的海盗，对这一防线也是谈虎色变，不敢轻举妄动。显而易见，“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已经渗透到了整个边境地区。

在南方的防线上，罗马帝国也确保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沙漠另一端的游牧民族会突然进行袭扰，扰乱北非的稳定与安全。不过罗马虽然失去了一直扮演缓冲角色的毛里塔尼亚王国，在南方边境线也只派驻了一个军团的兵力。此外，罗马还积极组织当地行省居民编成辅助军团，让他们保家卫国，抵御外敌。

东方地区是摆在罗马帝国的安全体系问题中，最为棘手也是最难全面解决的重大课题。当然，这倒不是以敌人的文明发展程度来划分的，因为罗马帝国的西方是落后的蛮夷民族，而东方的对手则是高度文明的帕提亚王国。自共和制时代起，罗马保障东方地区安全的策略，就是在罗马的庇护下支持一批中小型的君主制国家，让他们连成一线形成罗马

与帕提亚王国之间的缓冲地带。然而，君主制国家国内局势十分复杂多变，经常因皇位继承而爆发政变，从而使得罗马帝国东方陷入动荡之中。此外，如若这些君主制国家王室之间互相联姻，一个国家发生内乱，其他国家就会出兵干预，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实罗马帝国最大的假想敌帕提亚王国，因国王去世引发政局动荡的变故也时有发生。不过罗马帝国对发生内战的帕提亚王国采取的政策通常是，不乘人之危、作壁上观的态度。然而最令罗马帝国头疼的是，每一位继位的帕提亚新国王似乎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势，都会约定俗成地出兵，袭扰罗马帝国的邻国亚美尼亚王国，而亚美尼亚王国是罗马帝国东方防御网上的重要屏障。公元51年，帕提亚王国又一次进攻亚美尼亚。驻守叙利亚的4个军团也感受到了威胁的逼近，此时，叙利亚总督飞鸽传书向克劳狄乌斯紧急报告，称罗马帝国不可能躲过烧来的战火，应随时准备应战。然而，克劳狄乌斯正忙于收尼禄为养子，称这不过是件芝麻大的事情，不用慌张而弃之脑后于不顾。不过幸运的是，帕提亚举兵进攻亚美尼亚，到了冬季受不住严寒就撤兵了，次年春天也未再动干戈，这起战事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收场了。不过经过这件事情之后，罗马帝国更加意识到注意帕提亚王国的一举一动的必要性。

此外，罗马帝国面对的另一个东方难题，就是如何管理犹太人的问题。对一直以自我的特殊性为由拒绝被罗马同化的犹太教徒，克劳狄乌斯也继续采取了罗马自古以来对犹太人的做法，即只要他们不反抗罗马的统治，就不干涉他们的特殊性。此外，克劳狄乌斯还认为对犹太人的统治就应该交给犹太人负责。所以他任命希律·阿格里帕统治整个犹太地区。公元44年，希律·阿格里帕逝世，由于他的儿子阿格里帕二世过于年幼，罗马帝国收回了统治权，直接管辖这一地区。

公元50年，克劳狄乌斯决定再次把犹太地区的统治权委任给成年的阿格里帕二世。然而，这位年轻的国王虽继承了他父亲的统治热情，却是一个平庸之辈。克劳狄乌斯意识到阿格里帕二世的平庸无能，不相信

他能够统治整个犹太地区，于是把犹太地区一分为三，让阿格里帕二世治理其中的一个区域，而派遣另外两位总督治理剩下的撒玛利亚与加利利区域。阿格里帕二世与两位罗马总督开始了短暂的统治。而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并未划入这三个区域，而是由罗马直辖。然而，这种安排也埋下了隐患，要求神权统治的犹太人，与要求将宗教和政治分开的罗马人混居，就好像在他们之间埋下了炸弹，加之希腊人与犹太人之间矛盾的长期存在，使得这一地区的矛盾更加复杂化了。显而易见，中东“火药库”古已有之。

克劳狄乌斯一般接见受命赴任外地的官员。而包括总督、执政官与军团长在出发之前，都会先觐见皇帝，表达对皇帝委以重任的感谢，并与之辞行。克劳狄乌斯面对这些官员通常会这样回答道：

“站在我的角度，你们替我分担统治帝国的重任，让我减轻负担，我才应该感谢各位。”

经常会有人纳闷，罗马帝国为什么会如此大费周章，或是扶植中小君主专制国家，或是安抚犹太教徒来统治东方地区呢？为何不直接统治这些地区呢？按照罗马当时的兵力与实力，要想这么做的话根本不在话下。然而，我们不得不注意的一点是，若是罗马帝国把这些地区行省化了，光靠驻扎在叙利亚的4个军团要想维持这个地区的行省的安全，几乎是天方夜谭。再说负责整个罗马帝国防卫的25个军团共15万人加上与正规军数量相同的辅助兵，就是罗马目前能养得起的全部兵力。当年决定远征不列颠时，克劳狄乌斯也只敢增加了2个军团。若是罗马帝国继续扩大军事实力的话，就需要“挤”出大批的军费作为基础。而最有效的“挤”法就是增加行省税。然而，任意增加税收必然会引发行省人民的暴动，然后罗马就得出兵平定暴动，这样一来又得增编军队，最终结果就会陷入无尽的恶性循环之中。当然，罗马是绝不允许自己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中的。

拥有罗马公民权是加入罗马军团的必备条件。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

奥古斯都打造了25个军团共15万名士兵的庞大军事力量。当时罗马公民（17岁以上可以服兵役的男性）总数为500万人，到了罗马帝国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时代，罗马可以服兵役的公民增加了100万人，达到600万人。照增幅计算的话，可以把军团扩充到30个，将士兵人数增加到18万人。然而提比略在其在位的23年间，虽然人口不断增加，他始终没有扩充军事力量。克劳狄乌斯在决心远征不列颠之后，也仅仅扩编了2个军团共1.2万名士兵。在成功称霸不列颠后，克劳狄乌斯认为在当地只派驻2个团的兵力已足够，就又把罗马帝国军团的总数缩编为25个军团的规模。

不论是奥古斯都、提比略，还是克劳狄乌斯以及之后的皇帝们有着和现代专家们一样的看法，“security”（英语）一词的语源即“安全”（securitus，拉丁文），其中的含义不仅仅是依靠军事力量来实现安全保障，而是指以各种手段实现的安全保障。换言之，他们看重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就能构建社会安全的观念。也正因为如此，罗马帝国并没有改变本土及首都粮食完全依赖进口的策略。

公元51年，恶劣气候阻断了海上交通，影响到了小麦的进口。首都台伯河畔与奥斯提亚这两处仓库里库存的小麦只能维持15天的供应。

在库存的小麦只够供应15天的消息传出以后，罗马居民们有如热锅上的蚂蚁，不仅仅是市场上小麦价格大幅上涨，而且贫民们也十分担心，原本免费分发的小麦会中止发放。由于保障“国家安全”与“粮食安全”是皇帝的两大重责，所以遇到这样的天灾，愤怒与责难的矛头往往都会对准皇帝。针对罗马帝国这种粮食完全依赖进口的政策，历史学家塔西佗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口诛笔伐。

此时，克劳狄乌斯下令把各地的小麦集中到罗马，此外随着天气转好，在发生民众抢粮之前问题就被解决了。然而，这样临时性的危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需要皇帝采取临时对策应对的问题还是时有发生。不过，出现这样的粮食危机，光是指责小麦依赖进口这一国家政策，是解

决不了问题的。

早在罗马共和制时代，由格拉古兄弟推动《农地法》的主要目的就是着眼于奖励自耕农（个体农民）的积极性，这部法律最后在尤里乌斯·恺撒正式颁布实行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罗马帝国的粮食危机。用时髦的说法，这部法律正如现代政府热衷于扶持中小型企业一样。此外，格拉古兄弟还推行了另一项政策，就是针对罗马贫民阶层的社会福利性法律《小麦法》，通过立法的形式保证免费向贫民发放小麦。

曾经担任过护民官的格拉古兄弟，以及打下了元首制基础、担任终身独裁官的恺撒，有着社会中下层出身人民的强大民意基础，才推动了对这些政策重视程度的提升。而议员阶层是既得利益的大地主阶层，世世代代享受着元老院的议席，可谓是中下层阶级的对比阶级。美国学者中甚至有人并非开玩笑地说道，前者就是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而后者则是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当然，后者是以元老院为主导的支持共和制的人为主，所以理解成为共和党也没有什么不对。然而，美国的两大党派，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党派一样不能单纯地划分成左派和右派，显而易见，罗马的“两大阵营”也不能简单地在政策上一分为二。这是由于大多数的罗马人比起意识形态来讲，更加看重治理能力。

坚持元老院体制的人们真正的目的是要保全握在手中的利益，对于他们而言，最大的理论武器在于共和制这一意识形态。这一派理论家的代表人物有西塞罗，此外，还有因崇尚这种理念，而刺杀了恺撒的议员布鲁图。

虽然，在恺撒打倒了共和派之后，他最终还是被共和派谋杀身亡，但共和派最终还是败在了恺撒指定的皇位继承人奥古斯都的手上。就这样，罗马进入了元首制时代。如果用当今的美国来打比方，就是美国进入了“民主党”连续执政的时代。古罗马的“共和党”只有在元老院中拥有过半数的席位，也即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形成反抗皇帝的势力。然而，皇帝这一方也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左派政权。

罗马与迦太基发生布匿战争后，西西里岛被罗马纳入帝国版图，之后西西里岛出产的小麦就大量涌入罗马帝国本土，这对本土的农民而言，可谓是第一次冲击。居住着众多希腊人的西西里岛上大型农场发达，而且西西里岛产的小麦比意大利出产的小麦便宜，所以本土产的小麦就失去了竞争力。格拉古兄弟本来打算要强行推行、但由于遭到暗杀而被迫中止的《农地法》的目的，就是想要挽救面临生死考验的本土农民。

当然，不能把古罗马人冠以头脑不灵活这一看法，他们也不会只给自己留下唯一的选择。既然本地产的小麦没有竞争力，那就改种其他有竞争力的作物。意大利半岛虽没有辽阔平原去大量种植小麦，它的地势却适合广种葡萄与橄榄。虽然不是粮食作物，然而这些农作物在市场上极具销售潜力，也推动了意大利农业的再次复苏。根据恺撒制定的《农地法》形成的以中小规模的自耕农为中心的形式，恢复了意大利本土的农业。然而主要粮食小麦依靠进口的体制，在本土农业复苏后也一直没有任何改进，这又是为何呢？

倘若一定要用现代的说法来回答上面的问题，其实就是把问题交给市场自行调节。当然，这也是罗马人统治帝国的一种策略。罗马人的出色之处在于不会凡事都依靠自己去处理，如果有其他人办得到就会把事情交给那个人去处理。既然有更适合种植小麦的辽阔土地，那就让那个地方种植小麦，到时再把那个地方的小麦进口过来供自己食用。这就是罗马人的想法。

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本着这样的想法，加之不能只将精力放在本土，而是必须要放眼整个帝国的元首制时代的到来，自然就导致了粮食自给自足这一目标被搁置到一边的结果。

罗马帝国境内自耕农奖励的对象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农民。在罗马，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才有选举权，也就是说奖励自耕农的同时也是一种拉拢选民的策略。不过行省的人民不在奖励的范围之内，行省的农

业，一般是罗马人雇用当地人经营的大型农场模式，所以就算不给当地人农耕奖励，也不用担心会对选票造成影响。在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现代社会的跨国企业，其实早在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就已经出现了，因为行省的大农场的运营就是雇用廉价的奴隶与行省人来维系的。

发生于提比略晚年的金融危机，用现代的话而言就是“信贷危机”。为何这么说呢？金融业界的人不愿意放贷的对象不是行省的大型农场，而是帝国本土的自耕农。当时提比略采取的对策是，坚决执行恺撒制定的关于信贷的法律，即金融界融资的一部分资金必须要对本土投资。另外提比略还拨款1亿塞斯特斯，实行3年无利息借贷，援助本土的中小型企业，以避免本土农业走向泡沫的现象。

即使大环境十分不利，然而本土农业还保持着强劲的市场竞争力，原因就在于改种其他农作物，并努力提高农产品的品质。甚至有这样的传闻，印度国王将胡椒等香料出口到罗马帝国，意大利出产的高级葡萄酒却摆满了他们的餐桌。

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罗马帝国粮食依赖进口是出于统治策略上的考虑，是不能随意变动的，皇帝们能做的，只有努力保证本土小麦的供应。譬如提比略经常留心小麦的供应量，卡利古拉则补偿破损的小麦运输船只，而克劳狄乌斯做的是建造大型海港，改造奥斯提亚湾。历史学家塔西佗之所以对小麦进口政策口诛笔伐，其根源在于他只盯着粮食安全，忽视了国际政治的现实。

不管怎么样，即使连人口超过百万的罗马城都没有出现过因为饥荒而人口锐减的情况，意大利本土也从未发生过要求粮食的游行示威。然而，如若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估计皇帝的宝座也坐不稳了。

在罗马人眼中，皇帝的责任即国家的责任，除了保障罗马帝国的“国家安全”与“粮食安全”之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义务。提比略不仅保障了“国家安全”，还保障了“粮食安全”，然而人

民对他的评价仍然不好，因为提比略为了健全国家财政体系，采取了紧缩财政支出的措施，所以基础设施建设就成了牺牲品。到了克劳狄乌斯时代，克劳狄乌斯不得不去收拾卡利古拉造成的财政崩溃的烂摊子。然而，当时正处于太平盛世，帝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没有必要用像提比略那样紧缩财政的手段去保障国家与粮食安全。此外，作为历史学家，克劳狄乌斯深谙基础设施工程对于执政者的重要性。

公元52年，由卡利古拉动工、克劳狄乌斯续建的两条引水渠工程都已完工。罗马的基础设施工程一般都会以发起人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然而罗马人都想忘掉卡利古拉，所以这两条水渠就被命名为“克劳狄乌斯水渠”。2000年之后的今日，在罗马近郊的平原上我们还可以见到这条水渠的遗迹。

除了剩下的最后的输水工程，奥斯提亚的海港建设工程也接近尾声。而此港口一旦建成，这里将会是地中海地区设备一流与船只停泊量第一的大型港口。

克劳狄乌斯在本土还实施了另一项公共工程。他要抽干意大利中部地区的富基努斯湖的湖水，把它变成耕地，然而，这项工程中途夭折。由于引流渠运河没有完工，使得湖水泛滥成灾，最终出现了人员伤亡。本来是要恭迎皇帝出席的运河竣工庆祝典礼之处，变成了纳鲁奇索斯和小阿格里皮娜在皇帝面前相互指责的地方。小阿格里皮娜指责负责整个工程的纳鲁奇索斯私吞了部分工程款，修建豆腐渣工程。虽然纳鲁奇索斯是解放奴隶出身，然而自恃常年替皇帝代行政务，面对皇后的指责，他当然不会缄默。他回敬了皇后一句：“什么都不懂的女人给我闭嘴。”夹在两个人中间的克劳狄乌斯则大气都不敢出一下。这项恺撒规划的大规模工程建设，在经历了1850年之后，才在19世纪正式完工。现今望着眼前的一大片耕地，的确很难想象当时曾是一片波光荡漾的湖泊。如若当时古罗马也有环保人士的话，要完成这项工程恐怕比登天还难。

罗马帝国版图全盛时期（五贤帝时代）

不过，纳鲁奇索斯会向皇后回嘴道“什么都不懂的女人给我闭嘴”也不奇怪。在小阿格里皮娜专心于让她的儿子尼禄在元老院的议员面前露脸的时候，身为首席秘书官的纳鲁奇索斯正忙于协助皇帝处理那些平凡琐屑的政务，这些政务虽没有公共工程那样引人注目，然而少了这些工作，帝国就无法支撑下去。当时纳鲁奇索斯协助皇帝做的“平凡琐屑”的工作之一，就是对占拜庭人民提出的减税要求作出回应。

公元1世纪，君士坦丁堡（英语为Constantinople），也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虽有罗马帝国的出入黑海要道这一特色，然而，它只不过是罗马帝国境内的一个小城市。当时，虽然当地并未发生地震，也没有发

生火灾，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君士坦丁堡人民向克劳狄乌斯请求减免税收。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克劳狄乌斯决定免征当地居民5年的行省税。减免行省的税收，在免税期间要居民自己想办法恢复经济，是罗马中央政府的基本方针。免税措施的施行，原因是地震、火灾、洪水等天灾也好，还是经济不景气等人为因素也好，都不会发生改变。

克劳狄乌斯逝世

克劳狄乌斯在公元54年的秋天已经度过了63个春秋，而罗马帝国在他的统治之下也经历了13个年头。虽然克劳狄乌斯从未奢求过帝国的皇位，然而现在，他甚至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摄政的13年间他全心全意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虽然富基努斯湖水的排干造田工程最终以失败告终，然而耗费他多年心血的奥斯提亚港工程完工在即。在克劳狄乌斯看来，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另一方面，小阿格里皮娜的阴谋也已经万事俱备。也就是说，她需要借助克劳狄乌斯皇帝的身份所做的准备都已经完成了，皇帝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再者，如果等皇子长大成人，能自理国政时，她自己就会处于不利的境地。恰好就在此时，对克劳狄乌斯最忠心耿耿的纳鲁奇索斯身体抱恙，从罗马到那不勒斯近郊去修养。对小阿格里皮娜而言，此时下手可谓是天赐良机。

历史学家们大多持这样的观点，小阿格里皮娜给喜欢吃菌类的克劳狄乌斯食用了毒菌。克劳狄乌斯在吃下毒菌后并没有立即发作，到了深夜，毒性大发，就这样命丧黄泉。

然而，对于克劳狄乌斯之死，并没有立即公之于众。次日，即10月13日正午，皇宫之门大开，近卫军军团长布鲁斯率领1000名近卫军拥戴着尼禄出现了，直到此时克劳狄乌斯的死讯才公之于众。

在近卫军团的拥戴之下，尼禄径直奔赴罗马近郊的近卫军营地，他

受到了近卫军士兵们“万岁”的高呼。似乎是13年前克劳狄乌斯继位时的情形再现，尼禄向近卫军士兵们保证，将会给这些士兵每人发放1.5万塞斯特斯作为奖赏。

近卫军团拥护尼禄的消息传到元老院之后，议员们立即决定将皇帝所有的权力赋予尼禄，这也与13年前的情形如出一辙。

然而，尼禄继位较13年前克劳狄乌斯继位时不同之处在于，充斥在元老院的氛围，与得知尼禄继承皇位消息后罗马公民的反应，不论是议员们还是罗马公民都乐见这位17岁的年轻皇帝继位。议员们高兴之处在于，今后他们再也不用忍受解放奴隶出身的秘书官们目中无人的态度，而百姓们则是从一开始就看不起一直受制于妻子的克劳狄乌斯。克劳狄乌斯的国丧吊唁词由塞内加亲自执笔，由尼禄诵读。然而，据说当尼禄读到吊唁词中称赞克劳狄乌斯处事慎重、殚精竭虑这一段时，议事厅台下哄笑声一片。

将已故的克劳狄乌斯神化，就是尼禄向元老院提出的第一份议案。正因为如此，才让克劳狄乌斯和凯斯与奥古斯一样并列为“神君”。然而，在大家看来，其实这都是小阿格里皮娜在背后指使尼禄才有这份提案。而这份提案的真正目的，就是想通过将克劳狄乌斯神化这件事转移大家怀疑小阿格里皮娜弑夫的注意力。虽然克劳狄乌斯死后追封，他的遗嘱却没有被公之于世，也没有人提到遗嘱的事。由于皇位继承人不是尼禄，所以不敢公布遗嘱，历史学家们这样断言。

既然追封克劳狄乌斯为“神君”，就要建造供奉他的神殿，供奉他的神殿却没能像恺撒与奥古斯都的神殿一样，建在罗马城中央的罗马广场中，而是被盖在了罗马“七丘山”里没有重要建筑物的山丘之巅。后来，由于负责这项工程的尼禄一开始就无心修建神殿，所以神殿在中途被搁置了下来。

或许在罗马人看来，尼禄这种做法虽然对兢兢业业的克劳狄乌斯有

点不公道，然而若要将他和恺撒与奥古斯都摆在同等位置，确实也有点过头了，所以在罗马的历史上被尊称为“神君”的，除了恺撒与奥古斯都之外别无他人。

虽然皇帝克劳狄乌斯死后被追封为“神君”，但仍旧逃脱不了被人当成笑料的命运。在嘲笑克劳狄乌斯的人中，做得最过分最狠毒的莫过于尼禄的老师，即随后出任尼禄皇帝辅佐大臣的哲学家塞内加。

塞内加是罗马元首制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与悲剧作家，他在当上尼禄的辅佐大臣之后，是罗马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位参与国家政治的人。为了嘲弄皇帝克劳狄乌斯，他甚至发表了一篇名为Apokolokyntosis的文章。

在现代，研究者们也百思不得其解这个“Apokolokyntosis”一词的意思。然而，从这篇长达15页的文章内容来看，似乎可以理解成“被拒绝的神君”。大体是描写克劳狄乌斯死后，接受众神的审判，说他是一个非常不配“神君”这个称号的皇帝，最后由神君奥古斯都判他有罪。所谓的讽刺性文章，如果不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就不能体味到它的好笑之处，所以现在出版的Apokolokyntosis，比原版的“注解”要多很多。不过当时这篇文章就算没有很多注解，听的人也会觉得很好笑吧。塔西佗盛赞塞内加“有卓越的文采，拥有符合所处年代趣向的感性”。这种讽刺性的文章，如若不在事情发生后立即撰写，那么最好永远都不要写了，所以可以推断这篇文章是在10月13日克劳狄乌斯驾崩后就开始写了。从12月17日开始的罗马农神萨图努斯祭祀这一段时间是罗马人的“假日”（vacances），估计尼禄在出席祭祀典礼的时候就朗诵了这篇文章，在座的众人也肯定被内容逗得爆笑吧。然而，我在时隔2000年之后才读到这篇文章，除了感受到才华横溢的读书人身上最常见的现象，即缺乏对人性的关怀之外，别无其他感想。

然而，克劳狄乌斯自身也并非无可挑剔。一个从小到大就不被人尊敬的人，自然不能理解被人尊敬所带来的涟漪效应及其重要性，所以他

才会一心认为只要兢兢业业地做事，就会获得别人理解。

人性往往是没有那么容易暴露的。在我看来，在大多数人类的内心深处实际是希望被舒服地欺骗。其实，皇帝克劳狄乌斯不就是一个擅长舒服地欺骗他人的超人吗？而恺撒与奥古斯都都是具备这种能力的达人。他们后来成了罗马史上令人无比敬仰的“神君”，在世界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明星”，难道此类事实不正好证明了人性的这一面吗？



克劳狄乌斯

在克劳狄乌斯63岁时，小阿格里皮娜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使得罗马帝国一代皇帝成为牺牲品。然而，克劳狄乌斯与世长辞的时候，没有人觉得他没有尽职到最后。历史学家塔西佗这样记载道，晚年的克劳狄

乌斯出现了衰老迹象。我觉得克劳狄乌斯的衰老不是像一般人那样是到了一定年纪的缘故，而是这13年来的摄政生涯心力交瘁的缘由。提比略在位的23年，差不多是克劳狄乌斯的2倍，不过这是因为他隐居到适合保养自己身体的卡普里岛长达10年之久，才保证了他这么久的在位时间。可能有人会反驳，奥古斯都在位40余年，那是因为他不是个简单的人，也即奥古斯都并非淳朴而脚踏实地之人。

与提比略不同，克劳狄乌斯经常出席元老院的例会，要求议员们积极参与国政商议，他还经常出席法院听审，虽然人们批评他说皇帝应该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去做，甚至还引起了陪审团的厌恶，然而他都不理会，继续频繁地出席。其实他内心深处希望法律能够惩恶扬善。克劳狄乌斯在这样尽心尽力地努力了13年之后，难怪他会耗尽心力。克劳狄乌斯被害的确令人感到遗憾，然而死对他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就算克劳狄乌斯死后，真的会被传唤到罗马的众神面前接受审判，也应该会可怜他吧。此外，我也深信奥古斯都一定不会降罪于克劳狄乌斯。

对皇帝克劳狄乌斯一直忠心耿耿的解放奴隶纳鲁奇索斯此后的行踪，在史书中找不到任何记载。有研究者认为他用全部的财产换得生存，在帝国本土南方过着平民般的生活。也有人认为他最后死于监狱之中。不管是哪一种，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当塞内加文采洋溢讽刺克劳狄乌斯的文章，被尼禄大声朗诵的时候，纳鲁奇索斯的同僚帕拉斯在下面聆听之际，纳鲁奇索斯一定不在他的身旁。

当代的研究者中有人持这样的观点，纳鲁奇索斯之所以会前往那不勒斯附近休养，并非是出于身体上的不适，而是由于精神上的压力才导致了他逃避现实。这样看来，大概纳鲁奇索斯与克劳狄乌斯一样，都为帝国心力交瘁了。



第四章

皇帝尼禄

(54年10月13日—68年6月9日在位)

少年皇帝

尼禄继任罗马帝国皇帝时，时年16岁零10个月。当时，罗马规定年满30才有资格担任公职。因此，由一位年轻的皇帝接管罗马帝国在罗马历史上非常罕见。如若罗马当时存在大众媒体，或大众传播媒体最擅长的民意调查的话，那么刚刚即位的尼禄可能与卡利古拉继位时一样，拥有极高的支持率。

另一方面，尼禄与卡利古拉继位时面临的情形十分相似，他们前任皇帝的摄政并未出现极大的失误，也未出现政局不稳、财政拮据、怨声载道的情况。毕竟，罗马帝国皇帝的两个首要工作即是确保“国家安全”与“粮食安全”，尼禄继位时并未有这方面的顾虑。

然而，人不会因为不存在困难就会满足于现在的生活，人性现实的一面往往是在细枝末节中挑剔万分，并把这些瑕疵当做不满的借口。正因为我们必须和这些人打交道，丸山真男先生才会有“政治就是高难度的欺骗”这样一句名言。普通公民欢迎尼禄继位，只是希望转换心情而已；而元老院支持尼禄继位，则是期待他能够废除令议员们长期不满的解放奴隶主导的秘书官体制。

年轻的新皇登基毫无疑问会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想想看，先皇年逾花甲，行动迟缓，演讲时又喜欢引经据典，就像是站在三尺讲台上说教的历史学家。然而，现在的新皇帝是10余岁的少年，他朝气蓬勃又不失稳重，并且谈吐不俗，这自然令人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当然，元老院对秘书官制度颇有微词也有一定的缘由。克劳狄乌斯刻意安排解放奴隶加入“骑士阶级”，正是这种做法使得议员们非常不满，因为骑士阶级是罗马帝国仅次于议员阶层的第二阶层。况且，罗马历来重视前线的后勤工作，所以，在议员们看来，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借口，以纳鲁奇索斯为首的秘书官们的工作范围仅限于皇宫之内。

话说回来，秘书官制度被当代学者公认为是幕僚制度的发端，所以这一制度在当时应该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因此，各个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加在皇帝身上，仅凭皇帝一己之力不可能圆满解决。虽说元老院对秘书官体制牢骚满腹，却能够接受议员参与朝政的辅佐官制度。塞内加从其父辈开始，就一直属于议员阶层。因此，这位学识渊博的议员，愿意担起辅佐皇帝的重任，对于个中内情，他比别人更加清楚。

尼禄在元老院会场中，宣读了由塞内加亲自撰写的“施政方针演讲”，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重返奥古斯都时期的政治体制。

二、对于元老院所持有的权力，予以尊重。

三、司法独立，皇帝不得干预。

四、将“Domus”（私宅）与“Res publica”（国家，此处意译为“官邸”）分开。

上述四项内容被这位年少的皇帝下令刻在铜板上，并规定每年年初新任执政官就任时必须予以宣读。

同时代的罗马人，或者不同时代、但同属元首制时代的罗马人，他们只要听到这些内容都能够心领神会。然而，我们生活在罗马帝国灭亡2000多年后的今天，有必要对此进行细致的说明。因此，在聆听到第一条的时候，大部分议员都认为尼禄所谓的重返“奥古斯都时期的政治体

制”指政体实行共和制，也即由“第一公民”实际统治罗马公民的政治模式。实际上，所谓“奥古斯都时期的政治体制”是披着共和外衣的元首制。现代的研究者中有不少人简单地认为这是“元首政治”，因此，罗马人无法理解这种制度并不奇怪。这种体制正是奥古斯都创造的“精致的虚构”（delicate fiction）。正如恺撒所言，大多数人都只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现实，显而易见，元老院对尼禄宣布重返奥古斯都时期的政治体制时自然欢迎之至。

只要认真一思考的话，提比略、卡利古拉与克劳狄乌斯在继位不久，都纷纷表示要“重返奥古斯都式政治”。然而，包括尼禄在内的4位皇帝，后来无一例外都饱受来自元老院的诟病。如果说他们的统治方式违背了即位时的宣示，那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此后元老院会对他们指责不断。但在我看来真正的症结不在于此，虽然他们宣称要重返奥古斯都式政治，可他们是否具备让“精致的虚构”正常运行的冷静与清醒呢？

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要始终保持这种冷静与清醒非常困难。塞内加在心爱的弟子将满17岁时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宽容》（De Clementia），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必要让弟子加强理论学习，才有此一著作吧。打开书本，一位花甲智者对施行德政的热忱扑面而来，著作的内容是强调身为皇帝为何必须秉持宽容之心。这本书要呈给尼禄，因此塞内加的行文方式是向尼禄答疑解惑。整本书以拉丁文写就，简洁质朴，用词考究，塞内加当然不愧为与历史学家塔西佗并称罗马元首制时代的著名文人。



刚刚继位的尼禄

这本书用大量笔墨叙述宽容在皇帝下达政令时的重要作用，在我看来，塞内加并没有提到始终保持宽容所必需的清醒与冷静。然而，有个细节很有意思，让人读后觉得出生于西班牙的塞内加比出生于意大利的罗马人更像罗马人。塞内加这样记载讲述同情与宽容的差异：

> 眼之所见而生之精神反应，是谓之为同情，定不顾及产生此种结果之缘由；反之，宽容深究此结果之缘由，才可谓此种精神反应

与知性完美相处于一隙。

得遇良师，尼禄可谓非常幸运。然而，我们都明白教育的成果不在先生的本事，而是取决于学生的资质。话说回来，塞内加的著作可以算是一种“君主论”，但是和1400年后的另一种君主论大不相同。塞内加的“君主论”重在阐述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经拥有的权力，但是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则是系统而冷静地分析如何获取权力并将之牢牢掌握。也可以这样说吧，前者立足于人性本善论，而后者立足于人性本恶论。因此，君主论，也可以称之为领导论，在西方文明历经3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大浪淘沙遗留下来的竟然是后者，非常有意思。

话虽如此，尼禄在塞内加的理论指导下，以“宽容”为自己的口号。尼禄时代铸造的货币上也多次使用“宽容”一词。

尊重元老院的权力是尼禄施政方针演说的第二条要点。实际上“元老院的权力”指的是元老院从共和制时代就拥有的“元老院劝告”立法权。换言之，即以临时措施法（与今美国总统令相似）——限制奥古斯都制定的皇帝权力为前提，使元老院成为最高立法机关。对于这种措施，元老院肯定欣然同意。

说明白点，第三条就是宣示司法的独立。罗马法院的院长由时任法务官担任，由于没有专门的检察官，所以原告或其代理人还必须身兼检察官，维护自身的权力。当然，被告也会委托辩护人。原告和被告双方各自的人证和物证准备充分后开始辩论，最终的裁定权掌握在陪审团手里。

然而，罗马帝国皇帝参与审判，在奥古斯都时代之后变得十分常见，当时的罗马人在法庭上经常能看见皇帝提比略与皇帝克劳狄乌斯的身影。当然，他们俩并非不加挑选地出席任何审判案件，能让他们放下手边政务、拨冗前往倾听的案例几乎都是行省人民对行省总督或者长官

的控告。因为在他们看来，应该避免任职于行省的总督或长官因滥用职权引起的贪污或恐吓行为，这是治理行省人民的最大问题所在。

提比略以严词质问将被告逼到穷途末路，克劳狄乌斯则用翔实可靠的证据让被告百口莫辩。不难想象，陪审团的裁决肯定会在皇帝们如此干涉下受到一定的影响。

按照罗马的规定，要成为陪审团成员必须有一定的资格与财产。因此，实际上陪审团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元老院阶级或骑士阶级，即罗马社会中的“上层”或“中上层”阶级。甚至因滥用职权而被控告的行省总督或长官们，也都是元老院阶级或骑士阶级出身。如此一来，审判就演变成同样背景的人之间的互相审判。这种审判自然会产生弊端——共和制末期，总督们在行省横征暴敛大肆搜刮之后，即使被行省人民揭发，他们依然会逍遥法外。

为了根除弊病，奥古斯都当时想出了一个办法，用他喜欢的称谓“第一公民”这种超越罗马社会各阶层的身份来参与司法审判，并将之制定成为律法固定下来。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自然恪守这种做法。由于皇帝们毫不放松，所以进入元首制时代之后，行省总督滥用职权的情况确实得到有效遏制。追捧共和制的塔西佗甚至也留下这样的感叹：“政治居然会变得如此清澈，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频频驾临法庭，使得这成为罗马特权阶层十分厌恶皇帝的原因。

“第一公民”不会染指司法审判，尼禄这样的信誓旦旦的表白，意味着尼禄与提比略或克劳狄乌斯不同，他不会干涉审判。确保司法独立，不论从什么角度思考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古罗马，这种做法无疑是放任自行裁决做法的死灰复燃。

在第四条施政方针中，尼禄提出私宅与官邸分开。显而易见，尼禄的这个宣言是要纠正克劳狄乌斯的做法，其目的不过是表明他将废除秘书官体制。同第三条一样，这也是为了获得元老院的支持。议员们对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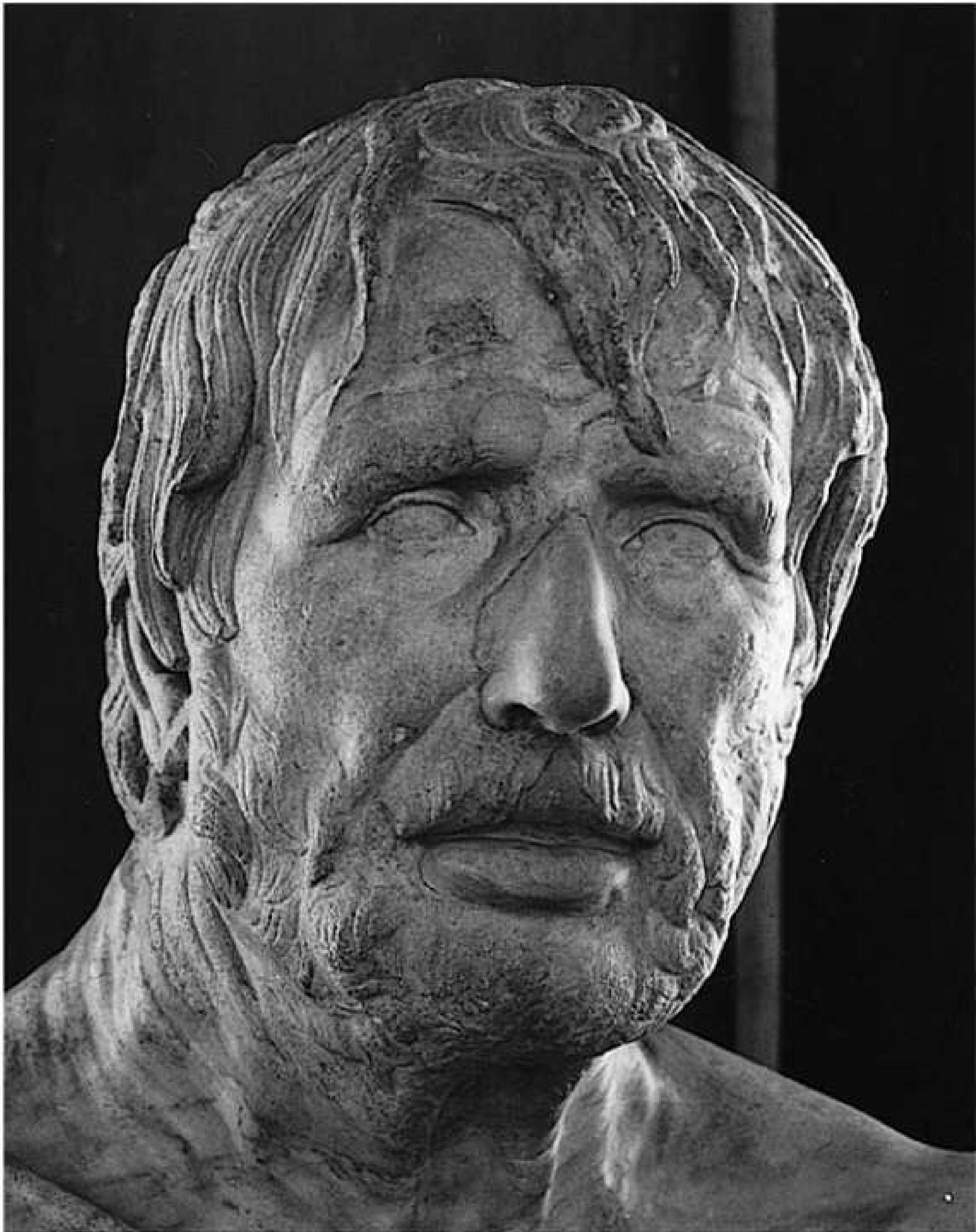
解放奴隶，一贯客套谨慎，但从骨子里根本瞧不起他们。显而易见，议员们对于尼禄表示要废除秘书官体制肯定会拍手称快。

秘书官体制变成辅佐官体制，但是要治理好疆域辽阔的帝国必须有大量的帮手来维系这个系统的运转。所以，与其说尼禄打算废除秘书官体制，倒不如说是将之转变为非正式的幕僚系统更为恰当。这种体制无法像克劳狄乌斯时代那样昭然于世，却同样发挥奥古斯都或提比略时代的辅佐功能。

这么一分析，我们就明白尼禄即位时的施政方针几乎一面倒地偏向元老院。塞内加不仅贵为议员，还是饱学之士，更是一位作家。罗马的元老院不只是单纯的立法机构，也不只是公职要员的人才储备库，而是当下时髦的“媒体”，对这一点，塞内加肯定心知肚明。其实事实也是如此，议员们差不多是罗马历史上唯一从事写作的生力军。此外，从提比略时代开始，元老院会场中讨论的所有议题都会被定期收录为《元老院纪事》（ Acta Senatus），散发到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况且，并不一定非得是“广大群众”，才能发挥“媒体”的影响力。在仰仗考古学之外，身处今天的我们要了解罗马历史也只能依靠这些元老院议员们的论著。作家出身的塞内加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有着非常好的思路，他认为要获得舆论的支持，首先要赢得元老院的支持。

针对曾经富贵显赫如今却贫困潦倒的元老院议员，经由塞内加设想，最后以皇帝尼禄之名提出的法案获得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并得以通过，该法案规定每年发给穷困的议员50万塞斯特斯。这项措施，其发放对象并非所有无法维持生计的贫苦居民，它只对难以维持元老院议员生活水准的议员发放。如果新议员中也有贫困之人，又该如何？通常情况下，进入元老院的财产资格是100万塞斯特斯，所以新任议员中由于没有年金而无法保住元老院议员资格的人应该没有。尼禄得益于这些偏袒元老院的政策，哪怕是他在自杀身亡之后依然得到人们“尼禄之五年良好政绩”的评价。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元老院相当于“媒体”。此外，尤

里乌斯·恺撒也明白元老院的“媒体”功能。恺撒期待推翻由元老院一手主导的政治体制，他的《内战记》一书，原原本本记录了自己推翻“元老院媒体”的这一过程。



塞内加

尼禄宣布对重新施行奥古斯都政治的确抱有很高的积极性，这一点我们不吝于肯定，然而奥古斯都创立的罗马式元首制对执政者的冷静清醒有极高的要求，不是凭借单纯偏袒元老院就可以完成这个“精致的虚构”。饱学之士塞内加是否清楚其中的复杂性？我们暂且不论这些表白有什么样的功效，也不论实行元老院政策的对错与否，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刚继位的尼禄以及辅佐官塞内加执政能力能否经受得住帕提亚王国的考验。公元54年深秋，罗马收到消息，帕提亚军队入侵罗马帝国东方屏障亚美尼亚王国。

强国帕提亚王国

公元前21年，奥古斯都与帕提亚王国签订了和平条约，约定两国的国界定于幼发拉底河，双方盟誓不互动干戈，这一年也即尼禄继任罗马帝国皇帝的74年之前。时年21岁的提比略代表罗马帝国在幼发拉底河中的小岛上与帕提亚王国缔结了和约。

这个条约并非同盟条约，只是相互约定彼此维持友好与和平。成王败寇这样一种观点牢牢扎根于东方人的思维之中，换言之，对于同盟关系他们毫无概念。假设当初恺撒没有遇刺身亡，而是继续率领军队进攻帕提亚的话，很有可能战胜帕提亚进而与之缔结同盟条约。先打败对手，再与之建立关系，这就是罗马人的同盟关系。

奥古斯都在恺撒遇害身亡之后，作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必须面对罗马人的两次耻辱——公元前53年克拉苏军队全军覆没，以及公元前36年安东尼军队远征失败。与帕提亚军队交锋时，罗马军队屡尝败绩。奥古斯都本人也不敢夸口说自己仅凭军事实力可以拿下帕提亚，于是他选择缔结和平条约。当然，这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所谓的同盟关系，就像罗马人所谓的“朋友”（amicus），是自己人。然而，如果只是单纯的和平条约，就是非敌非友，关系暧昧不明。所以，罗马加强了对帕提亚王国北、西、南三面的军事部署，从三面制约帕提亚，提防它拔刀相向。

形成这个包围圈的除了叙利亚行省和埃及等罗马直接统辖的地区之外，还有亚美尼亚、卡帕多西亚，以及诸如在奥古斯都时代形成的犹太国等中小君主国家。上述这些国家都是与罗马帝国缔结了同盟关系的国家，同盟国不必向罗马缴纳行省税，但在罗马出兵时，必须提供兵力，或援助以军粮与武器等等。

当然，无论是哪种系统或体制都并非完美无缺，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弊端和不足。罗马东方防御网唯一的要害，就是与帕提亚王国接壤的亚美尼亚王国。如果不让这个国家成为自己的盟友，那么所谓的帕提亚包围圈根本就无法形成。

然而，正是这个亚美尼亚，卢库鲁斯与庞培率领的罗马军队在共和制末期对亚美尼亚的战争屡战屡胜。卢库鲁斯甚至一度涉足里海海岸。正因为罗马拥有实力超群的军事力量，才使得亚美尼亚可以按罗马的意志选择合适的国王人选，最终推动两国结盟并将关系向纵深方向发展。

可是，从地理位置上看，亚美尼亚比罗马其他东方同盟国更加靠近东方，无论语言、生活习惯还是观念，都属于帕提亚王国称霸下的波斯文明圈，所以波斯人历来把亚美尼亚视为自己的领土也在情理之中。并且，持有这种想法的帕提亚人自信满满，因为罗马人一直都是他们的手下败将。

罗马帝国在这种情势之下的亚美尼亚对策，即帕提亚对策，始终是治标不治本，没有做到彻底根除。在帝国西方世界可以贯彻到底的方案，在东方世界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正因为如此，这个“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才在罗马历史上不断重复上演。虽然罗马帝国的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然而确实可以保证今后几十年的安稳日子。这是因为罗马不仅仅只依靠对话沟通来解决问题，同时也采用一面武力威慑一面用外交手腕来处理的两种手法，才使得这种针尖上的和平得以维系下来。

帕提亚趁机入侵亚美尼亚引发的“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往往是他们认为罗马皇帝在身体衰老或年幼的时候，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公元34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久居卡普里岛的提比略时年75岁高龄。帕提亚武断地认为提比略已经垂垂老矣，头脑亦不甚清醒，所以趁机进攻亚美尼亚。但是，借用某位研究者的形容，提比略是“年岁越高越深不可测”。提比略接到报告后立刻派遣后来成为克劳狄乌斯助手的路奇乌斯·维特里乌斯前往亚美尼亚，向亚美尼亚表明罗马的立场——坚决支持。维特里乌斯是手握重权的东方罗马军队总司令，他当即挥师开往亚美尼亚。这般声势浩大的军事力量就是极好的威慑，所以帕提亚王只能乖乖地从亚美尼亚撤回军队。

公元54年，帕提亚王国又故伎重演，然而从时间来看，距上一次失败仅仅过去20年。这一次他们又轻率地认为年幼的尼禄皇帝刚刚即位，根基未稳，应该没有办法当机立断采取措施。显而易见，帕提亚这次又要铩羽而归。此时罗马帝国还有塞内加坐镇，他并不可怕，但是出身行省的他对于保卫帝国安全怀有极高的热忱，也有积极挑战的勇气。虽然尼禄没有提比略干脆利落，他在“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再度爆发时却表现出了快刀斩乱麻的气概。

起用科尔布罗

面临帕提亚王国的威胁，塞内加在紧急选派东方总司令的人选方面眼光独到。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曾担任低地日耳曼军团团长8

年的时间，是一位统率了4个军团和辅助兵共4万兵力的将军，为莱茵河下游防线的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罗马帝国虽然进入元首制时代，他们在机动防御方面淋漓尽致地使用了主动出击战法。言外之意，他们会不时越过莱茵河袭扰日耳曼人，而非在莱茵河畔苦等敌人上门，以此让他们领教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不敢轻举妄动。之所以这条防线稳固，原因在于科尔布罗的积极战术十分奏效。也正是这位科尔布罗，在施展他的拳脚时也会被掣肘，罗马帝国深入日耳曼地区的军队本该更上一层楼，就在克劳狄乌斯一声令下之后，就遗憾地撤回到莱茵河防线。

科尔布罗这位将领来自南法行省，其身上洋溢着有异于其他战友的特质。科尔布罗麾下的士兵对他爱戴有加，他在敌军中也是赫赫有名。这倒并非出于科尔布罗性格温厚，对谁都亲切温和。与之相反，他是一位以严厉著称的将军。同起用他担任低地日耳曼军团团长的克劳狄乌斯皇帝不同，众人敬畏正是科尔布罗在敌我双方都声望极高的理由。虽然科尔布罗的年龄无从查证，我推算他于公元54年被派遣到东方时大概在55岁上下。放眼这一阶段驻守帝国各处边境的军团长们，除了科尔布罗能够担当奔赴帕提亚前线的重任之外，别无其他合适人选。

然而，没有把所有的权力交给科尔布罗是塞内加的严重失误。公元55年春，科尔布罗离开莱茵河驻地，长途跋涉来到幼发拉底河驻地接受重任。唯恐颜面扫地而被轻视的叙利亚行省总督夸德拉图斯，是科尔布罗见到的第一张丧气脸。

然而，将领之间也经常存在着瞧不起对方的情形，不过，这并没有发展到影响罗马帝国东方政策的地步。由于罗马帝国和帕提亚之间尚未正式开战，科尔布罗的正式职位并非军队的总司令，而是帝国卡帕多西亚与加拉太两个行省的总督。叙利亚总督指挥4个军团，位居罗马帝国驻守东方军队中的首要位置。所以没有设置军团的小亚细亚东部的两个行省总督位居叙利亚总督之后。然而，罗马方面给夸德拉图斯的命令是

要他把手下的4个军团匀出2个给科尔布罗，他负责南部，西边交给科尔布罗，通过两面夹击的战略把帕提亚军队赶出亚美尼亚。塞内加这样的命令，充分暴露出他缺乏军事经验的幼稚与浅薄。

是否进行军事行动，取决于指挥系统是否统一。若是不遵循这个原则，强行推动军事行动的话，注定会走向失败。我想，科尔布罗应该对战场进行了仔细查看了吧。只要冷静耐心观察，肯定会发觉帕提亚国王任命其弟梯里达底成为亚美尼亚王之后，就不再采取任何军事活动了。其实，帕提亚国王沃洛吉斯根本没有和罗马短兵相接的意图，可惜罗马没有丝毫察觉。即使如此，眼下也还没发展到必须即刻出兵的程度。更何况，夸德拉图斯送来的2个军团还未完全准备好出动。

科尔布罗在经过再三思索之后，认为这些士兵要经过训练才可以投入战斗。同时，他希望在军团训练期间，身在罗马的皇帝，其实是塞内加，能够察觉到有必要整合东方地区的指挥系统。

然而，科尔布罗始终未能等来罗马新的战略指向。加之帕提亚军队始终未越过幼发拉底河发动进攻，战场上丝毫体会不到紧张氛围。实际上，另外一件事吸引了尼禄和塞内加的全部注意力，让他们把东方问题抛在了脑后。

反抗母亲

小阿格里皮娜用尽各种手段让儿子尼禄成功登上皇位，想必还处于洋洋得意之中。一切都在小阿格里皮娜的算计内，即使元老院和普通民众对这件事情的起因经过还是觉得疑点重重，可是当克劳狄乌斯因误食蘑菇中毒身亡的消息公之于世之后，他们还是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们甚至没有要求宣读先帝的遗嘱，就认可先帝的养子尼禄而非克劳狄乌斯的亲生儿子不列塔尼库斯继任皇位。小阿格里皮娜以辅佐10余岁的

新皇之名，行统治之实。此刻看来，小阿格里皮娜似乎滴水不漏地实现了她的野心。

实际上，小阿格里皮娜成为皇太后之后，远比当皇后时期更强调自己的存在。小阿格里皮娜不论在什么场合总是出现在尼禄身旁。甚至连元老院的会议，她都下令把场地从罗马广场附近的元老院会场迁到山上的皇宫内。显而易见，这是为了让躲在一边的自己能够听到会议内容而使出了另一个招数。

为了在罗马帝国经济圈中承担基础货币而发行的货币始终保持着面值与成本一致这一特点。与此同时，历代皇帝的头像也会出现在这些货币之上，让普通老百姓知道统治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谁，这就是货币的宣传作用。然而，皇帝更迭并不会导致货币回收，或重新铸造刻有新皇头像的货币。基础货币的目的在于维持信用，只要面值与成本一致，不论货币上是几代前的皇帝，还是共和制时代的货币，都可以在市场上继续流通。这也就是它与现在的纸币最大不同之处。因此，在罗马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头像，都会出现在罗马帝国的货币上持续流通，话虽如此，新皇帝发行的货币也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

对于此次新货币的发行，小阿格里皮娜采用她和儿子面对面的图样。虽然，罗马曾经出现过女性头像的货币，而以女神头像为图案代表罗马国的货币也很多。然而，将皇帝与皇太后以彰显地位平等的面面相对形式，铸在同一枚货币上，这种钱币确实罕见。这种图案的货币还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只剩下金币，却无人敢说流通量超过金币的银币（第纳尔）不会有这种样式。今后可能会在考古过程中发掘到这种银币吧。总而言之，小阿格里皮娜在尼禄继位之后，获得的权势完全符合她的预期。小阿格里皮娜甚至连皇帝的告示都要求使用“奥古斯塔·玛特尔·奥古斯提”（Augusta Mater Augusti，崇高的皇帝之母）这样的字句。

小阿格里皮娜是罗马史上第一个想要掌权的女性，可惜的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尼禄是小阿格里皮娜的亲生儿子，所谓有其母必有其

子，尼禄很可能与她有相同的思维与想法，也有可能效仿她的做法，但是她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母亲想要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儿子也想如此，这很正常。如果认为10多岁的稚儿还没有自立，只能说小阿格里皮娜真的是机关算尽。姑且不论尼禄是否天赋异禀，总之他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饱学之士塞内加的得意门生。更何况，尼禄本身是个头脑精明、天资聪颖的少年皇帝。依照小阿格里皮娜的性格来推测，不难想象，她肯定是每天会对着一个模子出来的儿子说，你这个皇帝是我一手造就的。显而易见，普通家庭中10多岁的男孩与母亲之间经常发生的矛盾，在这对皇室母子之间也经常上演。



尼禄与母亲

尼禄对小阿格里皮娜也渐渐心生不满，事件源于他爱上了一个名叫阿可特的女奴隶，然而小阿格里皮娜对这样的人无疑是鄙视万分。起初，尼禄想尽办法躲过母亲的视线，他还请塞内加帮忙。塞内加并不乐意，然而在尼禄眼泪汪汪的哀求下，塞内加让皇宫近卫军队长的表兄弟阿尼乌斯替阿可特赎身。成为解放奴隶的阿可特假装阿尼乌斯的恋人，塞内加安排其与尼禄相见。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最后还是传到小阿格里皮娜耳中。小阿格里皮娜得知尼禄与这名女奴隶之间的关系后，震怒异常，破口大骂。实际上，让小阿格里皮娜恼火的并非尼禄已娶了屋大维娅却又与别的女人勾三搭四，而是他居然自降身份和一个女奴隶纠缠。所以小阿格里皮娜的语气中充满了恶毒的语言。然而，看不起儿子爱上的女人也就意味着根本没把儿子放在眼中，震怒中的小阿格里皮娜对此毫无意识。

尼禄对母亲小阿格里皮娜表达不满时，塞内加与近卫军团长官布鲁斯不但出谋划策，还积极从旁给予帮助。紧接着，尼禄的反抗行为，是解除了财务部门负责人帕拉斯的职务，他是克劳狄乌斯时代“解放奴隶三人帮”中的一员。尼禄曾经宣布要废除克劳狄乌斯时代的秘书官体制，那么将帕拉斯撤职可谓是名正言顺。纳鲁奇索斯和卡里斯杜斯二人都早已权势尽失，尼禄又怎么不会拔掉帕拉斯这颗眼中钉呢？

然而，小阿格里皮娜之所以有今天，帕拉斯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论是举荐小阿格里皮娜作为克劳狄乌斯的皇后人选，还是协助小阿格里皮娜实行拥立尼禄的计策，他都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显而易见，小阿格里皮娜对于他被撤职有如断腕之痛。为了让帕拉斯甘心卸任，塞内加答应他两个条件：其弟继续担任犹太长官，保障帕拉斯下半生平安。塞内加认为小阿格里皮娜可能会阻止帕拉斯卸任，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瓦解小阿格里皮娜和帕拉斯的同盟关系。不得不从命的帕拉斯灰溜溜地离开了首都罗马，这也彻底激怒了小阿格里皮娜。

小阿格里皮娜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她一下子就冲到了儿子尼禄的房间，根本不管前面有什么人，也不管是否有人在倾听，就一股脑儿地发泄自己的怒气，像洪水一样根本无法停住。

你之所以有今天靠的是谁？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让你成为皇帝？如今你却对我不仁不义，真是枉为人子！难道靠着独臂（暗指失去左手的布鲁斯）与流放犯（暗指塞内加）这两个家

伙，你就天真地以为自己能够管得住这个国家？



小阿格里皮娜

因为我有尤里乌斯家族的血缘，你这个出身并不显赫的阿赫诺巴尔布斯家族的家伙才能成为皇帝！居然连这其中的利害关系都不承认，我看连14岁的不列塔尼库斯都比你更合适，他也不是一个无知的小儿了！我要是带不列塔尼库斯到近卫军营地去，近卫军的士兵一定会顺从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比起你这个鸠占鹊巢的养子，身为克劳狄乌斯嫡子的不列塔尼库斯更有资格继承皇位。你这忘恩负义、不守孝道的家伙，必遭天谴！！！

小阿格里皮娜这番不经头脑思考的臭骂，足以让罗马时代的史学家们兴奋不已。然而，尼禄在此之前只想尽量避免与母亲碰面，彼此相安无事，这番话却让他心生畏惧。像这样的母亲不是发牢骚抱怨几句就完事的，她既然说得出恐怕就真会那样干。正因为这样，这位身体欠佳、才能泛泛、性格平庸而又毫不起眼、可怜万分的不列塔尼库斯的命运已经注定。

虽然一直对塞内加与布鲁斯褒扬有加的史学家们断定，他们肯定没有参与刺杀不列塔尼库斯，然而，我觉得这两个人是帮凶。假设，小阿格里皮娜真的拥立不列塔尼库斯，与尼禄对立的话，依然信仰“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的士兵们很可能会掀起哗变。况且皇帝年少又无子，那么能够强调自己有权继承皇位的就是竞争对手，而非后代。消灭竞争者的唯一办法就是除掉这个人。卡利古拉也曾下令杀害先皇提比略的嫡孙葛梅鲁斯。虽然奥古斯都收留了克娄巴特拉与安东尼的儿子，并把他扶养成人，然而，克娄巴特拉认为是恺撒唯一的亲生儿子小恺撒，也被奥古斯都除掉了。

并没有人以小恺撒之死为借口，去指责奥古斯都，也没有人因为葛梅鲁斯之死，去非难卡利古拉。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不列塔尼库斯死于宿疾——哮喘发作。当然，不列塔尼库斯之死疑点重重，然而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这种说辞。1600年之后，法国剧作家拉辛在17世纪以《不列塔尼库斯》为题创作的悲剧，就是这个事件的写照。

不列塔尼库斯之死对小阿格里皮娜的打击应该比任何人都强烈，她却又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主儿。对她而言，不列塔尼库斯之死的确感到了挫折，当然这并非出于其喜爱不列塔尼库斯这个继子，而是小阿格里皮娜担心失去权势而已。时年40岁的小阿格里皮娜对尼禄开始了报复行动。

首先，小阿格里皮娜策划积累一定的钱财。凭借她的血缘与地位，她通过遗产继承也积累了相当一笔财富。小阿格里皮娜将原本由经纪人代为管理的私有土地、投资悉数进行了置卖。

其次，小阿格里皮娜将筹措到的资金全部交给驻守莱茵河的日耳曼军团。当克劳狄乌斯还在位时，小阿格里皮娜就以今天的科隆是其出生地为由，将这座城市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接着迁入退役士兵，让这个城市变成殖民城市。小阿格里皮娜大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她之所以投入重金，就是为了让这个以自己之名命名的城市名副其实地罗马化。然而，小阿格里皮娜真正的目的是要拉拢驻守莱茵河防线的士兵。只要能把7个军团共4.2万名士兵的这支精锐之师收为己用，没有人能够阻挡她的野心。虽然小阿格里皮娜远居深宫，却开始与驻守莱茵河的军团长官们暗度陈仓。

再次，小阿格里皮娜开始同自己的儿媳交好。屋大维娅得不到丈夫的欢心，其弟不列塔尼库斯又英年早逝，因此整天郁郁寡欢。小阿格里皮娜就安慰她，拉近和媳妇的关系。屋大维娅朴实无华，为人低调，罗马民众对她有着深深的同情与敬爱。相反，小阿格里皮娜在百姓中间风评不佳，如果她能和屋大维娅拉近距离，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对她的不好评价。

尼禄不愧是有其母亲的风范，根本不会让小阿格里皮娜有任何得逞的机会。尼禄首先调开母亲身边的护卫，即让她从高高在上的“崇高的皇帝之母”变成一个普通人。接下来，尼禄又把她赶出皇宫。如此一来，小阿格里皮娜虽然住在帕拉蒂尼山上，但是她只能搬到外祖母安东

尼娅生前的住所。与此同时，尼禄把小阿格里皮娜的名字从各类邀请名单中去掉，使得她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机会骤然减少。此外，对小阿格里皮娜痛恨万分的尼禄更是变本加厉，尽干一些曾经会招致母亲批评指责的事情。

尼禄的玩伴大多和他同龄，他呼朋引伴，整夜带着他们在罗马城里溜达闲逛。外出时，他们都会乔装打扮成普通人，让别人看不出来他们的身份。这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到了城里简直如鱼得水，胆大妄为。有一次因为他们闹腾得太过火，接到居民投诉的警察赶来调解，结果他们居然和一队警察当街动武。当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制伏了这群年轻人，队长猛然惊觉皇帝也在其中，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才被无罪释放。不过，据说次日一早出席元老院会议时，尼禄脸上挨揍的伤痕还依稀可见。

然而，在塞内加与布鲁斯看来，年轻人有发泄的必要，所以尼禄眼下淤青未消地出现在元老院他们也没有过问。尼禄年方17岁，正是爱玩的年纪。

儿子尼禄继位不到一年，小阿格里皮娜的影响力完全丧失了。为了削弱小阿格里皮娜的权力，正是在塞内加与布鲁斯的鼎力支持下，年方17岁的尼禄才能做得如此周密。

当然，小阿格里皮娜不会甘心认输，也没有就此罢休。小阿格里皮娜加紧了筹措资金的步伐，也继续与驻守莱茵河的士兵们密切联系。如今，小阿格里皮娜还是屋大维娅的头号保护者。此外，小阿格里皮娜开始撰写回忆录，记录过去的点点滴滴。据说历史学家塔西佗曾经据此为考，虽然这部回忆录现在已经彻底散佚，但在历史上应该确实存在过。小阿格里皮娜在能够著书的罗马女性中算是一朵奇葩。然而，对于羽翼日益丰满的儿子而言，这样的母亲确实让人头疼。

统治之初

然而，正当这位少年皇帝四处展现其活力之际，攸关罗马帝国今后发展的重要决策，正在元老院激烈讨论着，并且得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

讨论的议题之一即是解放奴隶问题。元老院议员们已经对克劳狄乌斯时代“解放奴隶三人帮”的活跃极为不满，尼禄宣布废除秘书官体制并不能让他们感到完全称心，他们强烈要求大力管制解放奴隶的社会地位。具体而言，有议员提议，获得自由成为“解放奴隶”者一旦违法，应当让其恢复奴隶身份，并建议立法予以确定。

对于这样的提案，当然有议员持反对意见，反对派议员的理由如下：

如果仅仅从个别解放奴隶的例子来看，已经获得自由、甚至得到罗马公民权的解放奴隶之中，确实有人不配拥有这种待遇。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例子就立法限制所有奴隶，这与因噎废食有何不同，这种提案显然是不对的。解放奴隶在罗马社会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是不争的事实，罗马社会中、下层的重要成员也有他们的一分子。自尤里乌斯·恺撒开始积极实行解放奴隶政策至今已过百年，这项政策几乎成为罗马的传统。派驻行省工作的事务幕僚，首都的下层公务官员，意大利本土地方政府的管理层、实际负责祭典的工作人员、消防军、警察等等都是解放奴隶。甚至今天跻身于元老院阶级或骑士阶级的议员，他们的祖先出身于解放奴隶的也不在少数。

按照罗马的传统，拥有罗马公民权有两种类型：拥有选举权的“罗马公民权”和没有选举权的“拉丁公民权”。同样，解放奴隶也分两种类型：一类是法律许可解放奴隶，他们获得自由后与原主人没有任何关系；另一类是私人许可解放奴隶，他们获得自由后依然留在主人家中。

私人许可解放奴隶可以转化为法律许可奴隶。私人解放奴隶是否符合罗马公民身份的表现，是判断其能否转化的唯一标准。

因此，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判断“自由”（libertus）这一公益的利弊，应当遵循先例依据个案进行区别处理，而非制定法律一概而论。

这次会议尼禄也出席了，辩论的结果是大多数议员赞同后者的意见。容许失败者东山再起的国家，正是国家机能充分发挥的表现，罗马帝国拥有这种气度。

然而，元老院议员承认解放奴隶拥有人权，却并不承认奴隶的人权。自古以来，罗马就明文规定，如果奴隶弑主将实行连坐，同一屋檐下的奴隶都会被问罪，不仅仅是凶手一个人会被处以死刑，所有奴隶都会被处死。然而，由于很长时间都没有动用这条法律，所以通常情况下只有凶手被处死。

就在元老院讨论解放奴隶议题之际，负责首都罗马警卫的一位长官死在了家中奴隶的刀下。这位被杀害的谢肯图斯家中有400名奴隶。普通罗马公民游行，认为处死所有奴隶不符合时代精神。然而，元老院态度十分强硬，拒绝让步。如若法律不符合当下的时代，只要加以修改使用新法，旧法自然就遭到了摒弃。但是，这些属于上层阶级的议员家中拥有成百上千的奴隶，元老院出于这种担心拒绝修订法律。

虽说尼禄有地位与权力插手此事，然而他没有染指此事。塞内加也不愿推动法律修正。因为尼禄即位时宣布要“尊重元老院的权力”，他们要遵守当初的诺言。在罗马公民泪眼相送之下，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400名奴隶全部被处以极刑。稍稍值得欣慰的是，从那以后类似事件几乎再也没有发生过。不过，这是由于奴隶们再次深深体认到连坐的可怕，还是法律的适用范围变得灵活，抑或是皇帝开始干预，各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公元57年，也即这个案子发生之后的第二年，尼禄再次当选为两名执政官之一。这也是继公元55年之后，尼禄第二次成功当选。罗马传统的资格年龄是43岁，元老院选择10多岁的年轻人担任这一要职，充分表明元老院迫切希望尼禄当选。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而是希望借此限制皇帝的权力。执政官是罗马最高官职，让尼禄出任这一职务意味着把“第一公民”这种非正式的皇帝职位融入罗马的共和制体系中。

此前我已经提到，由奥古斯都创设的罗马式元首制可谓是“精致的虚构”政体。用更为严密的话来解释，“皇帝”仅仅是罗马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或者说将士们效忠的对象，对于普通公民而言，他们不用宣誓效忠“皇帝”。议员如若担任军职，则有宣誓效忠“皇帝”的义务，然而如若没有担任任何职务，只是普通的议员的话，他则不用宣誓效忠“第一公民”或“皇帝”，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从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简称“SPQR”（元老院与罗马公民）可以看出，元老院与公民才是罗马权力的来源，而“第一公民”仅仅是罗马公民中的“第一个人”而已，并没有其他的含义。

话虽如此，可是“第一公民”为何可以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呢？这是因为“第一公民”拥有以下权力：

“最高司令官”——拥有强大的军事权力，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调动军团兵加上辅助兵共计30万人的庞大军队。

“护民官特权”——罗马共和制时代设立的护民官是为了保护平民的权利，然而《霍滕修斯法》又规定，只要公民大会通过的法案，哪怕是在元老院遭到否决，也同样可以上升为法律。由此可见，护民官拥有了可以执行与元老院不同意见的特殊权力。此外，议员通过的所有决策，哪怕是高票通过，护民官还可以行使否决权，让所有的法律变成一纸空文。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当今社会，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俄罗斯这五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并非作为常任理事国才拥有权力，关键在于他们拥有否决权，即现代拉丁文中也用到的“VETO”。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形同虚设，也即否决权所向披靡。

“大祭司”——拥有罗马宗教界的最高地位，罗马帝国规定的祭祀日期，由他主持祭祀大典。

“国父”——是在受罗马公民们的委托之后，元老院授予的一项尊称。虽然提比略再三拒绝这一称号，在我看来，这种拒绝其实是得不偿失。因为，尤里乌斯·恺撒与奥古斯都欣然领受这个尊称，这一称谓是超越元老院阶级与普通民众等罗马社会各阶层的全体国民之“父”。每一位国民在公正而优秀的“父亲”带领之下，才能安心地各司其职，完成自己的义务。在罗马帝国，身处家族最高地位，就会拥有非常强大的“家父长权”（家长权），所以“国父”的言外之意就是国家中最大的家长。

因此，“最高司令官”、“护民官特权”、“大祭司”与“国父”都是共和制时代就存在的职位与尊称，这一切都是有法可依的。然而，依据罗马的法律，当所有“合法”权力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就变成“非法”的最高权力者。即使这样，罗马仍然用只表示公民“第一人”的“princeps”来称呼，显而易见，没有比这更具欺骗性的叫法了。把罗马帝国置于一人之下，是奥古斯都认为最现实的统治模式，因此，要达成这种设想唯有依靠“精致的虚构”。

元老院本身就是所谓的合法机构，对于其中的非法性自然是心知肚明，要让“第一公民”担任执政官，使其受到元老院的监督，是把不合法转化为合法的最好手段。

在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奥古斯都统治的40年里，他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兼任着执政官。而第二任皇帝提比略统治了23年里，备受元老院非难，原因在于其出任执政官仅有3次。虽然第三任皇帝卡利古拉统治

时间极短，但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4次担任执政官。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在位13年，兼任执政官总共有5年的时间。显而易见，罗马帝国几任皇帝都经历了“精致的虚构”台面下的交锋，对此深有感触。而新任皇帝仅仅是一位10多岁的少年，按照元老院的盘算，让其担任执政官易如反掌。身为议员的塞内加对个中原委自然是心知肚明。

在你来我往的“攻防战”之中，为了让形势对自己有利，双方都是花招频出，彼此试探。公元58年，元老院通过决议，让年满20岁的尼禄担任“终身执政官”。果不其然，尼禄不想被纳入体制之下，予以严词拒绝。至于尼禄拒绝是纯粹出于自己的思考，还是塞内加的怂恿，我们无从查考。在这件事情之后，尼禄此后一改以往向元老院倾斜的态度，对于元首制则是欣赏不已。

首先，尼禄考虑到普通公民阶级历来与元老院阶级对立这一点，以自己的名义赠与每个平民400塞斯特斯，作为拉拢民心的举措。

随后，恺撒时代开始的退役士兵的安置政策，被尼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允许安置地点改为意大利本土。此外，他还勇于打破陈规，从士兵们的愿望出发，并非以整个军团为出发点，让他们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这种安置政策，对于退役士兵们而言，也意味着可以重新回到故乡。当然，这样做的目的也有为了避免本土人口流失的现象，另一个目的在于期望退役士兵们在故乡获得土地之后，能够全心全意地拥护尼禄这位政策制定者。因此，这项措施还有另一层含义，以罗马人为主的军团兵，向行省进行殖民促进其罗马化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经济政策

罗马帝国的各种政策的调整，肯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变革。为了弥补“艾拉留姆”（Erarium，元老院行省税）出现的空缺，尼禄

从“费斯库斯”（Fiscus，皇帝行省税）中拨出4000万塞斯特斯用以弥补。尼禄通过这种“融资”方式，成功地整合了原本一分为二的国库，当然，要完成这种合并，必须在另一个国库出现赤字时最有利于操作。

因此，这两种税收原本一致。不论是作为直接税的行省税，还是作为间接税的关税等其他税种，在皇帝行省与元老院行省都大同小异。为了避免与元老院形成对立关系，奥古斯都处心积虑地将税收分开，分别称之为“Fiscus”与“Erarium”。元老院中的议员们互相推选产生总督，负责元老院行省治理，而皇帝行省总督或其他官员则由皇帝亲自任命。行省既然分为元老院行省与皇帝行省，那么从行省征收到的税款自然是前者由元老院支配，后者由皇帝支配。奥古斯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瞒天过海，化解了元老院的不满，成功将罗马帝国的政治模式转化为“第一公民统治”。

正如《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所述，“皇帝行省”与“元老院行省”的差别在于是否有必要常驻军团。通常情况下派驻军团是为了防御外敌入侵，抵御强敌帕提亚王国的叙利亚行省除外，大多数皇帝行省都位于罗马帝国的边关地区，十分落后。然而，反观元老院行省，大多是经济发达的城市与地区，罗马化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当奥古斯都开始施行这套税制之际，皇帝行省经常是入不敷出，也经常使用“Erarium”来填补“Fiscus”不足造成的皇帝行省税的亏空。

这种经济差距随着政局稳定以及基础建设的不断推进日益拉近。直至奥古斯都一个世纪之后的尼禄时代，皇帝行省的经济实力已经发展到与元老院行省不分伯仲的程度。实际上还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尼禄命令元老院行省总督尽量压缩开支，这当然不是元老院行省经济下降的缘故，而是因为皇帝行省经济增长较快。流动性强的狩猎民族在经济上要劣于流动性弱的农耕民族，由于不用担心敌人入侵，皇帝行省的农耕民族安心劳作，税收也随着生产的增加而水涨船高。

显而易见，所谓的统一国库，尼禄无非是把“Erarium”纳

入“Fiscus”内，这种改革加强了皇帝的权力，因为就连税收也由皇帝控制了。

谈到尼禄时代的经济政策，其在位14年间推动了三大改革：第一项改革正是前文所述的统一国库；第二项是提出全面废除间接税的议案；第三项是进行货币改革。其实第三大改革说是修订更为贴切，我想在实施这项改革的公元64年再加以叙述，大家更容易理解，因而在此暂且略去不表。我们先来看尼禄于统一国库次年提出的全面废除间接税的事例。

在此，我们先谈这些改革的结局的话，即使是尼禄在罗马社会怨声载道下选择自杀之后，第一项与第三项改革依然继续实行；只有第二项改革，甫一提出就遭到元老院的激烈反对，核心内容几乎被全数剔除之后才勉强过关。正因为如此，通过这个事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端倪，在全面废除间接税等相关议题上，尼禄与元老院的想法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有必要讨论第二项改革。

公元58年，虽然时年20岁的尼禄继续担任执政官，他却拒绝了元老院授予的终身执政官头衔。虽然元老院的400位议员每一位都比他年长，然而作为议长，尼禄还是宣布召开元老院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尼禄提出了全面废除间接税的提案。

正如在《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表格，罗马帝国的罗马公民和行省人民都有缴纳间接税的义务。在这一类税收中，以宝石、丝绸和香料为主的奢侈品，从东方地区进口会征收25%的关税，此外，还有5%的一般关税与1%的营业税。奥古斯都制定这种税制之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可以享受减税政策，部分皇帝行省甚至可以享受1.5%或2%的优惠关税，然而，当时罗马帝国本土及其他地区的关税高达5%。

元老院对于尼禄统一国库的提案几乎没有任何异议，由此可以判断

皇帝行省与元老院行省之间的税收在尼禄时代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当然，这也可以视为皇帝行省经济实力提升的标志之一，更进一步而言，皇帝行省的优惠关税政策大概也取消了。虽然缺乏证明优惠关税取消的历史文献，然而就在尼禄提议全面废止关税之际，议员们的发言中除了“二十分之一税”之外，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税收的字眼。随着皇帝行省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我们可以判断关税应当统一为5%，当然东方进口的奢侈品另当别论。

奥古斯都实行的税制改革

	罗马公民	非罗马公民（行省人民）
直接税	没有直接的收入税 解放奴隶税5% 遗产税5%	地租税或行省税 税率为收入的10% （服兵役的行省人民免直接税）
间接税	关税1.5%—5%（从东方进口的奢侈品征收25%关税） 营业税1%	

而废除这5%的关税，正是尼禄提案的核心内容，他的理由是废除关税会进一步促进贸易，进而提高经济实力，最终使得占据大头行省税的“什一税”增加。

对于尼禄的提案，议员们当然不赞同这种荒唐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拥有罗马公民权的罗马公民根本没有缴纳行省税的义务。如若废除关税，他们更不用缴纳关税，从而引发了帝国财政危机。在议员们认为，废除关税可能增加行省的税收目前只是推测而已，是否行之有效不得而知。更何况废除关税期间替代关税的钱从哪里来？恐怕只有通过提高行省税率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很可能演变成影响帝国统治上的危机，进而危及帝国的治理与发展。

在当时的历史文献基础之上，如今有部分研究者经过计算，如果废除关税，会导致罗马帝国国库约1亿塞斯特斯的损失，约占总收入的十五分之一。这种乐观的推测是否符合事实另当别论，如何先想办法把废除关税带来的空缺填补上，才是当时元老院更为关注的焦点。然而，尼禄似乎是个积极经济论者，他根本就不担心这种缺口。

尼禄亲自提议废除关税，并希望元老院予以通过将之上升为法律。可是，如果直接投票表决的话，肯定会被元老院挡下来，这样一来身为皇帝的尼禄也肯定会颜面尽失。于是，有议员提出修正案，内容是废除事关“粮食安全”的必需品小麦的“二十分之一税”，万般无奈之下，尼禄也只好接受。

议员们亲自否定了尼禄关于废除关税的提案，虽然表面上是在一本正经地讨论，然而内心深处，他们其实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20岁的年轻人。因为不久前尼禄曾对议员们乱下指令，使得议员们怨声载道。

罗马是全国唯一拥有大型角斗场的地方，卡利古拉皇帝专程命人从埃及运来25米高的方尖碑，仿照罗马样式兴建了一座私人角斗场，这座角斗场位于台伯河西岸的梵谛卡努斯（Vaticanus，今梵蒂冈Vatican）。尼禄下令加以改装，并开放为公民们的娱乐场所。

正是在卡利古拉兴建的这个角斗场，尼禄举办了一场类似今天田径比赛的体育竞赛。此外，他还命令罗马上流社会的元老院阶级与骑士阶级的男人到场中进行比赛，然后邀请普通罗马公民入场观看。

这些议员如果穿着托加的话，即使膀大腰圆也不会太过突出，有时甚至象征着崇高的社会地位，让人觉得稳重可靠。他们沐浴或按摩放松时肯定会脱掉衣衫，然而只有服侍他们的仆从奴隶看到他们的赤裸上身。尼禄命令他们在角斗场上裸露上半身，接受观众席上普通民众眼光的打量评判，根本就是一件让人羞辱的事情。这还不算完，这些议员在

青年时期就早已荒废了运动，然而尼禄居然要求他们跑步与跳跃。与希腊人不同，在罗马人看来，体育只是青少年用来锻炼身体的手段，绝非这些心怀国家社稷的议员们该做的事，这根本与他们的身份不符。然而，议员们虽心怀不满，也只得依从了皇帝的命令。

不用说，罗马公民们肯定兴高采烈地来看热闹。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让国会议员、高级幕僚或者财经界的大佬们赤裸上身参加田径比赛，各大媒体肯定会连篇累牍大肆报导。甚至连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也会不惜掏腰包去看热闹。说不定罗马公民们还会拍手称赞小尼禄真有能耐。这不是明摆着揭人短处吗，议员们不喜欢这飞扬跋扈的年轻人也就不足为怪。然而，与此同时，一位只有成熟男人才能完成的丰功伟业，正在远离罗马帝国千里之遥的东方前线上演。

亚美尼亚战线

赶走篡位的帕提亚王之弟，让亚美尼亚王国重回罗马帝国的掌控之下，科尔布罗正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到了亚美尼亚前线。然而，令他失望的是，望眼欲穿也未能等到从罗马传来改变战略的任何消息。罗马军队同帕提亚对峙的指挥系统依然没有统一，直到与帕提亚王谈判休战，他与叙利亚总督夸德拉图斯还是维持着互不隶属的状态，抵抗帕提亚的兵力也是两人各自领军。虽然夸德拉图斯碍于尼禄的命令不得已分给科尔布罗2个军团，再加上从驻守多瑙河中游的米西亚抽调的1个军团，共1.8万名士兵构成了科尔布罗的主要战斗力量。此外，虽然米西亚军团还有6000名辅助兵，加上同盟国的援助以及行省人民的志愿兵加入，这部分兵力不超过1万人。把上述兵力相加也仅仅有3.4万人上下。加之叙利亚行省派来的2个军团根本无法上战场，所以，在科尔布罗看来，罗马帝国在亚美尼亚前线的兵力根本就不是帕提亚的对手。

帕提亚王国可以算做罗马帝国唯一的假想敌，虽然叙利亚行省是与

之对峙的前沿阵地，经济十分发达，但仍然属于由皇帝直接管辖的“皇帝行省”。长期驻守叙利亚的4个军团，是罗马帝国在东方地区唯一的军事存在，更肩负着保卫帝国东方安全与稳定的重任。

驻守在莱茵河、多瑙河及不列颠，或北非沙漠的罗马军团同样以护卫帝国边界为首要任务，然而，他们所面临的敌人中除了部族酋长之外，普通居民都还是身穿兽皮的野蛮人。由于这些防线地处边境，驻守在这些地区的生活十分艰苦。此外，同文明国家的军队相比，蛮族的动向更加捉摸不透，所以这些地区的防御军队精神始终处在高度紧张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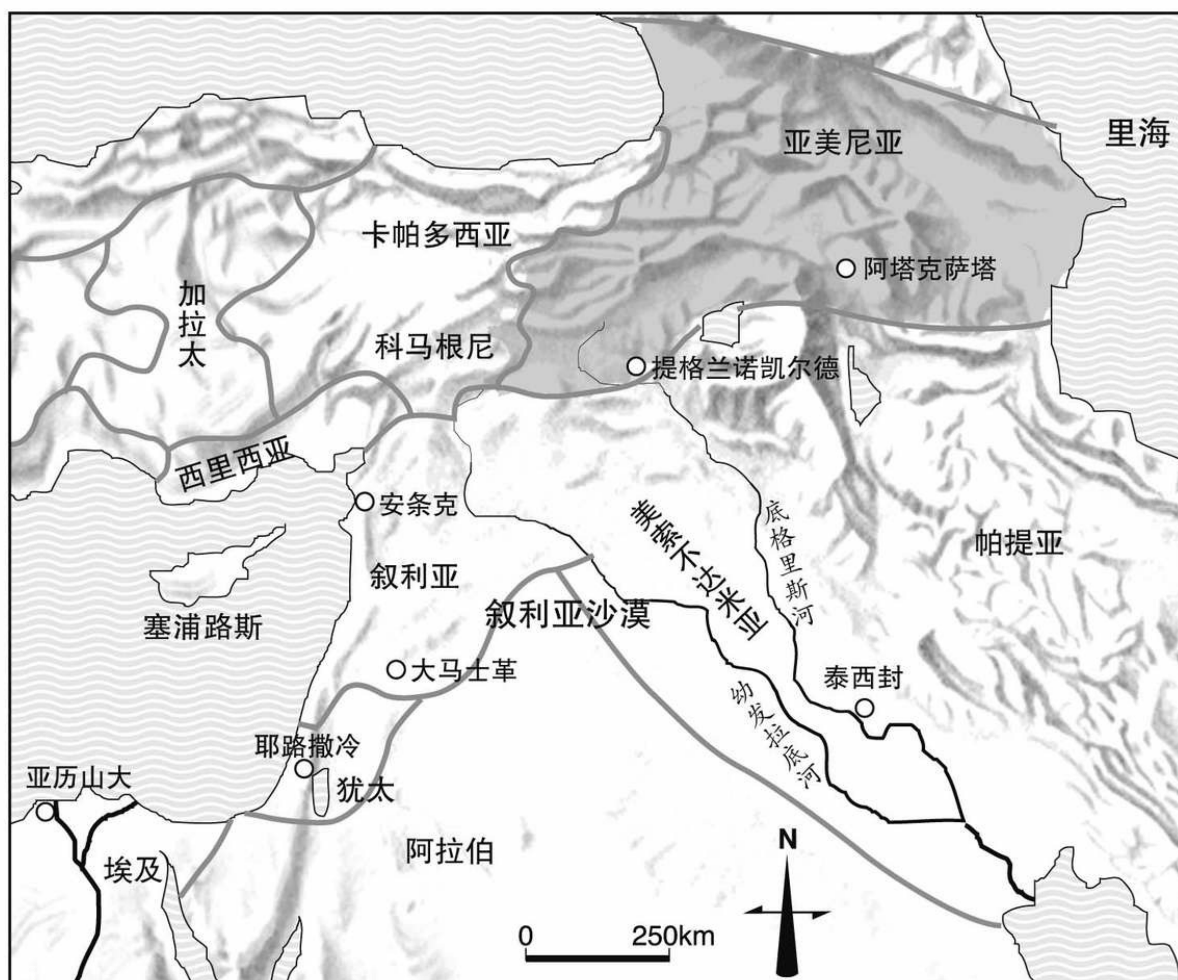
然而，叙利亚的情况与上述边境地区不同。当时罗马帝国有三大都市，分别是号称世界之都的罗马、埃及的亚历山大与叙利亚的安条克。亚历山大是托勒密王朝的首都，安条克也是塞琉古王朝的首都。此外，叙利亚“边境”的特色，是当地居民一直与国界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居民有着非常频繁的贸易往来，从而使得叙利亚十分繁荣。尽管两国敌对，但这并不会妨害到普通人之间的交流，他们只是生意伙伴，只有对方入侵之时才会暂时变成“敌手”。此外，4个罗马军团的驻地就设在繁华的安条克这个商业气氛浓郁的城市。由于叙利亚的“和平”氛围十分浓厚，前后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当地的罗马军团都不想打仗，居然出现了部分士兵与本地人合伙经商的例子。

叙利亚总督夸德拉图斯虽然长年担任叙利亚总督，但已经步入了老年。而时年50多岁的科尔布罗正是功勋卓著的将军，刚刚抵达边境就无法忍受当地的环境。科尔布罗的原驻防地位于莱茵河防线中部，属于地理与气候都十分糟糕的低地日耳曼，那里不仅要警惕从莱茵河中游到河口地区的陆地敌人，还要提防对手渡海而来。然而，科尔布罗刚一上任，就感觉到了东西方虽然有着质的差别，在艰苦环境方面却是难分伯仲。小亚细亚到亚美尼亚之间是绵延的陡峭山脉，从叙利亚往东到幼发拉底河之间是如同大海般一望无际的沙漠，它们都摆在了科尔布罗眼

前。

科尔布罗出身南法行省，但他的作风极似古罗马时代的将军。由于驻守安条克的两个罗马军团士兵早已过惯了大城市生活，科尔布罗到达叙利亚之后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禁止士兵们在屋檐下睡觉。这样一来，士兵们不得不从军营中搬到帐篷内居住。与此同时，他以身体条件为由，命令不适合军务的士兵与即将退役的士兵免除差役，把他们调整到类似今天的后勤岗位。按规定，罗马军团兵役年龄是17至45岁，即使是老兵年龄上限也不会超过45岁。然而，此项规定并不适用于百人队队长以上的指挥官，而只适用于普通的士兵。

经过一番工作之后，科尔布罗终于完成了这两个军团士兵的选拔。加之，一个驻守多瑙河防御前线的军团也从米西亚行省移师过来。与此同时，罗马盟国派出的援助部队也抵达了叙利亚。自古以来，罗马就有与盟国协同作战的传统，其主力是称为军团兵的重装步兵，所以同盟国派来的参战兵力只是骑兵、弓箭手等一类轻装步兵。由于科尔布罗将不适合作战的士兵调换之后，出现了人员空缺，有传闻科尔布罗选用了卡帕多西亚与加拉太的农民来填补空缺。总而言之，士兵人数要远远少于皇帝拨给他的3.4万人。科尔布罗在低地日耳曼军团时曾经指挥了4个军团加上辅助兵近5万人的兵力。然而，也不知道罗马帝国的指挥系统出了什么问题，科尔布罗在抵御强国帕提亚的前线时，手中的兵力居然比与日耳曼人作战时还少。如若是恺撒，他肯定会自己筹款招募新兵，整编队伍，及早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然而今非昔比，当下的时局已不允许这种共和制时代的模式。眼下，皇帝与手下的军团长们等级早已固定了下来，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能扩充兵力。所以，除了有效地利用手中的兵力之外，科尔布罗别无他法。



亚美尼亚及其周边

公元57年，尼禄与元老院之间的“攻防战”逐渐向有利于战局的形势迈进了一步。就在公元57至58年的这个冬季，科尔布罗率军来到险峻的山区进行严苛的军事训练。当然，不是所有地形和气候恶劣之所都可以作为训练场地，科尔布罗选择在小亚细亚东边与亚美尼亚接壤的边境山区进行训练。这种选择除了可以向亚美尼亚人进行军事恐吓之外，还能让训练有素的士兵随时攻入亚美尼亚，可谓一举两得。

科尔布罗选择的训练营地位于海拔2000米左右的高原上，搭建帐篷必须先凿开冻结在地表的冰块。然而，寒冷的天气使士兵接二连三地被冻伤，甚至有人在夜间巡逻时被冻死。罗马军装的特点在于手脚暴露在

外面，士兵们就穿着这种军装在凛冽刺骨的冰雪寒风中进行训练，而科尔布罗本人也穿着这种军装四处巡视士兵。许多罗马士兵不堪忍受这种严苛的环境，当了逃兵，原本经过筛选的队伍再次缩减。

虽然科尔布罗身材魁梧、沉默寡言，但他并不是一个粗鲁蛮横的将军。然而，只要士兵们一见到科尔布罗的头发在寒风中飘扬，他周围的氛围瞬间有如凝固了一般。虽然迟到两次在其他军团算不上什么，然而科尔布罗规定迟到一次就要进行严厉的处罚。对于弃旗逃跑的士兵则就地正法。如此严酷的训练之下，逃兵现象时有发生，其他军团对归队的逃兵不计前嫌，然而，科尔布罗军团的逃兵即使回来也难逃一死。正是在这种近乎疯狂的训练之下，在次年初春，这些原本在安条克堕落不堪的罗马士兵精神焕发，摇身一变成为帝国最精锐的部队。



罗马的军装

早在公元54年底科尔布罗就被派往东方。公元58年5月，此时可以说是他蛰伏3年多等来的天赐良机。科尔布罗命令士兵们拔营，挥师进入亚美尼亚境内，然而他并非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将军。

与刚刚登基的帕提亚王谈判停战，叙利亚行省总督夸德拉图斯派出的是一位下级军官负责谈判，而科尔布罗却派出一位高级军官负责谈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尔布罗非常懂得从对方的角度出发，进而达成停战的目的。科尔布罗进入亚美尼亚时没有立刻发动进攻，他一马当先走在军队前列，在脑海里出现两种达成目的的方式——选择开战，或选择谈判。

虽然罗马帝国将亚美尼亚王国纳入统治之下，然而受地缘文明差异的影响，其国内始终存在着亲罗马派与亲帕提亚派，并进行着拉锯战。帕提亚王之弟继承亚美尼亚王位以来，亲帕提亚派的势力自然盖过亲罗马派。科尔布罗率军挺进亚美尼亚，无异于孤军深入。在科尔布罗看来，他手上不足3万人的兵力很可能遭遇帕提亚与亚美尼亚的联合夹击。所以在帕提亚军队出兵之前，科尔布罗希望能与亚美尼亚新王——帕提亚王之弟梯里达底进行谈判，尽快达到战略目的。

经过几次彼此试探的小规模战斗之后，科尔布罗派遣使节求见梯里达底，恳求直接会面。然而可惜的是，科尔布罗的期待终究落空。年轻的亚美尼亚王梯里达底虽然暂时接受了会谈的要求，可是关键时刻仍举棋不定。为了打破僵局，科尔布罗将事先写好的提议递交给梯里达底。为了减少军团长的束缚，罗马一直有将空白的委任书交给被派到前线负责战事的总司令的传统，然而科尔布罗的提议可谓胆大包天。

待在东方的3年里，科尔布罗丝毫没有荒废这段宝贵的时间，他一直打探帕提亚王夺回亚美尼亚皇位的真正缘由，最终找到了答案。

公元51年，沃洛吉斯继承帕提亚皇位，然而他并非先皇的嫡子。其弟梯里达底却是先皇后之子。梯里达底生性敦厚老实，把帕提亚皇位让

给了沃洛吉斯。沃洛吉斯深受感动，觉得自己有责任替弟弟寻找一个新的落脚点，思来想去，只有亚美尼亚皇位最适合梯里达底。公元52年，也即沃洛吉斯继位后的第2年，帕提亚出兵亚美尼亚，此时罗马支持的国王仍然在位。时逢克劳狄乌斯任命的叙利亚总督及早作好了应战准备，帕提亚军队又遇到严冬的影响，所以撤军之后就没有任何动静。

帕提亚军队一旦察觉罗马军队的防御漏洞，通常不会轻易放过。而克劳狄乌斯驾崩与尼禄皇帝继位之初，正是天赐良机。公元54年，帕提亚军队再度举兵，并且成功占领了亚美尼亚，将体弱多病又饱受百姓诟病的国王赶出了亚美尼亚，并成功地让梯里达底当上了亚美尼亚王。

科尔布罗在弄清楚了个中原委之后，却发现手中无牌可出，因为罗马方面实在没有可以让他们凭借军事力量拥立为王的合适人选。再者，对于沃洛吉斯本人而言，也没有与罗马军队作战的计划，只是想保住梯里达底的亚美尼亚皇位而已。对于这一点，科尔布罗十分清楚。

那么，科尔布罗究竟向沃洛吉斯及其弟梯里达底提出了什么建议呢？下面是提议的主要内容：

> 科尔布罗将向罗马帝国皇帝禀告，请求尼禄承认梯里达底的亚美尼亚皇位，作为交换，梯里达底必须承认罗马帝国的霸权，把亚美尼亚的皇位视为罗马皇帝的封赏。

将皇位视为罗马的封赏收下，意味着承认罗马霸权，科尔布罗深知，在东方人的观念中这意味着臣服。科尔布罗还告诉沃洛吉斯，若是帕提亚愿意舍名求实，那么罗马帝国也存在舍实求名的可能性。

罗马帝国的亚美尼亚政策，如若从卢库鲁斯远征和庞培称霸开始算起，实际上已经持续了120余年的历史，然而这个提案可谓是颠覆性的大胆构想。在我看来，让一个深受罗马文化熏陶并且深爱罗马文化的王

子一直待在亚美尼亚皇位上，面临着重重困难。在当地仔细观察之后，科尔布罗应该明白了这一点。

然而，现在看来我们会认为这项提议实在是有先见之明，可在当时并未变成现实。沃洛吉斯根本无法容忍自己的弟弟梯里达底成为罗马的附庸，作为帕提亚人，他有着非常强烈的自尊。再者，如若点头答应了，肯定会引起帕提亚国内的强烈反对，进而影响到他的皇位。科尔布罗在收到沃洛吉斯拒绝的答复之后，只能通过武力解决亚美尼亚问题了。

科尔布罗命令所有的士兵往东北方向开拔，目标直指亚美尼亚首都阿塔克萨塔。至此，上至军团长，下至士兵，目标都已经很清晰了。

攻占首都

阿塔克萨塔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也即原苏联最南边的一处地方，现在只是生活着很多亚美尼亚人的一个小村庄。令人难以想象，2000年前这里是亚美尼亚王国繁华的首都。

罗马军队并非长驱直入径直攻进阿塔克萨塔。科尔布罗在行军途中把部队化整为零，每个分队分别安排了进攻目标，即沿路上的各个城堡要塞。一路上军队采取地毯式进攻，逐个击破，最终兵临城下。把这绵延展开的军队连接起来，就像一个半圆缓慢推进，渐渐形成围攻阿塔克萨塔之势。很明显，这是为了更轻松地攻克阿塔克萨塔而作的战略部署。

实际上，亚美尼亚王梯里达底一开始就放弃抵抗，开战之前他就望风而逃，因此，科尔布罗兵不血刃地拿下了首都。同年年底，罗马军队占领亚美尼亚王国首都的消息传回国内，百姓们欢呼雀跃，高呼“皇帝”以称颂军队最高总司令尼禄。处于元首制时代的罗马，所有胜利的

荣耀最终都由皇帝霸占。亚美尼亚又再次回到罗马的掌控之中，沉浸在喜悦中的尼禄、元老院以及普通民众都对此深信不疑。

虽然梯里达底确实逃之夭夭，然而对于这位前线指挥官科尔布罗而言，根本就容不得半点马虎。受到如此奇耻大辱的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面对变幻莫测的敌情，科尔布罗没有撤军，他决定继续战斗。科尔布罗苦于兵力有限，认为很难守住阿塔克萨塔，同时为了消耗敌军物资，让他们即使回城也无军需可用，科尔布罗下令坚壁清野，当然，他同时也考虑到保障城中居民的安全。公元58年到59年冬，罗马军队一直驻守在阿塔克萨塔。次年春，科尔布罗率军向亚美尼亚王国的第二首都提格兰诺凯尔德进发，在弃城之前，他们纵火烧毁了阿塔克萨塔。

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亚美尼亚第二首都提格兰诺凯尔德，遗址在如今的土耳其境内。亚美尼亚西抵黑海，东达里海，南接底格里斯河，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古代王国。虽然从阿塔克萨塔到提克拉诺科塔，按直线距离计算少说也有400公里，加之军团长要确保如此长距离行军的军粮供应十分不易，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到士兵们高涨的士气。如同攻克阿塔克萨塔一样，科尔布罗对提格兰诺凯尔德也是各个击破，地毯式包围。更何况第一首都阿塔克萨塔破城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这里，使得提格兰诺凯尔德的军民早已草木皆兵。

由于第二首都提格兰诺凯尔德的守军望风而逃，罗马军队同样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了这座城市。攻下这两座城市，意味着罗马凭借军事力量肃清了帕提亚在亚美尼亚的势力，对于这样的战果，罗马会洋洋得意。在皇位继承上，尼禄决定沿用奥古斯都的亚美尼亚政策，让罗马遴选的王子继承皇位。当此大任的王子名为梯里达底，他与东方各王室都有血缘关系，血缘上没有问题。可是对亚美尼亚人而言，这位长于罗马的王子完全是个陌生人，他在国内一没地盘二没人脉，换言之就是空降国王。为了让梯里达底坐稳这个皇位，尼禄命令科尔布罗留下1000名罗马

军团兵、1000名辅助兵与500名骑兵作为护卫。

如果认为仅凭这些兵力就可以保护这位空降国王稳坐江山，那么这位22岁的皇帝尼禄对于军事实在是太过天真。现实果然如此，一年不到这项决策就漏洞百出，所幸夸德拉图斯病逝后科尔布罗接任叙利亚总督，这是尼禄唯一可圈可点之处。然而，与此同时，尼禄又愚蠢地把指挥系统一分为二。

至此，被称为“尼禄初期的五年”的统治可以看做这位暴君最初的德政阶段。人们普遍认为，尼禄的这五年德政是因为塞内加和布鲁斯从旁辅佐。有这种想法的代表人物是五贤帝之一的图拉真皇帝，没有人质疑这位明主之言，可是我深有疑虑。诸位看看当时所谓德政的真实情况：此时的罗马依然有很多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时代遗留的组织和人才，帝国因此得以正常运转。另外，国内政局稳定，几无大事，这算是尼禄之幸。至于安全防卫，最多不过亚美尼亚一处。更何况这个隐患原本可以尽早解决，只是由于尼禄决策失误才多花费了10年时间。如若这5年的确是塞内加和布鲁斯负责帝国政务，姑且不论以近卫军保护尼禄为首要任务的布鲁斯，我认为依靠塞内加的外交与军事才能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作为一位身兼哲学家的文人，塞内加缺乏军事与外交经验却担任辅政一职，可以看出罗马帝国统治上的纰漏。当然，没有经验并不能作为被指责的口实。现代人亦然，各国总统或首相，都是从没有任职经验的人群中选举产生。塞内加的确是一流的哲学家、悲剧作家与讽刺作家，于政治却只属于二流角色。在此“二流”指的是只能勉强应付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

一般而言，知识分子会撰写并留下许多史实，他们属于文人，即传统上与权力无缘的人群。所以，他们在潜意识中会对同类惺惺相惜。尖酸刻薄的塔西佗也会对塞内加处处维护，确实发人深省。

我认为塞内加没有完全发挥“尼禄初期的五年”的影响力。尼禄与恩师塞内加的关系，正如尼禄极力摆脱母亲一样也是日渐疏远。换言之，尼禄即使是在“初期的五年”这一时期，也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并且可以依靠自己的意志进行决策。如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恩师塞内加肯定会对他施加影响，而“初期的五年”不可能就此终结。

弑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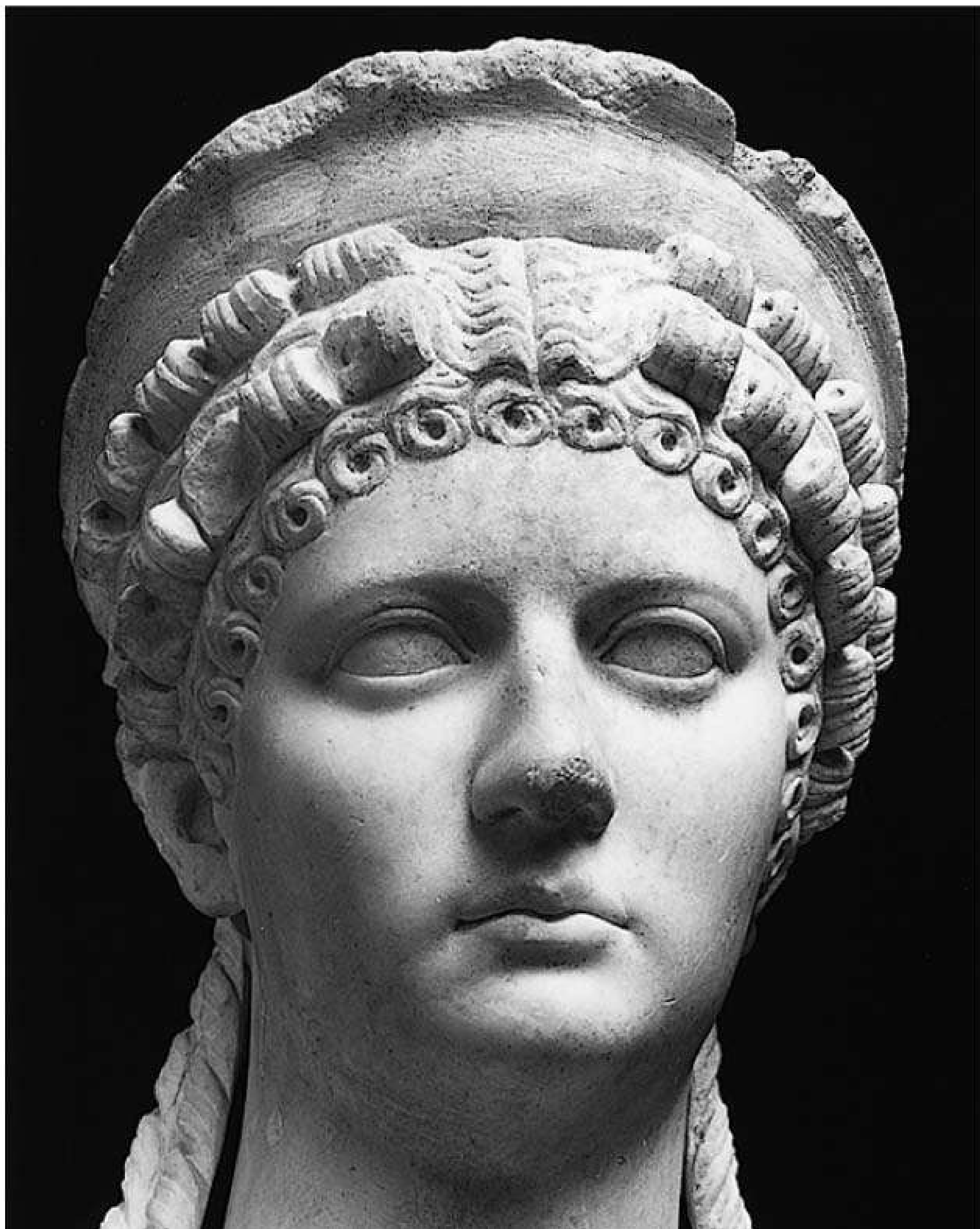
每当遇到迫在眉睫的问题，尼禄就很容易产生走向极端的倾向。我觉得这也是尼禄还不够成熟的表现。

尼禄在即将满20岁之际，钟情上了一位名叫波比娅·萨宾娜的女人，虽然她并非出身于高贵的书香门第，但其祖父的确曾在多瑙河防线立下过汗马功劳，也是历史学家蒙森所言的“提比略门生”之一。有传闻波比娅虽算不上罗马第一，却也颇有姿色；略有聪慧但也并不出类拔萃。波比娅不像尼禄的母亲小阿格里皮娜那样野心勃勃，但也是一位颇为在乎自己魅力的女性。

波比娅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位骑士阶级的富豪。当她育有两个孩子后却选择离婚，波比娅再婚的对象选择了另一位元老院议员的儿子。这位名叫奥托的年轻人也是尼禄的友人，而他再婚后的妻子正是尼禄想入非非之人。

当尼禄还是“皇太子”时，他迎娶了先皇克劳狄乌斯之女屋大维娅，他们的结合可以视为政治联姻。政治联姻并非是导致尼禄与屋大维娅这对夫妻关系淡漠的主要原因，而是因为屋大维娅呆板无趣、性格沉闷。尼禄的第一个恋人阿可特原本是个奴隶，她真心实意地爱着尼禄，却不懂得体贴人，尼禄很快就对阿可特感到厌腻了。此时，波比娅出现在尼禄的视线里，她楚楚动人又善解人意，身份也适合做尼禄的情人。

对于尼禄而言，将波比娅的丈夫这个障碍撇开易如反掌，他任命奥托出任卢西塔尼亚（今葡萄牙）行省总督。奥托经常陪尼禄整夜嬉戏，但是就任行省总督一职后，他的表现十分引人注目。在这个边境行省长达9年的任期内，奥托的治理堪称典范。尼禄死后出现了三个因争夺皇位而丧命的皇帝，而这位奥托正是其中之一。



波比娅• 萨宾娜

尼禄除去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障碍，但波比娅并没有点头同意成为

他的情人，这倒不是因为她深爱奥托，而是屈居情人她心有不甘。而正是这个问题让年轻的尼禄走向了极端。

如果要立波比娅为皇后，唯一的办法是与屋大维娅离婚，然而尼禄的母亲小阿格里皮娜根本就不会同意。

当然，小阿格里皮娜所言也不无道理，因为先皇克劳狄乌斯收尼禄为养子，使他有资格登上皇位。与先皇之女屋大维娅结合，则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皇位。所以，小阿格里皮娜自然不同意尼禄的鲁莽行事。

然而，与她那令提比略难以忍受的母亲大阿格里皮娜一样，这位小阿格里皮娜一生最大的依仗也是身上流着奥古斯都的血。可惜她一直不曾醒悟，奥古斯都驾崩23年后出生的尼禄认为，做“皇帝”需要的是“实力”而非“血缘”。

面对态度强硬的母亲，起初尼禄束手无策，然而，不久竟想除之而后快。

解放奴隶阿尼克特斯成为尼禄选中的帮手。阿尼克特斯曾任米塞诺海军基地将领，此人颇有才能，可惜品行不佳。他曾是尼禄少年时的体育老师之一，和尼禄的关系一向亲密。但是，小阿格里皮娜没有提拔他，因而他对小阿格里皮娜一直心怀不满。

这次谋杀必须瞒过众人耳目，要让大家都觉得只是一个巧合。尼禄接受阿尼克特斯的建议，命人打造一艘船底开洞的船，以便船只出海后能迅速失事。于是，尼禄到处宣传他与小阿格里皮娜重归于好的信息。大体的内容是不管她的母亲多么啰唆，他还是会听从母亲的教诲。



尼禄的母亲小阿格里皮娜 （V. 马拉诺的素描）

他们很快选好3月20日为下手的日子，就在工匠的保护神——智慧

女神密涅瓦（Minerva，希腊称雅典娜）的祭典日，恰逢工人们都休息，同时也是大家熟知的3月15日恺撒遇害的“弑父日”（Idus Martiae）的5天之后。就在这一天，尼禄在位于那不勒斯以西的米塞诺海角附近的巴科里别墅举办招待会，以庆祝女神密涅瓦的诞辰为由招待母亲小阿格里皮娜。

3月20日晚夜色十分美好，尼禄的重臣塞内加与布鲁斯等也出席宴会。在他们看来，22岁的年轻人殷切款待母亲的情景一定是久违的盛宴。从别墅极目远眺，就在这个3月份的大海，有如巨大的银盘中盛满了水一样，很少见到这么平静的海面。

宴会在半夜结束了，尼禄亲自送母亲小阿格里皮娜到码头搭船返回海边的别墅。当时的场景正如儿时儿子对母亲的依恋一样，尼禄热情拥抱将要登船的小阿格里皮娜，挥手作别。

不出预料，船沉了，然而预料之外的事让尼禄大失所望，小阿格里皮娜并没有溺死。

在卡利古拉时代，小阿格里皮娜曾被流放到文托特内岛，流放期间她早已练就了一身厉害的游泳本领。再者，船只是在波佐利湾沉没，这里以风平浪静著称，卡利古拉曾将船只连成一片，骑马从上面驰过都没有问题。加上事发当晚海面十分平静，静得仿佛一面剔透的镜子。小阿格里皮娜的泳姿在静谧星空的映衬下想必十分迷人。据说出海捕鱼的渔夫碰巧救起她时，她不慌不忙地表明自己的身份，命令渔夫将船只靠岸。

回到别墅后，小阿格里皮娜顿觉蹊跷，察觉此事绝非巧合，而是儿子故意设下的陷阱。然而，她故作冷静地写了一封信，让一名信得过的解放奴隶送呈皇帝尼禄。她在信中这样写道：“虽然船沉了，但万幸的是我只是肩膀受了点皮肉伤，不用担心。”

尼禄正在焦躁地等待母亲的死讯，夜不能寐。突然接到这封信之后，顷刻之间方寸大乱。塞内加与布鲁斯被紧急召至尼禄处，尼禄向他们哭诉坦白了一切，并央求解决之策。面对如此棘手的事情，塞内加与布鲁斯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但他们三人都十分清楚小阿格里皮娜肯定知道了内情，按照阿格里皮娜的性格，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这样一来他们也会跟着遭殃。塞内加提议，授意近卫军出手要省事得多。布鲁斯反对，理由是近卫军士兵不可能举剑击杀日耳曼尼库斯之女，他们只好放弃这个打算。最后，他们决定让阿尼克特斯再次下手去弥补他的过失。此时，夜如白昼。

阿尼克特斯首先把小阿格里皮娜的解放奴隶带到仆人面前，诬陷这名奴隶奉小阿格里皮娜之命谋杀皇帝，并在他张口反驳之前迅速杀人灭口。事有凑巧，这位解放奴隶正好身佩短剑，这柄短剑自然成为了生事的把柄。

随后，阿尼克特斯率领部下直奔小阿格里皮娜的别墅。刚一到达就把这栋住宅围得水泄不通，并冲了进去，把所有仆人都赶了出去。卧床休息的小阿格里皮娜看见这些来势汹汹的歹徒们仍故作镇定。她还一本正经地躺在床上平静地说道，如果儿子命他们前来探望，就转告她已无大碍。

当阿尼克特斯与部下将小阿格里皮娜的床团团围住时，她这才突然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她只指着自己的腹部说道：“你们要杀我的话就刺向这曾经孕育尼禄之处。”然而话音未落，她就被利剑刺得体无完肤，包括她的腹部。

罗马帝国上流社会的别墅从波佐利、拜亚、巴科里一直绵延至米塞诺海角的海岸线上，随处可见。为了掩人耳目，入夜后小阿格里皮娜的遗体被悄悄运出，草草火化之后就交由胆大的奴隶们挖坑掩埋了。这位贵为皇妹、皇后，最终成为皇太后的尊贵女性就葬于此，然而六亲不认的尼禄从未涉足此地。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塞内加才以叛国罪的罪名公开了处死小阿格里皮娜的消息。元老院议员与罗马公民们对小阿格里皮娜本来就没有好感，所以即使心里十分怀疑，但表面上仍然佯装确有此事。

然而，罗马人自古重视家庭，对他们而言，不管何种理由，弑母始终是有违伦常的大罪。对此，尼禄非常清楚，所以他极度担心议员们和普通民众会唾弃他，很长时间不敢返回首都。几番犹豫反复之后，尼禄还是决定回去。然而，令他十分吃惊的是，首都的罗马人纷纷欢迎他回来，根本没有流露出丝毫敌意，他终于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另一方面，罗马公民们都对丧父的屋大维娅寄予深切同情，罗马也没有无后可以离异的传统，所以尼禄不敢急着和屋大维娅离婚、再娶波比娅。至于波比娅本人，她可能深信有朝一日可以成为皇后，所以大概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情人身份。因而，除去小阿格里皮娜这个障碍之后，他们持续了3年的情人关系。当然，这当中也许与塞内加提出的暂时不宜刺激民心的建言不无关系。然而，弑母的煎熬让尼禄比任何人都要痛苦。22岁的尼禄每晚都被亡灵骚扰而夜不能寐。

亡灵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第三者也能看见，典型代表就是哈姆雷特看见其父的灵魂；另一种只有当事人才能得见，比如布鲁图看见恺撒的亡灵。仆人们每次听到尼禄在睡梦中号叫的时候急忙赶过去，却什么也没见到，所以让他辗转难眠的应该是后者吧。在元老院会议上，尼禄指责母亲为了实现她统治帝国的野心不惜命令解放奴隶前来刺杀，议员们也做出一副深以为然的表情，可是尼禄无法说服自己，他始终不能坦然以对。对于此时的尼禄而言，比起与妻子离异同情人结合，重新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更加重要。

惊慌失措的人通常会收到很多忠告，人们告诫他回到出发点，弄清楚自己的目的，再重新出发。与当时的罗马知识分子一般，尼禄痴迷于希腊化。然而，尼禄以外的罗马人，甚至希腊文化造诣颇高的塞内加也不认为有必要引入希腊精神，并将之融入日常生活，当然他也很喜欢希

腊文化。不过尼禄的倾向，就是偏好走极端。他固执地认为应该引进希腊文化，让它落地生根，从而使罗马变成文化之都。

今天，罗马历代帝王的头像都收藏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要分清头像的制作年代并不困难。因为以痴迷希腊化著称的哈德良（Hadrianus）皇帝就是最佳分界线，他之前的皇帝没有留胡须，在他之后的皇帝们都蓄有胡子，非常容易辨认。希腊人习惯蓄络腮胡，比如苏格拉底和伯里克利，罗马人没有这种习惯。罗马男性必须将脸上的胡子打理干净才算成年男子的样子。罗马人尊重希腊人在哲学、美术或文艺方面的才华，却看不起他们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把胡子刮个精光就是罗马人与希腊人划清界限的表现。

除了尼禄之外，哈德良之前的罗马皇帝都不留胡子。也许因为年轻，尼禄的胡子也十分少，最多只能盖住下巴而已。然而，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出尼禄效仿希腊人而付出的努力。从当时货币上尼禄的头像，我们可以知道刚即位时他并没有胡子。当他决意弑母时，他的头像下巴上有些许胡须，这与他对希腊化的喜爱溢于言表的时间大致重叠。

罗马奥运会

公元60年，这一年正是小阿格里皮娜离世后的一周年，尼禄正若无其事地筹备他的计划，并打算在首都罗马实施。

为了此项计划，尼禄筹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并将其命名为“Ludi quinquennali”（五年一届的竞技会），普通人称之为“尼禄节”，即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翻版而已。尼禄非常喜欢希腊，也很喜欢猎奇，所以为了区别于四年一届的希腊奥林匹亚运动会，他把罗马的竞技会规定为五年一届。

据记载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发生在公元前776年，当时的竞技项

目除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田径项目之外，还有拳击与摔跤等项目，但参加比赛的都是男性。古代奥运最后一天没有马拉松比赛，马拉松其实是近代的产物。但是当时也有重头戏，就是让观众为之疯狂的四匹马拉战车之间进行的竞赛。

普通比赛只要有健壮的身体就可以一决胜负，然而战车竞赛则不然，要参赛必须具备雄厚的财力作为支撑。所以，参赛者以有钱人居多，这也是观看率高的原因之一。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政治家阿西比亚德获胜，他像罗马的凯旋将军一样受到祖国人民的欢迎拥戴。在奥运会中获胜，为阿西比亚德往后的政治生涯增添了筹码。这充分表明，无论古今，奥运会的优胜者都被人们视为英雄。

提比略在罗得岛隐居期间也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大胜而归。尼禄的外祖父日耳曼尼库斯也曾经荣获过月桂冠。毫无疑问，这两位都是罗马上流社会人士，也都曾到希腊的奥林匹亚参加战车比赛。然而，提比略登基后根本没想过要把这项比赛搬到罗马。

可是，反观尼禄，他不仅精心策划还付诸了实施。在他的观念里，罗马帝国的男子必须效仿古希腊男子，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努力锻炼身体，然后在五年一届的比赛中向大家展现自己的身体。

除了体育竞技之外，尼禄还认为有必要在罗马举办兼具诗歌与音乐的比赛，让普通人也能参与其中并享受这一过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希腊文化。诗歌与音乐被视为希腊化的精髓，让普通民众接受它、习惯它，徜徉其中，罗马帝国才能转变为文化国家。尼禄本人喜好诗歌音乐远胜于政治军事，他也坚信自己于此道天赋异禀。爱好未必能够创造，和普通的业余爱好者一样，尼禄可能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联系。事实上，倡导文化国家，积极学习外来文化，努力扩大文化交流，这些更适合业余爱好者。

民众们对这个比赛的称呼“尼禄节”真是名副其实。这个庆典使用了

包括大角斗场、梵蒂冈角斗场、庞培剧场、马萨鲁斯剧场以及巴尔布斯剧场在内的所有公共设施，这样一来整个罗马城就变成一个巨大的会场，民众们可以免费进场观看比赛。参赛者都是业余选手，虽然不是专业人士，比赛却别有风味。当然，为了调动气氛，尼禄还组织了“皇帝团”拉拉队。就这样，庆典的目的完全达到，尼禄的这场“罗马奥运会”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圆满落幕。

然而，让罗马人理解竞技本身的美丽与乐趣绝非一朝一夕可成，这是项大工程。为此，尼禄兴建了“体育馆”（Gymnasium），可是只有青少年光顾，成年男子根本就不感兴趣。所以尼禄想出一计，在体育馆旁边盖一座罗马式浴场以吸引民众。浴场里面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人们可以沐浴、按摩、嬉戏、休息。这个浴场反响不错，但是依然没有成年男子去体育馆锻炼。因为在罗马人根深蒂固的观念里，锻炼身体是成长的必经阶段，既然长大成人了，体育锻炼自然可以告一段落。

“尼禄节”原本完全可以成为同奥运会不相伯仲的罗马竞技比赛，然而由于尼禄自杀身亡，竞技只举办了两届就随着尼禄的离世一起被历史湮灭。体育馆也难逃被拆毁以作他用的命运，只有浴场得以保存至今。

有趣的是，尼禄对希腊美学倾倒不已，然而他的身材丑化速度也不遑多让。

尼禄17岁继承皇位，当时他圆圆的脸蛋透出几分稚拙可爱，可惜此后货币上的头像却愈发臃肿。他举办“尼禄节”时不过二十二三岁，本是风华正茂之年，但胖嘟嘟的脖子破坏了这份美感。或许很多罗马公民觉得尼禄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加强体育锻炼。

应该是体质导致尼禄年纪轻轻就过度肥胖。但是他非常喜欢重视肉体美的希腊精神，其痴迷程度远远超出他对无视肉体之美的政治。有时候我不禁会想，要在矛盾和挫折之中保持精神平衡，实在不容易。



肥胖的尼禄

公元61年，即举办“尼禄节”的次年，时隔数年帝国边境又起骚乱，不列颠人揭竿起义。另一个边境问题，依然是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两起骚乱发生在帝国东西两侧，对国内稳定没有太大的影响。然而，普通公民可以不考虑这些变动会有何影响，身为维护帝国安全最高负责人的尼禄却不能不闻不问，他必须尽心尽力，兢兢业业才不负“皇帝”之称。当然，具体应对措施是现场指挥官的问题，皇帝要负责考虑根本的解决之策。

从这两个问题的处理结果来看，在不列颠问题上24岁的皇帝表现得无可挑剔，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却不尽如人意。万幸这一失策没有给帝国带来根本性恶果，因为彻底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科尔布罗的助力也不可或缺。不过，事无绝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后来成为尼禄外交策略的一个成功典范。

不列颠问题

有一种军事行动可以来去自如，即入侵别国、烧杀掳掠、目无法纪、为所欲为，犯下滔天罪行后溜之大吉的强盗行径。然而，如果入侵的目的不仅仅是侵占领土，还要把当地居民与自己同化，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首先，若欲以武力称霸，为免夜长梦多，被侵略者反抗之心渐长，速战速决乃上策。所以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倾全军之力，尽快一决雌雄。投入大量军力，赶快分出胜负。若以微弱兵力徐徐图之，对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双方都不是一件好事。马基雅弗利也认为，干坏事必须心狠手辣、不要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同理，侵略这种恶行也应该速战速决，之后妥善处理，这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双方都有利。当然，主张任何侵略都是罪行的理想主义我们不作讨论。直白地说，历史其实就是人类侵略史的串演，换言之，即人类恶行的大串联，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人性现实。至于如何把随之而来的伤害减至最低，这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

尤里乌斯·恺撒入侵高卢是罗马人最成功的一次“恶行”。在他看来，等待元老院裁决与虚度青春并无二致，他索性四处筹款，最后自己出资招募了10个军团，历时8年终于征服了高卢。当时，辅助兵部队制度未曾出现，所以10个军团只有6万人，再减去高卢战役中折损的士兵，兵力只有5万人左右。不过，这支队伍绝非浪得虚名，他们是历史

上威名赫赫的名将——恺撒麾下的精锐之师。高卢战役耗时8年，随后又用1年进行战后处理。对高卢的处理，恺撒没有报复泄愤，也没有调整统治阶层与部族的等级差异，他赋予被征服者罗马公民权，同意部族自治。此外，恺撒没有强求高卢人移风易俗，也不强迫他们使用拉丁语，他甚至以保护高卢民族免受日耳曼民族的威胁为己任。至于行省税和关税，他体谅高卢开发程度不高，所以短期内的税率低于其他行省，希望可以借此改善高卢的经济状况。

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堪称典范，非是高卢民族不欲独立，而是归顺罗马之后，他们积极融入罗马世界，少有擦枪走火之事。历史学家蒙森写道，高卢人称呼自己是罗马人，而非高卢人。高卢得以迅速罗马化，得益于恺撒“干坏事一鼓作气、善后处理深思熟虑”。

然而，可能由于主张征服不列颠的克劳狄乌斯皇帝于军事上还是半瓶子水的缘故，导致罗马人处理不列颠的方式与高卢截然相反。

最初征讨不列颠的4个军团很快缩减成3个，再往后只有2个军团继续征服行动。虽然有辅助兵制度，辅助兵力与正规军相当，可是2个军团士兵1.2万名，两者相加不过2万人。况且，其中的精锐部队可能不足1万人，同恺撒的5万精锐可谓天差地别。称霸高卢历时8年，征服不列颠耗费18载依然遥遥无果，两者的差距不言而喻。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不在前线指挥官，而是因远居罗马的皇帝战略部署不当。

当时，军团长每隔两三年必须轮换，他们能做的就是一步步地扩张，让退役士兵迁入此地后建立殖民城市，城市之间以罗马式街道相连，新城与原自治城市一同构成治理行省的“核心”。这种罗马的传统做法，并无不妥，只是进展太过缓慢。

公元61年，不列颠发生的反罗马暴动，事发地点不是自由之地，而是已经和罗马建立友好关系的地方。所以，这次暴动反映了罗马统治不列颠，没有成功。

不列颠暴动的发起人是一名叫做波狄卡的女性，波狄卡原本是与罗马缔结友好关系的部族长的遗孀。其实，暴动并非由她发起，只是她的两个女儿不幸被罗马人玷污，所以大家推选她做领导者反抗罗马。

在高卢战役中，恺撒与被征服者的女性之间，虽然算不上强暴，但是他们确实发生过不正当关系。然而，被征服者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发生反罗马的暴动。当然，恺撒也没有遮遮掩掩，为了表示“补偿”，他授予这名女子的父亲罗马公民权（也许该女子的父亲原本就属于统治阶级），甚至把自己的家族名称尤里乌斯赋予这个家庭。在距离恺撒统治百年之后的尼禄时代，出现了一名叫做盖乌斯·尤里乌斯的日耳曼人部族长，此人声称自己是恺撒后人。可见，不管在何处播种，只要彼此心满意足自然相安无事。不列颠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关系，才会导致反罗马暴动的产生。

当然，这些只是台面上冠冕堂皇的说辞，事情的真正缘由是这样的：

首先，不列颠尚未完全被征服，可是对于手下败将的不列颠人，罗马人永远一副高高在上的征服者姿态，肯定会刺激不列颠人。其实，罗马人这般做派不难猜测，他们摸不准旧敌什么时候会找帮手来对付自己，实在难以把这种对手视为盟友，又怎么会和他们平等相处呢？征服的时间越长，各种问题就会逐渐显露。

其次，金钱问题。这不是由于10%的行省税过高，而是缴纳税款时必须另行贷款，然而，借贷的利率又高得十分离谱。意大利本土的法律规定借贷利率最高上限为20%，但是行省可以随意乱定比例。不巧的是，在落后地区不列颠的金融业者全是罗马人。

布鲁图在共和制时代末期，在行省放高利贷，利率高达48%，西塞罗对此愤慨不已，有书信为证；那么想必在逐渐成为罗马统治范围内的不列颠，这种高利贷也是猖狂无忌。因为不列颠没有完全被罗马掌控，

所以在此地放贷也要承担一定风险。风险越高利率越高，这是经济上的逻辑。防止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是“战后处理”中极其重要的工作。然而，不论是克劳狄乌斯，还是尼禄，他们没有在前线指挥的经验，也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传闻尼禄的辅佐官塞内加由于在不列颠投资高利贷，因而累积了巨额财富。皇帝的近臣尚且如此贪财，何况别人？所以要让他们控制经济的恶性扩张，无异于天方夜谭。

在不列颠放高利贷的人因为没人管控，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享受暴利的人都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金融业者。不列颠人不仅对金融业者不满，所有罗马人也成了他们愤怒的对象。他们认为罗马人只把不列颠人视为可以尽情压榨剥削的对象，如此，与罗马人建立友好关系变成了一切灾难的源头，他们为此后悔不已。恰逢此时，担任不列颠行省总督的苏维托尼乌斯（此人并非《罗马皇帝传》的作者）率领驻守不列颠半数的罗马士兵，大肆驱逐死守摩纳岛（今安格尔西）的德鲁伊特教祭司与信徒，导致局面更加扑朔迷离。

移居至科尔切斯特的罗马退役官兵受到不列颠人的攻击，而罗马军队的屠城更刺激了暴动者的疯狂，他们甚至全歼了一个赶来支援的罗马军团。罗马军队的指挥官，面对不列颠行省的首都科尔切斯特彻底沦陷，外加一个军团全军覆灭这种惨败，根本无法继续保持淡定。军团长与皇帝财务官等人命令苏维托尼乌斯即刻回城增援，但是不及苏维托尼乌斯率军从安格尔西返回，这些暴动者已经穿过多佛尔海峡，直奔高卢逃窜而去。

由于军队元气大伤，导致了罗马的军事部署也出现了漏洞，已经无力抵挡暴动者的怒火。遇害的不只罗马人，与罗马人友好的不列颠人也不能幸免，老弱妇孺皆不例外。据说遇害者达7万人之多。这是因为不列颠人不会把俘虏当做奴隶贩卖，投降者一律格杀勿论。

总督苏维托尼乌斯可以运用的兵力只有1万人左右，可以说力量十分薄弱；并且高卢没有罗马驻军，所以只有等待救援一途：从莱茵河派

出援兵，或者等待西班牙的罗马驻军赶来增援。然而在这紧要关头，敌人不可能给罗马军队任何喘息的时间。面对暴动者的强大攻势，别无他法的苏维托尼乌斯只能决定在平原上布阵，与暴动者正面对决。仍然带有野蛮气息的不列颠人对这种战术并不娴熟，而罗马军队却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这场战役的结果，正如历史学家塔西佗评论的“不愧为昔日将军后代”一样，罗马军队大获全胜。敌军几乎全军覆没，8万多具尸体铺满了整个战场，血流成河，己方几无折损。骚乱处理至此结束，接下来交给身处罗马的尼禄皇帝来收拾残局。

为了填补被歼灭的一个军团出现的军力不足，尼禄下令从负责防守莱茵河的军队中拨出2000名军团兵、8个大队辅助兵以及1000名骑兵开往不列颠，兵力总计约1.1万人。同时，他派解放奴隶波里克雷特斯前往不列颠视察。皇帝的特使原本是奴隶，这不免遭亲罗马派的不列颠人耻笑。然而，这位波里克雷特斯非常称职，根据他的报告，尼禄大刀阔斧地修改了不列颠的治理政策。

没有资料明确记载改革的详细内容，我们清楚的是，尼禄没有任何报复行动。他反而以此为契机，180度改变了征服者罗马人对被征服者不列颠人的态度。此外，尼禄把苏维托尼乌斯召回罗马，重新选派了佩特罗尼乌斯担任不列颠的新任总督。这个安排对苏维托尼乌斯并不公平，他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竭尽所能并大败敌军，然而要让不列颠人知道罗马改变对他们的统治方式，除了人事调动之外别无他法。

不出所料，不列颠人在此后400年间很少发生反抗罗马的暴动了。当然，罗马的称霸大业远远没有画上句号。不过，就今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而言，当时的不列颠人已经被纳入“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之下。另一方面，从这个时期开始，作为德鲁伊特教象征的凯尔特文明被逐出不列颠，他们逃往爱尔兰，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就在英国与爱尔兰的信仰分化为新教与天主教前夕，罗马世界与非罗马世界之间早已泾渭分明。

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

尼禄适当调整了不列颠的统治策略，然而，在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上很难发现他的高明之处。我想，可能是这两个问题的性质差异太大的缘故。不列颠问题是帝国内部问题，它是帝国对一个地区的统治失误。而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却不一样，它影响着整个帝国的安全防御。

也许我们该说这是预料之中的事：罗马支持的梯里达底这个空降国王对亚美尼亚的统治不足一年，足以证明这是个错误的人事安排。亚美尼亚是被帕提亚重新掌控，还是继续亲罗马，无论哪种结局都必将影响罗马帝国东方防御系统的功能发挥。况且，亚美尼亚问题处理是否得当，将会决定与帕提亚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针对这个问题，尼禄眼前有三种选择：

（一）罗马帝国若没有其他合适人选，除了依靠军事实力保住梯里达底的皇位之外，别无他法。

（二）亚美尼亚王国的两个首都已经被罗马占领，那么为绝后患，索性把问题不断的亚美尼亚王国纳为罗马的行省。

（三）要么对于叙利亚总督科尔布罗的计策予以采纳。也即认可帕提亚王之弟梯里达底出任亚美尼亚国王，但作为交换条件，梯里达底必须宣誓服从罗马皇帝。

如果选择（一），庸碌无为的梯里达底是否有能力统治亚美尼亚，这个问题让人忧心忡忡。

如果选择（二），把王国变成行省由罗马直接统治，要在亚美尼亚实现这个目的并不容易，不太现实。亚美尼亚王国是属于波斯文明圈的文明国家，把这个国家变成行省与仍然较为野蛮的色雷斯王国不能一概

而论。将文明程度极高的国家纳为行省时，罗马会给予对方高度自治权，亚美尼亚原本与帕提亚亲近，如果给了它类似希腊或叙利亚等希腊裔城市的高度自治权，那么这个行省最终不过徒具虚名，罗马白费力气罢了。

尼禄也不敢采用方案（三），因为这会让首任皇帝奥古斯都定下的政策完全改变。其实他非常清楚，要维持与帕提亚的友好关系，方案（三）是最有效的途径。但是他担心元老院和普通民众强烈反对，理由是承认帕提亚王的弟弟成为亚美尼亚王，无异于当面打脸，让罗马颜面扫地，威信荡然无存。

面临选择时，以下几个条件帮助尼禄作出决定：

（A）自古以来，亚美尼亚的上流社会就分为亲帕提亚派与亲罗马派，如今两个首都尽由罗马掌控，亲罗马派必然得势，罗马方面大可借助他们的势力达成目的。

（B）首都是国家的核心，罗马占据着亚美尼亚的两个首都，在军事上非常有利。

（C）大部分民众希望把亚美尼亚变成罗马的行省，这意味着帝国的版图有所扩大。

最终，尼禄的选择是兼具（一）与（二）的策略：如果能保住梯里达底的皇位，他事休提，否则，就把亚美尼亚变成行省。然而，这种做法只会加剧与帕提亚的矛盾，刺激全面冲突的爆发。

科尔布罗得知这个决定后建议身在罗马的尼禄，必须安排一位只负责亚美尼亚战线的军团长。尼禄欣然采纳，他任命信仰军事至上的贝图斯为军团长，负责亚美尼亚前线的军事指挥。

公元62年，因尼禄的任命，甫上任的贝图斯获得3个军团，其中2个

军团从莱茵河抽调，再加上辅助兵以及同盟国的参战兵，总人数超过3万。另外，科尔布罗也掌握3个军团，不过他只负责履行叙利亚行省总督的职责，即他负责全面防守幼发拉底河以西，提防帕提亚军向西进攻。科尔布罗致力于加强幼发拉底河西岸一带的要塞防御，如此，罗马在这一地区的防线可谓铜墙铁壁。这样看来，尼禄的战略是把军事力量分为两个拳头，从两边包抄夹击帕提亚，表面上似乎很有道理。

大家都认为帕提亚王会御驾亲征，可是能在皇位争夺中获胜的人不可能脑袋空空。既然罗马在这一带的防御固若金汤，帕提亚王肯定不会自投罗网，傻瓜一样故意用头去撞铜墙铁壁。他的大军自然会避开西边的罗马防线，转向贝图斯率军集结的西北部寻找突破。更何况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的本意并非与罗马开战，他只是希望能确保弟弟梯里达底成为亚美尼亚王，因为弟弟把帕提亚的皇位让给了并不正统的自己，他想以此作为弥补。

连我这个军事方面的门外汉都能想到的情形，当时杰出的将军科尔布罗不可能没有预料到如此结果。也许科尔布罗明知结果，他刻意为之只是想试探贝图斯的深浅吧。毕竟没有亲身经历无法理解个中内情。

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几乎所有罗马人都深信贝图斯即将击溃帕提亚军队，让亚美尼亚真正成为罗马的领土，因为大家都乐意听到好消息。假如公元62年有民意调查，那么此时尼禄的支持率想必会非常可观。虽然这位年轻的皇帝偶尔会有奇怪的行径出人意料，然而于政事上他表现得可圈可点，不列颠问题妥善安排，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当机立断，这些都会让百姓觉得他足够担当统治帝国的重任。所以尼禄只要做好本职工作，认真履行帝国最高负责人的职责，即使偶有出格的言行，无非就是为民众们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而已。

向首都罗马供水的水道并非出自同一个源头。罗马人通常将有泉水涌出的水池视为圣地，禁止游泳。当然，神圣的水池只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用意是为了保证饮用水的纯洁干净。

可是尼禄偏偏就不信这个邪，跳进了其中一个神圣水池中游泳。然而，水池中的泉水温度比较低，所以尼禄当晚就发高烧，昏倒了。可是，几天之后他又奇迹般地康复过来，但是首都的居民们都不知该如何是好。尝到苦头后尼禄并没有再犯，而罗马民众们也没有表示不满，反而认为这是他朝气蓬勃的表现，更加拥戴他。

然而，高支持率经常与陷阱相伴相生，为了避免掉入陷阱就需要很强的自我克制能力，可是尼禄对此实在没有天分。不巧的是，尼禄就在此时失去了两名能够不计个人得失直言不讳的大臣。

塞内加下台

负责尼禄安全的近卫军长官布鲁斯因病离世，这也是尼禄失去左膀右臂之始。后世有种说法很盛行，说布鲁斯之死是尼禄授意所为，不过从他当时的症状来看，很可能死于咽喉癌。可是，塞内加也因布鲁斯之死心里面打起了退堂鼓。

同塞内加一样以文笔优美著称的历史学家塔西佗甚至这样写道："布鲁斯之死决定了塞内加权力开始丧失。"

与塞内加相仿，塔西佗的文学造诣非常之高。虽然他们都身为元老院议员，然而塔西佗在仕途上的成就最多是行省的勤务工作，塞内加却是辅佐皇帝、担当国家要职，两人不可相提并论。塞内加身处罗马帝国权力核心，才深刻体会到知识分子在这个职位上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

如果只是单纯的知识分子，他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区别仅仅在于没有实权。换言之，要让别人认同你所发挥的影响力，前提是有人愿意接受，就像没有了读者，作家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作为一位哲学家与悲剧作家，塞内加从尼禄12岁时就开始陪伴这位

年轻的帝王，前后14年。前6年他的身份是教师，后8年他的身份是尼禄的辅佐官。然而，塞内加并未在尼禄登基之后，一如既往地发挥他的影响力。图拉真皇帝所谓“尼禄初期的五年”的时代，我认为更早以前尼禄就开始自立了。尼禄的母亲小阿格里皮娜没有察觉儿子极度渴望自立，然而塞内加应该是早有所感。换言之，在“读者”尼禄的成长过程中，“作家”塞内加逐渐发现尼禄的目光不再专注于自己。

然而，此时被塔西佗称之为“塞内加的权力”依然不可小觑。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的重责大任并不轻松，这份工作让贵族气质浓厚的提比略皇帝偶尔发牢骚抱怨几句，让克劳狄乌斯皇帝殚精竭虑。尼禄喜好音乐诗词远胜于政治军事，所以政治上的很多事情就由他人代劳，这个人就是塞内加。这一点可以从很多法案中得到证实，这些法案都以尼禄的名义提议，目的是获得元老院的支持。塞内加能够发挥这些“权力”，少不了尼禄的许可，当然也离不开布鲁斯的支持。

当然，不论塞内加多么富有涵养，他毕竟出身西班牙行省，没有罗马名门贵族必备的世代相传的“被保护人”（clientes）。其实这些“被保护人”就是类似后援会的组织。这匹荒野上的孤狼能够纵声长啸，完全是由于布鲁斯时刻以锐利的目光警惕四周，毕竟他掌握驻守在意大利本土唯一的军事力量，即1万名近卫军。

世间不论哪种权力，拥有者总会受到无权者的强烈批评，并且露出破绽时遇到的攻击更猛烈。尼禄已经逐渐脱离塞内加的影响范围，元老院肯定是看穿了这一点，所以布鲁斯在世时塞内加已经开始受到攻击。在不列颠放高利贷的不只塞内加，但是似乎是杀鸡儆猴，他被特意提出来批评，仿佛他是不列颠发生骚乱的罪魁祸首。偏偏就在此时，布鲁斯撒手人寰，对塞内加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塞内加醒悟过来，他脚下的基石开始松动了，如果继续跟随尼禄，上演荒野孤狼走投无路的悲剧实在有违塞内加的本性。所以他选择退隐，回归平凡，重新执笔。此时的塞内加已经年近古稀，垂垂老矣。

还有现代学者持这样的观点，塞内加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无法忍受尼禄的暴政，于是以布鲁斯之死为借口，远离仕途。然而有这种想法的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不仅在“知识”的道路上求索，更会在“知识”的道路上一较高下。既然要分出胜负，一旦明白自己没有胜算，自动退出也是理所当然。

更何况，到此时此刻，尼禄在统治上虽然发生过因为对军事无知造成的失策，或是一意孤行举办罗马奥运会等，但是这些都不是暴政。元老院议员们没有谋划任何阴谋，民众们也没有不满，甚至边境上的驻守军团都没有任何骚动。真实的塞内加远比现代知识分子想象中的他更加坚韧，可是他竟然选择退隐，我深信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明白自己脚下的地基已经不稳了。

这场恩师与学生话别的场景在塔西佗所著的《编年史》中有所记载。我们简短描述的话，就是塞内加对尼禄说，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希望回归田园；尼禄则感念恩师劳苦功高，恭祝恩师颐养天年。我们不知道这段对话的真伪，即使真有其事，也只是一场师生情深意重的表演而已。塞内加当然希望在公共场合向尼禄说清退隐的缘由，尼禄也须对这段经年情谊表明态度和立场。66岁的恩师与25岁的学生，就这样平静地分道扬镳了。

但是，尼禄的自我控制力不强，此后再没有人能够直言不讳地进谏了。与此同时，尼禄迅速处理了不列颠问题，又决定使用武力积极介入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这为他赢得了民众的大力赞扬。

由于布鲁斯已死，塞内加归隐，没有人会阻止尼禄的任何决定。不久，尼禄与屋大维娅离婚，随即迎娶情人波比娅。尼禄对离婚的屋大维娅处以流放之刑，进而命人在流放之地将她杀害。据说因为尼禄害怕民众们太过同情屋大维娅，不满他休妻另娶，进而以抗议示威来支持屋大维娅，所以痛下杀手。无论如何，继弑母之后，杀妻又为尼禄添上了暴虐的一笔。

尼禄无端杀害无辜妻子一事，并没有因为其背上污名而画上句号。身为皇帝，尼禄的权威和权力有效发挥需要前提，就是成为先帝克劳狄乌斯的养子并与其女屋大维娅结婚、生育儿女，这样才是合法的。然而尼禄与屋大维娅没有后代就离婚，意味着他失去了合法性，正因如此，才招致小阿格里皮娜强烈的反对。再者，就奥古斯都定下的"血缘"继承制度而言，小阿格里皮娜的反对并没有错。小阿格里皮娜可以证明他身上流着奥古斯都的血，可是尼禄已经把她杀了。尼禄这个皇位的正当性越来越不堪一击。波比娅成为皇后之后没有被百姓接纳，她不像阿格里皮娜一样野心勃勃，却处处讲究排场，追求奢华。但是，人们在一帆风顺的时候都不会察觉不幸，只要稍有不顺，它就会变成导火线，焚烧一切。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和心爱的女人成婚，春风得意的尼禄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此时正如履薄冰。

已经步入25岁的尼禄愈发专横跋扈，甚至一度认为自己可以凭借"实力"而无须"血缘"这个靠山。这样做的结果，其实也意味着元老院、公民与军队将以更严苛的标准重新审视皇帝的能力。

罗马军队的投降

在尼禄的命令之下，前往东方上任的贝图斯把手中所有的军队都投入到了亚美尼亚。可惜的是，贝图斯却大意地将军队分为两个部分，导致攻击力分散，此外对军粮的补给路线也根本就是疏忽大意。尽管如此，罗马军队的进攻还算顺利，从当年年底贝图斯送回罗马的书信来看，罗马军队仿佛已经征服了整个亚美尼亚。对此，尼禄龙心大悦，下令兴建纪念碑庆祝胜利。

然而，就在贝图斯的报告传递到地中海以西时，异变陡生。贝图斯的罗马军队突然遭到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率军突袭，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此时，由于兵力分为两个部分，当时贝图斯手上不到2个军团。

与公元55年一样，尼禄再一次重蹈覆辙，公元62年他又一次分散帝国东方的指挥系统，导致贝图斯与科尔布罗地位、权限相当，手中的兵力也在伯仲之间。如此一来，原本应该放在首位的战略部署毫无意义。更为糟糕的是，贝图斯完全没有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运用手下的兵力，他又不经大脑地把不多的军队再度一分为二。罗马军队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帕提亚王并非傻瓜，他肯定会抓住这个破绽猛烈进攻。果不其然，贝图斯的军队惨遭失败，又苦于军粮不足，他们只好悻悻地逃回冬营地。然而祸不单行，就连冬营地也被团团围住，帕提亚王还下令猛攻不止，束手无策的贝图斯只得命部下快马加鞭向科尔布罗紧急求援。

科尔布罗在得知贝图斯率军深陷敌围之后，遵循罗马的战略传统，将他的军队也一分为二。首先，他严令一半部队死守幼发拉底河的帝国防线，同时下令将船只连接形成浮桥。他还在东岸的帕提亚领土上兴建堡垒，保证一声令下士兵们可即刻攻入帕提亚。接着，他开始准备军粮，囤积起来的大量小麦由骆驼队负责运输。随着寒冬即将来临，加之此次远征条件艰苦，形势危险，他们必须尽快深入敌军腹地。罗马军队历来凭借称之为“军备补给站”的作战方式所向披靡，同出身意大利本土的贝图斯相比，行省出身的科尔布罗更加忠实地贯彻了这一作战传统。科尔布罗率军从叙利亚沿小亚细亚以东北上，直扑亚美尼亚。

对于科尔布罗的排兵布阵，古代历史学家们众口不一，有人认为科尔布罗故意拖延时间，使得援军迟迟不至。然而，塔西佗对科尔布罗的战法却是赞誉有加，在他的笔下，科尔布罗的首要目的是增援友军而非征服亚美尼亚，行进过程中他身先士卒，激励士气，日夜兼程。然而，贝图斯并不知道科尔布罗正率军对他驰援，可能是因为科尔布罗派出的信差落入敌手，信息无法传递。然而，四面楚歌的贝图斯没有抗拒到底，就在此时早早地缴械投降了。实际上科尔布罗三天后就赶来增援，如果贝图斯再坚持三天，结果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惜天不遂人愿，贝图斯向帕提亚王投降，沃洛吉斯欣然受之。

恐怕连沃洛吉斯也没有想到此行会取得如此大的战果。这次战役的规模远远称不上战争，然而却改写了帕提亚对罗马的连胜纪录。沃洛吉斯对投降的贝图斯军队几乎没有任何惩罚，这也说明了他胜利后的喜悦心情。或者可以这样说，沃洛吉斯根本没打算和罗马正面交锋。

由于沃洛吉斯看中了罗马军团引为骄傲的土木工程建设特长，他并未命令解除贝图斯的军队武装，而是命令他们在幼发拉底河上游迅速架设一座桥梁。此外，沃洛吉斯还提出了另一个苛刻的条件，要求罗马军队从亚美尼亚境内全面撤出。败军之将的贝图斯不得不全部答应下来。

随后，向西南撤退的贝图斯残部与北上的科尔布罗军团迎头相遇，幼发拉底河岸边成为他们会合的地点，具体而言，就在离罗马军团受命搭建桥梁不远处的下游。科尔布罗的士兵们眼见贝图斯的士兵们因屈辱而表情僵硬，纷纷上前给予他们拥抱，并报以同情，听他们诉苦。

军团长们与士兵们的热情截然相反，由于气氛尴尬，匆匆结束了短暂的会面。

科尔布罗原本打算以己方的武力优势为依仗，促使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签订和平协议，然而贝图斯的败北让一切功亏一篑，他不禁开口抱怨。贝图斯反驳，他说沃洛吉斯不可能长期滞留亚美尼亚，只要静待时机，到时全面反扑，亚美尼亚又会重回罗马的怀抱，所以局势并没有改变。

听了这样自我开脱的狡辩之后，科尔布罗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尼禄没有命令我进攻亚美尼亚，我的任务只是保卫叙利亚行省。因为你们陷入困境，我不能袖手旁观才率军到此。再者，这一带对敌军的主力骑兵非常有利，我的部队能够安然无恙地抵达这里已是幸运至极。”

贝图斯与科尔布罗的会面不欢而散，贝图斯率领残部退回卡帕多西

亚，科尔布罗自然率军返回叙利亚。

科尔布罗前脚刚回到叙利亚行省首都安条克，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的使节后脚就到了此地。这位使节传达了沃洛吉斯的要求：拆除幼发拉底河东岸的堡垒，同时摧毁桥梁。

面对沃洛吉斯咄咄逼人的要求，科尔布罗回复道，如若帕提亚全面撤离亚美尼亚，他们愿意满足帕提亚王的要求。

面对科尔布罗强硬的回复，沃洛吉斯也不得不让步。由于幼发拉底河以东是帕提亚的领土，在这块土地上保留罗马的军事堡垒与被用刀抵着喉咙无异，让帕提亚时刻提心吊胆，而科尔布罗手中的堡垒正是这把刀。身为叙利亚行省总督，科尔布罗只能进行防御，无权越过幼发拉底河发动攻击。当然，如果科尔布罗借口与帕提亚人发生了冲突等则另当别论，而沃洛吉斯也认为科尔布罗寻找时机进攻的可能性很大。实际上，科尔布罗在东方待了8年，这8年没有白待，对帕提亚王室的秘密他了如指掌。帕提亚王沃洛吉斯最大的短处在于他非嫡出，如果臣子谋逆，首当其冲的就是他自己。

大概从这一时期开始，这种私底下“交换意见”开始频繁往来于帕提亚王沃洛吉斯与叙利亚行省总督科尔布罗之间。公元63年，帕提亚王派遣特使前往罗马觐见尼禄，随行的一队护卫中，科尔布罗安插了一位手下的百人队队长。

特使将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的亲笔书信上呈罗马皇帝尼禄。古今内外，外交公文自始至终都在打官腔，很容易让人产生云里雾里之感，弄不清真实意图是什么。然而，如若仔细整理一下这封帕提亚王的书信，还是可以得出以下要点：

一、关于亚美尼亚的主权属于帕提亚王国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而以往帕提亚与罗马交战总是取胜，也从旁证明了众神始终支持帕提亚王

国。

二、细观最近的战局，我们俘虏了前来提格拉尼斯挑衅的贝图斯军队，本可以将之全数歼灭，却允许他们撤军。这展现了帕提亚强大的军事实力，也显示出帕提亚人的宽容大度。

三、我弟弟梯里达底是神明之官，而帕提亚的神明之官禁止跨海航行。关于他就任亚美尼亚王一事，如果要求他亲自到罗马接受罗马皇帝加冕，即使他本人同意也无法实现。

所以，沃洛吉斯的提议是，让梯里达底前往罗马军队的营地，以罗马士兵为证，在皇帝雕像前加冕亚美尼亚王冠。

不久前贝图斯送来的形势乐观的报告书，与尼禄眼见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尼禄立即召见与帕提亚王特使同行的科尔布罗手下的百人队队长，仔细询问。这位百人队队长如实回答了实情，罗马军队完全被赶出亚美尼亚，此外，帕提亚军队也已全面撤军。于是，尼禄立即召开了相当于今天的内阁会议的“第一公民辅佐机关”（Concilium）会议。

所谓的“第一公民辅佐机关”会议，也即奥古斯都开创的由“第一公民”皇帝、当年任职的2名执政官、法务官（相当于各个部的部长），以及元老院的20名议员代表共同列席的会议。尼禄在这次会议上如实报告了情况，并同与会成员共商对策。关于此事，最终形成两种意见：开战；或者从大局出发，为了和平委曲求全，咽下把亚美尼亚皇位拱手让人的屈辱。与会人员绝大多数同意“开战”，在他们看来，罗马只有战胜后谈和的传统，根本没有战败后谈和的先例。这位特使只好带着尼禄拒绝的答复回国复命。

如果罗马帝国再起战端，败军之将贝图斯根本难挑此大任。眼下可当重任的只有科尔布罗，然而科尔布罗却身兼叙利亚行省的总督，这一职位通常只负责日常行政与司法工作。于是，为了让科尔布罗能够专心

解决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尼禄重新任命他人负责处理行政与司法工作。

元老院经过决议，授予科尔布罗东方“最高”绝对指挥权。虽然科尔布罗负责的地区只是东方，但是这份权力足以令他与皇帝平起平坐。这如同是拥有一份无须经过皇帝同意的空白委任状，科尔布罗使用外交手腕或军事行动来解决东方问题，都不受任何约束。提比略曾经把这项大权授予奉命前往东方的日耳曼尼库斯，科尔布罗继日耳曼尼库斯之后成为了第二位拥有如此大权的将军。东方地区的指挥系统终于得到了统一。

被召回意大利本土的贝图斯早作好了被追究责任的准备，然而没想到仅仅被尼禄挖苦了一顿，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尼禄这样讥讽道：

“听说你感到恐惧时容易瑟瑟发抖，所以我也不吓你了，在你担心被追究责任而装病之前，我已经决定原谅你了。”

由于指挥权的统一，科尔布罗可以调动4个军团、辅助兵和同盟国参战兵，共计5万人的兵力参战，但科尔布罗没有沾沾自喜，他没有丝毫懈怠。科尔布罗开始接触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至今已经8年，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决定挥师北上。此行的目标是亚美尼亚本土，这里距离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并不远，不过与之交手的却是帕提亚军队。对于这次行动，首都民众激动不已，元老院议员们静候佳音，尼禄比任何人都要期待。回顾罗马与帕提亚的战斗，无论是克拉苏还是安东尼都以失败收场，所以这一次是一雪前耻的天赐良机。科尔布罗从出任莱茵河防线的低地日耳曼军团长伊始，就以反应迅捷、当机立断的战术闻名天下，其他将领都公认科尔布罗是当时罗马军队中最勇猛的将军。帝国上下都对科尔布罗一定能大胜而归深信不疑。因此，只要科尔布罗击败帕提亚，就意味着罗马帝国将重新控制亚美尼亚。

然而，至于科尔布罗心里面在盘算什么，别说普通民众或者元老院

议员，甚至连尼禄也毫不知情。虽然科尔布罗手握可以调动5万大军的指挥权，然而他并非一心一意只想打仗。

当时的罗马

就在东方战场科尔布罗挥师北上的同一年，罗马帝国本土的小意外却接踵而至。

首先，罗马帝国本土南部一个名为庞贝的中等城市发生了地震。庆幸的是，城市受灾程度并不严重，不需要国库出力，所以庞贝能够独自重建。然而，如有先见之明的话，此次地震或许是16年后维苏威火山爆发、摧毁庞贝及其周边地区的前兆吧。

接着，尼禄下令兴建的马尔斯广场旁的体育馆受到雷击，引发了大火。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这座体育馆无人问津的原因，我想天公不作美的时候，更是人迹罕至，所以这次火灾中无人伤亡。尼禄当即决定重建体育馆。对于把希腊锻炼习惯引进罗马，这次意外并没有给尼禄的热情泼上冷水。

同年，波比娅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尼禄也首次当上了爸爸。这个女婴出生不久就被大喜过望的父亲命名为奥古斯塔，意即神圣的存在与尊贵的皇后之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女婴出生不到3个月就夭折了，尼禄当时的悲痛我们不难想象。

为了讨好波比娅，尼禄不断搜集奇珍异宝送给她，不仅仅是满足她的虚荣心，也是为了赢得她的欢欣。女儿出生，尼禄也送给波比娅礼物，感谢她替自己生下第一个孩子。虽然女儿夭折，尼禄为了安慰妻子的丧女之痛，想出的名目实在是多如繁星。其实，波比娅·萨宾娜并非如史书所记载的那样恶名昭彰，她并未强求“皇后”的封号，也没有对事关重大的人事调动指手画脚。的确，虽然她很贪婪，可是也不足以影响

国家财政，充其量就是效仿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泡个牛奶浴罢了。随着帝国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身为尼禄的妻子有一些符合身份的奢侈浪费无伤大雅，这些行为尚不至于动摇帝国的根本。

然而，波比娅铺张浪费的习性让首都的犹太人眼前一亮，他们利用这个便利，进入皇宫做起了生意。居住在首都明显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使得罗马的犹太人口成倍增长。然而，罗马的人口与经济实力依然不能跟埃及亚历山大的犹太人社会相提并论，此外，与东方地区的犹太人社会不同，罗马的犹太人不能按照犹太教戒律行事。奥古斯都早就规定了罗马帝国的西方地区，犹太人必须遵守罗马的法律，此后历任皇帝都忠实执行了奥古斯都的规定。

在卡利古拉皇帝的章节中，我们也曾叙述过，由于教规所限，犹太教徒始终拒绝成为罗马公民，这也说明了犹太人在罗马帝国中永远是一群格格不入的人。所以，由于居住在罗马帝国，犹太人感到弱势，他们非常希望拥有保护人。如果从捍卫犹太人社区的角度出发，这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只要把奢华的珠宝首饰赠与贪婪的皇后，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虽然波比娅对犹太教并不感兴趣，然而她却与首都罗马的犹太人往来密切。实际上，波比娅仅仅是一个世俗的女性，她对宗教毫无兴趣，也许正因如此，她不认为自己庇护的团体是宗教团体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这却让她的丈夫尼禄，在2000多年内一直被后人指责是一位反对基督教的皇帝。

公元63年，发生了两件大事，非常具有罗马特色。第一件事在元老院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还被苛刻的塔西佗称之为“可耻的传统”。

罗马帝国的官员选拔有着自己的特色，类似执政官与法务官一类罗马要职通常由元老院选举产生，行省总督则是在具有执政官经验的人选之间抽签后决定。然而，由奥古斯都提议、元老院通过的《尤里乌斯

法》（参见《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规定育有子女者优先考虑就任罗马帝国的公职。奥古斯都提出这部法律的真正目的，其实在于缓解帝国统治阶层生育减少的情况，所以这部法律可称之为“促进生育法”。所谓的优先，指在选举中票数相同时，育有子女者当选公职；如果双方均育有子女，子女多者优先当选公职。至于抽签，曾担任执政官的人选中，有子女者具有抽签资格，膝下无子者就丧失了权利，还得把公职让给有子女的人。这部法律已实施了长达80年之久。

罗马是举世公认的法治国家，然而法律是人制定的，就总会有人找到办法去钻空子，使之为自己谋利。“促进生育法”的漏洞，就是虚假的养父子关系。

每当罗马帝国临近公职选举或行省总督的抽签之际，人们为了形成养父子关系使出浑身解数，活跃非常。而当选举或抽签结束之后，养父子关系立即解除，人们又变回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有子女的议员们对这种现象心怀不满，纷纷抗议。这是我对塔西佗的评论深以为然之处，诚如他所言，的确是“可耻的传统”。

养育子女十分艰辛，无论经济还是精神方面，没有子女的人比较有利。可是他们还不满足，非要以伪装的养父子关系来侵害受法律保护的育有子女者的权利，所以议员们众口一词，向元老院提出法案，纷纷提出取消因伪装的养父子关系而得到的公职。

不出所料，元老院以高票通过了这项法案，在投赞成票的议员中同样有并无子女的人，这说明了罗马帝国不愧是一个法治国家。与此同时，这项法案的修正案也一并通过，修正案规定不认可此类养父子关系中养子的遗产继承权。如果失去遗产继承权，那么即使成为养子也无利可图，钻法律空子接受这种关系的人肯定会下降。随着这项法案的通过，对于有子女的人而言，罗马帝国“高级公职”的天平再次倾向他们。

第二件事同样发生在元老院。为了规范行省总督的行为，防止他们

在行省一手遮天，罗马允许行省人民检举行省总督。然而，由于这项规定，使得司法变成攻击对手的“工具”。行省总督们都不希望任期结束后还要接受审判，所以他们在任期内都极力与当地的权贵阶层保持友好关系。因为非权力阶层要向罗马法院起诉，障碍重重，权贵阶层则不然。这本来算不上穷凶极恶，但是应该把握分寸，适可而止，超过限度就会演变成总督与行省权贵阶层相互勾结，徇私舞弊。公正公平的统治应该兼顾所有弱势的行省人民，一旦总督和行省的权力阶层相互勾结，那么处于弱势的行省人民势必求告无门。所以，罗马长期以来承认行省人民检举总督的权利，并一直贯彻着这项权利的实施。

然而，一些行省人民并不买账，出现了要求改变这种局面的呼声。这个人正是克里特岛的一个居民，他出言不逊，放言罗马总督的生死全在他一念之间。元老院得知后十分震怒，要求将该男子处以流放，同时提议颁布法令限制行省人民的言行。

对于元老院提出的法案，尼禄并不支持。与之相反，尼禄提出了废除行省人民感谢决议的法案。所谓感谢决议，就是针对总督卸任时的一种传统。该法案的目的在于防止行省人民的感谢决议，变成对总督治理的“打分表”。这项法案以多数赞成获得通过。从这个插曲我们可以看出，在罗马帝国，即使是行省人民也非常桀骜不驯，这一点非常有意思。

虽然科尔布罗出身于行省，却是一位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将军。科尔布罗出身行省，却悍勇非凡，不能把他与出身于南法而又善于口出狂言的克里特人相提并论。也正是这位将军，使得自奥古斯都以来罗马帝国对亚美尼亚的政策，被完全颠覆了。

外交战

科尔布罗拥有全权处理亚美尼亚问题的空白委任状。此外，他还手握5万雄兵。挥师攻入亚美尼亚之后，罗马军队很快越过幼发拉底河继续前进。而沿途阻碍罗马军队的要塞堡垒都被逐一攻陷，亲帕提亚派贵族的领地也遭到掠夺。罗马军队像推土机一样如入无人之境，畅通无阻，整个亚美尼亚陷入极度恐慌之中。

此时，帕提亚军队在亚美尼亚的负责人是梯里达底，他的兄长沃洛吉斯身在帕提亚却心系在亚美尼亚的弟弟。兄弟两人得知科尔布罗军队的行军概况之后，明白罗马这次是下定决心动真格了。于是，二人立刻联名派遣和谈使者面见科尔布罗。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科尔布罗对帕提亚使者以礼相待，认真听他说明来意。不过，他并没有答复使者，而是命一位百人队队长将回复的信函送到梯里达底的军营。下面是科尔布罗的回复内容：

> 尔等在无足轻重的战斗中（意指与贝图斯的战斗）侥幸获胜，狂妄得忘了自己的低劣实力。为了让你们从傲慢中醒过来，我军出动以来有何战果，你们心知肚明。我罗马军队的铁蹄踏将而来，亚美尼亚势必沦为焦土。尔等最好相信，罗马军队想要达到的目的绝不会善罢甘休。若是梯里达底识时务的话，是不是应该在亚美尼亚化为焦土之前，把它当做我皇的礼物拜谢领受呢？
>
> 至于沃洛吉斯，奉劝采取聪明人的做法，尽早与我罗马帝国恢复友好关系，专心统治自己的国家，不要多管闲事。我早就知道你们东方外敌经常入侵，尔等分身乏术，根本没有余力抽调全军与罗马正面对决。反之，除了亚美尼亚之外，罗马的其余地区皆无战事，后继兵力将源源不断，这点想必尔等非常清楚。如若想要正面交战，胜利一定属于罗马。如此，沃洛吉斯和梯里达底，尔等将遭受罗马军队的沉重一击。

在这封信函中，科尔布罗只提到梯里达底最好接受罗马皇帝赐予的

亚美尼亚皇位，具体如何操作，他只字未提。所以，收到这封信的梯里达底和得知内容的沃洛吉斯把对接受的具体做法，理解为罗马帝国同意了先前沃洛吉斯派人送给尼禄的议和方案。方案的内容是，梯里达底愿意接受尼禄亲自加冕，但是碍于身为神明之官不得跨海航行的传统，加冕仪式只好改在罗马军营内尼禄的雕像前进行。

沃洛吉斯和梯里达底心里一直盘算着，若是罗马同意了这样的条件，那么帕提亚自然没有异议。于是二人联名转告科尔布罗，他们愿意与罗马缔结和平条约，愿意暂时休兵。收到消息之后，科尔布罗立即遣使告诉梯里达底，要求与其面谈。

之所以故意不提加冕的具体方法，这也是科尔布罗早就打算在和梯里达底面谈时的一大筹码。所以，与梯里达底的谈判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科尔布罗派出高官提比略·亚历山大与亚尼斯·维尼奇亚努斯，担任与梯里达底直接谈判的使者。笔者曾在前文中提到过提比略·亚历山大，作为一名犹太人他决心融入罗马社会，担任罗马公职，最终舍弃了犹太教成为罗马公民。提比略·亚历山大在科尔布罗的安排下，成了军备补给站的负责人。而亚尼斯·维尼奇亚努斯则是科尔布罗的女婿，是科尔布罗军团的第5军团长。他们对帕提亚的情况非常了解，是科尔布罗的左膀右臂。科尔布罗甚至提出，在谈判结束之前，把这两名高官留在帕提亚的军营里作为人质。如此这般之后，终于使得梯里达底相信了科尔布罗的诚意，所以他除了回复愿意接受谈判之外，还表示由科尔布罗指定时间与地点。

为了趁热打铁，科尔布罗把时间定在了数日之后，地点就在贝图斯战败之处。之所以短短几天后就举行面谈，想的正是速战速决、立竿见影；而谈判又安排在贝图斯战败之处，为的是通过罗马军队东方最高司令官与即将诞生的亚美尼亚王在此地谈判，就是要让贝图斯军队大败于帕提亚军队的阴晦一扫而光。

科尔布罗与梯里达底达成直接会谈的共识。当天，两人都各自率领

20名骑兵，在相互靠近时，也许是出于对长者的敬重，梯里达底率先跳下了坐骑。科尔布罗看在眼里，也下马步行。两人快步走近后，彼此握手拥抱致意。科尔布罗称赞梯里达底没有鲁莽行事，作出了务实明智的选择。而年轻的梯里达底则夸奖科尔布罗，过去8年间经常听到他的赫赫威名，今天则是第一次有幸识荆。让对手肃然起敬，这正是科尔布罗的拿手好戏。梯里达底还提到，沃洛吉斯皇兄也认为，科尔布罗虽是对手却仍然值得相信。现在，这位传说中的人物正出现在他的眼前，还对梯里达底赞誉有加，让这个头脑简单的帕提亚年轻人感激涕零。结果，梯里达底居然逞能地说道："其实为我加冕，到罗马去也可以。"

谈判后半段的内容没有留下记录，然而从整个事件的后续发展推测，我们可以知道科尔布罗的外交策略斩获颇丰。数日之后，科尔布罗先为梯里达底举行了加冕仪式的前半部分。

尼禄的塑像被放置在了罗马军营的正中央，而塑像前又搭上了祭坛，武装得五花八门的罗马人与帕提亚人围在祭坛四周。科尔布罗则站在祭坛边，看着头戴亚美尼亚王冠的梯里达底径直走向祭坛。梯里达底先向尼禄的塑像行礼，接着取下头上的王冠摆在祭坛之上。加冠仪式的后半部分将在罗马举行，因为接下来的仪式，必须由远在罗马的尼禄亲手把这顶王冠重新戴在梯里达底头上。

梯里达底身为神明之官，不可以航海，那么怎么去罗马呢？科尔布罗说，虽然路途遥远，但又不能违背祖制，从陆路去罗马是最好的选择。从帕提亚到罗马，是一段令人目瞪口呆的距离。我们不清楚他们如何渡过夹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但是走陆路肯定能到，只是时间更长而已。帕提亚王沃洛吉斯曾以胞弟梯里达底身为神明之官不得跨海为由，拒绝他前往罗马接受加冕，如今，他自己掉进了科尔布罗的圈套。因为走陆路就不会违背神明之官的戒律。然而梯里达底原本就向往罗马，科尔布罗劝说了几句，他立刻就点头同意了。对此，沃洛吉斯只好接受木已成舟的事实。

为梯里达底举行的前半部分加冕仪式结束之后，科尔布罗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虽然梯里达底身处罗马军营，却迅速被大家接受，还不依不饶地向邻座的科尔布罗追问很多年轻人特有的问题。比如，夜间巡逻为何要分为4班，每班3小时，百人队队长又为何特意在巡逻前报告？为何必须等号角响起之后大家才能离席？为何军团长帐前的篝火彻夜不熄？对于梯里达底的问题，科尔布罗像慈父般逐一回答。罗马军队严谨的纪律使得这位年轻的亚美尼亚王佩服得五体投地，与此同时，也对即将前往的罗马充满了好奇与期待。此时科尔布罗和梯里达底之间，肯定使用东方地区最普遍的希腊语进行交谈。

梯里达底向科尔布罗提出一个要求，恳求在出发之前向在帕提亚的母亲和兄弟告别。对此，科尔布罗赞扬他孝悌有礼。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梯里达底甚至将自己的幼女留给科尔布罗作为人质，自己返回了帕提亚。

沃洛吉斯见到回国的梯里达底，弄清楚来龙去脉后，对即将前往罗马的胞弟担心不已。沃洛吉斯立即修书科尔布罗，要求科尔布罗信守以下承诺：

第一，在梯里达底前往罗马的途中与抵达罗马之后，不能以臣服者的待遇对待他。

第二，在梯里达底前往罗马途中遇见罗马行省总督，希望不要禁止他们的出迎与拥抱。这表示罗马帝国对帕提亚王之弟梯里达底与罗马高官一视同仁。

第三，梯里达底停留在罗马城期间，希望给予他与罗马帝国执政官同等待遇。执政官所到之处历来有12名护卫为其“开道”，所以希望罗马方面能对梯里达底表示同样的尊敬。

第四，梯里达底在拜会罗马皇帝尼禄的宴席上，准许其带佩剑。因

为帕提亚的传统中，解除武装之后的会见象征着臣服。

科尔布罗一看到这样的语句，自然能够体会到沃洛吉斯对深入敌营的梯里达底的一片赤诚关爱之情，为之十分感动。然而，我们还可以把帕提亚王的忧虑理解为维系王室体统，远胜于其弟的个人安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嫡出的帕提亚王子梯里达底在罗马受到屈辱，那么帕提亚王宫内极有可能将矛头对准非嫡出的沃洛吉斯。科尔布罗对于沃洛吉斯的担心自然了然于心，毕竟对他而言，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重建和平工作是由他一手主导，无论如何都必须圆满落幕。随后，科尔布罗给沃洛吉斯回信，誓言一定严格遵守这四项要求。此外，科尔布罗是罗马帝国东方地区的最高司令官，有权命令众人按他的要求行事，所以他把这些要求写成文书，发往梯里达底前往罗马途中会经过的各行省总督和长官处，让他们依令行事。

亚美尼亚问题的解决

事情已成定局，帕提亚王沃洛吉斯除了答应之外别无他法，话说回来，身在罗马的尼禄皇帝又何尝不是。我们可以用剑道术语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博弈，即他们两人都被科尔布罗“一剑击中”。尼禄接到科尔布罗传来的汇报，大概是在公元63年底到64年春季之间。他原本期待接到的是击败帕提亚军队的捷报，可没想到收到的却是与敌人缔结和平条约的报告。尽管他们赋予了科尔布罗空白委任状，可是科尔布罗的做法完全有悖皇帝与“第一公民辅佐机关”会议的原定方案。

对于和平协议，皇帝可以行使否决权，而作为罗马帝国的法治主权者，元老院和公民，也有权力不承认罗马军团长擅自与敌人缔结的协议。不管是他们当中的谁，只要站出来行使自己的否决权，科尔布罗的外交成果将化为泡影。然而，幸运的是，尼禄、元老院与罗马公民们不但没有一点否认之意，反而对协议表示欢迎。而尼禄行事甚至更为乖

张，宣布愿意负担梯里达底一行全部的旅费，并通过科尔布罗向帕提亚转达了这一消息。

之所以会出人意料地回应这份和平协议，罗马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帕提亚王室作为罗马的宿敌，竟然答应要特地赶来罗马，并亲自从罗马皇帝手中接下王冠完成加冕仪式，这足以证明在帕提亚面前，罗马牢牢占据了上风。这让普通公民、元老院与皇帝都不会太过挑剔。只是想象罗马皇帝将亲手把王冠戴到跪在地上的帕提亚王弟弟的头上，对于大多数罗马人而言，就能够忘记帕提亚人夺走了历来由罗马决定亚美尼亚王的耻辱。

其二，这个原因与第一条原因并不一致，它源于部分罗马人能正视大多数罗马人不愿面对的现实。

与科尔布罗持同样的观点，这些人深知要分裂同属于波斯文化的帕提亚与亚美尼亚难于登天。然而，若是亚美尼亚与帕提亚过从甚密，帝国的东方防御体系将一触即溃，所以拉拢亚美尼亚是必然的。挑起与罗马帝国的事端绝非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的本意，而科尔布罗也将沃洛吉斯为了保护胞弟梯里达底地位的心意，转告了罗马皇帝与议员们。他们知晓帕提亚并无敌意，所以，这些人认为即使帕提亚王的胞弟把持着亚美尼亚的皇位，如若亚美尼亚愿意继续和罗马维持同盟关系，那么承认梯里达底的国王地位并无不妥。我认为尼禄也应该看破了这一点。在面临现实抉择时，哪怕是尼禄太过争强好胜，也不会被虚荣心左右。

回到帕提亚之后，梯里达底向母亲与兄长话别，并举办了饯行宴会。此后就带着大批随从与妻子出发了，这也很有东方君主的一贯做派。一路上他们受到沿路各个行省总督与民众的欢迎。梯里达底的这一趟陆路旅程，前后共用去了9个月的时间。如果是军队，走陆路从罗马到叙利亚的安条克，加上渡过亚得里亚海的2天海路，总共需要125天。至于帕提亚到安条克的距离，如果按军队的行军速度，大概也要150天

时间。同样的路程，梯里达底花了将近两倍的时间，不难想象他们是何等悠闲，一路游玩到了罗马。

罗马与帕提亚的骑兵队共同护卫梯里达底的加冕之旅。然而，梯里达底一行每天的花销高达80万塞斯特斯，即使罗马国库充盈，9个月的旅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是，在罗马看来这是和平的代价，还是比较划算。公元65年，梯里达底浩浩荡荡的一行人花了9个月终于平安抵达罗马。从梯里达底在尼禄雕像前完成了前半部分加冕仪式至今，算起来已经有一年了。

身为神明之官，梯里达底不能走水路。但是登上罗马帝国本土时，由于尼禄当时正好在那不勒斯为这行人接风洗尘，所以他只得打破禁忌，花了两天渡过亚得里亚海。要是这一行人继续从陆路踏上罗马帝国本土，他们就必须由北意大利进入，尼禄当然不可能到南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去迎接梯里达底。帕提亚与罗马之间原本就相隔甚远，而且就全程而言走海路也不过两天时间，所以梯里达底可能就要求手下对这条约束神明之官的戒律明知故犯。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走水路，最终赶到那不勒斯迎接的尼禄与梯里达底共同沿着阿皮亚大道，回到罗马。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同盟国君主的待遇，而是帝国的贵宾级待遇。尼禄与梯里达底年龄差不多大小，两人很快就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

尼禄决定在罗马广场举行加冕仪式的后半部分。手捧王冠、一袭紫衣的尼禄站在广场中央的讲坛上，身披金色王袍的梯里达底则跪在尼禄面前。尼禄亲手将亚美尼亚王的王冠戴在梯里达底头上。站在讲坛左边的是身穿白底红边托加的议员，站着右边的则是身穿金色东方式样服装的帕提亚与亚美尼亚官员。为了观看这难得的盛况，罗马市民们把罗马广场挤得满满当当，在场的市民更是欢声雷动。在这次仪式上，成为亚美尼亚王的帕提亚王之弟梯里达底，还被罗马赠与了“罗马的友好同盟”的称号。

在平和而肃穆的气氛中，加冕仪式结束，随后在庞培剧场的宽阔回

廊中举行国宴。布置豪华的宴会氛围同样是一派祥和。尼禄此时志得意满，心情愉悦，他不仅送了许多贵重礼物给亚美尼亚新王梯里达底，还许诺罗马会竭尽全力协助亚美尼亚重建7年前被科尔布罗攻陷与焚毁的首都阿塔克萨塔。这里所说的协助，指派遣建筑技师和能工巧匠前往阿塔克萨塔援建，也即技术支持。后来尼禄果真兑现了这个许诺。梯里达底将重建的阿塔克萨塔更名为尼禄尼亚（尼禄之都），以示感激。

亚美尼亚王梯里达底在达成了此次罗马之行的目的后，率领众人重返东方。归去也是循着陆路返回，只是梯里达底长途跋涉的目的地不再是帕提亚，而是亚美尼亚。如此一来，科尔布罗也没有必要再继续担任罗马军团东方地区的最高司令官，所以卸任后的科尔布罗奉命回到叙利亚行省，出任叙利亚总督。这次，科尔布罗的新使命，是监视进入新形势下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关系发展。这次人事变动虽然不是提拔他，但科尔布罗仍然心满意足地接受了此项任务。在科尔布罗看来，罗马与帕提亚的两国关系十分重要。

舍名求实，这是帕提亚选择的做法。那么，罗马帝国就真的愿意舍实求名吗？

亚美尼亚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就享受着与罗马其他同盟国不同的待遇。作为独立国家，同盟国没有向罗马缴纳行省税的义务。然而，他们却有责任派兵参加罗马发动的军事行动，也即今天的“后方援助”的义务。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关系，才能被称为罗马的同盟国。在罗马的众多同盟国之中，只有亚美尼亚不必出兵参战，也不必进行后方援助。虽然亚美尼亚是东方仅次于帕提亚的大国，然而这样的特别待遇也太过引人注目了。

对于亚美尼亚皇位的继任者，罗马通常采用特殊的方式来安排以控制亚美尼亚，不过奥古斯都与尼禄的差异，仅仅在于此次是由帕提亚人梯里达底出任亚美尼亚国王。当然，今后帕提亚人会有什么举动无人知晓，所以罗马方面自然不会也不能放松对亚美尼亚的监视。换言之，罗

马在叙利亚设置4个常驻军团，未来也不会变动。这可谓是一场赌博。其实外交何尝不是另一种赌博？然而，这场赌博最终以罗马胜出告终。

对于维系与罗马帝国的友好关系，亚美尼亚王梯里达底不遗余力，往往让人怀疑他不是帕提亚人。对于梯里达底这位新任亚美尼亚国王，罗马帝国并未采取任何会危及他皇位的活动，也非常尊敬他。只要帕提亚人统治的亚美尼亚王国平安无事，那么，帕提亚王沃洛吉斯自然不会轻起事端，这么一来罗马帝国与帕提亚之间也相安无事。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在图拉真皇帝时代来临前的半个世纪里一直维持和平友好。对于两个大国之间这50年的和平，想必现代许多国家的人都会给予积极的肯定。

为梯里达底加冕的3年后，尼禄众叛亲离，最终自杀身亡。帕提亚王沃洛吉斯闻讯后向罗马的元老院递交了以下请求：你们如何评价尼禄是你们的事，我们不管，但是尼禄对帕提亚与亚美尼亚有恩。所以，希望你们允许我们每年继续举办尼禄感恩节。

对罗马而言，与帕提亚维持友好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即使元老院断定尼禄为“国家之敌”，他们还是决定答应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的请求。

科尔布罗是个深谙“战争是端着武器的外交，而外交是没拿武器的战争”这一道理的将军。

早在科尔布罗到任亚美尼亚几年之后，他就建议承认梯里达底的亚美尼亚皇位，以此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尼禄在更早之前就采纳科尔布罗的建议，罗马就不会耗费12年来处理帕提亚——亚美尼亚问题了。不劳民伤财的领导者才是真正有能力的领导人，我深以为然。

歌手首演

正当梯里达底一行还在向罗马缓慢进发的公元64年，罗马的加冕仪式仍然在等着梯里达底的到来，可是，罗马国内就像帕提亚——亚美尼亚问题烟消云散了一样，到处洋溢着和平的气氛。因此，元老院与公民们对尼禄的支持率直线上升。照理说，身为皇帝获得的支持率越高，就需要有更强的自制力。然而，每逢支持率上升，尼禄就会乘机把以往因自重而自我压抑的事情全部翻出来，逐一实施。不出意外，尼禄的怪癖又出现了。

尼禄自幼就喜好诗歌，尤其喜欢用名为“齐特拉”（Cetera）的竖琴给自己伴奏，吟唱自己作的诗。他对自己喜好的解释是，吟诗奏乐是希腊化的精髓。其实如果他喜欢，自娱自乐倒也无妨，可他偏认为自己才华横溢，想要唱给大家听。当然这也是因为他深信这是希腊化的精髓，才有理由让众人听他唱诗。

尼禄从继位以后一直到梯里达底抵达罗马加冕为止，总是召集皇宫内的侍者与随从，为他们表演唱诗。尼禄最担心的是，普通罗马人总会觉得希腊化太过纤柔而极其反感，从而使得听众对他的才华心存偏见。然而，时年27岁的尼禄继位已有10年，而国民对他的高度支持更是提升了他的自信心。一直以来他就自恃才华横溢，厌倦了表演给只会溜须拍马的宫里奴才们欣赏，强烈希望有一天能公开表演，请罗马公民给自己的才华作出评判。现在，他终于下定决心将其付诸实践。

话虽如此，若是真的站在“罗马精神”的发源地首都罗马进行表演的话，尼禄还是缺乏这样的勇气。出于这样的考虑，尼禄把他首次登台献唱的地方选在了那不勒斯郊外的剧场。那不勒斯正如它的希腊名称尼亚波利（Neopolis）一样，是希腊人迁入之后才繁荣的城市，到了罗马时代，仍旧保留着浓郁的希腊化氛围。即使是历史学家塔西佗，也曾这样写道：“这里与希腊本土城市并无二致。”尼禄因此才会盘算到，自己以竖琴伴奏吟诗的形式来诠释希腊化精髓，那不勒斯的居民应该能够理解并欣赏。



复原的竖琴

果不其然，尼禄表演之际涌入了大量的观众，整个剧场被拥堵得水泄不通。然而，这些人并非前来感受“希腊文化精髓”，而是想瞻仰“唱歌的皇帝”。由于尼禄出现在剧场的身份是艺术家，而非皇帝。所以令大家失望的是，他没有以一袭紫衣、头戴黄金月桂冠的扮相出现在观众眼前，而是穿了比专业演员还要朴素的罗马短衣。虽然对这副打扮有些失望，但观众们对站在舞台上卖力抚琴、吟唱自己诗作的尼禄皇帝，还是在仔细聆听他的演奏，掌声不断。这场首演增加了尼禄的信心，很快就敲定了下一场演出的地方为罗马城，在象征罗马精神的堡垒之地展示希腊文化之精髓。而尼禄的下一个目标更为宏大，即前往希腊文化的发祥地，一展自己的风采。然而，尼禄首演不久后发生了一件大事，使得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这美好的愿望。

罗马大火

公元64年7月18日至19日夜，首都罗马大角斗场观众席下，一家店铺突发火灾。在强风的助长之下，火势迅速蔓延到周边的帕拉蒂尼山与西里欧山。罗马到了夏季，就会遭遇西罗科风的袭击，它是非洲吹来的西南风。这股风一旦吹起，就会让浸润在习习西风中的罗马街道气温骤升，像蒸笼一般。还好，这股西南风通常不会停留太久，可偏又不巧这一年的西南风有点异常。起火的大角斗场观众席被烧毁是意料中的事。然而，当天夜里火势就蔓延到帕拉蒂尼山与西里欧山，甚至还烧到了平民聚居区“苏布拉”。皇族的官邸都集中在帕拉蒂尼山上，那里共和制时代发家的望族宅邸也很多，全都被大火无情吞噬。西里欧山上也是高级住宅林立，山的低地一带则是百姓的房屋，不过大火才不管豪宅还是草屋，全都一焚而空。

每逢罗马人在建设帝国的新兴城市之际，总能发挥令人惊叹的都市规划才能，然而如此才能却没有应用到自己的首都建设上。由于罗马城是自然产生的首都，如果要规划罗马的建设布局，城中的“七丘山”就必

须被列为规划对象。这“七丘山”可以说是罗马的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再加上罗马发展成“世界之都”之后，由于人口大量涌入，人口超过了百万，其他都市难以望其项背。

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曾放言，继承时接手的是砖瓦的罗马，他会留下大理石的罗马。然而，奥古斯都所指的仅仅是公共基础建设。要容纳下不断增加的人口，不得不依靠名为“因斯拉”的五六层高的集中楼房。“因斯拉”是中下或下层民众的楼房。除了墙壁用石头建造之外，地板与天花板全都是木质结构。此外，为了扩大屋内空间，二楼以上的窗户大多向外延伸到街道上空。这样一来，原本就狭窄的街道变得更加拥挤。这种类似于大杂院的集合楼房，一般是相邻的两栋楼共用一堵墙壁，换言之，楼房之间根本就没有空隙，“因斯拉”群是一栋接一栋，十分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整个住宅区将无一幸免。

富人奢华的独幢建筑也并非完美无缺。这些豪宅的建材大多是大理石和马赛克，反映出整个罗马帝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但是柱子与柱子间的横梁不是石头而是木质结构。就算横梁上雕龙画凤，再怎么装饰也还是木材。还有，富人家的仆人住房与仓库都在楼上，这些地方的地板和门窗的框也都是木质结构的。当时罗马只有神殿、会堂与剧场等公共建筑物才会用铁制的卡子把石材连在梁上，豪宅也没有做到这一步，所以一旦火焰烧到梁上，房屋塌顶是迟早的事。

而罗马帝国当年就已经有消防队了。罗马帝国的消防队由奥古斯都一手组建，分7个大队共计7000名消防员。然而，由于当时还未发现橡胶，他们当然不能用塑胶水管引台伯河的河水来灭火。所以，人们只能用传递接力的方式来运水灭火。在这样的情形下，消防队的作用充其量就是在大火波及之前把可燃的完好建筑物摧毁，以达到阻止火势蔓延的目的。可是，就是这样的消防队在日后却成了指证尼禄教唆纵火的铁证之一。

这场大火烧到第6天傍晚才被成功扑灭。然而，火灾还没有就此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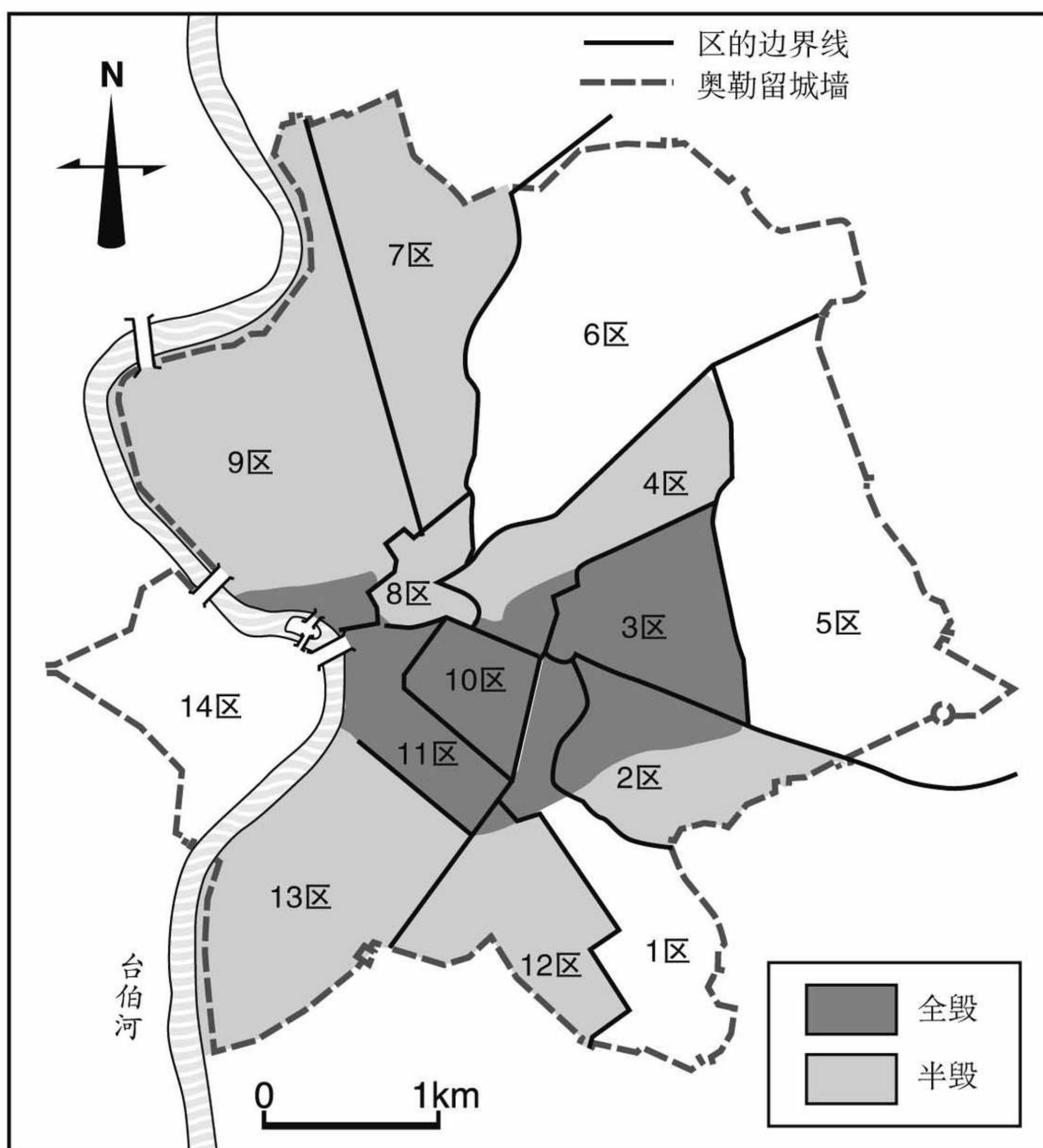
束，余火在强烈的东风之下再度复燃，又连烧了三天三夜。最后在这场大火的肆虐之下，罗马这个“世界之都”在9天的时间内几乎化为灰烬。

不巧的是，尼禄在罗马火灾发生时并未在罗马。当时，尼禄为了躲避酷暑，跑到了罗马以南50公里外的海边小镇安齐奥的别墅之中。火灾发生的第二天，尼禄才知道罗马发生了大火，立即驾着两匹马的战车，沿阿皮亚大道北上赶回首都。他在埃斯奎里山上的别墅没有被大火波及，不过这位27岁的皇帝并没留在家中。他带头指挥救灾，接连发出指令，罗马公民们在他的调度下井然有序地进行救火。

林立在离城中心最近的马尔斯广场上的公共建筑等，由于没有受到火灾的波及，所以向灾民开放。此外，凡是万神殿（现在我们所见的，并非哈德良皇帝时代的建筑物，而是阿格里帕修建的建筑物）、尤利娅选举会场、以“庞培”与“屋大维娅”等命名的回廊、有屋顶的建筑物等等，全部被用做灾民的避难场所。不过，要收容所有灾民，单靠这些建筑远远不够。所以尼禄下令从近卫军团兵营中运来大量帐篷，搭建在这些公共建筑物周围的空地上，也作避难场所用。于是在马尔斯剧场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帐篷村。

尼禄除了为灾民提供避难场所，并没有忘记给这些无家可归的灾民们提供食物。他下令将奥斯提亚港卸货后存放在仓库里的小麦，以及堆积在码头的小麦，全部运往罗马。繁忙的奥斯提亚大道与台伯河源源不断地运来小麦，送到躲过火灾的面粉厂磨成面粉，最后发到灾民手中的，是面粉或面包。然而，灾民们仅仅依靠面粉做成的汤与面包为生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尼禄还命令罗马附近的乡村提供乳酪、蔬菜和水果供应罗马。由于首都罗马有9条水道供应日常用水，资源充足，只有饮用水是唯一不缺乏的物资。

由于灾民们大都一无所有，使得灾民中有许多人投靠了灾区以外的亲戚朋友。尼禄便又下令将罗马小麦的零售价格下调，由往日1摩第（modius）10塞斯特斯降低为3塞斯特斯。



14个行政区的火灾受灾情况（为了帮助理解，在此，特加上当时并不存在的公元3世纪建的奥勒留城墙）

然而，在这场大火中，不幸被烧死、被倒下的建筑物压死、或是被逃难的人潮挤死的到底有多少人，当时的史学家们并未留下确切的数字。塔西陀记录了一次郊外剧场倒塌所造成的死伤人数，然而对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的伤亡人数却没有记载。现代研究者绝大多数持这样的观

点，虽然火灾烧毁房屋无数，然而并没有带来巨大的伤亡。电影《你往何处去》（Quo Vadis）对这次火灾的描绘，基于基督教反罗马的特定立场，在描述死伤时有夸大其实的成分。然而，作为“世界之都”的罗马在这次大火中蒙受了巨大损失，这一点毋庸置疑。

罗马帝国首都被奥古斯都划分为14个行政区域，并沿用至火灾发生之时。在大家看来，大火无情，是不会分行政区域焚烧的。事实上，罗马虽然并没有规规矩矩地按照计划来建成，然而罗马人却利用宽广的街道与广场划分各个行政区。

完全被烧毁的行政区域是以帕拉蒂尼山为中心的第10区以及大角斗场所在的第11区，还有平民居住的第3区苏布拉。这几个区都是城中心的核心部分，然而同在市中心的罗马广场与神殿较多的卡匹托尔山幸免于难，肯定是集中于这一带的公共建筑物全是大理石建筑材料的缘故。

部分被烧毁的包括第2、4、7、8、9、12区和第13区等7个行政区。位于罗马西北部的第7与第9行政区，是在复燃的大火中才被波及的。

逃过一劫的行政区域有第1、第5和第6行政区，以及台伯河西岸的第14行政区共4个行政区。这可能是因为起火点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大角斗场，而这几个区则分布在罗马城的郊区。

重建

首都罗马的这场大火，使得在14个行政区中全部被焚毁的有3个，半焚毁的多达7个，可谓是损失惨重。在大火之后，罗马不得不对受灾区进行全面重建。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以皇帝的名义向全国募捐。募捐一事，在几年之后里昂火灾之后也再度上演，罗马向里昂也捐了400万塞斯特斯，数额与罗马重建时大致相当。罗马既然从行省首都里昂都获得了400万塞斯特斯的捐款的话，想必富饶的亚历山大与安条克也不

会太少。自提比略时代伊始，形成灾区捐款传统之后，自然灾害时互相捐款已经变成惯例。尼禄在罗马重建时指挥若定，只是皇帝下达的命令全都是罗马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在尼禄的观念里，罗马的重建仅耐火还远远不够，还要更加美观。

第一，规定街道比以往更宽，尽量让街道笔直平坦。

第二，住宅建筑的高度限制在60步（约17米）以内。

第三，建筑物之间的间隔，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2.5步（约70厘米）。如果空间足够，还应尽量放宽间隔。所有建筑都要有属于自己的外墙，禁止使用同一外墙。

第四，建筑用的横梁只能用石头，而不能用木材。

第五，“因斯拉”应有自己的庭院。

第六，作为面向街道的住宅的防火措施，各住宅建筑物必须设置石柱门廊，这个门廊的经费由国库开支。

第七，清除了瓦砾与大火焚毁残留物的土地，应当归还给原来的主人。

第八，如果在规定时限内重建自己的房屋或者自己租住的住宅（因斯拉），国库给予奖励。

第九，住宅建筑的所有者必须在自家的庭院内建储水池，而且有义务储存备用水。

第十，水管的重建工作不能自己随意改建，应当交由专业的水管修复人员管理。

当然，这是为了杜绝无耻之徒撬开水管偷水。也正因为如此导致水

压偏低，使得道路边与广场公共水管的消防工作也几乎作废，这也是对这次大火深刻反省之后得出的教训。

第十一，将大火后残留的瓦砾全部运到台伯河岸。从奥斯提亚运小麦的船只，返回时必须顺着堆满瓦砾和废墟的河道走，并且顺道把这些堆积物带到奥斯提亚的沼泽地，因为要充分利用堆积物，所以不能随意乱倒在指定的场所之外。

上述政策就是灾后重建的全部政策。重建的经费开销非常大，单靠行省的捐款是杯水车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尼禄改造罗马城中心的同时，兴建“黄金宫殿”的原因。因此为了确保这些资金的运转，也在这一时期实行了之前稍微提及过的货币改革。

尼禄的货币改革，把原来7.8克纯金制造的奥里斯金币，减至7.3克，而3.9克的第纳尔银币，减至3.41克。此外，第纳尔银币的含银量也从100%下降到92%，但铜币纯度不变。罗马帝国的货币政策从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规定之后，87年来首次有人加以改革，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是货币贬值，然而我不赞同这种说法。

首先，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的经济实力大幅下降，如若非要将这次货币改革与大多数货币贬值政策相比，只是区区0.5克，根本不值一提。

而且，对于尼禄的改革，元老院与市民毫无异议，这也是一个事实。

货币贬值虽然代表经济实力的衰退，但是得益于长期的和平稳定与完善的基础设施，尼禄时代罗马帝国的经济实力一路向上发展。经济增长跟货币的流通量密切相关，但是黄金白银的产量并不一定和经济增长同比攀升。正因如此，近代开发使用纸币，但是古代人还没有这种观念。

同以前相比，黄金白银的产量略微增长了一点，然而经济增长更快。这样一来，能想到的有效经济政策就是缩小金银币的大小。当时，作为流通货币的条件是材料价值与币面价值必须一致，那么就应该尽量避免掺入杂质降低纯度。在经济实力衰退的第3世纪，金银币纯度变低已经成为罗马的一个特色。但是在1世纪的尼禄时期，还没有必要这么做。

为了灾后重建和兴建黄金宫殿的罗马大改造，尼禄的的确确很需要钱。但是动机不良未必后果就不佳。尼禄对金银货币的改革，一直沿用到五贤帝时代后公元215年的卡拉卡拉皇帝再次改革为止，长达150年之久。这跟我们熟悉的货币贬值不一样，反映了罗马帝国经济增长，是现实稳妥的改革证据。

尼禄皇帝兼顾建设与财源的重建政策得到了市民的广泛好评。在灾民与非灾民齐心合力下，罗马建设已经在全体市民的投入中快速进行。罗马也比之前更加井然有序，街道格局也变得更加规整。因此倒苦水的人也有，阳光洒进了罗马的各个角落，空气变得更加闷热。但是，一贯对尼禄持批评态度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却对尼禄赞赏有加，说他此举堪称人类智慧的结晶。

黄金宫殿

作为男人，都有修建宏伟建筑的理想。因此，罗马一直以来也有这样的惯例，即权贵阶级投入自己的私有财产建设公共建筑，然后将之慷慨赠与国家。这与其说是利益的社会回馈，还不如说是一种名誉的社会返还，而且受赠方会在建筑物上镌刻上捐赠方的名字作为回礼。

当然，身为皇帝的尼禄也不例外，然而他的目标不是庞培剧场或恺撒、奥古斯都神庙那样独栋的设施，而是另有策划。此外，尼禄肯定是

以国库来支撑他的梦想，而非自己出钱来实现梦想。在尼禄看来，让国库来完成这些工程是可行的。尼禄跃跃欲试地设想，从帕拉蒂尼山、经西里欧山之下的低地、再到埃斯奎里山开工，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改造计划。

时至今日，在我们游览罗马之际，很难想象西里欧山下的低地没有“圆形露天大剧场”（Colosseum）的罗马的样子。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圆形露天大剧场”时会觉得它就应该那样设计，因为可以眺望盘踞帕拉蒂尼山下的罗马广场遗址。然而，当时的罗马剧场并非有如今天所见的断壁残垣，而是神殿、会场以及各种纪念柱整齐排列的地方。从这里延伸出去还可以看见卡匹托尔山上的众多神殿，往北眺望可以看见雄伟的恺撒与奥古斯都广场，即此地是拥有众多公共建筑的罗马市中心区域。

历朝历代争先恐后进行公共建筑的有权者并不在少数，然而不会给人以低俗的感觉。以石柱廊为例，如果它仅仅只有支撑房屋的作用，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的数量。然而并列的柱子本身就能产生一种美感。集中的建筑物也是这样，也能产生出力量与美感。如果说在眺望茫茫海洋的断崖上建一个孤立的神殿是希腊人的审美观的话，那么将众多建筑集中起来，向外人展现力量与美感就是罗马人的审美观。

然而，尼禄痴迷于希腊文化。尼禄所想的是尝试在罗马城中心重现希腊称之为“阿凯迪亚”（Arcadia）的绿色世外桃源，于是下令兴建“黄金宫殿”。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完全占用了从帕拉蒂尼山到埃斯奎里山全部共计50万平方米的土地。

尼禄在帕拉蒂尼山下开始了他的工程，拉丁语直译为“穿行大厅”的“Domes Transitria”采用了列柱回廊的建筑风格，正中放置了4米高的黄金尼禄雕像。穿过“穿行大厅”，沿欧比斯山丘前的道路右侧往上，即“圆形露天大剧场”所在的低洼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广阔的人工湖。欧比斯山丘上“黄金宫殿”（ Domus Aura）主楼面对着这个人工

湖，而主楼的背后就是埃斯奎里山。这个地方被计划用于饲养动物的公园。据说，人工湖的水从遥远的罗马东北的特沃利引流而至。欧比斯山丘上人工湖一带全部修建了长达1.5公里的三排列柱的回廊。主楼雄伟壮观，甚至连建筑物的天花板都可以旋转，还可以利用上面的机关将花瓣撒落在游人头顶之上。可以说，黄金宫殿是融合了奢华、技术与梦想于一体的宏伟建筑。

在我看来，尼禄将意为私宅的“Domus”命名为这些建筑十分不妥，这是他犯下的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黄金宫殿没有栅栏也没有墙。皇帝的私人住宅本是不可以随便进出的，然而人工湖与自然公园罗马公民都可以随意进出。这也是尼禄想把城中心变成绿地的原因。如果那时候有生态学家，我想他们肯定会与尼禄产生共鸣。

然而，对于城市的理解，罗马人与尼禄并不相同。在罗马人看来，作为一个城市，特别是市中心，拥有可供城市正常运转的设施就能满足他们的生活，希望享受绿地美景大可以到郊外的山庄或别墅。此外，对于拥有第二栋房子，罗马人非常执著，所以他们往往在别墅中费尽心思营造美丽的庭院。这种痴迷可以与近代的英国人相媲美。

这些建筑被尼禄命名为“黄金宫殿”之后，他还感觉不够，甚至还夸口说这里才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这话传到那些渴望在城市中拥有庭院却十分贫困的公民耳中，不免有些刺耳。然而，炫耀并非尼禄的真正用意，他只是希望公民们可以到这里放松休憩。

“黄金宫殿”随着尼禄自杀身亡也搁置了下来。然而，此后的罗马帝国的历任皇帝都对“黄金宫殿”进行了改建。韦斯帕芗皇帝将人工湖改建为“圆形露天大剧场”，而把黄金雕像的尼禄头像换成了太阳神的头像；提图斯皇帝在庭园的西南角建了一个浴场；图拉真皇帝把主楼拆除后也重建了一个大浴场；哈德良皇帝在“穿行大厅”的位置上兴建了一座神殿。经过这些皇帝们的改建，原来的“黄金宫殿”早已面目全非了。在皇帝们有意无意的破坏之下，民众的反感逐渐消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

明了尼禄与罗马人的城市观非常不一致。在罗马人看来，比起波涛翻滚的湖面，宽敞的“圆形露天大剧场”更让人赏心悦目；比起放养动物的自然公园，温暖的浴场更让人心旷神怡，罗马人利用城市的方法不外乎如此。

此外，选错了日子重新动工也是尼禄的失误。

公元64年，就在年初动工的“黄金宫殿”即将落成时，突如其来的罗马大火将“黄金宫殿”也焚毁了，本来重新动工的日期应当稍微推迟一下，然而尼禄好像忘了一般。虽然尼禄一心致力于灾后重建，但对“黄金宫殿”的重建更是不遗余力。在普通民众看来，“Domus”等于私宅，所以尼禄花力气的重建当然让他们愤怒。在罗马公民之间，见面居然会开这样的玩笑：“趁尼禄还没把罗马变成私宅之前，赶快从罗马搬走吧！”

让罗马公民更为愤怒的是，这次火灾造成的灾区差不多与尼禄的“黄金宫殿”预想用地完全吻合，从而引发了罗马公民的纷纷质疑。保护私有财产在罗马实行得非常彻底，即使是皇帝要想要土地，也得出钱向所有者购买。然而，购买需要跟所有者分别交涉，没有充足的时间与金钱，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若是房屋被烧毁，所有者一般都会放弃土地，所以购买起来会比较轻松。因此，罗马大火是由尼禄下令纵火这一谣言也传开了。灾民中还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尼禄在埃斯奎里山的别墅中手抱竖琴，遥望着大火中的罗马，兴高采烈地唱着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特洛伊城沦陷一节的内容。这些谣言加重了灾民们痛恨尼禄的情绪。

罗马公民对尼禄的反感与敌意，使得27岁的尼禄浑身不自在。在他看来，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罗马公民，所以他们理应对自己感恩才是。虽然在罗马大火之前，尼禄偶尔会被罗马公民嘲笑。但从整体上而言，尼禄仍然是一位受罗马公民尊重的皇帝。现在，情势急转直下，尼禄继位以来第一次被敌意包围，这使得他惊慌失措，因此患上了强迫

症。为了打消人民对他的敌意，尼禄绞尽脑汁。就在此时，很多心怀叵测的人趁机向尼禄兜售诡计。

迫害基督教徒

在追查罗马大火纵火嫌疑过程中，为何尼禄会把矛头直指基督教徒呢？犹太教与基督教都一直拒绝融入罗马社会，为何犹太教就可以免遭尼禄的迫害呢？

公元64年夏，作为侥幸逃过火灾的4个行政区之一，犹太人居住的是台伯河西岸第14区。之所以他们会集中在一个地方，源于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奥古斯都允许他们在这一区中建立自己的聚居区。基督教起源于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提比略晚年时期，那时候还没有任何关于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耶稣基督在公元33年左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其信徒们开始传教，主要对象是与信徒们民族相同的犹太人。罗马帝国差不多每一个城市都有犹太人社区，所以罗马帝国也是基督教的传教范围之一。因而，在第三任皇帝卡利古拉与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时代，基督教徒都与犹太人生活在台伯河西岸的犹太人聚居区。

然而，新的运动往往最先遭到身边人的反抗，犹如基督被判刑是因为耶路撒冷犹太教的敌视态度。在尼禄时代，罗马的基督教徒大多是犹太人，他们大多数并非住在犹太人聚集的第14区，而是居住在台伯河对岸的第12区。虽然第12区曾被恺撒下令拆除，但仍然保留了共和制时代塞尔维马斯城墙的外沿。因为是郊区，虽然在大火中受到损毁，程度却并不严重。

由于罗马人是一个信奉多神教的宽容民族，他们认为基督教无非是犹太教的分支，只要不引发社会骚乱，就不会使得罗马宽容的方针改变。然而，在罗马人看来，宽容并不意味着赞同，仅仅是正视对方的存

在。在我看来，罗马人对待犹太教徒的态度可谓是真正的宽容。

罗马人与当地的犹太人没有太大摩擦，这当然与犹太教的选民思想不无关系。只有自己才是神明选中的子民，犹太人对此深信不疑。若是其他民族与他们一样，他们的地位就受到冲击。因此，即使热衷于在自己民族内部坚持信仰，犹太人根本不打算向其他民族传播其宗教。我们也从未曾听过犹太教传教的新闻吧？

然而，基督教与犹太教恰恰相反，耶稣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这完全不符合犹太教的选民思想。不过，我觉得耶稣的平等思想以“基督教的上帝”为前提，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民思想。话说回来，选民思想的差异导致了对待他人态度的不同，也导致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不同。换言之，犹太教对其他宗教的信徒并不热衷，基督教恰好相反。

波兰作家亨利克·显克维奇在其小说《你往何处去》（Quo Vadis）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十分有代表性：在罗马传教的圣彼得拜访罗马首屈一指的大儒、尼禄的亲信佩特罗尼乌斯，热心地游说他皈依基督教。然而，佩特罗尼乌斯不为所动地回答道：

“我深知你们的说教没错，但我死之时，自会饮毒自尽，请你们不要打扰我吧。”

乖乖听话就不是基督教了。基督教肯定不会放任不管。在他们看来，他们所信仰的上帝是唯一的，不相信这位上帝的人说明他还没有了解真正的宗教。所以，基督教徒坚信拯救这些可怜人就是他们的使命，不过这对那些非基督徒而言就是多管闲事。当时的罗马绝大多数人是非基督徒。

从多神教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罗马人眼里基督教徒的多管闲事就是桀骜不驯。《新约·使徒行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描述圣保罗在希腊传教时，在众多神像（希腊人也是多神教徒）的最后面找到一尊名

为“献给未知之神”的神像。和圣彼得不同，圣保罗属于激进的传教士，他对在场的希腊人大声嚷道：“这尊神正是我们唯一之神。”听到这种武断的话之后，希腊人愤怒地将圣保罗毫不留情地赶出了城外。

人类智慧还有尚未涉及的领域，而献给未知的神正是对尚未涉及领域谦虚的表现。如果武断地认为找到了无所不知的唯一之神，对于多神教的希腊人而言，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自大。能够接纳战败者的信仰，导致了罗马的神祇超过了30万个。然而，即便是罗马人十分宽容，他们与怒而赶走圣保罗的希腊人如出一辙。

此外，罗马人有自己独特的感情。罗马人击败埃特鲁斯坎人，随后将他们同化，除了活人祭祀之外，罗马人在这个过程中向埃特鲁斯坎人虚心学习，包括如何建造拱门、如何举行仪式和角斗比赛等。公元前2世纪，迦太基人被罗马人战胜，出于对迦太基人用婴儿来祭祀行为的极端蔑视，就把他们的首都焚为不毛之地。由于凯尔特人的德鲁伊特教也有活人祭祀的风俗习惯，罗马人也将他们赶出加入罗马帝国的高卢和不列颠，并为他们感到羞耻。罗马人比希腊人更厌恶在祭奠神灵时用活人作为祭品。

当然，在弥撒之中，基督教也有用面包与葡萄酒祭奠的习惯，面包象征着耶稣的肉，葡萄酒象征着耶稣的血这一点，罗马人对此十分清楚。然而，从罗马人的角度来看，这与在神灵前供奉牛羊，再把它们宰杀、烤熟、分吃是一样的道理。基督教徒一直强调耶稣之死是一种牺牲，道理大抵如此。

基督教徒吃牺牲者的肉，饮牺牲者的血，而罗马人只吃献祭的牛羊肉。在罗马人看来，基督教徒比埃特鲁斯坎人、迦太基人还要野蛮，甚至比蛮族凯尔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基督教徒的态度，普通罗马人基本是厌恶唾弃。

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徒的态度稍微有些不同。在历史学家塔西佗看

来，基督教徒就是破坏罗马人打造人类共同体制度的始作俑者、阴险的敌人。300年后的罗马帝国，的确验证了塔西佗的观点。

与尼禄时代的犹太人相比，同一时代的罗马基督教徒聚居区规模相对较小，势力低微，没有强盛到必须斩草除根的地步。此外，他们没有犹太人那样的好运，可以获得皇后波比娅的庇护。综上所述，罗马基督教徒当然是纵火罪最好的替罪羊。基督教徒除了犯有"纵火罪"，尼禄还指控他们犯下了"憎恶全人类罪"。

尼禄实施的逮捕并非撒网捕鱼，而是顺藤摸瓜。先逮捕了几个自称是基督教徒的人，然后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供出其他基督教徒，等其招供之后再予以判刑。当然，所谓的判刑一般都是死刑，然而不经审判直接推赴刑场又与罗马法律相悖。所以，在接到告密后，这些司法机构才采取行动，在证据齐全之后立即予以处决。

对这次清剿基督教徒的行动，以塔西佗为首的史学家都没有记载这次殉教者的确切人数。然而，有部分研究者从骇人听闻的刑讯手段，以及罗马以外城市基督教徒的组织规模等推测，处死的基督教徒有二三百人。要一次处死这么多人，的确非常吸引眼球。然而，尼禄并非简单地将其处死，而是当成了一场残酷的表演。传闻梵蒂冈的角斗场就是当时的刑场。

一些基督教徒被强迫穿上兽皮，然后被野狗群咬死。其他人则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这是罗马时代比较普遍的刑法。还有一部分人被用于夜间表演，一个个被绑在并排的柱子之上，然后活活烧死。被烈火焚烧的人肉柱，映得观众席上大气都不敢出的观众满脸通红。尼禄也在角斗场上的战车里，欣赏这残酷的"表演"。

这次基督教徒所遭受的残酷死刑，在市民的心中引起了与尼禄预期相反的情感。塔西佗不相信尼禄纵火，但是他依然这样写道：

> 即使这些人罪有应得，但是过于残酷的刑法让民众动了恻隐之心。其实人们都清楚，这些基督徒会遭此厄运绝不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只是满足一个人的暴虐罢了。

尼禄原打算将纵火嫁祸给市民讨厌的基督教徒，从而消除市民对他的怀疑。然而尼禄失算了，反而使传闻他故意纵火的谣言愈传愈凶。

罗马共和制时代与元首制时代的历史中，最有名的既非尤里乌斯·恺撒，也非奥古斯都，而是尼禄。他不仅十分出名，也可谓是罗马皇帝的代表。当然，罗马帝国延续期间并非如此。在罗马灭亡之后，基督教徒取代罗马人成为世界主人公后才有此定论。公元64年，尼禄迫害基督徒而成为罗马史上的名人。基督教徒极其反感尼禄，称其反基督教。对尼禄的评价在200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丝毫改变。

然而，尼禄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只局限在首都罗马，或许他只是为了转嫁纵火案，而此后没有发生类似事件。

基督教徒称五贤帝为“贤主明君”，这并不意味着在他们统治时期没有迫害基督教徒的事件发生。图拉真皇帝时代，耶路撒冷与安条克两名主教殉教。此外，里昂的基督教也曾经被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皇帝镇压过。然而除了局部地区受到镇压之外，并没有大规模扩散到帝国全境。而镇压的理由并非宗教问题，大多是借口维护社会治安。

进入3世纪，迫害扩散至罗马全国，但这也是从公元202年到250年间的短暂现象。公元250年一过，局势完全转变，公元253、257、258年，都是基督教徒受迫害最为严重的年份。

基督教徒在公元260年到303年期间并没有受到任何迫害。这对于居住在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徒来说无疑是最为宁静的一段日子。

然而，公元303年后基督教徒又遭受了新一轮迫害。戴克里先（Diocletianus）皇帝决定重建罗马帝国，然而，他决心把“打乱罗马人创建的人类共同体制度”的基督教徒彻底肃清。光看这一时期皇帝对基督教徒所下达的清扫令，就可以明白戴克里先的决心多么坚定。这一时期对于基督教徒而言是最大的受难时期。幸运的是，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us）下诏承认基督教徒的信仰自由，才使得灾难结束。基督教徒虽然卷进了帝王间的权力斗争，然而他们最终成为了胜利的一方。

上述的例子是基督教徒受迫害比较引人瞩目的事件，因而仅仅把尼禄看做基督教徒的敌人未免有失公允。尼禄迫害基督教徒的理由，除了指控他们是纵火犯与胁从犯之外，把“憎恶全人类罪”也强加在了基督教徒头上。然而，当时罗马人所说的“全人类”只是“罗马帝国”的意思。尼禄或许根本就没有想到，他居然成了第一个迫害基督教徒的当权者。

唱歌的皇帝

作为一位年轻的皇帝，其实尼禄的性格太过稚嫩，根本就容不得任何人对他的批评、反感与仇视。然而，正因为尼禄喜欢“标新立异”的性格，又不能坦然面对别人的批评、反感与仇视，这种性格使得他经常产生偏激的倾向。要么就是手忙脚乱地想扭转局势而丑态百出，要么就是反应过度地进行回击。不管怎么样，这都是由于不能保持精神平静而产生的心态。当尼禄看到民众对遭受酷刑的基督教徒产生怜悯时，心里也开始感到惴惴不安。

翌年，即公元65年，第二届“五年庆典”——罗马奥林匹亚运动会正式拉开了帷幕。罗马人通常将此盛会称之为“尼禄节”。在这个节庆中，尼禄希望以身体、诗歌和辩论来展现希腊化的精髓。举办此次盛会的初衷，就是要将希腊化融入罗马人的生活中，同时也是为了挽回其逐渐失

去的民心。因此，尼禄向民众表示，他将为自己创作的诗配上曲，参加歌唱比赛。其实，尼禄已经在那不勒斯彩排过，当时就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因此他信心十足。而尼禄很早之前就打算在罗马民众面前进行表演了。

这下子元老院如临大敌，为了降低皇帝自降身份、甘当艺人丑闻的热度，除了内定让尼禄获得辩论与歌唱的冠军之外，元老院别无他法。

对于元老院的好意，尼禄予以严词拒绝。在他看来，以自己的才能根本无须元老院插手。他表明自己要与其他参赛者一样平等比赛，服从裁判员的严格裁判，用自己的实力赢得桂冠。对此，元老院只能无可奈何地袖手旁观。

皇帝表演本身就吸引人，门票免费，罗马的春光又适合出门，所以那天的庞培剧场人山人海。可容纳3万人的露天剧场居然座无虚席，实在是因为尼禄的出演刺激了群众的好奇心。

从尼禄登上舞台伊始，就沐浴在群众的欢呼声与掌声之中。尼禄等这高涨的热情告一段落之后，手抚竖琴，和着自己创作的曲子，深情款款地唱出自己的诗作。从流传至今的几首诗作来看，尼禄的确有这方面的才华。至于曲子，当时无法录音，我们不好判断他的谱曲才华。套用那个时代的评论家的评价，用日语而言就是“下手の横好き”（越是拙劣之人越好瞎摆弄）。声音就是歌手的生命，尼禄的声音还不错，只是不够洪亮。

这些评价对观众而言毫无意义。尼禄唱得很卖力，唱完后他就用身上希腊式短衣袖子擦汗。罗马帝国的上流阶级通常用专用的布擦汗，如若要保持这一礼仪，就得命令仆人把布送到台上来，如此一来，就违背了他不想以皇帝的身份来比赛的初衷。等待评委们评分时，尼禄和其他选手一样，单腿跪着把竖琴抱在怀里，谦虚地安静等待。这一举动让观众很开心，不断为尼禄鼓掌喝彩。尼禄是否胜出，历史学家们没有留下

记录，不过比赛确实非常成功。如果在评委评分的基础上再加上观众投票，尼禄肯定获得优胜，因为没有一个参赛者得到的掌声和欢呼声盖过尼禄。

然而，观众席前面正襟危坐的议员与骑士阶级的男人，满脸鄙夷。观众中有来自行省和同盟国的贵宾，当他们见到艺人打扮的罗马皇帝时，也是一脸惊愕。

比赛非常成功，尼禄对此也很满意。虽然尼禄眼看就要满28岁了，然而在某些方面依然懵懂无知。他不明白人类是种很复杂的生物，亲近和敬意难以在他们心中并存。他也不知道，没有民众的尊敬与支持，皇帝的工作没法进行。年末，发生了一起针对尼禄的暗杀事件，史称“皮索的阴谋”。

皮索的阴谋

盖乌斯·卡尔普尼乌斯·皮索的出身正是这种案件中最具典型的。首先，皮索的家庭背景好。他出身于共和制时代的名门望族，也即尤里乌斯·恺撒后妻的娘家。从不把婚姻与政治混为一谈的恺撒都选择与这个家族联姻，也不难看出卡尔普尼乌斯家族在元老院的地位。卡尔普尼乌斯家族对于成为皇族的尤里乌斯家族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为了消除隐患，卡利古拉在位时，曾经把他流放到外地，克劳狄乌斯上任时才得以回国。

作为一名心胸宽广、亲切友善的绅士，皮索身材健壮，即使人到中年仍然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与不到30岁就肥头大耳的尼禄相比，无论身穿军装还是托加，皮索都是一个有魅力的罗马男子。至于才能与性格，并无特别之处。也许因为他并非才华出众、个性突出，所以才会被挑中在尼禄遇害后担任皇帝。

同决定刺杀尤里乌斯·恺撒的“布鲁图的阴谋”相比，这个“皮索的阴谋”明显不同。

刺杀恺撒的“布鲁图的阴谋”源于对国家体制的分歧而产生两个派别，一派支持庞大帝国由皇帝一人统治，另一派则赞成仿照旧例由元老院统治。换言之，恺撒属于革新派，而布鲁图属于守旧派。恺撒与部分人的私人恩怨，也掺和在了“布鲁图的阴谋”之中。

这次未遂暗杀事件并没有上述两个原因。这些策划者当中的确有忠诚的共和制主义者，然而他们并没有打算推翻元首制，恢复共和制。因为大家都普遍认为，由皇帝一个人治理的元首制要比由元老院少数人统治庞大的罗马帝国实际得多。这些策划者大约20到30人之间，却没有一个人是出于个人野心、私人恩怨以及恐惧害怕，全都是担心罗马帝国的未来才出此下策。出于维护“共同体利益”的责任感而参与谋杀策划，这正是他们的理由。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连主谋都没有。这次暗杀并非由单一的某个人提出来的，而是因为大家担忧罗马帝国的未来而集体商讨出的计划，并决定了刺杀尼禄后的继位人选。除去皮索，这些策划者中的其余人员全是亲近尼禄之人，儿时的伙伴、偏袒尼禄的议员。其中居然还有尼禄的启蒙老师与谋士塞内加。亲近尼禄之人策划暗杀尼禄，与卡利古拉遇刺极为相似，但不同于布鲁图刺杀恺撒，其目的不在改变国体而只是想换一位皇帝而已。卡利古拉与尼禄都是未满30岁的年轻人，除了暗杀他们别无他法。

然而，暗杀行动之前为何会走漏风声呢？

参与者中有一位名叫斯卡耶维努斯的男子，仿佛是要把遗嘱在自己生前兑现一般，居然早早作了财产分配。斯卡耶维努斯以答谢的名义，把财产悉数分给以前忠实侍候自己的仆人们。而得到财产的人中有个解放奴隶，名叫米里库斯。斯卡耶维努斯一再吩咐米里库斯把短剑磨锋利

点，再准备好止血药与绷带，将有大事发生。

米里库斯仔细一想，经常有客人登门拜访斯卡耶维努斯，主人会把他们支开，与这些男子密谈，而以前从未发生过此等怪事。米里库斯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随即将这些情况告诉妻子，同样是斯卡耶维努斯家仆人的妻子对丈夫说，即使你闭嘴不说其他人也会说漏嘴，到时候就会被当成共犯抓起来，还不如现在就去告密。米里库斯带上斯卡耶维努斯吩咐他磨好的短剑，去了尼禄当时住的郊区行宫。尼禄由于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失火，加之“黄金宫殿”尚未完工，暂时住在郊区的一处行宫。

听到米里库斯的告密之后，尼禄大吃一惊。自即位以来，这10多年从未有人想过要谋杀他。他深信自己与在位4年就遭到杀害的卡利古拉不同，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君主。然而，尼禄还是被吓得够呛，他赶紧传唤亲信近卫军长官提格里努斯（Tiglinus），下令他全面搜查。接替布鲁斯近卫军长官一职的提格里努斯出身低贱，他希望通过对皇帝的绝对效忠来掩盖自己的出身。

被捕后的斯卡耶维努斯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他说把短剑的刀刃磨利并无他意。尼禄犹豫不决，他不知道应该相信这位解放奴隶，还是这位议员。就在尼禄差点被斯卡耶维努斯说服之际，情势急转直下，提格里努斯再次拷问了米里库斯。米里库斯招出了来访者中有位名叫纳塔里斯的客人，与主人聊得十分投机。

于是，纳塔里斯也被缉拿归案。属于骑士阶级的纳塔里斯，在罗马仅次于元老院阶级。当他见到血气森森的刑具时，吓得浑身发抖，接着供出了皮索与塞内加。斯卡耶维努斯得知纳塔里斯招供后，也许觉得大势已去，很快说出参与其中的人名。塞内加的侄子——诗人卢坎赫然在列。

卢坎与尼禄生活在同一时代，和伯父塞内加一样，也是出身西班牙行省。他从小由伯父教导，与尼禄算是同门师兄弟。奥古斯都定下的

《百年节赞歌》是诗人贺拉斯的得意之作，尼禄把卢坎从雅典的最高学府召回，要求他创作尼禄节的主题赞诗。在尼禄看来，奥古斯都时代的国民诗人贺拉斯与维吉尔同样声名显赫，这个任务交由卢坎相当于给了他同等的荣耀。卢坎拥护共和制，他的长篇叙事诗《法萨卢斯》，描述了尤里乌斯·恺撒与庞培的生死决战，其偏袒共和派庞培的立场一目了然，不过尼禄依然重用了他。然而，尼禄万万没有想到，他寄予厚望的年轻人也背叛了他。

面对严刑逼供，激情的年轻诗人也弯下了腰。他提供的名单让审讯者难以置信，上面居然有他母亲的名字。

为了抓捕谋叛者，提格里努斯手下的近卫军团把罗马翻了个底朝天。皮索自知前途无望，他在近卫军赶来之前割腕自杀了。被选为次年行政官的拉特拉努斯，来不及自杀就被直接押赴刑场，当即处死。

哲学家塞内加是积极参与，还是装做不知情，抑或与他完全没有干系？我们不得而知。只有纳塔里斯指认塞内加参与谋杀，他的供词只是说，他受皮索之命拜访塞内加，告知皮索对塞内加不愿见他的埋怨，同时带回塞内加的答复。塞内加的回答似乎无懈可击。

“如果经常见面，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如今，我已经退隐，成了普通人，这样的我能否安度晚年，全在皮索一身。”

塞内加仅凭这句话，就被判定有罪。对这位曾经的授业恩师兼辅政大臣的老哲学家，尼禄下令“赐死”。换言之，尼禄命他自行了断。

这位哲学家塞内加已经年近古稀，即使割腕，血液也并不多。所以为了及早解脱，他躺进了放满热水的浴缸，但是没有如愿。最终，在为了促使发汗的蒸汽室的热气中才得到解脱。他在生前没有严厉批评尼禄，他有个愿望，希望在与朋友讨论哲学的过程中安静去世。就这样，罗马史上唯一一个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与世长辞。塞内加曾经

对尼禄寄予厚望，竭尽所能地辅佐他。退隐之后，尼禄如何看待他，对这一点塞内加本人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如果说尼禄“辜负”了塞内加，或许他也会觉得，对一个洞察力远胜常人的哲学家而言，这实在太过浅薄。即使如此，他引退后的著作仍旧保持一贯的飘忽忧郁，我不禁认为，这是老师在远处守望弟子。

与之相反，武士素来以简单直率为美德，他们在临终前的发言反而十分悲壮豪迈。

近卫军团大队长弗劳斯是原计划下手行刺的要犯，当尼禄质问他为何要对曾发誓效忠的皇帝刀剑相向时，弗劳斯这样说道：

“我恨你！当你还是一个受人民爱戴的皇帝时，我敢说没有人比我更忠诚。可是，眼看着你大逆不道弑母杀妻，痴迷于竞赛，后来又热衷于唱歌，甚至沦落到纵火犯罪，我只希望你死！”

百人队队长相当于如今的中队长，身为百人队队长的阿尔普斯气愤地严词谴责尼禄后，平静地走向了断头台。尼禄质问道：“为什么要害我？”阿尔普斯回答道：“要挽回你犯下的种种错误，除了杀了你别无他法。”

显然，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不依靠选举而又想要促进政权更迭时，唯有采取恐怖手段，才能改变一人独揽大权、乾纲独断的现状。参与此次暗杀阴谋的人全都拥有罗马公民权，意即拥有投票权。

纳塔里斯因指认同党得免一死，其他人被下令自裁或处以死刑。鲁弗斯与提格里努斯同为近卫军长官，虽然他也是审问者，然而审讯过程中被抖出参与策划暗杀后也难逃一死。“皮索的阴谋”就此功亏一篑。不知道尼禄怎么打算，他公开了所有审判过程，还以出版物的形式公之于众。难道他不担心民众们看了这些出版物后，同情这些暗杀者，甚至接受他们的言论思想？根据奥古斯都制定的《叛国罪法》，对帝国的第一

公民图谋不轨，与反叛国家同罪论处。所以这些人是罪有应得。

显而易见，在获悉对方意图置自己于死地时，没有人会感念旧情。尼禄原本心胸开阔，如今对谁都揣有防备心理。过了不久，心爱的妻子波比娅也与世长辞。尼禄因此变得更加孤独，疑虑重重，这导致近卫军长官提格里努斯的权力极度膨胀，愈加飞扬跋扈。对这种事情极为敏感且热衷的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就这样写道：恐怖时代再次降临。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是尼禄的密友之一，讽刺文学《萨蒂利孔》（Satiricon）就是他的杰作，他也被下令自裁。如果要说明尼禄是彻头彻尾的暴君，佩特罗尼乌斯是所有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中的最佳人选，相当于从不同角度呈现罗马人对尼禄的评价。在以基督教徒的立场描写罗马的小说《你往何处去》中，佩特罗尼乌斯就是主角之一。

可是，无论怎么假设都必须有说服力。比如批判罗马的体制，如果单从基督教徒这一方面进行论述，根本就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最具说服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列举这一阵营支持者们批评的例子。如果连皇帝的亲信都持反对皇帝的态度，那么更具说服力。在小说家眼里，这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然而，在这些以文章为武器的人口中，与其说是“战略”还不如说是“构造”。

虽然亲近尼禄的人不断离他而去，但他没有因此自暴自弃、滥用职权、不理朝政。似乎是等待皮索的阴谋结束一样，帕提亚王胞弟梯里达底为了前往罗马加冕，经过9个月长途跋涉后终于踏上了意大利国土。如前所述，尼禄亲到那不勒斯，以国宾之礼迎接宿敌帕提亚人。最终，在罗马首都举行的盛大加冕仪式圆满落幕。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亚美尼亚皇位之争，又使得罗马与其头号假想敌帕提亚再度确保了“和平”。罗马广场上的典礼场地民众围得水泄不通，当尼禄亲手把皇冠戴在跪着的梯里达底头上时，民众们对着尼禄山呼皇帝。真正的功臣是科尔布罗，然而市民并不知道。在他们眼里，恢复和平的有功之臣只有尼禄。尼禄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无论功劳由谁所立，只要一

经承认，最后尽归尼禄。沉浸在和平喜悦中的的市民发出阵阵欢呼，作为回应，尼禄下令关闭雅努斯（Janus）神殿大门。战神雅努斯神殿的大门敞开代表战争，关闭意味着和平，这是罗马自古以来的传统。

尼禄原本以罗马公民中“第一公民”这种虚伪的名号称呼自己，现在他享有民众给予的“皇帝”这种颂扬声，仿佛是在公民大会中以掌声、欢呼声的高低来选举一样。那么，此时的尼禄应该重拾皮索阴谋揭发时被动摇的自信了吧。

每天与历史相伴，重温曾经的一切。在这过程中让我感触最深的，决定成王败寇的不是那个人资质的高低，而是取决于他如何运用自己的资质。从这一点来说，尼禄始终在门外打转。他尽干不讨巧的事情，好不容易获得的名声又丢失了。也许在尼禄看来，只要民众支持他，做什么都无所谓吧。在他仿佛获得“和平之神”的赞誉之际，尼禄已经下定决心前往他心驰神往的希腊旅游。然而，这次并非皇帝视察，而是去希腊参加比赛，一展歌喉。

青年将领

尼禄若是个未雨绸缪的人，那么“贝内文托的阴谋”肯定会让他搁置希腊之旅，也应该使他清楚，莱茵河防区与巴勒斯坦等问题不断的地方更值得视察。虽然“贝内文托的阴谋”在萌芽状态就被尼禄掐灭了，也不如“皮索的阴谋”规模浩大，并未对他造成多大影响。然而，事实上这次阴谋影响深远，尼禄更应该深刻反省、思考，寻求根本对策，而非单纯地事后处理。因为罗马军队主力军团首次出现了反对尼禄的迹象。

以这些阴谋策划者聚集密谈的城市为名的“贝内文托的阴谋”，于公元66年正式酝酿成型。这次行动计划由军团的青年将领组织暗杀。他们并没有打算废除帝国政权恢复共和制。作为罗马军队的精英，他们虽然

常年戍守边关，却年纪轻轻就身居军团长或大队长等要职。虽然罗马帝国早就规定他们是今后能够统率4个军团以上的军团长的后备人选，然而由于与29岁的尼禄年龄差距不大，这群热血青年经常指责尼禄没有资格担当罗马帝国的皇帝。

这次阴谋的核心策划人物是一位名叫维尼奇亚努斯的青年将领，作为化解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功臣科尔布罗的女婿，他认为这是为国分忧解难的最佳时机。“贝内文托的阴谋”大概是意欲暗杀尼禄后拥立科尔布罗。为什么说“大概”呢？因为此次阴谋与“皮索的阴谋”不同，没有详细史料，我们只能推测。尼禄曾经公布“皮索的阴谋”的审问过程，然而针对“贝内文托的阴谋”，尼禄以“不值得”为由，没有这样做。尼禄趁他们在贝内文托密谋时全部予以逮捕，居然全是军人。也就是说，参与阴谋的人全是誓死效忠皇帝、拼死捍卫国家利益的青年将领。由于罗马帝国规定，军人不在公民的审判范围之内。事到如今，他们必须接受军法处置。然而，这次结果并未经任何审判马上就出来了，不到10人的青年将领全部被处死。而尼禄则若无其事地照原计划前往希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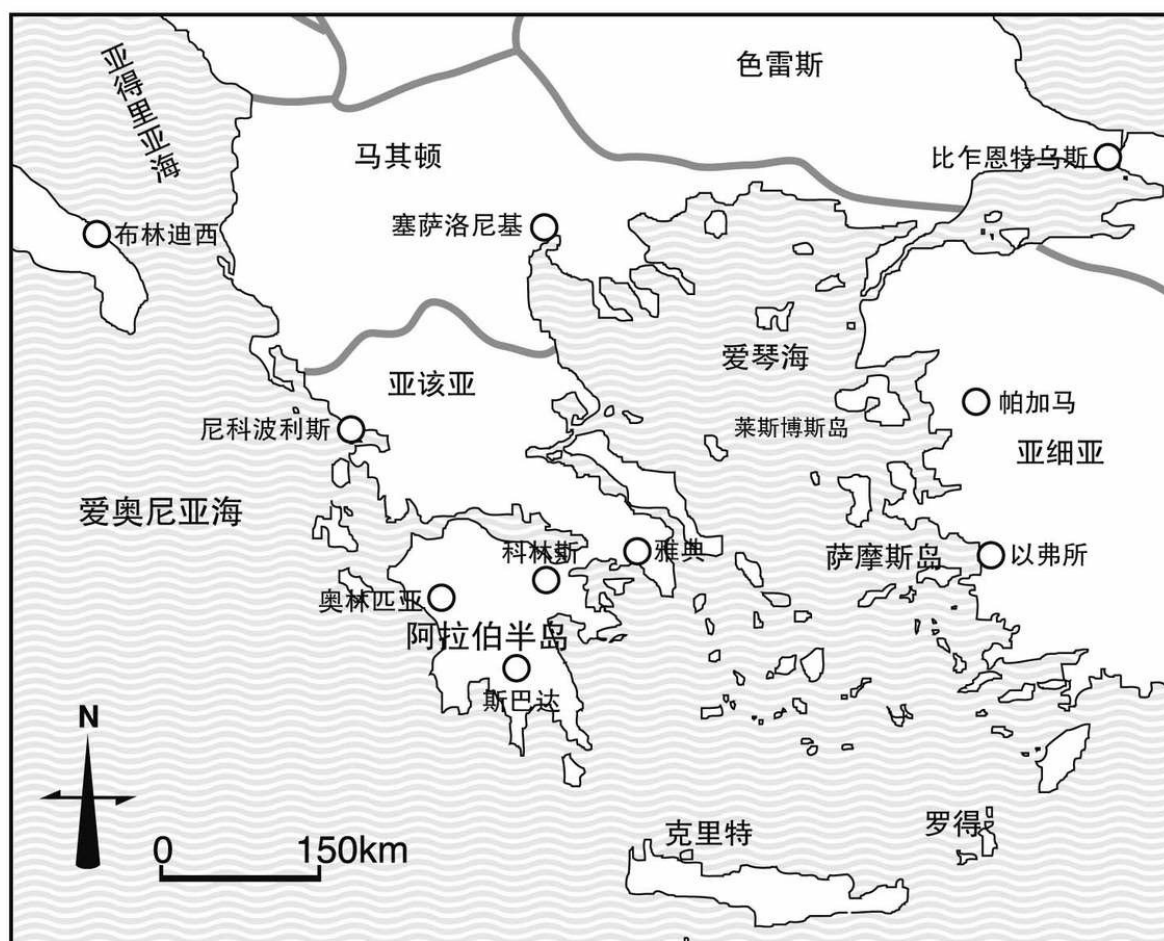
希腊之旅

罗马帝国历任皇帝都会前往各地视察，然而尼禄却是一个特例，从未视察过罗马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罗马帝国疆域宽广，西起不列颠，东至幼发拉底河，北抵莱茵河口，南接撒哈拉沙漠，统治了600多个民族。尼禄作为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亲自前往视察过的地方居然仅仅只有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的几处，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转战罗马帝国东西南北各处的尤里乌斯·恺撒暂且不论，就连擅长纸上谈兵的奥古斯都，从他继位前的内乱时代到登基以后，也亲自去过很多地方。提比略虽然55岁之后才登基，但在他即位之前有着极为丰富的外地巡视经历。甚至只当了4年皇帝的卡利古拉，在位期间也目睹了

莱茵河与多佛尔海峡，这还不算他少年时代与父亲日耳曼尼库斯前往东方的经验。虽然克劳狄乌斯登基时对国情一无所知，然而远征不列颠时他也亲自到过疆场。尼禄与前任皇帝们相比，继位时罗马一派太平，没有动乱与战事，然而他对国情的无知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尼禄统治罗马帝国，截至其去希腊之前，已经12个年头了。这12年间，尼禄见到的只有罗马到那不勒斯这一段国土。

与其说尼禄的希腊之旅是为了收集信息，不如说亲自前往沐浴它的新鲜空气，借此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更为恰当。可惜的是，尼禄根本没有领悟到这个真谛，也缺乏单纯的好奇心。作为一国之君，只要尼禄想做没有什么不可能。另外，皇帝亲自驾临，戍守边关的士兵们肯定欢迎之至。



希腊及其周边国家

在我看来，尼禄的性格虽不属于多疑一类，然而，作为一种探索，无论事前计划得多么周密，旅行一定会遇到计划外的情况。可是，尼禄与其他年轻人不同，他担心遇到意外。举办“罗马奥运会”与兴建“黄金宫殿”来改造罗马市中心，这些都是前人没有尝试过的新事物，这也说明了他并非厌恶新事物。但是，这些归根到底也是“计划内”的安排。此外，尼禄从未进行过即兴演讲，选择首次登台表演的地方，也是非常熟悉的那不勒斯；有了拉拉队作为坚强后盾，才敢在罗马登台表演。

尼禄并非以皇帝身份来完成这次憧憬的希腊之旅的。相反，他是以歌手的身份，带上“奥古斯特阿尼”拉拉队，与其他选手比试自己的表演才华。此外，虽然四年一届的奥运会与科林斯竞赛并非开赛之年，然而，在尼禄的强令之下又开办了这些竞赛。由于尼禄要参赛，原本没有的音乐项目，也在奥运会中增加了进去。拉拉队卖力的声援，加之蜂拥而至的希腊人的喝彩，各地举行的竞赛中，尼禄都获得了冠军，也获得了不少黄金桂冠。通常，奖励冠军的桂冠都是用月桂树的枝叶编织而成，然而由于尼禄获得了冠军，唯有此次桂冠是专门以黄金铸造。



尼禄憧憬中弹竖琴的阿波罗神

即使是这样，尼禄在这次希腊之旅时也履行了皇帝的职责。其中一件是下令开凿科林斯峡谷，使之成为连接爱奥尼亚海与爱琴海的运河，其目的是为了缩短绕道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时间和距离。尤里乌斯·恺撒是首先想到这个工程的皇帝，可惜以后的皇帝都没有打算建造此项工程。因为，这对维护地中海区域的“和平”无关紧要。从军事角度分析，科林斯海峡通航没有太大优势，但是经济方面会获得极大利益。希腊由于人才大量流入罗马帝国出现衰退，开凿科林斯海峡可以改善希腊的经济状况。

然而，尼禄驾崩之后这个工程也被搁置了，再也无人问津。19世纪，苏伊士运河这一举世瞩目的工程完工之后，这条运河才得以顺利完成。虽然重新动工时隔1800年之久，然而有传闻在重新动工之际，工程现场还发现了尼禄时代开凿岩石的遗迹。

也许是为了回报其获得的众多桂冠，或是为了在自己钟爱的希腊留下印记，总而言之，尼禄这次“巡演”顺带给希腊人带来了一份大礼。尼禄宣布将希腊全境都升格为“自由都市”。在此之前，由于雅典与斯巴达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只有这两座城市获得了“自由都市”称号。而这种升格，意味着内政自治，行省税全免。尼禄赋予希腊全境与雅典和斯巴达同等的特权。所以，即便不是希腊人也会对免征收入10%的行省税感到开心。显而易见，我们不难理解当时的希腊人会把尼禄视为最杰出的皇帝这种狂热。

然而，尼禄驾崩不到两年，这些全部变成一纸空文。心智成熟、性格健全的韦斯帕芗皇帝认为，区别对待行省非统治之良策。憧憬希腊化，与冷静处理政治工作完全是两码事。但是，韦斯帕芗皇帝依然承认雅典与斯巴达的特权，这其实也是“政治”。

话说回来，尼禄有时候还是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比如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由于指挥系统不统一，尼禄耗费了10年时间。所以在处理犹太叛乱一事时，为了不重蹈覆辙，他一开始就交由韦斯帕芗全权

处理。

然而，我们只能说，尼禄这一时期言行不成体统。他一方面命令韦斯帕芗全权负责镇压犹太暴动，另一方面，他又愚蠢地命令前线的士兵们避免出动。尼禄在希腊旅途中如此矛盾的指令，大概是他把这些命令视为对“贝内文托的阴谋”的后续处理吧。虽然，此时的罗马军队一派安静祥和，然而从罗马军队之后的变化来看，尼禄的决定实在愚蠢至极。

军团长之死

罗马帝国在莱茵河防线驻守了8个常驻军团，以保障帝国的边境安宁。被称之为高地日耳曼军团的，由一位军团长统率4个军团，担任莱茵河上游至中游河段防御。称之为低地日耳曼军团的，也是由一位军团长统率4个军团，担任莱茵河中游到下游的防御。罗马帝国共有25个军团，守护莱茵河的8个军团是公认的精锐军事力量。然而，此时担任高地与低地日耳曼军团长职位的，刚好是斯克里波尼乌斯家族的兄弟两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前线将领。

斯克里波尼乌斯兄弟俩被尼禄召到了希腊。与此同时，他也传唤了科尔布罗。科尔布罗时任叙利亚行省总督，负责幼发拉底河的防御工作。

作为最高司令官对下属的命令，尼禄在信中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三位军团长毫无防备就直奔希腊报到。然而到达希腊后，尼禄并未召见，他们没有等到皇帝设宴招待的通知，而是赐死的命令。提格里努斯奉命出迎，他指挥近卫军士兵包围了莱茵河的两位军团长，逼迫他们自杀身亡；迎接科尔布罗的是尼禄派来的近卫军士兵，科尔布罗从他们手中接到尼禄的亲笔书信，命其自裁。

塔西佗的《编年史》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最为翔实，可惜这个时期以

后的内容都失传了，所以我们并不清楚，解决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的功臣科尔布罗最后的命运到底如何。至于他临终前是何心情，除了想象之外别无他据。无论如何，有一点毋庸置疑，他没有犹豫，也没有申辩，爽快地举剑自裁。这三位军官，是否确实参与了“贝内文托的阴谋”，还是由于年轻气盛的将领们一时口误而造成的冤案？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尼禄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的确处死了长期驻扎在帝国最重要的两条防线——莱茵河与幼发拉底河的三名军团长。更有甚者，尼禄是先将他们调离了有部下忠心支持的军队之后才命令他们自裁，这种做法的确十分卑鄙无耻。

即便将军队的最高将领处死，军队也并未出现反尼禄的行动，这说明军队上下都在讨好皇帝，有研究者这样记下了当时的场景。确实如此，即使自己的长官遇害，在这一时期属下的士兵们也没有发生叛变。虽然没有行动，但反叛的心理正在酝酿之中。经此一事，以罗马公民为主的罗马军队对尼禄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是这样，此后一年内他们发起的叛乱我们就无从解释。尼禄无凭无据地处死三名军团长，这让他与整个罗马军队为敌。造成这种结果，与其说是尼禄行事过于草率，还不如说他蠢得无可救药。

若是尼禄对军队置之不理，他可能会永远待在希腊。作为皇帝就必须处理此事。尼禄离开罗马期间，一应政事皆由解放奴隶赫利乌斯处理，经赫利乌斯再三劝告，他终于在一年半后返回了罗马。传闻于公元68年1月下旬，尼禄从意大利南部港口布林迪西登陆。

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才终于回到本土。在尼禄看来，凯旋将军的待遇才对得起他的此行，故而，在那不勒斯与罗马都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

凯旋仪式

在希腊之旅全程陪伴尼禄的拉拉队每人手持一块宣传牌，行进在队伍的最前列。宣传牌上详细记录着获胜的各场赛事，在罗马的凯旋仪式中，这是凯旋之人进城时获得的待遇。为了让目不识丁的人也能了解情况，尼禄下令在宣传牌上描绘了他表演时的情景。宣传牌的尽头紧跟着一支队伍，他们高举获胜的奖品黄金月桂冠，据说月桂冠居然有1808顶，那么宣传牌也应该不少于这个数。尼禄作为凯旋将军，最后才慢条斯理地出场了。除了头上戴的不是橄榄枝编的月桂冠，而是黄金月桂冠之外，尼禄依照罗马帝国的古代礼仪，身披绣有金线的深红斗篷，驾着由4匹马拉的战车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到达罗马广场之前的行进路线严格遵循传统，然而经过罗马广场之后却没有登上卡匹托尔山，亲赴最高神祇朱庇特的神殿表示感谢。出人意料的是，尼禄刚进入罗马广场就往左转，耸立在帕拉蒂尼山之巅的阿波罗神殿才是凯旋仪式的目的地。作为艺术之神，阿波罗掌管着艺术。尼禄自认为不是战场上的胜利者，而是艺术上的胜利者，所以他坚信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他的是阿波罗神，阿波罗神才是他应该感谢的对象。

在历史学家的记载中不难发现，尼禄的凯旋仪式让罗马公民欢欣鼓舞。在罗马人看来，有趣新奇的事物都值得享受。更何况这次凯旋仪式打破常规，人们还可以看到春风满面的尼禄。

实际上，大获全胜的凯旋仪式，是人们为了庆祝国家安全得到保障而举行的庆典，这与手抱竖琴、自弹自唱的“巡演”结束后的凯旋完全不一样。所以，罗马的民众们迅速从狂热中回过神来，错不在普通人身上。

然而，对于罗马人迅速冷却的表现尼禄非常不满。在他看来，罗马人缺乏文化素养，于是他动身前往那不勒斯，他认为那里的文化水平高于罗马城。另外，在罗马他只能在奥运会期间登台演唱，但是在那不勒斯则可以完全任由他高兴，随时随地引吭高歌。可惜天不遂人愿，尼禄到达目的地之后突然接到报告，高卢发生暴动。

忧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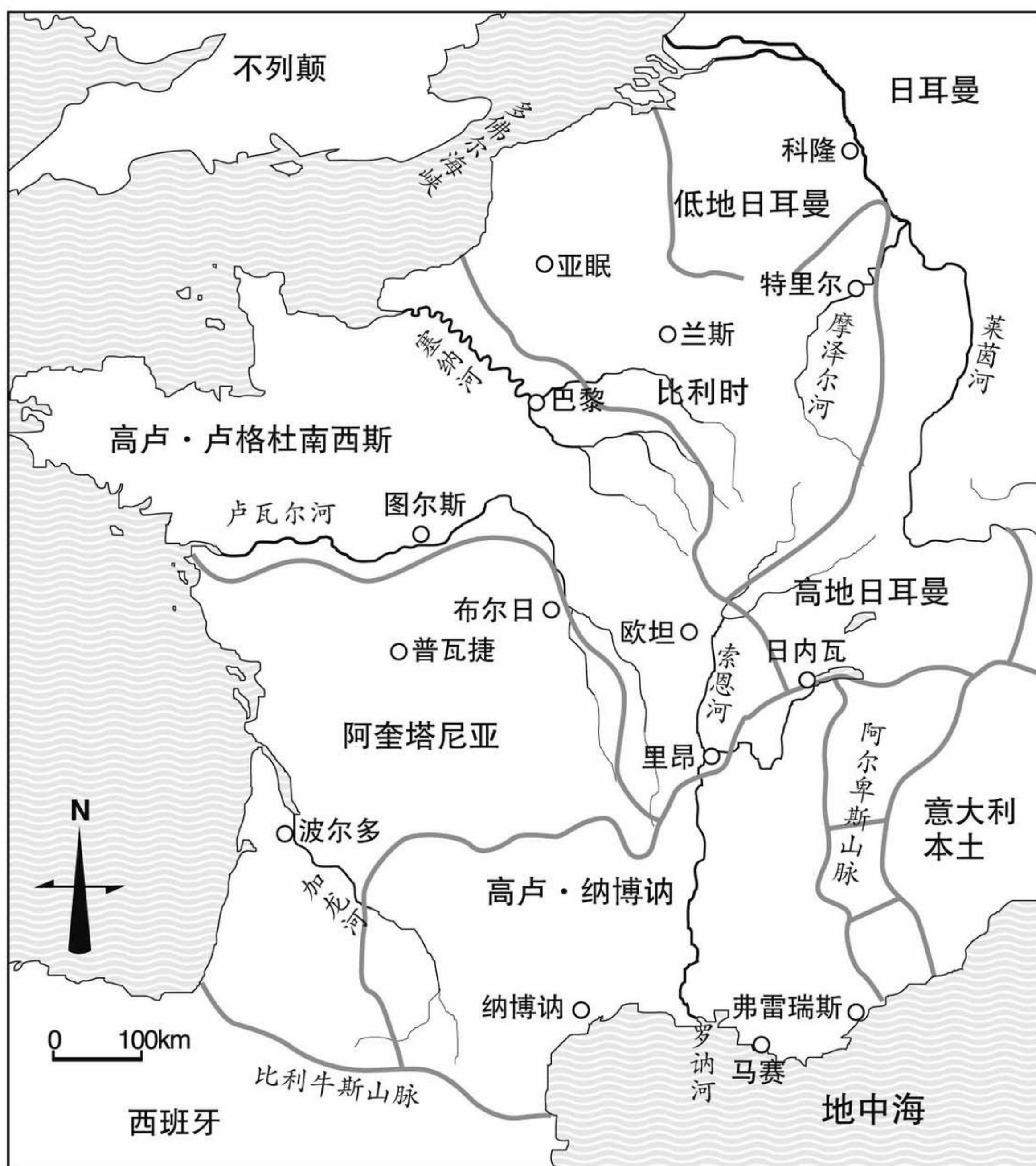
对于当时的罗马人而言，不管是谁，只要一听到盖乌斯·尤里乌斯·温德克斯这个名字，立刻就明白所指何人。比如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这个名字对2000年后的我们来说也是如雷贯耳。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名字。首先，温德克斯表示这个人是高卢人；尤里乌斯家族中，名为盖乌斯的男性多不胜数。百年前恺撒征服高卢之后，将自己的家族名赐予高卢部族首领，所以高卢人从此以尤里乌斯作为自己的家族名。虽然名字较长，然而只有温德克斯才表示他出身于高卢的一个地方，即阿奎塔尼亚（今亚奎丹）。

从父辈开始，这位高卢人的家族已经成为元老院的一员。这种结果得益于公元48年克劳狄乌斯皇帝制定的法律，它规定：高卢人可获得元老院议员席位。起初，这部法律承认当时与罗马历来友好的埃杜伊部族有资格加入元老院。当时大家都可以预见，既然允许部分部族加入元老院，那么其他部族获得这个资格也是早晚的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位温德克斯的父亲就不是埃杜伊族，而是属于阿奎塔尼亚族。

后来，子承父业的温德克斯也成为议员，然而议员职位并非终点，温德克斯甚至出任高卢行省中的重镇“高卢·卢格登”（里昂行省）的总督。如果把这里与罗马化进程较快的“高卢·纳博讷”（南法行省）进行比较，罗马人肯定认为这里比较落后。但克劳狄乌斯这部允许“长发高卢”（法国中北部）的权贵成为议员的法律，从立法到尼禄时代仅仅过去了20年时间，作为征服者的罗马人对被征服者的开放乃至同化速度之快，实在让人惊叹。

东邻莱茵河，北接多佛尔海峡，西至大西洋，南抵比利牛斯山脉，罗马帝国高卢全境分为5个行省（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其中，除南法行省是元老院行省之外，其余4个行省都是

皇帝行省。这4个行省中日耳曼行省位于莱茵河西岸，是防线的最前沿，所以罗马在此设置了常驻军团。此外，比利时、高卢·卢格杜南西斯与阿奎塔尼亚没有驻军。在“长发高卢”的首都卢格登（现在的里昂），罗马只驻扎2个大队（士兵不到1000人）。换言之，20年前行省出生的人没有资格进入元老院，如今罗马不仅让他负责治理高卢，还授予他军权，即使他手下的士兵不足1000人。罗马开国路线由尤里乌斯·恺撒开创，经克劳狄乌斯再次验证，到温德克斯一代终于结出“果实”。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温德克斯“果实”最后居然起兵反抗尼禄。



高卢全境

按理说，温德克斯应该义愤填膺地煽动高卢人：

“在我看来，尼禄根本不配为皇帝，拥护尼禄的罗马人自然没有资格统治我们。罗马人统治我们已经百年了，如今正是我们获得解放、赢

得独立的大好时机。”

然而，温德克斯用的却是这样的言语：

“尼禄把罗马帝国占为己有，整日沉溺于各种消遣、娱乐而萎靡不振，哪里还有泱泱大国一国之主的风范？他大逆不道，谋害生母，甚至以叛国重罪逼死贤臣良将。作为一国之君，他却喜欢化身歌手，琴技不佳，曲不成调，他自己居然沾沾自喜。这种不称职的首领应该及早下台，只有这样才能拯救高卢，拯救罗马人，拯救帝国。”

温德克斯的这番说辞很快鼓动了大约10万高卢人。实际上，这位总督号召群众时用的身份不是高卢人，而是罗马人。另外，他还鼓动同僚西班牙东北部的行省总督加尔巴，说他最有资格取尼禄而代之，成为罗马“第一公民”。

然而，就在卢格登总督温德克斯给西班牙总督加尔巴的亲笔信还在比利牛斯山脉途中时，莱茵河的高地日耳曼军团已经出动，准备镇压此次叛乱。

这8个防守莱茵河的罗马军团，不仅得提防前面日耳曼人的入侵，还得防着背后的高卢人生事。一旦高卢发生叛乱，军团长无须皇帝下令，就必须直接出兵平叛。从军团中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库尔蒂乌斯·鲁弗斯，正是时任高地日耳曼军团的军团长，当他接到温德克斯聚集高卢人叛乱时，当即发兵镇压。

尽管号称10万大军，高卢人依然不是精锐的罗马军队的对手。何况，温德克斯与他手下的高卢人并不希望和罗马军队开战。所以，这支队伍顷刻间溃不成军。也有历史学家记载道，高卢人损兵折将接近2万人。然而，这支罗马军队成功镇压了反抗尼禄的叛乱之后，居然对军团长鲁弗斯说道：“将军如想为王，我们愿效犬马之劳。”

这些罗马军人成功镇压了高卢人的叛乱，但他们反抗尼禄的心情与高卢人大同小异。对于士兵们的劝进，鲁弗斯拒绝了。在他看来，或许是士兵必须忠于自己宣誓效忠的皇帝？或许是在军团里历尽千辛万苦晋升至骑士阶级，连担任议员都还不够资格，又怎能奢望自己可统治帝国呢？他对此举棋不定。然而，反抗尼禄的行动已是此起彼伏。

崛起

西班牙总督加尔巴没有像鲁弗斯一样彷徨犹豫，而是立即响应了温德克斯的叛乱号召。加尔巴出身名门，祖辈们都是议员。加尔巴在统治行省的8年时间里，以德政著称，作为一个公职者，可谓是问心无愧。在他看来，20年前才被获准进入元老院的高卢人都能忧国忧民，作为罗马人岂能甘落人后呢？

伊比利亚半岛今天被分为西班牙与葡萄牙，而在罗马帝国时代则被分为三块：覆盖东部与北部的“希斯帕尼亚·塔拉戈纳西班牙行省”、南部的“贝提卡行省”，以及西部“卢西塔尼亚行省”。伊比利亚半岛的3个常驻军团全部集中在塔拉戈纳西班牙行省，总督是加尔巴，他也是3个总督中最年长的一位。

加尔巴接到报告，高卢人的叛乱被轻易镇压，温德克斯也自杀身亡，然而这并没有动摇加尔巴的决心。加尔巴说，行省总督宣誓效忠的对象仅限于元老院与罗马公民，这等于表明自己反尼禄的立场。公元68年4月2日，距离尼禄的凯旋仪式不到两个月，当时他正大肆庆祝自己的表演成功，引得非议不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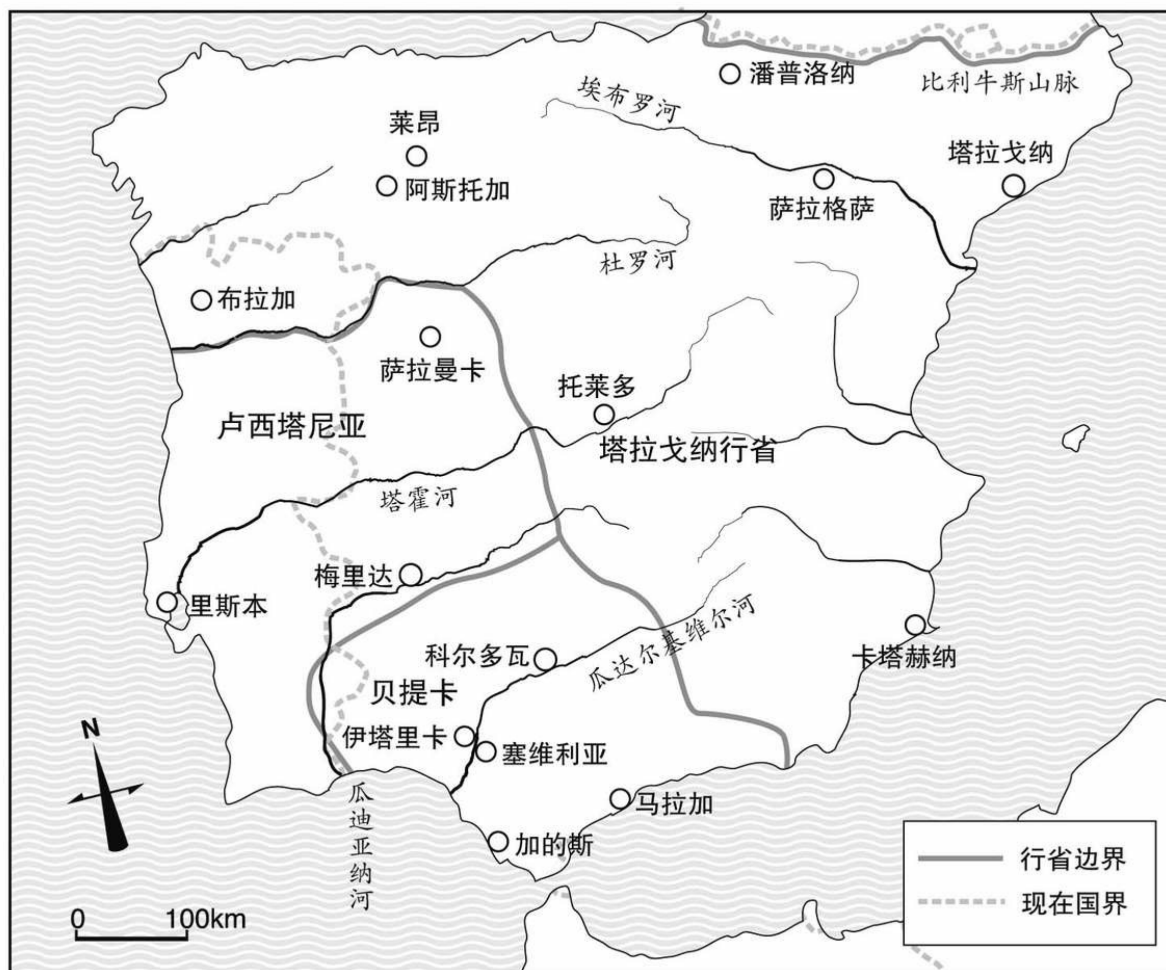
卢西塔尼亚行省的总督奥托对加尔巴表示支持。很早之前，派驻贝提卡行省的财务监察官、即代理总督的凯奇纳也公开表示支持加尔巴。换言之，整个伊比利亚半岛都拉开了反尼禄运动的帷幕。高卢人温德克

斯发起叛乱时，尼禄丝毫没有担心。然而，尼禄对加尔巴的异军突起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加尔巴家族自共和制时代就十分显赫。这次，尼禄不得不离开那不勒斯，急忙赶回首都。

然而，高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因军团长鲁弗斯举棋不定，不敢有任何动作，而低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亦然。加上元老院依然保持观望，在这种情况下，尼禄觉得还有希望挽回局势。

元老院接到报告，加尔巴在西班牙又扩充了一个军团的兵力，所以他们通过决议，把加尔巴定为“国家公敌”。按照规定，要编制一支由罗马公民权利所有者组成的正规军，首先必须获得最高司令官即皇帝的同意，接着由皇帝向元老院提议，元老院通过之后方可执行。加尔巴擅自扩军，是对元老院的冒犯。

然而，这次反抗尼禄的暴乱，扩散到了罗马公民之中。小麦是罗马公民的主食，把小麦运到罗马有专门的船只，但是民众居然发现船上运载的是改建角斗场用的沙子，这还是出自尼禄的命令，这彻底引发了民众对尼禄的不信任。我曾反复强调过，罗马皇帝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民的“安全”与“粮食”。身为皇帝，既不能有效控制负责国民“安全”的军队，也不把保证“粮食”放在心上，罗马民众忍无可忍。



伊比利亚半岛

元老院开始与“国家公敌”加尔巴联系，加尔巴本人在很久之前也派心腹潜入罗马卧底，双方暗度陈仓时日已久。当然，尼禄被蒙在鼓里。

元老院的议员全都是罗马社会的富裕阶层，思想较为保守。在他们看来，72岁的加尔巴比30岁的尼禄更有安全感。再者，加尔巴功勋卓著，经验丰富。历史学家塔西佗曾写道：“很多人都认为，虽然尼禄是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正统人选，然而真正有能力的还是……”当加尔巴率军攻向罗马的消息传来时，摇摆不定的元老院与罗马公民终于作出了选择。

国家公敌

局势突然变得对尼禄非常不利，一直以来信任有加的近卫军长官提格里努斯早已不知所踪。提格里努斯手握1万近卫军，这也是驻扎在罗马帝国本土唯一的军事力量，他不见了，尼禄就失去了一个依仗。而另一位近卫军团长官利比德乌斯拜倒在加尔巴的麾下，成了尼禄的敌人。

就像从即将沉没的船里仓皇出逃的老鼠一样，从尼禄的警卫到伺候其平常生活的奴隶全都逃得一个不剩。他原本准备逃往埃及的船只因为船员纷纷离开，现在空无一人。

屋漏偏逢连阴雨，尼禄被元老院判决为“国家公敌”。笔者曾一再重复过，“第一公民”是罗马皇帝的正式称谓，只有同时获得元老院和罗马市民的认可才有权统治帝国。尼禄被元老院宣布为“国家公敌”之后，意味着他的正当性受到了质疑。元老院发布公告后，由利比德乌斯一人指挥的近卫军决定拥戴加尔巴为“皇帝”。当然，这些士兵也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公民，他们拥有选举权。尼禄失去了元老院与公民的认可，意味着丧失了统治国家的权力。尼禄受到元老院派出的大批士兵的追缉。

即使这样，尼禄仍然没有自杀的勇气。由于尼禄曾经给予希腊特殊政策，在他脑海中还存在着一丝幻想，只要能够亡命希腊，希腊人一定会笑脸相迎。他甚至一度考虑逃往帕提亚，然而，眼下最担心的仍是扑朔迷离的命运。

民间有这样的传闻，虽然尼禄最后众叛亲离，但仍有4个地位卑微的仆人始终不离不弃。其中一个解放奴隶在罗马城外有住宅，位于首都以北的萨拉里亚大道与诺门塔纳大道之间，距首都6公里，尼禄一行决定逃到这栋住宅。大概是这个地方较为偏僻，加上人烟稀少，所以远方的声音清晰可辨。逃进房间之后，顺着东风，甚至连近卫军士兵们“皇帝加尔巴，万岁！”的欢呼声都传到了尼禄的耳朵中。

在后来的传闻中，尼禄此时痛不欲生的处境被描述得更加夸张。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尼禄知道有人会到这个藏身之处抓捕他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自行了断，并最终付诸实施。他甚至在临终前还说了“可怜的艺术家将要死了”这样一句遗言，然而是否真的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以尼禄喜欢咬文嚼字的性格来判断的话，他也许真的说了吧。这句话与他在“黄金宫殿”竣工前夕说的“终于建好像样的住宅了”相似，经常会让人产生歧义。

公元68年6月9日，罗马帝国第五任皇帝尼禄离世，享年30岁零5个月20天。尼禄继位时不满17岁，他在位的时间超过了14年。

接下来则要考虑怎么安葬尼禄了。奥古斯都陵由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兴建，然而时局注定尼禄无法安葬在那里。所以，与第三任皇帝卡利古拉的待遇相仿，尼禄的骨灰被埋在别处。在经过简单火化后，尼禄的遗骸被儿时的乳母及初恋女奴阿可特埋在了其生父杜米提亚家族的墓地内。这处墓地位于马尔斯广场上，然而具体地点现在已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然而，尼禄墓前祭奠他的鲜花水果从不间断，这一点是卡利古拉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从祭奠物品的数量与新鲜程度来看，这些东西不仅仅出自尼禄的乳母与阿可特。死者为大，罗马公民对自杀身亡的尼禄还是比较宽容的。假若抛开尼禄曾经的帝王身份，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更何况，尼禄并非碌碌无为，除了没有善始善终，多少还是有些政绩。换言之，作为领导者，持之以恒的意志力必不可少。

“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是由奥古斯都一手开创，到尼禄时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在我看来，尼禄之死并非单纯意义的奥古斯都血统断绝，而是象征着奥古斯都一手创立的“精致的虚构”的帝国政权终结。

卡利古拉遇害之后，或多或少拥有奥古斯都血缘的后裔，都会被拥

立为新的皇帝。元老院和罗马民众不但不反对，反而赞成如此行事。正因如此，克劳狄乌斯得以顺利继位。他登基时近卫军的确是一大助力，但是仅凭这个依靠不可能让元老院和民众们忍气吞声长达13年。所以，按今天的说法，克劳狄乌斯登基是各方势力互相妥协、达成共识的结果。

同卡利古拉相仿，尼禄也没有后代。但是在庞大的罗马帝国，身上流着奥古斯都血的人并非没有。单论女性一脉，有人嫁到共和制时代已是名门望族的埃米利乌斯家族，也有人嫁入同为名门的尤里乌斯家族。然而，这类人大多遭到清洗，因为卡利古拉或尼禄认为他们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可是如若人们依旧坚信，继承了奥古斯都“血缘”之人就有资格继承皇位，那么肯定能找到符合条件的幸运儿。如果如愿以偿，那么“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可能会加上一个埃米利乌斯什么的名称，变成“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埃米利乌斯王朝”等等，奥古斯都开创的政治体制应当可以万古长青吧。

然而，现实始终不是理想，元老院与尼禄分道扬镳，他们最终选择了与奥古斯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加尔巴，并不认为这么做有悖礼法。士兵和普通民众也不以为意。至此，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被罗马的主权者元老院和公民们抛弃了。自卡利古拉死后，换个人来当皇帝就可以维持统治；尼禄死后，加尔巴无法稳坐皇帝的位子，帝国一年半之内内战频发，原因就在于此。然而，为何一个世纪之后，才有人认为不应该如此选择皇帝继承人呢？

同少数人掌握统治权、多数人共同执政的共和制不一样，君主制是君王一个人独揽大权，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有效监督。实际上，元首制也好，君主制也罢，人类历史上的统治方式基本都有缺乏有效监督这类缺点。

然而，只有奥古斯都开创的罗马元首制存在监督机制。

相信各位在看了我所做的图表之后应该会明白，下面这个巧妙的框架正是罗马皇帝权力构建的基础。

然而，正是奥古斯都创立的这个界限模糊不清的权力框架，才能实现其统治帝国的构想。在奥古斯都看来，他的这个构想相较少数人把持的共和制更为优越，庞大的罗马帝国更适合采用他开创的元首制。奥古斯都沿着恺撒指明的方向前进，已经见证了奥古斯都预见的正确性，因为后来的帝国统治并无大的纰漏。罗马帝国的“和平”并不会因为个别皇帝的统治不力而受到影响，也不会动摇帝国的根本。

奥古斯都不仅仅亲自搭建了这个体系，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人”，对于他创造的这样一个“精致的虚构”体系他心知肚明。然而，要娴熟地驾驭这个体系为己所用，高超的政治技巧必不可少。

我们知道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一个身居高位同时又拥有娴熟高超的政治才华之人，简直可遇不可求。所以，哪怕是君主制的许多方面都是捏造且失于精巧缜密，然而世袭制仍然是君主制国家的首选。在君主制国家眼中，即使统治者没有卓越的政治才华，如若辅佐之人拥有这种才能，实际的政治生活同样可以照常运转。换言之，纵使统治者是弱智或者脑瘫，只要他与前任“血缘”相继，他照样可以统治帝国。当然，要让这个系统维持运转，这也是拥有卓越政治才华之人的责任。也即是说，通过承认权威却不授予权力的方式，弥补了缺乏监督机制的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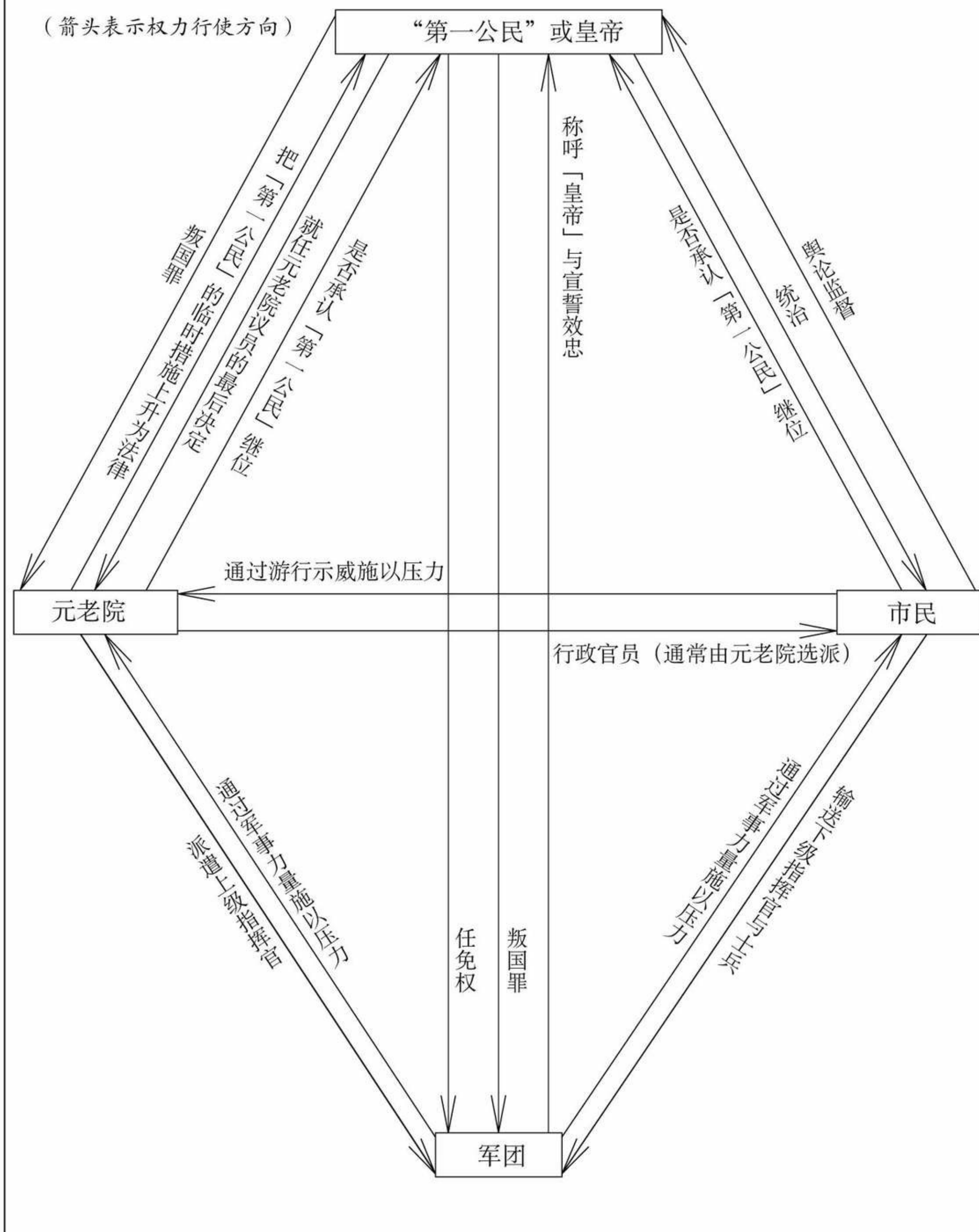
然而，罗马人与这种君主制没有丝毫联系。按照传统，罗马的权威与权力向来尽归一人。因为比起个人的“血缘”关系，罗马人更看重的是能力。即使是在元首制时代，世袭制也并不为罗马人接受。如果真要让罗马人接受世袭制，必须设置可以让他们安心的监督机制。

那么，奥古斯都为何如此钟情于世袭制呢？首先，相比出身都市的恺撒，奥古斯都则出身于农村，他对家族拥有更强的向心力。然而，奥古斯都对于罗马帝国的统治，并没有半点私心，这一点与家族企业的创

始人热衷于让儿子继承家业不同。在奥古斯都看来，世袭制可以避免争夺皇位导致的内乱，这才是真正的目的。然而，自古以来，世袭制并非罗马的最高统治者采用的传统。因此，仅凭“血缘”想当上皇帝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获得元老院和民众的认可。此外，为了使得世袭制更加巩固，士兵们在宣誓效忠自己的最高司令官的同时，也必须向皇帝宣誓效忠。

然而，这只是表面规定，真实情况如前（《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所述，在奥古斯都的巧妙平衡之下，将大部分权力都集中在皇帝身上。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能把权力利用得炉火纯青。没有驾驭这些权力的天赋，或者没有勇气使用这些权力，那么拥有权力也是枉然。因而，是否拥有权力完全取决于表面上的规则。对于罗马皇帝而言，如若元老院与罗马公民撤销对他的认可，罗马军队也拒绝宣誓效忠，那么即使身为皇帝，到那时也会沦为普通人，这就是所谓的表面规则。最典型的就是尼禄走投无路这个案例。

显而易见，在这种表面规则的操控下，“血缘”关系变得无足轻重。而罗马人认为的“血缘”，并非今天所谓的附加值，归根到底罗马人还是崇尚实力至上的一个民族。血缘对罗马人而言，只有拥有实力才会产生价值。尼禄之后的罗马帝国皇帝，全都与奥古斯都毫无血缘关系，这充分说明当时的罗马人早已不再唯奥古斯都的血缘论事了。


奥古都斯创立的政体——“精致的虚构”——拥有自我检查功能的元首制
（箭头表示权力行使方向）
“第一公民”或皇帝
元老院
市民
军团
叛国罪
把「第一公民」的临时措施上升为法律
就任元老院议员的最后决定
是否承认「第一公民」继位
称呼「皇帝」与宣誓效忠
是否承认「第一公民」继位
统治
舆论监督
通过游行示威施以压力
行政官员（通常由元老院选派）
派遣上级指挥官
通过军事力量施以压力
任免权
叛国罪
通过军事力量施以压力
输送下级指挥官与士兵

与共和制时代末期一样，对于没有附加值的实力而言，也难逃正面冲突。与一天时间就摆平了卡利古拉遇刺后的局势不同，尼禄自杀身亡后，罗马恢复和平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在罗马的内乱期间，先后出现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三位皇帝，直到韦斯帕芗继位才算大局已定，而前后差不多持续了一年半的内乱。这位继任的皇帝身上既没有流着尤里乌斯或克劳狄乌斯家族的血液，更不是出身于诸如加尔巴、奥托与维特里乌斯等元老院阶级。韦斯帕芗仅仅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家庭，其父甚至没有稳定的职业。

奥古斯都开创的政体是“精致的虚构”



奥古斯都开创的政体是“精致的虚构”

虽然罗马人与奥古斯都的“血缘”进行了诀别，然而他们并没有否定奥古斯都开创的元首制。罗马帝国的元首制由恺撒描绘蓝图，奥古斯都构建框架，经提比略奠定基础，最后由克劳狄乌斯修修补补才最终确立下来。甚至连感情上倾向于共和制的塔西佗也不能否认，最符合罗马帝国现实的，除了元首制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作为一个并非意识形态类型的民族，罗马人仍然是一个善于与现实抗争的务实主义群体。公元68年夏伊始，虽然罗马帝国经历了长达一年半的动乱，但在此期间并没有探索新的政体。元首制已经成为罗马的共识，问题仅仅在于谁能够有幸成为“代表”而已。但是正因如此，奥古斯都原本辛辛苦苦为元首制设置的监督功能，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或许是我错了，其实暗杀皇帝似乎也成为正常的监督手段之一。

后记

同为罗马人的历史学家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为何要对罗马皇帝们口诛笔伐呢？

如果我们在今天的意大利街头提问：“既是知识分子又身价不菲的人是谁呢？”意大利人的答案肯定会是：“左派。”

塔西佗身为元老院议员，而苏维托尼乌斯则是皇帝的秘书官。塔西佗比苏维托尼乌斯大约早出生15年，然而并没有两人生卒年的史料记载，不过传闻他们都活了60至65岁。可是，无论是《编年史》的作者塔西佗，还是撰写《罗马帝王传》的苏维托尼乌斯，他们都生活在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罗马帝国时代。

塔西佗在尼禄自杀而亡的那一年大约13岁，而苏维托尼乌斯则尚未降生。罗马帝国在尼禄死后，陷入了一年半的混乱状态，在这两个知识分子生活的时代，他们经历的罗马皇帝如下（括号内表示在位时间）：

韦斯帕芗（公元69—79年）、提图斯（公元79—81年）、图密善（公元81—96年）、涅尔瓦（公元96—98年）、图拉真（公元98—117年）、哈德良（公元117—138年）。

罗马帝国“五贤帝”中，后面三位皇帝占了三席。

对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的出生地，历史学家们并不十分了解，然而普遍推测塔西佗出生于南法行省。塔西佗的岳父阿格里科拉的家族姓名是尤里乌斯，出生地记载得很清楚，就在法国南部的法姆·尤里（今弗雷瑞斯）。尤里乌斯·恺撒在发动高卢战役时代，就曾经授予过很多

高卢实权派罗马公民权，甚至把自己的家族姓名尤里乌斯与元老院议员席位等授予了他们，阿格里科拉的祖先应当就是恺撒拉拢的对象。罗马帝国有这样的惯例，即行省出身的人被提拔为元老院议员之后，通常会选择同样出生地的人做自己的女婿。不难推测，法国南部名为高卢·纳博讷的地区很有可能是塔西佗的出生地。

与同样出身行省、最终跻身罗马上流社会的塔西佗不同，苏维托尼乌斯出生于意大利本土，其父是第十三军团的一名大队长。从苏维托尼乌斯的经历推断，他属于罗马帝国的中等阶层。不管怎么说，他们一位是元老院议员，一位是皇帝的秘书官，哪怕是没有处于罗马帝国的权力核心，当也应该是处于接近权力核心圈的地位。

从这两个人的政治态度来看，他们都坚持国家大事不应由个人独揽大权，而应当由元老院这支精英队伍挑起重任，显然上述立场表明他们都属于支持共和制的一派。身为议员的塔西佗身上的这种倾向十分强烈。然而，他们两人都生活在罗马秩序井然、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

如果只是单纯地反对某一种体制，往往会造成自身力量的损失。保存实力又能到达反对体制的目的，唯有提出一个能够取代现行体制的新的制度，才是正确的做法。也只有这样，反对体制才能取得积极的功效。

可是，随着罗马帝国政权的日益巩固，罗马人已经日益认可这种体制，在这种和平与繁荣的罗马帝国政权时代，不可能一味地反对体制，而新的制度也很难产生。甚至连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都没想过摧毁元首制度，回归共和制。

在这种前提下，如若无法提出足以取代旧体制的新制度时，理性的反体制者又如何谋求出路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批判。然而，一个人如果无法相信自己言语所具有的力量，他很容易变成为批判而批判，或者堕落为专门揭露别人丑闻的小人。就像研究者经常说的“塔西佗式悲观主义”，我想他产生悲观情绪的真正原因，并非担忧罗马帝国的未来，而是因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的担忧。这种想法与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然而，最后变成了德国历史学家蒙森说的：“该记的不记，记的都是不该记的。”试想一下，假如报纸上的社论与周刊杂志的八卦新闻，全是今天我们日本人留给后人的史书，那么后人会怎么来看呢？然而，罗马皇帝的不幸之处在于，塔西佗功力深厚，远非写社论的记者可比，他的文章引人入胜，而苏维托尼乌斯亦然，他的文章比周刊杂志的文章更有意思，很适合作为人们闲聊的谈资。正是他们俩功力深厚的文笔，这些文章才得以流传2000年之久。共和制时代的知识分子西塞罗也早就有这样的名言：“无论何时，批判当权者的文章总是受人追捧。”而我们在日本也很容易读到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译本了。

罗马人论述罗马皇帝与非罗马人论述的罗马皇帝，这两种形象大相径庭。对于罗马元首制时期600名议员失去决策国家大事的“自由”，对于非罗马人的希腊人斯特拉波、犹太人斐洛与约瑟夫·弗拉菲乌斯等而言，这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一件史事。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属于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而是被统治阶层。对于居住在罗马的非罗马人而言，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会受到罗马帝国是否正常运转的影响。所以他们的记载更为客观，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因而，非罗马人眼中的罗马皇帝就是：“该记的记，不该记的不记。”不会有丝毫隐瞒。

然而，由于这些非罗马人远离帝国权力核心，这也成为他们论著的硬伤，与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的著作相比，他们的作品缺乏真实性和说服力。仅仅从流传后世这个角度出发，由于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对批判皇帝不遗余力，也迎合了基督教徒们的口味，使得他们的作品流传

更加深广。

塔西佗的作品对后世的罗马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想介绍其中的一些章节。这本书与他崇拜的岳父阿格里科拉有关，名为《阿格里科拉》。笔者向大家介绍他担任不列颠总督时的一些段落，主要记述他如何治理：

> 阿格里科拉就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停战期间，实施了非常有效的措施。虽然不列颠人散居在各个部落过着自己的野蛮生活，然而他们依然拥有彪悍的好斗性。阿格里科拉了解到不列颠人的这种天性，通过竞争关系培养他们过上和平与安定文明生活的习惯。不论是不列颠人为公家或自己修建神殿、论坛（集会广场），还是建造石屋，都会给予奖赏。阿格里科拉积极奖励劳动者，惩罚懈怠者，如此一来，不列颠人之间自然形成竞争关系，总督大可作壁上观，根本就没有必要强制他们干活。
>
> 阿格里科拉让不列颠人部落族长的儿子们学习提高修养的必修课（英语是Liberal Arts）。他还不忘奉承这些族长几句，说不列颠人的聪明远胜高卢人的热情。这样一来，此前一直拒绝学习拉丁语的不列颠人都希望可以早日说一口流利地道的拉丁语。阿格里科拉甚至夸奖不列颠人身穿托加的姿态更加富丽堂皇，而罗马服饰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
> 就这样，不列颠人逐渐忘了他们原本的生活方式，迷恋上了罗马式回廊、浴场与饮食方式。无知而又浅薄的他们以为自己正在迈向文明，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他们成为奴隶的证明而已。

在不列颠，罗马人所做的不仅仅是盖祭祀场所、列柱回廊、议事厅、歌剧院以及浴场。如今的英国还留下诸如街道、上下水道等大量的古罗马遗址，都是当时罗马人的杰作。而痴迷庭院的现代英国人喜欢栽种花草，这当中有很多种类也是由罗马人移栽不列颠的。另外，现代英语中，大约有40%的单词来源于拉丁语。有些英国知识分子在聊到德国

人时，不经意间会流露出德国人是一个没有经过罗马文化熏陶的野蛮民族这样的轻蔑语气。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曾写过，恺撒跨越多佛尔海峡开启了大英帝国的历史。如今，关于古罗马的研究，英国人的成绩足以鹤立鸡群。没有英国人的研究罗马史将无从谈起，当然，这种说法也并不为过。

对于现在英国人的这副姿态，不知塔西佗知道了会作何感想？也许他会再次出言挖苦道，不列颠正是在罗马统治下的奴隶化了吧。

然而，当不列颠人从笔直平坦的街道一眼望去，他们的心里应该清楚，比起过去劳力伤神的道路，现在运输货物应该更加省时省力；当不列颠人站在宽敞屋檐遮挡下的会场内，他们的心里应该知道，哪怕是经常下雨，也同样能够高兴地在里面聊天。养成洗澡的习惯可以预防疾病，铺设水道就不用到远处取水，摆事实讲道理可以避免冲突，这些都是不列颠人从罗马人那里学到的生活习惯。正如塔西佗所言，虽然不列颠并不寒冷，但天地间弥漫着水汽。所以，不论是穿着罗马式长袍还是短衣，不列颠人应该不会再饱受这些天气的困扰了。

现代发达国家的左派知识分子，与武断地认为这些行为都是奴隶化结果的塔西佗如出一辙。他们拥有了一切，却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拼命工作为了电冰箱、洗衣机、汽车是错误的，极力想说服他们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他们不厌其烦地进行说教，从未考虑过自己是否真有这种资格。更进一步而言，不知道这些左派知识分子是否认真思考过，电冰箱、洗衣机让女性减少了多少负担呢？

笔者从心底十分尊敬塔西佗，他让我们了解了当时的历史。然而，有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想抗议几句：“塔西佗，你怎么能这样讲呢？”

大事年表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4	提比略被奥古斯都任命为罗马帝国下一任皇帝的继承者；此外，奥古斯都也指明了提比略之后为日耳曼尼库斯	提比略重返日耳曼战线，除易北河之外，其余重要河流全部纳入帝国统治之下	犹太希律大王驾崩，犹太国一分为三,三个儿子分别执掌一方；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徒要求恢复神权统治，引发暴动，叙利亚总督瓦鲁斯出兵镇压	
5		14 年后，提比略挥军再度进抵易北河畔		
6		罗马军队开始进攻马柯曼尼人	犹太教徒再生异变，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中部地区被纳为罗马行省	
7		潘诺尼亚与达尔马提亚发生暴乱，提比略立即与马柯曼尼人和谈		
8				（中国）汉朝被王莽所灭，新朝开始
9		夏，罗马军队征服了潘诺尼亚；秋，瓦鲁斯指挥的 3.5 万人罗马军队与阿尔米纽斯的日耳曼军队短兵相接；瓦鲁斯 3 个罗马军团在日耳曼中部条顿堡森林全军覆没；冬，达尔马提亚向罗马议和		
10	提比略三度担任日耳曼战役总司令。翌年、再获连任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3	提比略被奥古斯都召回罗马，授予罗马全军“最高指挥权”。其后，日耳曼尼库斯接手日耳曼战线指挥权			
14	为了确定罗马帝国的人口总数，奥古斯都与提比略共同进行了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约494万人拥有罗马公民权。8月19日，奥古斯都在那不勒斯驾崩，时年76岁。9月17日，提比略被元老院推举为“第一公民”，继任罗马帝国第二任皇位	由塔克法里纳斯领导的北非反罗马的暴动正式爆发；罗马军队驻潘诺尼亚营地发生哗变，提比略派儿子杜路苏斯前往平叛；罗马军队驻低地日耳曼营地也发生哗变，日耳曼尼库斯从高卢前往平叛；在经过流血整肃之后，成功镇压了低地日耳曼军团的哗变；罗马军队进攻日耳曼人		
15		春，日耳曼尼库斯率约6万罗马大军越过莱茵河，俘虏了日耳曼人领袖阿尔米纽斯的岳父及妻子，并将他们带回罗马		
16		日耳曼尼库斯带领8万大军攻入日耳曼腹地。成功击溃阿尔米纽斯军队。撤军时受到恶劣天气的干扰，损失不小		
17	5月26日，首都罗马为日耳曼尼库斯举行了凯旋仪式；日耳曼尼库斯将前往东方赴任。长达28年的日耳曼战争，被提比略画上了休止符，同时重新布防莱茵河防线；提比略要求元老院授予日耳曼尼库斯“最高指挥权”。秋，日耳曼尼库斯与其妻阿格里皮娜、其子卡利古拉出发前往东方		小亚细亚南部地区遭受大地震袭击，损失惨重。提比略拟定赈灾政策，重建灾区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8	小亚细亚小国卡帕多西亚与科马根尼被提比略纳入直辖行省。罗马帝国营业税下调，由1%降至0.5%(设置了时限）	1月，日耳曼尼库斯访问亚克兴角海战的遗址	日耳曼尼库斯抵达亚美尼亚首都阿塔克萨塔，并为新王阿尔塔什斯举行加冕仪式。日耳曼尼库斯到达埃及，至次年离开	（中国）赤眉起义
19	提比略以犹太人扰乱社会治安为借口，将他们暂时驱逐出境		春，日耳曼尼库斯从埃及返回叙利亚，随后前往帕尔米拉；10月10日，日耳曼尼库斯病故	
20	元老院审判叙利亚行省总督皮索，罪名是不服从日耳曼尼库斯指挥等，最后自裁而亡			
21	杜路苏斯成为执政官，提比略移交政务，前往那不勒斯近郊，并在当地滞留了一年时间；为解决北非叛乱，提比略任命新总督，整合指挥系统；原叙利亚总督奎里努斯去世，提比略决定用国葬厚葬奎里努斯	塔克法里纳斯发动的骚乱声势日大，严重影响了罗马帝国北非的统治；罗马驻莱茵河军队镇压了高卢东部的叛乱，事件起因于高利率税赋过高		
22	在提比略的请求之下，元老院授予了杜路苏斯“护民官特权”			
23	杜路苏斯突然死亡。提比略对莱茵河及多瑙河等罗马帝国的防线重整进行了调整，并下令补足军团人员空缺，对辅助兵总额等进行了规定	塔克法里纳斯战死，北非问题迎刃而解		（中国）刘秀战胜王莽，新朝灭亡
25				（中国）刘秀即位，史称光武帝，建立东汉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27	提比略把卡普里岛当做隐居地；罗马郊外一个名叫佩特洛小镇角斗比赛场观众席突然倒塌，导致了5000余人伤亡；罗马西里欧山遭遇火灾焚毁一空			（中国）赤眉起义失败，向光武帝投降
28		莱茵河下游的一个日耳曼部族掀起叛乱，罗马军队损失了900名士兵才将叛乱镇压下去		
29	莉薇娅（提比略的母亲，即奥古斯都的遗孀）离世；年末，日耳曼尼库斯遗孀阿格里皮娜与长子尼禄·恺撒被判有罪，分别流放至文托特内岛与蓬扎岛			
30	对阿格里皮娜母子的流放判决正式执行。阿格里皮娜次子杜路苏斯·恺撒也因被指控反叛国家而定罪，处以监禁；尼禄·恺撒死于流放地			
31	1月1日，协助提比略肃清阿格里皮娜派系的近卫军团长官塞亚努斯与提比略同时出任执政官；提比略辞去执政官职务。随后秘密解除塞亚努斯近卫军长官一职，重新任命马克罗担任此职。10月18日，提比略致信元老院，揭发塞亚努斯犯了叛国罪，元老院通过决议判处死刑，并于当天对塞亚努斯执行了死刑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33	阿格里皮娜于流放地文托特内岛离世。次子杜路苏斯·恺撒也离世；有议员被揭发在行省滥放高利贷，导致金融波动，地价暴跌，这也是罗马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提比略拟定公共资金的投入等多项措施，化解了困局			
34			帕提亚乘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什斯去世之际，介入亚美尼亚内政。次年，提比略派维特里乌斯前往叙利亚解决此事，帕提亚从亚美尼亚撤兵	
36	罗马的阿文庭遭遇大火，提比略立即命令救援，起草重建计划			
37	3月16日，提比略在那不勒斯以西的米塞诺海角别墅中驾崩，时年77岁；3月18日，日耳曼尼库斯幼子卡利古拉被元老院授予所有的权力；卡利古拉继任为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9月27日，卡利古拉获封“国父”称号。10月，卡利古拉重病			
38	夏，卡利古拉之妹杜路希拉离世；卡利古拉公布新供水管道的修建方案；10月，罗马发生火灾		埃及亚历山大的希腊人与犹太人矛盾升级，爆发了大规模冲突。以斐洛为首席代表的犹太使节团前往罗马面见卡利古拉陈情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39	罗马帝国财政处于崩溃边缘；春，卡利古拉接见犹太人与希腊人使节团	秋，卡利古拉前往高卢视察，放弃了进攻日耳曼计划		（中国）东汉，对全国农田及户口进行普查
40	5月下旬，卡利古拉回到罗马，8月31日为其举行了凯旋仪式。卡利古拉怀疑其妹小阿格里皮娜及尤利娅·莉薇娅对自己图谋不轨，将她们判处流放；与此同时，卡利古拉与元老院关系日益恶化	3月，卡利古拉放弃进攻不列颠，于多佛尔海峡附近进行军事演习	希腊人与犹太人在犹太地区的对立日益尖锐。犹太人砸毁祭祀卡利古拉的祭坛。卡利古拉命令叙利亚总督佩特罗尼乌斯在耶路撒冷大神殿建造罗马主神朱庇特塑像	
41	1月24日，近卫军团大队长卡西乌斯·卡瑞亚及科尔涅利乌斯·萨比努斯行刺卡利古拉，卡利古拉离世，时年28岁。卡利古拉之妻凯索尼亚与女儿同时遇刺身亡；当日，元老院通过决议，将卡利古拉的所有权限授予克劳狄乌斯，克劳狄乌斯黄袍加身，成为罗马帝国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对《叛国罪法》予以废止，流放文托特内岛的卡利古拉之妹阿格里皮娜得以重返罗马		统治犹太的权力，被克劳狄乌斯交给希律王家族的希律·阿格里帕。耶路撒冷等犹太中部地区恢复35年前的国王统治。克劳狄乌斯将亚历山大拉回正轨	
42	克劳狄乌斯计划在罗马外港奥斯提亚建设一个新港，同年破土动工	作为不列颠势力最大的部族领袖克诺贝里努斯离世，权力争夺战从不列颠蔓延至高卢东北		
43	罗马帝国远征不列颠，克劳狄乌斯任命奥尔斯·布劳迪斯为总司令	4万罗马大军在布劳迪斯的指挥下，从不列颠东南登陆，并在泰晤士河初战告捷；渡过海峡之后，克劳狄乌斯进入科尔切斯特城会见罗马军队，并制定了把不列颠行省化的方案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44	首都罗马为克劳狄乌斯举行凯旋仪式。让人吃惊的是其妻梅莎里娜赫然在列		由于希律·阿格里帕离世，罗马帝国再次接管犹太	
47	罗马为远征不列颠的总司令布劳迪斯举行了简单的凯旋仪式；因梅莎里娜诬告，使得原执政官法雷里乌斯·阿吉阿提库斯自杀身亡			
48	克劳狄乌斯对罗马帝国进行人口普查，约有598万人拥有罗马公民权；克劳狄乌斯举办“百年节”；克劳狄乌斯之妻梅莎里娜犯重婚罪，被克劳狄乌斯的秘书官纳鲁奇索斯下令处死			
49	克劳狄乌斯与侄女小阿格里皮娜（卡利古拉之妹）结婚，这也是其第四次婚姻；哲学家塞内加因被指控通奸而流放到科西嘉岛，小阿格里皮娜将之召回罗马，命其负责教导儿子杜米提亚·阿赫诺巴尔布斯（下一任罗马帝国皇帝尼禄）。后来升任近卫军长官的布鲁斯担任武术教师			
50	小阿格里皮娜劝说克劳狄乌斯收其子杜米提亚为养子，随后，杜米提亚更名为尼禄·克劳狄乌斯		克劳狄乌斯任命阿格里帕二世担任犹太国王，将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划为罗马直辖行省，分而治之	
51	尼禄时年14岁，小阿格里皮娜为其举办成年仪式；罗马帝国受到恶劣气候影响，小麦减产，导致储备量不足		沃洛吉斯继位为帕提亚新国王	犍陀罗艺术诞生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52	于卡利古拉时代开工兴建的两条供水管道竣工，取名为“克劳狄乌斯水道”		帕提亚进攻亚美尼亚，罗马出兵，帕提亚望风而撤	
53	尼禄与克劳狄乌斯之女屋大维娅完婚，并在元老院第一次发表了演讲			
54	10月13日，克劳狄乌斯驾崩，时年63岁（有传言称遭小阿格里皮娜下毒而亡）；就在当天，尼禄接受了近卫军团的“皇帝”称号。元老院也决定授予尼禄一应大权；尼禄继任为罗马帝国第五任皇帝，时年16岁		帕提亚攻占亚美尼亚，沃洛吉斯任命其弟梯里达底就任亚美尼亚皇位；罗马任命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为总司令，出兵亚美尼亚	
55	对于母亲小阿格里皮娜的专横跋扈，尼禄渐生反抗之意；由于担心小阿格里皮娜拥立克劳狄乌斯之子不列塔尼库斯为帝，尼禄谋杀了不列塔尼库斯		春，科尔布罗出任卡帕多西亚与加拉太行省总督，与叙利亚行省总督夸德拉图斯分别指挥两个军团，对帕提亚作战	
57	尼禄合并元老院行省与皇帝行省的财政税收，实现了国库的统一		从这一年的年末到第二年的年初，科尔布罗带军进入小亚细亚山岳地带，进行高强度练兵	（日本）倭奴国向东汉进贡，汉光武帝颁发金印
58	尼禄对于元老院授予的“终身执政官”称号予以拒绝；元老院否决了尼禄提议废除间接税的议案，随后双方达成折中议案		5月，科尔布罗率军发动进攻，攻入亚美尼亚。科尔布罗建议帕提亚上奏尼禄，请求罗马授予梯里达底亚美尼亚皇位，帕提亚拒绝。罗马军队兵不血刃地攻占亚美尼亚首都阿塔克萨塔，将帕提亚军队赶出了亚美尼亚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59	3月21日，尼禄弑母		春，罗马军队将阿塔克萨塔付之一炬，向亚美尼亚第二首都提格兰诺凯尔德进发，再次不费一兵一卒攻下该城。尼禄令梯里达底担任亚美尼亚王	
60	罗马首次举办五年一届的比赛“尼禄节”，规模十分庞大			
61	亚美尼亚再次爆发危机。荣升叙利亚行省总督的科尔布罗向尼禄献策，请求派遣军团长全面负责亚美尼亚战线，尼禄采纳了这个意见，任命贝图斯负责亚美尼亚战事	不列颠爆发了反抗罗马的暴动，罗马1个军团遭到歼灭，约7万人遭到残杀。远征安格尔西回师不列颠的行省总督苏维托尼乌斯，率领1万名士兵与不列颠人展开激战，以胜利收场		
62	罗马首都近卫军团长官布鲁斯病逝；尼禄谋士塞内加隐退；尼禄与妻子屋大维娅离异，迎娶波比娅·萨宾娜。随后，将屋大维娅流放远方，并将其谋害致死		贝图斯到达亚美尼亚前线，统率3个军团。科尔布罗也统率3个军团，并担任叙利亚行省总督一职；陷入帕提亚的包围圈，贝图斯率部无奈投降，被迫同意从亚美尼亚撤军；帕提亚国王沃洛吉斯遣使面见叙利亚总督科尔布罗，要求拆除科尔布罗建于幼发拉底河东岸的所有堡垒以及河上桥梁。科尔布罗提出条件，要求帕提亚从亚美尼亚全面撤离，帕提亚方面予以同意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63	帕提亚王遣使抵达罗马，向尼禄当面递交帕提亚王的亲笔信函。罗马拒绝议和，授予科尔布罗东方地区最高指挥权，准备开战；位于帝国南部的庞贝遭受地震袭击；尼禄建于马尔斯广场的体育馆遭遇雷击，被焚毁		5万罗马大军在科尔布罗的率领下，成功攻入亚美尼亚，并逐一攻陷了帕提亚的军事要塞；帕提亚请求议和，并按照科尔布罗的答复，向罗马表示愿意签订和平条约，双边暂时休兵；科尔布罗与帕提亚国王之弟梯里达底直接面谈。梯里达底同意前往罗马接受加冕	
64	尼禄开工建造“穿行大厅”；在那不勒斯露天剧场，尼禄首次以歌手身份出场表演；7月18日夜，罗马大角斗场观众席下方的店铺发生火灾，火势持续了9天，随后蔓延至罗马全城。尼禄指挥灭火行动，救助灾民，灾后重建等；与上次改革时隔87年，为了保证灾后重建及市中心改革所需资金，尼禄推行货币改革；在兴建“黄金宫殿”之后，尼禄饱受诟病；以纵火罪、“憎恶全体人类”等罪名为借口，尼禄大肆逮捕基督教徒，并予以判刑，然而坊间仍然有“尼禄下令纵火”的传闻		梯里达底前往罗马	

（续）

公元（年份）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65	春，尼禄在第二届“五年节(尼禄节)”中纵情高歌；年末，尼禄发觉了一起二三十人的暗杀行动,被称之为“皮索的阴谋”的矛头直指尼禄。除一人外，皮索、拉特拉努斯等皆被处死或自杀谢罪。塞内加被怀疑参与其中，遂自杀身亡。尼禄妻子波比娅离世；梯里达底到达罗马，在罗马广场从尼禄手中接受亚美尼亚王冠。此后，罗马与帕提亚之间半个世纪相安无事			
66	尼禄再次挖出“贝内文托的阴谋”，作为科尔布罗的女婿，维尼奇亚努斯等青年将领，欲谋杀尼禄，拥立科尔布罗当皇帝，然而阴谋败露，这些嫌犯全部被处死；尼禄以歌手的身份，到希腊旅行		犹太发生暴乱，尼禄命韦斯帕芗全权处理	
67		科尔布罗、高地日耳曼军团长与低地日耳曼军团长，三人被尼禄召到希腊，命令他们自杀谢罪		
68	1月，罗马为从希腊返回的尼禄举行了凯旋仪式；在西班牙发起叛乱的加尔巴，被元老院判决为“国家公敌”；罗马公民对于“粮食安全”怨声载道，反尼禄活动声势日大；元老院宣告尼禄为“国家公敌”；罗马近郊的近卫军一致决定拥立加尔巴为“皇帝”；6月9日，尼禄在罗马郊外的藏身之处自杀身亡	高卢的里昂行省总督温德克斯率10万人揭竿起义，反抗罗马，遭到鲁弗斯统率的高地日耳曼军队残酷镇压；4月2日，西班牙行省（希斯帕尼亚·塔拉戈纳西班牙行省）总督加尔巴响应温德克斯，加入反对尼禄阵营。奥托（卢西塔尼亚行省）和凯奇纳（贝提卡行省）两位西班牙行省实权人物也表示支持加尔巴。加尔巴又扩编一个军团		（中国）建造了白马寺，并从西域引入佛教经典

参考文献

一、第一手资料（如若能翻译的，则尽可能提供给读者译本）

塔西佗（Tacitus，Publius Cornelius）全部著作：

《编年史》（上、下），国原吉之助翻译，岩波文库，1981年

《日耳曼·阿格里科拉》，国原吉之助翻译，筑摩学艺文库，1996年

《同时代史》，国原吉之助翻译，筑摩书房，1996年

苏维托尼乌斯（Svetonius Tranquillus，Gaius）：

《生活中的恺撒》《名人》

《罗马皇帝传》（上、下），国原吉之助翻译，岩波文库，1986年

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罗马历史》

塞内加（Seneca，Lucius Annaeus）全部著作：

《关于人生的苦短》外二篇，茂手木元藏翻译，岩波文库，1980年

《论愤怒》外一篇，茂手木元藏翻译，岩波文库，1980年

《道德信函集——伦理信函集》，茂手木元藏翻译，东海大学出版

会，1992年

《自然研究——自然现象与道德生活》，茂手木元藏翻译，东海大学出版会，1993年

《悲剧集》1，西洋古典丛书第1期第2卷，大西英文、小川正广等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7年

《悲剧集》2，西洋古典丛书第1期第4卷，大西英文、木村健治等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7年

老普林尼（Plinius Secundus，Gaius）

《自然历史博物馆》

《老普林尼博物志》，大槻真一郎责任编辑，八坂书房，1994年

斐洛（Philon）

《晋见盖乌斯》（Legatio ad Gaium）又名《遣往盖乌斯（卡利古拉）处的使节》，西洋古典丛书第2期第5卷，秦刚平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2000年

普鲁塔克（Plutarchus）

《平行的生命》

《道德》

《普鲁塔克英雄传》全12卷，河野与一译，岩波文库，1952年

《普鲁塔克英雄传》（上、中、下），村川坚太郎编，筑摩文艺文库，1996年

《回忆录》13，西洋古典丛书第1期第6卷，户塚七郎翻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7年

《回忆录》14，西洋古典丛书第1期第1卷，户塚七郎翻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7年

《回忆录》6，西洋古典丛书第2期第3卷，户塚七郎翻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0年

《回忆录》2，西洋古典丛书第2期第16卷，户塚七郎翻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

《回忆录》11，西洋古典丛书第3期第4卷，户塚七郎翻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

二、第二手史料——后世学者所著的历史书籍或研究论文

ALEXANDER, W.H., *The Communiqué to the Senate on Agrippina's Death*, 1954.

ANDERSON, J.G.C., *Trajan on the Quinquennium Neronis*,《Journal of Roman Studies（JRS）》1, 1911.

ATKINSON, D., *The governors of Britain from Claudius to Diocletian*,《JRS》12,

1922.

AUGUET, R., *Caligula ou le pouvoir à vingt ans*, Paris, 1984.

BAKER, G.P., *Tiberius Caesar*, London, 1929.

BALDWIN, B., *Nero and His Mother's Corpse*, 《Mnemosyne》, 1979.

BALLAND, A., *Nova Urbs and "Neapolis,"* 《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1965.

BALSDON, J.P.V.D., *The Emperor Gaius*, Oxford, 1934; *Roman Women*, London, 1962; *The Romans*, London, 1965; *Romans and Aliens*, London, 1979.

BARBAGALLO, C., *La catastrofe di Nerone*, Catania, 1915.

BARDON, H., *Les empereurs et les lettres latines d'Auguste à Hadrien*, Paris, 1940.

BEAUJEU, J., *L'incendie de Rome et les Chrétiens*, 1960.

BELL, I.H., *Jews and Christians in Egypt*, 1924.

BÉRANGER, J., *Recherches sur l'aspect idéologique du principat*, Basel, 1953.

BIANCHI BANDINELLI, R., *Roma. L'arte romana nel centro del potere*, Milano, 1969.

BOETHIUS, A., *The Neronian "nova urbs,"* 《Corolla Archaeologica》, Lund, 1932; *The Golden House of Nero*, 1960.

BONACASA, N., *Arte Romana: Scultura*, Roma, 1979.

BONNER, S.F., *Education in ancient Rome*, London, 1977.

BORCH, H.C., *Roman Society: A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History*, Lexington, Mass., 1977.

British Museum Guide to Antiquities of Roman Britain, London, 1922.

BRUNT, P.A., *Stoicism and Principate*,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1975; *The revolt of Vindex and the fall of Nero*, 《Latomus》, 1978.

CARCOPINO, J., *Ostie*, Paris, 1929; *La Table Claudienne de Lyon*, 1930; *La vie quotidienne à Rome a l'apogée de l'empire*, Paris, 1939; *Aspects mystiques de la Rome païenne*, Paris, 1941.

CARSON, R.A.G., *Coins of Greece and Rome*, London, 1970; *Principal Coins of the Romans I-III*, London, 1978-81.

CARY, M. & SCULLARD, H.H., *A History of Rome*, London, 1975.

CASSON, L., *Travel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1974.

CHARLESWORTH, M.P., *Pietas and Victoria, the Emperor and the Citizens*, 《JRS》, 1929; *The Virtues of a Roman Emperor: Propaganda and the Creation of*

Belief, London, 1937;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reigns of Claudius and Nero*, Cambridge, 1939; *Nero, some aspects*, 《JRS》, 1950.

CIACERI, E., *Le vittime del despotismo in Roma nel I secolo dell'impero*, Catania, 1898; *La congiura pisoniana contro Nerone*, 《Processi politici e relazioni internazionali (PPRI)》, Roma, 1918; *Claudio e Nerone nelle storie di Plinio*, 《PPRI》, Roma, 1918; *Nerone matricida*, 1941-42; *Tiberio successore di Augusto*, Roma, 1944.

CLARKE, M.L., *The Roman Mind*, London, 1956.

CLEMENTE, G., *Guida alla storia romana*, Milano, 1978.

COARELLI, F., *Guida archeologica di Roma*, Milano, 1974; *Roma*, Bari-Roma, 1983.

COLLINGWOOD, R.G. & MYRES, J.N.L., *Roman Britain and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I*, Oxford, 1937.

COLUMBA, G.M., *L'impero romano*, Milano, 1944.

COWELL, F.R., *Everyday Life in Ancient Rome*, London, 1961.

CUNLIFFE, B., *Storia economica di Roma antica*, Firenze, 1979.

DE FRANCISCI, P., *Arcana Imperii III-1*, Milano, 1948.

DEMOUGIN, S., *L'ordre équestre sous les Julio-Claudiens*, 1988.

DE REGIBUS, L., *Politica e religione da Augusto a Costantino*, Genova, 1953.

EARL, D.,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 of Rome*, London, 1967.

FABBRINI, L., *Domus Aurea*, 《Analecta Romana Instituti Danici》, 1983.

FABIA, Ph., *Sénèque et Néron*, 1910; *La Table Claudienne de Lyon*, Lyon, 1929.

FERGUSON, J., *The Religions of Roman Empire*, London, 1970.

FERRERO, G., *Le donne dei Cesari*, Milano, 1925.

FRANK, T.,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33 A.D.,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 Baltimore, 1940.

GARZETTI, A., *Aerarium e fiscus sotto Augusto*, 1953; *L'impero da Tiberio agli Antonini*, Roma, 1960.

GATTI, C., *Gli "equites" e le riforme di Tiberio*, 1953.

GENTILI, B.,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latina*, Roma, 1976.

GRANT, M., *Aspects of the Reign of Tiberius*, 1950; *Roman Imperial Money*, London, 1954; *Roman History from Coins*, Cambridge, 1968; *Nero*, 1970; *The Jews and the Roman World*, London, 1973; *History of Rome*, Roma, 1981.

GRIFFIN, M.T., *Seneca, a philosopher in politics*, 1976; *Nero, the end of a dynasty*, 1984.

GRIMAL, P., *La civilisation romaine*, Paris, 1960.

HAMMOND, M., *Corbulo and Nero's Eastern Policy*,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1934.

HARDY, E.G., *Claudius and the Primores Galliae: A Reply and a Restatement*, 1914.

HARRIS, H.A., *Sport in Greece and Rome*, Ithaca, 1972.

HAVERFIELD, F. & MacDONALD, G., *Roman Occupation of Britain*, Oxford, 1924.

HEINZ, K., *Das Bild Kaiser Neros bei Seneca, Tacitus, Sueton und Cassius Dio*, Bern, 1948.

HEMSOLL, D., *The architecture of Nero's Golden House*, in *Architecture and Architectural Sculpture in the Roman Empire* (ed. by HENIG, M.), 1990.

HENDERSON, B.W., *The Chronology of the Wars in Armenia A.D.51-63*, 《Classical Review》 15, 1901.

HEUBNER, H., *P. Cornelius Tacitus. Die Historien. Kommentar*, Heidelberg, 1963-82.

HOPKINS, K., *Conquerors and Slaves*, Cambridge, 1978.

HUMPHREY, J.H., *Roman Circuses. Arenas for Chariot Racing*, London, 1986.

JOLOWICZ, H.F.,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oman Law*, Cambridge, 1972; *The Roman Economy*, Oxford, 1974.

JOSSA, G., *Giudei, pagani e cristiani*, Napoli, 1977.

KENT, J.P.F., *Roman Coins*, London-New York, 1978.

KNOKE, F., *Die Kriegszüge des Germanicus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22.

KORNEMANN, E., *Tibère*, Paris, 1962.

LANCIANI, R., *Rovine e scavi di Roma antica* (1897), Roma, 1985.

LAVER, P.G., *The Excavation of a Tumulus at Lexden, Colchester*, 《Archaeologia》 76, 1927.

LE GALL, J., *Le Tibre, fleuve de Rome dans l'aniquité*, Paris, 1953.

LEON, H.J., *Ball Playing at Rome*, 1946.

LEVI, M.A., *Nerone e i suoi tempi*, Milano, 1949; *Il tempo di Augusto*, Firenze, 1951.

LUGLI, G., *Roma antica. Il centro monumentale*, Roma, 1946.

LUTTWAK, E.N.,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Baltimora, 1977.

MacDONALD, W.L.,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Roman Empire,* New Haven, 1965.

MAGDELAIN, A., *Auctoritas principis,* Paris, 1947.

MANNI, E., *La leggenda dell'età dell'oro nella politica dei Cesari,* 《Atene e Roma》, 1938.

MARCHESI, C., *Seneca,* Messina, 1920.

MARKUS, R.A., *Christianity in the Roman World,* London, 1974.

MARROU, H.I., *Histoire de l'éducation dans l'Antiquité,* Paris, 1965.

MARSH, F.B., *The Reign of Tiberius,* Oxford, 1931.

MARTINAZZOLI, F., *Seneca, studio sulla morale ellenica nella esperienza romana,* Firenze, 1945.

MATHIEU, H., *Messaline,* Paris, 1961.

MATTINGLY, H., *The Events of the Last Months of Nero, from the Revolt of Vindex to the Accession of Galba,* 1953; *Roman Imperial Civilization,* London, 1957; *Roman Coins,* London, 1960.

McKAY, A.G., *Houses, Villas and Palaces in the Roman World,* Ithaka, 1975.

MEISE, E.,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Iulisch-Claudischen Dynastie,* München, 1969.

MOMIGLIANO, A., *Aspetti dell'antisemitismo alessandrino in due opere di Filone,* 1930; *Corbulone e la politica Romana verso i Pari,* 《Atti del II Congresso Nazionale di Studi Romani》, Roma, 1931; *La personalità di Caligola,* 1932; *L'opera dell'imperatore Claudio,* Firenze, 1932; *Literary Chronology of the Neronian Age,* 1944.

NEUMEISTER, C., *Das antike Rom. Ein literarischer Stadtführer,* München, 1991.

NEWBOLD, R.F.,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A.D.64 fire at Rome,* 《Latomus》, 1974.

NONY, D., *Caligula,* Paris, 1986.

OMODEO, A., *Saggi sul Cristianesimo antico,* Napoli, 1958.

PAOLI, U.E., *Vita romana,* Firenze, 1958.

PARKER, H.M.D., *The Roman Legions,* Oxford, 1928.

PASCAL, C., *Seneca,* Catania, 1906; *Nerone nella storia aneddotica e nella leggenda,* Milano, 1923.

PASSERINI, A., *Le coorti pretorie,* Roma, 1939; *Caligola e Claudio,* Roma, 1941;

Per la storia dell'imperatore Tiberio, Pavia, 1947.
PFLAUM, H.G., *Essai sur les procurateurs équestres sous le haut-empire romain*, Paris, 1950.
PHILIPSBORN, A., *L'abandon des esclaves malades au temps de l'empereur Claude et au temps de Justinien*, 1950.
POLACCO, L., *Il volto di Tiberio. Saggio di critica iconografica*, Roma, 1955.
PROFUMO, A., *Le fonti e i tempi dell'incendio neroniano*, Roma, 1905.
PUCCI BEN ZEEV, M., *Cosa pensavano i Romani degli Ebrei?* 1987.
QUIDDE, L., *Caligula, Eine Studie über römische Cäsarenwahnsinn*, Leipzig, 1894.
RABOSSI, M., *La coniazione di Nerone. La riforma dell'oro e dell'argento*, 1953.
RADICH, V., *Political dissidence under Nero: the price of dissimulation*, 1993.
RAMSAY, W.M.,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sia Minor*, London, 1890.
REYNOLDS, B.K.P., *The Vigiles of Imperial Rome*, Oxford, 1926.
ROGERS, R.S., *Criminal Trials and Criminal Legislation under Tiberius*, Middletown, Conn., 1935; *Studies in the Reign of Tiberius*, Baltimore, 1943.
ROMANELLI, P., *Storia delle provincie romane dell'Africa*, Roma, 1959.
ROSTOVTZEFF, M., *Storia economica e sociale dell'impero romano*, Firenze, 1965.
Royal Commission on Historical Monuments, *Roman London*, London, 1928.
SCRAMUZZA, V.M., *The Emperor Claudius*, Cambridge, Mass., 1940.
SEAGER, R., *Tiberius*, London, 1972.
SHERWIN-WHITE, A.N., *The Roman Citizenship*, Oxford, 1980.
SILVAGNI, U., *Le donne dei Cesari*, Torino, 1927.
SMALLWOOD, E.M., *Some Notes on the Jews under Tiberius*, 1956;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Principates of Gaius, Claudius and Nero*, Cambridge, 1967; *The Jews under Roman R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Leiden, 1976.
SORDI, M., *I primi rapporti fra lo stato romano e il Cristianesimo, e l'origine delle persecuzioni*, 1957.
SUTHERLAND, C.H.V., *Two "Virtues" of Tiberius, a Numismatic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 Reign*, 1938; *Aerarium and Fiscus during the Early Empire*, 1945; *Coinage in Roman Imperial Policy, 31 B.C.-A.D.68*, London, 1951; *Roman Coins*, London, 1974; *The Roman Imperial Coinage 1, 31 B.C.-A.D.69*, London, 1984.
SYDENHAM, E.A., *The Coinage of Nero*, London, 1920.
SYME, R., *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1952; *Tacitus*, Oxford, 1958; *Roman*

Papers, Oxford, 1977; *Domitius Corbulo, Roman Papers II*, 1979.

THORNTON, M.K., *The enigma of Nero's Quinquennium*, 《Historia》, 1973.

TIBILETTI, G., *Principe e magistrati repubblicani*, Roma, 1953.

VAN BERCHEM, D., *Les distributions de blé et d'argent a la plèbe romaine sous l'empire*, Genève, 1939.

VAN OOTEGHEM, J., *Les incendies à Rome*, 1960.

VEYNE, P., *Le Pain et le Cirque: sociologie historique d'un pluralisme politique*, Paris, 1976.

WARMINGTON, B.H., *Nero, reality and legend*, 1929.

WATSON, G., *The Roman Soldier*, London, 1969.

WEBER, C.W., *Panem et Circenses. Massenunterhaltung als Politik im antiken Rom*, Düsseldorf-Wien, 1983.

WHEELER, R.E.M., *London in Roman Times*, London, 1930.

WILLRICH, H., *Caligula*, 《Klio》 3, 1903.

WIRSZUBSKI, Ch., *Libertas as a Political Idea at Rome during the Late Republic and Early Principate*, Cambridge, 1950.

YAVETZ, Z,. *Plebs and Princeps*, 1969.